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SSATT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ISSN 3079-4552

2026 11
第2卷第11期

編輯出版：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出版社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編輯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編輯部
編輯部郵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gotu.wisvora.com

出版社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維思沃爾出版社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THINK TANK LIMITED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總編輯　陳科存

編輯委員會

梅見華　李兆祺　林鑫　蘇天　穆艾偉
孙文杰　呂憬若　黃少安　劉宇　葉明裕
陳曦　景瑞亮　崔健　王正威　李澤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吳廷雙　穆海尚　曹一君
陳立立　舒波　袁臣輝　郝淑茹　熊森浩

版权声明

文章版權由文章作者所有，單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所刊載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C BY 4.0）進行許可。根據該許可協議，任何第三方在明確署名原作者與出處的前提下，均可對本刊內容進行複製、傳播、演繹使用，無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個別授權。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許可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廣東國圖專注於數字學術出版基礎建設與學術服務創新，致力為全球科研工作者提供專業、規範、高效的出版支援。公司透過建置數子期刊平台、孵化高水準學術期刊、提供國際出版服務，通過出版學術期刊、舉辦學術會議，推動學術界與社會各界的對話與合作。

gotu.wisvora.com　gotu-track@wisvora.com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52
網上出版 ISSN 3079-4560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
維思沃爾出版社

地址: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街 99 號啟德工業大廈 8 樓 D07
publisher@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國大陸编辑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本刊依投稿原稿字體發行
不作繁簡互轉調整

WISVORA Publis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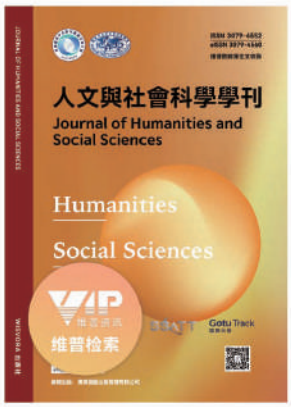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国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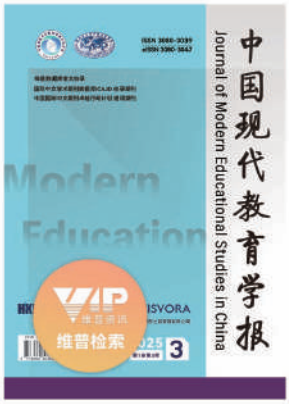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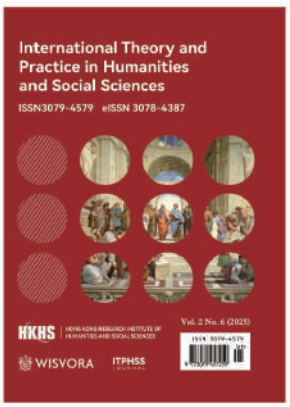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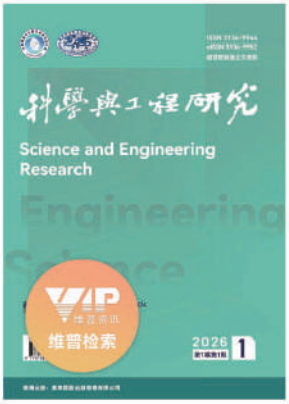
WISVORA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WISVORA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学术出版商。我们相信，跨学科前沿研究对于理解世界和解决现实挑战至关重要。WISVORA出版社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将研究见解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深入的分析和有效的策略。

WISVORA 还致力于推动中文学术成果的全球传播， 设立多个覆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艺术等领域的中文学术期刊， 为中文作者提供更便利、更高效、更专业的发表选择。 我们重视学术原创性与表达自由，采用快速审稿、开放获取、普惠版面费机制， 努力构建一个包容、多元、国际视野下的中文学术传播平台， 助力更多优质中文研究走向世界、服务社会。

>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
>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10+

我们目前已成功运营10余本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科、管理、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

我们运营的期刊数量

400+

已有来自全球的300多位学者参与我们期刊的编辑、审稿与学术合作

我们的合作学者数量

10000+

我们的作者社群已超过3000人，汇聚青年学者、博士生与研究机构专家

我们的作者社群规模

www.wisvora.com
publisher@wisvora.com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经济与管理研究

从绿色信息到信用信号：绿色信用体系的征信逻辑与制度优化——基于浙江实践 · 何杰…… 1
中小企业员工激励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研究 · 王一慧…… 10
社交媒体营销对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的影响机制及提升策略研究 · 吕林、刘岗…… 14
电商平台“处罚”行为的正当程序规制 · 孙明金…… 19
综艺IP赋能农文旅融合的空间生产机制研究——以“种地星球”项目为例 · 蒋奇英…… 24
生成式AI接受与持续使用：TAM-ECM整合机制 · 王晨…… 30

区域与发展研究

1991 年以来广西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 曾宇龙…… 38
基于数据挖掘算法的巴蜀文旅资源推荐与决策模型 · 周啸、赵太萍、李奥萌…… 46
非遗节事场景建构与产业融合——以德昌药市为例 · 刘博雅…… 52
泸州市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安全数智防控与常态治理机制研究 · 杨成、陈阳、曾传俊…… 57
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村级集体经济的迭代与优化——以豫北R镇为典型案例 · 张亚楠…… 61
明代归善县的交通——以驿站为例 · 邹逸超…… 67
由新会赵莫两姓田坦案看粤中“图告不图审”的地方诉讼特征 · 林嘉渠…… 74
地域文化符号在当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转译机制研究——以东北地域文化视觉表达为例 · 李润宇 张景潇…… 79
恢复性环境理论视角下金秀瑶族自治县乡镇公共绿色空间景观优化策略研究 · 钟丽漫、袁荣辰 巫婉婷、秦世骏…… 84
党校视域下伟大长征精神资政功能的实现逻辑与推进路径 · 周伟…… 90

教育理论与实践

地方文化资源融入《文化创意产业》课程的改革路径——以东莞为例 · 陈思萌…… 94
痛点导向下《中药资源学》校级一流课程内涵式建设与实践 · 汪丽波、施文艳、黄竹珺、张敏…… 99
二战时期英属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力量的建设 · 杨桦…… 105
生成式人工智能情境下大学生知识整合机制 · 王晨…… 112
成都市新都区校园心理异常学生群体数智防控及体育干预研究 · 郭靖祥、杨司涵、沈鑫、魏同婷 119
深度学习理念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建构模式研究——以《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例 · 周颖芳、张健、王丽萍、程瀚锐…… 123

产业导向与认知建构：三类求职能力实训营对高职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干预效果比较 · 王巧莲、郑振华石玉峰……130
从产业现场到课堂资源：访问工程师机制下跨境电商教学案例开发路径研究 · 方磊、陈聂宋铁军……137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经济数学学习 · 杨柳依、何杰……145
提质与增趣：“双减”课后服务中音乐活动的优化研究——以黄石市沈家营小学为例 · 周莲怡李海萌……150
“成长课程”理念下小学音乐课堂“五育融合”教学实践研究 · 许岳军、李秧秧……156
基于“资源-学科-素养”图谱的中小学“乐成长”特色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以黄石市为例 · 林佳欣夏娟……163
人工智能赋能基础音乐教育教学应用研究——以黄石市为例 · 万骐菲、易秀华……170
跨界学习视域下专业群教师国际化素养的生成机制——以轨道交通智能建造专业群为例钟子林……176
课程思政视域下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实践路径研究 · 陶攀、林泽航罗晓珊……181
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内涵、价值与提升路径 · 彭盈雪……186
“三新”背景下基于学习者画像的高中英语教学实践路径探究 · 代浩美、岳瑞玲……192

文化与艺术研究

微短剧镜头语言与共情机制研究——以《盛夏芬德拉》为例 · 杨博涵……197
弦歌不辍：中国文学中“琴”意象的美学内涵与文化嬗变 · 周辰……201
文化与制度之间：钱穆《政学私言》中的五权宪制构想 · 刘展……207
共耳与共像素：AIGC时代敦煌纹样的数字转译与美学重构 · 杨嘉钰……214
基于AIGC的楚漆器凤鸟纹样数字重构与文创设计实践 · 孟怡轩、崔宝琨……218
仪式、艺术与身体：商河鼓子秧歌的文化阐释与传播价值研究 · 于淼……222
基于DeepSeek的农业文本翻译提示词研究 · 徐月晨、李平……227
VR技术融合环境美学的海洋文化体验空间设计以及体验研究 · 袁荣辰、钟丽漫、秦世骏……234
共和何以失守：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的动员机制及政治转折 · 武欣悦……237
晚清驻台总兵吴光亮“飞虎军”考释 · 付诗云……242
古巴比伦时期的历法与王权 · 陈李妍……249
全球南方转向下黎紫书小说的南洋众生书写与跨族群叙事 · 陈矿……255
河南石窟乐舞艺术保护与传承研究 · 吴璇、麻鑫乐……26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 李中华……266

从绿色信息到信用信号：绿色信用体系的征信逻辑与制度优化——基于浙江实践

何杰[1]

(1.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绿色信用体系是在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形成的信用治理安排，其核心问题是绿色表现如何经由信息归集、信用化处理和场景应用转化为可核验、可解释、可使用的信用信号。既有研究主要讨论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环境信用监管和企业绿色创新，对绿色信用信息在公共信用、金融信用和市场信用之间的转换机制关注不足。本文在信息不对称、制度经济学和社会信用治理理论基础上，提出“绿色表现—信息归集—信用化处理—评价形成—场景应用—行为反馈”的分析链条。研究认为，绿色信用体系并非一般企业信用评价的绿色化附加项，而是对信用信息边界、评价逻辑和应用范围的扩展。浙江案例显示，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数字化改革、转型金融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观察绿色信息信用化过程提供了较完整的省域材料。同时，绿色信用体系建设仍面临信息边界不清、评价机制不稳、应用边界不明和权利约束不足等问题。据此，应围绕信息边界、评价机制、应用边界和权利约束四个层次优化制度安排。

关键词：绿色信用体系；环境信用监管；信用评价；信用治理；绿色金融；浙江实践

DOI：doi.org/10.70693/202610074920

From Green Information to Credit Signals: The Credit Reporting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of the Green Credit System

——Based on Zhejiang Practice

He Jie[1]

[1]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The green credit system is a credit governance arrangement form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ts core issue is how green performance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verifiable, explainable and usable credit signals through information collection, credit-based processing and scenario application.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he policy effects of green credit, environmental credit supervision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but pay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conversion mechanism of green credit information among public credit, financial credit and market credit. Based 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social credit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nalytical chain of "green performance — information collection — credit-based processing — evaluation formation—scenario application—behavioral feedback".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green credit system is not merely a green add-on to general corporate credit evaluation, but an extension of the boundary of credit information, evaluation logic and application scope. The Zhejiang case shows that green finance reform pilot zones, public credit information platforms, digital reform, transition finance and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provide relatively complete provincial-level materials for observing the credit-based transformation of green information.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en credit system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information boundaries,

作者简介：何杰(1972—)，男，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师，杭州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经济信息信用价格协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信用评估。
通讯作者：何杰

unstable evaluation mechanisms, ambiguous application boundaries and insufficient rights constraints. Accordingl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hould be optimized around four levels: information boundary, evaluation mechanism, application boundary and rights constraints.

Keywords:green credit system; environmental credit supervision; credit evaluation; credit governance; green finance; Zhejiang practice

一、引言

绿色低碳转型改变了企业信用信息的构成。企业环境表现、碳排放强度、绿色技术创新、节能降碳投入和供应链绿色管理能力，正在进入融资、监管、采购和市场合作等环节。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1]；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强调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2]。在这一政策背景下，企业绿色表现能否被转化为可识别、可评价、可使用的信用信息，直接影响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和信用监管效能。

从征信与信用治理视角看，绿色转型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特征。企业掌握自身环境投入、排放数据、治理措施和转型计划等内部信息，而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供应链伙伴和社会公众难以及时、低成本、可核验地获取这些信息。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绿色金融识别成本上升、风险定价不准确，也可能诱发虚假绿色宣传、环境数据造假和绿色项目资金错配等‘漂绿’问题。Akerlof 关于信息不对称的经典分析说明，当市场无法有效识别质量差异时，逆向选择会削弱市场效率[3]。绿色信用体系的价值正在于通过信息归集、信用评价和结果应用，将分散的绿色信息转化为具有治理功能的信用信号。

202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强调，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融合[4]。绿色信用体系可以理解为社会信用体系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具体展开。它不同于一般企业信用评价，也不同于单一绿色金融项目认定，而是围绕绿色信用信息归集、绿色信用评价、信用结果应用、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信用修复和动态反馈形成治理链条。对征信研究而言，绿色信用体系的讨论重点不应停留在绿色金融产品层面，而应回到信用信息、信用评价、信用应用和主体权益保护等基础问题。

浙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发源地，具有较高的案例观察价值。湖州、衢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绿色金融标准、绿色金融服务平台、碳账户、碳效贷款和转型金融等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信用浙江”建设和数字化改革为跨部门数据协同、企业信用画像和信用应用提供了制度与技术条件；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制造业转型以及山区海岛县绿色产业发展，又使绿色信用体系建设面对较复杂的企业结构和县域发展需求[5][6][7]。

本文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绿色信用体系在征信意义上如何界定；绿色表现如何经由信息归集、信用化处理、评价形成和结果应用转化为信用信号；浙江实践反映出哪些制度堵点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与以绿色金融政策效果为中心的研究不同，本文把绿色金融置于绿色信用结果应用场景之中；与环境信用监管研究不同，本文并不只关注监管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而是关注绿色信息如何跨越公共信用、金融信用和市场信用边界并形成可使用的信用信号。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在概念上区分绿色信用体系、环境信用、绿色征信与公共信用的边界；在机制上提出“绿色表现-信息归集-信用化处理-评价形成-场景应用-行为反馈”的分析链条；在经验材料上结合浙江实践，讨论绿色信息进入征信应用时面临的信息边界、评价机制、应用边界和权利约束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绿色金融与绿色信用识别研究

绿色金融研究普遍强调金融体系在绿色转型中的资源配置功能。Porter 和 Van der Linde 认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可能激发企业创新并改善竞争力[8]；Scholtens 指出，金融部门能够通过资本配置和治理约束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9]。国内研究更多围绕绿色信贷政策、企业绿色创新和融资约束展开。《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较早确立了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政策框架[10]；谢乔昕、张宇基于《绿色信贷指引》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转型的影响，指出绿色信贷政

策具有创新激励效应[11]；丁杰等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分化[12]；陈立峰、郑健壮讨论了绿色信贷政策、政治关联和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13]；程振等从企业风险承担角度讨论绿色信贷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14]；王花云等基于 CiteSpace 对绿色信贷研究现状与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15]。这些研究说明，绿色金融政策效果取决于绿色主体识别、信息透明度和风险定价能力，但对绿色信用信息如何进入金融识别过程讨论仍不充分。

（二）环境信用制度、绿色信用监管与企业治理研究

《征信》较早关注环境信用制度和区域绿色信用体系建设。人民银行宿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基于绿色金融视角讨论区域性企业绿色信用体系构建，已涉及绿色信用评价、绿色金融服务和区域信用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16]。应瑛等从制度变迁视角考察中国环境信用制度的演进逻辑与动态轨迹，提示环境信用制度具有从环境监管工具向综合治理制度扩展的趋势[17]。王江寒、费佳宝、李敏鑫以环境信用监管制度为研究对象，发现环境信用监管制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治理，并通过抑制管理者短视、增加环保投资等渠道提升绿色生产力水平[18]。与上述研究相比，本文不以环境信用制度变迁或监管效应为中心，而是进一步讨论绿色信息如何被信用化，并在金融、监管和市场交易中成为可使用的信用信号。

（三）社会信用体系与信用治理研究

社会信用体系研究强调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评价和应用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吴晶妹、张京基于 2014-2023 年中央政府社会信用政策文本，指出社会信用体系以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与评价为基础设施，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数智化工具[19]。黄卓、陶云清、王帅从企业违规角度发现，社会信用环境改善能够降低企业违规行为[20]。曹雨阳等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评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效果，也发现信用体系建设能够影响企业非财务行为[21]。罗森等发现社会信用体系会影响企业融资约束[22]，马庆波等则从准自然实验角度讨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23]。冯翼、徐霁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文件[24]。这些研究说明，绿色信用不宜仅被视为金融征信的补充变量，还应放在公共信用、金融信用和市场信用交互的治理结构中考察。

（四）信用标准化、企业信用监管与数据治理研究

绿色信用体系要有效运行，离不开标准化和数据治理。张金波在《征信》中指出，信用标准化在‘十四五’时期呈现应用导向加强、融合发展和垂直发展趋势，但仍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标准需求不足和标准质量参差等问题[25]。类延村、官月基于省级企业信用监管政策文本指出，企业信用监管政策在制度权威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方面仍有不足[26]。赵燕等从中小微企业综合信用评价角度指出，地方实践需重视信息来源合规性、替代数据共享、统一标准体系和信用主体救济渠道[27]。这些研究提示，绿色信用体系建设必须同时处理标准供给、数据合规、应用边界和主体权益保护问题。

（五）文献评述

既有研究已从绿色金融政策、环境信用制度、环境信用监管、社会信用体系、信用标准化和企业信用评价等方面提供了基础。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绿色信用体系并不等同于环境信用监管，也不等同于金融机构内部绿色评级。绿色金融研究多强调金融工具效果，对绿色信息如何转化为信用信息讨论不足；环境信用监管研究多关注监管制度演进及其治理效应，对信用信息跨场景流动关注不足；社会信用体系研究多关注一般信用治理，对绿色低碳转型场景下信用信息的异质性讨论不足。本文据此把研究重心放在绿色信息信用化过程，即绿色表现如何转化为信用信息、信用评价和信用信号。

表 1 相关研究脉络与本文切入点

研究脉络	核心议题	已有结论	本文推进
绿色金融	绿色信贷、融资约束、绿色创新	绿色金融政策具有创新激励和资源配置效应	忽视绿色信用信息基础
环境信用监管	环境信用制度、企业绿色治理	环境信用监管可促进绿色治理和环保投资	与征信、金融应用衔接不足
社会信用治理	公共信用信息、信用监管、信用政策工具	信用治理可降低违规、改善融资环境	绿色低碳场景讨论不足
信用标准化	标准供给、场景应用、信用评价	信用标准化强调应用导向和融合发展	绿色信用标准仍待构建
中小微信用评价	替代数据、评价合规、权益保护	综合信用评价可缓解融资障碍	绿色评价与主体救济需同步设计

三、概念边界与绿色信息信用化机制

绿色信用体系需要在概念上与环境信用、绿色征信和公共信用区分开来。环境信用主要指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基于环境守法、环境违法、环境管理和整改情况形成的信用记录或监管评价，其制度重心在环境监管。绿色征信若从狭义征信业务理解，主要涉及依法采集、整理、保存和加工与绿色低碳表现相关的信用信息，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信用产品或服务；若从广义信用治理理解，则还包括公共信用信息共享、行业信用评价和市场化信用服务等内容。公共信用则更侧重政府部门依法归集和使用的公共信用信息，具有行政管理和公共治理属性。

本文所称绿色信用体系，采用广义信用治理意义上的概念，但分析重点落在征信逻辑上，即绿色表现如何转化为信用信号。具体而言，绿色信用体系并不直接等同于环境信用监管，而是将环境信用、碳效信息、绿色技术创新、转型投入、供应链绿色管理等信息纳入信用信息处理过程；也不等同于金融机构绿色评级，而是关注公共信用、金融信用和市场信用之间的信息转换、评价形成、结果使用和权利约束。基于这一界定，本文的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绿色表现只有经过合规的信息归集、可解释的信用化处理和有边界的场景应用，才可能成为有效信用信号。

绿色信用体系的首要问题是界定其制度内涵。本文认为，绿色信用体系是以企业及相关市场主体的环境合规、资源能源利用、碳排放表现、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转型投入和生态价值创造能力为信息基础，通过数据归集、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信用修复和动态反馈，引导金融资源、监管资源和市场机会向绿色低碳方向配置的制度安排。

与一般企业信用评价相比，绿色信用体系具有更强的复合性、动态性和场景嵌入性。在信息来源上，它不仅包括财务信息、履约信息和司法行政信息，还包括环境监测、碳排放、能耗、绿色认证、环保处罚、绿色专利、供应链管理和转型计划等多源数据。在评价对象上，企业绿色转型具有过程性，不能简单以静态行业标签判断企业绿色信用水平。在应用场景上，绿色信用结果不仅用于金融授信，还可嵌入分类监管、政府采购、项目申报、产业链协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信用修复。

从运行机制看，绿色信用体系可以概括为“绿色表现—信息归集—信用化处理—评价形成—场景应用—行为反馈”六个节点。绿色表现是原始对象，主要包括环境合规、碳效水平、绿色技术创新、节能降碳投入和供应链绿色管理等行为事实；信息归集解决绿色数据获取和主体关联问题；信用化处理通过来源确认、口径标准化、真实性核验、时效处理和可解释加工，使原始绿色数据具备进入信用评价的条件；评价形成表现为评分、评级、标签或画像；场景应用则将评价结果嵌入授信、监管、采购、供应链合作等环节；行为反馈体现为企业整改、转型、修复和持续披露，并重新进入下一轮信息更新。

所谓绿色信息“信用化”，并非简单将环境、碳排放等数据纳入信用数据库，而是通过合法来源确认、主体关联、口径标准化、真实性核验、时效处理和可解释加工，使原始绿色数据具备进入信用评价和特定应用场景的条件。信用信息是被归集、加工的基础信息；信用信号则是该信息经过评价和场景解释后，对主体绿色履约能力、环境风险或转型能力形成的可使用判断。

上述链条可以从三个理论视角加以解释。信息不对称理论说明，绿色表现若不能转化为外部可识别信号，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交易伙伴就难以判断企业环境风险和转型能力；制度经济学强调，信用信号的形成依赖稳定规则，包括信息归集边界、评价标准、结果使用和责任配置[28]；社会信用治理理论则解释信用结果为何会进入金融、监管和市场场景，并通过守信激励、失信约束和信用修复影响主体后续行为。



图 1 绿色信息信用化与信用信号形成链条
资料来源：根据社会信用治理和绿色金融实践归纳绘制。

从征信功能看，绿色信用体系并不是在既有企业信用评价之外简单叠加绿色指标，而是对信用信息范围、信用评价逻辑和信用应用边界的系统扩展。信用信息范围由传统履约信息拓展到环境绩效、碳效表现和转型行为，信用评价逻辑由静态违约风险识别拓展到绿色转型能力识别，信用应用边界由金融交易扩展到监管分类、供应链协同和公共资源配置。由此，绿色信用体系既具有信息基础设施属性，也具有激励兼容和风险治

理属性。

绿色信用体系的作用机制可以从信息识别、信用评价、资源配置、激励约束、供应链传导和包容发展等维度加以理解。信息识别机制通过多源绿色数据归集和评价，将企业绿色表现转化为可验证信用信号，缓解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信用评价机制依托分类分层指标体系，把环境合规、碳效水平、转型投入和绿色创新纳入评价过程，形成可比较的绿色信用等级；资源配置机制将绿色信用结果嵌入授信审批、利率定价、担保增信、财政奖补和项目申报，引导资源向绿色主体和真实转型主体流动。在此基础上，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和风险提示提高企业绿色守信收益与违法失信成本，供应链传导机制则将绿色信用评价从单个企业扩展到链主企业、平台企业和上下游中小微企业之间的信用管理关系之中。对于山区海岛县和生态功能地区而言，绿色信用还可以识别生态资源和绿色产业价值，拓宽县域绿色产业融资渠道，从而体现信用治理的包容发展功能。

表 2 绿色信用体系运行环节的征信功能

运行环节	主要信息或行为	征信功能	治理效应
绿色表现	环境合规、碳效水平、绿色创新、转型投入	形成待归集的绿色行为事实	明确原始对象
信息归集	多源数据采集、主体关联、授权共享	把分散绿色数据转化为基础信用信息	降低信息搜寻成本
信用化处理	来源确认、标准化、真实性核验、时效处理	使原始绿色数据具备评价和使用条件	提高信息可核验性
评价形成	评分、评级、标签、画像	形成可解释、可比较的信用判断	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场景应用	授信定价、分类监管、政府采购、供应链协同	把信用判断嵌入资源配置过程	形成外部激励约束
行为反馈	整改、转型、修复、持续披露	将应用结果反馈至下一轮信息更新	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四、浙江实践：绿色信用体系的运行场景与制度表征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意义上的材料归纳方法考察浙江实践。选择浙江作为观察对象，主要基于三点考虑：其一，浙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发源地，绿色发展政策实践具有连续性；其二，湖州、衢州是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平台、碳效贷款、转型金融等实践为绿色信用结果应用提供了可观察场景；其三，浙江同时具有民营经济活跃、中小微企业数量多、山区海岛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求强等特征，能够呈现绿色信用体系在金融、监管、产业和县域发展中的多重应用。

材料来源包括 2016 年以来国家层面绿色金融和社会信用体系政策文件、浙江省及湖州、衢州等地公开发布的绿色金融和信用体系建设材料、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公开资料，以及《征信》等期刊既有研究。本文并不将这些材料作为严格因果识别证据，而是按照“信息来源—信用加工—结果使用—行为反馈”的维度进行制度表征分析，用以说明绿色信息在浙江实践中如何进入信用治理过程。

浙江案例的观察价值，不仅在于绿色金融规模，也在于生态文明建设、信用治理、数字化改革和民营经济转型之间具有较清晰的制度关联。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发源地，浙江较早形成了生态价值、产业价值和治理价值相互转化的政策环境；作为民营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浙江又面临大量中小微企业绿色转型、供应链绿色管理和融资信用增进需求。浙江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开展专项行动，也为绿色信用信息进入金融服务提供了政策场景[29]。绿色信用体系在这两类需求之间承担转换功能：一端将生态环境和绿色转型信息转化为信用信号，另一端将信用信号嵌入金融服务、监管分类、产业协同和县域发展。

表 3 浙江绿色信用体系建设的省域特色

浙江特色	具体表现	对绿色信用体系的意义
两山理念发源地	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政策基础较为清晰	绿色信用可承接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制度需求
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	湖州、衢州积累绿色项目识别、碳效贷款、转型金融等实践	为绿色信用评价结果进入金融业务提供实验基础
信用浙江与数字化改革	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平台调用和应用反馈基础较为完整	为绿色信用多源数据协同和动态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民营经济和块状产业	中小微企业多、供应链协同强、制造业转型需求集中	适合探索供应链绿色信用和中小微企业绿色增信
山区海岛县与共同富裕	生态资源丰富但传统抵押物和融资渠道相对不足	适合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县域绿色信用融资
转型金融先行探索	从绿色项目支持延伸到传统产业低碳改造识别	推动绿色信用从静态认定转向动态转型能力评价

从制度基础看，‘信用浙江’和数字化改革为绿色信用体系提供了信息基础设施。湖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显示，当地较早建成市、区县一体化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全面归集五类主体信用信息，并形成信用应用业务协同

链条[30]。这表明浙江绿色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在公共信用信息归集、信用产品调用、应用结果反馈和数字化治理能力之上。对于绿色信用而言，这种基础设施有助于生态环境、能源、市场监管、金融机构和信用服务机构之间开展信息协同。

从金融应用看，湖州、衢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提供了较集中观察对象。湖州绿色贷款余额由 2017 年的 369.5 亿元提升至 2024 年 6 月末的 3976.3 亿元，绿色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达到 33.8%，绿色贷款不良率仅 0.02%[31]。绿色金融规模扩大后，金融机构对绿色识别、信用评价和风险防控的需求随之提高，绿色信用评价结果也更容易进入业务流程。

从平台机制看，湖州实践的特点在于将绿色识别、信用评价和金融服务嵌入数字平台。公开材料显示，湖州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累计帮助 4.36 万家企业获得银行授信超 5328 亿元，碳效贷款截至 2024 年 6 月末累计发放 665.99 亿元[32]。‘绿贷通’平台将绿色、低碳标识嵌入银企融资对接流程，并推动 ESG 评价结果应用于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33]。这表明绿色信用信息已经进入客户筛选、贷前调查、贷中审批、贷后管理和风险定价环节。

衢州实践可以补充湖州案例中过于集中于金融平台的观察角度。衢州较早推进碳账户体系改革，并将碳账户与碳金融、碳足迹、绿色低碳供应链和分领域碳账户应用相衔接。2024 年衢州市发展改革委有关答复提出，深化碳账户体系改革，完善基于碳账户的转型金融模式，建立统一规范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并按县域和功能区推动个人、交通、能源、农业、项目、林业、工业、建筑等碳账户示范应用[33]。2025 年通过、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进一步将区域、单位、项目、个人碳账户以及碳账户金融纳入地方性法规框架，明确碳账户依法归集能源消费、生产过程碳排放、绿色低碳行为等数据并动态核算碳排放总量、强度和减排量[34]。这说明浙江绿色信用实践不仅有湖州的绿色金融平台和碳效贷款，也有衢州以碳账户制度化为核心的信息归集和信用化处理探索。

表 4 政策与实践文本中的绿色信用治理要素

政策或实践载体	核心内容	征信与信用治理意义
全面绿色转型政策	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提出绿色信用信息进入发展治理的宏观制度背景
绿色金融服务美丽中国建设政策	强调绿色金融资源配置、风险防控和产品服务创新	为绿色信用评价结果进入金融业务提供政策接口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意见	强调信用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并融入经济社会各环节	确立绿色信用体系作为领域化信用治理的制度依据
湖州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银企对接、授信评估、碳效贷款、绿色识别	呈现绿色信用信息平台化、产品化和流程化应用
湖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	绿色低碳标识嵌入融资对接，ESG 评价进入定价和风控	体现信用评价结果由记录走向金融应用和风险管理
浙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两山银行、绿色贷款、生态资源价值转化	拓展绿色信用在县域产业和生态产品融资中的应用边界
衢州碳账户体系	区域、单位、项目、个人碳账户与碳账户金融	呈现绿色信息归集、信用化处理和场景应用的制度化路径

从产品创新看，浙江实践已经从支持‘纯绿’项目延伸到识别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湖州成为浙江省转型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城市，公开材料显示当地围绕转型标准制定、金融资源配置和转型信息披露开展实践，累计发布转型金融支持项目、企业和技术 10 批次 156 个，并创新‘转型贷’‘碳效贷’等与转型目标、碳效表现相挂钩的专项金融产品。这提示绿色信用评价对象不应限于已经绿色的企业，还应识别高碳行业企业的真实转型行为和阶段性降碳绩效。

从部门协同看，浙江实践呈现出公共信用、税务信用、绿色金融和环境信息交叉融合的特征。湖州‘绿税通’服务平台通过‘数字税务+绿色金融’联动，推动小微企业将纳税信用、减碳成果转化为融资资本，并计划协助银行创新低碳信贷产品、降低信用贷款融资成本[29]。这一做法表明，绿色信用体系建设不是单一金融部门或生态环境部门能够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公共数据、税务数据、绿色低碳数据和金融风控模型之间形成可控共享与合规应用。

从县域场景看，浙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展了绿色信用体系的应用边界。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材料显示，截至 2021 年底浙江省绿色贷款余额达到 1.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3%，全省已建立‘两山银行’29 家[35]。山区海岛县生态资源丰富，但产业基础和融资渠道相对有限，生态农业、绿色文旅、清洁能源、生态修复等项目往往缺少传统抵押物。绿色信用体系可以通过识别生态产品经营主体的生态价值创造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履约能力，把部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可评价、可增信、可融资的信用资产。

由此看，浙江实践的分析价值在于呈现了‘理念基础—信用基础设施—数字平台—金融产品—产业转型—县域发展’之间的连续关系。绿色信用体系在浙江并非单纯服务绿色贷款增长，而是将绿色表现转化为信用信息，并将信用评价结果连接到金融服务、监管分类、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传统产业转型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中。

表 5 浙江绿色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实践与制度表征

领域	数据或做法	对绿色信用体系的启示
浙江绿色贷款	2021 年底余额 1.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3%	绿色金融支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浙江“两山银行”	截至 2021 年底建立 29 家，净资产规模 216 亿元	生态资源资产化、信用化、金融化场景
湖州绿色贷款	2017 年 369.5 亿元；2024 年 6 月末 3976.3 亿元	绿色金融扩张需要信用识别支撑
湖州绿色贷款风险	2024 年 6 月末占全部贷款 33.8%，不良率 0.02%	绿色信用有助于风险识别和定价
湖州绿色金融平台	累计帮助 4.36 万家企业获得银行授信超 5328 亿元	平台化归集信息并嵌入银企对接
湖州碳效贷款	截至 2024 年 6 月末累计发放 665.99 亿元	碳效表现与融资支持关联
湖州信用应用	绿色、低碳标识嵌入银企融资对接全流程	绿色信用从记录走向应用
浙江金融五篇大文章	目标：2025 年全省绿色贷款余额突破 4.2 万亿元	绿色金融总量保障、信息共享和转型金融服务协同[35]
衢州碳账户改革	推进碳账户体系改革，建设分领域碳账户示范应用；《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将碳账户金融纳入地方性法规框架	为绿色信用信息归集、动态核算和信用化处理提供制度样本

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湖州市相关信用体系建设文件、衢州市碳账户建设相关政策法规等公开材料整理。

五、现实堵点：绿色信息信用化的制度约束

结合政策文本、浙江实践材料和既有文献，绿色信用体系从政策倡导进入征信应用时，制度堵点并非彼此孤立的六个问题，而可归纳为信息边界、评价机制、应用边界和权利约束四个层次。

表 6 绿色信用体系制度堵点的证据来源与解释

制度张力	来源	解释
信息边界	社会信用政策研究强调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与评价是信用治理基础设施[17]；湖州实践显示绿色金融平台需要嵌入银企对接和绿色低碳标识[14]	绿色信息进入信用体系前，需要明确数据来源、共享范围、更新频率和使用责任
评价机制	信用标准化研究指出标准供给、应用导向和质量差异仍是信用治理难点[20]；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研究显示不同企业创新转型存在差异化影响[8][9][10]	绿色信用评价需要兼顾统一标准、行业差异和转型过程，避免静态标签化
应用边界	湖州绿色金融平台累计帮助 4.36 万家企业获得授信超 5328 亿元[13]；绿色金融政策强调风险防控[2]	评价结果进入金融和监管流程后，需要防止替代审慎风控和事实认定，并防范漂绿风险
权利约束	中小微企业综合信用评价研究提出信息来源合规、替代数据共享、统一标准和信用主体救济渠道问题[22]	评价结果影响企业利益时，必须同步设置告知、异议、纠错、修复和责任机制

信息边界问题，是绿色表现能否进入信用信息体系的前提。绿色信用评价需要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税务、能源、行业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和信用服务机构等多方数据支撑，但这些数据在权属、口径、更新频率、安全责任和商业秘密保护方面存在差异。若缺少清晰的信息采集边界和共享规则，绿色信息既可能归集不足，也可能因过度采集、重复采集或来源不明而引发合规风险。

评价机制问题，集中表现为绿色属性复杂性与信用评价标准化之间的张力。绿色信用评价既要具有统一规则，又要处理行业差异、企业规模差异和转型阶段差异。传统制造业企业尤其具有代表性：部分企业当前排放水平较高，但已形成明确转型目标、技术改造计划和阶段性减排绩效。如果评价机制只关注静态绿色认定，容易排斥真实转型主体；如果指标体系过度复杂，又会增加评价成本并削弱可解释性。

应用边界问题，关系到信用评价结果能否转化为有效信用信号。信用评价结果只有进入授信审批、利率定价、担保增信、政府采购、项目申报、监管分类、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才可能影响资源配置和主体行为。但结果应用也存在边界：绿色信用评价不能替代金融机构审慎风控，也不能替代行政监管事实认定。绿色金融规模扩大后，虚假绿色宣传、环境数据造假、资金用途偏离等漂绿风险需要通过动态监测、用途追踪和风险提示加以约束。

权利约束问题，是绿色信用体系区别于一般政策工具的制度要求。绿色信用结果一旦进入融资、监管、采购和供应链场景，就可能影响企业重大利益。因此，绿色信用体系必须明确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化信用信息的使用边界，建立评价结果告知、数据纠错、异议处理、动态更新、信用修复和算法评价责任机制。否则，信用评价越

广泛使用，越可能带来评价失真、权利救济不足和信用歧视风险[22]。

六、制度优化：围绕信用信号形成的规则完善

信息边界层面，应建立绿色信用信息目录和分级使用规则。目录应区分公共信用信息、环境监管信息、金融机构业务信息、企业自主披露信息和第三方评价信息，并明确采集依据、共享范围、授权方式、更新频率和责任主体。对于涉及商业秘密、碳排放敏感数据和企业经营策略的信息，应采取授权使用、最小必要、用途限定和安全审计等规则，避免以绿色信用建设名义扩大无边界数据采集。

评价机制层面，应在统一基础规则下建立分类分层评价体系。绿色低碳产业可以重点考察绿色技术创新、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益；传统制造业应重点考察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节能降碳投入和阶段性减排进度；中小微企业则应降低信息填报门槛，选取可获得、可验证、可解释的关键指标。对转型金融场景而言，评价机制还应区分静态绿色属性和动态转型能力，避免简单以行业标签替代信用判断。

应用边界层面，应把绿色信用结果嵌入金融、监管和市场交易流程，同时明确其使用限度。在金融领域，绿色信用评价可作为授信准入、利率定价、担保增信和贷后管理的辅助信息，但不能替代金融机构独立风控；在监管领域，绿色信用结果可用于分类监管和风险提示，但不能替代行政事实认定；在市场交易领域，绿色信用结果可用于供应链采购、订单融资和合作伙伴筛选，但应防止形成不合理市场排斥。

权利约束层面，应把主体权益保护嵌入绿色信用体系设计。绿色信用评价结果进入融资、监管、采购和供应链场景前，应建立结果告知、数据纠错、异议处理、信用修复和重新评价机制。对于算法模型参与评价的，应明确模型解释、数据来源、责任主体和复核路径。对于已完成整改、持续改善绿色表现的企业，应允许其通过动态披露和信用修复改变信用状态，使绿色信用体系兼具风险约束和转型激励功能。

七、结论与启示

绿色信用体系的核心不在于给企业增加绿色标签，而在于使企业绿色表现经过合规采集、信用化处理和有边界使用后，成为能够影响金融、监管和市场交易的信用信号。由此看，绿色信用体系既不同于环境信用监管，也不同于金融机构内部绿色评级，而是公共信用、金融信用和市场信用之间的信息转换机制。

浙江实践表明，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数字化改革、转型金融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绿色信息进入信用治理过程提供了较完整的制度材料。湖州绿色金融平台、碳效贷款、绿色低碳标识和 ESG 评价结果应用，以及衢州碳账户建设和碳账户金融等实践表明，绿色信息已经开始进入信息归集、信用评价、授信定价、风险管理和监管应用等环节。

制度优化的重点，应从单纯扩展绿色金融产品转向规范信用信号形成过程。信息边界决定哪些绿色信息可以进入信用体系，评价机制决定绿色信息如何被信用化，应用边界决定信用结果在金融、监管和市场交易中的使用限度，权利约束则决定信用主体能否获得告知、纠错、异议、修复和复核机会。只有上述规则相互衔接，绿色信用体系才能避免在绿色金融、环境监管和信用治理之间发生概念混用和责任错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Z].2024.

[2]中国人民银行，生态环境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Z].2024.

[3]Akerlof G A.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84(3): 488-500.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Z].2025.

[5]国家发展改革委.浙江省《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意见》答记者问[EB/OL].2022.

[6]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湖州绿色金融改革相关实践材料[EB/OL].2024.

[7]湖州市发展改革委等.2024 年湖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Z].2024.

[8]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97-118.

[9]Scholtens B. Finance as a Driver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6, 68(1):19-33.

[10]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Z].2016.

[11]谢乔昕，张宇.绿色信贷政策、扶持之手与企业创新转型[J].科研管理,2021,42(1):124-134.

[12]丁杰，李仲飞，黄金波.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J].金融研究,2022(12):55-73.

[13]陈立峰，郑健壮.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53(8):42-62.

[14]程振，赵振智，吕德胜.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10):68-74.

[15]王花云，杨柳，高风雨.基于 CiteSpace 的中国绿色信贷研究现状与热点可视化分析[J].征信,2026,44(7).

[16]中国人民银行宿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构建区域性企业绿色信用体系研究：基于绿色金融视角[J].征信,2017(11):42-45.

[17]应瑛，蒋小忠，董敏杰.中国环境信用制度变迁：演进逻辑与动态轨迹[J].征信,2024(7):6-13.

[18]王江寒，费佳宝，李敏鑫.绿色治道：环境信用监管制度与企业绿色治理[J].征信,2026,44(5):43-56.

[19]吴晶妹，张京.智慧社会构建：跨领域协同在社会信用治理中的应用——基于中国社会信用政策量化研究[J].征信,2026,44(1):1-10.

[20]黄卓，陶云清，王帅.社会信用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违规吗？——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J].金融研究,2023(5):96-114.

[21]曹雨阳，孔东民，陶云清.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效果评估：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J].财经研究,2022(2):93-108.

[22]罗森，丁玲，韩家平.社会信用体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以 A 股上市公司为例[J].征信,2026,44(2):12-20.

[23]马庆波，胡元林，杨国玉，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征信,2025,43(12):35-46.

[24]冯翼，徐霁.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文件研究[J].征信,2024(12):53-61.

[25]张金波.信用标准化："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J].征信,2026,44(5):10-22.

[26]类延村，官月.企业信用监管政策的结构维度、机制设计与优化发展——基于 59 件省级专项文本的考察[J].征信,2024,42(07):41-50.

[27]赵燕，毛芷贻，肖伟志，李向华.中小微企业综合信用评价地方实践的法律风险与预防路径[J].征信,2025,43(12):66-74.

[28]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9]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浙江开展五大专项行动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EB/OL].2024.

[30]湖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Z].2021.

[31]衢州市发展改革委.衢州市发改委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 82 号提案的答复[EB/OL].(2024-08-26)[2026-08-22].https://www.qz.gov.cn/art/2024/8/26/art_1229357427_5363124.html.

[32]衢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Z].2025.

[33]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湖州：转型金融助推绿色低碳发展[EB/OL].2024.

[34]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湖州市税务局："绿税通"数智赋能打造绿色发展新路径[EB/OL].2023.

[35]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浙江出台 20 项举措支持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EB/OL].(2025-03-31)[2026-08-22].https://zjic.zj.gov.cn/ywdh/nyhj/202503/t20250328_23346800.shtml.

中小企业员工激励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研究

王一慧

(韩国东新大学校，韩国 全罗南道 罗州市 58245)

摘 要：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吸纳社会就业的核心力量。人力资源作为企业核心竞争资源，员工激励机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企业人才留存效率、团队执行力与长期发展潜力。当前我国多数中小企业受经营规模、资金实力、管理理念限制，员工激励体系存在诸多漏洞，普遍出现员工积极性不足、人才流失严重、团队凝聚力薄弱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工商管理相关理论，结合中小企业经营特点，系统分析企业员工激励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成因，并针对性提出科学化、可落地的激励优化策略，旨在为中小企业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激活员工内生动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中小企业；员工激励；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优化安全管理

DOI：doi.org/10.70693/202610115659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Employee Incentive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Yihui Wang

Dongshin University, Naju-si, Jeollanam-do 58245, Republic of Korea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marke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ly fierce industrial competiti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have become a core force driving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absorbing social employment. As human resources constitute the core competitive asset of enterprises, the maturity of the employee incentive mechanism directly determines an enterprise's talent retention rate, team execution capac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potential. Restricted by business scale, capital strength and managerial concepts, most SMEs in China have various defects in their employee incentive systems. Common challenges including low employee motivation, severe brain drain and weak team cohesion seriously hinder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combined with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M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prominent problems in employee incentive practices, explores their root causes, and puts forward scientific and actionabl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incentives. It aims to offer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SMEs to impro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 stimulate employees'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enhance core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Employee Incentive;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Optimization of Incentive Mechanism;Safety Management

作者简介：王一慧(2000—)，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小企业员工激励政策。

通讯作者：王一慧

一、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市场竞争从传统的产品、价格竞争逐步转向人才与管理的竞争。中小企业数量庞大、覆盖面广，是市场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的主体，但其生命周期短、抗风险能力弱的痛点始终存在。究其根本，除了资金、技术、市场等外部因素制约，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滞后、激励机制缺失是核心内因。

员工激励是工商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模块，通过物质、精神、发展等多元化激励手段，能够有效调动员工工作主动性与创造性，实现员工个人价值与企业发展目标的深度绑定。相较于大型企业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充足的激励资源，中小企业激励方式单一、激励体系随意化、考核与激励脱节等问题突出，难以适配新时代员工的职业需求。因此，深入研究中小企业员工激励的现存问题，构建适配中小企业发展的激励体系，对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助力企业长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小企业员工激励的核心理论基础

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级，是员工激励最基础的理论依据。该理论核心观点为员工的工作动力来源于未被满足的需求，不同层级员工的核心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基层员工更关注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基础生理与安全需求，中层员工注重团队氛围、职业认可等社交与尊重需求，核心骨干与青年员工更看重职业晋升、能力提升、自我价值实现。中小企业开展激励工作，需结合员工需求差异制定分层激励方案，避免单一化激励导致的效果缺失。

2.2 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

双因素理论将影响员工工作状态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其中薪资待遇、工作环境、企业制度等保健因素只能消除员工的不满情绪，无法有效激发工作积极性；而工作成就感、晋升机会、培训发展、工作自主权等激励因素，是调动员工主观能动性的关键。当前多数中小企业过度依赖薪资福利等保健因素，忽视激励因素的开发，导致员工无负面情绪但工作懈怠、缺乏进取动力，这也是企业员工工作效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2.3 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认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相关，更取决于员工对自身与他人报酬分配的公平感知。员工会通过对比自身投入产出比与同事、行业同岗位水平，判断激励分配的公平性。若感知分配不公，会产生消极怠工、离职跳槽等负面行为。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绩效考核不透明、激励分配随意、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严重破坏激励公平性，大幅降低激励效果。

三、中小企业员工激励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激励方式单一，过度依赖物质激励

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的激励模式较为传统固化，普遍将薪资、奖金、福利等物质奖励作为唯一激励手段，忽视精神激励、发展激励的重要作用。部分企业管理者片面认为，只要薪酬待遇达标，就能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缺乏对员工精神需求、职业发展需求的关注。对于青年员工、技术型员工而言，单纯的物质激励无法满足其职业成长、自我提升、价值认可的需求，长期下来会导致员工工作热情消退、职业倦怠加剧。同时，过度依赖物质激励会大幅增加企业人力成本，且边际激励效果持续递减，一旦企业经营波动、薪资调整滞后，极易引发员工不满，造成人才流失[1]。

3.2 激励机制缺乏系统性，制度规范性不足

中小企业大多采用家族式、粗放式管理模式，尚未建立标准化、系统化的员工激励制度，激励工作主观性、随意性极强。多数企业没有制定明确的激励标准与实施流程，员工奖惩、晋升、评优等激励行为多由管理者主观判断，缺乏客观依据。日常工作中，管理者往往根据员工临时工作表现、个人印象给予奖励，激励标准模糊、奖惩尺度不一。同时，企业激励与绩效考核严重脱节，绩效考核流于形式，考核结果无法精准对接激励分配，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无差别”的现象，严重打击优秀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团队整体工作氛围松散。

3.3 职业发展激励缺失，员工成长空间受限

相较于大型企业完善的员工培训、晋升体系，中小企业普遍存在重使用、轻培养的问题，极度缺乏职业发展激励机制。一方面，企业忽视员工培训体系建设，极少开展系统化的技能培训、职业素养培训，员工难以获取专业能力提升的渠道，无法适配行业发展与岗位升级需求，职业能力停滞不前[2]。另一方面，企业岗位层级简单、晋升

通道狭窄，多数管理岗位由家族成员或老员工垄断，基层优秀员工缺乏公平的晋升机会，职业天花板过低。员工长期看不到职业发展前景，个人价值无法实现，逐渐丧失工作动力，最终选择离职跳槽，导致企业人才梯队断层。

3.4 激励公平性不足，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

激励的核心在于公平公正，而公平性缺失是中小企业激励管理的突出痛点。首先，绩效考核体系不科学，多数企业考核指标单一，仅以工作产量、业绩数据为核心，忽视工作态度、团队协作、工作创新等关键指标，考核结果片面，无法客观反映员工综合工作表现。其次，考核过程不透明，缺乏公开的考核流程、结果公示与申诉渠道，员工无法知晓自身考核问题与改进方向。最后，激励分配不公，存在平均主义、人情激励等问题，优秀员工得不到对应奖励，消极员工无惩罚约束，严重违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极大削弱了激励的公信力与有效性。

3.5 精神激励薄弱，员工归属感与凝聚力不足

良好的精神激励能够增强员工的企业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激励方式，却被多数中小企业忽视。企业管理者普遍重业绩、轻人文，缺乏对员工的人文关怀，日常工作中极少对员工的工作成果给予认可、表扬与肯定[3]。企业团队文化建设缺失，员工沟通渠道不畅，上下级、同事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团队氛围沉闷。同时，企业不关注员工的工作压力与生活需求，缺乏人性化关怀，导致员工对企业缺乏归属感与认同感，仅将工作视为谋生手段，难以形成爱岗敬业、主动奉献的职业态度，团队凝聚力与向心力严重不足。

四、中小企业员工激励问题的成因分析

4.1 管理者管理理念滞后

多数中小企业管理者文化水平与专业管理能力有限，缺乏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思维，对员工激励的重要性认知不足。部分管理者固守传统管理思维，将员工视为单纯的劳动生产者，忽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与多元化需求，片面追求企业短期经济效益，忽视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的长期价值。同时，管理者缺乏系统的激励理论知识，不了解不同激励方式的适配场景，无法结合企业实际与员工需求制定科学的激励方案，导致激励工作盲目化、低效化。

4.2 企业资金与资源约束

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资金储备有限、抗风险能力弱，日常经营资金主要投入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生产运营等核心板块，可用于人力资源激励的资金与资源十分有限。相较于大型企业充足的激励预算、完善的培训资源、多元的福利体系，中小企业难以投入大量资金搭建完善的激励体系，无法为员工提供高额薪资、优质培训、优厚福利等激励条件，客观制约了激励工作的开展[4]。

4.3 管理制度体系不健全

中小企业成立时间短、管理基础薄弱，尚未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激励配套体系。企业组织架构简单、岗位职责模糊，缺乏标准化的绩效考核、员工培训、晋升管理、奖惩制度，各项管理工作无章可循。同时，企业内部监管机制缺失，激励实施过程缺乏监督约束，导致激励制度落地困难、执行流于形式，无法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

五、优化中小企业员工激励机制的具体策略

5.1 丰富激励方式，构建多元化激励体系

中小企业需摒弃单一的物质激励模式，结合双因素理论，构建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发展激励相结合的多元化激励体系。首先，优化物质激励，建立弹性薪酬体系，结合岗位价值、工作业绩、工作难度制定差异化薪资标准，设立绩效奖金、全勤奖励、创新奖励、团队奖励等专项福利，保证物质激励的合理性[5]。其次，强化精神激励，通过公开表彰、荣誉证书、岗位公示、口头嘉奖等方式，肯定员工的工作成果，满足员工的尊重需求。最后，落地发展激励，为优秀员工提供轮岗历练、专项培训、项目主导等机会，全方位激活员工工作动力，实现激励效果最大化。

5.2 完善激励制度，推进激励管理标准化

中小企业需打破粗放式管理模式，建立系统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激励管理体系。结合企业经营现状、岗位特点与员工结构，制定明确的员工激励管理制度，明确奖惩标准、考核流程、晋升规则、激励实施流程，让激励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同时，强化激励制度的落地执行，杜绝管理者主观随意决策，保证激励工作的规范性。建立激励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市场环境、员工需求变化，及时优化激励制度与方

案，适配企业发展与员工需求，持续提升激励的科学性。

5.3 搭建职业发展通道，完善员工培养体系

针对员工成长空间不足的问题，企业需搭建清晰、公平的职业发展通道，完善员工培训培养体系。一方面，优化岗位晋升机制，打破家族化、资历化晋升壁垒，建立“能力优先、业绩导向”的晋升标准，为基层员工、青年员工提供公平的晋升机会，明确不同岗位的晋升层级与发展路径，让员工清晰规划职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构建常态化培训体系，结合岗位需求与员工能力短板，开展技能培训、管理培训、职业素养培训，同时鼓励员工自主学习、技能提升，并给予培训补贴、学习奖励，助力员工能力成长，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5.4 优化考核体系，保障激励公平公正

公平公正是激励有效的前提，企业需搭建科学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为激励分配提供精准依据。首先，细化考核指标，结合不同岗位的工作内容，从工作业绩、工作态度、团队协作、创新能力、岗位职责履行等多维度设置考核指标，保证考核的全面性与客观性。其次，规范考核流程，实行月度考核、季度复盘、年度总评的考核模式，公开考核标准、考核过程与考核结果，设立员工申诉渠道，及时解决考核争议问题。最后，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成绩与薪资调整、奖金发放、晋升评优、培训资源精准挂钩，实现“优绩优酬、多劳多得、劣绩约束”，充分发挥考核激励的导向作用。

5.5 强化人文关怀，增强员工企业归属感

中小企业需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强化人文关怀，提升员工归属感与团队凝聚力。一方面，搭建畅通的沟通渠道，管理者主动倾听员工的工作诉求、意见建议，及时解决员工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与生活困境，拉近企业与员工的距离。另一方面，定期开展团建活动、节日福利、员工关怀、带薪休假等人性化举措，缓解员工工作压力，营造和谐、积极、温暖的工作氛围。同时，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尊重员工、认可员工、赋能员工，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重视与关怀，主动将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绑定，提升工作主动性与忠诚度[6]。

六、结论

员工激励是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企业人才留存、团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员工激励工作存在激励方式单一、制度体系不完善、发展激励缺失、公平性不足、人文关怀薄弱等诸多问题，根源在于管理理念滞后、资源约束、管理制度不健全。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中小企业必须转变传统管理思维，立足企业经营实际与员工多元化需求，通过构建多元化激励体系、完善激励管理制度、搭建职业发展通道、优化绩效考核机制、强化人文关怀等策略，全面优化员工激励体系，有效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破解人才流失、团队低效的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参考文献：

[1] 张德.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 5 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2] 李思勰.基于数智化视角的中小企业人才激励机制优化策略探讨 [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24 (14):84-86.

[3] 杨洋.探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员工激励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4 (11):101-103.

[4] 赵晨阳.中小企业薪酬管理优化策略研究 [J]. 现代商业，2025 (15):173-176.

[5] 付盼.薪酬激励制度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J]. 中国集体经济，2024 (23):97-100.

[6] 兰雁琳。从团队协作到企业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动态激励模式研究 [J]. 全国流通经济，2025 (08):109-112.

社交媒体营销对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的影响机制及提升策略研究

吕林[1] 刘岗[1]

(1.淮北理工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平台的持续发展，社交媒体营销逐渐成为企业塑造品牌形象、维系消费者关系及提升品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与传统营销方式相比，社交媒体营销具有互动性、参与性、个性化及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能够通过消费者参与、品牌信任、品牌社群、意见领袖传播和电子口碑等途径影响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然而，社交媒体营销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并非单向且必然为正，其实际效果受到隐私顾虑、广告干扰、消费者既有品牌态度以及平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文献综述与理论整合的方法，梳理社交媒体营销与品牌忠诚度的相关研究，分析消费者参与、品牌信任、个性化营销、品牌社群及电子口碑等因素的作用机制，并从内容建设、关系维护、数据治理和效果评估等方面提出品牌忠诚度提升策略。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在长期动态效应、作用机制整合、忠诚度测量及研究情境适用性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企业优化社交媒体营销实践及后续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交媒体营销；品牌忠诚度；品牌信任；消费者参与

基金项目：淮北理工学院 2025 年校级科研项目资助(2025SK001)

DOI：doi.org/10.70693/202610184924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Social Media Marketing on Consumer Brand Loyalty and Strategies for Its Enhancement

Lyu Lin[1], Liu Gang[1]

[1]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Anhu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ocial media marketing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vital tool for enterprises to shape brand identity, cultivate consumer relationships, and enhance brand competitivenes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arketing approaches, social media marketing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levels of interactivity, engagement, personalization, and rapid dissemination. It influences consumer brand loyalty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including consumer engagement, brand trust, brand communities, the influence of opinion leaders, and electronic word-of-mouth (eWOM). However,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marketing on brand loyalty is neither unidirectional nor inherently positive; its actual effectiveness is contingent upon factors such as privacy concerns, advertising intrusiveness, consumers' pre-existing brand attitudes, and the specific platform environment. Employ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pproach, this paper synthesizes existing research on social media marketing and brand loyalty. It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such as consumer engagement, brand trust, personalized marketing, brand communities, and eWOM—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fostering brand loyalty, focusing on content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data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urthermore, the paper identifies limitations in current research—specifically regarding long-term dynamic effects, the integration of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measurement of loyalty,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findings across different research contexts—thereby offering insights for both corporate social media marketing practices and future academic inquiry.

作者简介：吕　林(1996—)，男，博士，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消费者行为；
刘　岗(1999—)，男，硕士，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

通讯作者：刘　岗

Keywords: Social Media Marketing; Brand Loyalty; Brand Trust; Consumer Engagement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逐渐从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工具演变为企业开展品牌传播、消费者互动和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渠道。企业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品牌信息、开展互动活动、组织线上社群、借助意见领袖传播产品信息，并利用消费者生成内容扩大品牌影响力。Kaplan 和 Haenlein（2010）指出，社交媒体建立在 Web 2.0 技术基础之上，支持用户生成内容的创造与交换，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空间[1]。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消费者品牌忠诚度不仅关系到企业的重复购买、客户留存和口碑传播，也影响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与传统营销相比，社交媒体营销能够通过持续互动和关系维护增强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联系，但浏览量、点赞量及短期购买意愿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品牌忠诚度的形成。因此，如何解释社交媒体营销影响品牌忠诚度的内在机制，并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提升策略，成为品牌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Bartoloni 和 Ancillai（2024）对 169 篇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综述，指出社交媒体营销研究在研究变量、前因条件和结果指标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碎片化现象，需要进一步整合不同研究视角[2]。与此同时，Vrontis 等（2021）关于社交媒体意见领袖营销的系统综述也指出，该领域在理论、方法和研究情境方面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3]。基于此，本文围绕社交媒体营销影响品牌忠诚度的主要机制、现实制约因素、提升策略与未来研究方向展开分析。

二、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社交媒体营销的内涵

随着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逐渐从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工具演变为企业开展品牌传播、消费者互动和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渠道。企业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品牌信息、开展互动活动、组织线上社群、借助意见领袖传播产品信息，并利用消费者生成内容扩大品牌影响力。Kaplan 和 Haenlein（2010）指出，社交媒体建立在 Web 2.0 技术基础之上，支持用户生成内容的创造与交换，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空间[1]。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消费者品牌忠诚度不仅关系到企业的重复购买、客户留存和口碑传播，也影响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与传统营销相比，社交媒体营销能够通过持续互动和关系维护增强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联系，但浏览量、点赞量及短期购买意愿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品牌忠诚度的形成。因此，如何解释社交媒体营销影响品牌忠诚度的内在机制，并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提升策略，成为品牌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Bartoloni 和 Ancillai（2024）对 169 篇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综述，指出社交媒体营销研究在研究变量、前因条件和结果指标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碎片化现象，需要进一步整合不同研究视角[2]。与此同时，Vrontis 等（2021）关于社交媒体意见领袖营销的系统综述也指出，该领域在理论、方法和研究情境方面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3]。基于此，本文围绕社交媒体营销影响品牌忠诚度的主要机制、现实制约因素、提升策略与未来研究方向展开分析。

（二）品牌忠诚度的内涵

品牌忠诚度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对特定品牌形成相对稳定的偏好、承诺及持续购买倾向。Oliver（1999）从消费者忠诚的发展过程出发，强调品牌忠诚并非仅由满意度决定，还与消费者的心理承诺及其他影响因素有关[5]。

从研究维度看，品牌忠诚度可以区分为态度忠诚与行为忠诚。态度忠诚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信任、情感认同和持续支持意愿；行为忠诚则体现为重复购买、持续选择及实际购买行为。二者具有联系，但不能完全等同。例如，消费者可能因为价格优惠而重复购买某品牌，却并未形成稳定的情感认同；也可能高度认可某品牌，却由于价格、渠道或产品供应等原因暂时选择其他品牌。因此，研究社交媒体营销效果时，应避免仅以购买意愿或互动数据替代品牌忠诚度。

（三）理论基础

本文主要借鉴关系营销理论、消费者参与理论和社会影响相关研究视角。关系营销强调企业通过信任建立、持续沟通和价值交换维系长期顾客关系；消费者参与理论关注消费者在品牌互动中的认知、情感与行为投入；社会影响视角则解释意见领袖、品牌社群及电子口碑如何影响消费

者的品牌判断。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分析社交媒体营销影响品牌忠诚度的基础。

此外，《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20）中关于移动营销、即时通信、隐私和移动媒介社会关系的讨论，为理解移动平台环境中的品牌传播、消费者参与及数据治理提供了跨学科参考[6]。

三、社交媒体营销影响品牌忠诚度的主要机制

（一）消费者参与机制

消费者参与是社交媒体营销影响品牌忠诚度的重要途径。企业通过评论互动、线上活动、产品共创和用户生成内容等方式，使消费者由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品牌传播的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消费者能够表达个人观点、获得品牌反馈，并在持续互动中形成对品牌的熟悉感与心理联系。

消费者参与可能通过提高品牌认知、强化品牌体验和增加关系投入促进品牌忠诚度。然而，参与行为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忠诚。消费者可能因为娱乐性、争议性或短期奖励参与活动，却未形成持续购买意愿。因此，企业需要将参与质量与参与数量区分开来，重点关注互动是否能够为消费者创造实际价值，并进一步转化为稳定的品牌关系。

（二）品牌信任的中介机制

品牌信任是消费者相信品牌能够持续提供符合预期的产品与服务，并在沟通过程中保持真实、可靠和负责任的心理状态。社交媒体为品牌提供了及时回应消费者问题、公开产品信息、处理投诉及展示服务过程的机会。当企业能够保持信息一致性、及时解决问题并兑现品牌承诺时，消费者更容易形成信任。

品牌信任可能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相较于仅依赖促销活动维持的短期购买行为，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忠诚通常更有可能表现为持续偏好、主动推荐和长期关系维持。但信任并非由信息发布频率直接产生。如果企业发布夸大宣传、隐瞒商业合作关系或无法兑现承诺的信息，社交媒体的公开传播机制反而可能放大负面评价，削弱品牌信任。

因此，品牌信任可以作为连接社交媒体营销活动与品牌忠诚度的重要中介变量，但其作用程度仍需结合产品类别、消费者经验和品牌声誉进行实证检验。

（三）个性化营销与隐私权衡机制

社交媒体平台能够根据消费者的兴趣、浏览行为和互动记录提供相对个性化的品牌信息。适当的个性化营销有助于提高内容相关性、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并增强消费者对品牌服务的感知价值。当消费者认为品牌能够理解其需求并提供适当的产品信息时，其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可能得到改善。

然而，个性化营销也存在明显的隐私风险。当消费者认为广告追踪过度、个人信息使用缺乏透明度或营销内容具有侵扰性时，个性化带来的便利可能被负面体验抵消。消费者即使继续使用相关平台，也不意味着其认可企业的数据收集方式。

因此，个性化营销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具有条件性。企业应在提高传播相关性的同时，重视知情同意、信息使用透明度和数据安全，避免以过度追踪换取短期转化。

（四）品牌社群与关系认同机制

品牌社群通过共同兴趣、品牌体验和用户互动形成相对稳定的消费者网络。消费者在社群中交流使用经验、寻求产品建议、分享品牌相关内容，并通过群体互动建立归属感。品牌社群不仅可以增强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也可能使品牌成为消费者自我认同和社会交往的一部分。

当消费者在社群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情感支持和身份认同时，其品牌依恋与持续支持意愿可能得到增强。但是，社群成员的积极参与也可能源于其原本较高的品牌忠诚度，不能简单地将社群参与视为忠诚提升的直接原因。此外，社群内部冲突、过度商业化和负面服务体验均可能削弱消费者的归属感。

因此，品牌社群管理应从单纯扩大成员数量转向提升互动质量，通过专业服务、用户共创和合理的社区规则，形成有助于长期关系发展的互动环境。

（五）意见领袖营销与电子口碑机制

意见领袖能够借助专业知识、个人形象、受众关系及内容传播能力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相较于单向广告，消费者有时更愿意参考与自身需求相似的创作者所提供的体验信息。若意见领袖与品牌定位相匹配，且商业合作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其传播内容可能增强品牌可信度和消费者认同。

与此同时，电子口碑是消费者通过网络发布、分享和评价产品或品牌信息的行为。积极且可信的评价能够降低消费者的信息不确定性，改善品牌声誉；负面口碑则可能迅速扩散，并影响其他消费者的品牌判断。Donthu 等（2021）对电子口碑研究的系统综述显示，该领域涉及消费者行为、信任、网络评论、用户生成内容和品牌忠诚等多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7]。

需要注意的是，意见领袖的知名度、粉丝数量及内容曝光并不必然带来长期忠诚。过度商业化、虚假宣传或品牌与意见领袖形象不匹配，都可能损害传播可信度。企业应重视意见领袖的受众匹配度、专业性、真实性和长期合作表现，并建立对负面口碑的及时回应机制。

四、社交媒体营销提升品牌忠诚度的策略

（一）优化内容质量，提升消费者参与价值

企业应围绕目标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设计内容，合理结合产品知识、使用场景、品牌故事、用户体验及互动活动，避免过度依赖促销信息和流量导向的内容。通过问答、投票、用户共创和反馈征集等方式，可以增加消费者的参与机会。但内容互动应以真实价值为基础，避免通过虚假抽奖、诱导评论等方式追求表面数据。

同时，企业应建立内容效果评估机制，将互动率与品牌认知、信任变化及后续购买行为结合起来分析，避免将短期曝光直接等同于品牌忠诚度提升。

（二）建立可信、透明的品牌沟通机制

企业应保持产品信息、品牌承诺和售后服务之间的一致性，及时回应消费者疑问，并对投诉和负面评价进行公开、合理的处理。对于产品局限、服务问题及合作推广内容，应保持必要的透明度，避免夸大宣传和隐瞒商业关系。

品牌信任的建立依赖长期行为的一致性，而非单次传播活动。企业应将社交媒体客服、产品质量管理和售后服务纳入统一的品牌关系管理体系，以实际服务体验巩固消费者信任。

（三）实施适度个性化营销，强化隐私保护

企业可以根据消费者主动表达的兴趣、明确授权的数据及合理的行为特征提供相关内容，但应避免过度收集与营销目的无关的信息。通过清晰说明数据用途、提供合理的偏好设置和退出机制，并落实数据安全管理，可以降低消费者对个性化广告的抵触。

企业还应持续监测广告疲劳、负面反馈及隐私投诉。当个性化营销带来的相关性提升不足以抵消侵扰感时，应及时调整内容频率和定向方式，实现营销效果与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平衡。

（四）完善品牌社群运营，推动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

企业应明确品牌社群的服务定位，提供产品使用指导、专业交流、售后支持及用户经验分享等内容，鼓励消费者参与产品改进和品牌活动。对于社群中的意见分歧和负面反馈，应建立清晰的沟通与处理规则，而非简单删除批评信息。

此外，企业应区分活跃成员、普通成员和潜在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避免以统一的运营方式对待所有群体。通过持续提供有价值的社群体验，可以提高消费者的参与质量，并为品牌忠诚度的形成创造条件。

（五）优化意见领袖合作与口碑管理

在意见领袖选择方面，企业不应仅依据粉丝数量或曝光规模，还应考察受众结构、内容专业性、品牌契合度和历史合作表现。通过长期、透明的合作关系，可以降低消费者对商业推广的怀疑。

对于电子口碑，企业应建立评论监测、问题分类、快速回应和服务补救机制。对于真实的负面评价，应优先解决问题并反馈处理结果，而不是单纯追求正面评论数量。只有当产品质量、服务表现和传播内容相互一致时，电子口碑才更有可能支持长期品牌关系。

（六）建立以长期忠诚为导向的评估体系

企业应从单一流量指标转向多维度的品牌关系评估。短期指标可以包括内容触达、互动率和点击率；中期指标可以包括品牌信任、消费者参与和推荐意愿；长期指标则应关注重复购买、客户留存和实际品牌转换情况。

在条件允许时，企业可以结合消费者调查、平台互动数据和交易记录，区分态度忠诚与行为忠诚，并分析不同营销活动对二者的影响。通过持续跟踪消费者变化，企业能够识别真正有助于形成长期关系的营销活动，避免因过度追求短期流量而忽视品牌资产的积累。

五、现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一）长期动态效应研究不足

现有研究中，横截面问卷较容易用于检验社交媒体营销、品牌信任和品牌忠诚之间的相关关系，但难以充分揭示这些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过程。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调查、实验设计或消费者行为追踪方法，检验营销活动是否能够持续影响品牌忠诚，并识别短期参与与长期忠诚之间的差异。

（二）作用机制整合不足

目前，消费者参与、品牌信任、意见领袖可信度、电子口碑和隐私顾虑等因素往往分散在不同研究中。Bartoloni 和 Ancillai（2024）的系统综述也指出，社交媒体营销研究存在研究视角相对分散的问题[2]。未来研究可构建整合性分析框架，同时考察营销活动的直接作用、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进一步比较不同因素的相对解释力。

（三）品牌忠诚度测量有待完善

购买意愿、推荐意愿、品牌态度和实际重复购买虽然具有联系，但并非同一概念。未来研究应分别测量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并在条件允许时使用实际交易或客户留存数据进行验证，从而降低仅依赖自我报告所产生的测量偏差。

（四）研究情境的适用性仍需验证

不同平台、国家文化、消费者群体和产品类别可能影响社交媒体营销的实际效果。例如，高参与度的消费品与高风险服务在消费者决策方式上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应开展跨平台、跨文化及跨产品类别比较，检验已有结论的适用边界，避免将特定情境下的研究结果直接推广至所有市场。

（五）负面效应与营销权衡关注不足

社交媒体营销不仅可能增强消费者参与和品牌信任，也可能引发隐私担忧、广告疲劳、信息过载和品牌反感。未来研究应同时考察积极与消极作用路径，进一步分析消费者何时将个性化理解为服务价值，何时将其视为隐私侵犯，以及负面体验如何影响品牌转换和口碑传播。

六、结论

社交媒体营销对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的影响，是由营销内容、消费者心理、社会关系及平台环境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消费者参与能够增强品牌互动，品牌信任有助于维系长期关系，个性化营销能够提高信息相关性，品牌社群可以强化归属感，意见领袖和电子口碑则影响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与社会评价。但这些机制并非在所有情境下都产生正向效果，其作用受到隐私顾虑、传播可信度、消费者既有态度及具体市场条件的制约。

为提升品牌忠诚度，企业应从内容价值、可信沟通、适度个性化、社群运营、口碑管理及长期效果评估等方面形成系统化策略。与此同时，学术研究需要进一步整合不同作用机制，区分态度忠诚与行为忠诚，并加强纵向研究和跨情境验证。只有将短期营销绩效与长期消费者关系相结合，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社交媒体营销的实际价值，并为企业构建可持续的品牌竞争优势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

[1] KAPLAN A M, HAENLEIN M.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J]. Business Horizons, 2010, 53(1): 59-68.

[2] Bartoloni, S. & Ancillai, C. (2024) Twenty years of social media marketing: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6, 435–457. https://doi.org/10.1111/ijmr.12360

[3] VRONTIS D, MAKRIDES A, CHRISTOFI M, et al.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marketing: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21, 45(4): 617-644. DOI: 10.1111/ijcs.12647.

[4] GODEY B, MANTHIOU A, PEDERZOLI D, et al. Social media marketing efforts of luxury brands: Influence on brand equity and consumer behavior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12): 5833-5841. DOI: 10.1016/j.jbusres.2016.04.181.

[5] OLIVER R L. Whence consumer loyalty?[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9, 63(Special Issue): 33-44. DOI: 10.1177/00222429990634s105.

[6] LING R, FORTUNATI L, GOGGIN G,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DOI: 10.1093/oxfordhb/9780190864385.001.0001.

[7] DONTHU N, KUMAR S, PANDEY N, et al. Mapping the electronic word-of-mouth (eWOM) researc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bibliometric analysi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35: 758-773. DOI: 10.1016/j.jbusres.2021.07.015.

电商平台“处罚”行为的正当程序规制

孙明金[1]

(1.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电商平台为了保证交易的秩序，一般会对平台内的经营者采取封禁店铺、降低搜索权重、扣划保证金等处罚措施。此类行为虽然发生在私法自治的外衣之下，但是具有准行政处罚的实质特征，而现行法律对其程序约束明显不足。用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来证明平台处罚应该受到告知、听取申辩、说明理由和救济告知等最低程序标准的限制。经过研究发现，平台处罚在告知、申辩、说明理由和救济这四个环节都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其根本原因就是存在“三单方”权力结构缺少程序制衡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要以《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为依托，创建起“最低程序标准+分档程序+监管备案”的规范化方案。要规范平台处罚程序，使数字时代社会公权力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关键词：电商平台处罚；正当程序；准行政处罚；平台私权力；平台规则

DOI：doi.org/10.70693/202610191170

Regulation of Due Process in E-commerce Platform "Punishment" Actions

Sun Mingjin[1]

[1]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To ensure transactional order, e-commerce platforms generally implement punitive measures against operators within the platform, such as shop closures, reduced search ranking, and deduction of security deposits. Although these actions occur under the guise of private law autonomy, they possess the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of quasi-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while current legislation shows clear deficiencies in procedural constraints.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in administrative law demonstrates that platform sanctions should be subject to minimum procedural standards, including notification,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 defense, explanation of reasons, and notification of remedies. Research has revealed structural flaws in all four aspects of platform penalties: notification, defense, explanation of reasons, and remedies.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three unilateral powers” structure, which lacks procedural checks and balances. Based on th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ory Measure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Online Trading Platform Rules" should be used to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framework, encompassing "minimum procedural standards, tiered procedures, and supervisory record-keeping." It is essential to standardize platform sanction procedures to ensure that social public power in the digital era operates consistently under the rule of law.

Keywords: E-commerce platform punishment; due process; quasi-administrative penalty; private platform power; platform rules

作者简介：孙明金，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平台内经营者对电商平台的依赖，早已超出一般商业合作的范畴。一个“违规通知”弹出，店铺搜索权重骤降、商品被下架、保证金被扣划，经营者面对的往往不是协商，而是一个既成的、难以推翻的处罚结果。以某电商平台为例，商家在收到“违反平台规则”的系统通知后，往往在数小时内即被限制流量甚至关闭店铺，而其获得的说明通常只是“违反社区规范”的概括表述，具体的违规事实、认定的依据与理由均付之阙如。对于高度依赖平台流量生存的经营者而言[1]，平台的一纸通知足以决定其营业的存续。这种不对称的处置关系[2]，构成了数字市场中一类普遍存在却少被追问的现象。平台究竟依据何种程序，对平台内经营者作出如此严厉的处置。

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平台能否处罚。平台负有治理交易秩序、制止违法行为的责任，其处置违规商家的行为具有管理与自治的双重正当性[3]。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平台处罚“依何程序”作出？经营者是否获得了事前的告知、事中的申辩与事后的救济？既有研究多从反垄断法、合同法与侵权法的视角讨论平台责任与平台治理[4]，却较少将目光投向处罚行为本身的程序构造，追问平台在作出处罚时是否履行了基本的程序义务[5]。正当程序原则作为约束公权力行使的经典法治原则，通常在行政权运行的语境中被讨论，而当代平台私权力的兴起，恰恰提出了一个具有理论张力的问题[6]。当私主体行使着实质意义上的公共治理权力时，正当程序原则能否、以及如何向其延伸[7]。

先证明平台处罚具有公法属性，揭示其准行政处罚的本质，再论证正当程序原则适用于平台处罚场景的正当性基础，最后用告知、申辩、说明理由、救济四个要素作为标尺来检验现状，最终落脚到可操作的程序规范设计上。本文认为平台处罚应当受到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约束，以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为机会，提出最低程序标准、分档程序和监管备案相结合的制度方案。该进路把行政法的分析手段带入到平台治理当中，一方面回应了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对于“社会公权力”一直存在的关注，另一方面也给平台处罚的程序规制赋予了具体的制度出路。

二、平台处罚行为的法律属性：私法自治抑或准行政处罚

“平台处罚”是指电商平台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作出的、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处置措施。就其表现形态来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格类处罚，即封禁店铺、限制入驻、暂停或者终止合作等，直接剥夺经营者继续经营的机会。第二类是流量类处罚，即降低搜索权重、屏蔽商品、下架链接、限制参与促销活动等，间接削弱经营者的交易能力；第三类是财产类处罚，即扣划保证金、罚款、扣减佣金或者冻结货款等，直接减少经营者的财产收益[5]。这三种处罚在实践中常常被同时使用，它们都给经营者带来了单方面的不利后果，与行政处罚的功能有相似之处。

对于平台处罚的性质，一种流行的观点把它归入私法自治的范畴。该说认为，平台和经营者之间是合同关系，平台规则属于合同条款，商家入驻就表示同意平台规则，处罚不过是合同违约的一种处理方式或者平台作为交易场所管理者自律的行为。这一解释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能回答平台处罚的三单方结构。平台一方制定规则、一方认定事实、一方执行处罚。经营者对于平台规则没有实质的磋商余地，“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缔约模式使“同意”成为一种形式，将其简单化为“合同自由”，无异于用形式平等掩盖实质支配[8]。一旦承认平台规则有格式条款以外的治理功能，合同进路就显得解释力不够。

更恰当的定性就是把平台处罚看作一种准行政处罚[9]。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辨析。其一为单方性，处罚作出无需相对方同意，经营者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其二为强制性，经营者若不接受处罚，就会面临经营资格丧失等不利后果，其实质强制力并不亚于行政强制。其三为惩戒性，处罚以经营者的违规行为为前提，目的在于制裁违规、威慑潜在违规，具有明显的报应和非难色彩。其四为外部性，处罚虽然发生在平台内部，但是它的效力溢出到平台和经营者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影响消费者福祉和市场竞争秩序[10]。平台凭借自身所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以及规则制定权而产生的处置能力，已经不是一般的合同权利了，而是具有社会公权力性质的“准行政处罚权”。该属性的发现并不是为了给平台的行为打上标签，而是要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权力既然存在，那么程序也应该随之产生。确定平台处罚的性质，给之后的程序规制提供逻辑起点。如果平台处罚只是私人之间的一种合同约定，那么法律对它的程序要求最多只能到格式条款的效力审查为止。一旦承认它

具有准行政处罚的性质，程序约束就有了正当性基础。属性认定就是把“平台有权处罚”和“平台必须正当程序地处罚”联系起来的关键环节，也是本文全部论证的支点。

三、正当程序原则适用于平台处罚的正当性基础

正当程序原则是行政法上的基本准则。其规范内涵虽然在学理上存在争议，但是就最低限度的要求而言，一般被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告知、听取申辩、说明理由和救济告知。这四项要求的共同本质就是对权力行使进行程序性制约，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受到可以检验的约束，它的价值并不在于保证结果必然正确，而在于保证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机会。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范围，正处在由传统的公权力向私人权力场景的扩展之中。近代以来的行政法理论用主体的公私属性来划定正当程序的边界，把程序保障义务限定在行政主体的行为上。但是当私主体行使着具有公共治理功能的权力的时候，以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界方式越来越捉襟见肘。私权力规制研究显示，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由主体是否是公权力所决定的，而是由权力本身性质所决定的[7]。当代大型数字平台拥有流量分配、规则制定和秩序维护的实际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或者补充了公权力在数字市场中的部分职能，将这种权力排除在程序约束之外，无异于在法治体系中留下一个巨大的程序盲区[11]。

平台处罚应当受到正当程序的约束，可以有两条途径来获得完整的证成。第一条就是权力来源路径。平台的处罚权不是单纯的契约权利，是经过法律授权或者义务设定才具有规范性支撑的。我国《电子商务法》以平台治理交易秩序、处置违法经营者的义务，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制度也要求平台对违规行为主动规制[3]。当法律把治理职能委托或者交给平台的时候，平台在履行该职能时所行使的权力就具有了公共委托的性质，其程序义务也应当随着权力来源的公共性而扩大。第二条为事实支配路径。经营者对于平台高度依赖，平台在相关市场中具有支配地位，因此平台享有无需得到相对人同意就能实现自己意志的实际强制力。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事实结构，即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才产生了程序约束的现实必要性[10]。无论是从“权力从哪里来”还是从“权力怎样运行”来说，平台处罚已经超出了私法自治的范围，正当程序不再是外来的道德要求，而是内生的法治约束。

四、平台处罚程序的现状检视

以告知、申辩、说明理由、救济这四个要素为标准，可以对平台处罚程序现状做更细致的考察。就告知环节来说，缺陷主要是处罚依据的模糊化和规则变动的不可预测。平台大多用“违反社区规范”、“影响交易秩序”等概括性的理由立即对经营者进行处置，处罚通知一般只引用规则名称而没有具体指出违规的事实和条款。平台规则的更新也并不总是能够准确地传达给每一个经营者，规则文本本身又庞大、晦涩且不断变化。当处罚依据本身就是一套经营者无法完全掌握的规则体系的时候，“告知”就很容易变成形式，经营者既不能预知自己的行为界限，也不能在事后对处罚的依据提出质疑[12]。更严重的是，没有对申辩和说明理由进行双重的缺失。大多数平台所谓的“申诉”是事后启动的、单方面的、内部化的复核程序，经营者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自行举证，复核是由平台内部人员进行的，既不是事前听取申辩，也不是有中立第三方参与的，而且处罚决定一般不会说明认定违规的具体理由和证据。在这样的结构里，申诉和处罚同属一个权力主体，复核者天然就倾向于维持原来的处罚结果。如果申诉结果在程序设计之初就已经被结构性地决定了，“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但我仍然维持原判”就成了常见的结局，申诉也不过是正当程序的装饰品[5]。救济渠道的实效性不足，成为第三大缺陷。经营者对于平台处罚的救济途径主要有三条，即平台内部申诉、提起民事诉讼、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内部申诉没有独立性已经如上所述；民事诉讼存在成本高、举证难等现实障碍，经营者不能证明平台规则适用有瑕疵，也不能承受诉讼期间经营受损的风险。行政投诉举报虽然有《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但是受理标准、处理时限和反馈机制不明确，经营者经常处于投诉无门的境地。经营者所遭遇的救济困境，归根结底就是"私法救济太贵、公法救济太远"的双重失灵[3]。

近年来出台的新规给平台处罚程序的制度性突破提供了一个契机。《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第一次对平台规则的制定、修改和执行程序作出了规定，要求平台制定或者修改规则应当公开征求意见并全面归纳处理意见，规则应当在实施前七日内公示，涉及重大权益的规则应当在实施前十五日内公示并设置过渡期，修改规则不得将同意设为默认选项，也不得阻止不接受规则的经营者退出。更重要的是，该办法第 19 条

对于平台对经营者采取负面影响措施作出直接的程序要求，即平台应当告知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经营者提起申诉的，平台应当及时复核、客观公正地处理，仅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处理的，申诉人提出人工判定要求时应当采用人工判定方式，处理结果应当及时告知申诉人。第20条又规定，平台不得对经营者的申诉权利作出不合理的限制。这些条款使平台处罚程序由“无法可依”变为“有章可循”，有重大的规范意义。但是就该办法整体结构来说，其规范重心仍然放在平台规则的制定和公示程序上，对于处罚行为本身具体程序义务的规定比较原则，缺少可操作的强度分层和责任约束，在实践中仍然会存在被架空的风险。新规给平台规则套上了程序之缰，但是在处罚行为这个关键节点上，缰绳的缰环还没有配齐。

五、平台处罚正当程序规制的路径设计

就以上问题提出了四个层次的路径设计，力求具体、可操作，不能停留在抽象的监管呼吁上。第一，确定适用于所有平台处罚的最低程序标准。按照正当程序原则的四项基本要求，应当把事前告知、听取申辩、说明理由、救济告知作为平台处罚不可逾越的程序底线。就具体而言，事前告知是平台在作出处罚之前要告知经营者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规则依据，听取申辩是平台给经营者留出合理的陈述和异议时间，说明理由是处罚决定中必须载明认定违规的具体事实、证据和规则条款。救济告知是向经营者明确提示申诉和其他救济途径。最低程序标准的意义在于，不论平台规模大小、处罚轻重，这四项要求都应该普遍适用，它是程序正义的“地板”，而不是“天花板”，是经营者程序权益的兜底保障[6]。第二，创建起和处罚严厉程度相适应的分档程序机制。一刀切的高强度程序要求会损害平台治理效率，统一的低强度要求又不能保护经营者权益，因此应该根据处罚的严厉程度来配置不同的程序强度。对轻度处罚，即警告、限期整改、短期限流等可以采用简易程序，平台只需履行告知义务并保存记录即可；中度处罚，如下架商品、显著降低搜索权重、扣划保证金等应适用标准程序，平台须事前告知、给予合理的申辩期限并作出书面理由；重度处罚，如封禁店铺、终止合作、冻结货款等应适用严格程序，包括事前充分告知、给予充分的申辩机会、由不直接参与原处罚认定的内部复核单元或者外部第三方进行独立复核，并明确告知外部救济通道。程序的强度要和处罚的严厉程度相适应，剥夺经营者全部营业资格的处罚不能用同一个程序来适用。该种分档思路既可以借鉴平台治理中的二元分治思想，也可以和公共治理领域分级治理的逻辑相契合[13]。第三，建立外部监督和备案制度。只依靠平台自身的约束来保证程序标准的实现是不现实的，行政监管的适度介入是必要的。

第一，要把平台处罚规则中涉及重度处罚的条款纳入监管备案范围，在规则实施前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程序合规性审查；第二，要由监管部门制定“平台处罚程序合规指引”，明确告知、申辩、说明理由和救济告知的具体标准，给平台提供可以遵循的规范；第三，建立定期抽查、约谈和公示制度，对多次违反程序义务的平台予以公开通报；第四，明确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规定平台违反最低程序标准作出的处罚，经营者在后续争议中可以主张该处罚无效。监管的价值不只是事后纠错，更在于用程序性备案和合规指引来使平台的处罚行为“事前有规矩、事中有留痕、事后可追溯”[11]。域外对于大型数字平台的治理经验也表明，外部监管的介入并不一定会损害平台的治理效率，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保护经营者权益和维护平台自治之间找到平衡。第四，完善平台处罚的救济衔接机制。救济是程序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打通平台、行政、司法三者之间的递进式救济链条。在平台内部要保证申诉渠道的便捷和复核的独立性，在行政上要明确经营者对平台处罚的投诉举报受理标准和处理时限，把平台的程序履行情况纳入监管核查范围，允许经营者在平台未依法履行程序义务时请求行政机关介入，在司法上要明确平台处罚行为的可诉性，承认经营者就平台处罚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请求司法审查的资格，适当减轻经营者的举证责任。建立平台内部申诉、行政投诉核查、司法最终救济的递进式结构，使经营者受到不正当处罚的时候可以得到有效的、可及的救济。救济不是程序的对立面，而是程序的最后一道——没有可及救济的程序，只是“看起来很美”的正义[2]。

六、结语

平台处罚权是数字时代催生出来的社会公权力。它产生于私法自治的外在形式之下，却行使着实质上的公共治理职能；它提高了数字市场的治理效率，也必然伴随着权力滥用的风险。本文

的主要观点就是正当程序是该权力不能回避的法治约束，承认平台处罚具有准行政处罚性质，正当程序就随之而来；对于告知、申辩、说明理由和救济环节存在的各种缺陷，最低程序标准、分档程序和监管备案就成了制度回应的必然选择。规范平台处罚程序，本质上就是把“权力”始终放在“法治”的轨道上。数字平台不是法外之地，平台处罚也不能成为程序之外的“黑箱操作”。

参考文献:

[1] 童攀. 电子商务平台处罚权的规制研究[J]. E-Commerce Letters, 2025.

[2] 肖静. 电商平台治理中商家权益保护与消费者保护的平衡机制研究[J]. E-Commerce Letters, 2026.

[3] 陈哲. 我国电商平台反垄断监管的现存问题与完善路径[J]. E-Commerce Letters, 2025.

[4] 吕镜懿. 电商平台反垄断规制的本土化建构与制度回应[J]. E-Commerce Letters, 2025.

[5] 赵钰. 互联网平台处罚行为的法律规制: 现状, 法理与路径.[J]. Cyber Security & Data Governance, 2026.

[6] 解志勇. 超级平台重要规则制定权的规制[J]. 清华法学, 2024.

[7] 徐蕾.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私权力的规制进路[J]. E-Commerce Letters, 2024.

[8] 陈吉隆. 数字治理视域下电商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法功能研究[J]. E-Commerce Letters, 2025.

[9] 张念波. 数字私权力的法律规制路径研究[J].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2025.

[10] 李磊. 超级平台自治权滥用行为的二元分治 以平台内经营者权益保护为视角[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6.

[11] Crawford, G., Crémer, J., & Dinielli, D. (2023). Consumer protection for online markets and large digital platforms. … Journal on Regulation.

[12] 汪圣娣. 电商平台自治规范的司法审查及其边界研究[J]. E-Commerce Letters, 2024.

[13] 张涵, 石义菲, 王新昕, 康飞. 融通创新视角下平台算法敏捷治理研究[J]. 科学观察, 2024.

综艺 IP 赋能农文旅融合的空间生产机制研究

——以“种地星球”项目为例

蒋奇英[1]

（1.暨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文旅融合已成为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综艺 IP 则依托其传播优势成为赋能农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媒介。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以《种地吧》衍生项目“种地星球”为案例，可从空间表征建构、空间意义再生产、空间实践转化、空间关系重构四个维度探析综艺 IP 赋能农文旅融合的空间生产机制。综艺 IP 虽有效推动了乡村空间的价值重构，但仍面临媒介流量周期错位、IP 符号产业转化能力不足、外部资本与乡村主体性失衡、消费扩张挤压在地价值等困境。针对上述问题，可通过推动流量品牌化转化、促进 IP 深度嵌入乡村产业、夯实在地主体参与、健全收益共享机制等路径加以优化。

关键词：综艺 IP；农文旅融合；空间生产机制

DOI：doi.org/10.70693/202610224052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Variety-Show IP Empowering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the "Zhongdi Xingqiu" Project

Jiang Qiying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rural areas. Leveraging its media reach, variety-show IP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this field. Drawing on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aking the "Zhongdi Xingqiu" project, a spin-off of Zhongdi Ba,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atial production mechanism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spatial representation construction, spatial meaning reproduction, spatial practice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lational reconfigur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lthough variety-show IP has effec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i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mismatch between media attention cycl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hythms,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IP symbolic value, an imbalance between external capital and rural agency,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consumption expans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local valu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traffic into place branding, deepening the embedding of IP into rural industries, strengthe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stakeholders, and improving revenue-sharing mechanisms.

作者简介：蒋奇英（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Keywords: Variety-show IP;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Spatial Production Mechanism

引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发展从单纯提升农业产能转向资源价值挖掘与产业结构优化，如何整合乡村特色资源，推动农业、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乡村资源的多元价值转化，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农文旅融合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激活乡土文化资源和拓展旅游消费场景，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1]。《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也提出，要进一步明确文旅融合、数字文化赋能乡村发展的方向[2]。

随着数字媒介不断介入乡村社会，媒介传播、场景营造逐渐成为激活乡村价值的重要手段。综艺节目凭借内容和流量优势，将农业生产、地方文化和乡村空间转化为具有传播力的文化符号，并进一步延伸至品牌运营、文旅体验等产业环节，成为推动农文旅融合的新型媒介资源。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农文旅融合模式、乡村传播效果和文化 IP 开发等问题，对于综艺 IP 如何实现从媒介流量转化为产业价值，以及如何推动乡村空间和多元主体关系重构，仍缺乏系统分析。

劳作纪实综艺《种地吧》及其衍生项目“种地星球”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该项目依托节目形成的受众基础，将线上媒介影响力导入线下乡村空间，通过农田体验、研学、文创消费、助农直播等业态，实现了综艺 IP 与农业、文化、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基于此，本文以“种地星球”项目为案例，引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探析综艺 IP 赋能农文旅融合的主要表现、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期为数字媒介背景下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解释视角。

一、相关研究与理论视角

（一）相关研究

1.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农文旅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 年）》提出，要“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3]，进一步凸显了农文旅融合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地位。围绕农文旅融合这一议题，学界已从内涵界定、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在内涵界定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农文旅融合并非农业、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资源、技术、资本和市场等要素的跨界整合，实现产业协同发展与价值共创。具体而言，农文旅融合通过整合乡村资源要素、生产空间、人力资本和市场渠道，促进资源共享与价值增值，推动乡村资源优势向产业发展优势转化[4]。就其本质来看，农文旅融合属于产业融合的高级形态，核心在于农业生产、文化传承与旅游消费功能的深度耦合，并通过机制创新实现乡村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5]。

在实践层面，当前农文旅融合仍存在产业融合层次较浅、项目同质化、乡土文化挖掘不足、产业链延伸不够等问题[6]。围绕上述问题，学界主要从产业协同、文化赋能和数字技术三个维度探讨优化路径。一是推动农业、文化与旅游资源协同配置，促进乡村旅游向体验化、沉浸化和复合化发展[7]；二是以乡土文化为核心塑造特色 IP、创新消费场景，增强乡村产业的文化价值[8]；三是依托数字平台、智慧场景和信息技术提升农文旅融合发展水平[4]。

2.综艺 IP 参与农文旅融合研究

随着综艺节目在乡村发展中的实践不断深化，学界对其研究视角也逐渐由节目传播效果拓展至综艺 IP 价值开发及产业赋能。在传播赋能方面，综艺节目被视为提升乡村可见度、塑造地方形象的重要媒介载体。以《种地吧》为代表，该节目依托劳作纪实叙事和跨平台传播矩阵，重构了乡村媒介形象，推动乡村议题进入公共讨论空间[9]。从更普遍的传播机制来看，网络综艺能够依托视频网站、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形成协同传播，通过内容扩散、社群互动与场景传播提升取景地知名度，并推动线上关注向线下消费延伸[10]。在 IP 价值转化方面，综艺内容与直播营销、文旅体验等产业环节相结合，能够进一步拓展综艺 IP 的价值链条。例如，《还有诗和远方》通过内容传播与直播营销联动，推动节目关注向消费行为转化[11]；《山水间的家》则将综艺内容与地方文化、

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相结合，探索“综艺+文旅”向产业实践延伸的可能性[12]。

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围绕农文旅融合的内涵、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也从传播赋能与价值转化维度探讨了综艺IP参与农文旅融合的作用。但对于综艺IP如何实现从媒介流量转化为产业价值，以及如何推动乡村空间和多元主体关系重构，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空间生产理论

空间生产理论由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系统阐述，该理论突破了将空间视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物理容器的传统认知，强调空间既是社会关系作用的结果，也是社会关系得以展开和再生产的重要载体[13]。为进一步揭示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列斐伏尔提出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析维度，后世学者将其概括为“空间三元辩证法”。空间实践指可被感知的物质生产与日常生活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塑造客观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关系；空间的表征是被构想和规划的空间，与知识、符号、制度及权力关系密切相关；表征的空间则更多体现空间使用者对空间的体验、想象和情感认同，强调主观体验、社会互动与文化意义。

空间生产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乡村研究，为解释乡村景观重塑、空间改造与乡村发展的内在机制提供了重要分析视角。在媒介化语境下，媒介叙事与符号传播同样参与空间的建构。基于此，本文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基础上，结合综艺IP赋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践，从空间表征建构、空间意义再生产、空间实践转化和空间关系重构四个维度出发，分析综艺IP由媒介叙事介入现实空间、推动农文旅融合的内在机制。其中，空间表征建构主要分析综艺媒介如何实现乡村空间的符号编码与形象塑造；空间意义再生产主要考察媒介表征如何经由受众认知、情感认同与公共互动持续生成乡村空间的文化价值；空间实践转化主要关注媒介流量与符号价值如何落地为乡村生产经营、文旅消费与场景体验等现实行动；空间关系重构则聚焦IP项目运营过程中政府、企业、村集体与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化。

二、综艺IP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表现

（一）节目传播推动乡村空间表征建构

综艺节目对乡村空间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空间表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并非对乡村空间进行客观再现，而是通过场景选择、叙事建构和影像传播，对乡村空间进行意义编码，使特定乡村景观逐渐转化为具有公共认知和文化符号意义的媒介空间。随着节目内容在多平台持续传播，这种空间表征不断被观看、讨论和再传播，进而塑造公众对乡村空间的整体认知。《种地吧》是这一空间表征建构的典型案例。该节目以青年驻村种地为叙事主线，将后陡门作为核心叙事空间，通过持续呈现农田、大棚、院落、仓库等生产生活场景，将乡村日常空间与农业劳动、成员互动和成长叙事相结合，使原本普通的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与节目内容相对应的认知印象。节目依托长视频、短视频、直播及社交媒体构建起跨平台传播网络，通过内容剪辑、话题互动和用户二次创作，进一步强化公众对后陡门的空间认知，使后陡门的空间形象持续进入公众视野。截至2025年8月，《种地吧》相关抖音短视频播放量超271亿次，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317亿次、讨论量突破2.3亿条[14]。

（二）劳动叙事驱动乡村空间意义再生产

媒介传播提升乡村空间可见度的同时，节目叙事也在重塑公众理解乡村的价值框架。不同于传统综艺对乡村自然景观的单向呈现，《种地吧》以农业劳动为叙事核心，将播种、管护、收获等生产过程与青年成长、团队协作和人与土地关系相结合，使农田、大棚、院落等生产空间突破原有物质属性，被赋予奋斗、共生、乡土情感等文化内涵，乡村空间因此由生产场所转变为承载价值认同的意义空间。节目播出后，大量观众围绕劳动过程、人物成长和乡村生活展开讨论，节目所传递的劳动价值和乡村情感逐渐内化为公众理解乡村的重要认知框架，使公众对乡村的关注由田园风光延伸至农业生产、劳动价值和乡村文化本身。“种地星球”项目延续固化了这一劳动叙事所生成的文化意义，通过保留少年之家、初代大棚等节目记忆场景，策划开展“后陡门丰收节”“共富农趣运动会”等主题体验活动，将节目中的劳动符号转化为可进入、可体验的现实空间。游客在场景互动与参与劳动体验的过程中，不但完成了对乡村空间的消费，更在节目情感记忆的唤起与劳动价值的认同中强化了对乡村空间的认同，使节目所建构的劳动意义进一步沉淀为现实空间中的文化记忆。

（三）IP热度带动乡村空间实践转化

节目传播所建构的乡村空间表征，只有进入现实生产、消费与交往活动，才能真正转化为空间实践，推动乡村空间持续发展。《种地吧》播

出后，后陡门由普通村落转变为观众主动到访的目的地，节目积累的热度开始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2023 年 5 月，依托节目形成的关注度和消费需求，“后陡门·种地星球”作为西湖文旅集团重点打造的农文旅融合实验项目正式启动。经过两年的规划与建设，该项目在 2025 年 6 月底进入试运营阶段，5 天内即吸引超 10 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人流达 3.5 万人次[15]。依托 723 亩土地资源，“种地星球”在保留农业生产功能的基础上，融合文旅消费、农耕体验和数字传播等多元业态，推动乡村空间由单一生产空间向生产、消费、体验相融合的复合空间转型。项目围绕“勤天小镇”布局 IP 文创、特色餐饮、主题民宿等业态，依托“小丰收直播间”“共富商店”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并通过“稻田拾趣”“丰收穿搭分享会”等活动，推动由节目塑造的乡村空间表征转变为现实生产生活空间，实现了媒介流量向空间实践的转化。

（四）项目运营促进乡村空间关系重构

乡村空间再生产既体现为空间功能的拓展，也伴随着空间生产关系的重构。“种地星球”项目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多元主体围绕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和利益共享建立起新的协作机制，逐步形成政府统筹、企业运营、村集体组织、村民参与的协同生产格局。其中，政府主要承担统筹协调和公共服务职能，西湖区将“种地星球”纳入区域农文旅发展布局，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统筹资源配置等方式为项目建设提供支撑；企业则发挥资源整合与市场运营优势，西湖文旅集团依托本地资源整合和项目运营能力推进产业布局，蓝天下传媒发挥内容生产和 IP 运营优势，将节目影响力延伸至线下空间，实现媒介资源、市场资源与乡村资源的有效衔接；村集体主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依托土地、集体资产等资源优势，积极协调项目建设与村庄发展的关系；村民则通过就业参与、经营服务、活动组织等方式融入项目运营过程，由传统农业生产者逐步转变为乡村空间价值创造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在项目运行中实现个人发展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推动了乡村空间生产关系由单一主体主导向协同共建转变，实现了乡村空间生产关系的重构。

三、综艺 IP 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媒介流量的短期聚集与乡村空间持续发展的周期错位

综艺 IP 进入乡村后，节目播出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公众注意力，并迅速带动游客搜索、到访和消费。以乡村综艺《向往的生活》为例，该节目播出后，其多个取景地的旅游热度均出现明显增长，部分地区也随之开展民宿、乡村旅游等后续开发。此类流量增长具有较强的时间依赖性，通常随着节目播出节奏、话题热度和平台关注度变化而波动。从空间生产理论来看，综艺节目主要作用于乡村空间的表征建构，能够通过影像叙事快速塑造公众认知，却难以直接替代乡村空间在产业培育、设施完善和品牌积累上的长期投入。综艺节目遵循的是播出季驱动的传播逻辑，强调短周期、高曝光和快扩散；乡村空间的发展则依赖农业生产、业态培育和公共服务的持续投入，具有明显的长期性和积累性。两种逻辑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周期错位。对于农文旅项目而言，如果客源和经营收入过度依赖节目播出后的外部流量，一旦热度回落，其项目收益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二）IP 符号价值向产业体系转化的能力不足

综艺 IP 形成的符号价值只有深度嵌入乡村产业体系，才能转化为推动乡村空间持续再生产的现实动力。然而，从当前实践来看，部分综艺 IP 虽已形成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和品牌认知，但其符号价值尚未有效嵌入地方实体产业体系，存在符号价值与产业发展脱节、价值联动不足等问题。一方面，受短期流量变现思维影响，多数 IP 运营主体更倾向于布局消费场景、开发文创产品等投入较低、见效较快的消费端业态，对农业生产、产品开发等实体产业链延伸投入不足，IP 价值更多停留于消费层面。另一方面，乡村产业体系自身承接能力有限。当前多数乡村特色农产品仍以初级产品流通为主，标准化生产、品质管控和品牌建设相对薄弱，难以承接 IP 带来的品牌溢价；同时，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产业链协同不足，难以满足 IP 热度带来的集中性市场需求。此外，兼具农业产业、品牌运营和市场拓展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相对匮乏，也进一步制约了 IP 产品创新、品牌迭代和渠道拓展，影响 IP 符号价值向乡村产业体系转化。

（三）外部资本介入与乡村主体性提升之间的结构失衡

工商资本与专业运营主体进入乡村，能够带来资金、技术、品牌和市场等外部资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但项目运营和资源整合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当市场资源和运营能力主要掌握在外部主体手中，而本地参与机制尚不完善时，乡村空间生产的资源配置和决策权容易向外部集中，村集体和村民较难进入空间价值创

造的核心环节。已有乡村旅游研究表明，资本介入乡村旅游开发容易造成村民参与不足、收益获取受限，村民收益多来源于土地、房屋出租和基础劳务，产业链高价值环节往往由外来资本主导。[16]这一问题在综艺 IP 衍生项目中同样存在。传媒机构、运营企业和市场资本凭借品牌运营、资源整合和市场策划优势，通常主导项目规划与运营。相比之下，村集体和村民虽掌握土地、农业生产经验和乡土文化等在地优势，但参与主要集中于土地协调、劳务供给和基础服务等环节，对项目定位、业态布局和运营决策的影响相对有限。这种主体关系的不对等，使乡村空间生产更多依赖外部力量，村集体和村民的发展诉求难以有效嵌入空间生产过程。长此以往，外部主体持续主导空间生产，乡村空间再生产的内生动力将受到制约。

（四）消费空间扩张与乡村在地价值留存之间的矛盾

在综艺 IP 赋能农文旅融合过程中，媒介流量和市场需求推动乡村空间逐渐围绕消费组织和运行。消费空间扩张提升了乡村资源的市场价值，但也可能挤压农业生产、文化传承和社区生活等在地价值，形成消费空间扩张与乡村在地价值留存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空间景观化。部分 IP 项目围绕游客体验和消费需求改造农田、村落等生产空间，使农业生产兼具观光、体验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生产功能。二是乡土文化空间符号化。为满足媒介传播和市场消费需求，乡土文化、民俗技艺等在地文化资源被提炼为具有观赏性和传播性的文化符号，其生活实践属性有所减弱。三是社区生活空间商业化。随着游客集聚和商业业态增加，部分原本服务于村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逐渐转向旅游接待和商业服务，社区生活空间受到一定挤压。

四、综艺 IP 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推动媒介流量向地方品牌资产转化

推动媒介流量向地方品牌资产转化，关键在于突破综艺 IP 热度的周期性局限，将节目形成的短期传播优势转化为支撑乡村持续发展的品牌资产。一方面，要推动 IP 符号与本土资源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独立辨识度的地方品牌。综艺 IP 能够提升乡村知名度，但难以替代地方品牌建设。地方应立足农业资源、民俗文化和产业基础，对节目形成的传播效应进行本土化转化，提炼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内核，逐步弱化对综艺 IP 的依赖，形成能够独立传播的地方品牌。另一方面，要建立属地化的品牌运营机制。流量回落后，应减少对节目内容的重复消费，持续挖掘本土农耕文化和乡土生活价值，通过产品创新、场景更新和品牌传播不断丰富地方品牌内涵，逐步将公众关注由综艺 IP 转向乡村本体，实现短期媒介流量向长期品牌资产的持续转化。

（二）促进 IP 价值向乡村产业体系深度嵌入

促进 IP 价值向乡村产业体系深度嵌入，应推动综艺 IP 由消费端引流向产业端赋能延伸，将媒介传播形成的品牌价值嵌入乡村产业链，增强乡村产业承接流量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首先，推动 IP 价值向产业链延伸。立足乡村产业基础，将综艺 IP 与特色农产品、农事体验、文创产品等产业开发相结合，推动 IP 影响力由旅游消费向产品开发、品牌建设和产业运营延伸，避免 IP 价值停留于场景打造和短期消费。其次，完善乡村产业配套体系，提升 IP 价值的在地转化能力。针对乡村产业标准化程度低、供应链不完善、运营能力不足等问题，健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质量管控和仓储物流体系，提高乡村产业承接 IP 市场需求的能力。最后，加强品牌运营、电商营销等专业人才引育，提升乡村产业运营和市场转化能力，为 IP 价值持续嵌入乡村产业体系提供支撑。

（三）强化村集体和农户的主体参与

乡村主体既是综艺 IP 赋能农文旅融合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乡村空间持续生产的内生动力。推动综艺 IP 赋能乡村可持续发展，应进一步拓展村集体和农户参与空间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引导其在空间规划、运营管理和价值创造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村集体层面，应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和资源整合作用，依托土地、村集体资产及乡村社会网络等资源优势，嵌入项目规划、业态布局和运营治理全过程，将本地发展需求有效融入综艺 IP 项目开发。针对空间改造、公共资源利用、产业布局等重要事项，应建立运营主体、村集体与村民协同协商机制，增强村集体在空间治理和利益协调中的参与度。农户层面，应进一步拓宽其参与空间价值创造的路径，立足农业生产经验、乡土技艺和生活资源优势，引导农户承接农事体验、特色产品开发、乡村活动运营等产业环节，实现由单一劳务供给向多元价值创造转变。同时，加强文旅运营、电商营销等技能培训，提升农户参与产业运营和市场经营的能力，使其能够持续共享综艺 IP 赋能农文旅融合带来的收益。

（四）完善项目收益回流和公共共享机制

完善项目收益回流和公共共享机制，有利于推动综艺 IP 赋能形成的发展成果更多留存在乡村，

实现经济价值与公共价值的协同提升。针对综艺IP衍生项目形成的场景消费、业态经营和品牌增值等收益，可探索建立收益回流机制，将部分经营收益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公共空间维护、人居环境改善和乡土文化保护等领域，推动文旅发展成果反哺农业生产和社区生活，避免项目开发只停留于商业消费层面。收益回流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规范的制度保障。项目运营方、村集体和相关主体应建立明确的收益核算、分配和使用规则，提升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和规范性。通过信息公开、村民监督和协商机制，确保公共收益使用与乡村发展需求相衔接，推动综艺IP带来的阶段性发展收益逐步转化为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资源，实现商业开发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N].人民日报,2021-04-28(01).

[2] 文化和旅游部 教育部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EB/OL](2022-04-07)[2026-06-04].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4/07/content_5683910.htm.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EB/OL](2025-04-07)[2026-06-07].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4/content_7017469.htm.

[4] 江娟丽,梁玉,张陈.数字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逻辑机理[J].改革,2025,(7):141-151.

[5] 危旭芳.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J].理论视野,2025,(5):64-71.

[6] 姜岩.推动新时代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23,(10):142-144.

[7] 王琪延,杜治仙.农文旅融合视角下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探索研究[J].中国物价,2024,(12):123-128.

[8] 武文霞.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广东茂名柏桥村的案例分析[J].南海学刊,2025,11(4):45-56.

[9] 杨长岭.《种地吧》：在农耕图景中感受泥土的气息[J].中国电视,2023,(10):84-86.

[10] 冷淞,房芊蕾.网络综艺赋能文旅融合的创新路径探析[J].现代视听,2024,(6):11-16.

[11] 彭榆博.综艺节目以美育引领文旅融合——以《还有诗和远方》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5):111-114.

[12] 张丽平,冷淞.融合文化创意与山水诗意的文旅综艺节目——以《山水间的家》为例[J].电视研究,2022,(12):75-77.

[13] 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Donald Nicholson-Smith,trans.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14] 丁珊,贾琳.田野上，生长出N种可能[N].浙江日报，2025-08-03(001).

[15] 凤凰网浙江.西湖区携手“十个勤天”“种”出文旅新范式[EB/OL].(2025-12-17)[2026-7-28].https://zj.ifeng.com/c/8p8IfcO0b0H.

[16] 于伟,刘淑敏,张学波,等.空间正义视角下乡村旅游空间商品化过程的主体博弈与社会效应[J].地理研究,2025,44(2):419-433.

生成式 AI 接受与持续使用：TAM-ECM 整合机制

王 晨 [1]

(1.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0)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日常学习和知识工作的速度很快，但“开始使用”并不能说明用户之后会怎样选择。本文据此把研究视线由首次采纳向使用后的行为变化延伸，并以技术接受模型（TAM）和期望确认模型（ECM）为主要分析线索，对相关研究作叙述性梳理。文章先讨论用户接触技术时对有用性、易用性、风险、AI 素养和信任的判断，再考察真实任务经验如何改变这些认识。实际使用后，模型表现是否符合预期、核验需要付出多少成本以及任务结果是否可接受，都会进入下一轮评价，并影响满意度及后续选择。由此，本文不把持续使用视为唯一结果，而将继续使用、阶段性停用和重新采用置于同一过程之中，同时讨论任务—技术匹配、AI 疲劳与认知卸载可能造成的差异。本文提出的是概念框架，其关系仍需通过纵向追踪、行为日志等资料验证。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接受模型；期望确认模型；持续使用；中辍行为；用户行为

DOI：doi.org/10.70693/202610077735

Generative AI Use Beyond Initial Adoption: Linking TAM and ECM Across Continued Use, Pauses, and Return

Wang Chen

Jiangxi Fenglin College of Foreign Economy and Trade, Jiujiang, Jiangxi 33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conceptual paper examines generative AI use as a sequence of judgments rather than a one-time adoption decision. TAM is used to describe how users approach the technology before or during early use, whereas ECM is used to interpret evaluation after experience has accumulated. The analysis distinguishes expectations formed before substantial use from judgments made after users complete real tasks. At the earlier stage, perceived usefulness, ease of use, risk, AI literacy, and calibrated trust are relevant to adoption. Later, users reassess the technology in light of whether expectations were met, how useful the tool proved in practice, how satisfied they were, and how much checking or correction was required. Continued use is therefore treated alongside temporary discontinuance and subsequent return. Task-technology fit, AI fatigue, and cognitive offloading are discussed as conditions that may change these transitions. The framework remains conceptual and should be tested with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s and behavioral records.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 continuance use; discontinuance; user behavior

作者简介：王晨（1996—），女，硕士，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学生学习机制研究。

1 问题提出与研究方法

1.1 问题提出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正在改变数字工具的使用方式。资料整理、文字生成、编程辅助和创意构思等过去往往需要在不同软件之间切换，如今可以在连续对话中完成相当一部分工作。不过，操作上的便利并不等于结果始终稳定。提示语写法、上下文信息乃至模型版本都可能影响输出，同一任务也可能出现差异较大的答案。因此，用户决定是否采用生成式 AI 时，除了考虑效率，还会关注答案可信度、任务适配程度以及实际体验是否符合先前预期。

有关生成式 AI 的用户研究，大多延续了信息系统领域关于技术接受的讨论。Davis 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把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视为影响使用态度与行为意愿的重要因素[1]；UTAUT 则进一步加入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促进条件[2]。这些理论能够解释技术为何被首次采用，但生成式 AI 一旦进入高频使用阶段，研究对象就不再只有“采纳”这一行为。继续使用、减少使用、短期离开以及重新返回，都可能出现在同一用户身上，因此仅从初始意愿出发难以覆盖完整过程。

生成式 AI 的使用评价具有明显的经验修正特征。用户尚未真正接触技术时，对其能力的认识可能来自媒体、同伴评价或产品宣传；完成具体任务后，回答质量、核验时间、返工成本和实际收益则成为新的判断依据。期望确认模型（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ECM）由 Bhattacherjee 提出，其基本思想是比较实际表现与事先预期，并通过确认程度影响使用后的感知有用性、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3]。就时间位置而言，TAM 更适合分析采用之前和使用初期，而 ECM 更能解释真实体验形成后的再评价。

国内研究也开始把视线从首次采用延伸至使用后的变化。赵静等分析 AIGC 进入研究生学术实践后的持续使用意愿[4]；张玥等从组态角度讨论平台用户中辍[5]；周涛等关注生成式 AI 用户的间歇性中辍[6]；邱均平等则发现，满意度在大学生持续使用生成式 AI 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7]。这些研究已分别触及持续、中辍等问题，但若从时间连续性看，首次接受、实际体验、暂停使用和再次回流仍较少被放在同一框架中讨论。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进行整合。

1.2 文献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叙述性文献分析 (narrative review)。研究重点不是建立穷尽式文献库，而是围绕 TAM 与 ECM 的衔接问题选择具有代表性和解释力的成果。资料主要来自中国知网（CNKI）、Google Scholar 以及相关文献的参考文献追溯，检索内容涉及“生成式 AI/ChatGPT/大语言模型”“技术接受/TAM”“期望确认/ECM”“持续使用/中辍/回流”以及“AI 素养/信任/风险”等。选取文献时，一方面保留技术接受和持续使用领域的经典研究，另一方面重点关注 2023—2026 年生成式 AI 用户行为与教育应用研究，并补充任务匹配、认知卸载、AI 疲劳等主题。鉴于研究目标是提出概念框架，本文不按系统综述报告样本量，也不开展元分析或文献计量。

2 TAM 与 ECM 的理论衔接

2.1 TAM：初始接受的认知基础

TAM 主要解释用户在技术采用前后如何形成初始判断。其基本逻辑是：用户会估计某项技术能否改善任务结果，也会评估使用它需要付出多大努力。前者通常被称为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PU），后者为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PEOU）[1]。置于生成式 AI 情境中，PU 可表现为节约时间、扩展思路、提高文字处理效率和获得即时反馈；PEOU 除了界面操作是否简单，还涉及用户能否较顺利地获得可用输出。

自然语言交互降低了生成式 AI 的入门门槛，但并没有消除高质量使用所需的投入。打开工具、输入问题通常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说明目标、补足限制条件、连续追问并核实结果。因此，PEOU 在生成式 AI 场景中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界面与操作成本，二是人机协作过程中的认知投入。后一个层面与提示表达、任务拆解和事实核验关系更密切，将其完全归入传统“易用性”并不合适，更有必要与 AI 素养结合考察。

2.2 ECM：使用后评价与持续使用

ECM 把研究视角放在实际体验之后。此时，用户不再只依赖外部信息，而可以把模型的真实表现同原有期待进行比较。若实际效果符合或超过预期，确认程度通常较高，使用后的有用性判断和满意度也容易上升；反之，反复低于预期的表现可能削弱继续使用的意愿[3]。这一机制对生成式 AI 尤其重要，因为用户很难仅凭一次接触准

确了解模型在不同任务中的能力，较稳定的评价往往需要经过多轮互动才能形成。

TAM 和 ECM 虽然都讨论“有用性”，但二者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测量同一种判断。TAM 中的 PU 往往带有较强的预期成分，可能受到口碑、初次体验和技术想象影响；ECM 关注的则是完成真实任务之后形成的经验评价。比如，同一模型在构思和语言润色中可能很省时，但在事实密集或错误成本较高的任务中，用户还要花时间核查来源、修正细节，其净收益可能明显下降。换言之，生成式 AI 是否“有用”不能脱离具体任务来谈，它会随任务风险、核验成本和使用经验而改变。

2.3 从“接受”到“持续”的双阶段逻辑

将 TAM 与 ECM 连续起来，真正需要处理的是阶段差异，而不是把两套变量简单叠加。用户尚未形成充分使用经验时，判断更多依据预期、少量尝试和外部评价；当真实任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实际结果以及预期是否兑现会成为主要依据。这样处理后，“为何开始使用”与“为什么继续、暂停或重新使用”可以被放在同一条时间链上观察。

表 1　TAM 与 ECM 在生成式 AI 用户行为中的功能比较

比较维度	TAM	ECM	整合后的分析重点
主要问题	为何愿意开始使用	使用之后为何继续或停用	呈现从初始采用到后续选择的过程
核心变量	PU、PEOU、使用意愿	期望确认、使用后 PU、满意度	区分使用前预期与使用后经验
时间位置	采用前及使用初期	形成真实使用经验之后	观察跨阶段的评价变化
GenAI 情境扩展	AI 素养、信任、风险	输出体验、校准信任、AI 疲劳、认知卸载	任务匹配与反馈更新

3 生成式 AI 初始接受的影响机制

3.1 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

初次采用生成式 AI 时，用户最直接的判断仍是它能否带来实际收益。大型语言模型之所以迅速进入教育和知识工作，与其能够缩短资料整理、文字生成和反馈等待时间有关。Kasneci 等指出，大语言模型在个性化学习、写作支持与反馈方面具有潜在价值，但错误信息和偏见同样不可忽视[8]。因此，PU 不宜被理解为“功能越多越有用”，更合理的判断是：在特定任务中，节省的时间与获得的质量是否足以抵消学习、核验和修改所产生的成本。

PEOU 在生成式 AI 中的含义也比传统软件复杂。自然语言输入使基础操作十分容易，但高质量结果并不会自动出现。用户仍需要说明目标、提供必要背景、调整提示并检查事实。由此可见，“容易操作”与“容易完成任务”并非同义。后续测量若只用界面友好程度代表 PEOU，可能忽略人机协作中的认知负担，因此应考虑把操作负担与协作负担分别测量。

3.2 信任、风险与 AI 素养

生成式 AI 的输出带有概率性，这使信任问题比普通软件更突出。模型可以给出语言流畅、结构完整的答案，但表达形式本身不能保证内容正确。Tlili 等在 ChatGPT 教育应用研究中同时讨论了学习支持作用以及错误信息、伦理与学术诚信风险[9]。因此，用户实际面对的是两个不同问题：工具是否能帮助完成任务，以及当前这条输出是否值得采纳。前者偏向价值判断，后者更接近风险与可信度判断，两者并不总会得出相同结论。

AI 素养在这里也不仅指是否会操作工具。更关键的是，用户是否知道模型在哪些任务中相对可靠、何时需要交叉验证，以及错误一旦发生会带来多大后果。具备较高 AI 素养的用户通常更能识别模型边界，并据此调节自己的依赖程度。因而，AI 素养不仅可能作用于 PU 和 PEOU，也会影响风险判断与信任形成。本文采用“校准信任”这一概念，所强调的是信任与模型实际能力之间的匹配，而不是单纯追求更高的信任水平。

3.3 社会影响与任务—技术匹配

UTAUT 把社会影响与促进条件列为解释技术使用的重要因素[2]。这一思路放到生成式 AI 场景后，意味着用户的选择并非完全由个人判断

决定。学校或组织对工具的态度、同伴使用情况、内部规则以及可获得的技术支持，都会构成使用情境的一部分。本文进一步认为，这类情境因素的作用方向未必一致：鼓励性的规范可能扩大使用范围，而当任务涉及学术诚信、保密或数据合规时，制度要求也可能促使用户收缩使用范围，甚至改用人工处理。

任务—技术匹配能够解释同一用户为何在不同任务中表现出不同的采用倾向。Dishaw 和 Strong 将任务—技术匹配引入技术接受研究，认为技术只有在特征与任务要求相契合时才更容易被使用[12]。就生成式 AI 而言，头脑风暴、改写、语言润色等任务对错误的容忍度较高，而财务、法律等高责任任务更重视准确性、可追溯性与核验成本。因此，研究不能只问用户“用不用 AI”，还应进一步考察 AI 被用于哪类任务，以及它在任务分工中承担了什么角色。

4 生成式 AI 持续使用的形成机制

4.1 期望确认与使用后有用性

持续使用并不是初次采纳之后自然发生的结果。用户在反复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持续修正对技术的认识。如果模型确实节约时间、提高质量，原先的积极预期会得到支持；如果频繁出现幻觉、偏题或高额核验成本，用户对其评价就可能下降。确认因而是一种可以反复发生的过程，而非只在第一次使用后出现。模型升级、用户能力变化或任务类型改变，都可能触发新的判断。Bhattacherjee 和 Premkumar 的纵向研究表明，信息技术使用中的信念与态度会随经验变化[13]，这也为解释停用后的再次采用提供了依据。

使用后的感知有用性，更接近用户完成任务后对“实际得失”的判断。模型功能丰富并不意味着用户一定会觉得有价值。以写作或资料整理为例，如果生成结果需要反复核对事实、重做格式并多次返工，原本节省的时间可能很快被消耗掉；相反，当用户逐渐知道哪些环节适合交给 AI、哪些环节必须自己处理，并形成较稳定的分工方式后，工具的实际价值才可能上升。由此可见，使用后有用性本质上是经验形成的净收益判断，而不是对功能清单的评价。

4.2 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愿

在 ECM 中，满意度反映用户完成使用之后对整体体验的评价[3]。生成式 AI 的满意感通常来自多个方面，例如输出是否可用、响应是否及时、修改是否方便、交互是否自然，以及结果能否较少加工就进入后续工作。Ashfaq 等关于 AI 服务代理的研究发现，满意度与持续使用意向之间存在显著关系[14]。虽然服务型聊天机器人与当前生成式 AI 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一研究仍提示：用户对交互过程和结果的总体评价，会影响下一次是否继续选择同类工具。

需要进一步区分的是，持续使用意愿并不等于持续使用行为。用户主观上愿意继续使用，也可能因订阅费用、替代工具、单位政策或交互疲劳而降低使用频率；反过来，有些用户即便满意度不高，也可能因为工作流程已经依赖某一系统而继续使用。因而，只用问卷中的持续意愿来替代真实行为，会遗漏相当一部分实际差异。更可靠的做法是结合登录记录、对话频率、任务类别和续费等行为指标进行判断。

4.3 惯性、依赖与 AI 疲劳

当生成式 AI 进入高频使用阶段，认知卸载与 AI 疲劳需要分开讨论。认知卸载是把原本需要由个体内部完成的信息加工转移到外部工具，从而降低即时认知需求[16]。若检索、综合、推理或写作长期整体交给生成式 AI，用户自身参与加工和核验的程度可能下降。AI 疲劳关注的则不是任务是否被外包，而是持续与 AI 互动所带来的心理消耗。Yang 等发现，提示不确定性与响应不确定性可能分别引发情绪疲劳和认知疲劳[17]。二者都可能影响长期使用，但前者涉及认知任务的转移，后者涉及交互过程本身的负担。

5 TAM-ECM 双阶段整合框架

综合前述分析，本文把生成式 AI 使用过程划分为前置认知、TAM 初始接受、实际使用、ECM 使用后评价和后续行为结果五个环节（图 1）。其中，“实际使用”承担前后阶段的衔接功能：只有进入真实任务，用户才有条件用经验修正原有判断。后续行为也并非只有“继续使用”一种。核验成本上升、风险增加或交互疲劳都可能导致阶段性停用；模型更新、任务需要变化或新的良好体验又可能促使用户重新采用。因此，持续、退出和回流更适合被理解为可以相互转化的行为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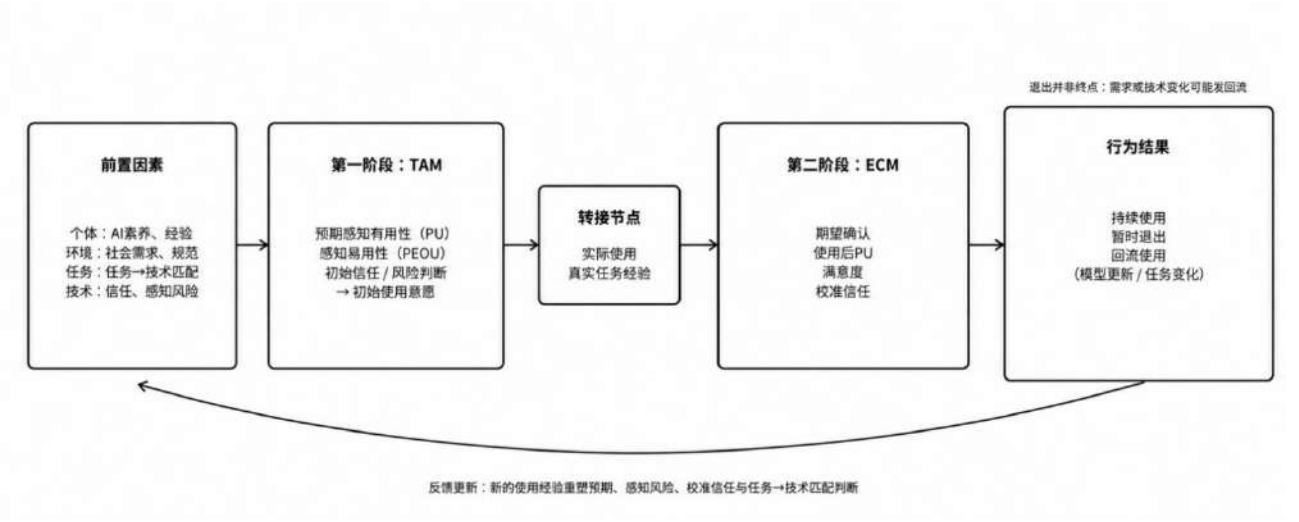


图 1　生成式 AI 接受与持续使用的 TAM-ECM 双阶段整合框架

这一框架的重点之一，是区分用户在不同阶段依赖的信息来源。真正使用之前，价值预期、操作难度、风险与可信度主要来自想象、口碑或有限体验；完成具体任务之后，输出质量、时间成本以及原有预期是否兑现会进入判断。由此，确认、满意度和校准信任都具有较明显的经验属性。即便变量名称相同，其在使用前后也可能代表不同含义，因此研究设计不宜把两类判断直接合并。

把“实际使用”设置为单独的转换环节，还有测量上的考虑。没有真实任务经验，就很难谈期望是否得到确认，也无法形成使用后的满意度。通过这一节点，可以把“准备尝试”“已经尝试”和“使用后仍继续”分别处理，避免把行为意愿、一次性采用与持续行为混为同一结果。

任务匹配和信任校准进一步限定了框架的适用方式。不同任务的错误后果、核验难度与潜在收益差别很大，生成式 AI 因此不存在脱离情境的统一价值。在错误代价高、结果又难核查的任务中，自动依赖程度应当更低，人工复核则需要更强；在低风险、易验证或偏生成性的任务中，人机分工更容易稳定下来。这意味着持续使用不能只统计频率，还要观察这种使用是否与任务风险相适配。

6 研究启示与未来方向

6.1 从意愿研究转向真实行为

技术接受研究常把行为意愿作为最终变量，但生成式 AI 平台事实上能够留下较丰富的行为记录。未来研究可将问卷结果与平台数据配合使用，例如比较自报意愿与实际使用频率、单次对话时长、主要任务类型和订阅续费情况。这样既有助于减少单一自陈资料带来的偏差，也能识别一些表面矛盾的情形，例如“愿意用但很少用”或“满意度一般却仍频繁使用”。

6.2 从横截面研究转向纵向动态研究

持续使用天然包含时间维度，单次横截面调查很难判断某种认知究竟是后续行为的原因，还是已经使用之后形成的结果。更合适的研究可以分阶段收集资料：T1 记录初始 PU、PEOU、信任和风险判断；T2 观察实际使用；T3 测量确认与满意度；T4 再记录继续、暂停或退出。如果研究期间恰逢模型升级，还可以将升级视作一个时间节点，比较前后评价是否发生变化。

6.3 从一般信任转向校准信任

传统技术接受研究往往假定，信任越高，技术越容易被采用。但生成式 AI 可能生成语言自然、形式完整却事实有误的内容，这使“高信任”本身未必是理想状态。更有意义的问题是，用户能否在模型擅长且错误代价较低的任务中适度依赖，又能否在模型能力有限或风险较高时主动核验。换言之，研究应考察的不是信任的绝对高低，而是信任是否与具体任务中的模型表现相匹配。

6.4 从持续使用转向人机能力配置

如果研究只记录生成式 AI 是否被继续使用，还不足以判断这种使用对人的能力意味着什么。Lo 的快速综述显示，ChatGPT 既可能为学习活动提供帮助，也伴随准确性、评价和学术诚信方面

的问题[10]；Dwivedi 等则从多个学科讨论了生成式 AI 在研究、组织实践和社会层面的机会与风险[11]。因此，后续研究有必要把使用行为与学习成效、任务绩效、创造力、自主加工和认知卸载放在一起考察。真正值得区分的不是“用了多少”，而是技术在什么条件下补充人的能力，又在什么条件下替代了原本应由个体完成的认知活动。

6.5 理论命题与可检验路径

为便于后续实证检验，本文把上述关系归纳为六项命题。P1：初始阶段的感知有用性对生成式 AI 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其作用可能强于仅体现界面操作难度的感知易用性。P2：AI 素养有助于提升任务拆解和结果核验能力，从而改善信任校准，并减少脱离任务情境的风险判断偏差。P3：真实使用后的期望确认越高，使用后感知有用性和满意度越高。P4：满意度与校准信任共同作用于高质量持续使用，且任务风险可能改变这种作用。P5：任务—技术匹配会影响感知有用性向持续行为的转化程度。P6：连续负面体验会提高阶段性退出的可能，而模型升级、任务变化或新的正向体验可能促成回流；回流之后形成的新经验还会继续修正预期、风险判断和校准信任。

表 2　TAM-ECM 整合框架的核心命题与测量建议

命题	核心关系	建议观测内容	可能的调节因素
P1	初始 PU→使用意愿	任务效率、产出质量、净收益	AI 素养、既往使用经验
P2	AI 素养→信任校准/风险判断	核验行为、提示能力、模型边界理解	任务风险、专业知识
P3	期望确认→使用后 PU/满意度	预期兑现程度、使用后净价值	任务风险、模型表现
P4	满意度+校准信任→高质量持续使用	持续意愿与实际使用记录	任务风险、具体使用情境
P5	任务匹配调节 PU→持续行为	任务类别、错误代价	AI 素养、使用情境
P6	负面体验→退出；技术/任务变化→回流	中辍时间、退出时长、回流次数、行为日志	模型升级、任务变化

7 讨论

7.1 理论贡献与局限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使用过程的重新组织，而不是继续增加解释变量。第一，TAM 与 ECM 被放在同一时间序列中，用户从首次接受、真实使用到使用后的再评价能够被连续观察。第二，框架引入校准信任、任务—技术匹配以及“持续—退出—回流”的状态变化，以回应生成式 AI 输出不稳定、模型更新快等特征。第三，本文区分了系统采用和内容采纳两个层次：用户愿意使用某个 AI 系统，并不意味着会接受系统生成的每一条内容。在高责任任务中，这一区分尤其重要，信息采纳研究可为其提供补充解释[15]。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解释范围存在明显边界。首先，研究属于概念构建与叙述性综述，六项命题目前尚未由实证数据检验。其次，框架默认用户对生成式 AI 具有一定选择权；如果系统由学校或组织强制部署，个人意愿的重要性可能下降。再次，本文讨论主要基于教育和知识工作场景，消费、娱乐或陪伴型应用是否遵循同样机制，现阶段尚不能确定。最后，组织制度、平台规则和模型更新虽然被纳入外部条件，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未展开。上述问题都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处理。

7.2 理论适用边界与研究设计建议

该框架更适合用于分析自主或半自主采用，并且用户能够多次接触生成式 AI 的情境。如果组织要求必须使用某一系统，制度要求、任务安排和支持条件可能取代个人意愿成为更直接的驱动力；若任务本身只发生一次，持续使用也就不是合适的结果变量。因此，在采用 TAM 或 ECM 之前，应先判断研究对象属于自主采用、制度性采

用还是强制使用，再决定各变量在模型中的位置。

量化研究可以沿实际使用进程安排变量测量。使用前记录 PU、PEOU、初始信任、风险感知和 AI 素养；任务进行中观察任务匹配、核验行为与交互质量；任务结束后再测量确认、满意度、校准信任以及之后的持续或退出行为。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最好通过不同时间点收集资料，并尽可能结合行为日志或实验操纵，从而降低同一时间点测量带来的因果解释限制。

量表设计还需注意概念区分。界面是否易用、提示是否有效、核验是否费力、用户能否拆分任务，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能力或成本；一般信任与“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 AI”也不宜用同一指标代替。对于退出与回流，访谈、使用日记和任务回溯可能比一次性问卷更有解释力，因为很多所谓“停用”只是阶段性的，用户之后仍可能因模型更新或任务变化重新采用。

7.3 实践启示

对产品设计而言，持续使用本身不宜被当作唯一目标。若系统只是让用户停留更久，却没有帮助其识别结果是否可靠，这种“黏性”并不等于高质量使用。更值得关注的设计包括：让来源信息更容易查看，在答案存在不确定性时给予提示，为事实核查保留便捷入口，并对高风险任务提供醒目的人工复核提醒。与此同时，还应减少因提示反复调整、结果波动和重复返工带来的额外操作成本，使用户能够把精力更多放在任务判断而非无效试错上。

对教育机构和组织管理者而言，生成式 AI 治理也不宜停留在“允许”或“禁止”的二分做法。更可行的方式，是根据任务风险设置不同要求：低风险且容易核验的活动可以在明确边界下使用；涉及隐私、评价、科研诚信或专业责任的高风险任务，则应提高披露、人工复核和责任追踪要求。高校和科研机构还可以把 AI 素养与人机协作规范纳入课程及科研训练，使管理重点从限制工具本身转向明确责任与核验规则。

对个体用户而言，AI 素养的重点也不只是会使用工具或会写提示词。任务界定、结果核查、风险识别以及对最终决定承担责任，同样属于重要能力。较合理的人机分工，是把生成式 AI 放在信息整理、方案发散等适合外部辅助的环节，同时在关键判断、深度学习和高责任决策中保留必要的自主加工。使用程度应由任务性质决定，而不是以“多用 AI”为目标。

8 结论

生成式 AI 用户研究正在从“是否采用”转向“采用之后发生什么”。TAM 能够解释用户在接触技术前后如何判断有用性、易用性和风险，ECM 则把分析推进到真实体验后的确认、满意度与后续选择。将两者按时间顺序衔接，可以更清楚地观察用户如何由预期进入尝试，又如何根据后续经验形成继续、暂停、退出或再次采用等不同结果。

据此，本文形成了一个从前置认知、初始接受、实际使用到使用后评价，再到持续、退出或回流的 TAM-ECM 过程框架。与把持续使用视为单一终点相比，这一框架更强调用户判断会被新的使用经验反复修正。实际使用使事前的有用性预期转化为对真实收益的评价，成功或失败的交互也会改变风险认识与信任程度。对于生成式 AI 而言，更值得关注的不是如何让用户一直使用，而是用户能否在不同任务风险下保持适当依赖、必要核验和自主判断。后续研究可借助纵向追踪、平台行为记录和跨情境比较，对这一过程进行检验。

参考文献：

[1] DAVIS F D.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J]. MIS Quarterly, 1989, 13(3): 319-340.

[2] VENKATESH V, MORRIS M G, DAVIS G B, et al.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ward a unified view[J]. MIS Quarterly, 2003, 27(3): 425-478.

[3] BHATTACHERJEE A.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systems continuance: An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J]. MIS Quarterly, 2001, 25(3): 351-370.

[4] 赵静,倪明扬,张倩,等. AIGC 重构研究生学术实践: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情报,2024,44(7):34-46.

[5] 张玥,李青宇,刘雨琪,等. 组态视角下 AIGC 应用平台用户中辍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4,47(3):130-137,148.

[6] 周涛,张春雷,邓胜利. 基于 C-A-C 的生成式 AI 用户间歇性中辍行为研究[J]. 现代情报,2025,45(3):40-50,64.

[7] 邱均平,龙康,徐中阳. 基于 ECT-U&G 的生成式 AI 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实证研究——以大学生为例[J]. 现代情报,2025,45(6):46-59.

[8] KASNECI E, SESSLER K, KÜCHEMANN S, et al. ChatGPT for good?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for education[J].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23, 103: 102274.

[9] TLILI A, SHEHATA B, ADARKWAH M A, et al. What if the devil is my guardian angel: ChatGPT as a case study of using chatbots in education[J].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2023, 10: 15.

[10] LO C K. What is the impact of ChatGPT on education? A rapi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Education Sciences, 2023, 13(4): 410.

[11] DWIVEDI Y K, KSHETRI N, HUGHES L, et al. “So what if ChatGPT wrote it?”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conversational AI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3, 71: 102642.

[12] DISHAW M T, STRONG D M. Extend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with task-technology fit constructs[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1999, 36(1): 9-21.

[13] BHATTACHERJEE A, PREMKUMAR G. Understanding changes in belief and attitude towa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longitudinal test[J]. MIS Quarterly, 2004, 28(2): 229-254.

[14] ASHFAQ M, YUN J, YU S, et al. I, Chatbot: Modeling the determinants of users’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AI-powered service agents[J].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020, 54: 101473.

[15] SUSSMAN S W, SIEGAL W S. Informational influence in organization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knowledge adoption[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3, 14(1): 47-65.

[16] RISKO E F, GILBERT S J. Cognitive offloading[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6, 20(9): 676-688.

[17] YANG H, ZENG Y, XING H, et al. Fatigued by uncertainties: Exploring 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costs of generative AI us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6, 87: 103010.

1991 年以来广西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曾宇龙[1]

（1.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1）

摘 要：1991 年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广西边疆治理经历了从安全优先的恢复性治理到开放驱动的协调性治理再到战略引领的系统性治理的历史演进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地方主动性相结合，确保边疆治理的正确方向和创新活力；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实现“发展促安全、安全保发展”的良性互动；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形成治理合力；促进民族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建构，筑牢边疆治理的精神根基。这些经验不仅推动了广西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也为新时代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广西；边疆治理；历史经验；治理现代化

基金项目：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2025ＲC02);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坚持共同性方向改进民族工作研究”(ZL2024004)；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宗委民族宗教理论和实践课题委托项目“‘合在一起’：广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1950-1958 年）”（202653）

DOI：doi.org/10.70693/202609093284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Guangxi's Border Governance Since 1991

Zeng Yulong[1]

[1]Party School of the CPC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ommittee (Guangxi Academy of Governance), Nanning, Guangxi 530021

Abstract: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China-Vietnam relations in 1991, the governance of Guangxi's frontier regions has undergone a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security-prioritized restorative governance to open-driven coordinated governance and then to strategically guided systematic governance, forming a distinctive frontier governance model. This model combines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with the initiative of local authorities to ensure the correct direction and innovative vitality of frontier governance; achieves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to foster a virtuous interaction of "development promoting security and security safeguarding development"; promote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to build a governance synergy; and facilitates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spiritual foundation of frontier governance. These experiences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Guangxi's frontier areas 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frontier regions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frontier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Guangxi; Border Governance; Historical Experienc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作者简介：曾宇龙（1993-），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研究。

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区域发展。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在长达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共有3市8县（市、区）与越南接壤，居住着壮、汉、瑶、苗、京等多个民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使广西边疆治理既面临维护边境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的传统任务，又承担着推动沿边开放、服务国家战略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自2017年以来3次亲临广西考察，均对广西边疆治理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广西“做足‘边’的文章”，“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1][2][3]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越关系恶化，受其影响广西长期以“保边疆、卫国家”为首要任务，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进程相对滞后。1991年11月，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广西边疆治理也由此进入全新阶段，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广西特点的边疆治理模式。三十余年来，广西实现了从“战争后方”到“开放前沿”的转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1年的1614元和657元增长到2024年的43044元和19954元，进出口总额从1991年的10.03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7563.89亿元，创造了边疆治理的生动实践。①本文通过对1991年以来广西边疆治理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总结其历史经验，并结合新时代边疆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启示建议，以期为新时代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一、1991年以来广西边疆治理的历史演进与阶段特征

1991年以来，广西边疆治理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国家战略调整，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根据治理重心的转移和政策导向的变化，可将其划分为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面临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治理任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

（一）安全优先的恢复性治理阶段（1991-2012年）

1991年11月，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受邀率团访华，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广西边疆治理进入战后恢复时期。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修复战争创伤，重建边境秩序，恢复生产生活，治理重心体现为“以稳促兴、以贸稳边”。

由于历史原因，不仅广西包括产业布局、建设进度等在内的整体发展节奏被打乱，边境地区居民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干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到1991年底，“全区大约还有600万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占全区人口的15%”，同时“已初步解决温饱的地方，由于生产条件尚没有根本改善，一遇较大自然灾害，就容易返贫”。[4]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广西边疆治理在重建边境安全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恢复边境经济社会秩序。1984年年国家批准实行边境小额贸易政策，使得广西边境贸易日趋活跃。1992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南宁、昆明市及凭祥等五个边境城镇的通知》，南宁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凭祥、东兴实行国家规定的边境开放市镇优惠政策。[5]这一时期，广西重点恢复传统边贸形式，鼓励边民通过互市贸易增加收入，同时逐步修复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至2012年，广西进出口总额达到294.74亿美元，较1991年增长近30倍，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32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008元，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2000年，广西基于“边境地区交通、通信、教育、卫生、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利用2年左右时间开展“边境建设大会战”，在“边境8个县（市、区）全面办好24件实事”，“重点加强交通、通信、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使边境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4]2002年9月20日，广西边境建设大会战指挥部宣布，“边境建设大会战要办的24件实事，总投资21.61亿元，建设的大小项目17927个，现已基本完成”，这对于促进广西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稳固边防，增进民族团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这一阶段的治理特点表现为：在治理目标上，以维护边境稳定为首要任务，经济发展处于从属地位；在治理主体上，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有限；在治理手段上，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政策优惠，治理方式较为单一。尽管如此，这一阶段通过构建基本安全框架和恢复边贸活力，成功实现了边疆治理向“和平建设”的转

① 数据来源：199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型。

（二）开放驱动的协调性治理阶段（2013-2020 年）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广西被定位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边疆治理进入开放驱动的协调性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统筹安全与发展关系，通过深化沿边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治理重心体现为“以开放促发展、以发展固边疆”。

2016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指出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等沿边重点地区是“我国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确保边境和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正在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先手棋和排头兵，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不断提高沿边开发开放水平”。[7]沿边开发开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广西借此机遇，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建设，这一阶段，广西边疆治理呈现出多维度协调推进的特征。在经济治理方面，“十三五”期间，广西累计进出口总额为 20734.78 亿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 82.2%，年均增长 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859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815 元。在社会治理方面，广西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同时推行“党建+网格”的基层治理模式，通过“积分管理制度”激发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在文化治理方面，加强花山岩画等文化遗产保护，推动传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广西首个世界遗产。

这一阶段的治理特点表现为：在治理目标上，实现了从“安全优先”向“安全与发展并重”的转变；在治理主体上，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初步形成；在治理手段上，政策工具更加多元化，法治、科技、文化等手段综合运用。通过开放驱动的协调性治理，广西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速，为后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战略引领的系统性治理阶段（2021 年至今）

进入“十四五”时期，广西边疆治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融入国家战略，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重心体现为“以战略引领发展、以系统思维提质”。

202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要求，“广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为新时代广西边疆治理指明了方向。在战略引领下，广西边疆治理呈现出系统性、整体性推进的特征。经济治理方面，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业态，2024 年广西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7563.89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9.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044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54 元。社会治理方面，2024 年广西使用 7.38 亿元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实施 1212 个项目，其中投入 1.2 亿元支持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8 个边境县(市、区)全部通行高速公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效显著，在 2024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广西 20 个集体、21 名个人获得表彰，获表彰数量居全国第一。文化治理方面，大力推进中华文化符号传承保护，通过“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等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这一阶段的治理特点表现为：在治理目标上，追求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在治理主体上，多元协同的治理网络更加完善；在治理手段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治理精细化水平显著提升。通过战略引领的系统性治理，广西边疆地区正在实现从“沿边开放”向“全域开放”、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深刻转变。

二、1991 年以来广西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

三十余年的广西边疆治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既体现了边疆治理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广西边疆的特殊要求，是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理论在广西的具体实践成果。深入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地方主动性相结合

广西边疆治理的首要经验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创造性，实

现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的有机统一。这种治理模式既保证了边疆治理的正确方向，又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形成了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治理格局。

1.党的领导是边疆治理的根本保证。广西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于边疆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健全党委领导边疆治理的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定期研究边疆治理重大问题，制定发展战略，部署重点工作，确保中央关于边疆治理的决策部署在广西落地见效。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边疆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边疆治理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才能有效应对边疆治理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2.发挥地方主动性是边疆治理的活力源泉。广西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同时，立足自身实际，积极探索边疆治理的有效路径。根据边境地区的地理特征、民族构成和发展阶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如推进民族团结积分制、边民合作社等创新实践。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将边疆治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中，争取国家支持，同时积极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实施路径。这种中央统筹与地方创新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既保证了国家意志的实现，又适应了边疆治理的实际需求，提高了边疆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完善制度保障是边疆治理的重要支撑。广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先后制定(修订)实施 4 项自治区、6 项设区市地方性民族法规，12 项自治县自治条例和 27 项单行条例，出台 67 件涉及民族事务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将党的领导和地方创新实践纳入法治轨道。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将边疆治理成效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鲜明的工作导向。完善资源保障机制，加大对边境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边疆治理提供物质保障。

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地方主动性相结合的经验表明，边疆治理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推进，同时要充分考虑边疆地区的特殊性，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鼓励地方大胆探索创新，才能实现边疆治理的科学有效。

（二）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广西边疆治理的核心经验是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和相互促进。这种治理理念既注重通过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又强调通过安全保障发展环境，形成了“发展促安全、安全保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1.以发展促安全是边疆治理的重要路径。广西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边疆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福祉、促进民族团结，从根本上夯实边疆稳定的基础。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为边疆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创造就业岗位，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实现了“发展是最大的稳定”。

2.以安全保发展是边疆治理的基本要求。广西深刻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始终把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放在重要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环境。建立健全跨境安全合作机制，与越南开展边防合作，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加强边境地区社会治理，推进平安广西、法治广西建设，基层治理能量有效释放，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通过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增强了投资者信心，吸引了更多资源要素向边疆地区集聚，为发展提供了保障。

3.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原则。广西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动态调整发展与安全的着力点，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在边境冲突刚结束的恢复时期，侧重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加强边境管控；在沿边开放阶段，侧重于扩大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同时完善安全防控体系；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安全水平的同步提升。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提高对各类风险的预见、应对和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发展中的安全风险和安全中的发展问题，实现了发展与安全的良性循环。

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经验表明，边疆治理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把发展和安全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只有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才能实现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三）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广西边疆治理的重要经验是打破政府单一治理的局限，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形成了治理合力，提高了治理效能。这种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既发挥了政府的主

导作用，又调动了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实现了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1.政府主导是多元协同治理的核心。广西各级政府在边疆治理中发挥规划引导、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监管服务等重要作用，为边疆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制定边疆治理发展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支持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加强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创造良好环境。政府通过转变职能、优化服务，为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提供了引导和支持。

2.市场驱动是多元协同治理的重要动力。广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边疆治理。实施“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吸引民营企业投资边疆地区，参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推动跨境经济合作，吸引东盟国家企业到广西投资兴业，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参与格局。市场主体的参与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提高了边疆治理的效率和活力。

3.社会参与是多元协同治理的基础。广西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基层群众等社会力量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激发社会活力。截至 2024 年底，广西各级民政部门共登记有 26662 家社会组织，总数居全国第 14 位。推行网格化管理，截至 2022 年底，广西全区已配备网格员 18.97 万名，发挥基层群众在信息收集、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方面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边疆治理更加贴近群众需求，提高了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多元协同是多元主体共治的关键。广西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协同机制，形成了治理合力。在决策层面，建立多方参与的协商机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在执行层面，明确各方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在监督层面，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督机制，确保治理成效。

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经验表明，边疆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政府力量难以完成，必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才能提高边疆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四）促进民族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建构

广西边疆治理的独特经验是将民族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建构有机结合，通过文化浸润、情感认同、价值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边疆治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文化治理模式既尊重和保护了民族文化多样性，又强化了中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1.强化国家认同是文化治理的根本目的。广西将文化治理与国家认同建构紧密结合，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通过国防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活动，增强边民的国家观念和国防意识。开展“我为界碑描红”等活动，强化国家领土意识和主权观念。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文化活动和学校教育，培育爱国情感，增强国家认同。通过国家认同建构，使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观念，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文化治理的核心目标。广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化治理全过程，推动各民族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西卷”等项目编纂，阐释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广西的历史，增强历史认同。在文化产品创作和文化活动开展中，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3.促进文化交流交融是增强认同的重要途径。广西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搭建平台，增进文化理解和情感认同。依托“广西三月三”等传统节日，开展民族团结联谊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推动民族文化进校园、进社区，增进各民族群众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开展跨省区、跨国界文化交流活动，扩大广西民族文化影响力，同时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通过文化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在文化互动中增进理解、消除隔阂、增强认同。

促进民族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建构的经验表明，边疆文化治理必须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一原则基础上促进文化交融，在文化交融中增强国家认同，才能构筑起边疆治理的精神防线。

三、广西边疆治理的当代启示

广西边疆治理的实践经验不仅具有地方特色，也包含着边疆治理的一般规律，对于新时代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些启示涉及边疆治理的价值取向、制度设计、方法创新和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为其他边疆地区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

广西边疆治理的实践表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是边疆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边疆治理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盼，让各族群众共享治理成果，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

1.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边疆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西通过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2024 年边境 8 县（区、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达 19538 元，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此，边疆治理必须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根本目的，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持续加大对边疆地区的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让边疆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尊重和保障各族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原则。广西通过推行民族团结积分制、边民合作社等形式，调动各族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因此，边疆治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畅通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群众成为边疆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和评价者。

3.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是边疆治理的重要目标。边疆治理必须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立足边疆地区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拓宽增收渠道。要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要求边疆治理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凝聚起边疆治理的强大力量。

（二）构建与国家战略相衔接的边疆治理体系

广西边疆治理的实践表明，边疆治理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战略相衔接，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实现边疆治理的高质量发展。边疆地区要立足自身区位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将边疆治理纳入国家战略实施体系，形成边疆发展与国家战略实施相互促进的局面。

1.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是边疆治理的重要路径。广西将边疆治理与“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成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因此，边疆地区要准确把握自身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找准发展方向和重点。要立足边疆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使边疆治理与国家战略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将边疆地区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纳入国家规划，获得更多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

2.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动力。广西通过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提升沿边开放水平，2024 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7563.9 亿元。因此，边疆地区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立足自身区位优势，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完善对外开放平台，优化开放布局，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合作体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3.加强区域协同发展是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广西通过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协作、与东盟国家的产能合作，形成了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因此，边疆地区要打破地域限制，加强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要积极参与国内区域合作，承接产业转移，吸引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集聚。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跨境产业合作，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构建与国家战略相衔接的边疆治理体系，要求边疆地区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和战略思维，准确把握国家发展大势，找准自身定位，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布局，通过服务国家战略实现自身发展，

同时通过自身发展支撑国家战略实施，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能

广西边疆治理的实践表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同时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治理能力，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边疆地区要注重发挥法治和科技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边疆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坚持依法治理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保障。边疆治理必须坚持依法治边，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治理中的问题。要完善边疆治理的法规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为边疆治理提供法治保障。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依靠法治维护边疆稳定和发展。

2.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治理能力是边疆治理的重要抓手。边疆地区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边疆治理的科学化水平。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要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共享，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要加强智慧边境建设，推进边境防控体系智能化，提高对跨境违法犯罪的预警和打击能力。

3.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任务。边疆地区要树立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要加强对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环境等领域风险的监测预警，提高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要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形成风险防控合力。

运用法治思维和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能，要求边疆地区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边疆治理的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

广西边疆治理的实践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疆治理的根本要求，只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各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才能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边疆地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贯穿于边疆治理全过程各方面，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1.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边疆地区要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全过程，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要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利用新媒体技术，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营造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氛围。

2.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边疆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各民族在生产生活、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交往交流。要推进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让各民族群众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增进感情。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增强文化认同。

3.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撑。边疆地区要坚持以发展促团结、以团结促发展，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发展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的支持力度，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各族群众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要求边疆地区必须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边疆治理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社会基础。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边疆治理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广西边疆治理的实践表明，边疆地区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创新发展，实现从边缘到前沿的转变，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广西边疆治理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工作时强调：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N].人民日报，2017 年 4 月 22 日，第 1 版。

[2]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N].人民日报，2021 年 4 月 28 日，第 1 版。

[3]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N].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16 日，第 1 版。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广西改革开放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78-2018）上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

[5]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省对外开放实录[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第 364-365 页。

[6]《广西边境建设大会战实录》编写组编.广西边境建设大会战实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 77-88 页。

[7]《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72 号）》[EB/OL].（2016-01-07）[2026-04-2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1/07/content_10561.htm）。

基于数据挖掘算法的巴蜀文旅资源推荐与决策模型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代表性城市为例

周啸，赵太萍，李奥萌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摘 要：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背景，深入研究了南充市代表性文旅景点的巴蜀文化特征和空间特征，建立了南充巴蜀文旅资源推荐模型。首先构建了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结构，形成主城与周边景点空间关系格局。然后以南充文旅景点的巴蜀文化属性为标签，构建数据挖掘算法实现景点属性聚类。再以游客所在位置建立景点空间可达模型。综合游客兴趣匹配度和景点空间可达度，为游客推荐最优景点和旅游线路。实证研究证明，我们构建的模型能够很好地为来南充旅游的游客推荐兴趣匹配度高的景点，同时节省交通成本，为游客推荐空间可达度高的景点和旅游线路，最大限度满足游客的需求和预算要求。

关键词：数据挖掘；巴蜀文化；文旅资源；旅游推荐

基金项目：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旅游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中心“南充加快建设巴蜀特色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专项课题资助（课题名称：基于时空大数据挖掘的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决策模型构建，编号：WLXZ2025A008）；乐山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课题名称：基于“人工智能+文旅”创新融合模式的乐山非遗文化旅游空间决策模型构建，编号：SKL2025B12）

DOI：doi.org/10.70693/202609134003

Bashu Cultural and Tourism Resource Recommendation and Decision Model Based on Data Mining Algorithm

——Taking Representative City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as an Example

Zhou Xiao, Zhao Taiping, Li Aome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Le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ichuan Leshan 6140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Twin-City Economic Circle and the Bashu Cultural Tourism Corridor,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Bashu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Nanchong City, and establishes a recommendation model for Bashu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Nanchong. Firstly,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Bashu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Nanchong is constructed to form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pattern between the main urban area and surrounding scenic

作者简介：周啸（1986—），男，博士后，教授，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智慧旅游；
赵太萍（1990—），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李奥萌（1993—），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通讯作者：周啸

spots. Then, taking the Bashu cultural attributes of Nanchong tourist attractions as labels, the data mining algorithm is adopted to realize the attribute clustering of scenic spots. Next, a spatial accessibility model of scenic spots is built based on tourists' locations. By integrating tourists' interest matching degree and scenic spot spatial accessibility, the optimal scenic spots and travel routes are recommended for tourists. Empirical research verifies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can effectively recommend scenic spots with high interest matching for tourists visiting Nanchong. Meanwhile, it minimizes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recommends scenic spots and travel routes with high spatial accessibility, so as to meet tourists' demands and budget constraints to the maximum extent.

Keywords: data mining; Bashu culture; cultural and tourism resource; tourism recommendation

一、引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打造新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建设西南地区大后方的重要战略部署。南充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川北区域中心城市，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文化和经济增长极，也是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核心城市。南充市内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典型巴蜀文化特征的景点星罗棋布，统筹规划市内具有巴蜀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基于区域地理空间分布特点构建巴蜀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决策模型，是助力成渝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打造文化旅游新经济增长极、推动南充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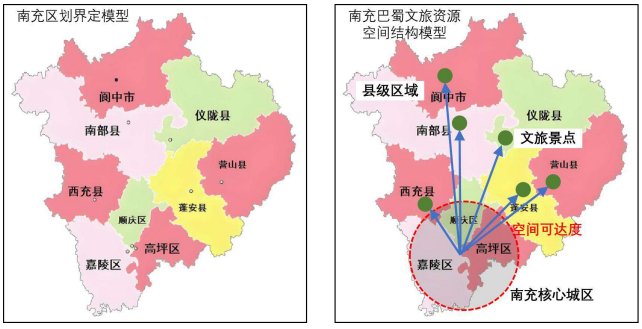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指出，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是引领区域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培育我国文化和旅游新发展空间、打造全国文化和旅游发展新增长极的重大举措。2025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南充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南充市委关于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巴蜀特色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的决定》指出：“加快建设巴蜀特色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大力实施文旅兴市战略”，从擦亮品牌、筑牢支撑、打造增长引擎、激发市场活力和增强内生动力几个方面重点阐释了“巴蜀特色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目标和路径，从时空布局、空间规划、资源整合等方面强调了深度挖掘南充巴蜀文旅资源、持续提升南充巴蜀文旅资源辐射影响力和构建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意义，足以看出南充建设巴蜀文旅经济廊带的重要性。

针对国家和省市出台的相关政策，我们以南充市内的巴蜀文化旅游景点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基于大数据挖掘的巴蜀文旅资源推荐模型。首先构建了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结构模型，以南充市辖区为空间范围设计旅游资源空间，将旅游资源存入数据库。其次构建基于数据挖掘算法的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聚类模型，将南充市的文旅景点按照属性特征进行聚类，然后再以空间可达度获得不同景点与游客之间的空间关系模型。在构建聚类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匹配游客兴趣度、计算最优空间可达度等为游客推荐最优景点，以满足游客的旅游动机利益，提高游客的满意度，从而提升南充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二、模型构建

（一）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结构建模

首先，我们确定了南充市管辖的地理空间区域，以该地理空间区域为研究范围构建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模型。将南充市包含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纳入建模范围，通过空间可视化方法构建空间结构。其次，建立南充巴蜀文旅资源属性特征数据库和空间特征数据库，分别存储景点的属性特征和空间特征，其中，属性特征用于描述景点的巴蜀文化属性，空间特征用于描述景点的空间位置、交通信息等。空间建模为景点聚类算法提供数据基础。图 1 为构建的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结构模型，图 1（a）为南充区划界定模型，图 1（b）为建立的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结构模型。图中绿色实心圆代表文旅景点，红色区域代表南充核心城区范围，蓝色剪头代表南充城区与文旅景点之间的空间可达关系。图 1 中的地图底图来自百度图片。



(a) (b)

图 1. 本文构建的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结构模型

（二）基于数据挖掘算法的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挖掘模型

将数据挖掘算法引入文化旅游研究和景点推荐，是“人工智能+旅游”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智慧旅游技术开发的重要途径。游客抵达南充市以后，对于陌生城市和环境不熟悉，需要科学合理的推荐系统为其提供符合兴趣需求的景点，同时为其规划合理的、符合其经费预算的线路，以最大程度满足游客的需求。针对南充文化旅游，首先基于巴蜀文旅资源空间结构模型采集和确定文化旅游景点，然后再根据游客的旅游兴趣确定各文旅景点的属性标签。本研究中，我们确定的巴蜀文化属性标签为：“巴蜀山水风景”、“巴蜀历史文化”、“巴蜀美食文化”、“巴蜀工艺技艺”、“巴蜀戏剧文化”。基于标签建立数据挖掘算法。

首先，对巴蜀文化属性标签进行量化，作为构建数据挖掘算法的基本元素。构建文化属性标签 $L_{(x,y)}$ 并构成一维向量 $\mathbf{L}_{(i)}$，该向量用于描述巴蜀文旅资源的特征属性。其次，构建数据挖掘算法目标函数 $f(\mathbf{L}_{(i)},\mathbf{L}_{(j)})$，如式（1）所示。基于建模条件，构建的南充文化旅游景点数据挖掘算法如下。

$$f(\mathbf{L}_{(i)},\mathbf{L}_{(j)})=\left[\sum_{y=1}^{\max y}\left(L_{(i,y)}-L_{(j,y)}\right)^{r}\right]^{1/r} \tag{1}$$

算法：南充市文化旅游景点数据挖掘算法

Step 1：基于建立的空间结构模型，确定南充范围内的 w 个巴蜀文化景点 $T_{(i)}$，初始化 p 个聚类簇 $C_{(i)}$，聚类簇数量 $p \le 4$，根据南充市内巴蜀文旅景点保有量决定；

Step 2：确定各文旅景点 $T_{(i)}$ 特征属性向量 $\mathbf{L}_{(i)}$，并对其进行量化和归一化；

Step 3：计算任意文旅景点 $T_{(i)}$ 与 $T_{(j)}$ 之间的目标函数 $f(\mathbf{L}_{(i)},\mathbf{L}_{(j)})$；

Step 4：搜索目标函数中值最大的 δ 个函数，从中选择涉及函数值的 2δ 个景点作为聚类中心。若存在更大目标函数，则替换中心重新搜索；

Step 5：按照目标函数由小到大的顺序，吸纳其余 $w-\delta$ 个非中心点至 δ 个聚类簇 $C_{(i)}$，完成聚类。

在构建基于文化属性的景点聚类算法的基础上，对南充文旅景点的空间属性进行挖掘。研究南充巴蜀文旅景点与主要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可达度是旅游决策的关键，为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整合与决策开发提供必要条件。我们引入基于直线距离的空间可达度作为衡量两点之间通达程度的标准，设定交通枢纽的坐标为 (x_1,y_1)，文旅景点的坐标为 (x_2,y_2)，则景点与交通枢纽之间的空间可达度 S 如式（2）所示，δ 为归一化参数。通过空间可达度计算方法，可以获得各个景点与游客所在交通枢纽之间的通达度，从而确定其交通成本的高低。

$$S=\delta\times\frac{1}{\sqrt{(x_1-x_2)^2+(y_1-y_2)^2}} \tag{2}$$

（三）基于文旅景点挖掘的游客兴趣匹配模型

将南充文旅景点的巴蜀文化属性标签“巴蜀山水风景”、“巴蜀历史文化”、“巴蜀美食文化”、“巴蜀工艺技艺”、“巴蜀戏剧文化”作为评分项提供给游客，由游客对评分项进行评分，分数区间为（1，10），然后将评分进行归一化，得到游客对每个标签的兴趣度。量化值越高代表游客的兴趣度越高。在确定游客对各标签量化兴趣值的基础上，按照景点属性向量 $\mathbf{L}_{(i)}$ 中标签的顺序构建游客兴趣向量 $\mathbf{X}_{(i)}$。基于景点属性向量 $\mathbf{L}_{(i)}$

和游客兴趣向量 $\mathbf{X}_{(i)}$ 建立景点兴趣匹配模型，如式（3）所示，$L_{(i)}$ 为景点属性量化值，$X_{(i)}$ 为游客兴趣量化值。

$$M = \left[\sum_{i=1}^{\max i} \left(L_{(i)} - X_{(i)} \right)^r \right]^{-\frac{1}{r}} \tag{3}$$

（四）基于景点匹配的旅游推荐模型

基于游客对各属性标签评分及量化值，通过式（3）计算游客与各聚类簇中景点的匹配度，然后再按照匹配度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匹配度值 M 越大说明景点越匹配游客的兴趣，推荐给游客的概率越高。同时，针对式（2）构建的景点空间可达度模型，分别计算各个景点的空间可达度 S，并按照空间可达度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空间可达度值 S 越大说明前往景点的交通成本越低。综合匹配度值 M 和空间可达度值 S 排序，为游客推荐最优景点。

结合南充旅游地理空间信息、旅游交通信息、文旅资源空间信息等规划符合游客兴趣的线路，配以巴蜀文化讲解为背景的语音导游、景点导览等个性化服务，将南充巴蜀文化深入贯穿整个旅游线路和游览过程。此外，系统还可以为政府部门开展旅游决策与规划、旅游企业开发巴蜀文旅线路、来充旅游的游客做好出行规划和决策等提供智力支撑和决策支持，为南充推进巴蜀特色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动力。

三、实证研究

为验证构建模型和算法的可行性和适用性，我们以南充市地理空间范围和市内代表性景点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采集南充市内代表性文旅景点及其经纬度，同时设计属性标签：“巴蜀山水风景”、“巴蜀历史文化”、“巴蜀美食文化”、“巴蜀工艺技艺”、“巴蜀戏剧文化”。利用各标签对景点进行属性量化，通过构建的数据挖掘算法对景点进行属性聚类，然后以游客所在位置计算景点空间可达度，为游客推荐最优景点和线路。

（一）基本数据采集

我们采集的南充文旅景点及经纬度坐标如表1所示，均为南充市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对各景点进行属性标签量化，得到表2数据结果。游客所在位置设定为南充火车站。

表1 南充市代表性文旅景点及经纬度坐标

	朱德故里	阆中古城	升钟湖	张澜故里	清水湖	金城山	禹迹山	天宫院
经度	106.608	105.967	105.741	105.860	106.534	106.466	106.179	106.012
纬度	31.464	31.576	31.526	30.906	31.168	30.759	31.417	31.178

表2 南充市代表性景点属性标签量化值

	朱德故里	阆中古城	升钟湖	张澜故里	清水湖	金城山	禹迹山	天宫院
山水风景	0.70	0.75	0.90	0.65	0.85	0.88	0.72	0.60
历史文化	0.95	0.98	0.45	0.90	0.30	0.40	0.82	0.88
美食文化	0.60	0.90	0.70	0.45	0.35	0.30	0.30	0.35
工艺技艺	0.30	0.85	0.20	0.25	0.10	0.15	0.40	0.30
戏剧文化	0.20	0.80	0.10	0.15	0.05	0.05	0.10	0.20

（二）景点聚类和空间可达度结果

基于表2采集的景点属性量化值，利用构建的数据挖掘算法对景点进行聚类，得到结果为：聚类簇 C(1):{朱德故里，阆中古城，张澜故里，天宫院}；聚类簇 C(2):{升钟湖，清水湖，金城山，禹迹山}。基于表1数据计算景点空间可达度，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南充市代表性景点空间可达度

	朱德故里	阆中古城	升钟湖	张澜故里	清水湖	金城山	禹迹山	天宫院
空间距离(km)	85.8	85.3	86.2	23.5	58.3	36.9	69.1	75.4
历史文化	0.012	0.012	0.012	0.043	0.017	0.027	0.014	0.013

（三）景点和线路推荐结果

假定游客对各个属性标签的打分和量化值分

别为：“巴蜀山水风景”（0.8）、“巴蜀历史文化”（0.5）、“巴蜀美食文化”（0.4）、“巴蜀工艺技艺”（0.2）、“巴蜀戏剧文化”（0.1），根据构建的兴趣匹配模型，计算得到表 4 所示的匹配度结果。

表 4 南充市代表性文旅景点兴趣匹配度

	朱德故里	阆中古城	升钟湖	张澜故里	清水湖	金城山	禹迹山	天宫院
匹配度	0.192	0.085	0.312	0.229	0.417	0.564	0.251	0.220

根据表 3 和表 4 结果，对景点的匹配度和空间可达度进行排序如下：

（1）景点匹配度：金城山 > 清水湖 > 升钟湖 > 禹迹山 > 张澜故里 > 天宫院 > 朱德故里 > 阆中古城

（2）景点空间可达度：张澜故里 > 金城山 > 清水湖 > 禹迹山 > 天宫院 > 阆中古城≥朱德故里≥升钟湖

基于上述结果，为游客推荐匹配度高、空间可达度高的景点为：金城山、清水湖和禹迹山。结合南充市地理空间条件和交通条件，为游客推荐从南充火车站出发，乘坐公共汽车和自驾游两种交通模式下的游览线路，如表 5 所示。由计算结果和推荐的景点及线路可知，我们构建的模型和方法能够很好地为游客推荐兴趣匹配度高的景点，同时尽可能节省交通成本，为游客推荐空间可达度高的景点和旅游线路，最大限度满足游客的需求和预算要求。

表 5 不同交通方式条件下推荐给游客的旅游线路方案

方案一：公共大巴（客运班车）旅游线路
D1：南充火车站→金城山→南充城区→南部县城
1. 火车站坐公交至高坪汽车站，搭乘乡村班车赴金城山，游玩；
2. 坐午后班车返回高坪；转车至马市铺客运站，乘大巴到南部县城，当晚住南部。
D2：南部县城→清水湖→禹迹山→返回南充火车站
1. 南部客运站城乡小巴去清水湖，游玩；返回县城；
2. 客运站坐班车到碑院镇，短途代步到禹迹山；
3. 游玩完毕返回南部县城，大巴返回南充火车站。
方案二：自驾旅游线路
D1：南充火车站→金城山→南部县城
1. 上午：南充站出发，驱车约 1h20min 到金城山，游览 3h；
2. 下午：下山开往南部县城（约 1h50min），县城住宿。
D2：南部县城→清水湖→禹迹山→返回南充火车站
1. 上午：县城→清水湖（20min，游玩 2h）；
2. 下午：清水湖→禹迹山（30min，游玩 2.5h）；游玩结束直接返回南充站（约 1h20min）。

四、结束语

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背景，以巴蜀文化旅游研究为依托，对代表性城市南充及其文化旅游景点进行了研究。南充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川北区域中心城市，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文化和经济增长极，也是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核心城市。实现南充文化旅游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对推动南充旅游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本文首先构建了南充巴蜀文旅资源空间结构模型，以南充市辖区为范围确定了研究论域，南充主城区为中心、周边文旅景点为对象建立了空间可达关系模型。其次，构建了基于景点巴蜀文化属性的数据挖掘算法，实现了南充代表性景点的属性聚类，将具有相近属性的景点聚集成簇，为旅游推荐提供数据基础。然后以游客所在位置为中心建立了景点空间可达模型，衡量景点的交通成本。基于游客兴趣和位置，结合兴趣匹配模型和空间可达模型，为游客推荐景点和旅游线路。实证研究表明，我们构建的模型和方法能够很好地为游客推荐兴趣匹配度高的景点，同时尽可能节省交通成本，为游客推荐空间可达度高的景点和旅游线路，最大限度满足游客的需求和预算要求。我们构建的方法具有良好的实践性，可以为政府部门开展旅游决策与规划、旅游企业开发巴蜀文旅线路、来充旅游的游客做好出行规划和决策等提供智力支撑和决策支持，为南充推进巴蜀特色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向丽蓉,胡传东,曾涵林,等.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24,(03):38-44.

[2]张莞,粟源昱.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研究——基于三个案例点的调查分析[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23,28(04):5-11.

[3]尹伟,秦珺,黄园林,等.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评价与建设研究[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22,37(06):80-86.

[4]王梦娇,严敏,马健.四川省“一核五带”区域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基于“十三五”时期数据的分析[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22,24(05):57-68+72.

[5]龙志,曾绍伦.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实证分析——以川南城市群为例[J].城市学刊,2017,38(04):55-62.

[6]张科,Wong Siao Fui,李益彬,等.基于空间结构分布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以内江市为例[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38(08):103-111.

非遗节事场景建构与产业融合——以德昌药市为例

刘博雅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四川 成都 611331)

摘 要：非遗节事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并不是把文化资源直接转化为商品，而是需要借助具体的场景，把原本存在于地方生活中的文化内容组织起来，通过真实性表达、戏剧性体验和合法性建构，让文化资源变成游客能够观看、参与和感受的文化体验，并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与文旅、康养、商贸等业态形成联系；这类产业价值能否长期保持，还取决于传统文化能否在传承基础上得到合理利用，并形成较为稳定的延伸。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场景理论；产业融合；德昌傈僳族端午药市

DOI：doi.org/10.70693/202609307926

Scene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estivals:

A Case Study of the Dechang Lisu Dragon Boat Festival Medicinal Market

Boya Liu

Sichuan Film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Chengdu 61133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estivals with related industries does not simply mean turning cultural resources directly into commodities. Rather, it relies on concrete scenes that organize cultural content embedded in local life. Through the expression of authenticity, dramaturgical experience, and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cultural resources are transformed into cultural experiences that visitors can observe, participate in, and perceive. This process further expands spaces of consumption and creates connections with tourism, health and wellness, commerce, and other sectors. Whether such industrial value can be sustained over time depends on the appropriate us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and on the formation of relatively stable extensions.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cene theor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chang Lisu Dragon Boat Festival Medicinal Market

引言

非遗进入当代社会以后，怎样在保留文化内涵的同时回应现代消费需求，一直是相关研究关注的问题，文化资源本身并不会自然变成文化产品，更不会直接形成产业价值，传统文化要被更多人看到、参与，并进入现代消费过程，还需要有具体的空间、活动和体验方式来承接。

非遗节事正好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较为集中的载体，与单纯的静态展示相比，节事会把原本分散在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技艺、物产和民俗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集中呈现，游客在观看、体验和消费的过程中，也会让这些文化内容与餐饮、旅游和商业逐渐产生联系。德昌傈僳族端午药市就具有较强的地域特点，药材交易、祭药王、进山采药以及端午民俗共同构成了药市的文化基础，随着活动内容逐步丰富，民俗展演、药膳体验和旅游活动也进入其中，使传统集市和现代节事两种形态同时存在。

作者简介：刘博雅（1999-），女，助教，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管理。

目前关于非遗产业化的研究，大多从文旅融合、文化消费和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展开，对节事内部具体场景如何形成、文化内容又怎样进入消费过程，仍有进一步分析的空间。本文引入场景理论[1-2]，从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三个维度观察德昌药市场景的形成，并在这一基础上讨论其文化消费特点以及文旅、康养、商贸等业态的延伸情况，用来说明场景建构在非遗产业融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一）场景与场景建构

场景这一概念最早来自戏剧和艺术领域，主要关注特定空间中人物、活动与环境之间形成的关系，Silver 和 Clark 把场景理解为由地点、文化活动和社会价值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环境[3]，并进一步从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三个维度分析场景的文化特征[4]；其中，真实性强调文化内容与地方历史、生活传统之间是否存在真实联系，戏剧性主要表现为文化内容能否在空间中被看到、被呈现并让人参与，合法性则关注这种文化表达能否得到社会认可，以及它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和消费空间是否具有相应依据。

放到非遗节事中来看，真实性更多来自传统文化实践本身，德昌当地长期存在的药材交易、采药习俗和祭祀活动，为药市提供了与地方生活相连的基础；戏剧性让这些较为地方化的文化内容能够被外来游客直接看到和体验，民俗展演、传统服饰、药材陈列以及药膳体验都属于这种呈现；合法性则与非遗认定、地方文化认同和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方式有关，它为传统文化进入现代节庆和旅游活动提供了社会基础。本文所说的“场景建构”，就是借助这一理论观察传统文化在药市中被怎样组织、呈现，并转化为可以参与的文化体验。

（二）产业融合与分析框架

非遗节事的产业融合有自身特点[5]，非遗并不是一种单一商品，而是由技艺、习俗、知识、仪式和生活方式等多种内容共同组成，其产业利用如果只被理解成对文化符号的商品化开发，就很难说明其中的实际过程；传统文化只有进入具体空间，通过节事活动被展示、参与和消费以后，才有可能继续同旅游、餐饮、商业等相关产业发生联系。按照这一思路，本文把场景建构作为分析入口，以“文化资源—场景建构—消费联系—业态延伸”为基本线索，对德昌药市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二、德昌傈僳族端午药市的资源禀赋

（一）自然环境与药材资源

德昌县位于凉山州安宁河谷，山地和河谷相互交错，多样的生态环境为药用植物生长提供了较好的自然条件。端午药市并不是后来专门打造出来的文化项目，它所依托的是当地长期延续下来的采药、用药和交易习惯，重楼、翻白草、天门冬、龙胆草等药材在当地药市中都有较高的辨识度；采药人在采集时会关注药材是否成熟，也会注意保留幼苗和部分根系，这些做法反映出传统生产中形成的自然观念。药材交易、日常饮食以及普通生活都能看到这些地方知识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端午药市中的草药一直带有较强的“生活属性”，这成为它区别于一般节庆活动的重要基础。

（二）民族习俗与节庆传统

德昌傈僳族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祭药王、进山采药等习俗，这些内容又与端午节避秽、祈福等民俗交织在一起，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节庆文化。随着药市不断发展，原本散落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药王祭祀、采药活动和药材交易，被集中到了特定的节庆时间和公共空间内，药市也就不只是买卖药材的地方，同时承担了集中展示地方文化的功能；悬挂菖蒲艾草、佩戴香包、品尝药膳等习俗增加了现场的参与感，对当地居民来说，药市仍保留着节庆和日常消费的性质，对外来游客来说，药材、民俗、饮食和民族文化则构成了可以观看和体验的地方文化内容。

（三）非遗认定与地方文化认同

2013 年，德昌傈僳族端午药市被列入凉山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节庆习俗由此获得了更明确的文化身份，也为药市进入公共文化活动和地方旅游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不过，进入非遗名录并不能代替文化本身的传承，药市能够继续存在，仍然要依靠传统药材交易、节庆习俗与地方日常生活之间保持联系。制度认定更多是一种外部保障，真正支撑药市长期延续的，还是当地居民不断参与和使用的文化生活。

三、药市场景建构：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

（一）真实性：传统生活构成文化基础

非遗节事一旦与地方生活脱离，只依靠舞台表演和视觉包装来吸引游客，就容易变成与日常文化实践分开的“展示性节庆”[6]。德昌药市比较突出的地方，是节庆活动中仍然保留了草药交易、采药习俗和药膳等与当地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药材也是整个药市最容易被感知的文化载体，它的形态、气味和用途让传统药文化具有很强的物质感，游客可以通过闻、看、问、买等方式接触相关知识；采药习俗中积累的经验又让这种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这种地方性并不只是宣传中使用的“特色”标签，而是药市能够被识别、被记住的重要基础。

（二）戏剧性：从地方生活到公共文化体验

地方生活中的文化内容平时比较分散，外来游客如果只依靠日常观察，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完整了解，端午药市把药材交易、节庆习俗和民俗活动集中到特定街道和公共空间之后，这些内容就有了更直观的展示方式。街边摆放和交易的药材让草药的形态与气味直接进入现场环境，到了端午期间，菖蒲、艾草、香包和民族服饰等节庆元素又增加了现场氛围，音乐、舞蹈以及民俗仪式等活动也进入公共空间，使原本分散在地方生活中的文化内容被集中呈现出来。

药市还给游客提供了实际参与的机会，游客除了观看药材交易和民俗活动，还能购买草药、品尝药膳，在具体活动中接触当地的生活方式和药文化，这使传统文化不再只是被摆出来观看的内容，而变成可以进入其中并亲身感受的节事体验。节事化呈现也有相应边界，药材交易、节庆习俗和民俗活动仍要与当地原有生活传统保持联系，只有把展示建立在真实文化内容之上，药市才能在增加观赏性的同时，不把地方文化原有的实际内涵消解掉。

（三）合法性：文化认同与公共表达的结合

这里所说的合法性，不只是文化内容有没有得到制度认定，还包括当地社会是否认可它的价值，以及这种表达能不能进入公共空间。德昌药市已经获得非遗项目认定，同时又长期作为地方节庆延续下来，地方政府、社区、文化组织和市场经营者都参与其中，使药市逐渐成为地方文化形象的一部分；不过，这种合法性并不会因为进入一次非遗名录就永久形成，活动能不能继续办下去，还与居民是否持续参与、传统内容是否继续留在现实生活中有关。非遗认定能够提供制度支持，地方社会对这一文化传统持续使用和认可，才是药市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

四、场景建构下的文化消费

（一）地方生活消费与节事消费并存

德昌药市中的消费并不是后来额外加到节庆上的单一商业行为，它原本就建立在药材交易这一传统功能之上，并随着节事内容增加逐渐向其他消费形式延伸。对当地居民来说，购买药材仍然带有明显的日常生活消费性质，传统药材既能观看也有实际用途，药市保留着集市买卖的基本功能；对外来游客来说，除了购买商品，还会接触药膳、民俗表演和传统活动等体验内容，两种消费方式同时存在，让药市兼有地方集市和节事活动两种属性，也为它同旅游、餐饮等业态建立联系提供了条件。

（二）从观看到参与的消费变化

节事场景和普通商业空间之间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消费者能够直接参加其中的文化活动，草药陈列、民族歌舞、传统习俗以及药膳体验，会让消费者从单纯购买商品的人逐渐变成文化活动的参与者。这种参与未必马上形成新的消费，但它会改变游客和文化内容之间的关系，比如看过民俗活动之后可能会继续了解药材，品尝药膳之后也可能对当地药文化形成更具体的认识，于是不同消费行为之间产生了连续联系；从这个角度看，节事场景并不是简单增加几个消费项目，而是把原来分散的文化内容和消费活动放到了同一空间中。

（三）消费内容的文化化

端午药市中的消费还带有比较明显的文化属性，药材原本具有实用功能，进入节事场景以后，它同时成为识别地方文化的一部分，药膳、香包以及相关文化产品也具有类似特点，消费者购买的内容并不只是一件物品，其中还包含了对地方文化的体验和记忆。文化消费也不等于所有传统内容都要被做成商品，部分祭祀仪式、民俗活动和地方知识仍需要保留原来的文化意义，产业开发做到什么程度，应更多根据文化内容本身的性质和地方社会能够接受的范围来判断，不能只把能否商业化作为标准。

五、业态延伸：文旅、康养与商贸的融合

（一）文旅活动：延长节事文化的体验空间

药市带来的文化体验并不一定只能停留在街区内部，随着德昌地方旅游的发展，药市可以同其他文化景观、民族村寨以及自然资源产生联系，让游客在节庆期间接触到更加完整的地方环境和文化内容。文旅融合的重点也不在于把药市重新包装成一个普通旅游景点，而是把药材、民族文化、地方饮食和节庆活动整理成游客能够理解、能够参与的旅游内容[7-8]，在这样的联系中，药市可以成为游客认识地方文化的一个入口，原本集中在单一节事空间里的体验也会向更大的地方旅游空间延伸。

（二）康养业态：药文化与生态资源的结合

德昌的自然环境以及当地长期积累的药材知识，为药市同康养业态建立联系提供了现实基础，传统药文化本来就包含一定的健康生活观念，药膳、草药体验和相关休闲活动，也能够成为文化消费向康养消费延伸的具体形式。不过，这种延伸仍要建立在传统文化内容和科学规范之上，地方经验中的药材知识并不代表所有传统说法都能直接拿来宣传现代健康产品；相比强调治疗效果，药市与康养更适合在文化体验和地方生活方式层面形成联系，通过药膳、草药文化展示和生态体验等方式拓展消费空间，也能避免把非遗文化简单等同于医疗或健康功效。

（三）商贸延伸：传统交易功能的现代化表达

商贸本来就是药市最传统的产业功能，相比旅游和康养，它与药市之间的联系更直接。电商平台、短视频传播和地方品牌建设不断发展以后，药材销售有了突破节庆时间限制的可能，线上展示、信息传播、包装设计和渠道建设，都能让原本主要集中在端午期间的交易逐渐延伸到平时；与此同时，商贸延伸还要面对药材质量、产品标准和交易规范等问题，传统草药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地方特色不能代替产品质量和规范经营，只有质量得到基本保障，药市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才可能逐步转化成较稳定的市场价值。文旅、康养和商贸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延伸方向。

六、产业价值的形成与现实反思

（一）从节庆交易到地方产业联系

药市带来的经济影响，比较直接地体现在端午节期间的药材交易、餐饮和旅游消费上，同时还会把部分客流带到住宿、交通以及其他服务行业，节庆活动在短时间内形成的集中客流，为地方商业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消费机会。据德昌县公开统计数据，2025 年端午假期，德昌县共接待游客 11.07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124 万元；2026 年端午假期，全县接待游客 127637 人次（约 12.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783.84 万元，同比增长 16%，两年的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都出现了增长，也可以看到节庆消费正在向住宿、餐饮、交通等地方产业继续延伸。

药市的价值也并不只来自节庆几天内形成的短期消费，药材、药膳、民族文化和地方生态等内容还可以继续进入旅游、商业以及文化产品开发，使传统节庆产生超过单一节庆时段的经济联系；不过，这些内容能不能进一步形成较稳定的产业，还会受到市场需求、经营能力、产品质量和基础设施等条件影响，节事规模扩大只能说明参与度和消费机会有所增加，不能直接等同于产业价值已经稳定形成。

（二）文化传承与产业利用之间的关系

从文化层面看，节事活动给祭药王、采药习俗和民族文化展演提供了不断进入公共空间的机会，也让原本主要存在于地方社会内部的文化实践被更多人看到。传统文化如果长期只保留在档案、图片或者静态展示中，很容易和现实生活逐渐拉开距离，而节事活动能够让这些文化内容继续出现在真实的社会活动里；但被更多人看到也不表示传承问题已经解决，如果文化内容为了展示被过度简化，或者传统仪式完全变成面向游客的表演，非遗原有的生活基础仍然可能受到影响，产业利用与文化传承之间也就需要一直保留一定的边界和约束。

（三）产业发展中的风险与边界

药市规模不断扩大以后，原有的文化基础和生态资源也可能面临新的压力，比如过度舞台化会让祭药王、药膳等传统内容逐渐离开原来的生活语境，草药消费增加以后，如果采集过程缺少规范，也可能给野生药材资源带来压力。节事产生的收益怎样进入当地社区和传承群体，同样是产业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真正参与文化展示和传承的人承担了较多责任，却很难从产业发展中获得相应回报，非遗产业化的持续性就会受到影响；药市后续开发需要同时考虑文化保护、生态利用和市场需求，对药材采集和生态资源加强保护，减少民俗活动的简单复制和过度表演，

并逐步把产品质量、收益分配和社区参与等机制做得更加明确。

（四）以传承为基础拓展产业空间

德昌药市的产业价值并不是通过一次开发就形成的，它是在传统文化持续存在的基础上逐步积累起来的，药材交易让药市保留了生活基础，节事活动把相关文化内容集中到公共空间，旅游、药膳和康养等新的消费形式才有机会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出现。非遗节事进行产业开发时，需要把文化传承放在比较基础的位置，传统药材交易、祭祀和民俗活动的核心内容应当继续保留，同时可以根据现代消费需求增加适当的文化体验和服务项目；商业开发过程中还要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和产品质量管理，并让当地社区及相关文化主体更多参与收益形成和分配，使文化资源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还能得到维护和延续。

结语

从德昌端午药市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文化资源进入产业体系并不是一步完成的，传统药材交易一直构成药市延续的生活基础，节事活动把分散的地方文化内容集中到能够展示和参与的公共空间以后，药膳、旅游和康养等消费内容才逐渐进入其中。场景理论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角度，真实性让药市没有脱离地方生活，戏剧性提高了传统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可见度和参与性，合法性又为这些文化内容进入现代公共活动和产业空间提供了社会基础，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使传统药市逐渐具备了公共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两方面的特点。

非遗产业融合也不等于要把全部文化资源都转化成商品，对德昌药市来说，产业开发中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让传统文化继续和地方生活保持联系，同时在这一基础上增加新的消费方式与产业空间。药市能够形成的产业价值，也不能只看节庆期间有多少消费，更要看这些文化传统能不能在现代社会继续被使用、被表达，并和现实生活保持联系；当产业开发与文化传承之间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时，非遗节事才有继续延伸为地方文化资源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徐晓林, 赵铁, 特里·克拉克. 场景理论：区域发展文化动力的探索及启示[J]. 国外社会科学, 2012(3):101-106.

[2] 吴军. 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J]. 社会学评论, 2014(2):90-95.

[3] SILVER D A, CLARK T N. Scenescapes: 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Social Lif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4] CLARK T N, ed.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M]. Amsterdam: Elsevier, 2004.

[5] 李先跃. 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进展及趋势——基于 CiteSpace 计量分析[J]. 经济地理, 2019,39(12):212-220,229.

[6] 郭新茹, 陈天宇, 唐月民. 场景视域下大运河非遗生活性保护的策略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5):161-168.

[7] 张胜冰. 文旅深度融合的内在机理、基本模式与产业开发逻辑[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5(5):94-99.

[8] 文化和旅游部. 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Z]. 文旅非遗发〔2023〕21 号.

泸州市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安全数智防控与常态治理机制研究

杨成[1] 陈阳[1] 曾传俊[1]

(1.西南石油大学，四川 成都 610500)

摘 要：本文以泸州市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安全数智防控与常态治理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剖析了泸州市场馆安全治理的现实图景与运行困境。研究发现，泸州市场馆数智化建设处于局部改造初级阶段，面临技术基础薄弱与数据孤岛叠加等困境。据此，从数智赋能维度提出“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四层架构与全要素感知、智能预警、应急处置协同机制；从机制耦合维度提出多元主体责任清单、赛事全程安全管理、绩效评估动态调适三条优化进路。

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安全；数智防控；常态治理；泸州市

基金项目：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中心项目，泸州市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安全数智防控与常态治理机制研究（SHAQ202602）

DOI：doi.org/10.70693/202610074498

Research on Digital-Intelligent Prevention & Control and Regular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Venues for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in Luzhou City

Yang Cheng, Chen Yang, Zeng Chuanjun

1.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digital-intelligent security prevention-control and regular governance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 venues in Luzhou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dopt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s, it analyzes the realistic status and operational dilemmas of venue security governance in Luzhou.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igital-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venues in Luzhou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partial renovation, confronted with overlapping challenges including weak technical foundation and data silos. Accordingly, from the dimension of digital-intelligent empower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our-layer architecture consisting of perception layer, transmission layer, platform layer and application layer, and establishes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covering full-element perception, intelligent early warning and emergency dispos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chanism coupling, three optimiz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formulating a responsibility list for multiple stakeholders, implementing whole-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for events, and dynamically adjust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Keywords: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venue security; digital-intellig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gular governance; Luzhou City

作者简介：杨成(1974-)，男，汉族，四川巴中人，硕士，硕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陈阳（2002-）硕士在读，研究领域：体育人文社会学；
曾传俊（2003-）硕士在读，研究领域：体育人文社会学 。

大型体育赛事的安全保障水平，不仅关乎赛事成败，更折射出城市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重大体育赛事必须坚守的底线[1]。从北京冬奥会的“简约、安全、精彩”，到成都大运会的“预防为主、防救协同”，再到杭州亚运会的智能化防控实践，我国赛事安全保障正经历从传统人防为主向数智驱动转型的深刻变革。然而，当视野从一线城市转向地级市时，像泸州这样的川南区域中心城市，在场馆安全防控的数智化程度与常态化治理成熟度同赛事安全需求增长之间，正形成一道急需填补的鸿沟。如何让数智技术落地于地级市场馆安全防控，又如何实现从“战时状态”向“常态治理”的平滑过渡，成为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的研究命题。

一、泸州市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安全治理的基本情况

表 1 泸州市主要大型体育场馆基本情况

场馆名称	所在区县	场馆层级	主要设施
泸州奥林匹克体育公园	龙马潭区	市级	2.2 万座主体育场、3300 座体育馆、18 片网球场、羽乒馆
泸州市体育生态园	江阳区	市级	综合训练馆、恒温游泳馆
江阳文体中心	江阳区	区县	文体中心
纳溪区河西全民健身中心	纳溪区	区县	全民健身中心
纳溪区河东体育场	纳溪区	区县	体育场
泸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	泸县	区县	体育馆
合江县体育馆	合江县	区县	体育馆
合江县体育场	合江县	区县	体育场
叙永县体育中心	叙永县	区县	体育中心
古蔺县全民健身中心	古蔺县	区县	全民健身中心

如表 1 所示，目前泸州市已建成 2 个市属大型体育设施，各区县均建有综合性体育场馆，纳入四川省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名录的大型场馆达 11 个。其中，市属核心场馆泸州奥林匹克体育公园位于龙马潭区，占地 320 亩、投资 4.26 亿元，是川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馆集群；区县场馆普遍规模偏小、配置偏低，赛事资源高度集中于主城区，区域发展不均衡。

从安全治理总体情况看，场馆安防体系涵盖人防、物防、技防、应急响应四个维度，技防权重最高、已成防控核心支柱；物防层面应急避难平急转换机制不完善，区县场馆周界防护薄弱；人防层面安保力量以赛事期临时抽调为主，缺乏常态化专业队伍。数智化建设总体处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爬坡的初级阶段，受财政投入与人才双重制约，明显滞后于成都、杭州等赛事名城，老旧区域仍依赖模拟监控与人工巡查，数据互通不畅。

二、泸州市大型赛事场馆安全数智防控体系的构建路径

（一）总体目标与体系架构设计

构建泸州市场馆安全数智防控体系，应着眼于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的三级跃迁[2]，达成安全防控全面化、数据运维高效化、应急处置精准化、常态治理可持续化目标，构建覆盖“人、机、物、环境”全要素的智能交互体系，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感知、从单点防控向全域协同、从赛事突击向常态长效的转变。体系架构采用“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四层设计：感知层通过物联网传感器、高清摄像头、智能门禁实现全要素采集；传输层依托 5G 确保低延迟传输；平台层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构建安全数据中台，破除“数据孤岛”60；应用层提供智能预警、辅助决策、指挥调度等服务。核心逻辑在于“集群动态转移”，通过云计算弹性调度，赛事期间动态扩容应对峰值负载，赛后弹性缩容降低成本，破解“瞬时峰值”与长周期建设的矛盾，杭州亚运会延期后阿里云释放约 70%云资源的实践提供了技术参照。指标体系可借鉴陆晨曦等学者以人防、物防、技防、应急响应为一级指标、19 个二级指标的框架，融入数据互通率、算法准确率、隐私合规度等数智化新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开展定性定量结合评估。

（二）全要素感知、智能预警与应急处置的协同机制

全要素感知是数智防控的基础。传统防控依赖人工巡查与固定监控，存在覆盖盲区、响应滞后等不足，数智技术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电、气、燃”等多维参数，借助计算机视觉识别可疑物品遗留等异常行为，利用射频识别与人脸识别实现身份自动核验，可构建“无死角、全天候、全自动”的感知网络，将防控触角从场馆内部延伸到周边区域。智能预警是连接感知与处置的关键枢纽，数智化架构可借助数据优势增强风险识别与预警能力，实现精准预警。应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机制：事前通过大数据挖掘历史赛事安全事件识别高风险场景；事中利用机器学习对实时数据流式分析，检测威胁时通过声光报警、移动推送发布预警，并结合强化学习动态优化预警策略；事后对处置过程全程可视化追溯，为监督问责提供条件。应急处置是最终落点，北京冬奥会经验表明需确保纵向指挥与横向协调有机结合，应构建“纵向三级指挥、横向多部门协同”机制：纵向上设市级高层指挥、赛区指挥、场馆实战指挥三级体系；横向上打破公安、应急、消防、卫健等部门信息壁垒，依托数智平台实现资源联动。更为关键的是实现感知、预警与处置三者协同闭环，感知数据为预警提供输入，预警信息为处置提供依据，处置结果反过来优化感知策略与算法，形成“训练与风险输入—成效输出与再训练”的良性循环，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打造场馆“数字孪生体”，将应急响应从“经验驱动”升级为“数据驱动”[2]。

三、泸州市大型赛事场馆常态化安全治理机制

（一）多元主体联动的责任清单与协同机制

场馆安全治理涉及政府、场馆运营方、赛事组织方、安保企业乃至市民公众的多元协同，要推动治理结构从简单叠加向深度融合转变，打造协同治理共同体。责任清单核心在于“确权明责”，按“谁主管谁负责”原则[1]明确各主体边界：应急管理部门统筹协调，公安部门治安防控，消防部门火灾防控，体育部门赛事组织；场馆运营方负责日常安全管理；赛事组织方负责风险评估与现场指挥；社会力量提供专业安保与志愿者支持，避免因人员交叉、权限各异造成工作重复、责任悬空。协同机制关键在于“打破壁垒”，传统治理体系与数智化赛事的网络化特征存在结构性冲突，临时治理机制与城市常规体系割裂。泸州应依托“城市大脑”搭建赛事指挥与日常管理双向联动数据通道，实现应急与常态模式灵活切换；建立联络员、联席会议、专家咨询等制度，形成安保合力。

（二）贯穿赛事全程的安全管理与共建共享参与机制

赛事安全管理应贯穿筹办、举办、收尾全过程。北京冬奥会经验表明，若场馆建成后再设计安保系统势必造成重复投资，安全管理必须前置到规划设计阶段，实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筹办阶段，成都大运会组织 27 名专家累计辨识 1221 项风险，对 617 项逐一编制应急处置卡，“管控一批、消除一批、降级一批”的思路值得借鉴；北京冬奥会在 4 场仪式间隔仅 12 天情况下坚持每场前完成一轮风险防控与预案修订，高频滚动更新机制值得学习。举办阶段，杭州亚运会萧山区构建全覆盖智慧消防系统，实现火警全态势感知、秒级预警、多级联动，可在泸州推广，同时落实“隐患动态清零”[1]。收尾阶段，应将赛事期间积累的安全数据、处置经验、技术成果转化为常态治理资源，构建科技遗产价值转换路径，实现“一次建设、多重利用”，并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公众由被动接受者向积极合作者转化。

（三）绩效评估、反馈与动态调适机制

数智防控与常态治理的有效性需科学绩效评估检验。基于 AHP 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脆弱性评估方法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应构建涵盖“技术效能、治理效能、社会效能、可持续性”四维度的评估体系，关注系统可用性、风险识别率、公众安全感、赛后利用率等指标，建立“评估—反馈—整改—再评估”闭环流程，同时畅通公众反馈渠道。动态调适机制要求治理体系具备自我进化能力，数智技术快速迭代、赛事风险不断演变，静态体系难以适应动态需求。泸州应建立动态评估机制，依据城市发展阶段灵活调整技术应用范围与深度；建立技术更新常态化机制，定期评估技防设备状态；基于赛事安全事件复盘持续优化预警算法。此外，将数据共享程度、技术复用效果纳入考核，以制度激励推动各部门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技术引领—制度支撑—价值共创”的良性循环。

四、结语

大型体育赛事场馆安全的数智防控与常态治理，是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缩影。本文以泸州市为研究场域，描绘了场馆安全治理的现实图景，剖析了技术底座薄弱、技术至上倾向、场景局限与瞬时峰值挤压、伦理风险等运行困境，从数智赋能与机制耦合两个维度提出了构建路径与优化进路。

参考文献：

[1]张敏,徐文标,韩迪. 说奥运看大运迎亚运——三地共话大型体育赛事安全保障[J].中国应急管理,2023,(9):6-15.

[2]冯加付,宋业猛. 数字技术赋能大型体育赛事场馆智慧化转型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5,44(5):66-73.

[3]宋业猛,冯加付. 数字技术赋能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学理探赜与实现路径[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5,41(6):75-84.

[4]盛昊民,王若光. 数智技术融入体育赛事风险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优化路径[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5,44(4):15-21.

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村级集体经济的迭代与优化

——以豫北 R 镇为典型案例

张亚楠[1]

(1.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视域下，村级集体经济的迭代与优化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以豫北 R 镇为典型案例进行样本分析，旨在探讨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既有实践理路，分析当前存在的思想观念、资源利用、能人培育、产业开发等实践困境，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期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集体经济；乡村全面振兴；优化策略

基金项目：2025 年度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校级重点调研课题（ZD2025004）阶段性成果；2026 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62400411441）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202610146302

Ite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R Town in northern Henan as a typical case

Zhang Yanan

Hen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engzhou, Henan 450000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stated that it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typ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aimed at strengthening, benefiting, and enriching farmers.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te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driving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R Town in northern Henan as a typical case for sample analysis, aiming to explore the existing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ies, analyze the current practical dilemmas in ideological concepts, resource utilization, capable person culti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with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

Keywords: collective economy;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Optimization Strategy

作者简介：张亚楠（1989-），女，博士，研究方向基层治理、数据治理。

一、引言

农村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是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抓，着力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题，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高村级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既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顶层制度设计提出之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探索建立兼顾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调节机制；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要扶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多种实现形式。这些政策导向和实践要求，为村级集体经济的迭代与优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动力。然而，“新形势下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与其彰显的重要地位成为当前突出矛盾”，[1]如何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视域下，有效推动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仍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本文以豫北 R 镇为典型案例，旨在分析当前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既有路径及存在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思路与对策，以期为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的迭代与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二、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既有实践理路

R 镇位于豫北地区，是 A 市 L 市下辖的一个乡镇。全镇 185 平方公里，辖 33 个行政村，108 个自然村，47000 余人，耕地面积 3.6 万亩。R 镇既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文物古迹不胜枚举；又是革命老区，拥有八路军豫北办事处、L 县抗日政府等一大批红色革命遗址。同时作为红色资源聚集地，两个 5A 级景区都位于 R 镇辖区，十大经典工程 R 镇独占四处。这些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为 R 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R 镇党委高度重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硬指标，突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实践，通过政策撬动、产业驱动、村企联动、示范带动，不断开辟村集体经济发展新途径，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服务群众的能力，有力助推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R 镇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为：农村专业合作社、光伏发电、土地租赁等。

（一）抓政策支持，提升统筹推进“主动力”

为了破解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发展难题，R 镇党委、政府立足实际、精准发力，通过强化政策保障、实施精准帮扶、推动项目倾斜等政策举措，切实增强村级“造血功能”，具体主要有以下三种实践路径。一是创新政策供给，夯实集体经济发展基础。R 镇党委、政府制定了资金、土地、技术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强力支持。近年结合 L 市一系列政策和措施，R 镇出台相关招商引税收激励政策，鼓励和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二是精准调研帮扶，破解薄弱村集体发展瓶颈。对集体经济薄弱的村，镇党委组织力量对这些村进行深入的调研摸底，特别是摸清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的主客观原因，实行逐村“会诊”，做到心中有数，帮助他们理清发展路子，制定出详细的发展规划，并把任务指标细化分解，责任落实到人。三是项目资源倾斜，激活村集体经济发展动能。镇党委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源围着发展转”，推动各部门扶贫项目、开发项目、招商引资项目，有计划、有重点地向薄弱村集中，推动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允许资源匮乏村跨区域参与产业园区建设，共享发展红利。

（二）抓发展路径，提升致富增收“内生力”

通过对各村反复摸底和深入调研，R 镇积极支持村集体利用当地地理位置、资源优势、现实基础等实际出发，实施因村制宜、特色发展的模式。一是挖掘特色产业优势，各村成立“农、林、牧、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核桃、花椒、中药材等经济作物，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比如千亩水稻田、核桃粉条、苹果鸭蛋、梧桐树、养驴场、花椒基地等。二是结合国家光伏帮扶政策，因地制宜发展绿色能源光伏产业，于 2016 年成立 R 村金源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核算并出台了《R 镇村级分布式光伏电站收益分配方案》，把一些可利用的屋顶、空旷地一起纳入光伏发电工程，大幅度增加集体收入。做到村村“有钱搞建设，有钱谋民生”。三是通过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租赁承包土地、门面房、电站、果园等经营权，千方百计争取项目投资，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四是全力挖掘乡村旅游资源，打造民宿、农家乐，积极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观光、

创意农业等新兴产业，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如在红色资源聚居地的多个村，通过打造文旅村庄，内提品质，增加收入，形成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山水生态和休闲娱乐为主的旅游产业格局，在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旅游服务方面创收，带动集体增收。五是依托本村实际优势资源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除此之外通过三资清查、补充耕地、乡脉经济等多方式多途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三）抓群众参与，提升共建共享“凝聚力”

镇党委始终将集民智、聚民力、汇民心作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关键点，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引导广大村民投身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真正成为参与者、推动者、共享者。一是强化组织引领，凝聚发展合力。镇党委、政府多次组织各村书记参加交流座谈会和现场观摩会等，邀请先进村做经验介绍和技术指导，为各村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和协作发展创造良好氛围和环境，在合作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村集体经济发展。二是持续强化村民自治，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将群众参与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充分调动群众主动性、积极性，目前 R 镇已有 80%以上群众参与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级产业发展。三是提升村民能力素质，健全利益联结机制。R 镇注重激发村民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热情，通过举办技能培训、创业指导等活动，提升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村民们在集体经济的带动下，积极参与到各类经济活动中，不仅增加了个人收入，也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此外，R 镇还建立了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村民，让村民在共建共享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实践困境

目前 R 镇各村集体经济发展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从总体上看村集体经济整体实力还比较薄弱，造血功能差，发展后劲不足，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

（一）转变思想难

长期以来，受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部分村干部和群众对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认识不足，观念陈旧，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主动作为、开拓创新的意识。一些村干部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是上级的事、政府的事，与己无关，存在畏难情绪，缺乏信心和决心。同时，部分村民对集体经济发展漠不关心，参与度不高，没有形成全村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这种思想观念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村两委成员仍缺乏与时俱进思维、绿色生态发展思维以及农业品牌化、特色化思维。部分村干部对自身肩负的职能职责认识不全，缺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牵头人和负责人，缺少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无法运用农业现代化发展理念加强农产品特色及优势，导致农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力不足，极大影响产业发展及农民增收。二是部分村民也存在观念落后问题，对集体经济发展持观望态度，缺乏主动参与和积极贡献的意识，这进一步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三是部分村集体在规划产业发展时缺乏系统性思维，盲目模仿其他地区成功模式，忽视本地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点。

（二）资源盘活难

“人才、资本等长期从农村单向流向城市，农村土地闲置资源盘活难，金融体系不够健全，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和数字赋能机制薄弱仍是突出问题。”[2]这是城乡发展进程中，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第一，土地资源受限是集体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农村最多的是土地资源，但是土地资源盘活往往受地域位置制约，除个别地方外，作为资产抵押贷款在现行政策下还存在一定障碍。至于部分位置偏僻、自然资源有限的村，可依托盘活的资产少，经济发展空间也更小。第二，土体性质转变和用地指标控规严格加剧收缩村集体经济发展空间。近年来高速公路建设征用大量土地，受用地指标、规划限制等影响，可开发的土地资源正在逐步减少，基本农田、一般农田转化为建设用地难，村级集体经济不能放开手脚发展，致使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级收入较少。第三，资源开发机制滞后阻碍村级集体经济潜力释放。主要表现为尽管一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机制，这些资源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地挖掘和开发，从而未能转化为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通过创新机制和政策引导，有效盘活农村资源，成为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能人培育难

当前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已经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因为“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输入与培养，这与传统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专业人员完全不同。”[3]因而需要谨慎识别。一是人才外流与回流意愿不匹配形成恶性循环。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力量弱，有能力、会经营的人大多外出经商务工，能人回乡发展由于风险大、回报慢，一般热情不高、有顾虑；高校毕业生也更多地愿意留在城市寻找发展机会。二是教育与培训体系滞后制约人才成长。现有的农村教育和培训体系往往侧重于传统农业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现代农业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新型技能的培养，这进一步限制了农村能人的成长和发展。三是激励机制缺失削弱人才发展活力。农村人才发展政策支持与保障机制不健全，难以激发创业热情与创新动力。农业经理人、电商运营者等新兴职业尚未纳入职称评定体系，制约职业人才发展空间。而留在本地发展的农民群众思想、文化和综合素质普遍不高，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能力相对较弱，尤其是缺少懂经济、有头脑，能够带领一方群众致富的领头人。因此，如何吸引和培养农村能人，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和创新活力，成为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四）产业开发难

“中国产业经济结构升级仍有较大空间，农产品在农业全产业链中所占的增值收益较小，农业产业自我升级发展困难。”[4]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普遍面临产业结构滞后、业态单一、要素制约等多重瓶颈。就产业发展而言，产业结构单一化与升级路径缺失。从村集体经济整体情况来看，很大一部分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租赁收入，绝大多数村仍以发展传统种养业为主，产业层次较低、规模不大。就新业态发展而言，休闲、观光等农业新业态虽然有较好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先天优势，但还缺乏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政策支持，培育新的产业模式需要长期开发引导；城镇产业发展量较少、层次较低、市场竞争力较差，规模生产效益及观光、休闲等特色产业拉动效益尚未显现，还没有形成产业化发展、规范化经营。就产业资金支持而言，村级集体经济在产业开发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等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许多有潜力的产业项目难以得到有效实施；技术落后则限制了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使得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管理不善则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进一步制约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此外，部分村干部在产业开发上缺乏长远眼光和战略规划，盲目跟风或急功近利，导致产业发展不可持续，甚至陷入困境。

四、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的优化策略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抓手。“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一项惠民工程，根本目标是实现农村的共同富裕。”[5]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政策环境，确保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一）选优配强班子，凝聚集体经济发展合力

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村班子建设是关键，村干部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选优配强班子。积极推行支部书记“一肩挑”，鼓励村支书带头领办合作社，不断扩大村党组织书记“领头雁”效应。进一步优化村两委干部结构，吸引更多的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退伍军人等进入村干部行列，大胆选用思想解放、事业心强、思路清晰、群众认可、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切实让村干部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参谋者、实践者和参与者。二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村班子年度目标考核的主要指标内容，与村干部年度考核、评先选优、提拔任用挂钩，让村级组织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集体经济和增加群众收入上来。对工作成效明显的村进行奖励，培树典型，形成正确的村级经济发展导向；对工作不力、敷衍塞责的村负责人进行调整，打消村干部求稳怕乱、不想发展、不敢发展的思想包袱，增强村干部主动担当、主动发展的意识，解决畏难情绪和“等、靠、要”思想。三是提升能力水平。加强对村“两委”班子及班子成员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力的培训，着力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基础。充分利用电视、新媒体、短视频等平台向村民宣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价值，借助经验分享会、参观活动等方式，拓宽干部群众的发展视野，让农民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还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二）发展特色产业，增加集体经济发展效益

根据各村不同的资源禀赋、区位特点、产业优势，积极探索多元化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切实为各村找准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提升集体经济发展动力。

一是发展土地合作型经济。“集体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物质基础，也是农民最可靠的基本生活保障来源。”[6]鼓励和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引导农户以承包地、林地等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合作社中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以土地股份合作为基础，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发展产业带动型经济。围绕“一村一策”“一村一品”目标，鼓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发展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项目，做好特色农产品产业的规划和开发，根据需要组建各类社会服务组织，把农民有序、合理组织起来，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规模优势进入市场，“以电商网络为依托，通过数字赋能增强商品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等环节的规范化和智能化”[7]。三是探索农旅结合型经济。积极推动有条件的村结合本地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建设外具乡村风格、内部设施齐全的乡村农家乐和独具特色的高质量民宿，完善乡村旅游系列产品，将农业农村发展与旅游产业的建立与推广相结合，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展之路，确保“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借助数字化工具重塑乡村文化结构与功能，将物质空间整理与非物质文化资本转化有机耦合，有力扩展数字乡村建设的文化产业发展空间”。[8]四是打造红色研学型经济。通过挖掘红色资源和革命文化，变“红色资源”为“红色经济”，与干部培训学院对接，增设旅游资源现场教学点，打造精品红色旅游新线路，切实推进红色旅游业发展，带动民宿经济和农产品销售。

（三）加大政策扶持，夯实集体经济发展基础

要始终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制定出台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配套政策，大力整合项目资源，因村制宜，分类施策，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新途径。“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重新调整和优化村民之间及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强化各治理主体的利益联结。”[9]一是健全保障措施。切实增强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常态化长效化，进一步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统筹协调、合力推进，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内控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规范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互助资金协会等村级组织委托代理记账工作，采取多种措施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城市资源投入农村产业，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推动农村创新创业。”[10]为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创造条件，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二是强化监督管理。“三资”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加强对“三资”的监督管理是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举措，应使群众广泛参与对农村“三资”的监管治理，增强“三资”使用明细、收益情况、分配流向的公开透明度。采取多部门联合的方式，开展“三资”清查工作，促进“三资”管理规范化，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筑牢底线。三是加强项目统筹。主动转变发展思路，把发展村集体经济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旅游、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多形式、多渠道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确保有力保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权益。政府还应加强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指导，帮助各村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和路径，避免盲目跟风和急功近利。通过政策扶持和引导，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支持。

结语

本文以豫北 R 镇为样本，在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系统审视村级集体经济的迭代路径。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实践困境：思想观念滞后导致资源闲置与路径依赖，资源利用低效弱化土地、资金等要素增值能力，能人培育断层制约管理创新与市场开拓，产业开发单一限制可持续增收空间。这些难题折射出传统集体经济模式与现代化治理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为破题提供了历史性契机。鉴于此，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能局限于村集体经济的迭代更新，还需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探索：第一，以土地制度改革激活资源价值。通过入市试点盘活闲置建设用地，探索“作价入股”“异地置换”等模式，将土地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第二，以能人引育重塑发展内核。构建“本土人才回流+外部专家导入”双轨机制，设立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培育计划；第三，以产业融合拓展增长维度。

推动“农业+文旅+电商”三链协同，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休闲农旅等融合型业态，培育集体品牌 IP。集体经济的迭代升级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更是农民共富的制度基石。唯有以土地新政破局、以人才活水润泽、以产业融合筑基，方能将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政策机遇转化为农村发展的持久动能，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王军,曹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困境与关键举措[J].农业经济问题,2022,(09):100-110.

[2]王克冬,曾维忠,武佩佩.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内在逻辑、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24,42(06):1159-1164+1178.

[3]李鹏.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机制、困境与模式选择[J].农业经济,2025,(05):54-56.

[4]蒋黎,蒋和平,郝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科学内涵、条件分析及实现途径[J].经济学家,2024,(11):119-128.

[5] 徐进,刘辉.农户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农户调研数据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4,(08):30-34+199.

[6]何宝玉.论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律适用[J].法律适用,2025,(05):51-69.

[7]陈宝玲,罗敏,国万忠.从失衡到均衡：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的变迁研究——以宁夏 L 县实践为例[J].理论月刊,2020,(12):60-69.

[8] 沈费伟,张坦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机理与路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03):61-72.

[9]岳奎,刘柯均.村庄治理共同体重塑：对农村传统共同体消散的考量与回应[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4,26(06):76-85.

[10]蔡海龙,陈文卓.城乡关系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理论辨析、历史演变与发展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25,45(04):31-42+206.

明代归善县的交通——以驿站为例

邹逸超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0 ）

摘　要：明代归善县驿站是惠州府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隆庆三年后由五驿调整为四驿（欣乐、平山、平政、水东），承担着接待官员、传递文书、保障驿递等职能，并作为水陆交通枢纽，连接广东核心的广州府、粤东地区的潮州府乃至相邻的福建省。归善县驿站实行“驿银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经费由归善等县按粮摊派，体现了“以一府之粮应一驿之需”的管理原则。同时，归善县驿站系统在维护区域通信畅通、促进物资转运与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明代广东东部驿传体系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归善县；驿站；交通

DOI：doi.org/10.70693/202610159209

Transportation in Guishan County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Post Stations

ZouYich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e post stations in Guishan County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ere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Huizhou Prefecture. After the third year of the Longqing reign (1569), they were restructured from five stations to four (Xinle, Pingshan, Pingzheng, and Shuidong).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receiving officials, transmitting official documents, and ensuring postal relay services. As a land-and-water transportation hub, they connected Guangzhou Prefecture, the core region of Guangdong, Chaozhou Prefecture in eastern Guangdong, and even the neighboring Fujian Province. The post stations in Guishan County operated under a fiscal system of “local self-sufficiency in post-station silver,” with funds apportioned by Guishan and other counties according to grain quotas, embodying the management principle of “using the grain of one prefecture to meet the needs of one post st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ost-station system of Guishan County played a key role in maintaining smooth reg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promoting material transf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postal relay system in eastern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Guishan County; post stations; transportation

驿站是我国古代驿传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历代政府都对此予以重视，明政府亦不例外。明代统治者参照前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设驿传制度，在京师者名为会同馆，在外者为驿站、急递铺、递运所[1]。对于明代驿站的研究，前人主要是从宏观的驿传制度方面入手，或从政治、军事角度讨论明代驿站的功能，但对有明一代归善县之驿站交通之研究仍存在可探析的空间。

作者简介：邹逸超(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

因此，本文将以明代广东归善县的驿站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该地区驿站的交通格局和运作情况。

一、驿站的数量与位置

归善县属惠州府，相关的传世方志中关于归善县的驿站数量记载有所不同，或云“有驿五”，或云“有驿四”，并无争议的四个驿站为：欣乐驿、平山驿、平政驿和水东驿，仅苦竹派驿[1]的相关记载存在着差异。

嘉靖年间所修《惠州府志》有李玘、姚良弼分别所主修的版本，两个版本中关于归善县驿站数量均为五个，以李玘主修的《惠州府志》所载为例，归善县“驿凡五”：

“曰欣乐水马驿，在城北下廓；洪武三年，知县木寅建；永乐十年修。曰平山马驿，在内外管都；洪武元年，驿丞程镒建；永乐十五年，驿丞蓝旺重修；嘉靖十九年，知府李玘重建。曰平政马驿，在内外管都；洪武元年建。曰水东，在归善县驯雉都；洪武元年建；永乐十三年，驿丞骆仕高修；下浮龙川江达欣乐，上溯龙川江达博罗莫村驿。曰苦竹泒水驿，在宽得都；洪武元年建；上溯龙江达河源，下浮龙江达莫村。”[2]

综合相关文字记载和舆图情况可见，位于归善县城东南面的驿站有三个，即水东驿、平山驿和平政驿。欣乐驿和苦竹派驿则位于归善县城的北面。惟独雍正年间所修的《归善县志》中称归善县驿站数量为四个：“有驿四，曰欣乐，水、马驿，在城北下郭……曰平山曰平政，俱马驿，俱在内外管都，俱洪武元年建。曰水东：水驿，在驯雉都、洪武元年建。”[3]

可见，在明清易代之后，苦竹派驿的归属地是发生了变化的，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并未直接见于《归善县志》当中，但或应在析置永安县时一并被移交给永安县进行管理：

“都十有三，里三十有七……隆庆三年割古名、宽得二都，共五图，另设永安县。”[3]64

如前文所引李玘主修的《惠州府志》中的材料所示，苦竹派驿本身是位于宽得都的，故该驿一并被移交予永安县是有其合理性的。

与此相似的是，宽仁里巡检司的相关记载或可成为苦竹派驿一同被移交予永安县的佐证，如《康熙永安县次志译注》中所整理的材料记载称：

巡检司二，一曰驯雉里巡检司，在凤凰冈，旧在归善水东驿侧，嘉靖中佥事施儒徙于古名都乌石屯。扁曰“永吉”，而司名仍旧，安民镇立县，乃徙于凤凰岗。一曰宽仁里巡检司，在苦竹派驿侧佥事施儒徙于桃子园（按：属于宽得都），后复还此（按：即苦竹派驿侧）。上有水驿，洪武元年建，旧坐派博罗，今隶永安，以宽仁巡检摄之[4]。

可见，已隶属永安县的宽仁里巡检司，是统摄着苦竹派驿的，且巡检司就设置在苦竹派驿旁边（按：且巡检司的位置虽经迁徙，但始终位于宽得都域内），可见彼时苦竹派驿随永安县设立时一并被移交是符合逻辑的。故而认为苦竹派驿是隆庆三年时随着宽得都被拆分给永安县时，一并被移交予永安县管辖，所以在雍正时所编修的《归善县志》中未将苦竹派驿纳入数量统计中，最终与前代相关记载产生了出入。

综上，有明一代，以隆庆三年为界，在隆庆三年之前，归善县所拥有的驿站数量为 5 个，隆庆三年之后该县拥有的驿站数量为 4 个。

此外，除欣乐驿的位置有变化外，其余几个驿站并无大的位置变动：

（按：万历）二十五年秋八月，移建欣乐驿于拱北桥左——洪武三年知县木寅建驿城北下廓。至是知府程有守见旧驿僻且圮，同归善县知县邓镳移建于此。

总之，从包括苦竹派驿在内的 5 个驿站位置来看，归善县内所属驿站位置基本处于一个稳定的态势。

二、驿站的维续

而就如何保证驿站的维续运转而言，前文所引的《康熙永安县次志译注》当中的“旧坐派博罗”已有所暗示，即是由地方承担并摊派于民——明代并无类似于宋代转运司一般的省级解运机构，这就导致驿站体系事实上是直属于“典与辇车、乘、卫、守、廐牧、传邮之事”[5]的车驾司。而各地的驿站在行政上由驿丞进行管理，财政上依赖于州县的差役摊派给。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驿站差役的摊派经历了一个由永充到轮充的转化，这个转化是在洪武年间就完成的，同时是嘉靖时全面推行站银制改革、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明代驿传封建依存关系前的重要一步[6]。恰好在嘉靖时所编修的《广东通志初稿》中，有着相似的改革措施，且记载有关于归善县驿站的相关材料，其记载称“计定各府编米，并驿递该用，量派宽裕银两”：

看得各府所属州县，田粮有多寡，驿递用银

[1] 部分史料当中的“派”写作“泒”，实为同指一物。

亦有繁简不同，难以通省概论。今定以一府钱粮，应当一府驿递之用，以为一府百姓差役均平。

各府掌印官每年俱要严督州县各掌印官，俱于十月秋成之际，照依本府委官编定驿传花户各实在粮米数目，责令各图里排，各将本户并本管甲首各银两，随粮照数带征，送县秤纳，解府贮库。

各驿递官吏按季具领，赴府依时照数给领，回还答应。

如有征解过时，及人户恃顽不纳，本府查将各州县掌印官，迟一月者截俸，该吏截参；迟一季者，掌印官听分巡道提问，该吏坐赃革役。

仍行该州县，将恃顽人户提问应当罪名，责限完纳，庶不累驿官揭债之难，不中奸民惯拖之计。

州县官吏不许径拘花户赴纳，亦毋得乘机滥罚里排人等完票纸价及火耗秤头之类，违者许诸人举告拿问，赃罪不恕。

其各驿递所派银两，年终用剩，照数贮库，以俟下年通融支用，一毫不许别项支销。

其量派宽裕银两，诚恐人事不齐，临期缺用，难于派征，故预备此节，本府明白贮库，明开月报簿内。

各驿递果有马匹倒死、船只铺陈坏烂，申请抚按二司、守巡等衙门委官估计呈允，方许动支；有剩一体收贮听用，毋容各驿递官吏妄申滥费，如违，查出从重究治。

今将计定各府所属州县粮米，除优免并虚粮外，实在该编米石，并驿递每年该用及量派宽裕各银两数目，开列于后[7]。

可见，此项改革是以“驿银地方自给”为核心原则，各府的驿递费用均由本府自身的钱粮收入来承担，旨在实现“一府钱粮当一府驿递之用”，使劳役负担在本府内部实现公平。

其次，本项改革也明确了具体征收与管理的流程。一方面，采取了定时征收之规定，即每年“十月秋成之际”，由府、州县官员督责，按登记在册的“花户”实际田粮数目，“各将本户并本管甲首各银两，随粮照数带征，送县秤纳”，并进行集中的管理，将所征收的银两“解府贮库”。另一方面，各驿站需“按季具领”，即按季度向府库申请领取经费。

另，还规定了相应的监督与惩罚机制。首先是对“如有征解过时，及人户恃顽不纳”这两种情况的行为，规定了从罚俸、革职到问罪的处罚措施。同时也严禁州县官吏趁机盘剥百姓，譬如“乘机滥罚里排人等完票纸价及火耗秤头”，若有发现，即“赃罪不恕”。而若有“各驿递果有马匹倒死、船只铺陈坏烂”这类额外的支出，也不得“各驿递官吏妄申滥费”，必须经上级衙门合适批准后方能动支，避免了驿站官吏虚报预算或滥用经费。

此外，改革还特别申明了财政方面的纪律针对盈余的处理方式，即实行“量派宽裕”的预算原则，在编订预算时预留一定的宽裕量以防不时之需。且，若“年终用剩”，则必须“照数贮库”，结转至下一年使用，绝对不允许挪作他用。

同时，还记载了此时惠州府驿站财政预算与分摊方案：

惠州府所属欣乐、水东、平山、平政、苦竹泏、苏州、莫村、南丰、东海滘、大陂、平安、宝江、义合、蓝口、雷乡、通衢、兴宁、七都，十八驿；并路通南赣、无驿和平县。

每年通计派用银七千三百两；量派宽裕银五百两；二项共银七千八百两。

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兴宁、长乐、和平八县，实在该编民米五万一千三百八十一石。

每年一石，该编派银一钱五分一厘八毫八忽[7]491。

这是从惠州府的视角进行的一个总的宏观计算，若从归善县实际的维续情况来看：

曰欣乐，水马驿，在城北下廓。洪武三年，知县木寅建；永乐十年修；原额支用银一千一百五十两零九分二厘七毫；坐派：归善县银八百七十三两二钱四分六厘五毫，博罗县银一百八十九两七钱九分六厘九毫二丝四忽，和平县银八十七两零四分九厘二毫七丝六忽。

曰平山，马驿，在内外管都。洪武元年，驿丞程镒建；嘉靖十九年重建；原额支用银三百两；嘉靖二十八年，议增银二十两，共银三百二十两；坐派归善县。

曰平政，马驿，在内外管都。洪武元年建；原额支用银三百一十两；嘉靖二十八年，议增银三十两，共银三百四十两；坐派归善县。

曰水东水驿，在驯雉都。洪武元年建；永乐十三年，驿丞骆仕高修；原额支用银四百五十两三钱九分四厘一毫一丝八忽；坐派归善县。

曰苦竹泏，水驿，在宽得都。洪武元年建；嘉靖三十五年重建；原额支用银四百四十四两一钱二分九厘七毫，坐派博罗县。

设官：驿丞各一人，吏各一人[8]。

与此相似的还有：

归善县……拨欣乐驿银八百七二三两……水东驿银四百五十两……平山驿银三百二十两……平政驿银三百四十两。

博罗县……拨苏洲驿银五百九十三两……欣乐驿银一百八十九两……莫村驿银五百一十一两……苦竹泷驿银四百四十四两[8]423。

上述所引的两则材料，实际上是详尽到归善县内五个驿站的财政支出的档案记载。据其所涉及的财政经费内容来看，包括了：额定预算、预算调整和经费分摊（按：或言“坐派”），共三个方面。

从额定预算来看，这两则材料详细列出了归善县内每个驿站每年固定的“原额支用银”，精确到了毫、丝、忽，与前文省级改革中的详尽程度相同。

从预算调整来看，这两则材料还记录了嘉靖年间为平山、平政两驿追加预算的情况。一方面，这与前文省级改革中“量派宽裕”的原则相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恰恰反映了驿站原有预算可能无法覆盖驿站支出增加的趋势，在这背后应是有其他因素影响着驿站的维续运转（按：将在下文中举例说明）。

从经费分摊来看，这两则材料共同说明了归善县内每个驿站的维续成本由哪个或多个县承担，其中：归善县负担最重，独自承担了平山、平政、水东三个驿站的全部费用，并承担了欣乐驿的大部分费用；博罗县承担了苦竹派驿的全部费用及欣乐驿的部分费用；和平县分摊了欣乐驿的部分费用。据此而言，与省级改革措施“以一府钱粮，应当一府驿递之用，以为一府百姓差役均平”的出发点相类似。以欣乐驿为例，年用支千两白银，不可不谓大驿，且欣乐驿本身是惠州府内重要的驿站节点（按：本文第三章中将予以论述说明），仅依靠归善县承担的话，必然给其带来不小的财政压力，因此将欣乐驿开支费用分摊到博罗县、和平县是有其合理性的。而苦竹派驿比较特殊，其支出成本乃全由博罗县独自承担，这可能是因为苦竹派驿本身靠近博罗县，乃博罗县所常可用之驿站，加之归属博罗县的驿站仅为苏州（洲）驿和莫村驿两个驿站[2]，驿站财政支出负担较小，因而替归善县分派苦竹派驿的经费也是合乎逻辑的，且亦符合改革当中使本府差役均平的意图。

归善县所属驿站的财政支出摊派情况，大抵如上述所言。至于前文所认为驿站的支出增加超出驿站预算的趋势，是受其它因素影响所致，其中一例子可见：

（按：天启九年）夫马头银，派入丁银内。登云坊民向当夫马头，后驿传裁减，推于十三坊，乡约屡告苦累。知县陆，派通县，每丁加银叁分，总计一百五十两。驿官答应，设夫马头十名，岁给工食；内除四十两，贴欣乐驿[3]36。

受驿传裁减的影响，原本由登云坊一坊所承担的夫马头役被推给十三坊共同承担，以至于“乡约屡告苦累”。这实际上就是受到原征银雇募的夫马头役习惯被打破的影响，其余十三坊不得不亲身赴役而避免无人应役的情形。而夫马头役确实是一个沉重的差役[9]，因而当地知县宁可派入丁银，以保证差役正常摊派，这也是将劳役转变为货币化的银役的典型例子，就维续驿站的运作而言是相对有益且可持续的。

此外，还有一有关于驿站维续运转的侧面案例：

往岁，铺兵告劳，官乃掣守县城民兵十七名助之。此十七名者，不过稍津贴铺兵酒食，即安坐于家。民兵合九十名，城守而去其四之一，虚所特以助，无用非计也。岂若稍增铺兵食我？[3]119。

此虽非直接反映驿站运作情况的例子，但涉及到与驿站同属于驿传系统的急递铺，可作为彼时归善县驿站维续状况的一个侧面写照。从此段材料中可见，“铺兵告劳”这一现象并不鲜见。但就驿传系统中差役的负担程度而言，驿站最重，递运次之，递铺最轻，且隆庆后递铺渐裁撤，原来由递铺所承担的任务亦多半转移到驿站，驿站的负担进一步加重[10]。

因此，可以推测彼时归善县的驿站维续压力也是相当大的，且若非嘉靖年间广东一省力行相关改革，归善县之驿站运作或许也将成为一大难题。

三、驿站的功能及其交通地位

驿站作为驿递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发挥的功能影响着驿传系统在军事维稳、政治信息传输、商品贸易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11]。

就归善县驿站的功能而言，其中有承担管理递运所功能的驿站，如欣乐驿——“递运所，洪武二年建，正统四年并欣乐驿带管”[2]75。而其

[2] 旧有沙河驿亦隶属博罗县，但业已废弃，可参见嘉靖年间李玘主修的《惠州府志》卷 2，记载称“沙河驿驿丞：裁革”；以及崇祯《博罗县志》卷 2，记载称“废沙河马驿……嘉靖四年裁革”。

它的功能可参照万历二十五年时，主持欣乐驿改建的程有守之相关自记：

古皇华使奉符乘轺，至于郡县，郡县给之。周官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驿传之制，所从来远矣。惠故有欣乐驿，僻在城北下郭。洪武三年，县令木寅建；永乐二年重修；嗣后莫可考镜。万历十年都大水，驿淹颓几既。

乙未秋，余奉天子命来守是邦。比至，舣舟江湍，未见所谓驿者，疑之也。日过下郭，始知故驿所在；视之，四楹孑孑草间而已。问丞，丞对曰："傕居民舍。"余抚然叹曰："公刘迁邠，必首庐旅；召伯营谢，亦先峙粻。堂堂大府，使行旅无即次之安，候人鲜栖身之所；子产讥晋，岂至此乎？"亟议新之。

会岁太祲，未遑。越明年，适有学宫之役。佥言厥木独榱椽腐枵耳，若楹柱等犹然可备方斲，盍新旧参用之便？余曰："不然。学宫教化之地，贤士之关；其悉以新木，毋杂旧材。"

今年春正月，学宫成。余顾诸僚友笑曰："是可以新驿舍矣。"乃卜地于拱北桥之左，属照磨顾九经董其功。

是役也，先年议三百金，事体重大，逡巡鲜举。余会计率从省约，费半而工倍之。经始于四月初吉，落成于八月中旬，蓋不逾时而底绩焉。

驿当木陆通衢，中厅四楹，翼以两厢；前为门三间，后官房三间；驿左筑室以居丞。凡间即未能恢规制而崇大之，而视之故墟，亦可以宾至如归，有所藉而塞地主之责矣。

嗟嗟！余之蒞惠阳也，甫两载馀耳。往者作学宫、立社仓、改龙兴门、籼天臬书院、脩拱北等桥，乃复有是役，不啻啻多事哉？

顾政事有必不可已者：不一营则不久佚，不暂费则不永宁。余业已当其劳，而又无烦费；惟是修举废坠，或可逭鳏旷之万一焉耳。

工完，记而镌诸石，庶后之观者知沿革所自云[3]116-117。

据此可见，欣乐驿最核心的功能有以下四点：其一，接待过往官员与使臣。这是其最基本的功能，恰如文中提到"古皇华使奉符乘轺，至于郡县，郡县给之"，明确指出了驿站用于迎接奉旨出行的皇华使臣等官员，并提供相应的服务；其二，为公务人员或来往商旅提供住宿、休息场所。驿站建有"中厅四楹，翼以两厢；前为门三间，后官房三间"，这些设施就是为了让因公出差的官员、信使或来往商旅等人马能够得到安顿和休息；其三，发挥水陆交通枢纽的功能，协调水陆的交通及物资转运。欣乐驿站应位于"木陆通衢"之地，即水陆交通要道的交汇处。这表明欣乐驿不仅是陆路驿站的节点，也紧邻水道，负责协调和管理水陆两路的公务交通与物资转运。此外，程有守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即驿站还象征着当地官府的体面与治理水平。据程有守所言，驿站的状态直接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当欣乐驿破败到需要官员"傕居民舍"时，当地知府应视其为失职和耻辱，程有守认为这会使得"堂堂大府"颜面尽失。因此在他看来，重建驿站不仅是为了实用，也是为了维护国家权威和官府形象。

据此可知，归善县的驿站功能远超一个简单的休息站，除以欣乐驿为代表的大驿站外，其基本功能为维持明帝国通信畅通、保障公务或商旅出行，而欣乐驿此等大驿站还具有展示国家权威、协调水陆交通的功能。可以认可的是，驿站是归善县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

若是将归善县的驿站纳入到整个广东省的交通格局这一较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归善县的驿站仍不失为这一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时人论述即可为最佳证明：

自东洲、黄家山、铁冈、苏州、欣乐，由水东、莫村、苦竹派一带，又由陆路从平山、平政一带，各至凤城，皆通福建，颇为冲要[7]481。

又：

如省城往惠、潮，则自五羊取船，至欣乐换船，至雷乡驿上马，至新宁取船而至凤城。如福建而来，若由水路，亦如前取换船只……其余腰驿，止是经过取夫，未有逐站倒换也[7]482。

以欣乐驿为代表的"木陆通衢"、"颇为要冲"之处，可谓是扼守住了省府通往粤东乃至福建最为便捷之途径的水陆交通要道，其它驿站不过是"腰驿"，令时人也不得不感慨道"止是经过取夫，未有逐站倒换也"。故而欣乐驿于广东交通格局之重要性可见一斑，那么认为归善县整体驿站系统的维护是非常之重要者，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另，还有《明代驿站考·一统路程图记》中有相似论述：

本司（按：广东布政司）至潮、惠二府路：五羊驿，一百里乌石驿，六十里增江驿（并增城县），一百里沙河驿（属博罗县），一百里惠州府欣乐驿，八十里平山驿，七十里平政驿（并属归善县），八十里平安驿（属海丰县），七十里南丰驿，八十里东海滘驿，八十里惠来县大陂驿，

八十里北山驿，五十五里武宁驿，六十里灵山驿（属潮阳县），七十里桃山驿（属揭阳县），七十里潮州府海阳县凤城驿[12]。

且：

广东城至惠、潮二府水、陆路：五羊驿，一百二十里增城县东洲驿，九十里东莞县黄家山驿，八十里铁岡驿，七十里苏洲驿，四十里惠州府归善县欣乐驿，一百里水东驿，五十里莫村驿（属博罗县），一百三十里苦竹派驿，九十里河源县宝江驿，八十里义和驿，一百七十里蓝口驿（并属河源县），六十里龙川县雷乡马驿，過岭，六十里至通衢马驿，六十里兴宁水马驿，下水，七十里七都驿站（并属长乐县），八十里程乡县榄潭镇驿，七十里程江驿，六十里松口驿（并属程乡县），五十里大埔县，四十里三河驿，一百里产溪驿，七十里至潮州府海阳县凤城驿，一百里饶平县岡马驿，八十里至福建漳州府[12]272。

综上两则材料可见，归善县所辖驿站是广东省官方水陆交通的重要节点与控制枢纽，是粤东地区水陆交通网络的重要连接与转换中心。在惠州府乃至广东省这一区域交通网络当中，归善县的驿站是其重要的战略支点。归善县所辖驿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归善县境内形成了一个相互协调的交通网络：欣乐驿水陆协调，是为总枢纽；平山、平政两驿，则是控制东向陆路的干线；水东及苦竹派驿，控制着北向水路的交通通道。

可见，归善县的驿站设施是惠州府乃至整个广东一省交通网络重要的一环。正是这些驿站的存在，共同构成了归善县作为广东东部交通网络“十字路口”的交通地位。

此外，还有一与驿站交通便捷性相关的有趣例子：

旧史氏曰：郡城出朝京门，逾拱北桥，下江之干，漠无人居，独有一亭，为迎送之所，落落木棉三五株而已。百雉突兀荒郊间，若山城村垒然，甚不称郡也。

予尝偕长老履其地，观其形胜，辨其土壤，其砂逆土缠护郡城，力最重；岸带江流，可置数百家，取彀绵湖利。屋湖之土筑之，迁驿署于皇华亭；其傍近地，令民得自占筑，不过一二年，居者栉比矣。

其下一里许，即三台石，可以建塔；塔成，而以圆通庵僧移居之。入惠州者，过思疑洲上白沙堆，即见塔标高耸，烟火稠密，壮哉郡乎！惠可以富矣。

昔史起言西门豹治邺，有漳水而不能用，是为不智；魏卒用之，而河内富。今惠亦有可富之道，而不能无待于能用之人。若乃宁济桥之利，予固言之矣[3]121。

这则材料指出，若以具体的发展规划，譬如移民建屋、迁建驿署、兴建地标等，可以使得原来荒凉的地带变得“居者栉比矣”，进而“惠可以富矣”。这巧妙点出了时人对驿站的又一看法，即驿站不仅于交通格局当中有着重要位置，若是能对其交通便利性和通达性加以利用，也能够带动地区的发展。这体现了驿站建设应合理利用交通地理资源的重要性，而欣乐驿改建于拱北桥旁并仍成一大驿，恰是此时人对此观念运用的最好证明。

结论

综上所述，归善县的驿站在明代广东交通与行政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且，该县驿站数量在隆庆三年前为五驿，后因永安县析置，苦竹派驿划出，终为四驿。

这些驿站不仅承担接待官员、传递文书、提供宿泊的核心功能，更是水陆交通枢纽，尤其欣乐驿处于“木陆通衢”之地，是连接广州、潮州乃至福建的关键节点。在财政方面，驿站运营依托“驿银地方自给”制度，经费由归善县及周边县份按粮摊派，体现了明代驿传系统“以一府之粮应一驿之需”的管理原则。

总而言之，归善县驿站系统不仅维系了国家通信与运输网络的畅通，也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是惠州府乃至广东省东部交通格局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

参考文献：

[1] 孙书磊.明代公文制度述略[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57-62.

[2] 李玘.惠州府志[M]//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76.

[3] 孙能宽.归善县志[M]//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16-117.

[4] 康熙永安县次志译注编委会.康熙永安县次志译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124

[5] 查继佐.《罪惟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953.

[6] 李长弓.试论明代驿传役由永充向轮充的转化[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02):34-40.

[7] 戴璟.广东通志初稿[M]//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38，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491.

[8] 姚良弼.惠州府志[M]//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385.

[9] 刘文鹏,屈成.明清之际驿站财政制度的变革[J].山东社会科学,2022,(10):92-101.

[10] 吕景琳,若亚.略论明代驿传之役[J].明史研究,1997,(00):149-155.

[11] 徐海燕.明代驿递制度初探[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02):65-66.

[12]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26.

由新会赵莫两姓田坦案看粤中“图告不图审”的地方诉讼特征

林嘉渠[1]

(1.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清代乾隆至咸丰年间，广东新会县赵、莫两姓争夺沙田数十年，期间赵姓家族通过伪造地契、篡改边界等不法手段，企图强行霸占，历任知县审断结果相互矛盾，导致冲突进一步扩大，最终引发大规模命案，知县聂亦峰审理案件时将赵姓通过诉讼谋取利益的行为总结为“图告不图审”五字，本文以赵莫两姓田坦案为中心，从制度、社会利益和司法实践等角度探讨“图告不图审”的地方诉讼特征成因及背后清代粤中地区基层司法与地方宗族权力网络的互动。

关键词：赵莫两姓田坦案；图告不图审；新会；土地纠纷

DOI：doi.org/10.70693/202610168463

The Local Litigation of “Seeking to Sue Rather Than to Be Judged” in Central Guangdong: Viewed Through the Zhao and Mo Clans’ Sandbar Land Dispute in Xinhui

Lin Jiaqu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Qianlong to Xianfeng reign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Zhao and Mo clans in Xinhui County, Guangdong, engaged in a decades-long struggle over sandbar fields (shatian). During this dispute, the Zhao clan sought to seize the land by illicit means, including forging deeds and altering boundary descriptions. Contradictory rulings by successive county magistrates exacerbated the conflict, ultimately leading to a massive and deadly clash. In trying the case, Magistrate Nie Yifeng characterized the Zhao clan’s pursuit of illicit gain through litigation as “filing lawsuits without seeking trial” (tu gao bu tu shen). Centering on the Zhao-Mo sandbar land disput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socio-economic, and judicial factors behind this distinct local litigation ecology, illuminating the intricate interaction between grassroots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and local lineage power networks.

Keywords: Qing Dynasty; Xinhui;Land Dispute

作者简介：林嘉渠（2001—），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清史。

清代乾隆至咸丰年间，广东新会县赵、莫两姓围绕土名“太庙下”、“仙人湾”、“南涌口”的沙田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夺。该田地原本属于莫氏的祖尝田，然而赵姓家族通过伪造地契、篡改边界等不法手段，企图强行霸占，最终在咸丰七年（1857 年）引发了武装冲突，酿成赵姓 5 人死亡、8 人重伤的大案，引发广泛关注。此案历经数十年波折，横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辗转由陈寿颐、邱才颖、聂亦峰三代县令正式审理，方才得以最终解决。通过此案，可以窥见清中叶粤东地区诉讼的风貌，进而理解当地“图告不图审”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赵莫两姓田坦案始末

本案涉及沙田，大致可分为甲、乙、丙三部分，呈南北排列。甲田位于北端，赵姓及其党羽诡称其为自行开垦，实则该田产属于别姓，田契所载土地并不归属赵姓及其党羽。乙田居中，自西向东依次包括莫若智田、冯张二姓合田及何玉田三部分。丙田坐落于南端，为莫氏祖田，亦是本案中引发纠纷的土名为“太庙下、仙人湾、南涌口”的沙田。

莫氏于乾隆年间承垦丙田，持有垦单、印照等物，西至海界，百年间输粮无异。道光八年 (1828) 赵家幕后操纵县民余玉成、余发成、余上就，假报承垦甲田，谎称面积二顷九十余亩，获官府升科给照，甲田实际位于丙田之北，中隔大沙河及乙田，南北相距十余里。此番举动系为将来赵家预谋篡改地契方位埋下伏笔。道光二十三年（1843），赵姓党羽余玉成与三水县职员李燮元串通，谎称道光十年将甲田垦照抵押给李燮元，后于道光十六年失窃。时任知县陈寿颐受理此案，但屡传李燮元等不至，在现场勘核了土名四至以及莫氏垦照后，认定莫氏垦种属实，并无越界图占及拖欠租谷等事，按照原告三月不到之例销案。由于案件并未具结，李燮元等继续控诉。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寿颐卸任后，新任知县邱才颖受蒙蔽将莫氏近半数之田断归余姓，并补发垦照，在补办垦照时，赵家将原始勘界中的 “南至”全部改为“北至”，如原“南至莫若智坦”改为“北至莫若智坦”，使本在北部的甲田位移至南部丙田位置。余姓随即不再追究所谓“莫氏占田欠款”，并以每亩不足 4 两的贱价将田坦转卖赵姓。随后赵家以余、李名义连年控诉莫氏霸占，同时组织抢割莫氏田禾。莫氏监生莫廷蕙等无力对抗赵姓强族，于咸丰初年将田捐归紫水义学，欲平息争端。而赵家则以“未具结”为由，年年抢割义学田租，并逼官府“押割”。咸丰七年晚造禾熟，义学首事禀请官府押割，新会县会同武营派弁何兆彪、卫象贤率兵押割，赵家聚众百余船、千余人，持械夜袭抢割，与官兵冲突，武营开炮镇压，致赵姓 5 人毙命、8 人重伤。赵家谎称命案系“莫芝云等贿嘱何兆彪等抢割放炮”，上控省府，将莫氏族人及义学绅董陈焯之等列为凶手，索要抵命。因此案涉案死者众多，引发省府广泛关注。咸丰九年（1859）聂亦峰履任后亲赴现场，徒步百里勘界七日，确认余玉成原报甲田在北，莫氏太庙丙田在南，中隔大河及乙田，绝无重合可能，赵家所持补发垦照中“南至”均被篡改为“北至”，与道光八年原始档案不符。进而洞悉余玉成、李燮元实为赵家傀儡：余、李控词矛盾百出，如李燮元称道光十年按田，但余玉成道光二十年仍自称管业，所谓“失照”、“补照”系预谋篡改。赵家惯于霸产，因沙田年收租谷五千余石，值银四五千两，利益巨大，因而阴谋霸占。最终，聂亦峰裁定本案系赵家抗法所致，官兵奉令押割，赵家聚众抢禾、辱骂官兵，武营被迫开炮。聂亦峰确认太庙下田归莫氏并已捐义学，赵家所持地契系伪造。莫芝云等本为文弱书生，捐田后已无利害关系；阖邑绅董联名具保，实因公道而非受贿。[1]

尽管案件始末已经明晰，但聂亦峰本着息讼止争的原则，在回任新会后给出的断语中定论，鉴于莫氏已经将田产捐出，义学又谦逊明理愿意相让地界而耕，为了不让田产无主抛荒加之田产本是有价之物，不能无偿处置，因此仍归赵家掌管、经营产业。最终，赵家尽管付出了五死八伤的代价，但却是从事实上获得了对涉案田产的实际控制权，针对赵家借诉讼之名谋取田土之实的情况，聂亦峰称之为“图告不图审”的粤中诉讼风气。

二、州县司法程序疏漏助长“图告不图审”之风

司法程序的漏洞是“图告不图审”的重要原因。赵莫两姓田坦案首次上升到县司法层面，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赵家党羽李燮元向南海县呈报垦照失窃，并在报案词中篡改土地四至。然而依照清代法律条例，“户婚、田土、钱债、斗殴、赌博等细事，即于事犯地方告理，不得于原告所住之州县呈告。原籍之官，亦不得滥准行关；彼处之官，亦不得据关拘发，违者分别议处。”[2]李燮元此举行为明显违背了“于事犯地方告理”

的司法管辖原则。涉案土地位于新会县境内，李燮元身份据聂亦峰记载为三水县职员，倘若垦照真实存在失窃亦是发生于三水县，其呈报失窃案时理应向新会县衙或三水县衙投状申告，而非越境赴南海县上控，纵使在南海县呈报，亦当移知新会存案。南海县官府受理失窃案并单独存档的行为亦构成对司法管辖权的僭越。由于李燮元呈报失窃的案底是赵家夺取莫氏田产的重要一环，可以认为其跨县呈报失窃案的行为本就是为了利用跨域审察不便的漏洞，从而为后续篡改四至、伪造权属提供合法文书依据。依清律“凡民人告争坟山，近年者以印契为凭。如系远年之业，须将山地字号、亩数，及库贮鳞册，并完粮印串，逐一丈勘查对。果相符合，即断令管业。”此条例位于“盗卖田宅”之下，虽用于坟山争讼，可其适用逻辑亦延伸至沙田等不动产争讼之中，印契作为州县官处理土地纠纷类案件的重要依据，是判定产权归属的重要凭证，李燮元通过南海县官府违例受理案件的行为为赵家虚构了一份不存在的垦照，使其在形式上具备了印契这一关键证据，从而在后续争讼中获得了文书支撑。

在聂亦峰接手田坦案之前，前任县令陈寿颐和邱才颖分别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导致审断结果差异的关键因素是勘丈核对结果的区别，勘丈是审理田土讼案的重要环节，其执行人通常为州县官、县丞、巡检、典史等[3]。陈寿颐审理案件时，由于原告李燮元屡传不至，因此只核对了勘丈结果和莫氏垦照，查明无误后便以莫氏所持契照为凭，判令管业。而邱才颖再审时，赵家伪造藩照，将原本莫氏田产“西至海”修改为“西至涌”，并于田中挖两丈涌作为标识与莫氏田产形成“界址分明”之假象，借此误导勘丈人员，使其误判界址归属，从而营造出有利于赵家的勘丈结果，邱才颖据此勘丈核对结果进行了对赵家的判决，勘丈环节的不严谨致使勘丈结果流于形式，增加了勘丈结果的可操纵性，使得诬陷告案的成功率上升，助长了“图告不图审”之风。

州县官在民事细故案件审理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样是导致“图告不图审”风气蔓延的重要因素。田坦案数次审理过程中，州县官本人的意志对案件审理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按照聂亦峰结案后呈送的禀折中对案件疑点的分析，邱才颖在审理过程中有一定偏袒赵家的倾向，除上述其在勘丈过程中对赵家所呈伪照未加详察外，还曾选择性的忽视赵家呈交证据中的疑点，如在道光二十九年审理此案的判词中，称莫氏的田产在东边，东边的土地绝无可能延伸至西边；余氏的田产在北边，北边的土地却能延伸至南边，就此将田产断判给了余氏。对此聂亦峰指出滩田的形成本需子母坦依次淤积相生，方能从一处延展至另一处。而查勘结果，从马鞍山下一直到何玉等人的田产之间，并无余氏产业。既然不存在作为根基的母坦，衍生的子坦自然是子虚乌有。邱县令判断莫氏的坦田只应在东边，中间隔着一道小潮涌，绝无可能从东向西延伸。余氏的田产与涉案滩田之间隔着一道大河、两道小潮涌，邱县令却反倒认定余氏北田能向南延伸，这是自相矛盾的，同时，邱县令对赵家抢割等行为视而不见，又有数次对赵家及其党羽的堂训“不录供词，不作判语”，存在偏袒的嫌疑。

同时，“图告不图审”有助于借助己方细事诉讼拖延对方细事诉讼进程。清律明令禁止越讼，对于该管衙门处理中的案件，不鼓励重复上控，《大清律例· 刑律· 越讼》下的条例明确规定“其业经在该管衙门控理，复行上控，先将原告穷诘，果情理近实，始行准理。如审理属虚，除照诬告加等律治罪外，先将该犯枷号一个月示众。”在邱县令将半数之田划归赵家党羽余姓后，莫氏监生莫延蕙赴省上控，而赵家亦遣人赴县控诉莫氏强占其田产，形成对抗，结果是双方均匿不到案，导致案件审理迟迟无法推进，双方互相缠讼，连年抢割，田土纷争持续发酵。清代省级督抚两司对于越讼的态度较为复杂，对越讼案件少有受理甚至严厉申斥是常态[4]，邱县令上任后，县一级的司法审断有利于赵家，因此赵家选择反复进行县级诉讼以堵塞莫氏诉讼空间，而田土细事类案件并非省府上级司法单位的关注重点，上控往往难以取得成效，上级衙门多以批回原审为常例。但在涉及人命或大规模械斗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案件时，上级司法机关则会迅速介入，咸丰七年赵家与官兵冲突导致五死八伤的命案发生后，赵家迅速赴臬司上控，聂亦峰被调署新会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为处理此案，可见通过县级诉讼阻塞上诉路径的策略只适用于“细故”，而在面对命案等重情时省级司法机关的反应速度则相对迅速，对“禁止越讼”条例的执行也更为审慎与灵活。

三、宗族势力与无赖光棍群体借诉讼谋利

“图告不图审”之根源并非“告”或“审”，而是以告案为名，行占田图利之实。粤中宗族势力凭借雄厚财力和广泛人脉，对地方事务具有强

大影响力，而“图告不图审”的特殊诉讼特征便是建立在地方宗族势力强大的经济、人脉基础上。赵莫两姓田坦案前后跨度三十年有余，牵扯关键人物涉及新会、南海、三水等地，时间长、范围广，如此长期的诉讼必须有强大的宗族势力作为后盾，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同时赵家所涉案件不止田坦案一起，仅聂亦峰在任期间便有“莫腾骧控赵永富贿串混割案”、“侯宜用控赵亚一抢割毙命案”、“梁灏先控赵覲恩强占沙坦案”、“钟朝恩控赵家抢割田禾案,又控赵容芳叠抢霸占案”、“陈嘉猷控赵翰航强占沙田案”、“陈日新控赵忠信强占田坦案”等，其罪状甚多，足见对赵家而言，占田、抢割乃是稀疏平常之事，是其谋利手段之一。以赵家为代表的地方宗族之所以热衷于诉讼，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案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时，宗族可以凭借其强大的人力优势，占有土地收益。田坦案中，尽管道光二十九年之后邱县令始将部分田产划归余姓继而转卖赵家，但早在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莫氏莫廷泽曾上禀获准派差役李彪等前往涉案田护割，而据李彪等的禀复，莫姓老坦已被余、赵二姓割尽，同年十二月据证人何君睦、周安稳等的目击证词曾目睹赵家赵擢平等人驾船前往涉案田坦抢割禾稻，赵家连年抢割不休，已实际占有土地，迫使莫氏不得不将土地捐归义学，饶是如此，赵家仍不罢休，聚众百余船、千余人，持械夜袭抢割，最终导致命案爆发。可见所谓“图告”仅为其拖延时间、混淆视听之手段，而“不图审”则是因为官府审判结果不但对其无利，反而可能有害。因此，赵氏宗族更倾向于通过持续诉讼维持现状，确保既得利益不受损害。根据聂亦峰对涉案土地的勘丈结果，涉案田土总计九十余亩，预估年收租谷5,400 余石，值银 4,000-5,000 两。尽管聂亦峰对亩产量估值可能存在夸大，收益远高于诉讼成本是显而易见的。

晚清地方司法中存在着大量通过包揽诉讼来牟取私利的“讼棍”群体，他们“砌词上控，希图拖累富民；或莠民聚众相谋，动以钱粮差徭控告官长，借大题为敛钱之计；或讼棍扛帮不胜，复以诈赃毙命控告书差，借延讼为餔啜之计。”[5]，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严重干扰了司法公正。聂亦峰在田坦案的判词中重点强调了讼棍之害，指出其挑唆诉讼、混淆视听，致使案情复杂难解。讼棍本身是一个囊括范围较大的词汇，岸本美绪指出所谓“讼师”、“光棍”、“贱民”具有指代某类具有强烈负面价值判断的人群的特征，通过这些词汇“当时人们给那些认为危险的人群所强制扣上的帽子，进而构成当时人们借以清楚区分良民与恶徒的观念世界之一部分。”[6]而田坦案中为赵家出头的余姓三人以及李燮元则被聂亦峰称为“沙棍”，“沙棍”一词笔者已见最早记录载于乾隆年间《海宁州志》，道光之后出现数量增多，多见于沿海地方志之中，陶澍在其文集中收录了一条道光上谕可以大致解释“沙棍”的性质：“通州、崇明一带沙地偶然涨出，多为土豪霸占。近因争地酿衅，讼案纷起，请饬各州县勘明此等沙滩，无庸纷纷查办等语。此项沙地坍涨靡常，沙棍乘机霸占，恃强逞凶，屡酿巨案，最为该省恶习。”[7]可见沙棍特指在沿海沙地争夺中倚强凌弱、霸占土地并挑起诉讼的无赖之徒，相比于讼棍，沙棍更兼具地缘性与暴力性，余姓三人中的余玉成以及李燮元都被聂亦峰称为沙棍，其中余玉成曾多次参与抢割，而李燮元则是因诉讼手段狡诈老练而被斥为“积惯沙棍”，可见沙棍一词亦带有讼棍的司法贬抑色彩。为打击讼棍群体，聂亦峰于上任之初即颁布《息讼示》，但收效甚微，相比于内地各省，在广东这样相对分化的社会中，由于诉讼当事人社会成分复杂等因素，导致不服判决、滥打官司、雇佣讼师的复杂法文化盛行。无赖光棍群体同地方宗族势力结合使得“图告不图审”的风气日益增长。

在清代州县司法文化中，细事官司本不应存在，只有在民间调解失效时才需要上升至正式庭审。[8]而在实际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州县官相比于“判明是非”也大多更关注“定纷止争”，讼起于争，争生于利，站在州县官立场，长期持续的诉讼争斗不止会影响地方稳定，同时也会对其本人的考绩造成负面影响，息讼即为息争，而争斗双方中势力较强的一方往往是需要主动安抚的对象，尽管聂亦峰在禀文中已经基本理清了田坦案的是非曲直，却仍不得不在“息讼”逻辑下权衡轻重，赵家势大，哪怕此前陈县令判其理亏，邱县令已将半数田产判归赵家，但其仍不满足，连年行抢割之事；而莫氏势弱，愿意将田产捐予义学说明其已无意于争产，唯求息事宁人。出于平息争端、维护地方稳定以及确定征税对象的考量，聂亦峰在回任新会后判定由赵家管业，并写入谳语，赵莫两姓田坦案至此尘埃落定，这种以“息讼”为核心的司法逻辑，成为“图告不图审”之风气蔓延的重要因素，加上田土细事案件原告不到可以径行销案的惯例，更使“告而不审”成为常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粤中“图告不图审”的诉讼特征由多方原因构成，从制度层面看，清代州县司法程序存在诸多疏漏：司法执行程序的疏漏为跨域虚假诉讼提供了可乘之机，勘丈环节的不严谨使得诬告成功率大大上升，州县官在民事细故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过大自由裁量权使得案件审理结果极易受到个人影响，而“原告不到则销案”的惯例与上级衙门对田土细事上控的消极态度，进一步放任了“图告不图审”的地方诉讼习俗。从社会层面而言，粤中地区强大的宗族势力为长期缠讼提供了人力、财力支撑，“沙棍”“讼师”等群体的推波助澜则加剧了诉讼乱象，而土地资源所蕴含的巨额经济利益，成为各方势力铤而走险、争夺不休的驱动力。此外，清代司法在处理细故类案件时多以以息讼止争为核心目的，旨在维护地方稳定，但在实践中由于原被告两造势力强弱有别，往往向强势一方倾斜，客观上纵容了强势宗族势力借诉讼谋利的行为，进一步助长了“图告不图审”之风。

参考文献：

[1] 聂亦峰.聂亦峰先生为宰公牍[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80-109, 182-183.

[2] （清）徐本修、（清）刘统勋纂：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清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本，第 1464 页。

[3] 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14-216.

[4] 魏淑民：张力与合力:晚清两司处理州县小民越讼的复杂态度——以樊增祥及其《樊山政书》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13(8): 81-86.

[5] 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卷十六・吏政一，清光绪二十四年上海书局石印本，[M].第 156 页 b。

[6] 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4-8.

[7] （清）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奏疏，清道光二十年两淮淮北士民刻本，871。

[8]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229.

地域文化符号在当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转译机制研究

——以东北地域文化视觉表达为例

李润宇[1]，张景潇[1]

(1.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地域文化传播需求的不断增长，地域文化逐渐成为当代视觉传达设计的重要创作资源。然而，在实际设计实践中，地域文化的视觉表达仍存在符号运用表层化、文化内涵转译不足以及视觉形式同质化等问题，部分设计作品停留于传统图案、地方建筑和民俗元素的直接拼贴，未能有效建立地域文化内涵与当代视觉语言之间的深层联系。如何在保留地域文化辨识度的基础上，实现文化意义、视觉形式与现代传播需求之间的协调，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本文以东北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围绕地域文化符号在当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转译过程展开研究。在梳理符号学、视觉传达设计及文化转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典型设计案例的图像分析与内容分析，探讨地域文化符号从文化信息提取、视觉语言重构到传播情境适配的转化过程，并尝试构建地域文化视觉转译的分析框架。研究拟从符号识别度、文化语义传达、视觉协调性及受众理解等维度，对不同类型的地域文化视觉表达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文化语义为核心、以视觉形式重构为手段、以受众认知为参照的设计策略，为地域文化在品牌形象、文创产品及数字传播等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将地域文化视觉设计从单纯的元素提取与形式创新，进一步引向文化语义、视觉结构和传播效果之间的综合研究，以期为地域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提供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地域文化；视觉传达设计；文化符号；视觉转译；符号学；文化传播

DOI：doi.org/10.70693/202610171880

Translation Mechanisms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 Case Study of Visual Expressions of Northeastern China

Li Runyu, Zhang Jingxiao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g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contemporary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n practice, however,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regional culture may rely on superficial symbols, insufficien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r homogeneous visual forms. Taking Northeastern Chinese regional culture as its focu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Based on semiotics,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it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vering the extraction of

作者简介：李润宇(2000—)，男，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张景潇(2002—)，男，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通讯作者：李润宇

cultural information, reconstruction of visual language, and adaptation to communication contexts. It suggests evaluating regional visual expressions in terms of symbol recognition, cultural meaning, visual coordination, and audience understanding, and offers design strategies centered on cultural semantics, visual reconstruction, and audience cognition. The cases, survey sample, and data-analysis scenarios discussed in the manuscript remain a proposed research plan and require validation through actual research.

Keywords: Regional Cultur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Cultural Symbols; Visual Translation; Semiotic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引言

在全球化传播与数字媒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信息传递与形式美化，而是逐渐扩展至文化认同建构、地域形象塑造及社会价值表达等层面。地域文化作为特定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社会生活与集体记忆共同形成的文化体系，包含建筑形态、民俗活动、生活器物、地方语言、自然景观以及饮食习惯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具有历史与社会意义，也为当代视觉设计提供了具有差异化特征的创作素材。

东北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自然环境特征与历史文化积淀。寒地气候、工业发展历史、多民族文化交流、地方民俗及日常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东北地域文化的多重面貌。然而，在部分面向大众传播的视觉设计中，东北文化的呈现往往集中于冰雪、红色元素、传统纹样或具有地域指向性的生活符号。这类视觉表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受众对地域的初步认知，却也可能因符号使用方式相对固定而形成刻板印象，使东北地域文化的复杂性与当代性难以得到充分呈现。

从视觉传达设计的角度看，地域文化元素并不能在脱离其文化语境的情况下直接转化为有效的设计语言。同一种图形在不同的色彩、构图、媒介和叙事环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同一种地域符号也可能因受众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解释。因此，地域文化视觉设计的关键并非简单增加地方元素，而是研究文化信息如何经过筛选、提炼与重组，形成既具有地域辨识度，又能够适应当代视觉传播规律的设计表达。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地域文化符号的视觉转译机制上，试图回答地域文化符号如何从原始文化语境进入视觉设计系统、设计形式如何影响文化意义的传递，以及受众如何理解经过设计转化的地域文化信息等问题。研究希望通过理论梳理、案例比较和实证研究的结合，建立较为清晰的分析路径，为地域文化视觉传达设计提供理论参考，并为后续设计实践中的符号选择、视觉语言建构及传播效果评价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地域文化与视觉传达设计的关系涉及设计学、文化研究、符号学和传播学等多个领域。现有相关研究大致可以从文化符号的意义生成、地域文化的视觉表达以及设计传播效果三个方面展开梳理。对这些研究的归纳不仅有助于明确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也能够帮助识别现有研究中仍有进一步讨论空间的问题。

符号学为理解地域文化的视觉表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论述、皮尔斯对符号与对象及解释项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莫里斯符号学对语形、语义与语用三个维度的划分，均提示视觉符号的意义并非完全来自其外在形态，而是在一定的文化约定、认知经验与解释过程中形成的。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时，图形、色彩、文字及图像并不是孤立的装饰性元素，而是承载信息并参与意义建构的符号系统。例如，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轮廓既可以指向具体的空间对象，也可能关联历史记忆、城市身份与集体情感。因此，对地域文化符号的研究需要同时关注其形式特征与文化指涉，避免将视觉识别效果直接等同于文化理解程度。[1]

文化转译相关研究则为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路径。文化资源进入当代设计，并不意味着对既有形式进行原样复制，而是涉及文化信息的选择、解释、重构与再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设计者既需要理解文化符号原有的社会背景，也需要考虑其进入新的媒介与使用情境后可能产生的意义变化。对于地域文化设计而言，转译并非单向度的视觉加工，而是文化内容与现代审美、技术条件及受众认知之间的持续协商。由此，设计创新与文化延续并非必然对立，关键在于视觉形式的变化是否保留了文化表达中具有识别价值的核心信息。[2][3]

在地域文化视觉表达领域，相关实践与研究涉及城市形象设计、旅游品牌设计、非遗视觉转

化、地方文创产品开发及文化空间导视等方向。这些研究为地域文化资源的设计应用积累了丰富经验，也表明地域特色可以通过品牌标志、字体系统、图形语言、色彩体系与叙事内容等多种形式呈现。然而，从研究路径来看，部分设计研究更侧重作品呈现、设计理念阐释与形式创新，对符号选择的依据、文化意义的转译过程以及受众如何解读设计成果等问题讨论相对有限。即使部分研究引入问卷调查或用户评价，也需要进一步关注研究工具的有效性、评价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结论能否得到材料支持。[4][5][6]

综合来看，现有理论能够为地域文化视觉转译提供较为充分的概念资源，但文化语义分析、视觉形式分析与受众认知评价之间仍有进一步整合的空间。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地域文化符号的来源、视觉重构方式与受众理解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避免仅以形式美感或地域元素数量判断设计效果。不过，这一研究空缺仍需通过正式的文献检索与系统梳理加以验证，不能仅凭少量案例或个人观察便认定为普遍存在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本文拟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同方法分别承担理论建构、设计过程解释与受众反馈检验的任务，使研究既能够讨论地域文化视觉转译的内在机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相关设计策略的实际表现。

文献研究主要围绕符号学理论、地域文化研究、文化转译理论以及视觉传达设计方法展开。正式研究可通过中国知网、万方、Web of Science 及相关学术出版平台检索中英文文献，并根据研究主题设置“地域文化视觉设计”“文化符号转译”“地域品牌形象”“视觉认知”等关键词。文献筛选应关注研究对象、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结论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记录不同研究对于文化符号、视觉转译及设计评价的定义。通过对相关研究进行分类比较，本文拟明确核心概念的使用范围，并据此建立后续案例分析与问卷设计所需的评价维度。

案例分析主要选择具有明确地域文化指向、公开展示完整视觉成果且能够获取必要背景资料的设计项目。案例可涵盖地域文化品牌形象、博物馆或文化机构视觉系统、旅游目的地传播设计及地方文创产品等类型。为降低案例选择的主观性，研究拟预先制定筛选标准，包括文化主题的明确程度、视觉成果的完整性、设计资料的可获取性以及案例类型的多样性。正式研究可选取约八至十二个案例作为分析对象，并依据统一的编码表记录文化符号来源、图形提炼方式、色彩与字体策略、视觉应用场景以及文化叙事方式。案例数量最终应根据资料质量与分析饱和程度调整，而不宜仅为满足预设数量而纳入证据不足的项目。

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拟设计问卷，以了解受众对不同地域文化视觉表达的识别、理解与审美评价。问卷可设置基本背景信息、地域符号识别、文化内涵理解、视觉协调性评价及整体传播印象等内容，并采用经过预试修订的量表题目。若以比较不同视觉设计方案为目标，可将具有不同转译方式的设计样本呈现给受访者，控制图像尺寸、展示时长及说明文字等因素，尽可能降低非研究变量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作为假定性研究方案，本文可将目标样本量暂定为一百五十至二百人，并通过线上问卷与设计专业相关群体的定向招募获取数据。正式研究需要说明受访者的纳入条件、招募渠道、有效问卷筛选标准及知情同意程序。如果样本主要来自高校学生或设计相关群体，则研究结论应限定在相应样本范围内，不宜直接推及所有年龄与文化背景的受众。问卷发放前还应开展小规模预测试，检查题目表述是否清晰、量表是否能够区分不同评价维度，并根据反馈进行必要调整。

四、数据分析

本文的数据分析拟围绕文化符号的转译方式与受众认知之间的关系展开。案例分析部分将依据预先设定的编码维度，对各案例的视觉元素与文化信息进行归类比较。文化符号来源可划分为自然环境、历史建筑、民俗活动、生活器物及地方产业等类别；视觉转译方式则可从形态简化、结构重组、色彩提炼、字体转化及叙事重构等方面进行描述。通过建立案例编码表，可以比较不同项目如何选择地域文化资源，以及不同视觉处理方式如何与品牌定位和传播媒介相适应。

在案例比较过程中，研究需要避免将某种设计形式简单归类为优劣。抽象化图形可能提高视觉系统的统一性，却也可能削弱受众对具体文化对象的辨认；较为写实的图像可能更容易传达物象信息，却未必能够形成具有延展性的品牌语言。因此，分析应同时考察文化符号的可识别性、形式转化程度、文化语义的保留情况及其在不同媒介中的应用表现，并结合案例背景解释各类设计选择的适用条件。

问卷数据分析可通过描述性统计了解受访者的基本构成，以及不同设计方案在识别度、文化理解和视觉评价等指标上的总体表现。若问卷采用多题项测量同一潜在维度的方式，可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前提下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与结构效度。对于不同设计方案的比较，可根据研究设计、变量分布和样本结构选择配对样本检验、独立样本检验或相应的非参数方法；若研究关注视觉转译方式与文化理解之间的关系，也可进一步开展相关分析或回归分析。统计方法的选取应由研究问题、变量类型和数据特征决定，而不是为了增加论文的技术复杂度而机械使用。

为了说明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本文可以设置一个假定性分析情境：若受访者对具有清晰文化来源、同时经过适度视觉重构的设计方案表现出较高的地域识别评价，而对过度抽象、缺少必要文化线索的方案表现出较低的文化理解评价，则可进一步讨论文化符号的可辨认程度与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但这一情境仅用于示范如何从数据过渡到解释，并不代表实际研究已经获得上述结果。正式论文必须以真实数据为依据，提供必要的样本信息、统计结果与不确定性说明，不能预先将期望出现的结果写成已经得到验证的结论。

通过案例材料与问卷数据的交叉分析，研究可进一步识别不同转译策略在特定条件下的优势与局限。例如，当案例分析表明某一设计方案通过字体结构、色彩系统与图形组合建立了稳定的视觉识别体系时，问卷数据可以用于观察受众是否能够将这些视觉特征与相应的地域文化联系起来。若两类材料之间出现不一致，也应将其视为值得解释的研究现象，而非直接舍弃与原有判断不符的数据。

五、讨论

地域文化符号的视觉转译涉及文化意义与视觉形式之间的动态关系。设计者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对原始文化资源进行筛选与解释，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包含对文化信息的重新组织。因此，地域文化设计的有效性不应仅通过传统元素是否出现来判断，而应考察这些元素是否与设计主题形成具有逻辑关联的表达系统。当地方建筑、民俗图案或自然景观仅作为装饰性元素出现时，其文化指向可能停留在表层识别；当这些元素的形态特征、历史背景与文化寓意能够共同参与视觉叙事时，设计则更有可能形成具有持续辨识度的文化表达。

视觉转译中的抽象化与具象化并非相互排斥的两种路径，而是需要根据传播任务进行协调的设计手段。具象表达能够提供较为直接的识别线索，适用于需要快速建立文化对象认知的传播情境；抽象表达则有助于提升图形系统的简洁性与延展性，适用于品牌形象的多场景应用。然而，当抽象化过程过度压缩文化信息时，受众可能难以理解设计与地域之间的关联。相反，如果设计过分依赖具象的传统图案，也可能削弱视觉语言的现代性与差异化。因此，设计策略的选择需要兼顾文化信息的保留程度、视觉系统的协调性与具体媒介的使用需求。

受众认知是理解地域文化视觉设计的重要环节。设计者对某一符号的文化解释，并不必然等同于受众实际接收到的意义。不同年龄、教育背景及地域经验可能影响受众对视觉线索的解读方式。某些地方性符号对于长期生活在当地的人而言具有丰富的生活记忆，对于缺乏相关经验的受众而言却可能仅表现为一般性的装饰图形。这说明文化表达不能完全依赖设计者的主观阐释，而需要通过用户研究了解不同受众的理解路径，并在必要时借助文字说明、情境叙事或多媒介信息补充文化背景。

从设计实践的角度看，地域文化视觉转译还涉及文化真实性与商业传播之间的协调。文创产品、旅游品牌及商业视觉项目通常需要具备较强的市场识别度和传播效率，但过度追求流行风格也可能导致地域文化被简化为容易消费的视觉标签。设计者需要在文化研究与视觉创新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使设计成果既能够适应现代传播环境，又不至于脱离原有文化语境。对于东北地域文化而言，这一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其文化形象既包含冰雪、工业和民俗等较易识别的元素，也包含日常生活、社会变迁与地方情感等不易被单一图形概括的内容。更充分的视觉表达需要突破固定的地域标签，从多层次的文化经验中寻找具有当代意义的设计主题。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框架仍存在一定限制。案例分析的解释可能受到研究者自身文化经验与审美判断的影响，问卷调查也可能因样本来源、刺激材料和题目设计而产生偏差。如果研究仅采用静态图片作为评价材料，还难以充分反映动态视觉、交互媒介和真实使用场景中的传播效果。因此，后续研究可以通过访谈、设计实验或实际应用观察补充问卷数据，并对不同年龄群体、地域背景及媒介环境下的文化理解差异开展进一步

比较。通过多种方法之间的相互补充，可以提高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与适用范围。

六、结论

本文围绕地域文化符号在当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转译机制展开讨论，尝试将文化符号的来源、视觉形式的重构及受众认知纳入相互关联的研究框架。通过符号学与文化转译相关理论的梳理，研究指出，地域文化的视觉表达并非对传统元素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涉及文化信息选择、意义解释、形式重组与传播适配的综合过程。视觉传达设计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立具有地域辨识度的外在形式，也在于通过视觉语言组织文化信息，使其能够在新的媒介与社会情境中获得理解与传播。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提出以文献研究建立理论基础，以案例分析梳理不同类型的视觉转译策略，并通过问卷调查考察受众对文化识别、语义理解与视觉表现的评价。该研究路径有助于将设计者的形式判断与受众的实际认知联系起来，为地域文化视觉设计的分析与评价提供较为系统的方法参考。相较于单纯从作品风格或地域元素数量出发进行讨论，将文化语义、视觉结构与受众反馈结合起来，有助于更全面地解释不同设计策略的作用条件及其潜在局限。

从实践层面看，地域文化视觉传达设计应重视文化资源的前期调查与语义辨析，避免在缺乏文化理解的情况下进行符号拼贴；同时应依据品牌定位、传播媒介与目标受众选择适宜的视觉转译方式，使文化辨识度、形式创新与信息传递之间形成相对协调的关系。对于东北地域文化而言，设计实践可以在冰雪、工业与民俗等常见主题之外，进一步挖掘地方生活经验、社会记忆与当代城市文化，拓展地域文化视觉表达的主题范围。

由于本文所呈现的案例规模、问卷样本量与数据分析情境均属于研究方案层面的假定，现阶段尚不能据此得出已经经过实证验证的结论。后续研究需要完成系统的文献检索、真实案例采集、问卷预测试与正式调查，并依据实际结果修正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将研究结论应用于具体的品牌形象或文创设计项目，通过设计实践与用户评价之间的反复验证，进一步考察地域文化视觉转译机制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1]李源, 全峰梅. 基于莫里斯符号学的博物馆地域性设计——以南宁博物馆为例[J]. 工业设计, 2025(9): 77-80.

[2]张鹏, 康国珍, 倪泰乐. 天府农耕文化中二十四节气视觉符号的设计转译路径[J/OL].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 2026[2026-10-17]. https://link.cnki.net/urlid/51.1574.G4.20260519.1056.002.

[3]齐宁宁. 地域文化非遗元素融入新中式包装设计的路径探究：从符号转译到功能重构[J]. 中国包装, 2026, 46(9): 11-14.

[4]刘小璇. 徽州地域文化元素在视觉设计中的转化与应用[J]. 普洱学院学报, 2023, 39(5): 101-103.

[5]米娟. 庆阳地域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符号化表达策略[J]. 上海包装, 2025(6): 107-109.

[6]杨帆. 地域文化传承视域下非遗元素融入高校艺术设计类课程教学研究[J]. 美术教育研究, 2026: 47-49.

恢复性环境理论视角下金秀瑶族自治县乡镇公共绿色空间景观优化策略研究

钟丽漫[1] 袁荣辰[1] 巫婉婷[2] 秦世骏[1]

(1.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2.广西艺术学院 建筑艺术学院 530007)

摘 要：恢复性环境理论为理解自然环境与个体注意力恢复、压力缓解及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乡镇公共绿色空间既承担日常休憩、交往与活动功能，也可能成为居民接触自然、获得心理恢复体验的日常场所。本文以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乡镇公共绿色空间为研究语境，在梳理恢复性环境理论、健康景观设计及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空间类型归纳与设计策略推演的方法，构建由生态基底、感官体验、空间可达性、活动适配和地域认同组成的分析框架，并提出自然要素连续化、安静与活力空间分区、多感官体验营造、全龄友好设施配置、瑶族地域文化审慎转译及长效维护等优化策略。研究可为金秀乡镇公共绿色空间的健康导向设计提供前期分析思路，但其适用性仍需通过具体场地调查、使用者评价和建成后评估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恢复性环境理论；乡镇公共绿色空间；景观优化；感知恢复性；地域文化

DOI：doi.org/10.70693/202610222887

Landscap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ownship Public Green Spaces in Jinxiu Yao Autonomous Coun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Theory

Liman Zhong[1],Rongchen Yuan[1], Wanting Wu[2],Shijun Qin[1]

[1]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2]School of Architectural Art, Guangxi University of Arts, Nanning, China

Abstract: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theory provides 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ural settings, attention restoration, stress recover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Township public green spaces support everyday recrea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tact with nature, and may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perceived restoration. Focusing on township public green spaces in Jinxiu Yao Autonomous County, Guangxi, this paper reviews research on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health-oriented landscape design, and 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spatial typology, and design-strategy synthesis, it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volving ecological conditions, sensory experience, accessibility, activity compatibility, place identity, and maintenance. Strategies include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continuity, arranging quiet and active spaces, supporting multisensory contact with nature, improving

作者简介：钟丽漫 (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袁荣辰 (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巫婉婷 (200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建筑与环境设计；
秦世骏 (200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age-friendly facilities, interpreting local culture through verified source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stablishing feasible maintenance mechanisms. No original site measurements, questionnaire records, or interview data were provided for this draft; therefore, it does not report unverified local findings or statistical results. The framework should be tested and refined through field surveys, user evaluation, and post-occupancy assessment before empirical conclusions are drawn.

Keywords: Restorative Environment Theory; Township Public Green Spaces; Landscape Optimization; 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Regional Culture

一、引言

随着健康导向的公共空间建设受到关注，绿色空间的评价重点逐渐由绿地面积、植物数量和景观形态，拓展至空间是否支持休息、活动、交往以及积极的环境感知。恢复性环境理论强调，环境能够通过提供心理上的“远离”、吸引非强制性注意、形成有序且可理解的整体，并与使用者目标相适配，帮助个体从注意力疲劳或压力状态中恢复[1]。相关研究已将恢复性环境理论应用于城市公园、口袋公园及健康景观设计，并关注景观要素与使用者体验之间的联系[3]。

与大城市公园相比，乡镇公共绿色空间的规模、管理方式、使用节律和地方文化背景可能具有不同特点。其空间类型可能包括乡镇公园、广场绿地、滨水休憩空间、街旁绿地以及与公共服务设施相邻的开放空间。对这些场地而言，生态环境与日常生活并非彼此分离：植物、水体、地形和地方景观构成自然体验基础，步行联系、座椅、遮阴和活动场地则决定居民能否持续、舒适地使用空间。若设计仅追求景观观赏性，而未考虑安静休憩、老幼活动、社交交往和维护条件，空间的潜在恢复性可能难以转化为实际体验。

二、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一）恢复性环境理论的核心内涵

恢复性环境研究主要涉及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ART）和压力恢复相关理论（Stress Recovery Theory，SRT）。注意力恢复理论关注持续的定向注意所带来的精神疲劳，认为自然环境中的柔性吸引能够减少个体维持注意力的消耗[8]。压力恢复理论则强调自然环境可能通过情绪和生理反应影响压力体验。两类理论的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均提示环境质量不能只以视觉美观衡量，还应关注使用者在场地中的感受与行为。

在注意力恢复理论的常见阐释中，恢复性环境通常涉及四类特征：远离感，即暂时脱离日常事务与心理负荷；魅力性，即环境能以较少认知努力吸引注意；延展性，即空间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可探索性；相容性，即环境条件与使用者的活动目标、能力和偏好相匹配。这些维度可以作为景观设计分析的理论工具，但不应被直接等同于临床心理治疗结果。本文使用“恢复性感知”描述使用者对环境恢复性特征的主观评价，使用“潜在恢复性”描述设计层面可能支持恢复体验的环境条件。

（二）从理论维度到景观设计要素

恢复性环境理论需要经过设计转译才能用于场地优化。远离感可对应适度的空间缓冲、树荫下的停留点及对交通或活动噪声的合理处理；魅力性可通过植物季相、树冠层次、水体、地形和可观察的自然变化实现；延展性可由连续步行路径、视线组织和清晰的空间层级支持；相容性则要求设施尺度、通行条件、活动类型和维护水平与使用者需求相协调[5]。这些对应关系是设计分析的逻辑映射，不意味着某一单独景观要素必然产生同等程度的心理恢复效果。

现有研究提示，恢复性体验可能受到环境要素与使用情境的共同影响。针对福州城市公园的研究讨论了游客情绪与环境恢复性的关系[8]。关于城市绿色空间感官维度的研究，则分析了景观特征与感知恢复性之间的联系[9]。另有研究探讨自然景观特征与情绪、恢复体验之间的关系[10]。针对中国南方夏季城市绿地的研究关注了恢复性感知的环境情境因素[11]。公园恢复性感知与社会文化价值之间的联系也已成为研究议题[12]。因此，在乡镇场景中不宜机械复制城市公园的设施配置，而应根据空间尺度、周边活动、地方自然条件及居民使用方式形成具体策略。

（三）相关研究评述与本文切入点

相关中文研究包括恢复性环境理论与园林康

养机制综述[1]、城市绿色空间与心理健康研究进展[2]、上海中心城区口袋公园恢复性效益研究[3]，以及健康导向的植物景观设计研究[5]。关于复愈性环境与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研究，为理解环境与心理体验的关联提供了另一类研究视角[6]。健康导向的校园景观研究则从空间设计策略层面提供了案例参照[7]。此外，疗愈景观设计方法研究也为环境设计转译提供了参考[4]。这些成果为理论选择、指标构建和设计策略提供了基础。英文研究通过场地调查、问卷或多变量分析，讨论环境感知、景观特征、情绪及社会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9]。

但现有成果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城市公园、口袋公园、校园、旅游景区或特定人群。乡镇公共绿色空间的日常使用、地域生态背景与地方文化认同需要在具体场地中重新识别。本文不宣称金秀研究对象已被系统调查，也不将文献中其他地区的结果直接外推至金秀，而是尝试形成一套适用于后续现场验证的分析框架：将生态环境条件、感官体验、活动适配和地域认同放在同一设计逻辑中讨论，并明确哪些判断需要现场证据支持。

三、研究地域、对象界定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地域与对象界定

本文研究地域为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的乡镇地区。为避免研究范围过大，建议正式实证阶段选择一个乡镇作为核心调查单元，再根据场地类型与使用特征选择 2—3 处公共绿色空间进行比较。候选场地可包括乡镇公园或广场绿地、滨水公共空间、街旁绿地及公共服务设施周边的开放空间；具体是否纳入，应以现场可达性、公共开放程度、使用频率和场地边界清晰度为准。若实际场地并不符合公园或绿地的基本属性，不宜仅为匹配题目而将其命名为“公园”。

本文所称“乡镇公共绿色空间”，是指乡镇居民能够日常进入、以植物或其他自然要素为重要组成，并承载休憩、步行、交往或户外活动的公共开放空间。研究重点不是评价整个县域的生态环境，也不是对所有瑶族文化景观进行普遍概括，而是讨论具体公共空间如何通过环境设计提升日常使用体验。涉及瑶族文化的内容，应通过地方文献、实物调查及居民访谈核实其来源和使用语境，避免把民族文化简化为装饰图案。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边界

本文拟采用文献分析、场地类型分析、现场调查、问卷访谈和设计推演等方法。文献分析用于提取恢复性环境的理论维度；场地类型分析用于比较空间结构、自然要素、设施条件和主要活动；现场调查应包括场地测绘、照片记录、植物与设施登记、活动观察及噪声、遮阴情况记录；问卷与访谈用于了解居民的恢复性感知、使用频率、停留目的和环境满意度，问卷设计可参考既有绿色空间与心理健康研究及恢复性质量测量工具[2]；设计推演则将理论维度与现场确认的问题对应，形成具体优化策略。

（三）恢复性景观分析指标框架

结合恢复性环境理论及恢复性质量测量研究，后续场地调查可重点考察六个方面：一是远离感与安静性，包括噪声干扰和停留环境；二是魅力性与自然接触，包括植物层次、季相和遮阴；三是延展性与空间连贯，包括路径、入口及节点之间的联系；四是相容性与活动支持，包括座椅、照明和无障碍通行；五是地域认同，包括地方文化表达的真实性及居民认可度；六是管理维护，包括植物养护、排水、清洁和设施完好程度。以上内容是用于现场记录的初步框架，不是已完成信效度检验的量表，正式使用前应结合场地类型和已有研究进行筛选与预测试。

四、面向金秀乡镇公共绿色空间的分析框架

（一）生态基底与空间连续性

恢复性体验不仅来自单个植物景观，也与自然要素能否连续、可感知且便于接近有关。调查时可记录乔木遮阴、植物层次、季相变化、雨水流向、裸露地面、硬质铺装和绿地间的步行联系，以判断自然要素是否服务于停留与日常使用。相关城市绿地研究为分析景观特征与恢复性感知的关系提供了参考[9]。

植物配置应兼顾地方适生性、养护成本、视线安全和活动需求。若调查发现遮阴不足，可评估补植乔木或调整休憩点；若绿化过密造成视线遮挡，则应在保障生态功能的前提下优化林下空间。具体措施须依据现场条件和管理能力确定。

（二）感官体验与环境干扰

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共同构成使用者对绿色空间的体验。已有研究关注自然景观特征与情绪、恢复性感知之间的联系，并提示多种环境因素可能共同作用，而非某一要素单独决定结果。

在金秀乡镇场地的后续调查中，可记录道路交通声、商业活动声、自然声、照明、气味、热暴露和座椅舒适度，并通过问卷了解使用者对安静程度、自然感和空间安全感的主观评价。

多感官设计不等于添加大量感官刺激。对希望安静休息的使用者，连续的扩音、强烈照明或气味浓重的植物可能构成干扰；对儿童和社交活动人群，适度的声音与可观察的活动则可能提升空间活力。因此，设计需要在安静性与活跃性之间建立空间层次，例如将静态休憩点布置在相对安静、遮阴且视线舒适的位置，将较活跃的交往或健身活动安排在便于到达且不直接干扰安静区的区域。具体分区方式应根据场地尺度和活动观察结果确定。

（三）行为需求与设施适配

恢复性潜力需要通过可达、可停留且适配需求的空间条件转化为实际体验。设施调查除记录座椅数量外，还应关注座椅朝向、遮阴、与步道的距离、老年人起坐便利性，以及活动空间是否影响通行。健康导向的校园景观研究可为设施与使用需求的分析提供设计案例参照[7]。步行型空间应保证路径连续，交往型空间应支持面对面交流，自然观察空间则需提供舒适视线与停留条件。

行为观察应记录活动类型和空间分布，不应仅凭外观推断个体健康或心理状态。若某区域使用率较低，还需综合检查可达性、设施舒适度、维护状况、调查时段和管理限制，避免将原因简单归结为景观设计。

（四）地域文化与场所认同

金秀的地域文化是乡镇公共空间设计中需要认真对待的内容，但文化表达应建立在资料核实和社区参与基础上。景观设计可以从地方植物、传统生产生活记忆、地方材料、空间使用习惯及居民认可的文化符号入手，而不是将文化简化为图案铺装或仿古构件。涉及瑶族服饰、纹样、仪式、建筑形制或特定象征意义时，应通过可信文献、地方文化工作者及居民访谈确认其来源、适用场景和表达边界。

恢复性环境与地方认同的结合，不仅是视觉符号的展示，也可以体现为居民熟悉的日常活动、邻里交流、地方植物认知和公共空间共同维护。设计者应避免将地方文化当作外部观赏对象，而应把居民视为文化表达和空间使用的共同参与者。若居民对某一文化表达方式存在分歧，应通过协商调整设计，而不是预设单一、统一的地方审美。

五、乡镇公共绿色空间景观优化策略

（一）以地方生态条件为基础，构建可持续的绿色空间网络

第一，优先识别场地内已有的成熟乔木、自然地形、原生或适生植物及雨水流向，将其作为空间组织的基础，减少无必要的硬质化和大规模地形改造。有关城市绿地植物景观设计的研究可作为植物选择与空间组织的参考[5]。第二，结合步行联系梳理绿地之间的可达路径，使乡镇公园、广场绿地、滨水空间和街旁绿地在日常步行尺度上形成互补，而不是把每一处场地视为孤立的景观项目。第三，植物选择应兼顾适生性、季相、维护成本和使用安全，谨慎使用具有明显致敏风险、尖刺或果实易造成滑倒的植物，并根据当地气候和现场条件确定品种。

绿色空间网络并不意味着每处场地都需要相同的植物配置。可根据场地条件分别设置遮阴停留节点、自然观察节点、活动草地或生态缓冲带，并以连续步道和清晰入口连接。若场地面积有限，应优先保障可达、可停留和可维护的基础功能，再逐步增加多样化的生态体验。

（二）通过空间层级营造安静与活力并存的恢复性体验

空间组织可采用“到达—过渡—停留—活动”的层级逻辑，该空间组织思路仍需结合场地使用情况进行验证，城市公园恢复性效益研究可作为分析参考[3]。入口应便于识别，过渡空间用于降低道路或周边活动对内部空间的直接干扰，停留空间为休息、观察和交往提供条件，活动空间则容纳较高强度的日常活动。场地较小时，可通过座椅朝向、植物边界、铺装变化和小尺度高差形成软性分区，而不必完全依赖围墙或硬质隔断。

安静区与活力区之间应保持适度距离和视觉联系。遮阴座椅可布置在能观察自然景观、又不处于主要通行冲突点的位置；儿童活动和健身空间则需考虑安全视线、噪声影响和通行组织。空间分区不应削弱乡镇公共空间的开放性，也不宜通过过度围合造成视线盲区。

（三）以多感官自然体验提升环境魅力性

景观魅力可通过植物季相、叶片质感、树影、自然声及材料触感体现。设计可保留自然观察视点，配置季相适宜的植物，并利用林下空间或小

型观察点增加自然接触。

多感官设计应控制维护与安全成本。植物需考虑花粉、气味和养护；水景应评估补水、卫生与安全；照明需兼顾通行、眩光和邻里影响。维护能力有限时，应优先选择低维护、适应性强的措施。

（四）以全龄友好设施提升空间相容性

设施配置应以行为需求为依据，而不是简单增加设施数量。休憩设施应提供有遮阴条件的座位，并兼顾不同身高、起坐能力和陪伴需求；步道应尽量连续、平整，减少突然的高差和容易绊倒的铺装；公共照明应满足夜间识别与通行需求，同时避免过亮和直射眩光；导视标识应简洁清楚，便于初次到访者识别入口、路径和公共服务设施。若场地具有较强的老年人使用需求，可进一步核查扶手、靠背、座椅高度和休息点间距。

设施布局应与活动观察结果相对应。例如，若使用者主要进行短暂停留，设计应提高入口附近和主要步行路径边缘的休憩便利性；若存在较多邻里交往活动，则可提供相对灵活的座椅组合和遮阴空间。设施的最终数量、尺寸与位置应根据现场测量、无障碍规范、消防及安全要求进行确定，本文不在缺乏场地尺寸时给出虚构的具体工程参数。

（五）以居民参与实现地域文化的适度转译

地域文化融入宜从“符号装饰”转向“日常体验”。设计前可通过居民访谈、地方志和相关文化资料，了解居民对场地历史、地方植物、传统活动及公共空间使用方式的认知；设计过程中可设置居民讨论或方案反馈环节；设计完成后则应观察文化表达是否被实际使用和认可。只有在来源明确、语义准确并获得社区认可的前提下，才将特定文化元素转化为铺装、标识、景观设施或空间叙事。

文化表达也可以体现在场地组织方式和活动支持上，例如为地方节庆、日常交流、社区展示或手工艺活动预留弹性空间，而不必把所有文化内容都固定为永久性景观装置。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应保持开放，避免把单一文化展示作为乡镇公共空间的唯一功能。

（六）建立与基层管理能力相匹配的维护机制

恢复性景观的品质依赖持续维护。设计阶段应同步考虑植物修剪、排水清理、铺装维修、照明检查、座椅更换和垃圾收集等日常工作，并明确管理责任。优先选择可获得、易维护且适应当地条件的材料和植物，减少难以维修的定制构件。对于需要定期养护的花境、雨水设施或水景，应在方案中说明维护频率、责任主体和潜在成本，避免建成后因管理不足而降低空间品质。

可通过居民共管、志愿活动和意见反馈增强公共空间的持续使用，但不能将专业维护责任完全转移给居民。对于需要长期管理的设施，应由相关管理主体提供明确的维护安排。场地优化还应保留根据季节、活动需求和使用反馈进行小幅调整的空间，使设计能够在运行中逐步完善。

六、实施路径与评价机制

（一）分阶段实施路径

实施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完成场地测绘、照片记录、设施清单、通行条件及活动观察；其次，将问题按安全可达、生态基底、休憩体验、活动冲突和地域表达分类，优先解决基础使用障碍；再次，选择代表性节点开展低成本、可调整的试点；最后，通过相近时段复查、问卷或访谈比较优化前后的使用情况。

分阶段实施便于控制改造风险并适应基层资源条件。评价时应区分设计完成、设施建成、使用者满意和恢复性感知变化，不能仅凭建成照片认定健康效益已经实现。

（二）建议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评价可结合客观记录与主观问卷。客观指标包括遮阴与停留点分布、路径连续性、设施完好程度、活动点位、噪声和维护情况；主观指标包括远离感、魅力性、延展性、相容性、满意度及再次使用意愿。指标选择可参考恢复性质量测量工具。量表应优先采用已有验证版本，改编题项需说明依据并进行预测试。

横断面问卷可用于描述评价差异和探索变量相关性，不能直接证明景观要素造成心理健康改善。若要检验优化效果，可在条件允许时开展改造前后比较，并尽量控制季节、天气、时段和使用人群差异。缺乏实测数据时，应将指标体系表述为研究框架，而非虚构统计结果。

七、讨论与结论

（一）主要认识

第一，恢复性环境理论为乡镇公共绿色空间的健康导向设计提供了从空间形态走向使用者体验的分析视角。远离感、魅力性、延展性和相容

性可以帮助设计者把抽象的健康目标转化为可观察的空间特征，但这些维度需要与现场环境和使用者需求结合，不能被直接当作心理疗效的替代指标。

第二，乡镇公共绿色空间优化宜采用生态基底、感官体验、空间可达性、活动适配、地域认同和维护管理相结合的综合框架。该框架综合了恢复性环境理论与园林康养研究中关于环境条件和使用者体验的相关思路[1]。自然要素能够提供环境体验的基础，但只有与步行路径、休憩设施、活动组织和日常维护协同，才可能形成可持续使用的公共空间。

第三，地域文化的融入应以资料核实和居民参与为前提。对于金秀瑶族自治县的乡镇公共空间，地方文化可以成为建立场所认同的资源，但具体文化元素、表达方式和适用情境必须通过可靠资料与当地居民意见确认，避免未经核实的符号化表达。

（二）研究局限与后续工作

本文的主要局限在于缺少金秀具体场地的实地测绘、行为观察、问卷和访谈原始资料，因此本文提出的是基于文献与设计逻辑的分析框架及优化策略，不能被理解为已经通过现场数据验证的实证结论。后续研究应先明确具体乡镇和场地，再完成多时段现场调查，结合居民感知评价检验各维度的适用性；同时还应根据当地生态条件、文化资料和管理机制调整设计策略。只有在报告真实样本来源、调查程序、数据处理方法和结果局限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形成符合期刊研究规范的实证论文。

综上，恢复性环境理论可为金秀瑶族自治县乡镇公共绿色空间的景观优化提供有价值的设计视角。本文提出的生态连续性、多感官体验、空间层级、全龄友好、地域文化参与和维护管理等策略，旨在为后续场地研究建立清晰的分析路径。其实际成效仍需通过现场调查与使用后评价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 吴嘉雯. 恢复性环境理论视角下园林康养作用机制及应用研究进展[J]. 广东园林, 2025, 47(6): 64-71. DOI:10.12233/j.gdyl.2025.06.008.

刘丽洁, 刘献琦, 王飞达, 等. 山东日照：潮声新韵 向海而歌[N]. 新华网, 2025-09-29.

[2] 翟宇佳, 范彬彬, 霍钧资, 等. 近 10 年城市绿色空间与心理健康国际研究进展——理论框架、对象、测量工具与指标[J]. 中国城市林业, 2022, 20(6): 168-176. DOI:10.12169/zgcsly.2022.07.22.0001.

[3] 邵钰涵, 卢娴, 殷雨婷. 上海中心城区口袋公园恢复性效益研究[J]. 中国城市林业, 2024, 22(1): 25-33, 86.

[4] 肖玥凌, 杨晓翔. 注意力恢复理论导向的网络工作者疗愈景观设计方法[J]. 时尚设计与工程, 2025(6): 19-21.

[5] 曾怡文, 张泳江, 韩蕊莲. 健康导向下的城市绿地植物景观设计研究[J]. 设计进展, 2023, 8(3): 1584-1591. DOI:10.12677/Design.2023.83191.

[6] 肖涵, 李熙然, 张亚宁, 等. 复愈性环境缓解大学生学习倦怠[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1, 29(11): 1727-1732. DOI:10.13342/j.cnki.cjhp.2021.11.026.

[7] 朱理立. 健康导向下的中小学校园景观设计优化策略研究——以上海平和双语学校景观改造为例[J]. 园林, 2021, 38(12).

[8] WU Y, LIU J, QUEVEDO J M D, et al. Crit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visitor emotions: analysis of “restorativeness” in urban park visits in Fuzhou, China[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3, 11: 1286518. DOI:10.3389/fpubh.2023.1286518.

[9] WANG S, LI A. Identify the significant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of 8 perceived sensory dimensions in urban green space[J]. Heliyon, 2024, 10(7): e27925. DOI:10.1016/j.heliyon.2024.e27925.

[10] LI Y, LI W, LIU Y. Remedies from nature: 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mechanisms of natural landscape features on emotions and perceived restoration in urban park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4, 15: 1502240. DOI:10.3389/fpsyg.2024.1502240.

[11] CHEN L, MA Y. 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of urban green spaces in southern China during summer[J]. Scientific Reports, 2025, 15: 38580. DOI:10.1038/s41598-025-22382-8.

[12] GUO J, KWON 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of urban parks and sociocultural value: a case study of Labor Park in Dalian, China[J]. Land, 2025, 14(5): 1097. DOI:10.3390/land14051097.

党校视域下伟大长征精神资政功能的实现逻辑与推进路径

周伟[1, 2]

(1.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中共新乡市委党校，河南 新乡 453000)

摘 要：党校（行政学院）被制度性地定位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智库，其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工作因而不能仅停留在教学与理论阐释层面，还须向决策咨询成果延伸。本文以党校为分析主体，首先说明党校承担伟大长征精神资政任务的制度依据与结构性优势，继而指出当前党校系统在该领域已形成平台和项目积累，但存在学理向政策分析转化不深、学员治理经验未被有效激活、项目成果难以沉淀为稳定能力三重短板，最后提出以“问题反向对接”“学员联合生产”“案例与方法沉淀”为支点的改进路径。

关键词：伟大长征精神；党校智库；决策咨询；资政转化

DOI：doi.org/10.70693/202610236524

The Realization Logic and Advancement Paths of the Governance-Advisory Function of the Great Long March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Schools

Zhou Wei [1,2]

[1] 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2]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Xinxiang Municipal Committee, Xinxiang, China

Abstract:Party schools (schools of administration) are institutionally positioned as important think tank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refore, their work of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Great Long March Spirit cannot remain merely at the level of teaching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but must also extend to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outputs. Taking Party schools as the analytical subject,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and structural advantages for Party schools to undertake the governance-advisory task related to the Great Long March Spirit. It then points out that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has already accumulated platforms and projects in this field, but still faces three shortcomings: insufficient conversion of theoretical scholarship into policy analysis, ineffective activation of trainees' governance experience, and difficulty in consolidating project outputs into stable capacity. Finally, it proposes improvement paths anchored in "problem-based reverse alignment," "joint production with trainees," and "accumulation of cases and methods."

Keywords:Great Long March Spirit; Party School Think Tank;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Transformation into Governance-Advisory Outcome

作者简介：周伟(198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周伟

一、党校作为长征精神资政主体的制度依据与结构优势

（一）党校智库身份的制度确认

党校的智库属性并非新近附加，而是有其明确的制度来源。2015 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希望党校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智库”，将决策咨询从党校的一般科研职能中单独标定出来。2025 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进一步将这一身份固化：党校（行政学院）被界定为“党和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重要智库”，决策咨询工作被要求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与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并明确“鼓励教职工、学员参与决策咨询工作”，同时要求“推动教学、科研与决策咨询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这意味着，党校的资政功能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自选动作”，而是与教学、科研并列的制度化职责。党校系统从事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研究，正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展开的。

（二）党校在伟大长征精神资政领域的特殊条件

与其他智库主体相比，党校系统在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研究上具备几项难以替代的条件，这些条件源于党校的制度属性本身。

其一，党校处于伟大长征精神教学资源与治理实践需求的交汇点。伟大长征精神本身并不直接产出政策方案，他的资政价值在于为理解治理中的深层问题——例如理想信念如何维系、独立判断如何形成、群众路线如何操作化、困难条件下组织纪律如何保持——提供历史参照。党校的培训体系恰好是把这些历史参照与各级领导干部的治理实践反复对照的制度化场所。学员在党校同时携带着伟大长征精神的知识框架和来自一线的治理问题，这种“双重在场”是外部研究机构难以复制的。

其二，党校拥有“教研人员+学员”的复合研究资源。党校既有专职从事党史党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教研队伍，又有大量具有实际决策经验的学员。2025 年《条例》关于“鼓励教职工、学员参与决策咨询工作”的规定，为这一资源的制度化使用提供了依据。江西省委党校的实践表明，“让经常作决策的人为决策研究提供‘金点子’、开出‘好方子’”，可以弥补专职研究者与决策现场之间的距离。在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研究中，这意味着关于某一历史经验“是否可用、如何可用”的判断，可以由具有一线治理经验的学员进行检验和修正，而不必完全依赖研究者的单向推演。

其三，长征沿线党校系统已具备初步的资政平台和项目经验。四川长征干部学院依托省委党校办学，2022 年 10 月以来围绕伟大长征精神传承发展立项省部级以上长征主题课题 7 项，形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案例 7 个，立项决策咨询项目 118 项，并探索“智库共建、培训共享、项目共研、品牌共育”以及总部与分院联动的机制。阿坝州委党校将“长征精神研究”列为科研决咨重点方向之一，要求为州委州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撑。这些实践说明，党校系统在伟大长征精神资政领域并非从零开始，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做”，而在于如何从分散的项目化运作转向稳定的制度化产出。

二、党校系统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研究的进展与结构性短板

（一）已有进展：平台、项目与批示的初步积累

从可观察的实践看，党校系统在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研究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可辨识的成果形态。四川长征干部学院系统 2022 年 10 月以来立项决策咨询项目 118 项，覆盖文化、文创、文旅融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方向，产出了《创新整合川渝两地红色资源打造长征文化品牌的建议》等具体咨政成果。在成果转化端，江西省委党校《领导论坛》2023 年以来刊发的文章中，61 篇获省级以上领导批示 199 次，批示率居全省内参前列，部分建议直接转化为政策举措。这些数据表明，党校的资政渠道是通畅的，伟大长征精神相关议题进入决策视野的通道是存在的。但“有通道”不等于“有稳定的高质量供给”。当前的核心矛盾，不是平台缺失或渠道不畅，而是资政产品的学理含量与决策针对性之间的断裂尚未在制度层面得到解决。

（二）三个“转化不足”

第一，从“精神阐释”到“治理命题”的学理转化不足。党校系统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少，但相当部分集中在内涵阐释、历史考证和时代价值论述层面，其知识形态是“教育性”的而非“分析性”的。资政研究需要的不是再次确认伟大长征精神“是什么、为什么重要”，而是回答“这一精神中哪些机制性要素可以被提取出来，用于分析和改善当下的治理实践”。例如，长征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精神，在

资政语境中应当转化为对特定决策场景中信息失真、路径依赖、外部经验误植等问题的诊断框架，而不是停留于“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重申。这一转化环节的薄弱，使大量伟大长征精神研究成果难以直接进入决策产品的产生流程。

第二，学员资源的资政功能激活不足。尽管2025年《条例》已作出原则性规定，但学员参与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研究的机制在多数党校仍处于探索阶段。学员在党校学习时间有限，精力主要投向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资政研究往往被视为“附加项”而非“必修项”。同时，学员带来的治理问题与教研人员的伟大长征精神知识储备之间，缺乏常态化的“对接—孵化—反馈”流程。结果是，学员的实践经验没有被系统地转化为资政选题的来源和成果质量的检验标准，教研人员的伟大长征精神研究也缺乏来自决策一线的“问题牵引”。

第三，从“项目化产出”到“制度化能力”的沉淀不足。四川长征干部学院118项决策咨询项目的规模表明，有组织地推进长征精神资政研究是可行的。但项目制的逻辑是“完成即结束”。如果缺乏将项目成果提炼为可复用的分析框架、可迁移的研究方法、可持续的团队能力的机制，资政研究就容易停留在“年年立新项、年年从头来”的状态。党校系统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项目数量，而是将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研究中反复出现的分析路径（如“历史经验—治理场景—政策选项”的对应关系）固化为党校资政研究的方法论资产。

三、以“教研咨一体化”重构党校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的实践路径

（一）以“问题反向对接”打通学理向资政的转化通道

党校的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研究，应当在选题阶段就嵌入“问题反向对接”的要求。具体而言，不是先研究伟大长征精神的某个方面、再寻找其政策含义，而是从党委和政府当前面临的治理难题出发，反向识别这一精神中可供调用的分析资源。例如，当决策者面对“如何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维持组织纪律与执行效率”的问题时，长征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历史经验就可以被转化为关于组织激励、信息传递、纪律执行成本的分析素材，而不是作为“精神号召”被泛泛引用。这一“问题—资源”反向对接的选题逻辑，应当成为党校伟大长征精神决策咨询项目立项的基本准则。在成果形态上，资政报告需要明确区分“历史经验描述”“机制性提炼”和“政策建议”三个层次，避免用精神阐释替代政策分析。

（二）把学员从“被培训者”转变为“资政研究的合作生产者”

学员资源的激活，需要超越“鼓励参与”的原则性表述，建立可操作的工作流程。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在主体班次中设置“伟大长征精神与治理实践”专题研讨模块，要求学员从各自工作实际出发，提交一个与伟大长征精神相关的治理难题或政策困惑；教研人员从这些“问题清单”中筛选出具有资政潜力的选题，与学员组成联合课题组，学员负责提供场景知识、检验建议的可行性，教研人员负责历史经验的学理化提炼和报告撰写。江西省委党校“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建议进课堂、成果促发展”的机制，以及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总部+分院”联动的智库共建模式，都为这一工作流提供了组织原型。关键是将这种合作从“偶发的项目合作”转变为“班次运行的常规环节”，使学员的治理经验成为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研究质量控制的结构性要素。

（三）建设“伟大长征精神资政案例库与方法库”，沉淀可复用的研究能力

项目制的局限在于成果的不可累积性。党校系统应当有意识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资政研究中形成的典型成果，拆解为可复用的“案例单元”和“方法模块”。一个完整的资政案例单元至少应当包含：治理问题的类型、调用的伟大长征精神要素、从历史经验到分析框架的转化路径、政策建议的形成逻辑、以及决策端的反馈（采纳、部分采纳或未采纳及其原因）。方法模块则包括如何在长征精神议题上开展快速调研、如何组织学员参与联合研究、如何撰写兼顾学理严谨性与决策可读性的资政报告等。这些模块的积累，可以使党校系统在伟大长征精神资政领域逐步形成一种“有组织的研究能力”，进而使其成为可教学、可培训、可迁移的知识资产。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EB/OL]. 求是，2016-05-01 [2026-10-21].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8317481.

[2] 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Z].2025-08-03.

[3] 李能.坚持高质量有组织一体化推进地方党校智库建设[N].学习时报，2024-11-22（A11）.

[4] 何毅,杨羽航.长征精神引领干部教育的三维解读——基于长征精神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与赓续[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4):1-8.

地方文化资源融入《文化创意产业》课程的改革路径——以东莞为例

陈思萌

(东莞城市学院，广东 东莞 523419)

摘 要：地方文化资源为《文化创意产业》课程联系产业现实、深化理论认识提供了重要条件。针对地方文化案例偏重知识介绍、产业过程呈现不足及理论学习与现实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本文结合东莞传统非遗资源与潮玩产业的发展特点，在文献梳理和公开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地方文化资源融入课程的教学价值与改革路径。研究重点提出两项改革方向：一是将莞香文化与旅游创意、活动创意等知识内容衔接，探索非遗参访、文化体验与文旅项目分析相结合的教学；二是依托东莞潮玩产业链，探索企业参访与适度的创意设计、样品制作相衔接的产教融合教学。同时，强调从文化理解、产业分析与项目可行性等方面完善评价。上述方案为待实施的改革设想，实际效果有待后续教学检验。

关键词：地方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业；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

DOI：doi.org/10.70693/202610237758

Teaching Reform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urse: A Study of Dongguan

Simeng Chen

Dongguan City College, Dongguan, Guangdong 523419, China

Abstract: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provide a meaningful context for connecting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ourse with real industrial practices.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on Donggua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imitations of approaches that rely mainly on cultural descriptions and isolated industry cases. It proposes two related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reform. Firs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Guanxiang (Dongguan incense) can be linked to cultural tourism and event creativity through appropriately organized heritage visits and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allowing student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visitor experience and service development. Second, Dongguan's designer-toy industry can support industry-oriented learning by conn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reative production concepts with enterprise visits,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where feasible, selected prototyping activities. These activities are intended to enrich, rather than replace, a theory-oriented curriculum. The proposed evaluation focuses on cultural understanding, explanations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the feasibility of creative projects and the use of reliable evidence. The reform pathways have not yet been systematically tested; their actual effects require subsequent classroom evaluation.

作者简介：陈思萌（1993—），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智媒传播、文化创意产业

Keywords: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ory-oriented courses; teaching reform; Donggu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一、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正在改变地方文化资源的呈现方式及其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东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显示，2023 年末全市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共有 43029 个，其中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42710 个，2023 年经营性文化产业营业收入为 2110.8 亿元[1]。这些数据揭示了当地文化产业的主体规模及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单位数量与营业收入并不能直接反映文化原创能力或具体课程的教学成效。地方文化资源的历史积累、产业基础和消费场景，因而成为进一步理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制的重要切入点。

与产业发展相对应，文化创意产业课程的知识体系不应停留于文化产品分类和产业现象介绍，还涉及文化价值转化、知识产权运营、产业链协同与数字传播等议题。东莞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石排镇潮玩产业发展资料，反映了当地制造基础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联系[2]。作为一门理论课程，《文化创意产业》所承担的任务并非训练学生完成某一项设计操作，而是建立文化资源、创意转化、产业组织与市场价值之间的认识框架。地方文化资源的教学意义，在于使相关理论获得可观察、可比较的现实背景。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地方文化与高校专业教育的联系。张景、霍媛媛指出地方文化融入课程可能存在资源开发不足、融入形式化等问题[3]；项仲平、刘静晨则较早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高校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4]。这些成果提示，地方资源进入高校教学既涉及课程内容建设，也涉及产业发展背景下的人才培养需求。但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一类以产业理论认知为主要目标的课程，如何将地方文化从描述性素材转化为能够解释文化资源开发、价值形成和产业组织的分析材料，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基于此，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公开统计资料梳理相结合的方法，以东莞的区域文化结构和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为研究背景，重点探讨地方文化资源进入《文化创意产业》课程的价值逻辑、现实限制与教学改革路径。本文所称“融入”，并不是将地方文化单独设置为知识单元，更不意味着用地方案例取代一般产业理论，而是围绕专业知识目标，考察文化资源怎样支持概念辨析、机制解释与迁移判断。本文并未开展对照实验或大规模学生调查，对课程改革的效果不作未经验证的因果推断。

二、地方文化资源融入课程的价值与现实张力

地方文化资源的教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其能够揭示文化与产业之间的区别及联系。文化资源包括历史记忆、传统技艺、地方民俗、社会生活方式和区域审美经验等，其中一部分能够通过创意开发和组织化生产形成文化产品或相关服务，但并非所有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都自动构成产业。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与相关经营主体的市场活动属于不同分析层次。因此，地方文化资源进入课程，应当兼顾文化属性、生产活动、经营主体和价值实现条件，避免将“文化保护”“产品销售”与“产业发展”混为一谈。对于具有传统技艺背景的资源，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联系尤其需要在理论层面予以辨析。

与一般性教材案例相比，地方文化资料还具有区域结构上的连续性。东莞既保留莞香制作等传统技艺，也形成了以原创 IP 与制造配套为特点的潮玩产业，两者分别关联文化传承、体验消费与产业链协同。陈海东等关于莞香非遗产业发展路径的研究[5]，为将传统技艺置于文化开发与产业经营背景下讨论提供了依据；邱丽平等对东莞非遗视觉元素现代转译的研究[6]，则表明文化符号进入当代产品需要兼顾文化识别、设计转化与使用场景。上述研究不能直接证明教学改革成效，但有助于明确地方文化资源应当衔接的课程知识，而不是把地方特色简单等同于教学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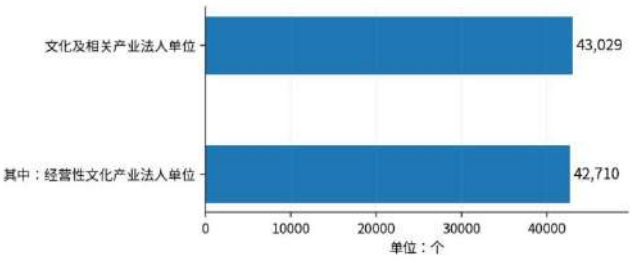


图 1 2023 年东莞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规模
数据来源：东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经营性单位为全部单位的组成部分，不应相加。

地方性同时构成教学优势和认识局限。其优势在于文化现象较为接近学生所处的区域社会，容易形成具体的事实背景；其局限则在于地方文化熟悉感可能被误认为理论理解。学生了解某个地方节庆、某项传统工艺或某种潮流商品，并不等于能够解释其产业链、价值分配或市场传播机制。以区域情境为主的材料若缺乏一般化的概念框架，课程易演变为地方文化知识介绍，形成“案例丰富、理论薄弱”的局面。与此同时，不同区域的资源条件和产业组织差异较大，地方经验也不应被当作可以不经检验便直接复制的产业发展模式。

数字化环境进一步放大了文化资源与产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张力。短视频、社交平台和人工智能辅助创作不断改变文化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但传播热度不等于文化价值，产品销量也不等于产业生态的长期竞争力。杨茵在研究数字化背景下非遗资源融入高校艺术设计课程时，讨论了课程整合、教学方法和资源建设等方面的改革问题[7]。虽然艺术设计课程与文化产业理论课程的目标有所不同，但相关研究提示：数字技术应服务于课程知识体系的更新，而不能以工具展示代替产业机制分析。

教学内容与学业评价之间的错位，同样值得注意。若理论课程把记忆产业概念作为主要考核目标，学生可能能够复述文化资本、创意转化、产业集群或知识产权等术语，却难以用这些概念区分不同行业的价值创造方式。反之，若完全以“创意方案是否有趣”评价学习成果，又容易偏离理论课程的性质。Chi 与 Wylie 提出的 ICAP 框架强调，学习者对知识的解释、建构与有意义互动具有重要的认知作用[8]。由此推及课程改革，评价应同时重视概念掌握、事实证据、产业机制解释和知识迁移，而非仅依靠活动参与度或最终产品外观。

三、地方文化资源融入课程的具体改革路径

地方文化资源融入《文化创意产业》课程，不能停留于更新案例名称，而应在理论知识与实际产业活动之间建立可理解的联系。本文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使学生既能认识地方文化的历史内涵，也能进一步分析文化资源如何被组织为文旅服务或文化产品。结合课程的理论属性及相关研究关于教学目标与学习活动应保持一致的讨论[9]，以下着重从莞香非遗体验和潮玩产业协同两个方面提出改革构想，相关实践宜作为理论教学的延伸，而非以动手制作替代理论学习。

（一）以莞香非遗体验为纽带，贯通文化认知与文旅创意教学

在传统的旅游创意与活动创意教学中，文化资源的介绍往往以图片、视频及产业案例讲述为主，学生能够了解某项传统技艺的历史背景或文化价值，却较难切实体会其成为旅游体验、文化服务和消费产品的过程。以东莞莞香文化为例，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地方文化符号上，还包含香材处理、制香工艺和相关生活习俗等可被感知的文化内容。相较于只把莞香作为非遗知识点进行讲解，课程改革可考虑将其与文化旅游的体验性、活动创意的参与性相联系，在条件具备时依托香文化展示场馆或专业传承机构开展参访与适宜的体验活动。学生通过接触制作展示、文化讲解和体验空间，可以更直观地认识文化资源与旅游服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为理解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文化附加值提供现实背景。

这一改革的重点并不是让学生掌握完整的制香技能，而是将亲身体验转化为产业分析。实地学习后，相关理论可以进一步联系到文化旅游课程所涉及的游客需求、体验设计、服务组织和市场传播等问题：传统技艺为什么能够吸引游客，文化讲解与手作体验构成了怎样的服务内容，文化消费的形成需要哪些运营条件，以及在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持非遗文化的真实性与传承意义。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简要的莞香文旅体验策划或产业分析报告，比单纯复述非遗历史更能体现课程的专业目标。已有莞香产业发展研究[5]可作为理解其现实开发条件的补充依据，东莞非遗视觉元素现代转译的研究[6]则可用于讨论文化符号在文旅纪念品与创意表达中的合理运用。通过文化认识、现场体验与理论反思的衔接，非遗资源有望从课堂中的观赏性案例转化为能够解释文化旅游和文化服务运行逻辑的教学材料。

考虑到课程学时、活动安全及校外合作条件，非遗体验不宜被设计为所有学生必须完成的复杂手工制作项目。对于暂不具备实地条件的教学单元，也可以借助真实展陈资料、非遗影像和相关产业访谈开展替代性分析；对于具备条件的课程，则可与现有实践教学环节适度衔接。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评价重点都应是学生对非遗文化价值、文旅体验内容及项目可行性的理解，而不是作品是否精美或参与过程是否热闹。

（二）依托东莞潮玩产业链，促进产业认知与创意实践衔接

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教学通常能够通过潮玩产品及知名 IP 说明创意附加值和文化消费现象，但产品背后的研发、打样、制造与运营等环节相对不易直接呈现。东莞潮玩产业依托当地制造业和配套企业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发展基础，石排镇潮玩产业集群总产值由 2021 年的 98.66 亿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155.06 亿元[2]。这一变化既提供了产业观察的现实材料，也提示文化创意产品的形成不仅涉及角色设计，还涉及制造条件、企业协作及市场运营。因此，与其仅把潮玩作为“热门消费品”介绍，不如将其作为联系文化 IP、创意生产和产业链组织的综合性学习对象，探索校企协同的课程实践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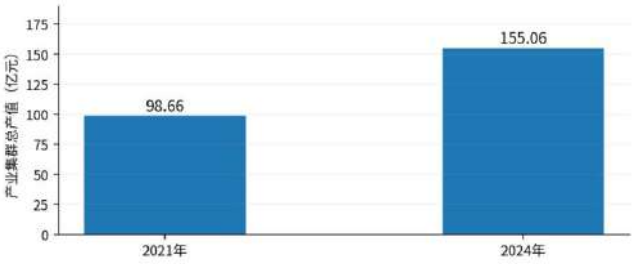


图 2 2021 年与 2024 年东莞石排镇潮玩产业集群总产值
数据来源：东莞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2 月 15 日公开报道。单位：亿元，指标为石排镇潮玩产业集群总产值。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课程可依托地方潮玩企业、产业园区或设计服务机构开展产业参访与专业交流，使学生了解创意构想到产品样品之间的实际联系。在学习层面，重点并非安排完整的工业生产训练，而是使学生认识原创形象需要经过造型调整、数字建模、材料选择、样品制作和市场定位等多重环节，理解“设计得出来”与“生产得出来、销售得出去”之间的差异。课程还可以与文创设计等实践教学形成适度衔接，围绕地方文化元素提出简单的原创 IP 构想，并在合作资源允许时选取部分方案尝试样品打样，以真实的制作反馈反思设计是否具备技术及商业可行性。相关产教融合研究强调产业资源对人才培养的支持作用[10]，但对于《文化创意产业》这类理论课程而言，企业资源的核心价值仍在于帮助学生认识产业链条与价值形成机制，而不是以完成实体玩具作为唯一学习目标。

这一改革还应避免将潮玩实践简化为一次工厂参观。学生对产业活动的理解，最终需要回到知识产权、生产成本、品牌运营及消费需求等专业问题，并通过简要的产业链分析或项目可行性说明予以呈现。由此，地方制造业优势能够成为理论课程理解产业组织的现实条件，同时也有助于学生认识文化创意产业不只是“提出好点子”，而是创意内容与技术、市场和组织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述两条改革路径分别面向传统文化资源的体验转化和现代文化产品的产业转化，在教学评价上宜保持共同的理论尺度。笔者认为，改革实施后可从文化理解的准确性、产业机制解释的完整性、方案可行性及材料依据等方面观察学生的学习表现，并通过案例分析作业和阶段性反思积累证据。相关建议仍属于拟实施的教学改革方案，后续需要结合合作单位条件、课程组织及真实学习成果进一步验证和调整。

四、结论

地方文化资源为《文化创意产业》课程联系产业现实提供了重要基础，其教学价值不仅在于丰富文化知识，更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文化资源如何经过开发、组织与传播形成文化产品和相关服务。东莞莞香传统技艺与潮玩制造业具有不同的资源属性与产业条件，分别能够为文化旅游体验和文化产品生产过程提供观察背景，也为突破纯粹依靠图文案例讲述的理论教学提供了改革切入点。

本文基于文献和公开产业资料，重点提出以莞香非遗体验衔接旅游创意教学、以东莞潮玩产业链衔接创意实践的两条改革路径，并强调以文化理解、产业分析和项目可行性作为学习评价重点。相关构想并非已经完成的教学实验，其实施仍受校外合作、课程学时及资源条件制约。后续研究需结合学生学习成果和实际教学反馈，进一步检验这些改革安排是否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文化价值转化与产业运行机制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东莞市统计局. 东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EB/OL]. https://tjj.dg.gov.cn/gkmlpt/content/4/4389/post_4389733.html.

[2] 东莞市人民政府. 潮玩正当时 | 石排华丽转身，从“代工基地”到“潮玩小镇”[EB/OL]. (20

25-12-15). https://www.dg.gov.cn/zwgk/zfxxgkml/spz/qt/gzdt/content/post_4475421.html.

[3] 张景, 霍媛媛. 地方文化融入高校课程的探索——以学前教育专业“幼儿园环境创设”课程为例[J].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4):160-165.

[4] 项仲平, 刘静晨. 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高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路径探究[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09, 16(3):71-74.

[5] 陈海东, 冯洋逸, 练娜菲. 东莞莞香非遗产业创新集群发展路径研究[J]. 文化产业, 2023(7):139-142.

[6] 邱丽平, 刘美星, 何梓婧, 等.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东莞非遗文化视觉元素在日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 创意与创新, 2025, 9(5):64-68. DOI:10.12184/wspcyycx2WSP2516-415513.20250905.

[7] 杨茵. 数字化背景下非遗融入高校艺术设计课程的路径探析[J]. 新传奇, 2025(32):78-80. DOI:10.26938/j.cnki.CN42-1794/Z.2025.32.025.

[8] CHI M T H, WYLIE R. The ICAP framework: Linking cognitive engagement to active learning outcomes[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14, 49(4):219-243. DOI:10.1080/00461520.2014.965823.

[9] BIGGS J. Enhancing teaching through constructive alignment[J]. Higher Education, 1996, 32(3):347-364. DOI:10.1007/BF00138871.

[10] 汪佳懿, 董莹, 罗富臣. 基于产教融合的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探究[J]. 中国高校科技, 2024(1):130. DOI:10.16209/j.cnki.cust.2024.01.026.

痛点导向下《中药资源学》校级一流课程内涵式建设与实践

汪丽波 施文艳 黄竹珺 张敏

（普洱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

摘 要：《中药资源学》作为新农科与新医科交叉课程，承担着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专业人才的培育使命。传统的教学模式有三重困境:核心内容如“黑箱”，科研训练呈“片段”，知识能力止于“纸面”，难以培养出使命担当的中医药人才。本课程建设以 CCE 智慧教学新范式，以“脑中有图、手中有术、心中有魂”为教学目标，探究教学中的困境。以结构化(C)知识体系打开教学内容黑箱，依托知识图谱梳理知识点、穿插实际案例，实现知识体系化、过程可视化和价值引领作用;以联通性(C)学习场域贯通科研训练链条，通过创新平台、微科研项目完成科研训练闭环，提升实践创新能力；以赋能型(E)师生角色破解知识应用纸面化，借助科教融合、问题图谱、多元评价，激发学生使命担当。课程建设以来，学生获得省级竞赛奖项、产出科普作品、课程评教 B 类等;该模式在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其他课程中推广，为教学过程的困境和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一流课程；中药资源学；痛点导向；项目驱动；智慧教学；多元评价

基金项目：2023 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2023YLKCZD005）

DOI：doi.org/10.70693/202609308609

Connotativ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University-Level First-Class Course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Under the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Wang Libo, Shi Wenyan, Huang Zhujun, Zhang Min

Pu'er University, Pu'er, Yunnan 665000, P.R. China

Abstract: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integrating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new medical sciences,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Science" is tasked with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face three major challenges: core content remains a "black box,"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appears as fragmented "snippets," and knowledge and skills remain confined to the "paper level," making it difficult to nurture dedicated tal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course adopts the CCE intelligent teaching paradigm, aiming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having a mental map, mastering practical skills, and possessing a sense of mission." It explores and addresses these teaching challenges by using a structured (C) knowledge system to uncover the black box of course content, leveraging knowledge graphs to organize key concepts and interweaving real-world cases, thereby achieving systematic knowledge integration, visualized learning processes, and value-driven education. A connected (C) learning environment integrates the entire chai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forming a closed-loop through innovative platforms and micro-research projects, thus enhancing students' pract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 empowering (E) teacher-student dynamic breaks the limitation of knowledge application remaining theoretical, uti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oblem-based knowledge mapping,

作者简介：汪丽波（1971-）本科，教授，研究领域：中药资源学；
施文艳（1990-）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中药栽培学；
黄竹珺(1987-)硕士，讲师，研究领域：中药临床学；
张敏（1995-）硕士，助教，研究领域：中药产品与开发。

and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thods to inspire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students have won provincial-level competition awards, produced science communication works, and received positive evaluations in course assessments. This model has been extended to other courses within the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fer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addressing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practices.

Keywords: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Smart teaching;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一 引言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应当坚持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建设标准，推动课程由资源堆砌的表层建设转向内涵式发展[1]。一流课程建设的核心并非教学课件、微课视频等资源的简单叠加，而是直面课程内在教学矛盾，重构教与学关系，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三位一体[2]。

在美丽中国建设与“双碳”战略背景下，《中药资源学》作为新农科与新医科交叉核心课程，是连接药用植物微观生理特征与区域资源宏观生态格局的关键载体，也是塑造学生生态文明素养、构建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思维的核心课程。课程立足西南区域特色药用资源保护与生态修复现实需求，为民族药产业振兴、中医药产业绿色转型提供资源学理论支撑。课程设置知识、能力、素养三维育人目标：知识层面，构建中药资源生态知识体系，能够解析药用植物种群演替、资源碳汇、道地药材生态适宜性等系统问题；能力层面，完成中药资源野外调查、数据分析与资源评价完整科研训练链条，具备野外资源生态评估与产业适配研判能力；素养层面，践行“两山”理念，树立生态优先、资源保育的职业信念，成长为服务地方中医药产业振兴的新农科人才。

课程建设前的教学实践活动中，中药资源学常规教学模式存在三个痛点问题。一是教学过程“黑箱化”，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按课程设计以自我讲授为主，交流互动不多，学生在学习中出现认知短板，教师难以及时发现，且教学过程没有建立可视化反馈机制，也导致后期教学设计调整滞后；二是科研训练“片段化”，如中药资源蕴藏量估算、药用植物种群调查等科研训练，评价资源量的方法，相关知识的理论讲解和实验实践均在不同的章节和实验完成，如果综合评价某地资源状况，二者各异，缺少从方案设计、野外样方调查、数据记录、蕴藏量计算（种群分析）到报告撰写的一体化综合实训，学生难以完整体验科研全流程；三是知识应用“纸面化”，学生识记基础理论概念能力较强，但在真实环境中开展中药资源调查、药材产地适宜性分析等实践工作时，部分学生暴露出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不足，学生对知识的学习还停留在应对纸质考试，难于将课堂知识应用或解决真实环境中的问题。

为解决上述教学中的困境，《中药资源学》立项校级一流课程建设并进行了内容重构。课程团队历经多轮课堂实施、实践反思与方案迭代，构建了痛点导向下的一流课程内涵建设与实践。从知识体系重新构建、学习场景再建设、评价体系改革三个层面开展课程内涵提质建设，并融合进智慧教学、AI 辅助推演、项目式学习、课程思政等多元手段，探索一流课程建设路径，为利用区域特色中药资源来打造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流课程提供实践参考。

二 课程改革的总体思路及痛点分析

一流课程内涵建设坚持以学生能力发展为核心，确立痛点牵引、体系重构、通过场景赋能、评价引领的理念,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3]，课程建设更不是简单的往课程里添加资源，而是先找准课程本身的问题，再调整课程目标、知识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办法，让知识学习、科研训练和价值观培养真正结合起来。

（一）课程建设中的痛点分析

依托“中药资源学智慧教学平台”，结合问卷调查等数据，分析出课程建设的三大问题，如学生对中药资源与环境、中药新资源调查与动态监测、中药资源替代补偿等内容的理解仅停留在表层，知识点之间缺乏连贯，不利于复合型人才培养；实验与实践环节彼此分割，学生不能完成从参与选题到成果产出的整个科研探究周期，制约创新与科研能力的系统养成。学习动机功利化，学习重型偏向应试，出现学生专业能力与中药资

源保护责任担当分离，弱化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与能力。

(1)中药资源学过程“黑箱化”。在课程中资源评价的指标体系、药材品质形成与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机理、样方设计的统计学原理等这些知识点如同“黑箱”，学生理解和掌握其机理较为困难。在智慧平台数据中，让学生绘制“道地药材品质形成”关联图，仅 1/3 的学生能正确理解并绘制，大多数只画环境与品质一条线，而微生物与品质关联没有思考，甚至不知道根际微生物是品质形成的参与者；而对于“生物多样性指标”，有近 3/5 的学生仍停留在“机械记忆公式”层面，对生物多样性数据背后的种群和群落稳定性与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性管理考虑较少，无法回答“为什么过度采挖某种药材会破坏群落的药用资源库”等问题，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思维，制约复合型人才培养。

(2)科研训练“片段化”。实验实践环节相互分割，学生无法经历完整科研周期。学情调查显示，40%的学生认为实验课能完整地体验科研流程；60%的学生课后持续投入科研的时间趋近于零。如中药资源种类分布调查，实验主要任务是辨认、拍照、压标本，采回标本后鉴定，无人追问为什么本地有（或只有）这一种植物；中药资源蕴藏量调查实验内容只做新鲜采集药材的“称重”工作，后期鲜重折算干重数据、中药资源蕴藏量推算等工作敷衍，使得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科研叙事能力缺乏系统训练，制约创新能力培养。

(3)知识应用“纸面化”。在学习过程中所学知识与真实应用环境脱节，难以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现实问题。例如面对“学校后山发现一片野生滇黄精，村民要挖，你怎么处理”的任务，多数学生考虑采收方式，仅 1/4 的学生还把“资源更新”“可持续采收”知识用在真实的抉择上。另外，在终期考核试卷中开放式设计题（或论述题）得分率(50%)低于基础知识题(80%)。此外，约 80%的学生学习动机功利，如在中药材市场调查任务中，学生对照片、数据记录完成度高，但药材销售商家惨伪或药材质量等问题不主动深究，没有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难以转化为自觉的责任素养，削弱了其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能力。

（二）课程改革的总体思路

课程教学团队基于校级教改项目，经过研究-实践-反思-重塑的思路，创新性构建并实践了 CCE 智慧教学新范式(Constructed-Connected - Empowered)。该范式以“重构认知体系、融通学习场域、重塑师生角色”为核心，旨在实现“脑中有图、手中有术、心中有魂”的教学目标(图 4)。为了打开生态过程的黑箱，致力于结构化(C)知识体系，通过动态知识图谱、师生机协同、中国生态故事这三把钥匙，让学生脑中有图。为了融合科研训练的片段，着力于联通性(C)学习场域，通过创新平台、微科研项目、生态论坛这三个环节，打造完整训练链，让学生手中有术。为了转化知识应用的纸面问题，聚焦于赋能型(E)师生角色，通过科教融合、问题图谱、多元智能评价这三种力量，激发学生内在担当，让他们心中有魂。

三 CCE 智慧教学新范式构建与实施举措

依托中药资源学智慧教学平台采集学习数据画像，并结合课程问卷调查结果，课程团队梳理出三大教学痛点：

对痛点进行分析后，教学团队依托校级教学改革项目，遵循 “研究 - 实践 - 反思 - 重塑”迭代建设思路，构建 CCE 智慧教学新范式。范式以课程知识、能力、素养三维育人目标为导向，围绕内容体系重塑、学习空间重塑、思政体系重塑三大方向开展系统建设，以兴趣、乐趣、志趣为内在育人驱动力，搭建三层架构、九项举措一体化教学体系，分别破解教学黑箱化、科研训练片段化、知识应用纸面化三大痛点，最终达成“脑中有图、手中有术、心中有魂” 的育人目标。基于 CCE 模式的《中药资源学》智慧教学新范式见图 1。

（一）结构化（Constructed）知识体系，破解教学黑箱化

以重构认知体系为核心，搭建结构化知识体系，构建“资源透视镜”，实现学生脑中有图（认知）[4]。一是图谱为纲，体系清晰。构建动态中药资源知识图谱，打破教材章节壁垒，实现知识点一键透视、逻辑一链贯通，将抽象的药用资源生态过程具象化、可视化。二是师生机协同，路径高效。设计 AI 资源推演、思辨论坛等教学活动。教师创设资源调查场景与评价标准，依托 AI 与学生深度交互、反馈追问，引导学生自主推演药用种群动态过程，识别学生思维盲点，引导深度探究。三是本土故事，价值引领。构建“中国中药资源故事线”，选取西南道地药材保护、民族药资源保育等本土真实案例，将专业知识嵌入案例

叙事[5]。学生在案例解析中自主提炼资源学核心原理，完成从现象到内在机制的认知建构，在中医药资源保护实践案例中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见表 1

表 1 课程思政案例的融入表

章节	主要思政元素	思政切入点	思政目标
中药资源调查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中药人的使命担当	以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为案例，讲述普查中科研工作者跋山涉水、野外踏查的艰辛历程，以及克服恶劣自然条件、持续开展资源摸底的坚守，取得的资源本底成果意义。	引导学生体会甘于奉献的情怀，锤炼不畏艰苦、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树立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脚踏实地开展野外调研的职业素养，建立守护中药资源的责任担当。
中药资源评价	中药资源保护理念、可持续发展思维、职业素养	结合中药资源数量和品质的评价方法，解释其辩证关系，融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讲解中药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意义。	引导学生树立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梳理过度开发与资源枯竭关系；培养敬畏自然、守护中药材资源的职业素养，保障中医药产业长远发展的家国情怀。
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传统中医药哲学智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正确三观	以中药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典型案例为例，融入“天人合一”“物尽其用”“取之有度”的传统中医哲学思想，讲解资源循环利用、绿色开发的核心内涵。	帮助学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核心要点；塑造尊重自然、节约资源、绿色履职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药资源的人工培育	专业责任感、社会使命感、科研探索创新精神	以连翘等野生抚育的成功案例为切入点，阐述野生抚育是缓解中药资源枯竭重要途径。客观指出当前多数野生中药材抚育技术仍不完善，仍存在科研空白与技术难题，亟待深入研究与突破。	引导学生认识中药资源人工培育与野生抚育的现实价值与行业痛点，树立主动钻研、大胆探索、攻坚克难的科研精神，助力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担当。

（二） 联通性（Connected）学习场域，破解科研训练片段化

以融通学习场域为核心，搭建联通性学习场域，打造“中药资源科研训练链”，实现学生手中有术（实践）。连通性学习理论为本研究混合式教学场景及教学场域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6]。项目式学习在中医药专业课程教学中已被证实可有效打通理论与实践壁垒[7]，同时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与课程融合，有助于构建完整科研训练链条[8]。

一是平台支撑，时空无界。打造同步加异步融合学习空间，依托智慧教学平台支撑学生自主学习；整合校内实验室、野外药用资源实训基地等资源，支撑高阶科研实践学习。

二是项目驱动，学用一体。不单独设立专项培养计划，而是把微科研模式融入常规实验课程。立足校园及周边地域环境，设计一系列综合性调查课题，包括药用资源本底调查、药用植物种群分布调查、民族药与民间药调研、中药材市场调研、中兽医应用、中药植物源农药、中药化妆品等多个研究方向。以 AI 助教为科研辅助顾问，指导学生独立完成选题论证、方案设计、野外实地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与成果总结汇报，使学生在课程实验中系统体验完整科研链条，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深度融合。

三是论坛淬炼，学术自信。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生命科学学科竞赛等现有平台承载学生科研成果交流，构建师生与 AI 协同互动的研讨机制，转变单向灌输式授课方式。学生在项目申报、竞赛答辩、成果交流中锻炼科研汇报与逻辑表达能力，在实战中积累科研经验，涵养学术自信。

（三） 赋能型（Empowered）教学生态，破解知识应用纸面化

以重塑师生角色为核心，构建赋能型师生关系，创设“价值生成场”，实现学生心中有魂（价值）。素质导向的多元课程评价体系，能够改变传统笔试为主的考核模式，促进学生高阶能力发展[9]。一是科教融合，赋能探索。将团队中药资源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推动教师由知识讲

授者转变为探究引导者，赋能学生自主探究真实资源问题。二是问题图谱，精准探究。依托智慧课程平台搭建中药资源问题图谱，将区域资源保护宏大问题转化为可落地的研究任务，配套研究方法指导，打通课堂知识与资源保护现实挑战，解决学生知识调用无序的问题。三是评价牵引，能力导向。推行素养导向的多元智能评价体系。评价焦点由知识识记转向综合能力施展；评价方式由期末一次性考试转向全过程学习数据画像；评价主体由教师单向评分转向师生机协同多元反馈；评价标准由唯一标准答案转向迭代优化，引导学生面向真实问题开展探究。



图 1. 基于 CCE 模式的《中药资源学》智慧教学新范式

四 CCE 智慧教学新范式改革实践成效

（一）课程层面：筑劳基础，重构智慧教学范式

通过 CCE 智慧教学新范式的实施，课程的教学目标达成度有了明显提升，学生学习态度得到转变。开放式应用或设计题得分率从课程建设前的 60%提升至 79%。学生实践教学项目报告达到“优秀”等级的比例提升至 40%；例如通过对将学生实践教学前后测试报告对比分析，发现前测报告中概念不清、证据链不完整等问题，在重构智慧教学范式后学生得到改善，且在材料组织、数据补充及参考文献应用等较前测报告更熟悉。中药资源学课程近三年校级课程评价成绩均为 B，改革不仅提升了知识与能力的输出质量，也增强了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使学生的学习态度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智慧教学新范式对提升教学质量有明显影响，具备良好的推广潜力与应用价值。

（二）学生层面：增强实践认知，树立资源保护责任担当

通过课程建设实施，推动了学生从“知识认知”到“责任担当”的转变。学生依托课程开展从野外资源调查到市场药材销售再到产品开发多样的实践活动，制作科普视频等活动，将课程知识转化为具有科学性与传播力量的科普成果。近 3 年共有 26 人次学生在省级赛事中获奖，包括省级“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省级“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高水平平台。

（三）团队层面：以传承固本，打造高水平教学创新团队

教学团队以校级一流课程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教师内部梯队培养，期间青年教师教学素养与教研能力都得到了全面提升。建设期间，团队成员围绕课程建设累计立项校级教研教改项目 5 项，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4 篇，团队成员从传统经验式教学的基础上持续探索，初步构建科教融汇、协同育人的运行机制；团队从经验传承向研究型、创新型教学团队演进。

（四）成果层面：铸基自成，教学成果示范辐射

CCE 智慧教学新范式在中药资源学课程中不断优化，在体系趋于成熟后，逐步向中药化学、

中药产品与开发等相关课程移植，形成了可借鉴的教学案例。从适用范围看，该范式设计思路可迁移至生物学、生态学等新农科、新医科科核心课程，为同行破解课程教学困境时提供参考。另课程建设成果主动对接地方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需求，课程负责人获批省级三区科技人才项目，在项目实施地围绕产业技术的普及，中药资源调查与保护、资源利用等内容开展培训，帮助基层从业者增强资源保护意识，提高产业技术素养，服务地方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

五 改革反思与展望

地方高校在一流课程内涵建设过程中普遍面临资源、场地、评价量化等现实困境[10]，一流课程内涵建设是长期迭代的持续性工作。本课程建设虽以 CCE 智慧教学新范式，以“脑中有图、手中有术、心中有魂”为教学目标，探究教学中的困境。以结构化(C)知识体系打开教学内容黑箱，依托知识图谱梳理知识点、穿插实际案例，实现知识体系重构，但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智慧环境下的推演思辨，教学中的研讨探究等高阶教学活动，对教师的教学设计与课前准备提出了较高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该范式常态化实施。后续课程团队将梯度推进建设，进一步探究课程由教师“个人备课”转向“团队共建”转变，依托智慧平台的案例库，实现课程设计的轻量化和可复制，保障今后课程建设中常态化开展。

另外，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受学生规模、野外实习场地、项目与经费等条件制约，传统线下微科研项目的学生覆盖比例存在客观上限。后续建设中适当扩大单个项目的成员规模，结合实际情况引入虚拟仿真等数字化手段来补充野外实践调查部分环节缺失，通过该方式扩大项目式教学覆盖面，使更多学生获得完整的科研训练。在多元评价体系中，学生的高阶素养属稳性指标，难于被量化，而现在评价指标的客观性与稳定性还不够成熟，下一步建设中可把高阶素养细化为可具体观测的指标，结合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过程性数据综合考核，提升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面向未来，课程团队将持续坚持痛点导向的内涵建设思路，迭代完善课程体系。一方面，持续丰富中药资源知识图谱与问题图谱，补充云南本土道地药材、民族药野外调查案例，更新智慧教学平台数字化资源；另一方面，优化 AI 辅助教学、思辨论坛教学设计，精简教学任务，降低实施门槛。持续扩充大创项目、微型科研项目载体，扩大项目式学习覆盖范围；打磨多元评价指标体系，提升高阶能力评价科学性。团队将持续发挥课程示范辐射作用，依托基层服务项目推动教改成果落地，对接区域中药产业需求，持续提升中医药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六 结语

本文以中药资源学校级一流课程建设为载体，针对传统教学中教学黑箱化、科研训练片段化、知识应用纸面化三大痛点，开展了多轮教学实践。重构课程内容体系、搭建了联通课内外的学习场地、推行以素养为导向的多元评价。从教学实践数据表明，痛点导向的改革路径能够有效改善传统教学中的突出问题，使学生专业能力与价值素养同步提升，教学团队教研能力不断增强，成果在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的其他课程实践环节中得到应用。

但 CCE 智慧教学模式在目前仍存在一定的困难，教学实施的经费投入较大、野外实训条件受限、高阶素养的评价还缺少量化的手段。今后我们会结合地方民族中药资源的特色，持续改进课程设计，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中医药产业，更好服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Z].2019.

[2] 吴岩. 建设中国"金课"[J].中国大学教学,2018(12):4-9.

[3] 李培根.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一个重要的教育理念及若干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01):1-6.

[4] 张艳红.项目式学习在中医药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中医教育,2024,43(02):45-48.

[5] 王芳. 课程思政融入中药资源学教学的实践探索[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3,21(11):16-18.

[6] [陈丽. 混合式学习场景构建与连通性学习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2,32(06):23-29.

[7] 刘敏. 智慧教学背景下课程"暗箱"问题破解路径探析[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15):78-82.

[8] 吴文倩，王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与专业课程融合的实践探索 [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1,40 (05):208-211.

[9] 赵军. 素质导向多元课程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高教学刊,2024(08):112-115.

[10] 周欣. 地方高校一流课程内涵式建设困境与突围[J].药学教育,2023,39(03):12-16.

二战时期英属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力量的建设

杨桦[1]

(1.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250358)

摘 要：二战期间，在英国、殖民地政府及教会推动下，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在战前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此期间，女性初等、中等及师范教育在入学人数、学校和教育设施建设等方面实现飞跃，殖民地人民对女性教育的态度也有所改观，但仍存在性别歧视、发展不平衡和教育西式化严重等问题。战后，女性教育成为英国在黄金海岸殖民地开发计划的重要关注对象，而这同时也促进了殖民地人民觉醒，加速英国殖民政权瓦解。1957 年，随着黄金海岸独立，有关女性教育发展的计划也随之结束。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属黄金海岸；女性教育；父权制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25 年度“固生堂中医”人才教育基金“历史与红色文化研究”专项资助课题“二战时期英属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力量的建设”（编号 2025201）的结项成果。

DOI：doi.org/10.70693/202609295868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Gold Coast during World War II

Yang Hua[1]

1.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China, 250358

Abstract: During World War II,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s, and churches, women’s education on the Gold Coast further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pre war edu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as a leap in enrollment, school and educational facility construction for women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acher education. The attitude of colonial people towards women’s education also improved, but there we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gender discrimin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and serious west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fter the war, women’s education became an important focus of Britain’s development plan in the Gold Coast colonies, which also promoted the awakening of the colonial people and accelerated the collapse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regime.In 1957,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Gold Coast,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education came to an end.

Keywords: World War Ⅱ; British Gold Coast; Women’s education; Patriarchy

作者简介：杨桦（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洲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黄金海岸的女性教育事业未受到战争的重大影响，并在英国政府和殖民地政府的推动下获得新的进展。然而，该阶段的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发展未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目前，国外研究或将其置于非洲整体教育框架内作为次要方面论述，①或聚焦于女性教育面临的困境，缺乏对战时发展成果的系统分析；②国内研究则更为稀缺，且不成系统。③为此，本研究以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④等一手资料为基础，旨在梳理二战期间黄金海岸女性教育的发展脉络，评析其成就和局限，并探讨其战后走向。

一、二战期间黄金海岸女性教育的进展

1939—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黄金海岸本土未被卷入战场，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女性教育得以继续运转。在此期间，女性教育体系延续战前结构，初等教育迅速发展，中等教育虽艰难起步，但也有突破，女性师范教育则因本土需求而受到重视。在这同时，阿奇莫塔学院作为教育重镇，发挥了引领作用。

（一）在校女性教育

1.初等教育

初等教育是战时女性教育中普及范围最广、增长速度最快的教育阶段，女性入学人数在这一时期呈攀升状态。为了配合这一现象，殖民地内部也建立了多所女子学校，混合学校中女孩入学的名额也大幅增加。

1939 年，在殖民地内部接受资助的初等教育学校中，入学女孩数量为 14723 人，至 1940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15201 人。1941—1942 年，虽然太平洋战争致使整个战争局势更加严峻，但是女性教育上升的态势并没有发生逆转。1942 年，殖民地内部女孩入学规模显著增加，据统计，同年初级教育学校中的女孩数量已有 22651 人。1943—1945 年，女性入学数量增加的趋势继续保持下去，1945 年，仅就黄金海岸受资助学校统计，初等教育女性入学人数也有 20815 人。为配合这一趋势，殖民地内部的女子学校和能够提供女性教育课程的学校数量也进一步增加。1940 年 3 月能够为女孩提供女性教育课程的学校从 1939 年 3 月的 40 所增加到 51 所，同年底，这一数字增加到 53 所，而且增加了一所女子学校。1941 年，黄金海岸已经拥有 25 所女子学校，能够为女孩提供教育部批准的科学课程的学校也有 57 所。至 1945 年，殖民地内部已建有 30 所女子学校，殖民地教育部也在考虑将新的女子学校列入援助名单。⑤

2.中等教育

女性中等教育在整个黄金海岸都存在滞后于初等教育的现象。虽然阿奇莫塔学院和韦斯利女子高中可以提供女性中等教育，但是能够参与到其提供的中等教育中的人数稀少。1938 年底，阿奇莫塔学院 27 名接受中等教育的女孩中，只有 1 人通过了黄金海岸教育部代表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组织的学校证书考试。韦斯利女子高中内基本全是接受初等教育的女孩，而且只有经过挑选的女孩才能够参加证书考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43 年，此后韦斯利女子高中才可以提供中等教育。但是鉴于殖民地教育部给予中等教育重大重视，女性中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较快。1944 年，韦斯利女子高中招收了 50 个可以接受中等教育的女性，1946 年初这个数字增加到 63 人，阿奇莫塔学院的招生人数与其相差不大。1945 年殖民地内三所教会学校宣布为女性开设了新的中学课程，1946 年初，这三所学校的中学女性入学人数为 82 人。但殖民地人民为女性提供中等教育的观念仍需加强，众多家长的消极意愿也在阻碍中等教育的发展，女性中等教育的发展空间与潜力非常大，任务也更加沉重。⑥

（二）女性师范教育

黄金海岸女性师范教育的发展伴随着女性教育需求的增加而加快，虽然英国政府和众多教会团体都会派遣女性教师在女子学校或者混合学校

①（美）戈京：《加纳史》，李晓东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年；（英）理查德·雷德：《现代非洲史》，王毅、王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②Fiona Leach, "African girls,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 education and the patriarchal imperative," in *Gender Balance and Gender Bias in Education*, Routledge, 2013, pp.31-43; Theresa Tuwor, Marie-Antoinette Sossou,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education in West Africa: strategies for maintaining girls in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Vol. 12, No. 4(2008), pp.363-379.

③李鹏涛：《殖民主义与非洲社会变迁——以英属非洲殖民地为中心（1890—196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刘金源：《单一经济及其依附性后果——以加纳为例》，《西亚非洲》2002 年第 4 期，第 30—34 页。

④本研究数据均参考《1938—1946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38-1946*,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39-1946.）。

⑤数据参考《1939—1946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39-1946*,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40-1946.）。

⑥数据参考《1939—1946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39-1946*,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40-1946.）。

中参加工作，但是黄金海岸的需求持续扩大，培养本土女性教师的任务紧迫。而且战争爆发后，许多学校人员被迫接受动员进入军队，与敌方势力有关的教会团体①也被强制驱逐出黄金海岸，人员的大量流失使教育工作的发展受到明显影响，促使殖民地加快发展教工人员的脚步。

战争期间，政府推动②和教会援助的女性教师培训中心是培养黄金海岸女性教师的主要阵地，虽然战争也对此造成影响，③但是培训教育进展较为顺利。殖民地内，能够参与培训的女孩需要参加特殊的证书考试，完成相应的课程后才有资格获得相关证书。1940 年底时，殖民地内部已有 196 名女性教师在接受培训，56 人于年底完成课程，1941 年培训中心又招收了 44 名新生。至 1945 年时，黄金海岸共有 223 名女孩在接受师范教育课程，并在 1946 年初时招收了 110 名新生。相较于初、中等女性教育，女性师范教育受到殖民地更多的青睐，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许多殖民地家长认为，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未来的就业方向，师范教育都有利于参与其中的女性成为合格的家庭主妇，所以殖民地人民也存在较好的参与意愿。④

（三）阿奇莫塔学院的女性教育

阿奇莫塔学院自 1924 年建立以来，一直是黄金海岸内部非常权威的教育圣地，这所学院既向殖民地人民提供教育，也与政府合作进行殖民地内相关需求的研究与开发，而且有时会代表教育部主持部分教育工作，⑤是殖民地内教育领域的领头者。阿奇莫塔学院可以同时提供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教师培训教育，并配有专业化教育设施，更因作为黄金海岸内部水平最高的教育学院，而享有政府的重要关注与补贴救济。⑥阿奇莫塔学院深受建立之初领导人物教育理念的影响，非常重视女性教育，每年都会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女性教师培训留出进修名额以及经费预算，战争期间也不例外。

在阿奇莫塔学院，女生和男生接受一样的课程训练，只是女生需要接受家政和体育的单独教学。1944 年之前，阿奇莫塔学院仍保留幼儿园和初等教育阶段的招生，且女生的录取比率高于男生。⑦1944 年，阿奇莫塔学院决定终止幼儿园和初等教育的招生工作，黄金海岸教育部对此的解释为，阿奇莫塔学院初期的招收工作主要考虑到，从外部招收学生可能会对学院的中等教育工作形成掣肘，但是到 1944 年时，政府推动和社会资助的学校提供的教育已经非常完备，阿奇莫塔学院从中招收的学生已经可以为学院的中学、教师培养等部门提供优质生源和教务人员，阿奇莫塔学院也是时候集中精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⑧

中等教育是阿奇莫塔学院重点关注的对象，其建设水平也处于殖民地内部前列。在韦斯利女子高中未招生前，阿奇莫塔学院是当时唯一的一所为女孩提供公认的中等教育机构，中等教育阶段的学生数量在学院学生总数中也占比最大。⑨战争期间为了促进中等教育的发展，学院为通过初等教育七级考试以及中等教育的女孩开设了一项特殊的课程，该课程的重点是家庭工艺，家政学等课程也在学院中为女孩开设。1945 年，能够参加教育部代表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组织的学校证书考试的 18 人中，阿奇莫塔学院输送了 9 位。⑩另外，阿奇莫塔学院中等教育阶段的女孩有机会获得中等教育奖学金，而且如果她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学院的教师培训。

阿奇莫塔学院的女性师范教育也是殖民地内部女性师范教育的佼佼者。作为殖民地内部非常重要的女性教师培养基地，阿奇莫塔学院招收的能够参与教师培训的女孩，都是从通过初等教育七级考试的女孩中挑选出来的，她们与男生一起参与四年制的课程。1938 年底，殖民地内部接受培训的全部女孩有 163 人，其中阿奇莫塔学院中有 66 人，其他女孩在政府、教会组织的培训中心进行三年制学习。战争期间阿奇莫塔学院的女性师范教育也在进行，1941 年底时 69 名女孩在学

①例如巴塞尔传教团，它属于德国传教团。

②主要是阿奇莫塔学院，有关情况和详细数据在下文第三部分列述。

③1942 年时，部分培训中心被军方征用，但培训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④数据参考《1940—1946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40-1946*,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41-1946.）。

⑤例如 1943 年时，代表教育部开设了两门面向教师培训的课程。

⑥例如 1940—1941 年，殖民地概算规定捐给学院 4829 英镑的资助，另外还有 2539 英镑的资助用于农业教育。

⑦数据参考《1939—1940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39-1940*,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40.），当时参与入学选拔的 736 名男生，只有 90 名被录取。

⑧前文所述，阿奇莫塔学院设立的原因之一也是为弥补当时黄金海岸没有一所高等教育学院的缺憾。

⑨1943 年底，学院入学人数为 632 人，初等教育 125，中等教育 238，教师 175，大学 94，女生入学为 53 人。

⑩数据参考《1945—1946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45-1946*,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46.）。

院接受培训，同年殖民地内部共有 185 名女孩在接受培训。战争期间，虽然殖民地的教育活动受到战争以及经费有限等原因的限制，但是阿奇莫塔学院也会组织一些有关教师培训的活动与一些特殊课程，①以丰富教师们的教学经验和知识储备。②

但是，阿奇莫塔学院的教育发展受到战争的影响也不能忽视。1940 年下半年，为了给英国与黄金海岸的军事活动留出空间，许多学校的建筑被接管以便用于服务战争，阿奇莫塔学院的不少建筑也被征用，女子初等教育部不得不随之搬迁。1941 年底时，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很多家长在担忧这种紧急住宿和紧急安排对孩子教育的影响，1941 年学院的学生数量也因此有所下降。直至 1942 年时，因为紧急建造的临时建筑已经完工，搬迁的部分有了容身之地，阿奇莫塔学院也终于在战时有了一个稳定的发展基地。

二、二战时期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工作的评价

二战期间，黄金海岸女性教育整体顺利开展，虽部分时间和地区受战争动员活动影响，但整体成果显著。战争期间，殖民地内部受教育女性人数大幅增长，初等、中等及师范教育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殖民地内部对女性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得到提高。然而，这一时期女性教育仍存在问题，受教育人数不及男性，发展水平存在地域差异，父权制限制发展潜力。这些是未来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发展的阻碍，也是战后英方和黄金海岸需填补的发展空间。

（一）女性教育的量化成就与女性受教育意识的转变

在英国政府和黄金海岸殖民地政府的努力下，二战期间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工作获得十分可观的成果，这是英国人在黄金海岸宣称以及推进的“文明使命”的成功表现，也是证明英国在黄金海岸殖民合法性的理由之一。

1939—1945 年，黄金海岸女孩入学人数实现飞升，初等教育阶段受资助学校中的女孩入学人数在这六年中不间断增长，从 1939 年的 14723 人到 1945 的 20815 人，实现 41.38%的增长；女性中等教育虽发展较慢，但是却实质性地改变了黄金海岸女性中等教育发展滞后的现状，阿奇莫塔学院和韦斯利女子高中以及后续三所可开展女性中等教育课程的学校的出现是对女性接受中等教育的鼓励，更是对传统约束女性观念的突破，虽然女性在中学接受的部分课程与家政服务直接相关，但这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与当地传统相衔接。

黄金海岸女性师范教育的发展是整个殖民地女性教育发展举足轻重的部分。1939—1945 年间，虽然殖民地内部每年培养的女性教师增长幅度较小，能够从中获取结业证书的女性也较少，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殖民地内部女性教育的需求。而且本土女性教师比之西方女性教师而言，本土女性教师能够更好地理解入学女生的教育和生活需求，同时这一职业可成为黄金海岸女性可以选择的发展路径，为黄金海岸女性走出家庭、选择自己的人生提供了新的机会。

女性教育在战争期间的量化成就是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工作开展的宝贵成果，而伴随着这些成果以及推动这些成果诞生的重要背景是，黄金海岸内部对于女性教育认可和重视。殖民地人民对女性教育态度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这其中也不能缺少殖民地政府和教会的努力。以黄金海岸北部领地初等教育为例，1938 年时，这片区域的非洲家长对女性教育的态度并不乐观，当年该地仅存在一个女子系，且其属于一所教会学校，共招收了 43 名学生。1940 年该所教会学校受到政府的援助，学生数量也增长到 72 人，同年底，北部领地内又开办了一所新的女子学校，这两所学校都在探索北部领地女孩培训的最佳方式，旨在依托现有有限资源，帮助其日后成长为高效的家庭主妇，而这种培养理念也促使北部领地的家长开始转变思想。1942 年，北部领地人民对女性教育的态度不似从前那么冷漠，甚至存在温和的兴趣，酋长们对女性教育的态度也逐渐改观。1943 年，酋长等土著管理者也在努力提高女孩的入学人数。至 1945 年，北部领地中有 496 名女孩在接受教育课程，比 6 年前增长了十几倍。这些转变反映了北部领地的教育氛围发生了强烈的变革，也可映射出整个殖民地内部的女性教育意识也处于提高的状态。③

（二）战时女性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桎梏

战时英国和殖民地政府在黄金海岸的女性教

①例如为期三年的工艺美术教师培训特殊课程。

②数据参考《1938—1942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38-1942*,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39-1942.）。

③数据参考《1939—1946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39-1946*,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40-1946.）。

育工作的确取得重大成就，但这期间也存在众多问题阻碍教育工作的开展，而且英国在殖民地推行的西式教育在与本土教育的融合过程中也存在偏执的倾向。

1.女性教育从属于父权制社会的需求

父权制框架下，性别不平等社会结构、针对女性的社会歧视，以及童婚、女性必须承担繁重家务等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存在，长久以来构成了束缚黄金海岸女性受教育权利的枷锁。在家庭中，黄金海岸女性的人生受制于男性，她们的主要职责在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能够妥善处理家庭事务。女性长期缺乏自尊与自信，被迫成为家庭的附庸，而教育也因此被视为与婚姻并不相容的存在。早婚现象被视为保持贞洁的一种方式，并且强迫结婚与生育的现象屡见不鲜。此类状况皆迫使女性放弃受教育的机会或者中断教育过程，也会使得性别不平等、女性持续贫穷化等现象继续存在。①

虽然战争期间殖民地内部女性教育的问题得到非洲家长们的重视，但是这些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依旧是训导女性成为合格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家长们对女性教育的认可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女性教育提供的课程便于教导女孩们扮演好家庭角色，殖民地政府在设置课程时也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女性教育中，烹饪、针线、照顾婴儿等家政类课程是女性必修课程。因此，虽然女性也可以接触男性能够接受的教育课程，但是在这些家政类课程面前，这些常规类课程似乎并不重要。女性教育中的传统观念在束缚女性成员的同时，也在固化她们的思想，女性健康状况、自尊心等都受制于此，这封闭了女性教育的内生动力，阻碍了女性对受教育权利的诉求。传统观念、传统习俗及在此之下的教育课程等严重限制了女性教育事业潜力的激发，在这同时，也减少了殖民地政府为推进女性教育事业做出的努力，大大削减了相关政策的预期成果。

2.女性教育不平衡问题始终存在

英国与殖民地政府的女性教育政策和宣传缓解了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困境，推动更多女性入学，但战争期间当地阻碍女性教育的传统观念和习俗仍存在，导致女性教育不平衡问题更明显，主要体现在性别、地域、阶段教育三方面。女性教育与男性教育发展不平衡和父权制影响直接相关，女性在入学人数、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落后于男性。以 1940 年为例，政府推动和受资助的 464 所学校中仅 23 所是女子学校，男生入学 46408 人，女生仅 15201 人；②同年殖民地各类学校中男生入学人数占比 77.62%，女生仅 22.38%，至 1942 年女生入学占比仅增至 23.44%。这只是女性教育落后的一小部分，性别歧视和传统观念使教育不平等更普遍、难扭转。

战时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在地域上的差异主要在南部（沿岸殖民地和阿散蒂）与北部领地之间体现，南部地区在教育理念、教育设施与教育资金投入等方面均领先于北部领地。1938 年，北部领地除存在一所招收女子系的教会学校外，也存在招收女孩的公立学校，塔马利公立学校中就有 8 名女生。但遗憾的是，这些女生的父母均来自沿海地区，他们较为开明的教育理念使得他们支持女孩的学校教育。彼时，北部领地民众对女性教育的态度不容乐观。尽管截至 1945 年，北部领地民众对女性接受教育的态度有所改善，但该年度北部领地初等教育仅招收 496 名女生，相较于同年整个殖民地招收的 43448 名女生，这一进展极为有限。此外，在中等学校建设、奖学金设置等方面，北部领地的女性教育均落后于南部地区。以 1939—1940 年殖民地政府实际教育费用支出情况为例，该年度南部奖学金支出达 855 英镑，其中包含女子中等教育奖学金，而同期北部领地并无奖学金支出。同时，在整个战争期间，北部领地内没有一所可招收女生的中等教育学校或女子系，女性教育奖学金也因此失去了来源与受益对象。③

造成黄金海岸女性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不只是殖民地传统观念与习俗对女性教育的束缚，根本原因在于贫困和经济落后，这关乎学校和师资队伍的建设，更关乎高层次教育的普及。而黄金海岸女性教育最为明显的不平衡问题就在于阶段教育的差别，这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整个殖民地内部女性初、中、高等教育差距。1939—1945 年间黄金海岸内部能够为女性提供初等教育的学校众多，但是中等教育学校屈指可数，高等教育

①Theresa Tuwor & Marie-Antoinette Sossou,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education in West Africa: strategies for maintaining girls in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Vol. 12, No. 4(2008), pp.364, 367-368.

②数据参考《1940—1941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40-1941*,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41.）。

③数据参考《1938—1940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38-1940*,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39-1940.）。

学校为零，女性教师数量相对于学生的数量而言也十分短缺。虽然殖民地政府每年都会为殖民地教育留出财政预算，更有众多社会资助扶持教育发展，但是面对殖民地内庞大的人口基数，殖民地政府与社会救济的援助在普及初等教育的过程中已力不从心，更无法兼顾初、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二是北部领地与南部之间初等、中等教育的差别。据 1939—1945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统计，至 1945 年，殖民地内部 25 所初等教育女子学校中，北部领地仅有两所，且北部领地人民为女孩提供中等教育的意愿比南部更低，北部领地也未有女性中等教育场所，因此北部领地和南部的女性初等、中等教育不但在女孩入学数量上相差甚远，与之相匹配的女性教师数量、学校建设等也存在巨大差别。

3.女性教育西式化问题愈加严重

除了以上父权制、教育中不平衡问题外，战时黄金海岸女性教育的形式、课程设置与内容也因以西式教育为模板而造成忽视本土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女性教育课程中存在大量家政类学习与考核的现象，这既是黄金海岸家长们希望女生接受的课程，也是对西方女性常接受的课程的模仿；另一方面英国派遣的教务人员与殖民地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基本会以西式教育方式作为授课的标尺。在本土女性教师群体成长起来前，英国教育下的课本、参考影片等一系列辅助教育手段都以西方观念为指导。而且虽然黄金海岸处于非洲大陆，但是授课内容多与英国有关，英国的宪法、地理、文学都可作为女性教育中常规课程的主题，①而非洲本土的文化、地理、历史则受到遗弃和蔑视。这一问题的存在首先会固化女性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甘愿成为家庭中的付出者，②同时也会造成本土文化在女性一方向后辈传承中的缺失，③影响非洲文化的自我传承，更造成非洲文化西式化。

三、女性教育工作的战后发展趋向

战争结束后，英国面临维持帝国和战后经济恢复的双重任务，道德和物质上的双重困境使其意识到英帝国支援的重要性。在非洲，为了维系英国殖民统治、获取经济发展资源，并回应殖民地要求自治的呼声，英国准备实行渐进式非殖民化政策，以政治上的宪政改革延缓殖民地独立的进程，同时实行殖民地开发计划，引领殖民地走向现代化，实则是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渗透，④增强英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在各项发展计划中，农业开发、教育、医疗、公共工程建设等是主要关注对象。黄金海岸女性教育经过战争期间的突出发展后，也成为殖民地发展的重要方面。

1946 年开发计划启动后，殖民地内女性教育工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表现。其一，殖民地内多所学院获得英国财政支持以用于改善学校设施，同时黄金海岸教育部门也有意为女性人员留出岗位。其二，殖民地内出现多项资助计划。1946 年，一项用于培养教育工作人员六年奖学金计划获得英国殖民地大臣的批准并获得 96000 英镑的扶助。参与该计划培养的人员可选择在阿奇莫塔学院或者英国作为培养地，也可二者都选，1946 年获得该奖学金的 32 人中，有一名是女性。⑤其三，女性初等、中等和师范教育的上升趋势仍旧存在。能够接收女性学生的学校不断增加，女性入学数量和入学率不断上升。1946 年，政府考虑将新的 25 所女子学院纳入援助名单，这其中既有初等学校，也有中等学校。1946 年 3 月，其中 17 所已经在名单中，政府希望另外 8 所学校可以在 1947 年或者 1948 年被囊括进去。

战后，黄金海岸逐渐由战时状态转为和平状态，殖民地的女性教育工作自身既有自主发展的意识，也有英国有意的扶持。虽然英国的发展计划意在延续黄金海岸作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角色，女性教育的发展也是其稳固殖民地统治的手段，但是英国殖民者在黄金海岸开展的女性教育工作促进了女性教育在黄金海岸的普及，使更多的女性有机会进入到学校中接受教育的洗礼，为黄金海岸女性教育的发展添加了新的动力。黄金海岸女性也由此提高了地位，社会发展有了新的生产劳动力。同时黄金海岸教育中男女平等观

①Djamila Aissat, Yasmina Djafri, "The role of colonial education in retrospect: The Gold Coast case in the era of imperialism," University of Abdelhamid Ibn Badis, 2011, p.8.

②虽然有一部分女性可以通过常规课程结业，并且走上就业（教师等）的道路，但是家政类课程依旧是她们的必修课程。

③非洲本土文化在殖民教育中遭受漠视的现象非常普遍，当这一现象进入到女性教育中时会产生代际影响。很多儿童在未入学时，多数时间由女性（母亲、姐妹等）照顾，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幼年时期接受的一部分知识由女性授予，而这部分知识的内容和水平由女性已接受的教育内容和水平决定，而本土文化若在女性教育这一环节漏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非洲文化的传承。

④刘光斌、宋飞：《二战后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演变（1945—1964）》，《广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 期，第 146 页。

⑤数据参考《1945—1946 年黄金海岸教育部报告》（*Report 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39-1940*,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1946.）。

念的推广以及对女性受教育权利的重视，推动了黄金海岸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未来经济的发展，这也成为英国在殖民地进行现代化的表现，成为战后英国维持在黄金海岸殖民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重要手段。但这些教育工作在服务英国的同时，也促进了黄金海岸的民族觉醒，冲刷了本就脆弱的殖民基础。1957 年黄金海岸独立后，随着殖民地发展计划的结束，英国在黄金海岸的女性教育规划也宣告终结。

参考文献

[1] Angela W. Browne, Hazel R. Barrett, "Female Edu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key to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27, No. 3(1991), pp.275-285.

[2] Audrey sitsofe gadzekpo, "Women's engagement with gold coast print culture From 1857 to 1957,"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2001.

[3] Theresa Tuwor, Marie-Antoinette Sossou,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education in West Africa: strategies for maintaining girls in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 Vol. 12, No. 4(2008), pp. 363-379.

[4] Djamila Aissat, Yasmina Djafri, "The role of colonial education in retrospect: The Gold Coast case in the era of imperialism," University of Abdelhamid Ibn Badis, 2011.

[5] Fiona Leach, "African girls,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 education and the patriarchal imperative," in *Gender Balance and Gender Bias in Education*, Routledge, 2013, pp.31-43.

[6] Ernestina Wiafe, "Western formal education in Gold Coast-Ghana: An overview of colonial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curriculum from 1919-1927," PhD diss.,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2021.

[7] 黄克衡.加纳：黄金海岸[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8]（美）戈京.加纳史[M].李晓东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9] 张经纬.英国殖民扩张对加纳土著社会的影响 (1553—1947) [J].新乡学院学报,2017,37,(07):56—58.

[10]（英）理查德·雷德.现代非洲史[M].王毅、王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生成式人工智能情境下大学生知识整合机制

王晨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江西省九江市 332000)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解释，如何转化为大学生自身的知识结构？本文属于概念性理论研究，以知识整合为主线，结合自我解释与生成性学习理论，区分外部表征、交互活动和个体理解。将尚未经学习者有依据接纳的概念、证据与适用条件联结界定为候选关系，提出原有理解显化、候选关系审查、自我解释重构和变式应用校验相互反馈的框架，并推导三个条件性命题。论证聚焦关系依据的判断、错误修订与近迁移校验，结果包括有依据的采纳、修订和审慎保留。本文从个体微观认知加工层面补充工具使用与交互记录研究，提出观测和教学评价方向。框架、命题及观测方向尚未经实证检验，全部课程例子均为假设情境。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学生；知识整合；自我解释；人机协同学习

DOI：doi.org/10.70693/202610073465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Generative AI Contexts

Wang Chen

Jiangxi Fenglin College of Foreign Economy and Trade, Jiujiang, Jiangxi 33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conceptual study asks how university students come to understand the explanations they obtain from generative AI. Knowledge integration provides its main perspective, supplemented by research on self-explanation and generative learning. The analysis separates external representations and interaction activities from individual understanding. Candidate relations are defined as links among concepts, evidence, and conditions of applicability that learners have not yet accepted on justified grounds. To examine how these relations enter learners' knowledge structures, the paper connects four processes: articulating prior understanding, examining candidate relations, reconstructing self-explanations, and testing understanding through near-transfer tasks. Learners may return to earlier judgments during this process; no fixed sequence is prescribed. The analysis addresses the grounds for acceptance, the correction of errors, and the use of near-transfer tasks to check understanding. Possible outcomes include justified acceptance, revision, and suspension of judgment. Three conditional propositions inform suggestions for future observa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assessment. By focusing on individual cognitive processing, the framework complements research on tool use and interaction records. The framework, propositions, and proposed observational measures have yet to be tested empirically. All classroom examples are hypothetical.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students; knowledge integration; self-explanation; human-AI collaborative learning

一、问题提出：得到解释之后，理解如何发生

在教育研究方法课上，可以设想这样一道题：某班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后，期末成绩有所提高，这是否足以说明新方法有效？学生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提问，很快得到一份完整解释，其中既有概念辨析，也有研究设计建议。读到这里，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但若继续追问：学生原来的基础不同怎么办？换一个班级，结论还能成立吗？能够复述答案的学生，未必说得清判断依据。这个为理论分析设置的情境提醒我们，获得一份有条理的说明，与形成能够解释和修正的理解，并不是

作者简介：王晨（1996—），女，硕士、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学生学习机制研究。

同一个问题。

已有研究分别从教学组织、互动方式和学习表现切入这一问题。陈静远等提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以知识点为核心的教学资源组织方式结合，以增强教学应用的针对性[1]。何珊云、沈演对大学课堂人机对话的研究发现，其样本以单轮互动居多，持续讨论和评价性话语相对较少[2]。这些研究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追问：资源被组织起来、学生参与了对话之后，哪些知识关系真正进入了学生的理解？互动记录可以呈现发生过什么，却不能仅凭提问次数说明理解发生了什么变化。

学习结果的研究呈现出不同方向。Kestin 等在大学课程开展的随机对照研究发现，经过专门教学设计的人工智能辅导，在所研究内容的学习测验中优于比较条件[3]。Bastani 等在土耳其高中数学课堂发现，缺少针对性教学约束的支持改善了辅助练习表现，却伴随后续独立考试表现下降；采用教学约束的条件未出现同样的显著下降[4]。两项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比较条件不同，不能直接对比效应大小，后者也不能直接推论大学生。这种结果差异提示，仅问“AI 是否有效”还不够，还需要认知层面的理论框架，解释不同支持方式为何可能产生不同的学习结果，而不能把差异一概归结为技术本身。

理论讨论已经注意到人机分工与学习过程的关系。钟柏昌、林小红围绕生成式自我调节学习讨论人技关系及学习循环的重构[5]；Nakamura 则从认知劳动分工解释人工智能支持下学习结果的差异[6]。在此基础上，仅强调“学生不能放弃思考”还不够。本文把分析进一步落到概念关系：系统已经组织好一套解释时，学生如何判断其中的联系、将其与已有认识接合，并在条件变化后重新组织解释？

本文属于概念性理论研究，以大学课程中的概念理解、理论比较和证据分析任务为范围，通过概念辨析与理论推导提出过程框架及条件性命题，不报告新采集的实证数据。文中课程例子均为假设情境，不是课堂观察或访谈材料；全部命题与框架尚未经实证检验。“大学生”限定分析对象，并不意味着这些认知过程只存在于大学阶段。

二、知识整合的理论基础与情境变化

（一）整合的对象不是信息数量，而是知识关系

Linn 与 Eylon 将知识整合放在学习者已有观点与新观点的联系中，强调辨析、组织并发展较为连贯的理解[7]。Linn 等关于科学教学与评价的研究，也关注学生能否建立具有解释意义的知识联系，而非只掌握孤立知识[8]。据此，本文将知识整合界定为：学习者围绕特定问题，依据相关证据和学科判断标准，建立、辨析、修正或暂缓接受概念联系的认知过程。理解并不因联系增多就一定更好。删除没有依据的联系，区分不能混同的概念，承认某个判断尚无充分证据，同样可能构成有意义的结构调整。

需要区分三个分析层面。外部表征指系统输出的文字、图示和解释框架；交互活动指学生的提问、比较、核验与修订；个体理解则指学生能够说明并运用的概念联系。前两者为观察学习提供入口，却不能直接替代第三者。一张漂亮的概念图可能只是良好的学习资源；反复修改图示，也未必触及关键关系。反过来，学生没有留下详尽的对话记录，并不能证明其没有学习。重要的是，外部材料怎样参与了理解的形成，而不是过程记录是否足够丰富。

候选关系：本文指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中，供学习者评判、尚未经其有依据接纳的概念—证据—适用条件联结。

这是服务于本文分析的工作性概念，强调外部解释在学习者判断中的暂定地位，并非认定这种关系只由 AI 产生。证据或条件未被明确写出时，其缺口本身就是审查对象。课程中的“某项证据支持某个结论”，不是两个术语之间的简单连线：学生需要说明为什么可以这样联系，又为什么不能随意延伸。“候选”既不预设输出错误，也不把未经理解的接受当作整合完成。

（二）自我解释为外部材料参与理解提供过程依据

知识整合视角说明学习者需要处理什么，自我解释研究则帮助解释这一处理怎样发生。Chi 等在八年级学生学习人体循环系统知识的研究中发现，引导自我解释有助于理解[9]。该结果不直接证明大学生使用人工智能时也会产生相同效果，但提供了可借鉴的过程依据：外部说明需要与已有知识建立联系，学习者对这种联系作出解释，可能参与其理解形成。

Fiorella 与 Mayer 关于生成性学习的研究，强调学习者主动组织材料并使之与先验知识发生联系，同时讨论相关策略的适用条件[10]。为避免名称相近造成混淆，本文将“生成性学习”专指学习者的认知加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技

术系统及其内容生成。系统写出推理，不等于学生进行了生成性学习；材料由系统首先提供，也不妨碍学生通过比较和解释形成理解。本文据加工主体与活动性质划定边界，不以是否使用 AI 来认定生成性学习是否发生。

（三）从获取信息转向审查已组织的解释

本文关注的人工智能使用情境有一项特点：系统不仅返回信息，还围绕提问组织概念联系，并在追问后继续调整解释。学生因此需要审查“已经被组织好的关系”。一段推论是否省略了条件？文字中的因果表达是否有相应证据？调整措辞后，问题是否真的得到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传统学习中从未出现过的，但在人机连续对话中，需要同时追踪答案的变化与学生认识的变化，不能默认二者同步。

认知卸载研究讨论人们如何借助外部行动或资源降低任务的认知要求[11]。这并不意味着把任务交给工具必然损害学习。记录材料、保留中间信息或整理结构，都可能为概念比较提供便利。判断应回到具体学习目标：若课程要求学生辨析证据与结论的关系，材料整理可以借助技术，整理后呈现的推论却仍需通过学习活动加以把握。外部支持是否有益，取决于它减轻了什么负担，又为学生保留了怎样的理解机会。

三、大学生知识整合的过程机制

外部解释进入个体理解，并不是一次信息复制。本文以原有理解显化、候选关系审查、自我解释重构和变式应用校验，分别分析比较起点、关系依据、解释组织和适用边界。四环节之间存在多重双向反馈，不是固定的教学步骤。变式应用校验发现困难时，可返回候选关系审查；若发现最初问题理解有误，还可重新显化原有判断。自我解释重构中暴露的依据缺失，也会再次触发审查。这些往返仅是理论上可能的联系，不是已经验证的必经路径。

（一）原有理解显化：留下可以比较的起点

学生以什么认识进入交互，会影响其能够比较什么。具备一定基础者可以辨析观点，不理解关键术语者则可能难以确定比较对象。专长反转效应研究指出，同一种指导方式对不同知识水平的学习者未必具有相同作用[12]。因此，分析不应只从系统输出开始，还要辨认学生已有的判断、直觉及疑问。

原有理解显化，是把与当前问题有关的认识转化为可以反思和比较的对象。这些认识不一定是完整命题，也可能表现为尚说不清的直觉或错误前概念。在本文的假设情境中，学生可能只是直觉上觉得“分数上去了，方法就有用”。对暂时难以解释者，可以先请其在两个对照案例间作判断、标出有把握与拿不准的部分，或借助图示和口头追问逐步说明理由。这些表现只是认识的线索，教师不能替学生补出一套理由，再把它当作学生原有理解。

显化不要求学生完整说出全部内隐认知，只需捕捉与当前问题相关的局部判断与疑问。基础薄弱者不必先独立写出完整答案。教师可提供必要术语和简短示例，再请学生说明已理解与未理解的部分。比较起点也可以在第一次交互后形成。保留一句初始判断，便能在后续讨论中追问“你的哪条理由变了”。发现证据不足后撤回判断，并说明撤回的理由，也可能是整合发生的线索。

（二）候选关系审查：把完整答案拆成可判断的联系

按照前述定义，审查候选关系，就是判断外部解释中的联系能否被有依据地接受。首先应辨识关系性质：系统是在描述共现、提出原因、作出类比，还是依据规则进行推论？这些联系需要不同支持。答案客观上正确，与学生知道它为什么正确，仍是两件事。

随后，核验需要落到具体依据和适用条件。“你确定吗”可以开启追问，却不是核验的终点。同一个系统再次给出相同结论，并不构成独立证据；一条文献确实存在，也不等于它支持当前判断。学生应能够回到课程材料、原始研究或教师提供的对照资料，检查证据究竟支持了哪一部分。对无法接近原始材料的情况，则应保留限制，而不是把确认次数当成可信程度。

在假设的研究方法任务中，可以把解释拆成三个相连的问题：材料呈现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将变化与教学方式联系起来，还有哪些解释未被排除。若证据只能支持“出现了变化”，系统却进一步作出因果判断，学生要修正的是证据与结论之间的联系，而不只是把语气改得委婉。若联系已有充分依据，审查也可以以接受结束，不必为了体现批判性而刻意反对。

关系审查可以导向有依据的采纳、修订后采纳，或证据不足时的审慎保留（suspension of judgment）。审慎保留不是含糊回避，而是标明尚不能判断的部分，并说明缺少何种证据、需要

核验什么。新解释与原有认识相容时，可以检查新增条件；出现分歧时，再比较双方依据。“保持质疑”的态度不能替代核验。

（三）自我解释重构：从认可理由到组织自己的解释

审查主要回答“为什么可以接受”，自我解释进一步回答“这些联系怎样组成我的解释”。两者往往交错：试着说明理由时会发现证据缺失，核验之后也可能重新界定问题。自我解释研究提供了新旧知识联结的过程依据[9]，但其在人工智能情境中的具体作用仍需检验。学生可以补出省略条件、比较替代解释，或画出局部关系图；图中连线表示什么、为何成立，仍应由学生说明。

学生改动了哪些字句，并不是判断重构的好起点。仍以前述任务为例，比较条件变化后，学生若能说清原结论为何需要调整，便提供了理解变化的线索。单纯替换语序或词语不能说明这一点，保留部分原句也不足以否定学习。要观察的是关键关系如何被重新组织，而非谁记得更多细节；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仍可查阅资料。

还需单独考虑 AI 给出错误解释的情形。系统可能错述研究的分组方式，也可能把材料中的相关关系写成因果关系。学生需要回到原始材料，核清事实前提与推论各自的问题，再追查哪些后续判断依赖这条错误联系。撤回错误联系、追查依据并重建解释，需要留下具体理由；仅让系统重新作答，原有误解可能仍在。重构时应交代哪些联系须放弃、哪些判断还能保留，并以可核验材料为据。暂时无法核验的部分，应暂缓判断，不以新答案的流畅程度代替核验。

学生自己的解释同样可能出错，甚至会把未经核验的联系组织得更连贯。因此，自我解释不是可靠整合的充分条件，须与反馈相连。智能辅导研究中的“帮助困境”关注何时提供或保留支持[13]，并不把支持越少等同于学习越主动。系统可提供局部追问、对照材料和纠错提示，但若修改理由仍被完整代写，就需另行判断学生是否参与了重构。

（四）变式应用校验：在条件改变时检视理解

学习中的即时表现不能直接替代对长期保持与迁移的判断[14]。本文重点讨论近迁移变式：保留课程领域和核心关系，只改变比较对象、证据来源或某项限定条件，检查学生能否调整判断。相较之下，远迁移涉及更大的情境、表征或任务距离，例如将课程中的证据判断方法用于陌生领域。远迁移需要额外知识和转换能力，本文不把它作为四环节成立的必要证明，也不由近迁移表现推定其已经发生。

在前述任务中，可保留主要研究材料，只改变比较条件，请学生说明哪些判断仍然成立。只换措辞而不变知识关系，容易测到答案熟悉程度；同时改变过多条件，又不易定位困难。本文的变式设计因此首先服务于对关键关系的检视，而不是追求高难度跨学科应用。

应用中的困难可以使学生返回证据审查，必要时重新界定问题。反馈应指出哪条关系缺少依据，而不只给出对错。Hattie 与 Timperley 指出，反馈作用与其类型和提供方式有关[15]。学生不理解关系本身，与理解关系却漏看条件，需要不同反馈。前者可能要回到概念辨析，后者则宜重新比较条件；不能把每次错误都处理为重看一遍完整答案。

一次答对不足以说明理解稳定，表达不流畅也未必意味着整合失败。可结合关系说明、修订记录和适当延迟后的近迁移表现判断。四环节的结束并不要求得到一个毫无疑问的答案：形成可靠联系、修正不当联系和有理由地保留判断，均可能是结果。若只有外部答案改善而缺少个体理解证据，则不能直接认定整合已经完成。

四、机制的成立条件与理论命题

（一）知识基础、任务要求与支持方式的匹配

知识基础须与判断任务相匹配。不了解关键概念时，增加核验要求可能只增加无目标搜索，专长反转效应为这种适配提供了依据[12]。对基础不足者，可先给出概念说明和有限的证据；对已有基础者，再增加比较替代解释和识别边界的要求。显化与审查不应成为只有表达熟练者才容易完成的形式任务。

本文三个命题共同限定于大学课程的概念理解、证据分析和理论比较任务，不直接适用于以动作熟练度、程序自动化或机械记忆为主要目标的技能训练和背诵任务。不同课程的判断标准也需保留：证明任务关注推导规则，经验研究关注证据与推论的匹配，文本阐释需要说明材料与解释的联系。共同要求是依据可说明，而非所有学科共享一套答案标准。

审查还需要可理解的证据入口。仅要求“批判性思考”，却不给出可核验材料，学生仍可能在系统的多次回答之间循环确认。模型输出质量

也应纳入条件分析。事实准确性、逻辑有效性、解释完整性和证据可核验性，都可能改变审查难度。后续研究宜记录模型版本、提示和实际输出质量。不能仅依靠大模型名称假定输出质量，也不能将使用不同模型带来的学习表现差异简单归因为学习者认知加工水平。

动机与元认知能力可作为待检验的调节因素：学生是否愿意继续核验，是否意识到自己只是读懂措辞，可能影响其是否进入或返回某一环节。这里不把它们视为已证实路径，也不将照搬答案简单归结为懒惰。若任务只要求交付完整文本，学生的加工选择还可能受到评价要求影响。自我效能与求助方式的关系，也留待后续研究专门处理。

支持应减到什么程度，须看学生当前能完成哪些判断。Renkl 与 Atkinson 讨论过示例学习向问题解决过渡时支持形式的调整[16]。这一思路可用于区分完整解释、局部补全与自主组织：它们回应不同的理解状态，问题不只是是否允许使用 AI。尚不理解基础关系的学生，若过早失去支持，可能只是多作无效尝试；已经掌握这些关系后，持续接收成品解释也未必有助于当前任务。因而，调整要依据学生的实际判断，而非对话累计了多少轮。

（二）三个条件性命题及其观测方向

以下命题及拟观测方向均属理论推导，尚未经过实证检验。观测内容仅为操作化建议，不构成可直接使用的成熟量表或编码工具。

命题一（关系审查）：在系统输出、学习时间和基本任务条件相近，且学生能够理解证据的情况下，审查概念关系的依据与适用条件，相比只评价答案完整性和表达质量，更可能改善后续独立解释与近迁移表现。其推导依据是加工对象与后续判断要求相匹配。

观测重点：可沿着一条候选关系追踪学生的判断，查看其是否辨清关系性质、核对证据能支持什么、补上适用条件，以及据此作出修订。再以独立解释的准确性、依据充分性和延迟近迁移表现，考察理解是否变化。对话轮次、答案长度与完整度可另行记录，但不能单凭它们认定发生了关系审查。比较设计仍需平衡或控制先验知识、阅读能力与练习时间。上述内容只是拟观测方向，尚不是经过信效度检验的编码工具。

命题二（解释—反馈匹配）：自我解释对可靠知识关系形成的作用，受到先验知识与纠错反馈的共同限制。对于缺少关键概念的学生，仅增加解释要求而不给予适当反馈，未必优于提供清晰示例。解释能暴露认识，却不能自行保证正确。

观测重点：比较反馈前后的错误定位、错误联系撤回、依据补足及解释重组，区分措辞修改与关系修订。结果考察错误联系是否在后续判断中重现。须记录基线概念掌握、反馈准确性与针对性及任务难度。解释篇幅、自报投入或反馈条数不能直接代表整合质量。以上仅为拟观测方向，并非经过信效度检验的编码工具。

命题三（支持调整）：本命题比较两种支持安排，即持续提供完整答案，或依据学生表现逐步减少成品解释，同时保留必要提示和反馈。对已能完成基础关系判断、但近迁移应用尚不稳定的学生，后一种安排更可能促进关键知识关系的独立重建。基础不足或任务难度明显提高时，这一推论不直接适用。

观测重点：先记录支持何时开始撤减、提示具体到什么程度，以及学生实际怎样使用支持，再比较其前后对关系的说明、延迟独立重建和近迁移表现。总学习时间、材料、任务难度与教师额外帮助须保持可比。少求助不等于理解更好；如果学生只是增加了无效尝试，却未重新组织关系，就应重新考虑支持安排。这里列出的是拟观测方向，并非已完成信效度检验的编码工具。

后续研究需制定学科化编码规则，检验信度与效度，包括评分者一致性。还需区分干预是否引出审查、审查是否关联理解变化。对话轮次等过程变量不自动等于因果意义上的混淆变量，不宜不加区分地纳入统计控制。整体方案有效，也不足以证明所有环节及其循环关系均成立。

五、理论贡献与教学启示

（一）将人机分工落实到关系的判断与修订

相对于知识整合研究对观点辨析和联结的关注[7]，本文把系统预先组织的概念—证据—条件联结作为需要再次判断的对象。增量不在于换一个名称，而在于把外部答案与个体理解之间的距离落实为可分析的关系变化。整合质量不能只用联系数量和叙述连贯性描述，还要看学生是否掌握依据、边界及修订理由。

认知劳动分工研究讨论哪些加工由学生或系统承担[6]，本文进一步追问学生对加工结果形成了什么认识。系统先给出解释，不排除学生随后通过核验与重构学习；学生亲自写出答案，也不保证关系可靠。将审慎保留纳入结果，有助于区

分“知道证据还不够”与“尚未理解问题”，避免把表面的确定性当作成熟理解。

与国内研究的对话也应落实到具体问题。何珊云、沈演提出加强对 AI 回答的反思[2]，钟柏昌、林小红讨论人技协同中的学习循环[5]。本文承接这些讨论，将批判性使用具体化为辨识关系性质、核验依据和检查适用边界。它不是另建一套批判性思维理论，也不涵盖批判性思维的全部内涵，而是为课程中的反思要求提供较小的分析单位。删去一条无依据的断言，可能比增加一段流畅评论更能显示认知变化。

（二）围绕关键关系安排教学与评价

【拟议假想作业，尚未开展教学实践】以大学教育研究方法课为例，可用一份教学方式与成绩变化的简短材料布置作业。学生先留下对研究效度的判断，文字表达有困难时，也可画图或口头说明。读过 AI 分析后，选出其中三条影响结论的候选关系，逐条写明依据、适用条件和未决问题，再据此重构自己的分析，交代哪些判断保留、哪些撤回。随后，教师改变一项比较条件，让学生重新判断；下一次课再提供另一道近迁移题，作简短校验。

作业的组织顺序不必成为认知活动的固定次序。学生查阅材料时可以返回最初的问题，重构解释时也可能再次核验；遇到 AI 出错，要留下据何纠错的说明。核验材料可由教师预先审核提供，避免把任务变成无边界检索。提交物保持简短即可，包括自己的分析和关键修订记录，不需要另交一份完整对话汇编。

一份 AI 辅助报告能说明作业完成得怎样，却不能单独回答学生理解了什么。考核宜把两类证据分开：人机合作产出物关注文本组织、材料使用和任务完成；个体知识整合则看学生能否解释核心关系、指出尚不确定的部分，并在条件改变时调整判断。只收最终文本，评分就可能混入模型输出质量。

具体评价时，可从报告中选一条关键关系作简短口头追问，或给出近迁移任务，再与学生的修订记录对照。图示等适当表达形式同样可以使用。两类成绩如何加权，应由课程目标决定；一次脱离工具的测验也不能概括全部学习。文本像不像 AI 写的，则不宜作为判断知识整合的依据。

这些安排仍是待验证的设计建议。后续可借鉴 Sandoval 的推测映射思路，将设计特征、中介过程与学习结果分别检验[17]：核验提示是否引出关系审查，关系修订是否对应后续理解变化。研究还需观察审查未发生、反馈未被采纳或修订产生新错误的情形，才能辨认机制边界。

六、结语

本文从外部解释如何进入个体理解出发，以候选关系为分析单位，提出四环节之间的反馈联系及三个条件性命题。论证关注的不是 AI 把答案组织得多好，而是学生能否说明关系的依据，发现问题后是否能够修订。人机之间不必保持固定距离，但协同产出与个体理解应分别获得证据。

研究局限

本文目前能够提供的是概念解释与理论推导，框架、命题和拟议观测方向都还未经过实证检验。文中课程例子只是说明机制的假设情境，没有相应的课堂观察或访谈资料作为依据。分析限于大学生的概念理解、证据分析与理论比较任务，因而尚不能确认其对中小学生、技能型课程、机械记忆任务或远迁移是否适用。另一个边界是分析层次：这里讨论的是个体认知加工，课堂社会互动、同伴讨论及师生对话如何参与知识整合循环，尚未纳入。

动机、元认知、自我效能和模型输出质量虽被列为可能条件，其调节路径尚未形成或检验。后续可在相近任务和输出条件下，考察动机与元认知是否影响学生启动审查及返回核验；也可保持材料和提示相近，比较不同输出质量条件下的关系修订与延迟近迁移表现。研究仍须记录实际输出，不能只按模型品牌分组。检验应兼顾支持与反证，尤其需要解释审查已发生而理解未改善的情形。

参考文献：

[1] 陈静远, 胡丽雅, 吴飞.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以知识点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变革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7): 177-186.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3.07.016.

[2] 何珊云, 沈演. 学会提问：大学生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学习模式的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5, 43(2): 34-48.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2.004.

[3] KESTIN G, MILLER K, KLALES A, et al. AI tutoring outperforms in-class active learning: an RCT introducing a novel research-based design in an authentic educational setting[J]. Sc

ientific Reports, 2025, 15: 17458. DOI: 10.1038/s41598-025-97652-6.

[4] BASTANI H, BASTANI O, SUNGU A, et al. Generative AI without guardrails can harm learning: evidence from high school mathematic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5, 122(26): e2422633122. DOI: 10.1073/pnas.2422633122.

[5] 钟柏昌, 林小红.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学习的革命”：生成式自我调节学习[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6, 44(1): 44-55.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6.01.004.

[6] NAKAMURA D. Augmentation or erosion? Regulating cognitive offloading in generative AI-supported STEM learning[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26, 38: 124. DOI: 10.1007/s10648-026-10224-6.

[7] LINN M C, EYLON B S. Science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taking advantage of technology to promote knowledge integr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DOI: 10.4324/9780203806524.

[8] LINN M C, LEE H S, TINKER R, et al. Teaching and assessing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science[J]. Science, 2006, 313(5790): 1049-1050. DOI: 10.1126/science.1131408.

[9] CHI M T H, DE LEEUW N, CHIU M H, et al. Eliciting self-explanations improves understanding[J]. Cognitive Science, 1994, 18(3): 439-477. DOI: 10.1207/s15516709cog1803_3.

[10] FIORELLA L, MAYER R E. Eight ways to promote generative learning[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16, 28(4): 717-741. DOI: 10.1007/s10648-015-9348-9.

[11] RISKO E F, GILBERT S J. Cognitive offloading[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6, 20(9): 676-688. DOI: 10.1016/j.tics.2016.07.002.

[12] Kalyuga S. The expertise reversal effect[M]//Managing cognitive load in adaptive multimedia learning. IGI Global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9: 58-80.

[13] KOEDINGER K R, ALEVEN V. Exploring the assistance dilemma in experiments with cognitive tutors[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7, 19(3): 239-264. DOI: 10.1007/s10648-007-9049-0.

[14] SODERSTROM N C, BJORK R A. Learning versus performance: an integrative review[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10(2): 176-199. DOI: 10.1177/1745691615569000.

[15] HATTIE J, TIMPERLEY H. The power of feedback[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7, 77(1): 81-112. DOI: 10.3102/003465430298487.

[16] RENKL A, ATKINSON R K. Struct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example study to problem solving in cognitive skill acquisition: a cognitive load perspective[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3, 38(1): 15-22. DOI: 10.1207/S15326985EP3801_3.

[17] SANDOVAL W. Conjecture mapping: an approach to systematic educational design research[J].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2014, 23(1): 18-36. DOI: 10.1080/10508406.2013.778204.

成都市新都区校园心理异常学生群体数智防控及体育干预研究

郭靖祥[1] 沈鑫[2] 杨司涵[2] 魏同婷[3]

(1.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四川资阳 641300；2.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成都 610500；3.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甘肃甘南 747000)

摘 要：青少年心理异常问题已成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现实议题。儿童青少年时期既是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心理卫生问题的高发时期，我国学龄儿童青少年心理异常患病率较高，应加强心理健康防治与早期干预。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调查法等方法，对成都市新都区的 800 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研究发现新都区校园心理异常学生群体检出率为 8.01%，主要表现为抑郁、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等。同时“教联体”作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有效载体，为心理异常学生体育干预提供了组织联动、资源整合和场景延展的现实基础，且体育锻炼作为非药物、低成本、易推广的健康促进方式，在改善青少年抑郁、焦虑、心理困扰等方面具有积极价值。

关键词：教联体；青少年心理异常；SCL-90 量表；运动干预促进

基金项目：成都市新都区社科联合会 202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都市新都区校园心理异常学生群体数智防控及体育干预研究）

DOI：doi.org/10.70693/202610072612

Research on Digital Prevention and Sports Intervention for Students with Psychological Abnormalities in Schools of Xin du District, Chengdu

Guo Jingxiang[1], Shen Xin[2], Yang Sihan[2], Wei Tongting[3]

1 Ziyang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iyang, Sichuan 641300, China; 2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3 Gansu Minzu Normal University, Gannan, Gansu 747000, China

Abstract：Mental health issues among teenagers have become a significant real-world concern that affects both students'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re key stages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growth, but they are also high-risk periods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e rate of mental health issues among school-aged children and teen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high, so it'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prevention, early intervention, and mental health care. This study used methods like literature review, survey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o sample 800 students in Xindu District, Chengdu.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detection rate of students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in

作者简介：郭靖祥（1996—），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领域：体育教育训练学
杨司涵（1999—），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领域：体育教育训练学
沈鑫（2000—），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领域：体育教育训练学
魏同婷（1998—），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领域：体育教育训练学
通讯作者：沈鑫

Xindu schools was 8.01%, with common problems including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ensitivity in social interac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Educational Alliance' serves as an effective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hoo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providing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sports-based interventions for students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extended activity settings. Moreover, sports exercise, being a non-drug, low-cost, and easily promoted way to boost health,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easing depression, anxiety,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in teenagers.

Keywords: Educational Alliance; Teen Mental Health Issues; SCL-90 Scale; Promoting Through Exercise

青少年心理健康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学校健康教育力度，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要求[1]。众多研究显示，我国学生心理问题正朝向低龄化趋势恶化发展。在《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4-2025）》调研中这类情况尤为凸显，《2025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学业状况调查报告》研究中显示[2]，在无抑郁风险的青少年中，经常或每天不想上学的比例不到 5%；而在有抑郁风险的青少年中，这一比例分别飙升至 20.2%和 45.4%，农村和留守子女中比例更高。数据表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从个体困扰演变为需要系统干预的公共卫生议题。基于此，研究立足于学生心理异常的现实问题，通过对存在心里健康问题的青少年进行体育干预展开研究。

一 新都区青少年学生心理异常群体 SCL-90 量表抽样调查分析

（一）抽样设计与研究方法

科学合理的抽样设计师保障调查结果真实性与研究结论可参考性的前提，研究立足与成都市新都区，为考虑到调查对象的特殊性、学校的可及性、调研时间安排及学生的配合意愿等实际条件，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能配合研究的学生为主要调查对象。依照心理测量学中样本量条目数应为 2 倍及以上，本次调查共计发放 800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787 份，有效回收率 98.38%。如，表 1。

表 1 问卷发放情况表（N=187）

	发放量	回收量	有效回收率	心理异常人数	异常率
数据	800 人	787 人	98.38%	63 人	8.01%

（二）SCL-90 量表测评结果与数据分析

在本次调研中，共有 63 人被测出心理异常，其主要症状是包括强迫症、抑郁、焦虑、偏执等心理问题。根据调研结果显示：（1）新都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集中在躯体化不适、强迫症、人际关系之间的敏感和自我情绪焦虑等方面，成都市新都区校园心理异常学生群体在偏激方面与全国青年的整体水平基本一致。（2）学生心理问题逐渐呈现低龄化发展，小学低龄化的学生群体与中学学生几乎有着追赶持平的迹象。（3）人际适应困扰、强迫思维和躯体化不适是该区域青少年心理异常的主要表现维度。

综上，成都市新都区校园心理异常群体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的干预难以对心理异常学生奏效，需要探索新的系统性干预体系。

二 新都区青少年学生心理异常群体的表现特征

（一）青少年学生心理异常群体的共性特征

青少年心理异常学生群体的体育干预首先不是单项活动设计问题，而是政策执行体系的再组织问题。2025 年教育部办公厅《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将每天综合体育锻炼两小时加入到心理健康工作体系之中。研究认为，青少年心理异常学生通常表现出三类共同倾向。一是发生阶段具有发展敏感性，儿童青少年时期既是身心发育的关键期，也是心理卫生问题的高危期，学习问题、情绪问题、品行问题以及青春期心理行为问题均可能在这一阶段集中显现[3]；二是心理异常表现往往不是单一症状，而是情绪、认知、行为和社会适应的复合性失衡，常表现为焦虑、抑郁、压力感增强、心理困扰、注意力下降、同伴交往回避、现实归属感不足等；三是心理异常与青少年身体发展、脑发育和社会环境高度交织，青春期脑结构和脑功能处于快速重塑阶段，内外环境变化叠加学业压力、家庭关

系和数字媒介影响，使该群体更易受到抑郁、焦虑等精神卫生问题侵扰。

（二）新都区青少年学生心理异常群体的特征解构

不同类型学生呈现出差异化表现：抑郁倾向学生多表现为情绪低落、活动兴趣减退、自我评价降低、社会参与意愿不足，其背后可能伴随海马、杏仁核、前扣带皮层等脑结构和默认模式网络等功能连接异常[4]。焦虑倾向学生则更突出紧张、担忧、压力敏感和过度警觉，常在考试、人际交往和身体表现评价中放大不安全体验。网络成瘾或网络游戏成瘾学生具有更明显的行为依赖和现实替代不足特征，相关研究指出，网络成瘾不仅表现为反复使用网络、难以克制、耐受性增强和退瘾反应，还会造成体力缺乏、生理功能下降、免疫力下降、肥胖等躯体问题，并在认知层面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缓，在非认知层面表现为焦虑、抑郁、社交回避甚至自杀意念等风险[5]。如表 2 所示，心理异常的学生因不同的类型所表现的行为与认知特征是不一样的，而他们的躯体和社会功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在抑郁倾向学生之中，核心问题在于“行为激活不足”，表现为活动减少和社交退缩；而焦虑倾向学生的核心问题在于“生理唤醒过高”，表现为紧张警觉和回避行为。这种差异化特征决定了体育干预不能“一刀切”，而应根据心理异常类型匹配不同的运动处方。

表 2 新都区青少年学生不同心理异常类型的特征表现

心理异常类型	核心情绪表现	认知与行为特征	躯体与社会功能影响
抑郁倾向	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自我评价降低	消极归因、注意力下降、决策困难	活动减少、社交退缩、睡眠食欲改变
焦虑倾向	紧张担忧、压力敏感、过度警觉	灾难化思维、回避行为、完美主义	心悸出汗、肌肉紧张、考试发挥失常
强迫倾向	反复思虑、不安感、控制欲强	强迫观念、重复行为、仪式化动作	时间消耗、效率下降、同伴关系紧张
人际敏感	自卑胆怯、被审视感、交往焦虑	过度解读他人评价、社交回避	同伴关系不良、孤独感、班级融入困难
网络成瘾	快感依赖、戒断烦躁、现实疏离	注意力分散、时间感知扭曲、冲动控制弱	体力下降、作息紊乱、学业成绩下滑

（三）青少年学生心理异常群体的特征因素解构

青少年心理异常学生群体的生成具有明显的多因素耦合特征。其一是个体发展因素，青春期脑发育敏感性、情绪控制能力尚未成熟、自我认同尚不稳定，使学生在面对压力事件时更容易出现心理波动[6]。其二是学业与评价因素，考试竞争、升学压力、成绩排名和单一评价方式容易放大青少年的失败体验和自我否定感[7]。其三是家庭因素，亲子沟通不足、过度学业期待、家庭运动氛围缺失和情感支持不足，会削弱学生的心理安全感。其四是学校因素，若学校体育、心理健康教育和班级支持之间缺乏联动，心理异常学生就难以在日常教育场景中获得持续支持[8]。

三 青少年心理异常学生群体的体育干预机制

（一）构建执行体育锻炼干预政策体系

青少年心理异常学生群体的体育干预首先不是单项活动设计问题，而是政策执行体系的再组织问题。2025 年教育部办公厅《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则将“体育每天 2 小时”直接纳入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提出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2 小时，开展班级赛、年级赛等全员性体育比赛，并鼓励学校与社区合作开放周边运动场馆。同时，成都已基本形成以 22 个区（市）县二级心理维护中心和 1121 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为支撑的三级心理健康服务网络。成都市第四十中学校公开分享过“家校社+医警”五方协同教联体经验，通过家庭、社区、医院和警方资源整合，建立“四预机制”和“4321 心理健康守护体系”，定期开展五方联席研判、家长培训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二）构建体育锻炼干预方案体系

从公开案例看，当前国内已有一些可资借鉴的实践雏形，但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心理异常

类型识别—运动处方匹配—家校社协同执行—心理效果追踪”的标准化模式。建立“心理类型—运动处方”匹配机制。对抑郁倾向学生，重点采用中低强度有氧运动、户外步行、慢跑、骑行、同伴陪伴运动和小目标达成训练，对焦虑学生，重点采用瑜伽、太极、八段锦、节律跑、呼吸放松训练和低压力体能游戏，核心目标是降低生理唤醒和评价焦虑。对于网络成瘾学生，可强化篮球、羽毛球、足球、定向运动等具有现实互动和规则体验的项目；对于社交退缩学生，则宜从双人合作、趣味游戏、小组任务逐步过渡到团体运动。其次，通过家庭、学校、社区同步进行执行发展，核心目标是通过行为激活增加积极体验，最后运用可穿戴智能设备进行心理评估追踪。如表 3。

表 3 心理治疗表

心理风险类型	主要干预项目	核心改善表现
抑郁倾向	慢跑、户外步行、同伴陪伴运动	情绪低落减少，活动兴趣增强
焦虑状态	八段锦、瑜伽、节律跑、呼吸放松	紧张感下降，睡眠改善
网络依赖	篮球、羽毛球、足球、定向运动	屏幕时间减少，现实互动增加
社交退缩	趣味游戏、双人合作、小组任务	主动交流增加，回避行为减少

（三）构建体育锻炼干预运行机制

体育锻炼干预运行机制的核心，不在于把心理异常学生简单纳入体育活动，而在于建立“早发现、可分层、能处方、有反馈、可评价”的闭环治理体系。据此，青少年心理异常学生群体的体育锻炼干预运行机制可设计为“五环闭合”模式：由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共同参与，综合观察学生心理测评结果、体育参与状态、睡眠情况、同伴关系等变化，将学生心理异常风险提前识别，应依据学生心理风险程度、运动适宜性和社会支持状况进行分类管理，轻度的可接受运动干预处理，高危的则需优先转入医学通道，并在专业评估后决定是否配合运动干预支持；运动处方实施后，应建立持续反馈与动态调整机制。学校负责课内外体育干预的组织，家庭承担亲子运动、作息管理和情感支持，社区提供运动空间和社会体育指导，专业机构参与心理督导和风险评估；最后引入 RE-AIM 框架进行综合评价。

四 结束语

“教联体”视域下心理异常青少年学生运动干预，应从单一体育活动转向家校社医协同的健康促进体系。本文基于青少年心理异常群体的共性与个性特征，提出政策执行、方案设计与运行机制三维路径，强调通过分层分类运动处方和“五环闭合”机制提升干预的精准性与持续性。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仍受方便抽样方法和样本规模限制，调查结果主要反映是的调查样本的具体情况，尚且不能代替成都市或者全国的总体健康水平，且干预周期追踪及不同心理学生类型的调查没有做扎实，未来研究可以在两个地方进行深入调查，（1）加强样本量，扩大样本来源（2）引入纵向追踪设计，探索长期效应（3）探索人工智能和可穿戴设备在心理异常康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EB/OL]. (2016-10-25) [2026-10-03].

[2] 陈歆棠.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蓝皮书 2025：现状、影响因素与改善对策[EB/OL]. 百度动态，(2025-11-27) [2026-10-03]

[3] 司琦,金秋艳.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干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03):67-74.

[4] 丁文清,周苗,宋菲.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 Meta 分析[J].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7,39(07):785-791.

[5] 杨管,何炳辰,王尧,王锦福.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体育锻炼干预机制构建及实现路径——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的分析视角[J].体育与科学,2025,46(03):78-87.

[6] 王小春,张铭港.体育锻炼预防和改善青少年抑郁的前沿证据与展望[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5,49(04):30-40.

[7] 王建虎,刘巳丹,李雅婷,姜玉琴.数智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作用机理及实践向度——基于协同理论“三大原理”视角[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6,38(02):71-81.

[8] 代薇,曹义兰.评价引领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的应为与何为[J].中国教育学刊,2026,(02):69-75.

深度学习理念下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建构模式研究

——以《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例

周颖芳[1] 张健[1] 王丽萍[1] 程瀚锐[1]

(1.唐山师范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

摘　要：师范生公共课普遍面临内容的规范性、情境的稀缺性、课时的压缩性三重困境，导致学生停留于浅层记忆，难以实现深度学习。本研究以深度学习理论和师生学习共同体理论为理论基础，针对师范生公共课的特殊约束，建构了“一核·三维·三导向”师生学习共同体模式。该模式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目标，以情感共鸣、多元化教学、认知飞跃为三维机制，以任务驱动、问题导向、成果导向为三条实施路径，依托线上线下混合环境实现师生双边活动的协同共振。研究表明，该模式在理论上回应了两种理论在特殊场域中的适用性困境，在实践上为师范生公共课提供了一套兼顾理论根基与操作性的教学设计框架。希望此模式能够为师范生公共课的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照，并在后续研究与实践中不断完善。

关键词：深度学习；师生学习共同体；师范生公共课；教学模式；混合学习

基金项目：唐山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25JGYB063），深度学习理念下的师生学习共同体建构模式研究——以《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例

DOI：doi.org/10.70693/202610145919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Teacher-Student Learning Community under the Concept of Deep Learning

——Taking Educational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as an Example

Zhou Yingfang[1], Zhang Jian[1], Wang Liping[1]Cheng Hanrui[1]

[1]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Hebei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Public courses f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generally face three dilemmas: the prescriptive nature of content, the scarcity of authentic situations, and the compression of instructional hours. These challenges lead students to remain at the level of rote memoriz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deep learning.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deep learning and teacher-student learning communit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One Core, Three Dimensions, Three Orientations" teacher-student learning community model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constraints of public courses for normal university

作者简介：周颖芳(1996—)，女，教育硕士，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及教育学；
张　健(1985—)，女，教育学博士，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及教育学；
王丽萍(1980—)，女，教育硕士，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及师范生专业发展。
程瀚锐(2005—)，女，本科在读，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通讯作者：周颖芳

students. The model takes deep learning as its core goal, employs emotional resonance, diversified teaching, and cognitive leap as the three-dimensional mechanisms, and adopts task-driven, problem-oriented, and outcome-oriented approaches as the thre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It relies on an online-offline blended environment to achieve synergistic resonance in bilateral teacher-student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model theoretically responds to the applicability dilemmas of the two theories in special contexts, and practically provides a teaching design framework that balanc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operability for public courses f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t is hoped that this model can offer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ublic courses f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in subsequ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Keywords:deep learning; teacher-student learning community; public courses f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teaching model; blended learning

一、引言

当前师范生公共课教学面临着一组相互缠绕的结构性困难。以《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课程为例，其教学内容以法律法规条文和政策文件为主体，规范性极强，却天然缺乏叙事性和情境感；学生在课堂上面对的是一系列抽象的“应当”与“不得”，而非鲜活的教育现场。与此同时，该课程在培养方案中通常仅分配 16 至 32 学时，要在如此有限的课时内完成从“教育法基本理论”到“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多个模块的教学，教师不得不采用“快速覆盖”的策略，学生则被迫进入“记条文、背考点”的应试轨道。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师范生正处于从“学生”向“教师”过渡的身份转换期，他们对教育政策的敏感度和对师德问题的判断力尚未建立，同时缺乏足够的教育见习和实践经验来支撑对政策文本的理解。于是，课堂上常见的景象是：教师在讲台上逐条解读法条，学生在座位上低头划书、拍照留存，师生之间鲜有真正的对话与碰撞。这种“教师讲条文、学生背考点”的浅层学习状态，使得课程本应承担的法治素养培育与师德信念内化功能大打折扣——学生或许记住了“不得体罚学生”的规定，却未必理解“教育惩戒”与“体罚”的边界在哪里；他们能背诵《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条目，却难以在模拟情境中做出合理的师德判断。[1]

上述两重困境——内容上规范性与情境性的断裂、课时上广度与深度的冲突——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当前教学缺乏一个能够将“法条理论学习—师德意义建构—法治素养提升”贯通起来的整合性框架。现有教学模式下，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学生是知识的接收者，整个过程遵循“教师讲授—学生记忆—考试复现”的单向逻辑。教学目标偏重知识再现，评价方式以传统纸笔测验为主，即使引入相关真实法律案例，课堂上也缺失支持深度参与、协同建构和过程诊断的有效机制。学生在课堂上看似“学了”，实则只是将法条暂时存放在短期记忆中，课程结束后很快遗忘，更谈不上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法治素养和师德信念。

深度学习理论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方向。深度学习强调学习者在教师引领下，围绕挑战性主题实现主动参与、深层理解、知识迁移与高阶思维发展，而非机械记忆与表面完成。[1][2] 这意味着，学生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法条罗列，而是一个能够帮助他们将零散的政策知识整合为判断框架、并在具体情境中加以运用的学习过程。师生学习共同体则被证明是承载深度学习的有效组织形态：它通过共同愿景、平等对话与协作反思，使课堂从“教知识”转向“共同成长”。[3][4] 在共同体中，教师不再是唯一的权威信息来源，而是与学生一起围绕真实问题展开探究的引导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在对话、合作与反思中主动建构意义的参与者。

既有研究已提出“共同愿景—对话认知—支持环境”的双螺旋框架，并论证了师生学习共同体在情感、认知、教学三类功能上的实现机制。[5] 情感功能指向学习意愿的激发，认知功能指向深层理解的发生，教学功能指向学习过程的组织与引导，三者协同运作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度学习生态。然而，既有成果多面向跨学科通识课程或本科专业课程，较少落脚于师范生公共课这一“政策规范密集、实践情境稀缺、课时刚性压缩”的特殊场域。师范生公共课有其独特的约束条件：课程内容以规范条文为主，天然缺乏情境土壤；课时紧张，难以开展耗时较长的探究活动；学生缺乏一线实践经验，对政策文本的理解容易

停留在字面。这些约束意味着，通用的共同体模式不能直接移植，而需要针对性地进行改造和适配。

因此，本研究以《教育政策法规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课程为载体，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师范生公共课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个“一核·三维·三导向”的师生学习共同体模式。该模式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目标，以情感共鸣、多元教学、认知飞跃为三维机制，以任务驱动、问题导向、成果导向为三条实施路径，在线上线下混合环境中实现师生双边活动的协同共振。本研究旨在回应三个问题：第一，深度学习与师生学习共同体之间存在何种逻辑关联？第二，师范生公共课语境下，“一核·三维·三导向”模式应如何具体建构？第三，该模式在实际教学中能否有效促进师范生从浅层记忆走向核心素养发展？

二、核心概念与逻辑关系

2.1 深度学习：从知识接收到意义建构

深度学习的概念源于瑞典学者马顿和萨乔（Marton & Säljö）对学习者信息加工方式的经典研究，他们根据学生处理学习内容的不同方式，区分了浅层加工与深层加工两种取向。国内学者何玲、黎加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深度学习的教育学含义，将其界定为“在理解的基础上批判地学习新知识，将新知识与原有认知结构融合，并在新情境中实现知识迁移与问题解决”的学习形态。[2] 这一界定揭示了深度学习的三个关键特征：理解性、整合性与迁移性。

刘月霞、郭华则将深度学习置于课堂教学的实践语境中，提出深度学习是“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学习过程”。[1] 他们特别强调，深度学习不等于学习内容的难度叠加，而在于学习发生的质量——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知识的内在逻辑，是否能够将知识运用于新的情境，是否在认知、情感和行动上实现了统整参与。

综合上述研究，本研究将深度学习在师范生公共课语境中操作化为三个维度：一是理解的深度，学生能够透过对法条的字面记忆，把握政策背后的立法意图和价值导向；二是参与的深度，学生以主动的姿态投入学习活动，而非被动接受教师的单向输出；三是迁移的深度，学生能够在模拟或真实的教育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做出合理的判断与决策。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深度学习在师范生公共课中的操作性定义，也为后续的模式建构提供了目标参照。

2.2 师生学习共同体：从教学组织到成长生态

师生学习共同体的理论根基可以追溯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脉络，以及维果茨基关于“最近发展区”与社会建构的论述。日本学者佐藤学在此基础上，将学习理解为“与客观世界对话（认知性实践）、与他人对话（社会性实践）、与自我对话（伦理性实践）”的三重对话过程，并主张学校应当成为以倾听、合作、反思为基调的学习共同体。[3][4] 在这一视野中，学习不再是个体头脑中的信息加工，而是在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协商与共建中发生的意义建构过程。

在高等教育的语境中，师生学习共同体被赋予了更具操作性的内涵。董庆华、郭广生将其界定为“师生围绕共同的学习愿景，通过对话、合作与反思等互动方式，实现知识共建、能力发展与价值认同的学习组织形式”。[5] 他们进一步提出，一个有效的师生学习共同体需要同时发挥三种功能：情感功能——为学生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激发学习意愿；认知功能——通过对话与协商促进深层理解的发生；教学功能——通过任务设计与过程引导确保学习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结合师范生公共课的特殊性，将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归纳为四个方面：共同愿景（师生对“为什么学”达成共识）、平等对话（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协作共建（知识在互动中被共同建构而非单向传递）、支持性环境（包括资源供给、评价机制和反馈系统）。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共同体运行的底层逻辑。

2.3 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目标与路径的统一

深度学习与师生学习共同体之间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目标—路径”的逻辑耦合。深度学习回答的是“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它规定了学习的质量标准和价值取向——不是浅层记忆，而是深层理解、知识迁移与高阶思维的发展。它为教学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地”：所有的教学活动最终都应该指向学生的深度学习。

师生学习共同体回答的是“怎么学”的问题。它提供了一种组织形态和互动机制——通过共同愿景凝聚学习动力，通过平等对话促进意义建构，

通过协作反思深化理解层次。它是通向深度学习这个目的地的“交通工具”。

两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深度学习是“目的地”，师生学习共同体是“交通系统”。没有共同体的支撑，深度学习容易沦为空洞的理念口号，难以在课堂中真正落地；没有深度学习的牵引，共同体容易退化为形式化的小组活动，失去了“共同成长”的教育意涵。

董庆华、郭广生的双螺旋框架已经初步揭示了两者的耦合机制：共同愿景为深度学习提供情感驱动力，对话认知为深度学习提供认知支架，支持性环境为深度学习提供制度保障。[5]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将这一一般性框架适配到师范生公共课这一特殊场域中，构建了“一核·三维·三导向”的师生学习共同体模式。该模式保留了“情感—认知—教学”三功能的核心逻辑，但针对师范生公共课“理论厚重、情境稀缺、课时压缩”的特点，增加了“三导向”作为具体的实施抓手，使理论框架更具操作性和情境适应性。

三、理论建构：从一般原理到特殊场域的适配

3.1 深度学习理论在师范生公共课中的适用性分析

深度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围绕挑战性主题实现主动参与、深层理解与知识迁移，其有效性依赖于三个前提条件：学习内容具有可探究的结构性、学习环境提供充足的思考与对话空间、学生具备相应的先前知识与内在动机。[1][2] 然而，师范生公共课在这三个条件上均面临显著制约：课程内容以法条和政策条文为主体，呈现为“条款式”结构，缺乏天然的探究空间；课时总量仅16至32学时，难以支撑长时间的深度研讨；学生多处于“通过考试”的外在动机驱动下，对政策文本的先前知识积累薄弱。这意味着，深度学习理论在该场域中的应用不能简单移植，而需要通过教学设计对上述缺失条件进行补偿。

3.2 师生学习共同体理论在师范生公共课中的适用性分析

师生学习共同体理论主张学习是在共同愿景引领下，通过平等对话与协作反思实现意义建构的过程。[3][4] 董庆华、郭广生将其功能归纳为情感功能、认知功能与教学功能三个层面。[5] 然而，该理论的有效运行同样依赖特定前提：共同体成员拥有共享的目标愿景、具备平等对话的意愿与能力、存在支持协作的制度环境。在师范生公共课场景中，这些前提的实现面临特殊困难：学生来自不同专业方向，对课程的期待和投入程度差异显著；长期的“被动听讲”习惯使学生缺乏主动对话的训练；课时紧张使得协作活动的时间被大幅压缩。因此，共同体理论在该场域中的应用同样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适配。

3.3 理论整合的逻辑起点

上述分析表明，深度学习理论与师生学习共同体理论在师范生公共课中都遭遇了各自的“适用性瓶颈”，但两者的瓶颈恰好指向同一个方向：缺乏一个能够同时补偿内容规范性、情境稀缺性和课时压缩性三重约束的教学机制。深度学习理论提供了“去哪里”的目标指引，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怎么去”的组织原理，但两者都没有直接回答“在特殊约束条件下如何走通这条路”的问题。这正是本研究的理论切入点——将两种理论的核心逻辑进行整合，并针对师范生公共课的特殊约束进行创造性适配，从而建构一个兼具理论根基和情境适应性的教学模式。

3.4 从一般理论到特殊模式的推导逻辑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的理论推导遵循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首先，以深度学习理论为依据，明确师范生公共课的教学目标不应止于“记住法条”，而应指向更深层的素养发展，这是整个模式的核心指向。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直面师范生公共课的三重特殊性带来的障碍：内容的规范性导致情感疏离，情境的稀缺性导致认知脱节，课时的压缩性导致学习浅表化。师生学习共同体理论恰好提供了克服这些障碍的可能机制——其情感功能、教学功能与认知功能分别对应着破解上述三重障碍的理论路径。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将这些机制转化为可操作的课堂实施抓手，并为模式配置适宜的运行环境。沿着这一推导逻辑，最终形成了“一核·三维·三导向”的师生学习共同体模式。下文将对这一模式的具体内涵与运行机制进行系统阐释。

四、模式阐释：“一核•三维•三导向”的师生学习共同体

基于前述理论推导，本节对“一核·三维·三导向”师生学习共同体模式的具体内涵与运行机制进行系统阐释。该模式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目标，以情感共鸣、多元化教学、认知飞跃为三维机制，以任务驱动、问题导向、成果导向为三条实施路

径，在信息化混合学习环境中实现师生双边活动的协同共振。具体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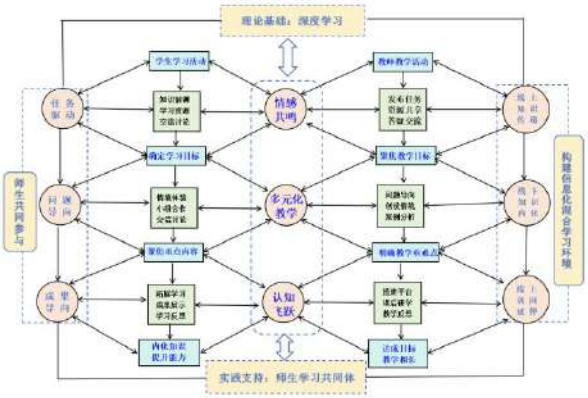


图 1 “一核・三维・三导向”师生学习共同体模式图

4.1 一核：深度学习的素养指向

“一核”是指该模式始终以深度学习作为核心目标指向。在师范生公共课的语境下，深度学习被操作化为三个层次：一是理解的深度，学生能够超越对法条的字面记忆，把握政策背后的立法意图与价值导向；二是参与的深度，学生以主动姿态投入学习活动，而非被动接受教师的单向输出；三是迁移的深度，学生能够在模拟或真实的教育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做出合理的判断与决策。这一核心贯穿师生双边活动始终，是整个模式建构的逻辑起点。

4.2 三导向：任务驱动•问题导向•成果导向

三导向位于模式图的左侧，体现“师生共同参与”的递进链条，是三维机制落实到课堂操作层面的实施路径。

任务驱动指向“学什么”的问题。课前，教师发布明确的学习任务，任务具有挑战性和真实性，如“分析某校教育惩戒案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学生则完成知识前测、学习资源交流讨论等活动。任务驱动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具体的“锚点”，使学习不再是漫无目的的听讲，而是围绕明确任务的定向探索。

问题导向指向“怎么学”的问题。课中，教师聚焦教学目标，以问题创设情境、引入案例分析；学生则确定学习目标，在情境体验、小组合作和交流讨论中展开深度学习。问题导向的目的是将静态的法条知识转化为动态的判断活动，迫使学生在“用”中学。

成果导向指向“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课后，教师明确教学重点、搭建研学平台、进行教学反思；学生则聚焦重点内容，完成拓展学习、成果展示和学习反思。成果导向的目的是为学习提供一个可见的终点——成果既是学习的证明，也是评价的依据，同时也是学生成就感的来源。

三导向贯穿师生双边活动，体现共同参与。在学生端，最终实现“内化知识提升能力”；在教师端，最终实现“达成目标教学相长”。

4.3 三维机制之一：情感共鸣

情感共鸣是模式图中任务驱动阶段的心理基础，其理论依据来自师生学习共同体理论中的“情感功能”。[5] 该功能强调，学习者的认知活动总是嵌入在特定的情感场域中——当学生感到安全、被接纳、被尊重时，他们才愿意冒险表达观点、暴露自己的困惑、参与有深度的对话。

在师范生公共课场景中，情感共鸣的建立面临特殊挑战：课程内容的规范性容易让学生产生“与我无关”的距离感，长期的被动听讲习惯使学生习惯于隐藏真实想法。因此，情感共鸣的实现需要教师有意识地创设条件：一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从“权威者”转变为“引导者”和“同行者”；二是营造安全的表达氛围，鼓励学生大胆提问、自由表达；三是通过共同愿景凝聚共识，让学生感受到“我们是同一个学习团队”。

4.4 三维机制之二：多元化教学

多元化教学是模式图中问题导向阶段的核心路径，其理论依据来自师生学习共同体理论中的“教学功能”。[5] 该功能强调，学习目标的实现需要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作为支撑——不同类型的知识、不同层次的能力，需要匹配不同的教学策略。

针对师范生公共课“内容理论性强、易枯燥”的特点，多元化教学机制设计了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组合：案例教学通过真实教育政策案例引发讨论，情境模拟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体验师德困境，小组辩论围绕争议性政策话题展开交锋，反思写作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个人见解。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不是“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模式，而是需要学生主动参与、思考、表达的互动模式。多元化教学的目的不是“花样翻新”，而是为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提供多条通往深度理解的路径。

4.5 三维机制之三：认知飞跃

认知飞跃是模式图中成果导向阶段的终极归宿，其理论依据来自师生学习共同体理论中的“认知功能”。[5] 该功能强调，学习的本质不是信息的累积，而是认知结构的重组与升级——从零散的知识点到结构化的知识框架，从表面的“知道”到深层的“理解”与“运用”。

在师范生公共课中，认知飞跃的实现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知识结构化，引导学生将零散的法条和政策条文整合为“教育法治思维框架”；第二阶段是问题解决化，让学生在真实或仿真的问题情境中运用知识，完成从“知道是什么”到“知道怎么用”的跨越；第三阶段是反思常态化，通过反思日志、同伴互评等方式，促使学生从“做了什么”上升到“学到了什么”“还能怎样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三维机制之间并非孤立运行，而是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关系：情感共鸣为认知飞跃提供心理安全基础，多元化教学为认知飞跃提供多样化路径，认知飞跃则是情感共鸣和多元化教学的最终归宿。没有情感共鸣，学生不愿参与；没有多元化教学，学生无从参与；没有认知飞跃，参与就失去了意义。三维机制与三导向一一呼应，共同构成模式的内核。

4.6 混合环境与师生双边活动

模式的运行依托“构建信息化混合学习环境”（具体见模式图右侧虚线框）。这一设计的理论依据来自深度学习理论对“学习时间与空间”的要求：深度学习需要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对话与反思，而有限的课堂时间无法满足这一需求。[1][2]

以《义务教育法》为例，本模式下混合环境的设计思路为：课前，学生通过线上平台观看教师录制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导读微课，同步阅读相关法条原文，将低层次的“认知目标”放在课外完成；课中，在线下课堂围绕真实法律案例展开讨论——例如教师在上网课时强制要求学生投屏微信聊天记录所引发的隐私权争议，学生以“模拟法官”身份依据相关法规判断教师行为是否越界，并对其中蕴含的权利冲突展开辩论，通过“法官判断—两难辩论”的层层推进，引导学生从记忆法条走向在真实教育场景中权衡权利与义务，实现法治素养的跃迁；课后，通过线上平台提交学习反思日志、互评同伴的分析作品并拓展阅读相关司法解释，将学习的持续性延伸到课外。

在师生双边活动方面（具体见模式图左右两侧），教师的活动包括：发布学习任务、提供学习资源、组织课堂互动、给予及时反馈、引导反思总结。学生的活动包括：课前自主学习、课中积极参与、课后反思输出、同伴互助互评。师生双方在“任务—问题—成果”的链条上形成良性互动，在“师生学习共同体”的实践支持下（模式图底部），共同推动深度学习的发生。最终，学生实现“内化知识提升能力”，教师实现“达成目标教学相长”。

五、讨论与结论

5.1 对本模式的几点反思

第一，此模式与“翻转课堂”有何区别？

乍看之下，此模式的“课前线上传递—课中线下互动—课后线上巩固”设计与翻转课堂颇为相似。但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逻辑起点不同：翻转课堂是从“时间分配”出发的，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把讲授放到课外，把互动放到课内”；而此模式是从“认知分层”出发的，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有限课时内实现深度学习”。换言之，翻转课堂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此模式则是一种教学设计原理——它规定了哪些认知活动应该发生在课前、哪些发生在课中、哪些发生在课后，而这种规定的依据不是时间的便利性，而是认知层次的递进规律。因此，翻转课堂可以看作此模式的一种可能载体，但二者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

第二，三维机制是否适用于所有教学内容？

情感共鸣、多元化教学、认知飞跃作为三种机制，在此模式中被赋予了普适性的地位。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同教学内容对三维机制的依赖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对于“教师权利与义务”这类与学生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内容，情感共鸣可能更容易建立，认知飞跃的触发也相对自然；而对于“教育法律法规的历史沿革”这类偏史实性的内容，多元化教学可能需要承担更大的比重，认知飞跃的实现则需要教师更精心的设计。因此，教师在运用此模式时，不应机械套用三维机制的固定顺序或权重，而应根据具体教学内容的特点进行灵活调整。

5.2 结语

“一核·三维·三导向”师生学习共同体模式是对深度学习理论与师生学习共同体理论在师范生公共课场域中的一次创造性整合。它既回应

了理论在特殊情境中的适用性困境，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教学设计框架。需要指出的是，此模式对教师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需要具备扎实的法条知识功底，以便在课堂讨论中给出准确的引导；需要具备设计多元化教学活动的能力，以便在不同环节调动学生的参与；需要具备即时反馈和引导反思的能力，以便帮助学生实现认知飞跃。这意味着，此模式的推广不能仅仅依靠一份教学设计方案，还需要配套的教师培训和发展支持。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不可能是“万能处方”，它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教师的理解、学生的参与和情境的支持。希望此模式能够为师范生公共课的教学改革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并在后续的研究与实践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刘月霞,郭华.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理论普及读本）[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2]何玲,黎加厚.促进学生深度学习[J].现代教学，2005(5)：29-30.

[3]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变[M].李季湄,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

[4]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5]董庆华,郭广生.走向深度学习的师生学习共同体建构研究——以北京市某高校创立跨学科师生学习共同体为例[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4，45(2)：144-151.

[6]Marton F, Säljö R. On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I. Outcome and process[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76, 46(1): 4-11.

产业导向与认知建构：三类求职能力实训营对高职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干预效果比较

王巧莲 [1] 郑振华 [1] 石玉峰 [1]

(1.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在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攀升与就业结构性矛盾并存的背景下，高职毕业生在学历层次、专业深度与社会认可度上相对弱势，其就业困境不仅源于岗位供给不足，更源于职业认知模糊与求职行动迟滞，传统就业指导对此回应有限。本研究以北京 2024—2026 年三期求职能力实训营 118 名学员为样本，采用前后测准实验与混合方法，评估政校企社协同实训效果及模式差异。结果：职业成熟度总分由 169.34±22.51 升至 179.04±21.83（t=8.76，p<0.001，d=0.44），6/8 维度显著改善。课程模式差异显著：产业导向型 C 营最优（d=0.734），认知建构型 A 营次之（d=0.486），技能扩展型 B 营最弱（d=0.312），差异集中于认知入口、行动深度、反馈来源与产业融入。基线效应显著（β=-0.486），低基线学员提升 14.2 分，高于高基线组 5.3 分；26.2%学员职业态度负向变化实为认知校准。建议构建“认知—行动—反馈”三重闭环，强化政校企社协同与分层干预。

关键词：求职能力训练营；职业成熟度；高职学生；课程模式差异；分层干预

基金项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点调研课题“关于进一步促进首都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生涯发展支持机制探索研究”（202410）研究成果

DOI：doi.org/10.70693/202610145200

Industry-Oriented and Cognitive-Constru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ree Job-Seeking Ability Training Camps on the Career Matur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ang Qiaolian, Zheng Zhenhua, Shi Yufeng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tinuously rising numbers of college graduates and coexisting structural employment contradiction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graduates are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in degree level, professional depth, and social recognition. Their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stem not only from insufficient job supply but also from vague career cognition and delayed job-seeking actions, to which traditional employment guidance has limited response. This study takes 118 trainees from three job-seeking ability training camps held in Beijing from 2024 to 2026 as samples, and adopts a pretest-posttest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and mixed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and model differences of government-school-enterprise-society collaborative training. Results: The total career maturity score increased from 169.34±22.51 to 179.04±21.83 (t=8.76, p<0.001, d=0.44), with 6 out of 8 dimensions significantly

作者简介：王巧莲（1986-），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指导、人力资源管理、生涯教育；
郑振华（1979-），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大数据统计分析、职业教育、人力资源管理；
石玉峰（1982-），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AI 赋能人力资源、职业教育、生涯教育。

通讯作者：王巧莲

improv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mong curriculum models: the industry-oriented Camp C performed best (d=0.734), followed by the cognitive-constructive Camp A (d=0.486), and the skill-expansion Camp B was the weakest (d=0.312). Differences were concentrated in cognitive entry, action depth, feedback source, and industry immersion. The baseline effect was significant (β=-0.486); low-baseline trainees improved by 14.2 points, higher than the 5.3 points of the high-baseline group. The negative change in career attitude among 26.2% of trainees was actually cognitive calibr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build a threefold closed loop of "cognition–action–feedback" and strengthen government-school-enterprise-society collaboration and differentiated intervention.

Keywords:job-seeking ability training camp; career matur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urriculum model differences; differentiated intervention

一、引言

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攀升，2026 年预计达 1270 万人，高职学生占比约 45% – 47%。然而，高职生在学历层次、专业技能深度及社会认可度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1][2]。实证研究表明，高职毕业生在简历制作、面试应答、职业定位及岗位信息获取等关键环节普遍存在能力不足[2]。国务院印发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切实做好青年群体就业工作”，要求“开展青年求职能力实训，开发职业体验岗位”[3]。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北京市“十五五” 时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规划》进一步要求要大力开展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职业技能提升等就业促进行动”[4]。上述政策部署为求职能力实训营的规范化、常态化开展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

就业能力作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史秋衡和任可欣构建了三维度结构模型[5]，王建光和楚洪波建立了内外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6]，鲍威和万义辉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智慧育人模式[7]。在效果评估方面，职业成熟度概念源于 Super 的生涯发展理论[8]，Crites 将其操作化为八个维度[9]，国内研究证实主动性人格、职业自我效能与职业使命感呈显著正相关[10][11]。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空白：第一，"四方协同"理论尚未拓展至短期集中式求职能力实训场景；第二，缺乏不同课程模式之间的效果比较；第三，较少从职业成熟度视角评估实训干预的心理效应。

基于此，本研究以 2024-2026 年三期求职能力实训营的 118 份高职学员样本为对象，采用前后测准实验设计与混合研究方法，系统评估求职能力实训营对学生职业成熟度和求职行为的干预效果、模式差异及分层优化路径。研究假设如下：H1：协同实训能够显著提升高职生职业成熟度；H2：不同课程模式干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产业导向型最优；H3：基线水平越低，提升幅度越大；H4：职业态度维度存在"双刃剑"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本研究整合 Super 生涯发展理论、SCCT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与 Savickas 生涯建构理论，构建“认知-技能-体验”三维干预框架。Super 理论将职业成熟度操作化为“完成特定阶段发展任务的能力”，为本研究选择 8 维度量表提供依据。SCCT 理论揭示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即干预通过提升职业自我效能，进而促进职业探索行为[12]。Savickas 理论强调“生涯适应力”，为解释短期干预如何通过重构职业叙事实现态度转变提供框架[13]。

（二）实训模式设计

本研究依托的求职能力实训营采用“政府-学校-企业-社区”四方协同的资源聚合模式。人社局负责政策引导、资金保障及岗位资源对接；企业提供参观场地、派出企业导师、分享用工标准与岗位需求；社区提供就业辅导员现场跟班观察、对接基层就业服务网络；学校承担学员筛选、教学组织执行，四方协作开展整体课程设计、组织安排与效果评估。

为考察不同课程模式下的实训效果差异，三期实训营归纳为三种课程模式：

A 营（认知建构型）为期 3 天，在校内开展。该营以职业认知工具为主线，首日密集安排霍兰德、MBTI、三叶草模型、能力三核等认知测评，辅以辩论赛、价值观拍卖等互动反思环节，侧重政策引领下的标准化实训与自我认知建构。

B 营（技能扩充型）为期 3 天，在校外开展。该营采用“技能拼盘”策略，每天切换不同主题，安排了保健按摩、新媒体运营、低空经济等行业拓展内容，体现院校专业特色与区域经济需求的结合。

C 营（产业导向型）为期 3 天，在校外产业园内开展。该营以产业体验为核心载体，首日即入驻产业园区，通过园区参访、HR 午餐会、实习岗位介绍等环节实现“沉浸式”职业认知，次日安排 5 位企业 HR 进行真实模拟面试，突出产教空间融合与创业导向。

三营核心差异体现在四个维度：（1）认知入口不同。A 营从“自我认知工具”切入，B 营从“多元技能体验”切入，C 营从“产业真实场景”切入；（2）行动环节深度不同。C 营安排 5 位企业 HR 真实模拟面试，A 营和 B 营由培训师主持；（3）产业融入程度不同。C 营将课程嵌入产业园区，A 营和 B 营以培训教室为主要场所。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24—2026 年在北京市连续开展的三期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共计 129 名学员，回收有效问卷 118 份（A 营 31 份、B 营 41 份、C 营 46 份）。数据收集采用前后测问卷与每日定性反馈相结合的方式。实训营开始前 1 天进行前测，结束后当天进行后测。每期每日结束后收集学员定性行为记录日志 387 份（A 营 128 份、B 营 146 份、C 营 113 份）。样本以即将升为大三的大二学生为主，年龄集中于 19 至 22 岁，正处于 Super 职业发展理论所界定的“探索期”（15-24 岁），是求职能力干预的关键窗口期。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标准职业成熟度量表（CMI）作为测量工具，包含 8 个维度，每维度 5 题，共 40 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经预测试，量表整体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2，各维度α系数介于 0.721 至 0.854 之间；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 8 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贡献率为 68.43%，各题项因子载荷大于 0.55，交叉载荷小于 0.35。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量化分析运用 SPSS 26.0 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单因素协方差分析。质性分析对 387 份记录日志采用主题编码方法进行分析，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编码一致性系数 Kappa=0.83。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配对样本 t 检验

本研究共纳入北京市三期求职能力实训营的高职生样本 118 份。表 1 汇总了三期实训营在职业成熟度八个维度上的前后测均值（M）、标准差（SD）及提升幅度。从总体前测水平看，B 营前测均值最高（M=3.770），显著高于 A 营（M=3.544）和 C 营（M=3.593）。

从维度层面分析，三营在"信息应用"维度均呈现出正向变化，且 A 营与 C 营的提升幅度较大（分别为 0.376 和 0.420），这与实训营课程设计中强调信息检索、岗位筛选和招聘渠道利用密切相关。A 营检验结果显示，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信息应用”（t=-3.190，p=0.003）、“职业认知”（t=-3.386，p=0.002）、“价值观念”（t=-2.163，p=0.039）和“条件评估”（t=-2.683，p=0.012）四个维度达到显著水平。C 营结果呈现出更为广泛的显著性：“信息应用”（t=-5.448，p<0.001）、“职业认知”（t=-3.458，p=0.001）和“个人调适”（t=-3.399，p=0.001）三个维度在 0.01 水平上显著。

整体而言，干预后职业成熟度总分从前测的 169.34±22.51 显著提升至后测的 179.04±21.83（t=8.76，p<0.001，d=0.44），提升 9.7 分，改善比（后测高于前测人数占比）为 73.6%。在 8 个维度中，6 个维度达到显著改善。

（二）效应量分析

“信息应用”维度干预效果最为稳健，A 营和 C 营分别达到中等效应（d=0.573）和大效应（d=0.803），说明求职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是短期实训最容易见效的领域。“职业认知”维度在两营中均达中等效应（A 营 d=0.608，C 营 d=0.510），印证了实训营通过企业参观、行业讲座和 HR 面对面交流提升学员职业认知的有效性。“职业态度”维度呈负向小效应（A 营 d=-0.302，C 营 d=-0.331），结合统计显著性结果，可以判断这一负向变化具有实质性意义，反映了实训促使学员从理想化向现实化转变，即从幻想期向探索期的阶段性跃迁。C 营总体效应量 d=0.734，属中等偏大效应；A 营 d=0.486，中等效应；B 营 d=0.312，小到中等效应。

（三）课程模式差异（ANCOVA 分析）

控制前测得分后，ANCOVA 结果显示三营在职业成熟度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2,125)=12.38$，$p<0.001$，$\eta^2=0.165$）。事后多重比较表明：C 营显著优于 A 营（p=0.012）和 B 营（p<0.001），A 营显著优于 B 营（p=0.038）。C 营在职业认知、职业选择、职业

规划能力和职业自信心 4 个维度上均显著优于 B 营，在职业世界认知和职业规划能力上显著优于 A 营。A 营在职业认知维度上与 C 营无显著差异，但显著优于 B 营。这一模式差异揭示了“认知先行”原则与“深度体验”原则需协同发力：A 营的密集认知工具链在自我认知维度创造了深度，但缺乏真实职场接触制约了职业世界认知的提升；C 营的产业 immersion 在“向外”维度上优势显著，但在自我认知深度上与 A 营持平。

（四）基线效应与群体差异

以干预前后测差值为因变量，前测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前测总分对提升幅度的预测作用显著（β=-0.486，p<0.001），即基线越低，提升越大。这一基线效应在三个营中均成立，但 C 营的基线效应最强（β=-0.534），A 营次之（β=-0.468），B 营最弱（β=-0.382）。以中位数为界分为高基线组（n=65）和低基线组（n=64），低基线组总分提升 14.2±8.6 分，显著高于高基线组的 5.3±7.2 分（t=6.32，p<0.001，d=1.12）。性别差异方面，女生在职业自信心维度的提升幅度（d=0.52）显著高于男生（d=0.28）（F(1,127)=4.36，p=0.039）。

为进一步直观呈现基线效应的组间分布差异，图 1 以箱线图展示低基线组与高基线组提升幅度的中位数、四分位距及异常值。低基线组中位数（约 13 分）显著高于高基线组（约 5 分），箱体不重叠，组间差异稳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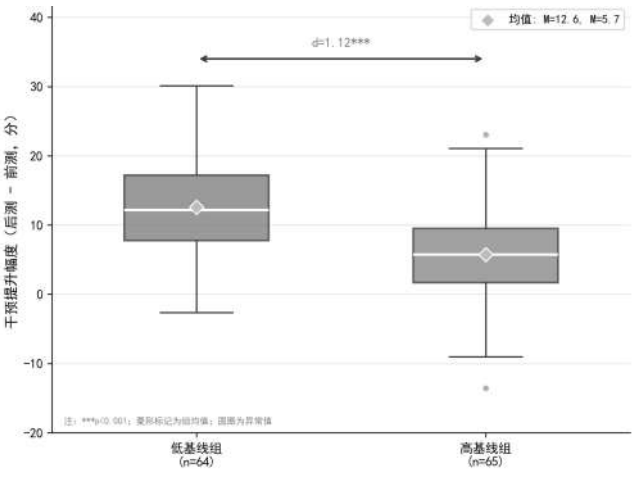


图 1 低基线组与高基线组提升幅度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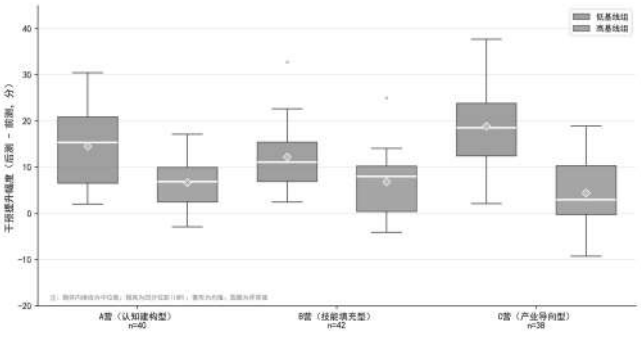


图 2 三营低基线组与高基线组提升幅度对比

注：箱体内横线为中位数；菱形为均值；圆圈为异常值。

三营分组的箱线图（图 2）进一步揭示，C 营低基线组的中位数提升幅度最大（约 18 分），且在各营中均呈现低基线组优于高基线组的一致模式，印证了基线效应的跨模式稳健性。

（五）职业态度的“双刃剑”效应

整体样本中，73.8%职业态度得分持平或正向变化，26.2%出现负向变化。定性分析表明，这种“负向变化”实为“现实化调整”，标志着学员从幻想期向探索期的阶段性跃迁。在 A 营，学员武*完成霍兰德和 MBTI 测试后表示“岗位偏理工，和我专业有很大区别”；在 B 营，学员陈**在企业用工标准解析课后提到“毕业工资大部分都在 3k，第一次了解到”；在 C 营，多名学员在 HR 模拟面试后意识到“面试官更看重实操技能与岗位匹配度”。与之对比，正向变化组则体现自我效能感提升，如 C 营学员张*“一开始非常不自信，但勇敢迈出第一步后，发现投简历并不可怕”。

（六）定性分析：传导链条

基于 387 份反思日志的定性分析，显示三营在课程入口、行动环节、反馈来源和产业融入四个设计维度上的差异，A 营在“职业认知”维度上取得了与 C 营相当的效果，这一结果看似矛盾，实则揭示了“认知先行”原则的有效性：当学员通过霍兰德、MBTI 等标准化工具获得对自身的结构化认知后，即使缺乏真实职场接触，其“我是谁”“我适合什么”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仍可显著提升。然而，A 营在“职业世界认知”维度上显著落后于 C 营（d=0.38 vs 0.82），表明仅靠自我认知工具无法弥补对外部职业环境了解的不足。C 营的“现实碰撞”路径则通过产业园区浸润和 HR 真实反馈，同时激活了“自我认知”与“世界认知”两个维度：学员在模拟面试中既发现了自身

简历与专业要求的差距（自我认知），也理解了面试官对实操技能的权重偏好（世界认知），从而实现了“向内探索”与“向外碰撞”的协同。B 营的“技能拓宽”路径虽然通过保健按摩、新媒体等跨领域体验创造了认知入口，但由于每个主题停留时间过短（平均 1–2 小时），学员反馈中频繁出现“知道了但不知道如何用到求职中”的断层感，导致其各维度效应量均处于三营最低水平。

四、讨论

（一）求职训练营活动的有效性

本研究揭示四方协同实训模式对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的多维影响。信息应用与职业认知在三营中均显著提升，整体干预效果达中等效应水平（d=0.44），表明实训营有效打破了高职生面临的信息壁垒，体验式教学在职业自我探索中具有独特优势。职业态度维度虽呈负向变化，但反映了“认知校准”机制——学员从“盲目乐观”转向理性评估，标志着从“幻想期”向“探索期”的阶段性跃迁。H1 获得有力支持。

（二）活动差异的深层机制

ANCOVA 结果清晰显示三营效果排序：产业导向型（d=0.734）>认知建构型（d=0.486）>技能扩展型（d=0.312）。C 营优势在于“三重闭环”：产业园区空间沉浸、HR 午餐会与模拟面试的人际闭环、园区参访-模拟面试-双选会的认知-行动闭环。A 营在职业认知维度与 C 营无显著差异，体现“认知先行”原则的有效性，但在职业世界认知上因缺乏真实职场接触而落后。B 营“广度有余、深度不足”，3 天覆盖 7 个以上主题，每个主题仅 2—3 小时，与专业匹配度较弱。H2、H3 获支持。

（三）职业态度“双刃剑”效应的理论解释

从 Super 理论视角，职业态度的“去理想化”是从“幻想期”向“探索期”过渡的正常表现；从 SCCT 理论看，这反映了“结果期待”的重新校准。H4 获得支持，提示评估干预效果时需结合质性数据和实际行为变化综合判断。

进一步分析 26.2%出现负向变化的学员，三营呈现出差异化的“认知校准”效果，即“职业态度维度的负向变化并非干预失败，而是标志着学员从幻想期向探索期的阶段性跃迁”。A 营（认知建构型）以“认知冲突型校准”为主：学员在霍兰德和 MBTI 测试后发现兴趣-专业错配，职业态度得分下降但职业认知显著提升（d=0.68），呈现“态度降、认知升”的补偿结构。B 营（技能扩展型）以“信息冲击型校准”为主：学员接触到真实薪资数据和市场标准后产生“去理想化”冲击，但因缺乏系统的认知整合环节，部分学员停留在“信息冲击后的茫然”状态，这也解释了 B 营职业态度效应量（d=-0.05）为三营最低的原因。C 营（产业导向型）则体现“行动承接型校准”：学员在 HR 模拟面试中收到真实反馈后，第二天即可在双选会上投递修改后的简历并获得回应，将“去理想化”迅速转化为“行动意愿”，张越从“非常不自信”到勇敢投递并获面试邀请即典型案例。综上，未来课程设计应在提供“现实信息”的同时设置“认知整合与行动规划”环节，避免“去理想化”演变为“职业无力感”。

（四）“课程设计—学员体验—干预效果”传导链条

课程设计要素与干预效果的对应关系体现在四个维度：认知入口上，A 营“自我认知工具链”创造了与 C 营相当的职业认知效果；行动深度上，C 营“5 位 HR 真实模拟面试+双选会”实现了从“知道”到“做到”的最深转化；反馈来源上，C 营学员获得来自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反馈，权威性和即时性远超培训教师反馈；产业融入上，C 营“空间闭环”的情境浸润效应是校园内实训无法替代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北京市三期求职能力实训营 118 名高职学员为对象，系统评估了“政校企社”协同模式下集中式求职能力实训的效果、模式差异及分层优化路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协同实训模式能够有效提升高职生职业成熟度，整体效果达中等效应（d=0.44），6/8 维度显著改善，信息应用与职业认知维度在三营中均获显著提升；第二，课程模式差异显著，效果排序为产业导向型（d=0.734）>认知建构型（d=0.486）>技能扩展型（d=0.312），核心差异体现在认知入口、行动深度、反馈来源和产业融入四个维度；总体来说 C 营的优势并非源于基线差异，而是课程设计的系统性优势。第三，基线效应显著（β=-0.486），低基线学员提升 14.2 分，显著高于高基线组的 5.3 分；第四，职业态度呈“双刃剑”效应，26.2%学员的负向变化实为“认知校准”过程。

（二）分层靶向干预路径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提出“分层靶向”干预路径，如图 3 所示。对于低基线学员，建议优先采用产业导向型或认知建构型模式：产业导向型通过真实职场沉浸快速提升职业世界认知，适合职业准备度极低的学员；认知建构型通过系统认知工具链帮助建立自我认知框架，适合自我认知模糊的学员。对于高基线学员，建议采用“认知建构+产业体验”的混合模式，在巩固自我认知基础上增加真实职场接触，实现从“查漏补缺”到“精进提升”的跨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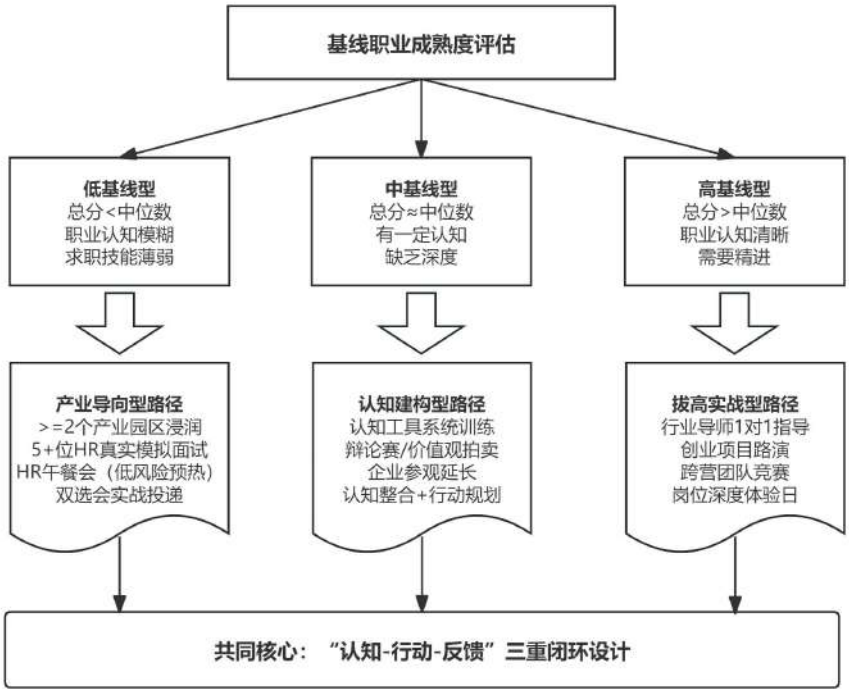


图 3 政校企社协同实训的分层靶向干预路径

（三）课程活动优化建议

第一，构建“认知-行动-反馈”三重闭环。A 营的“认知先行”优势和 C 营的“深度体验”优势提示，理想的干预模式应将两者结合：第一天通过认知工具建立自我认知框架，第二天通过产业参访和模拟面试进行行动检验，第三天通过双选会实现真实反馈。C 营的“HR 午餐会”这一非正式互动环节值得推广，在正式面试前为学员提供了“低风险预热”，降低了后续面试的心理门槛。

第二，提升课程内容与专业的匹配度。B 营首日上午的低空经济课和保健按摩课程虽创造了独特的体验入口，但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关联度较弱。建议将此类“拓展性”内容调整为“专业+”模式，既保留跨领域视野拓展的价值，又增强与核心职业能力发展的关联。

第三，关注职业态度的“双刃剑”效应。对出现“去理想化”负向变化的学员，应提供后续辅导，帮助其从“认知现实”过渡到“接纳现实并积极行动”，避免“去理想化”演变为“职业倦怠”。建议在干预后期增设“职业现实与积极行动”主题工作坊，由行业前辈分享职业发展历程。

第四，强化政校企社四方协同机制。C 营首日的“政企校实习基地授牌”仪式虽非教学内容，但其制度性承诺强化了四方协同的仪式感。建议建立“四方协同”的制度化机制，明确各方职责和资源投入，并将“授牌仪式”等制度性环节纳入标准课程设计。

（四）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应采用随机对照实验（RCT）设计，更加严谨地验证因果效应；增加 3 个月、6 个月和 1 年的追踪测量，考察训练效应的持久性；探索数字化实训模式，对比线下与混合式实训的成本效益差异；扩大样本量与地区覆盖，检验实训效果的普适性边界。

参考文献：

[1] 王益彬, 张莉. 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现象、成因及其消解路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2, 40(3): 121-128.

[2] 程玮. 大学生就业能力及其提升实证研究——基于全国 64 所高校的有效样本分析[J]. 高教探索, 2017(7): 80-86.

[3] 国务院.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Z]. 2026.

[4]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规划: 京人社发〔2026〕9 号[Z]. 2026.

[5] 史秋衡, 任可欣. 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内涵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的对比[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8): 1-15.

[6] 王建光, 楚洪波. 大学生高质量就业能力评价——基于吉林省 2631 份调查数据[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 39(12): 89-95.

[7] 鲍威, 万义辉. 教育学视角下的中国大学生可就业能力理论建构[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25(1): 1-12.

[8] SUPER D E. A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80, 16(3): 282-298.

[9] CRITES J O. Measurement of vocational maturity in adolescence[J].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1965, 79(1): 1-31.

[10] 沈雪萍, 顾雪英. 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使命感的中介作用[J]. 心理学探新, 2018, 38(6): 546-550.

[11] 方小婷, 叶宝娟, 杨强, 等. 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7, 33(5): 561-568.

[12] LENT R W, BROWN S D, HACKETT G. Toward a unifying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career and academic interest, choice,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94, 45(1): 79-122.

[13] SAVICKAS M L. 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M]// BROWN S D, LENT R W.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2nd ed. Hoboken: Wiley, 2013: 147-183.

从产业现场到课堂资源：访问工程师机制下跨境电商教学案例开发路径研究

方磊[1,2,3] 陈聂[2,3] 宋铁军[4]

（1.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商务研究中心，浙江 宁波 315012，2.人工智能与品牌创新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012，3.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商务学院，浙江 宁波 315012，4.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宁波 315177）

摘 要：访问工程师制度是高职院校推进产教融合的重要抓手，但其成果向教学资源的转化路径尚不清晰。本文以某制造型出口企业的跨境电商业务为案例对象，以访问工程师入企诊断为起点，沿着“产业现场到问题识别、真实问题到教学素材、教学素材到课程资源”的三阶转化路径，系统探讨跨境电商教学案例的开发机制。研究发现，入企诊断能够有效识别选品经验化、利润核算不透明、客诉利用不足等六类真实问题；典型性、矛盾性、可脱敏性、可操作性四项筛选标准可将产业问题收敛为可教学案例；聚合化、化名化、模糊化三种脱敏方法配合双重校验机制，能够在保护企业信息的前提下保留案例的决策逻辑与教学价值；三层教学目标、模块化组织、差异化教学方法与多元考核评价共同构成案例从素材到课程资源转化的教学设计框架。本文提出三阶转化模型，将访工制度功能从教师能力提升拓展至课程资源建设领域，为高职院校跨境电商教学案例开发提供了一条可复制的操作路径。

关键词：访问工程师；教学案例开发；跨境电商；三阶转化模型；制造型出口企业

基金项目：宁波市教育科学规划职成教与民办教育专项课题（2026YGHZC70），宁波市新型智库——人工智能与品牌创新研究院成果

DOI：doi.org/10.70693/202610201496

From Industrial Site to Classroom Resourc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eaching Cases under the Visiting Engineer Mechanism

Fang Lei[1,2,3] Chen Nie[2,3] Song Tiejun[4]

[1]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Digital Commerce Research Center, Ningbo, China, [2] Institu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rand Innovation, Ningbo, China, [3]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School of Digital Commerce, Ningbo, China, [4] Junhe Pump Industry Co., Ltd, Ningbo, China

Abstract: The visiting engineer system serves as a crucial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yet the pathway for transforming its outcomes into teaching resources remains unclear. Taking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operations of a manufacturing export enterprise as the case object, this study

作者简介：方 磊(1986—)，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高职教育；
陈 聂(1982—)，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高职教育；
宋铁军(1971—)，男，大专，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

通讯作者：方 磊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eaching cases along a three-stage transformation path: from industrial site to problem identification, from real problems to teaching materials, and from teaching materials to curriculum resourc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n-site diagnosis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six categories of real-world problems, including experience-based product selection, opaque profit calculation, and underutilization of customer complaints. Four screening criteria—typicality, contradictoriness, desensitizability, and operability—can converge industrial problems into teachable cases. Three desensitization methods (aggregation, anonymization, and obfuscation), combined with a dual verification mechanism, preserve the decision-making logic and pedagogical value of cases while protecting corporate information. A pedagogical design framework comprising three-tiered learning objectives, modular organization,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methods, and diversified assessment constitutes the key to transforming materials into curriculum resourc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three-stage transformation model that extends the function of the visiting engineer system from individual faculty development to curriculum resource construction, offering a replicable operational pathway for develop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teaching ca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Visiting engineer; Teaching case development;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ree-stage transformation model; Manufacturing export enterprise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与“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战略部署，访问工程师制度正是落实这一战略的重要制度安排——它既是教师获取产业实践经验的核心通道，也是产教融合从“学校主导”走向“校企双向嵌入”的组织载体。

2023 年教育部印发《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将企业实践纳入职教师资制度体系。浙江省同步推进访工制度化，2026 年明确高职以访工为主并给予经费支持。“浙教助企”行动计划（2024—2027）提出对接“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课程资源与校企协同培养机制。上述政策将访工功能从教师能力提升延伸至课程资源共建，也构成本文选择制造型出口企业作为案例对象的直接政策依据。

然而，政策力度与实际转化成效之间仍存在落差。部分访工教师能将企业经历有效转化为教学案例，而另一些则沦为到岗打卡，大量一线问题因数据敏感或缺少教学化重构而无法进入课堂。这种分化背后隐藏着一个核心问题：访问工程师究竟通过什么机制，将企业诊断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可用的教学案例？既有研究多聚焦访工制度实施效果与教师能力提升，对案例转化机理缺乏系统解构[1-2]。更关键的是，现有解释框架往往将成果转化简化为经验迁移，忽视了从产业现场到课堂资源之间需要经历问题筛选、脱敏处理、教学重构等多道工序。

本文引入“三阶转化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将案例开发过程分解为“产业现场到问题识别、真实问题到教学素材、教学素材到课程资源”三个阶段，以某水泵制造型出口企业的跨境电商业务为案例对象，展示每一阶段的操作方法与校验机制，试图回答“企业问题如何转化为教学案例”以及“转化何以持续有效”两个核心问题。

二、文献综述

访问工程师研究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成果积累。在制度功能层面，已有研究证实访工经历对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具有显著作用，但访工成果的转化效率偏低、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仍是制约制度效能的关键瓶颈[1-2]。在影响因素层面，访工周期长短、学科背景与企业需求的匹配程度、企业提供的支持力度，被识别为影响访工贡献度的三个核心变量[2]。整体来看，该领域的研究重心集中在教师能力提升维度，对访工成果如何向后端的课程资源转化，尚缺乏系统的方法论探讨。

教学案例开发研究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在案例质量评价方面，已有研究基于大规模样本分析，提炼出案例选题与教学目标的匹配度、决策点的清晰程度、案例材料的完整性三项关键质量指标[3]。在开发流程方面，形成了“案例采编—教学流程设计—学习效果评估”的三环节框架，其中知识点—情境—问题的匹配关系被视为案例设计的核心逻辑[4]。在课堂检验方面，知识点明确性、知

识线与情节线的清晰度、问题的可识别性、教学计划的可行性被确立为四个检验维度[5]。在数据合规方面，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特定目的、最小必要和公开透明原则，经营数据可按商业秘密分类保护并通过去标识化和匿名化降低法律风险，已成为案例脱敏的基本共识[6-7]。但上述研究主要面向本科和 MBA 教育场景，对高职教育情境、尤其是跨境电商领域的适配性研究相对不足。

跨境电商教学研究揭示了资源端的缺口。在培养方向上，跨境电商人才的知识结构正从单一的平台操作向“运营+数据+管理”复合方向转型，数据分析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合规意识成为核心素养[8]。在教学方法上，基于真实数据的模块化教学改革已被证明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实操能力，通过脱敏真实数据、设计任务卡和数据集的方式，可以在保护企业信息的前提下还原业务场景[9]。在生产性实训方面，以真实业务项目为载体的“做中学”模式也被广泛认可[10]。然而，上述改革所依赖的案例素材多来自校内创业孵化或虚拟仿真平台，真正源自制造型企业一线运营的原创案例仍然稀缺，特别是涉及选品验证、广告投放诊断、客诉反馈研发等典型业务矛盾的案例开发，尚缺少系统的操作范本。

综合三个领域的文献脉络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交叉空白：访工研究积累了教师如何“走出去”获取产业经验的证据，案例开发研究提供了如何“写出来”的规范性方法，跨境电商教学研究提出了如何“用起来”的真实业务需求，但三者之间缺少一条贯通的转化路径。现有成果尚未系统回答一个操作层面的核心问题——访工诊断中发现的企业问题，究竟需要经过怎样的筛选标准、脱敏技术和教学设计，才能成为可用的课堂教学案例？本文以三阶转化模型为分析框架，将这一过程分解为“产业现场到问题识别、真实问题到教学素材、教学素材到课程资源”三个阶段，以某水泵制造型出口企业的跨境电商业务为案例对象，逐一展示每一阶段的操作方法与校验机制。

三、访工诊断中的案例筛选机制

（一）产业现场到问题识别——入企诊断的问题发现

访问工程师入企的首要任务是“沉下去”，在真实的产业现场中发现真问题。高职院校访问工程师项目通过教师到企业开展周期性实践，既服务企业技术改造，也反哺课程教学与“双师型”队伍建设[2]；项目贡献度受访工周期、学科背景等因素影响，说明入企应有足够时间深入业务链路[1]。不同于问卷调查或二手数据研究，入企诊断可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数据调取、流程跟访等方式，触及企业运营中那些写在墙上但没有执行的制度和众人皆知但无人说破的矛盾。在案例企业入企诊断阶段，通过为期一个月的密集调研，系统梳理出跨境电商业务在六个维度的核心问题。

首先是数据底座薄弱。七个平台数据口径各自为政，销售额有的含税有的不含税，费用科目命名方式各不相同，库存数据分散在 FBA（亚马逊物流）后台、FBM（自发货）本地表格、海外仓管理系统三套体系中。运营团队每天在平台间切换、手工导出、Excel 拼接，数据更新滞后至少两天，管理层看到的经营数据往往是昨天甚至前天的旧数据。其次是利润核算不透明。因数据口径不统一，企业无法精确计算每个 SKU、每个平台的净利润，财务只能给公司整体毛利估算，无法回答哪个 SKU（库存量单位）真正赚钱、哪个平台广告边际效益递减、哪一类客诉正在恶化。第三是库存管控粗放。数百个 SKU 的动销率、库龄、IPI（库存绩效指数）分数未看板化，FBA、FBM、海外仓、国内仓之间缺乏协同，曾出现同一款产品在 FBA 断货而国内仓仍有大量现货。第四是合规管理被动。数十项平台违规点散落各后台，缺统一巡检清单和到期预警，曾因 EPR 注册号过期被下架、因电池产品认证到期被海关扣押。第五是客诉利用不足。每日客诉邮件停留在客服回复到关单的单向消耗，漏水、接头不匹配、标称参数虚标等反复出现的质量信号没有回流到研发改款。第六是选品决策经验化。新品主要依赖负责人直觉和展会信息，缺市场容量、竞争格局、成本利润系统测算，曾出现重资源开发的新品上市后销量惨淡且无法系统复盘。上述六类问题构成案例池，但需按教学案例规范进一步筛选。

（二）教学案例的筛选标准

从产业现场问题中筛选教学案例，重点看正文与使用说明的匹配，包括案例选题与教学目标、决策点与思考讨论题、案例材料与分析思路的匹配[3]。本研究提出四项标准：第一项典型性，即问题是否反映制造型出口企业跨境电商的共性困境。多平台数据口径不一、客诉信息未结构化、选品缺数据支撑等具有较普遍教学代表性；企业独有偶发事件不宜单独成案。第二项矛盾性，即是否存在真实决策困境。教学案例不是标准答案

演示，而是把信息不完备条件下的两难呈现给学生，如新品进或不进、广告预算降或不降、客诉改款或暂不改款；案例开发应围绕决策点设计讨论题，使正文材料、分析思路与教学目标一致[3]。第三项可脱敏性，即去除企业名称、客户姓名、订单号、具体金额等敏感信息后，核心因果关系和决策矛盾仍保留。涉及客户个人信息的内容，应按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对个人姓名、联系方式、地址等作去标识或匿名处理[6]；涉及销售额、利润、供应商等经营信息，按商业秘密保护要求做分类、泛化、比例缩放或删除[7]。脱敏后若只剩空道理，则不适合教学；若决策矛盾仍在，即使数字做聚合处理，案例仍可成立。第四项可操作性，即复杂度适配课堂学时与学生认知水平。教学案例通常按二至四学时组织，过于技术化或过度依赖企业财务明细的素材应降维、拆分或改为综合实训。

（三）案例筛选结果与应用说明

基于四项标准，从六类问题中筛选三个案例。

第一，选品验证。产业原型为企业进入新细分市场时面临市场容量、竞争格局、成本利润不确定性。该问题在制造型企业从 OEM（原始设备制造商）转向自主品牌出海时具有共性；矛盾点在于调研显示有机会、竞品显示压力大、成本测算显示利润薄，进或不进构成两难。教学上按市场分析、竞品评估、成本利润测算设任务，用脱敏后的容量排名、价格区间、成本占比替代原始数据。第二，广告 ACoS（广告销售成本比）诊断。产业原型为某平台广告花费上升但 ACoS 居高，需判断低效关键词、重构广告结构。矛盾点在于降预算可能影响曝光与排名、维持预算则侵蚀利润；ACoS 为比率指标，可用相对值组织教学。第三，客诉处理与研发反馈。产业原型为漏水、接头不匹配、参数虚标等客诉反复出现，需建立打标、统计、改款建议闭环。矛盾点在于改款投入与客诉普遍性、改款后销售回报均不确定。三个案例分别覆盖选品、引流、售后，形成入局—运营—迭代链条。成稿时应为每个案例配使用说明，明确教学目标、决策点、讨论题与分析思路[3]。

（四）案例筛选与访工诊断的互动关系

案例筛选不是先诊断后筛样的线性过程，而与入企诊断同步调整。教师带预设选题进企业，用访谈和数据分析核验选题是否真有决策矛盾、是否具备教学转化条件；诊断深入后发现新素材，再修正筛选方案[4]。本案例中，最初设想做多平台数据口径统一和 SKU 级利润核算，但前者技术细节过重、后者财务敏感信息过多，课堂可操作性弱；反而是选品验证、广告 ACoS、客诉改款三类问题矛盾鲜明、可脱敏、可任务化，最终入选。该过程说明访工案例开发应在企业现场动态迭代，并通过课堂试用持续修正案例适用性[5]。

四、真实问题到教学素材——脱敏重构的方法与技术

（一）脱敏处理的必要性与原则

企业现场材料包含销售额、利润率、客户订单、供应商等敏感内容。直接进课堂可能涉及商业秘密，也可能涉及客户姓名、订单号、地址等个人信息。处理原则有二：一是去敏感信息，对企业名称、品牌、客户身份、具体金额等可识别信息做替换或删除；二是保决策逻辑，脱敏后仍需让学生看到因果链和两难点，避免因过度处理使案例失真。经营类敏感数据可按商业秘密保护思路做分类分级、泛化、比例缩放或删除[7]；个人类敏感数据按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去标识、匿名或删除直接标识符[6]。脱敏目标是在保护企业利益和个人信息的前提下，保留教学所需的管理矛盾。

（二）脱敏处理的具体方法

针对跨境电商运营数据，可采用三类处理。第一，聚合化，用相对指标替代绝对数值，如市场容量用排名或百分比、广告花费用 ACoS 或 ROAS（广告支出回报率）、利润用毛利率区间或成本占比。比率指标便于分析趋势，也能降低具体金额泄露风险。第二，化名化，用虚拟企业名、品牌名、产品代号和客户匿名标识替代真实主体；客诉邮件删除客户姓名、订单号、收货地址，保留产品型号、故障描述和处理结果。第三，模糊化，在保留因果链前提下调整时间线、数量级，如将具体月份改为季度、将精确日邮件量改为“每日大量”、将精确违规项数改为“数十项”。上述处理应与案例教学目标匹配：哪些信息必须保留以支撑决策，哪些标识符必须删除以满足保密，需在成稿前确定[3]。

（三）从问题描述到教学任务的结构化重构

脱敏后还要把“企业问题描述”转为“学生任务”。可按案例写、教、学流程组织：先定课程知

识点与教学目标，再依据脱敏素材确定案例事件，形成正文与使用说明，最后课堂检验并修订[4]。选品验证设为三项任务：基于脱敏容量判断细分市场是否值得进入，基于竞品价格与销量排名评估竞争强度，基于成本占比测算不同定价下利润空间。广告 ACoS 诊断设为报表任务：识别高花费低转化关键词，判断暂停、降价或改文案，并给出预算分配。客诉改款设为分类任务：对脱敏客诉按质量、物流、使用指导、其他打标，统计高频故障，结合返修成本与潜在退货损失写改款优先级。任务设计应保证知识点、情节线、问题线清晰，避免把案例写成企业情况汇报[4-5]。

（四）脱敏质量的校验机制

脱敏不是一次完成，采用双重校验。第一重产业真实性校验，由企业相关人员审核脱敏后素材，确认经营矛盾未被扭曲、可识别信息已充分处理；经营数据可参照商业秘密分类分级标准检查是否仍含核心敏感字段[7]，客诉材料可参照个人信息去标识要求检查是否仍含直接标识符[6]。第二重教学有效性校验，由同行教师或试讲班级审核学时、认知负荷、讨论空间；课堂检验重点看案例知识点是否明确、情节是否清晰、问题是否可识别[5]。校验发现问题如成本结构过度归一导致无法测算，应补分项占比；客诉分类维度过少导致改款建议空泛，应补故障属性与频次。修改后再次小范围试用，形成“脱敏—成稿—校验—试用—修订”闭环[4]。

五、教学素材到课程资源——教学设计的关键要素

（一）教学目标的三层分解

教学素材转化为课程资源，第一步是明确教学目标。一个脱敏后的企业案例可以承载多种教学功能，但如果目标不清晰，课堂容易变成故事分享或企业情况介绍，失去案例教学应有的训练价值。本研究将教学目标分解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知识目标，即学生通过案例应掌握哪些概念和原理。以选品验证案例为例，知识目标包括市场容量的测算方法、竞争格局的分析框架、成本结构的构成要素、盈亏平衡点的计算逻辑。这些知识点在传统课堂中也可以讲授，但嵌入案例情境后，学生是在“需要用的时候学”，记忆和理解的效果更好。第二层是能力目标，即学生通过案例分析应锻炼哪些实操技能。选品验证案例对应的能力目标包括数据检索与整理能力、定量分析能力、风险判断与决策能力；广告 ACoS 诊断案例对应的是广告报表解读能力、关键词优化能力和预算分配能力；客诉处理与研发反馈案例对应的是信息分类能力、统计归纳能力和跨部门沟通能力。第三层是素养目标，即学生在案例讨论中应形成的职业态度和价值判断。跨境电商运营中常见的“刷单冲量还是合规经营”“低价抢市场还是品质溢价”“客诉敷衍了事还是推动改款”等矛盾，背后涉及商业伦理和职业操守的判断，这些素养目标需要在案例讨论中有意识地引导。

三层目标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知识目标是基础，能力目标是核心，素养目标是升华。教学设计应围绕能力目标组织课堂活动，让知识目标的达成服务于能力训练，让素养目标的渗透贯穿于案例分析的全过程。

（二）教学内容的模块化组织

三个案例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在教学组织中可以采用模块化的方式。每个案例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模块，安排两学时完成，三个模块合计六学时，可以根据课程进度灵活安排在连续三周或集中实训周内完成。

选品验证模块的教学内容包括四个环节。第一环节是情境导入，教师用五分钟简要介绍案例企业的背景和面临的选品困境，抛出“进还是不进”的核心问题。第二环节是数据发放与分析，学生分组领取脱敏后的市场容量数据、竞品价格数据和成本结构数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市场分析和利润测算。第三环节是小组汇报与辩论，各组展示自己的分析结论和决策理由，教师引导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重点追问“你的数据支撑是什么”“如果市场环境变化你的结论是否还成立”。第四环节是总结与升华，教师点评各组方案的优劣，归纳选品决策的一般方法和常见误区，并引出素养层面的讨论：在数据不完备的情况下，是等待更多数据还是基于已有信息果断决策?

广告 ACoS 诊断模块同样采用四环节结构。情境导入环节呈现 ACoS 持续攀升的背景和运营团队的焦虑；数据分析环节发放脱敏后的广告报表，要求学生识别低效关键词并提出优化方案；汇报辩论环节聚焦“降预算还是维持预算”的两难选择；总结升华环节归纳广告优化的核心逻辑，并引导学生讨论“短期利润和长期排名哪个更重要”。

客诉处理与研发反馈模块的情境导入环节呈现一批真实的脱敏客诉邮件，让学生直观感受客

诉的数量和类型；数据分析环节要求学生分类打标、统计高频故障、撰写改款建议；汇报辩论环节围绕“改还是不改”展开，不同小组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总结升华环节讨论客诉管理的闭环价值，以及“客户的声音如何成为产品改进的动力”。

（三）教学方法的适配选择

案例教学不等于“讲故事+提问”，不同的教学内容需要匹配不同的教学方法。三个案例虽然都属于决策型案例，但在具体教学方法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选品验证案例更适合采用“角色扮演+决策模拟”的方法。学生扮演跨境电商运营经理的角色，面对有限的预算和时间窗口，需要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做出是否进入新市场的决策。教师可以设置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每个节点上发布新的市场信息（如竞品突然降价、物流成本上涨等），模拟真实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这种方法可以强化学生的临场决策能力和抗压能力。

广告 ACoS 诊断案例更适合采用“数据分析+方案竞赛”的方法。学生拿到相同的广告报表数据，各自独立或分组制定优化方案，然后横向对比不同方案的预期效果和取舍逻辑。由于 ACoS 优化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不同方案之间的比较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过程。教师可以引入“预算约束”条件，迫使学生在有限的资源下做出优先级排序。

客诉处理与研发反馈案例更适合采用“分类打标+角色互换”的方法。前半段学生以客服主管的身份对客诉邮件进行分类和统计分析，后半段切换到产品经理的角色，根据分析结果撰写改款建议。角色互换的目的是让学生体会同一个问题在不同职能岗位上的视角差异，理解跨部门协作的必要性和难度。

（四）考核评价的多元设计

案例教学的考核不能只看最终的决策结论，更要看分析过程和参与质量。本研究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过程性评价占 60%，包括三个维度。第一是课堂参与度，考察学生在小组讨论和全班汇报中的发言质量和次数，不追求“说得最多”，而是追求“说得有据”。第二是分析工具的使用，考察学生是否能够正确运用市场分析方法、广告报表解读方法和客诉分类方法，而不是凭感觉拍脑袋。第三是团队协作表现，考察学生在小组内的分工配合情况和互相质疑的建设性程度。

结果性评价占 40%，以个人书面报告的形式呈现。每个案例结束后，学生需要提交一份不超过 1500 字的案例分析报告，内容包括问题界定、数据支撑的分析过程、决策结论及理由、反思与改进建议。报告的评价标准不是结论是否正确——因为很多案例本就没有标准答案——而是论证的逻辑是否严密、数据的使用是否恰当、反思是否深入。

三个案例全部完成后，还可以设置一个综合性考核任务：给定一个新的脱敏企业情境，要求学生在一周内完成从问题识别、数据分析到决策建议的全流程分析，综合检验三个模块的学习效果。

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访问工程师入企诊断为起点，以某制造型出口企业为案例对象，沿着“产业现场到问题识别、真实问题到教学素材、教学素材到课程资源”的三阶转化路径，系统探讨了跨境电商教学案例的开发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访工诊断是教学案例开发的有效起点。不同于传统的二手资料案例开发或企业委托案例开发，访问工程师以教师身份嵌入企业运营一线，既有足够的时间和权限接触真实的业务数据和管理矛盾，又有教育学背景支撑其对素材的教学价值判断。这种“教师即研究者、企业即实验室”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学案例开发中长期存在的“案例脱离实际”和“企业不愿配合”的双重困境。本研究中，为期一个月的密集调研所发现的六大问题，均来自真实运营场景，而非教科书式的假设或二手数据的拼凑，这为后续的案例开发提供了扎实的素材基础。

第二，案例筛选需要建立明确的标准化框架。并非所有企业问题都适合转化为教学案例，本研究提出的典型性、矛盾性、可脱敏性、可操作性四项筛选标准，为从问题池中甄选案例素材提供了可操作的判断依据。三个入选案例——选品验证、广告 ACoS 诊断、客诉处理与研发反馈——分别对应跨境电商运营的选品、引流、售后三个核心环节，且各自具有鲜明的决策矛盾和适中的教学复杂度，验证了四项标准的有效性。同时，案例筛选与访工诊断的互动关系表明，案例开发不是先诊断后筛选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在产业现场中动态调整、不断迭代的过程。

第三，脱敏重构是连接产业素材与教学案例的关键桥梁。企业数据涉及销售额、利润率、客户信息等敏感内容，直接用于课堂教学存在法律和商业风险。本研究提出的聚合化、化名化、模糊化三种脱敏方法，在保护企业利益和个人信息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保留了案例的决策逻辑和教学价值。选品验证案例经过两轮脱敏调整的经验说明，脱敏不是一次性的技术操作，而是一个需要在“保护信息”和“保留价值”之间反复平衡的动态过程，双重校验机制为此提供了质量保障。

第四，教学设计决定了案例素材能否真正转化为课程资源。从教学目标的三层分解到教学内容的模块化组织，从教学方法的适配选择到考核评价的多元设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围绕案例的特点进行针对性设计。三个案例虽然同属跨境电商领域，但因各自的知识点、能力目标和矛盾类型不同，在教学方法上各有侧重：选品验证侧重决策模拟，广告 ACoS 诊断侧重数据分析竞赛，客诉处理侧重分类打标与角色互换。这种差异化的教学设计，有助于充分发挥每个案例的教学功能。

（二）研究创新

本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三阶转化模型”这一分析框架。现有的教学案例开发研究多集中于案例写作规范或案例教学法的讨论，较少关注从产业现场到课堂资源的完整转化链条。本研究将这一过程分解为三个独立的阶段，并为每个阶段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标准，为同类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分析框架。

二是将访问工程师制度与教学案例开发进行了有机结合。访问工程师作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的重要途径，其功能长期以来主要被理解为教师个人能力的提升，而对这一制度在课程资源建设方面的潜力挖掘不够。本研究展示了访问工程师入企诊断如何同时服务于教师发展和教学资源建设两个目标，拓展了访工制度的功能边界。

三是提供了制造型出口企业跨境电商领域的原创教学案例。现有跨境电商教学案例多为平台操作类或营销策划类，鲜有涉及制造型企业从 OEM 代工向自主品牌出海转型过程中的真实管理困境。本研究的三个案例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于同类院校的跨境电商课程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案例来源单一。三个案例均来自同一家制造型出口企业，虽然保证了案例素材的深度和一致性，但也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其跨境电商业务面临的典型问题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单一企业得出的筛选标准和脱敏方法是否适用于其他情境，尚需进一步验证。

第二，案例应用效果有待长期跟踪。本研究完成了从素材到案例的开发和设计，但由于时间限制，三个案例尚未经过完整的课堂教学检验。教学设计的合理性、案例难度的适配性、考核评价的有效性，都需要在实际教学中接受检验并根据反馈进行调整。未来研究可以在案例投入课堂使用后，通过问卷调查、学生访谈、成绩对比等方式，系统评估案例的教学效果。

第三，脱敏方法的技术细节有待深化。本研究提出了聚合化、化名化、模糊化三种脱敏方法，但对于具体的技术参数——如聚合到什么粒度既能保护信息又不影响判断、模糊化到什么程度不失真——尚未给出量化标准。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数据脱敏领域的技术进展，探索更加精细化、标准化的脱敏方案。

第四，案例的可持续更新机制尚未建立。跨境电商平台规则更新频繁、市场竞争格局变化迅速，案例素材如果不及时更新，很快就会失去时效性。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如何建立案例的定期更新机制，包括与企业保持长期合作关系、设立案例素材的年度采集计划、建立案例版本的迭代管理制度等。

总体而言，本研究在“访问工程师机制下跨境电商教学案例开发”这一议题上做出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个从产业现场到课程资源的完整转化路径。希望这一研究能够为同类院校的访工项目和案例开发工作提供参考，也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在这一方向上继续深耕，共同推动高职院校案例教学的质量提升。

参考文献：

[1] 刘双飞. 高职院校访问工程师项目贡献度的因素研究[J]. 南方职业教育学刊, 2020, 10(3): 59-65.

[2] 刘双飞, 胡晓霞. 访问工程师项目对高职院校教师发展影响的研究[J]. 天津职业大学学报,

2019, 28(5): 30-34.

[3] 吕一博, 刘泉山, 马晓蕾, 等. 工商管理案例开发现状及撰写规范性研究[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17, 10(2): 209-224.

[4] 刘志迎, 徐笑悦, 胡芬, 等. 教学案例: 写、教、学流程画布和逻辑闭环[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3, 16(2): 241-249.

[5] 刘志迎, 张孟夏. 工商管理教学案例的课堂检验探讨[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17, 10(4): 419-428.

[6] 王利明.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问题——以《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解释为背景[J]. 当代法学, 2022, 36(1): 3-16.

[7] 曹毅搏. 商业秘密视角下的企业数据管理机制构建[J]. 科学决策, 2022(9): 1-15.

[8] 窦凯, 李秀华, 郝云凯. 数字经济背景下国贸专业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2024, 22(2): 54-58.

[9] 张艳婷, 韩宝国, 方欢. 基于 PGSD 的模块化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以“跨境电商数据分析与应用”课程为例[J].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 22(6): 58-65.

[10] 潘慧.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生产性实训项目的设计与实施[J]. 对外经贸, 2025, (11): 147-150.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经济数学学习

杨柳依 [1] 何杰 [1]

(1.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会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解释概念、提供解题路径，也可能遗漏经济条件，使学生在获得答案后停止推理。经济数学的教学需要明确学生与工具在问题表征、模型求解和结果解释中的分工。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教学任务设计的方法，提出独立分析、智能辅助、交叉核验和经济阐释四个连续环节，并以具有产能约束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例来说明具体的实施方式。本方案以初稿、关键交互、纠错记录和经济解释作为过程证据，将评价重点落实到假设与约束识别、核验依据及结论适用范围。针对不同数学基础，提出提示支持和分层追问方式，同时说明使用披露与课堂反馈要求。本文形成的是可供试教的教学方案，尚未通过课堂实验检验；其适用性与学习效果需结合实际教学进一步评价。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经济数学；教学设计；人机协同；过程评价

DOI：doi.org/10.70693/202610202365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Economic Mathematics Learning

Yang Liuyi[1], He Jie[1]

1. School of Accounting,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e AI can explain concepts and suggest solution methods, but it may also omi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stop reasoning once an answer is obtained. Economic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refore needs to specify students' responsibilities when using AI to formulate problems, solve models, and interpret results. Drawing on publish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develops a teaching design with four stages: independent analysis, AI assistance, cross-verification,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A profit-maximization problem with a capacity constraint illustrates the proposed activities. Initial models, selected AI interactions, correction records, and economic explanations serve as evidence for process assessment, with attention to assumptions, constraints, verification, and the scope of conclusions.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differentiated prompts and questions,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classroom feedback procedures. The design is intended for classroom piloting; its feasibility and effects on learning have not yet been empirically evaluated.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nomic mathematics; teaching design; human-AI collaboration; process assessment

作者简介：杨柳依（1991—），女，博士，研究方向为大数据金融、经济数学教育；
何杰（1972—），男，讲师，研究方向大数据与信用评估。
通讯作者：何杰

一、问题提出

经济数学中的题目的正确答案有两层要求：一是运算成立，二且结论适用于题目给定的经济情境。以利润问题为例，学生不仅需要求解导数，还需要进一步给出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判断，例如收入与成本如何随产量变化、产量受到哪些约束，以及最优值对应什么经营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迅速提供公式和步骤，但学生作为使用主体，需判断工具是否使用了题目中的全部条件。若作业只检查结果，教师难以区分学生已经理解了模型，还是仅仅只获得了一份形式完整的解答。教育部于 2024 年公布的首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涉及到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1]。UNESCO 指南（2023）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数据保护和能力建设[2]；荀渊（2023）提出，应重视学生与人工智能协作共处的能力发展[3]。这些要求落实到经济数学课程上，意味着教师需要把可借助工具的活动、应由学生承担的判断以及评价所需的证据纳入教学任务要求。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不同视角。Chan 和 Hu（2023）讨论了学生感知的学习支持及准确性、隐私等顾虑[4]，Abbas 等人（2024）考察了学生的使用行为与拖延、记忆及学业表现的关系[5]，Baidoo-Anu 等（2024）关注学生体验和培训指导需求[6]。Jensen 等（2025）分析 ChatGPT 发布初期高等教育评论中的主张，提示应审视对技术应用的乐观预期[7]。课程层面已有“化工热力学”AI 助教实践[8]及数学课堂教学内容选配探索[9]。这些文献为本文的教学任务设计提供了一些参考，但仍然需要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教学任务设计的方法，围绕学生如何保留独立判断、如何核验 AI 建议、教师如何评价学习过程三个问题，提出四阶人机协同方案，并通过自设教学例题说明活动与评价的对应关系。

二、教学任务的设计原则

（一）保留学生的初步判断

学生在使用 AI 前应当提交问题表征，包括变量、单位、函数关系和主要约束。前置任务控制在当前知识水平可完成的范围内。这样操作的作用是为后续比较留下依据。AI 补充了什么，学生为什么修改，哪些判断仍需保留，这些原始依据都需要保留。因为没有初稿，仅凭完整答案很难识别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

（二）将核验落实到具体步骤

“检查 AI 是否正确”的过程显得过于笼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将其拆成学生可以执行的任务。具体而言，概念解释要回归定义，公式推导要核对题目条件，数值结果要进行复算，经济结论要检查条件约束与单位。另外，还需要学生采用其他的 AI 进行重复回答，用来补充线索。但需要说明的是，两次回答一致并不能代替学生进行独立验证。关键依据应来自数学定义、计算过程和题目条件。

（三）使评价证据对应学习目标

如果课程目标包括建立模型、识别错误和解释结果，评价就需要看到相应证据。交互记录不能给以数量取胜，学生只需保留影响方案判断的片段，并说明采纳或拒绝的理由。教师将这些材料与初稿、最终解答对照，必要时还需要以简短追问进行辅助检验，检查学生能否解释关键步骤。

三、四阶人机协同任务的组织

（一）独立分析并形成初稿

教师首先提供完整的经济背景与数据条件，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说明待解决的问题，列出变量及单位，将文字信息转化为关系式，并指出哪些条件会限制答案。如果学生遇到暂时不能确定的关系，教师允许其用问题形式标注。例如，价格是否随产量变化、固定成本在停产时是否仍需承担，都应在求导前确认。教师依据初稿判断学生的学习困难发生在经济情境理解还是数学表达方面。

（二）围绕初稿使用 AI

学生将初稿中的具体困难提交给 AI，问题应包含背景、已有模型、本人判断与希望检查的步骤。教师可提供一些问题的提问起点，例如“请检查我是否遗漏了约束，并说明该约束影响哪一步”，但不可要求全班套用同一段长提示词。学生收到反馈后，标记需要验证的建议，而不是立即替换自己的解答，对于不适用的建议，也应写出自己的拒绝理由。

（三）交叉核验并形成纠错记录

学生选择决定结论的步骤进行独立复算，检查函数的定义域、可导性、单位和条件约束；必要时可借助计算器或电子表格验证数值。学生的纠错记录至少需要说明原判断、核验依据及修正

后的影响。教师可提供含有条件遗漏的教学错解，让学生进行诊断。学生之间也可根据自己的 AI 输出进行相互检验。需要注意的是，教学错解应明确由教师为活动编制。

（四）解释经济结果与适用范围

学生用经济语言说明数值结果意味着什么、依赖哪些假设，以及条件变化后需要重新检查哪些结论。解释并不以重复公式作为完成标准。例如，“利润在该产量下最大”之外，还需学生交代该产量是否可行、价格是否由模型给定、产能变化会不会改变决策。学生的最终提交材料需要呈现出从初稿到结论的完整判断过程。

四、具有产能约束的利润最大化教学示例

（一）例题条件与初步模型

以下为说明教学流程而设置的例题，所用数值并非来自企业调查或课堂测量。

现假设一企业在某短期经营期内的产量为 q，价格为 $p(q)=100-q$，收入与成本采用一致的货币单位，成本函数为 $C(q)=20q+100$。固定成本为 100，在该期内无论是否生产均需承担，产能上限为 30，允许企业停产。

为便于导数教学，该题将产量视为连续变量。要求学生确定使该期利润最大的产量，并说明产能上限变化的影响。

学生应先写出收入 $R(q)=q(100-q)$，利润 $\pi(q)=R(q)-C(q)=80q-q^2-100$，可行域为 $0\leqslant q\leqslant 30$。这里的价格随产量变化，不能按价格外生不变处理；固定成本的短期承担条件也使 $\pi(0)=-100$ 具有明确含义。上述条件需在初稿中保留，避免后续学生仅仅根据求导的结果来作出决策。

（二）提示与教学错解的核验

教师在教学中，允许学生将自己的模型提交给 AI，要求检查收入函数与可行域是否一致，并解释求导结果如何用于决策。另外，教师需要单独提供一份自己编制（非 AI 输出）的教学错解。

例如，由 $\pi'(q)=80-2q=0$ 得 $q=40$，且 $\pi''(q)=-2<0$，所以最优产量为 40。

该推导找到了无产能约束时的顶点，却没有处理 $q\leqslant 30$。核验的关键是需要学生指出 40 不在本题的可行域内，并说明二阶导数为负不能免除约束检查。

在修正时可采用两条路径。一是在[0，30]上，$\pi'(q)=80-2q\geqslant 20>0$，利润随产量增加，最大值位于 q=30；二是利用利润函数在闭区间上连续、区间内部可导的性质，检查区间内驻点与端点。区间内没有驻点，比较 $\pi(0)=-100$ 与 $\pi(30)=1400$，得到同一结论。学生应说明两条路径各自使用了什么条件，而不是仅记录答案一致。

表 1 不同产能条件下的候选产量与利润比较

产能上限	需要检查的产量	对应利润	最优产量
30	0，30	−100，1400	30
50	0，40，50	−100，1500，1400	40

表 1 展示了上述自设例题的计算结果。当产能上限改为 50 时，驻点 40 进入可行域，错误解法中，比较端点与驻点后最优产量为 40。对原上限 30 而言，增产到上限之外只是放宽约束后的假设情形，不能作为原题的可行解。

（三）经济解释与参数追问

在原题中，最优产量 30 意味着模型在既定价格关系、成本条件和产能限制下支持满负荷生产，并不意味着企业在任何市场条件下都应扩产。$\pi'(30)=20$ 表示模型在该点附近的边际利润仍为正，可据此讨论放宽产能约束的潜在价值；但扩产还可能增加固定成本或改变需求关系，原模型没有包含这些变化，因而不能直接支持投资结论。

教师可进一步追问：为什么 40 的利润更高却不能选？产能提高到 50 后为什么不选 50？若只改变该期必须承担的固定成本，最优产量是否改变？学生应当作出适当的解释。例如，固定成本作为利润函数中的常数项不改变本例导数及产量排序，但会改变利润水平；如果固定成本随停产或扩产决策发生变化，则应重新建立分段或扩展模型。教师的追问用于检查条件理解，不能由本例推及全部经营决策。

五、过程评价与学习支持

（一）评价材料及判断标准

学生的作业由初稿、关键交互片段、核验记录和经济解释组成。表 2 展示了教师用于检查各类材料是否支持相应学习目标的主要内容。值得强调的是，教师不可将学生的输出篇幅、提示词数量或使用工具的次数给分。评分权重由课程目标和任务难度确定，本文不将某一比例设为普遍适用标准。

表 2 教学任务的过程评价要点

评价维度	主要证据	达到要求的表现
问题表征	使用 AI 前的初稿	变量与单位明确，函数关系有依据，列出影响结论的约束
工具使用判断	关键交互及求助修改说明	问题具体，能够解释采纳或拒绝建议的理由
核验与纠错	复算或错解诊断记录	定位关键错误，用数学与题目条件说明修正依据
经济解释	文字结论与教师追问	说明结果含义、适用条件及模型未纳入的因素

同一错误应依据证据区分处理。举例来说，若学生的初稿中遗漏了相关约束条件，但学生在核验中发现该遗漏并进行了修正，说明该学生完成了纠错任务。若某学生的最终答案正确，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检查端点，则应当被视为仍未提供充分的条件理解证据。教师可以分别评价最终模型与修改过程，避免既忽略纠错，也把任何修改都视为能力提高而导致对学生使用 AI 的偏差。

（二）分层提示与课堂反馈

数学基础较弱的学生可先获得变量表或条件清单，再完成收入和利润表达式，教师追问重点放在每一项对应的经济含义。能够独立建模的学生则可比较求导判断符号与候选点比较两种路径，并讨论参数变化。任务的核心要求保持一致，提示支持程度有所区别，避免把使用更复杂提示词当作更高水平。课堂反馈应针对可修正的问题。例如，对遗漏产能约束的学生，先追问“候选产量是否满足题目条件”，再要求其完成比较；对把固定成本与停产决策混淆的学生，教师可使其回到例题约定重新解释成本函数。此外，教师可根据常见错误调整下一次任务，但反馈记录只能说明教学中观察到的问题，不能直接证明方案产生了因果效果。

六、实施条件与后续检验

（一）实施准备与使用要求

实施前，教师自行复核例题、参考解答和教学错解，确认学生已经学习所需的导数与极值知识。课堂使用 AI 可能受到账号、网络和设备条件影响，教师也可提供预先保存的交互片段或统一示例，保证学生仍能完成判断与核验任务。提交材料避免包含个人身份信息、同学作业或未经允许的敏感数据。学生需说明使用的工具、日期、主要用途及采纳的内容；教师应按学校和课程规则说明允许的使用范围。若作业缺少过程材料，可先通过补充说明或简短口头核验判断学生理解，不能仅凭文字风格判定违规。工具版本和输出会发生变化，教师的教学课堂评价应依靠可追溯的材料，而非假定同一提示始终产生同一答案。

（二）后续试教与效果检验

后续的试教可在记录方案实施情况的同时，设置不借助 AI 的独立任务，考察学生能否识别约束、定位错误并解释经济结果。若安排前后测，教师需要检查题目难度与评分标准的可比性，并记录学生数学基础、实际使用情况和缺失作答；条件允许时再设置实验组与对照组。交互记录与学生解释可帮助分析改进发生在哪一步，但只有在取得相应数据后，才能报告学习表现或效果差异。

七、结语

经济数学中的 AI 辅助任务应保留学生对模型条件与结论的判断。本文提出四个连续环节，以初稿建立比较起点，以具体求助限定工具用途，以交叉核验处理错误，以经济阐释检查结论的适用范围。产能约束例题说明，即使求导过程正确，遗漏可行域仍会导致不可执行的决策，因此评价需要同时检查结果与依据。该方案目前属于文献支持下的教学设计，尚无课堂数据证明其学习效果。后续应通过试教与独立任务评价，检验方案的可行性及其对学生表现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关于公布首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的通知[EB/OL]. 2024-04-17. https://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404/t20240417_1126075.html.

[2] UNESCO. Guidance for 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R]. Paris: UNESCO, 2023. DOI: 10.54675/EWZM9535.

[3] 荀渊.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价值和使命[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7): 56-63.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23.07.006.

[4] CHAN C K Y, HU W. Students’ voices on generative AI: perceptions,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in higher educ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2023, 20: 43. DOI: 10.1186/s41239-023-00411-8.

[5] ABBAS M, JAM F A, KHAN T I. Is it harmful or helpful? Examining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enerative AI usag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2024, 21: 10. DOI: 10.1186/s41239-024-00444-7.

[6] BAIDOO-ANU D, ASAMOAH D, AMOAKO I, et al. Exploring student perspectives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J]. Discover Education, 2024, 3: 98. DOI: 10.1007/s44217-024-00173-z.

[7] JENSEN L X, BUHL A, SHARMA A, et al. Generative AI and higher education: a review of claims from the first months of ChatGPT[J]. Higher Education, 2025, 89: 1145-1161. DOI: 10.1007/s10734-024-01265-3.

[8] 卢滇楠, 党漾, 王宏宁, 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课程教学：以“化工热力学”课程为例[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4(5): 89-98.

[9] 曹一鸣, 吴景峰. 生成式 AI 赋能数学课堂教学内容选配的探索与研究[J]. 数学教育学报, 2024, 33(5): 60-66, 7.

提质与增趣：“双减”课后服务中音乐活动的优化研究

——以黄石市沈家营小学为例

周莲怡[1] 李海萌[1]

(1.湖北师范大学，湖北 黄石 435000)

摘 要：“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的目标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本研究以黄石市沈家营小学为个案，以“提质—增趣”为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访谈调查与行动研究等方法，考察以民乐团为代表的课后音乐活动的实践样态与现实困境。研究发现：课后音乐活动在提升学生音乐素养、增强文化自信方面成效明显，但“提质”与“增趣”双目标失衡问题突出，表现为课程梯度不足、评价聚焦展演结果、活动形式固化、协同停留表层。其根源在于师资、经费、场地等资源的结构性制约，以及供给节奏与学生兴趣发展规律的错位。据此，研究提出“提质”与“增趣”融合共生的优化策略：提质层面构建“基础—提高—展演”三阶递进课程体系，深化高校协同并引入非遗传承人等社会力量，建立过程性与表现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增趣层面融入游戏化元素、推行“菜单式”选课、打造品牌展示活动，并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上述策略已在学校实践中分步推进，其对学生参与度、素养成长度与家校认可度的实际成效，有待更长时间的跟踪检验；阶段性经验可为同类学校课后音乐活动的高质量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双减”；课后服务；音乐活动；提质；增趣；校地协同

基金项目：2025 年黄石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生专项）课题“提质与增趣：‘双减’课后服务中音乐活动的优化研究——以黄石市沈家营小学为例”（课题编号：2025GHA098）

DOI：doi.org/10.70693/202610206483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Interest Enhancement: A 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of Music Activities in After-School Service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 A Case Study of Shenjiaying Primary School in Huangshi City

Zhou Lianyi[1] Li Haimeng[1]

1.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0, Hube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goal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has shifted from "availability" to "quality". Taking Shenjiaying Primary School in Huangshi City as a case study and adopting a "quality improvement—interest enhancem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actice and dilemmas of after-school music activities,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orchestra,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interview survey and action research.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fter-school music activities have achieved

作者简介：周莲怡（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李海萌（1982—），男，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人类学、音乐教育。

通讯作者：李海萌

notable results in improving students' musical literacy and enhancing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yet a prominent imbalance exists between the twin goals: the curriculum lacks a graded design, evaluation focuses on performance outcomes, activity forms are rigid, and school-locality collaboration remains superficial. These problems stem from structural constraints in teachers, funding and venues, as well a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rhythm of provision and the developmental patterns of students' interest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that integrate quality improvement with interest enhancement: building a three-tier progressive curriculum of "foundation—improvement—performance", deepening university-school collaboration and introduc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establish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combining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embedding gamified elements, implementing a "menu-based" course selection, creating branded showcase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ing supporting mechanisms for teachers, funding and venues. These strategies are being implemented progressively in school practice. Their sustained effects on participation, literacy growth and recognition from families and schools remain to be examined through longer-term follow-up, while the preliminary experience offers a replicable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fter-school music activities in similar schools.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fter-school services; music activities; quality improvement; interest enhancement; university-school collabor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要求学校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每周 5 天开展课后服务、每天不少于 2 小时。这意味着课后服务已从“看护托管”的补充定位，上升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也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美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强调，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音乐活动以审美感知、情感体验和创造表达为基本路径，在课后服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合唱、民乐合奏等活动天然带有集体性，有助于培养合作意识与规则意识；以民乐、戏曲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活动，更承担着文化浸润与文化自信培育的功能。同时，音乐活动以兴趣为起点、以体验为核心，是课后服务“增趣”的重要抓手，也是检验课后服务是否“有趣、有料、有效”的试金石。因此，如何让课后音乐活动既“提质”又“增趣”，是一个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问题。

沈家营小学毗邻湖北师范大学，是一所具有艺术教育传统的公办小学，其课后音乐活动中，民乐团是与湖北师范大学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然而前期调查显示，以民乐团为代表的课后音乐活动仍面临“提质”与“增趣”的双重失衡：教学未按学生年龄与基础分层设计，低年级学生畏难、高年级学生“吃不饱”；评价聚焦展演结果，忽视过程中的兴趣变化；校地合作停留于阶段性授课，难以形成育人合力。该校案例兼具典型性与代表性，本研究尝试构建“提质—增趣”分析框架，通过个案调查与行动干预提炼优化策略。

二、研究现状与概念界定

综观已有研究，大致形成三条线索：一是政策解读与实施现状研究，关注课后服务的政策意涵与“5+2”模式的落实状况；二是服务质量与困境研究，揭示课后服务普遍存在器材不足、专业师资短缺、形式单一、城乡差距明显等结构性问题；三是优化路径研究，多主张构建“普及性 + 个性化”的课程体系并建立校内外协同机制。就音乐学科而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课后音乐服务的价值论证、音乐社团的组织训练、民族音乐进校园以及兴趣激发与评价方式等主题。总体来看，已有成果多聚焦常规音乐课堂或单一社团，对多种音乐活动并置运行的整体性考察较为薄弱，对“提质”与“增趣”相互促进的内在机制亦缺乏深入阐释。本研究即从此切入。

在概念界定上，“提质”指提升课后音乐活动的质量，指向专业性、结构化与育人实效；“增趣”指增强活动的趣味性与学生的参与度，指向趣味性、参与度与文化浸润。在学理上，该框架与学习理论中“结构”与“动力”的双重视角相呼应：莱夫和温格（2004）提出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表

明，学习者是在实践共同体中经由边缘到中心的渐进参与实现能力成长与身份建构的，参与机会的结构化程度直接影响其学习投入的意愿，这为“提质”与“增趣”的融合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由此，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提质为增趣提供内容支撑与成长价值，使“趣”不流于浅层娱乐；增趣为提质提供动力机制与持续能量，使“质”不沦为枯燥训练。二者融合共生，共同构成判断课后音乐活动质量的分析坐标。

三、研究设计与个案概况

本研究遵循“提出问题—框架构建—个案考察—问题诊断—策略设计—实践探索”的思路展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调查法与行动研究法。考虑到研究场域规模有限，且研究对象为小学生，本研究未采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而以半结构化访谈作为主要资料收集方式，辅以课堂观察与实物资料分析。访谈对象涵盖校长、专职音乐教师、班主任、高校指导教师共 6 人，学生 12 人，家长 8 人；课堂观察覆盖民乐团的日常训练与主题展演。考虑到民乐团是该校课后音乐活动体系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品牌项目，本研究以其为核心考察对象，访谈与观察主要围绕民乐团展开，兼及艺术节、特长展示等其他音乐活动。访谈围绕参与动机、活动体验、素养变化、困难与建议四个主题展开，经转录后按主题编码归类，形成“活动成效—现实困境—归因分析”的主题框架，并与课堂观察记录相互印证；下文引用的访谈资料按受访者身份标注（教师 T1—T6、学生 S1—S12、家长 P1—P8），以增强证据的可追溯性。鉴于实践干预处于推进阶段，本研究将实践环节定位为策略的分步推进与阶段性探索，系统效果评估留待更长周期的跟踪完成。

沈家营小学毗邻湖北师范大学，是一所具有艺术教育传统的公办小学，长期将艺术教育作为办学特色。学校现有专职音乐教师数量有限，除承担常规音乐课外，还须兼顾多个社团的训练指导，日常排练主要依托课后服务时段开展。“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民乐团是学校的品牌社团，也是与湖北师范大学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按声部编设拉弦（高胡、二胡）、吹管（笙、竹笛）、弹拨（扬琴、琵琶、中阮、大阮）、打击乐等声部，设一团与二团两个梯队，由高校专业教师定期驻校指导，高校不同专业的大学生负责日常教学，每周固定开展活动，参与学生覆盖二至六年级，既有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性训练，也有面向骨干团员的提高性排练，形成了普及与提高并重的活动格局。

在社团活动之外，学校以主题活动营造全员参与的音乐氛围。每年举办校园艺术节，设置班级合唱、器乐展演等专场，力求实现“班班有节目、人人可上台”；结合期末与重要节日开展特长展示活动，鼓励学生以独奏、独唱、亲子合作等形式展示音乐特长。主题活动与社团训练相互衔接：社团为展演储备作品，展演为社团提供动力，形成“以演促练、以练促学”的良性循环。在运行机制上，学校探索了三项做法：一是“小先生制”，由高年级或资深团员负责新团员的基础带练与声部辅导，以教促学、以老带新；二是高校协同，由高校教师承担民乐团核心声部的指导任务，师范生以实习助教身份参与日常训练；三是分层走班，按学生年龄与学习基础划分梯队，基础层重在启蒙体验，提高层重在技能进阶。三项机制初步盘活了校内外的音乐教育资源，但也逐渐显露出协同深度不足、分层依据单一等问题，成为后文诊断与优化的现实起点。

四、音乐活动“质”与“趣”的失衡及归因

（一）“质”的成效与不足

从访谈反馈看，课后音乐活动在提升学生音乐素养方面成效明显。多数学生表示参加活动后“音乐知识更丰富了”“演奏技能有明显进步”“对音乐作品的理解更深了”，部分高年级学生已能独立视奏简单乐曲。民乐团指导教师反映，经过一个学年的系统训练，二团学员普遍掌握了基础乐理与合奏要领。学校民乐团曾在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中亮相。多位家长在访谈中提到“孩子更自信了”“回家会主动练习乐器”，认为音乐活动对孩子的性格与习惯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说明课后音乐活动在专业性与育人实效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也为后续优化提供了良好起点。

但“质”的不足同样明显，突出表现为课程梯度不足。不少学生反映“活动内容难度没有明显区分”，低年级学生普遍感到“有些内容对我来说太难”，而高年级学生则抱怨“内容不够有挑战性”，“吃不饱”与“够不着”的现象并存。一位二年级家长反映孩子“有点跟不上、慢慢就不想去了”，而五年级学生则表示“想学更难的作品但没有机会”。究其机制，现有分层主要按年级而非素养水平划分，同一梯队内部差异较大；训练内容以作品排练为主线，缺乏面向不同基础的阶梯化设计。当学生长期处于“过难”或“过易”的状态时，学习的

获得感与持续投入的意愿都会受到削弱，课程的结构化程度因此成为制约“提质”的首要因素。

除课程梯度外，“质”的不足还体现在评价聚焦展演结果上。访谈显示，学校对课后音乐活动的评价基本以期末展演结果为主要依据，展演作品完成度、获奖情况成为衡量活动成效的核心指标，而学生在训练过程中的兴趣变化、协作表现与审美理解则较少被记录与反馈。这种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使训练内容向少数骨干团员倾斜，普通学生的成长需求容易被忽视；二是使学生形成“为演出而练”的功利化认知，一旦未能进入展演名单，参与的积极性便明显下降。评价功能的窄化，使课后音乐活动难以真正发挥促进全体学生素养发展的作用。

进一步看，“质”的不足还与专业支撑的薄弱密切相关。学校专职音乐教师数量有限，既要完成常规音乐课教学，又要兼顾多个社团的日常训练，精力的分散使其难以对每一名学生进行细致的个别指导。高校协同虽引入了专业力量，但合作形式仍以阶段性授课为主，高校教师通常按周或按主题到校指导，训练的系统性与连续性难以保证；师范生助教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人力，但其自身尚处于学习阶段，在教学设计与课堂调控方面经验不足。此外，非遗传承人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尚处于零星状态，缺乏稳定的合作机制与课程化安排，所开设的特色内容往往随人员变动而中断。专业支撑的不稳定，使活动内容在“规范化”与“专业化”两个方向上都受到限制，也解释了为何课程梯度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二）“趣”的成效与不足

在“趣”的层面，课后音乐活动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多数学生表示“喜欢”或“非常喜欢”参加课后音乐活动，民乐团学生尤其珍视“能演奏民族乐器”的经历，并表现出较强的自豪感；不少学生认为音乐活动让自己“更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名学生在访谈中提到，通过学习民乐“知道了二胡、古筝是中国的乐器”“想把这些好听的音乐介绍给更多人”。家长也反映，孩子参加活动后对音乐类节目、传统戏曲的关注度明显提高。这印证了民族音乐活动在增强文化认同方面的独特价值，也说明“增趣”已具备较好的情感基础。

但“趣”的不足同样值得警惕，突出表现为活动形式固化、自主选择空间有限。相当一部分学生希望“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音乐活动”，认为“活动形式比较固定，希望更有新意”，也有学生希望能“自己选择想参加的活动”。从活动供给看，社团招新以学生自选为主，训练流程长期沿用“训练—分排—合排”的固定程式，游戏化、创编类环节占比不足；学期末以展演为唯一出口，过程中的趣味体验被弱化。当活动供给的固定节奏与学生兴趣的动态变化不匹配时，“兴趣浓但选择少”的矛盾便显现出来，部分学生因此在中途退出社团。

（三）失衡的双重根源

上述失衡有两重根源。其一是资源的结构性制约。师资方面，学校专职音乐教师既要承担常规音乐课教学，又要兼顾多个社团训练，负担沉重；高校协同虽引入专业力量，但以阶段性授课为主，难以覆盖常态化训练需求。经费方面，乐器购置与维护、外聘教师劳务等缺乏稳定渠道，社团只能优先保障既有乐器的使用。场地方面，社团排练与课后托管共用教室，音乐活动“找地方、抢时间”的情况时有发生。资源约束之下，学校只能优先保障“能开起来”，无暇顾及“开得好、开得有趣”，分层设计、游戏化改造等提质增趣举措因此难以落地。

其二是供给节奏与学生兴趣发展规律的错位。小学生的音乐兴趣具有易变性、波动性与情境性，其发展往往伴随“尝试—消退—再点燃”的循环，需要活动供给及时回应；而课后服务按周次固定排课、以学期为周期的供给节奏，难以适应兴趣的动态变化。同时，教师普遍缺乏对学生兴趣状态的持续观察与记录手段，往往要等到学生退出社团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当儿童“想尝试、想变化”的天性与“固定内容、固定形式、固定出口”的供给结构相遇，“趣”的损耗便在所难免。这一判断也提示，优化策略必须同时回应资源条件与供给机制两个层面，而不能仅停留在活动形式的翻新上。

五、“提质”与“增趣”的优化策略

基于上述诊断，本研究以校地协同为支撑，从“提质”与“增趣”两个维度设计优化策略，并在实践中逐步调整完善。

（一）构建“基础—提高—展演”三阶递进课程体系

构建“基础—提高—展演”三阶递进课程体系。基础阶面向全体学生，以音乐游戏、体态律动、歌唱与课堂乐器为主，重在兴趣启蒙与素养奠基，与音乐课堂形成衔接，解决“够不着”的问题；提高阶面向有基础、有兴趣的学生，以分声部训练、

作品排练与乐理进阶为主，重在技能提升与协作养成，实行按素养水平而非单纯按年级动态编组；展演阶面向骨干团员，以舞台实践、音乐创编与作品打磨为主，重在表现力与审美创造的培育，回应“吃不饱”的诉求。三阶之间实行“动态晋升、可上可下”，学生可依据自身进步与意愿在层级间流动，避免一次分层带来的固化。配套建立“音乐成长护照”，以简洁的条目记录学生每阶段掌握的技能与参与的活动，使每名学生都能看到自己的成长轨迹，也让教师的分层依据从“年级”转向“素养”，从根本上缓解课程梯度不足的问题。

（二）深化高校协同，引入非遗传承人等社会力量

深化高校协同，引入非遗传承人等社会力量。学校与湖北师范大学共建“课后服务美育协同基地”，形成“高校教师—师范生—小学教师”三方协同机制：高校教师负责课程研发、师资培训与骨干指导，师范生以实习助教身份融入课后服务、承担日常训练中的示范与辅导，小学教师负责活动组织与校本转化，从而实现专业力量从“阶段性授课”向“常态化陪伴”的转变。同时，学校引入非遗传承人等社会力量，开设黄石地方戏曲、民歌等特色课程，让“非遗进课后”，既充实了课程内容，也强化了音乐活动的文化浸润功能。为保障合作的稳定性，学校建立社会力量的准入审核与考核退出机制，明确资质要求、教学职责与评价办法，确保外聘资源专业可靠、持续可用，避免因人走课停而导致课程中断。

（三）建立过程性与表现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建立过程性与表现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以“过程档案 + 阶段展演 + 成长报告”替代单一的结果评价。过程档案记录学生的出勤情况、课堂投入、合作表现与课后练习轨迹，由教师与“小先生”共同填写，动态捕捉兴趣与素养的变化；阶段展演以音乐会、创编展示等真实任务为载体，考察学生的综合表现力，并明确“人人参与”的原则，让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获得一次展示机会；成长报告以“素养雷达图 + 激励性评语”的形式反馈给学生与家长，淡化横向比较、强调纵向成长。评价结果同时反哺课程设计，教师依据过程档案中反映出的共性问题调整活动内容与分组，使评价真正成为“提质”的抓手而非“筛选”的工具。

（四）融入游戏化元素，探索“音乐 + ”跨界融合

融入游戏化元素，探索“音乐 + ”跨界融合。针对活动形式固化的问题，学校在训练环节嵌入游戏化设计：将节奏训练转化为“节奏闯关”游戏，将视唱练习设计为“音乐寻宝”任务，将作品学习改编为角色扮演与情境创编，让学生在“玩中学、演中悟”。同时开发“音乐 + 体育”（节奏律动操）、“音乐 + 美术”（音乐绘画）、“音乐 + 戏剧”（校园音乐剧）等主题活动，以新奇感与成就感维持学生的兴趣浓度。需要强调的是，游戏化与跨界融合并非弱化专业训练，而是以更贴合儿童心理的形式达成既定的训练目标，在保持专业标准的前提下实现“趣”与“质”的统一。

（五）推行“菜单式”选课，培育学生自主管理团队

推行“菜单式”选课，培育学生自主管理团队。针对自主选择空间有限的问题，学校每学期初发布“音乐活动菜单”，涵盖器乐、声乐、戏曲、创编等模块，并注明各模块的训练内容与基本要求，学生依据兴趣自主填报，学期中允许在名额允许的前提下动态调整一次，兼顾“兴趣优先”与“基础适配”。同时成立学生“音乐委员会”，由学生自主管理社团事务、策划主题活动、组织“周末大舞台”的报名与排期，将“小先生制”升级为“朋辈导师制”，让高年级学生承担更充分的指导与组织角色。自主选择与自主管理共同强化学生的参与感与主人翁意识，使“要我参加”逐步转变为“我要参加”。

（六）举办主题音乐节、草坪音乐会等品牌展示活动

举办主题音乐节、草坪音乐会等品牌展示活动。针对展示机会不足的问题，学校打造多层次、常态化的展示体系。每学期举办一届主题音乐节，如“四季音乐会”“民族音乐周”“亲子音乐嘉年华”，以主题化设计增强仪式感；利用校园草坪、走廊、楼梯转角等非正式空间开展“草坪音乐会”“课间音乐快闪”，让音乐自然融入校园生活；设立“班级音乐角”，支持学生自由组合、随时展示。展示活动坚持“人人可参与、班班有节目”的原则，从“少数人的舞台”走向“全体学生的节日”，以真实、多样的展示机会为学生的音乐学习提供持续动力。

（七）健全师资、经费与场地保障机制

健全师资、经费与场地保障机制。针对资源的结构性制约，学校从三方面着手：师资上，依托高校协同基地开展专项研修，以“课例研讨 + 师徒结对”的方式提升音乐教师的 AI 工具应用与分

层教学设计能力，并逐步培养校内骨干；经费上，将乐器维护与外聘劳务纳入学校年度预算，同时争取校地合作项目与社会资源的支持，形成相对稳定的投入渠道；场地上，统筹安排社团排练时段，采取“错峰使用 + 功能分区”的办法，减少社团与托管之间的空间冲突。保障机制的建立，使前述各项策略具备可持续运行的基础，避免优化举措因条件波动而中断。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策略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支撑的整体。“提质”类策略为活动提供内容支撑与成长价值，使“趣”不流于浅层娱乐；“增趣”类策略为活动提供动力机制与持续能量，使“质”不沦为枯燥训练；保障机制则决定二者能否长期稳定地运转。在实践中，学校采取“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式：优先落实游戏化设计与展示活动等见效较快的举措，再逐步推进课程体系重构与评价改革等需要制度支撑的深层调整，使优化过程与学校实际条件相适应。

六、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提质—增趣”为分析框架，对沈家营小学课后音乐活动的优化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课后音乐活动具有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其成效集中体现在学生音乐素养的提升与文化自信的增强上。第二，当前课后音乐活动的主要矛盾是“提质”与“增趣”的双目标失衡，表现为课程梯度不足、评价聚焦展演结果、活动形式固化、协同停留表层，其根源在于资源的结构性制约与供给节奏同学生兴趣发展规律的错位。第三，“提质”与“增趣”并非此消彼长的两难，而是融合共生的统一体：以三阶课程保障成长梯度，以校地协同夯实专业支撑，以过程性评价牵引真实成长；以游戏化融合激活兴趣，以“菜单式”选课归还选择权，以品牌活动提供持续动力，并以师资、经费与场地的保障机制托底。第四，上述策略已在学校实践中分步推进，其对学生参与度、素养成长度与家校认可度的实际成效，有待更长周期的跟踪检验；“提质—增趣”融合共生的可行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作为个案研究，样本集中于单一学校，结论的外部效度有待更多学校检验；研究以访谈与观察资料为主，对素养提升的客观测量尚不充分；行动干预周期相对有限，策略的长效性仍需更长时间的追踪验证。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开展多校比较，开发可量化的音乐素养测评工具，并探索校地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化路径，为课后音乐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2021-07-24)[2026-10-03].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深入推进课后服务 支持探索暑期托管 切实发挥学校课后育人主渠道作用[EB/OL].(2021-07-13)[2026-10-03].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606/2021/tqh_210713/sfcl/202107/t20210713_544274.html.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EB/OL].(2020-10-15)[2026-10-03].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0/15/content_5551609.htm.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5] 高巍,周嘉腾,李梓怡.“双减”背景下的中小学课后服务：问题检视与实践超越[J].中国电化教育,2022(5):35-41.

[6] 吴晓红.“双减”政策下小学音乐课后服务的现实问题与优化对策[J].新课程研究,2024(S1):119-121.

[7] 王静,王腾宇.“双减”背景下中小学音乐课后服务的现实审思与路径优化[J].中国音乐教育,2024(6):18-24.

[8] 马雨晨,雷琪琪.课后音乐服务的内涵与价值[J].中国音乐教育,2022(12):49-53.

[9] 资利萍,彭雅薇.“双减”政策下学校美育生态的“破”与“立”——艺术类课后服务的立场、使命与创新[J].中国音乐教育,2024(4):67-74.

[10] 莱夫,温格.情景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M].王文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成长课程”理念下小学音乐课堂“五育融合”教学实践研究

李秧秧[1] 许岳军[1]

(1.湖北师范大学，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新时代基础教育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五育并举、五育融合” 成为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导向，旨在破解学科教学单一化、育人碎片化问题，助力学生全面发展。黄石市深耕 “成长课堂” 教改，立足学生成长，聚焦课堂体验、课堂参与与素养培育。小学音乐依托美育特质贯通五育，是推进五育融合的重要抓手。当前小学音乐课堂普遍存在育人目标狭隘、五育融合形式化、课堂模式固化、评价体系单一等现实困境，难以充分发挥音乐学科的综合育人价值。本研究立足 “成长课程” 核心理念，以小学三至六年级音乐课堂为研究载体，通过现状调研、框架建构、课例迭代、实践验证的研究路径，构建 “目标 — 任务 — 活动 — 评价” 一体化的五育融合课堂教学体系，探索五育深度融合的落地路径，优化课堂模式、提升育人实效，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为当地成长课堂与美育建设提供实操范例。

关键词：成长课程；小学音乐；五育融合；课堂教学；教学实践

基金项目：2025 年黄石市教育规划课题《“成长课程”理念下小学音乐课堂“五育融合”教学实践研究》（编号：2025GHB188）；2025 年黄石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德美融合”：黄石文化资源赋能师范院校舞蹈人才培养体系重构研究》（编号：高校组 13 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高师舞蹈专业课程思政“一核两翼三驱四维”模式建构与提升实践研究》（编号：2025354）

DOI：doi.org/10.70693/202610204368

A Study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s under the Concept of "Growth Curriculum"

Li Yangyang[1], Xu Yuejun[1]

1.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2, China

Abstract: Ba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dheres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has become the core orient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It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omogenized subject teaching and fragmented education, and support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Huangshi City promot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Growth Classroom", centers on student growth, and focuses on classroom experience,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competency cultivation. Rely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rimary school music integrates the five educations, serving as a key carrier to advance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At present,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s commonly face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ing narrow educational objectives, formalized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rigid classroom modes and simplistic evaluation systems, which restrict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value of music subject. Based on the core concept of "Growth Curriculum", this research takes music classrooms for Grades 3 to 6 in primary schoo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research routes of curr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framework construction, lesson iteration and practical verification, it

作者简介：李秧秧(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许岳军(1981—)，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舞蹈教育。

通讯作者：许岳军

builds an integrated classroom teaching system of "Objective-Task-Activity-Evalua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This study explores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in-depth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optimizes classroom modes, improves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and provides practical examp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rowth Classroom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local regions.

Keywords: Growth Curriculum; Primary School Music;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ing Practice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全面落地，基础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当下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核心重点，是打破单一学科育人壁垒、深度落实五育融合育人理念，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体系。新课标摒弃单纯知识技能本位，聚焦学生核心素养与全面发展，强调学科教学的综合性、实践性与育人价值。为推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黄石市全面推进“成长课堂”教学改革。改革摒弃传统灌输式固化模式，确立“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核心理念，突出课堂教学的体验性、探究性、实践性与成长性，高度关注学生课堂参与度、体验感与素养养成，为各学科课堂转型提供区域方向。小学音乐作为美育落地的重要阵地，其演唱、聆听、律动、创编等课堂活动天然承载德、智、体、劳多元育人价值，是贯通五育、落实融合育人的关键学科。然而，当前小学音乐课堂五育融合育人仍存在诸多短板，育人实效亟待提升。现阶段多数音乐课堂过度聚焦音准、节奏、演唱等技能训练，忽视学生审美感知与情感熏陶；五育融合多停留在教案文字与口头说教，标签化、碎片化现象突出；课堂以教师讲授、学生模仿为主，自主探究与创编实践机会不足；评价只看演唱结果，缺乏对学生过程成长的关注，音乐学科综合育人价值难以真正发挥。基于此，开展本课题研究，探索适配“成长课堂”理念的小学音乐五育融合教学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研究立足区域“成长课堂”特色教育理念，聚焦小学音乐单一学科，将宏观五育融合理念转化为具象的课堂教学体系，细化五育融合在美育课堂的落地路径，丰富了五育融合学科落地的理论体系。同时突破当前“成长课堂”研究多停留于理念阐释、较少涉及音乐学科的不足，完善小学音乐课堂五育融合的学理参考。

实践意义：本研究通过一线课堂调研与迭代实践，梳理小学音乐五育融合教学的现实问题，构建可落地、可操作的教学框架、活动范式与评价工具，能够直接解决一线音乐教师“融合无方法、教学无体系、评价无依据”的现实困境。通过典型课例打磨与推广，促进学生审美、品格、思维、实践能力全面发展，研究成果可用于区域校本教研，助力本地小学音乐课堂改革与美育建设。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围绕五育融合与音乐教育开展了大量研究，现有成果多集中于五育融合的政策解读、宏观育人机制、跨学科课程建设等层面；针对小学音乐课堂的专项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的德育渗透、劳动教育融入或审美教学创新，缺乏德、智、体、美、劳一体化的课堂实施体系。黄石“成长课堂”相关研究也较少涉及音乐学科，学科落地研究相对薄弱。

国外艺术教育研究聚焦体验式学习、项目式教学与表现性评价，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真实情境创设、学生实践创造与过程性成长评价，为本研究任务链设计、过程性评价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国外经验不能直接照搬，需结合国内艺术课标与黄石本地教改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为本课题奠定理论基础，但普遍存在宏观研究多、微观落地少，理念阐释多、实操策略少，单一育人研究多、五育协同研究少的问题。本研究立足区域特色教改理念，聚焦真实课堂场景，开展系统化实践研究，弥补现有研究短板。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究思路：本研究遵循“现状诊断—框架建构—实践迭代—评价优化—成果凝练”的核心思路展开。首先，通过课堂观察、师生访谈、现状调研，梳理当前小学音乐课堂五育融合的现存问

题与成因；其次，结合成长课程核心理念与音乐学科特质，构建五育融合音乐课堂教学框架、任务体系与评价体系；再次，选取唱歌课、欣赏课、综合实践课三类核心课型，开展多轮行动研究，迭代优化教学设计与教学策略；最后，通过多源数据评估教学效果，凝练可推广的教学策略、课例资源与实施路径，形成完整的研究成果体系。

研究方法：一是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五育融合、成长课堂、小学音乐教学、表现性评价等相关政策文件与学术文献，界定核心概念，厘清研究理论基础；二是课堂观察法，依托自主研制的课堂观察量表，常态化观摩小学三至六年级音乐常态课堂，记录教学目标、活动设计、五育融合方式、学生参与状态与评价模式，精准诊断教学痛点；三是行动研究法，以“计划 — 行动 — 观察 — 反思”为核心循环，结合不同音乐课型开展教学设计、课堂实施、效果复盘、方案优化的迭代研究；四是案例研究法，选取典型教学单元打造精品课例，完整记录教学全过程，提炼不同课型的五育融合实施策略；五是评价研究法，构建过程性、表现性、增值性三位一体评价体系，通过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评价、作品分析等多维度方式，全面评估教学改革效果。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成长课程：成长课程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遵循小学生身心成长节律与认知发展规律，以学生完整生命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逻辑重构的整合型课程体系。区别于传统学科课程“以知识点、教学进度为中心”的设计逻辑，成长课程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将德、智、体、美、劳融入课堂全过程，重视体验、探究与多元评价，是黄石本土化课堂育人理念。

五育融合：依据《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艺术课堂要打通美育与德、智、体、劳边界，以美润心、以美铸魂，落地五育融合课堂。本研究中的五育融合，指以美育为统领，将德育、智育、体育、劳育内嵌于音乐聆听、演唱、律动、创编、表演活动，实现各育有机共生，而非简单叠加、口头说教。

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实践：指小学常态音乐课堂，涵盖唱歌课、欣赏课、综合实践课三类课型，立足义务教育普惠性，突出全员参与、实践体验。音乐学科四大核心素养 —— 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为课堂教学提供明确的目标框架。

（二）理论基础

立德树人育人理论：立德树人是新时代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核心是坚持育人为本、五育并举，摒弃单一知识技能教学，聚焦学生健全人格塑造与全面发展，要求各学科课堂实现知识教学与价值育人的统一。该理论为本研究提供根本价值引领。

核心素养理论：核心素养理论是新课标课改的核心导向，推动基础教育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聚焦学生终身发展所需的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2022 版艺术课标明确音乐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与五育融合育人目标高度契合，为教学目标设计提供直接依据。

体验式学习理论：体验式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主张学生通过亲身参与、情境体验与自主反思完成知识内化与素养生成，摒弃传统单向灌输式教学，高度适配小学阶段学生认知特点与音乐学科实践性、体验性特质，为本研究课堂活动设计提供实践逻辑。

三、小学音乐课堂五育融合教学现状与问题分析

在黄石市“成长课堂”教学改革背景下，区域小学音乐课堂逐步树立五育融合育人理念，尝试打破单一技能教学模式，探索美育引领德、智、体、劳协同育人路径。通过对城区、乡镇多所试点小学开展课堂观摩与师生访谈发现，当前小学音乐五育融合教学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未能充分落实“成长课堂”体验性、探究性、成长性的核心要求，在育人目标、融合方式、课堂模式、教学评价四个维度存在现实问题。本章结合一线教学实况，剖析现存问题及其深层成因。

（一）育人目标片面，技能化倾向严重

部分小学音乐课堂育人目标定位狭窄，教学重心集中于音准、节奏、演唱等技能训练，把演唱成果、节目展演作为核心评价标准，忽视审美体验、文化浸润与品格塑造，弱化多元育人目标，呈现“重技能、轻素养，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学生只能习得基础音乐技能，缺少情感熏陶与综合实践成长，偏离成长课堂全面育人的改革方向。究其原因，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部分教师对学科核心素养、五育融合理解不够深入；音乐学科无升学压力，教师综合育人主动性不足；学校考核偏重展演与竞赛成绩，进一步引导教师优先开展技能训练。

（二）融合方式浅表，标签化问题突出

五育融合已纳入黄石 “成长课堂” 改革要求，但小学音乐课堂实践中形式化、标签化现象较为普遍。不少教师仅在教案中罗列五育目标，课堂依靠简单口头说教进行价值渗透，五育元素与聆听、演唱、创编等音乐核心活动相互割裂，属于 “为融合而融合”，难以实现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根源在于教师缺少五育融合教学方法，对 “美育统领、多育渗透” 的内在逻辑把握不足；学校缺少相关教研培训，可供借鉴的成熟课例匮乏；教师备课侧重完成教学流程，忽视育人目标与课堂活动的深度耦合。

（三）课堂模式固化，学生主体缺失

区域不少小学音乐课堂仍采用 “教师讲授、学生模仿” 的传统授课模式，与 “成长课堂” 体验、探究、实践的育人要求不符。课堂活动形式单一，以教师范唱、集体跟唱、重复训练为主，学生缺少自主探究、小组创编、舞台实践的机会，学习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学生主体地位弱化。一方面，教师创新教学意愿不强，偏好流程稳定、易于管控的传统教学；另一方面，开放式活动存在课堂秩序、教学进度管控压力，教师因此简化课堂活动；部分乡镇学校教具、场地资源有限，同样制约多元化实践活动开展。

（四）评价体系单一，成长导向不足

适配五育融合与成长课堂的多元评价体系尚未建成，现有音乐评价以终结性技能考核为主。教师主要依据期末演唱、音准节奏等显性指标评定学生，忽略课堂参与、审美感悟、合作能力、创意创编等过程性表现，缺少增值性、发展性评价，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综合成长，评价的激励育人作用有限。一方面，传统评价观念难以转变，教师习惯于以技能成果评判学习成效；另一方面，可落地的过程性评价量表缺失，教师实施缺少依据；常态化课堂时间紧张，难以持续追踪每位学生的成长变化，造成过程性评价落地困难。

四、“成长课程”理念赋能小学音乐五育融合教学的育人策略

针对前文小学音乐课堂五育融合教学存在的育人目标片面、融合方式浅表、课堂模式固化、评价体系单一四大核心问题，结合黄石市 “成长课堂” 以学生成长为核心，重视体验、探究与发展的改革理念，立足小学音乐美育本质与五育融合内在逻辑，从目标重构、课堂模式、活动创新、评价改革四个维度提出可落地、可推广的优化策略，破解课堂现存痛点，构建五育协同、素养落地的小学音乐育人新范式。

（一）构建五育协同的分层教学目标体系，破解技能化育人困境

针对课堂育人目标片面、重技能轻素养的现状，依托成长课堂分层育人理念，转变技能本位的目标设计思路，以美育为主导，搭建 “知识技能 — 过程方法 — 情感态度 — 综合素养” 四维分层目标框架，推动五育目标协同落地，扭转教学技能化倾向。在目标实施中厘清各育定位：美育重在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夯实学生音乐核心素养；德育依托音乐作品中的红色文化、民俗内涵涵养文化自信与道德品质；智育借助乐理学习、作品赏析训练学生逻辑与探究思维；体育利用体态律动、合唱形体训练，提升学生身体协调性；劳育通过小组排练、乐器整理、舞台布置、音乐创编等活动，培育责任意识与劳动素养。同时依据不同学段学生认知水平，设置分层递进目标，避免 “一刀切” 教学，保障全体学生全面成长。

（二）设计进阶式课堂任务链教学模式，解决融合浅表化问题

针对五育融合标签化、育人要素与教学割裂的问题，结合音乐学科 “唱、听、动、创、演” 特点，依托成长课堂进阶育人思路，摒弃生硬叠加、口头说教式的融合手段，建立 “体验导入 — 深度聆听 / 演唱 — 合作探究 — 创编表达 — 反思评价” 五步任务链教学模式，依靠递进式课堂任务承载五育要素，推动融合由表面叠加走向深度渗透。体验导入依托作品背景、民俗情境创设课堂场景，自然融入德育；聆听与演唱环节打磨音准节奏，落实美育与智育；合作探究依靠小组研讨、声部配合培养协作能力；创编表达鼓励学生开展音乐创意设计，并在展演、道具制作中渗透劳动教育；反思评价引导学生复盘收获、自我反思。整套任务环环相扣，将五育贯穿课堂全程，规避 “为融合而融合” 的形式化问题。

（三）搭建多元化五育融合课堂活动库，破除课堂模式固化难题

针对传统课堂形式单一、学生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围绕小学音乐唱歌课、欣赏课、综合实践课三类课型，建立系统化五育融合课堂活动体系，丰富育人载体，落实成长课堂体验、探究、

实践的要求。唱歌课以合唱、轮唱、分组演唱为主要活动，在声部协作中培养团队意识，依托红色、民间歌曲教学渗透家国文化教育；欣赏课设置背景探究、音色辨析、审美评述活动，引导学生深度思考，锻炼审美与逻辑思维；综合实践课开展体态律动、简易乐器演奏、音乐创编、情景表演、道具手工制作等活动，兼顾身心锻炼、艺术创新与劳动实践。多元课堂活动打破教师单向讲授的固化模式，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综合发展。

（四）构建全过程多元评价体系，完善成长育人导向

针对评价维度单一、重结果轻过程的弊端，遵循成长课堂 “以评促长” 理念，搭建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增值性评价三位一体的多元评价体系，重塑评价标准，发挥评价的导向与激励功能。配套开发课堂观察记录表、学生自评互评量表、作品评价量规、成长档案单等评价工具，跳出单纯技能考核的局限。评价范围拓展到课堂参与、审美感悟、小组协作、创意创编、劳动实践、品格表现等多个维度，实现综合素养评估。同时建立 “课前基线测评 — 课中记录表现 — 课后增值对比” 动态评价机制，重点追踪学生阶段性进步，弱化等级甄别，关注个性化成长。借助全过程多元评价，捕捉学生成长动态，反向优化五育融合课堂，实现教学与评价双向赋能。

五、教学实践迭代与课例实施分析

为验证本研究前述五育融合优化策略的可行性与实效性，依托黄石市广场路小学四年级音乐课堂开展两轮行动研究，以真实课堂教学为载体，完成教学设计、课堂实施、问题反思、方案优化的完整迭代过程。通过典型课例深度落地前文提出的分层目标体系、进阶任务链、多元活动载体、全过程评价体系四大策略，检验策略在常态化课堂中的适配度，凝练可复制、可推广的小学音乐五育融合成长课堂实施范式。

（一）实践实施流程

本研究严格遵循行动研究“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循环逻辑，开展两轮递进式课堂教学实践，逐步解决前期调研发现的目标片面、融合浅表、模式固化、评价单一等教学问题，持续优化五育融合课堂育人路径。

第一轮实践：框架落地，问题诊断。本轮实践重点聚焦五育融合教学框架的初步落地，选取唱歌课、欣赏课两类常规课型开展试点教学，全面落地四维分层目标、五步任务链、多元化课堂活动等核心策略。实践过程中通过课堂结构化观察、师生随机访谈、学生音乐作品分析等方式，重点核查教学设计与课堂实操的适配性，重点排查五育目标是否落地、课堂活动是否有效、学生主体是否凸显、评价方式是否全面等问题。第一轮实践主要解决“有无融合”的问题，同时系统梳理课堂中出现的任务梯度不足、融合渗透生硬、过程评价缺失等实操短板，为第二轮优化提质明确整改方向。

第二轮实践：优化迭代，提质成型。基于第一轮实践的问题反馈，本轮聚焦课堂提质增效与范式成型。针对性优化五育分层目标、进阶式任务链流程、课堂活动载体与多元评价体系，补齐前期教学短板。细化分层任务适配不同学情学生，优化五育融合渗透方式，摒弃生硬叠加、口头说教的浅表融合模式，完善过程性、表现性、增值性三位一体评价流程。通过第二轮迭代，彻底破解传统课堂技能化、形式化、固化化等痛点，形成流程规范、逻辑清晰、可落地、可推广的五育融合成长课堂标准化教学范式。

（二）典型课例实践展示

本章节选取黄石市 G 小学四年级《歌唱祖国》唱歌课为典型课例，完整落地前文四大优化策略，全方位展示五育融合成长课堂的实施过程，验证策略的实践价值。本课立足成长课堂学生本位、体验成长、素养育人的核心理念，以四维分层五育目标为导向，依托五步进阶任务链，搭配多元课堂活动与全过程多元评价，实现五育深度共生、协同育人。

1.精准设定五育分层教学目标

本课摒弃传统唱歌课只重音准、节奏、演唱的单一技能目标，构建五育协同的分层目标体系，兼顾技能夯实与素养成长。美育目标：学生能够完整、饱含情感地演唱歌曲，把握歌曲雄壮激昂的曲风，提升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能力；德育目标：通过了解祖国发展历程与歌曲创作背景，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智育目标：掌握附点节奏、强弱对比等乐理知识，学会分析歌曲结构与情绪层次，锻炼音乐思辨能力；体育目标：规范站立演唱体态，通过律动配合呼吸训练，提升身体协调性与气息控制能力；劳育目标：通过小组排练协作、课堂道具整理、歌词创编作业整理等实践，培养责任意识与劳动

素养。同时针对优生、中等生、学困生设置演唱、创编、合作的分层要求，适配全员成长需求。

2.依托进阶任务链推进课堂实施

本课全程采用“体验导入—深度演唱—合作探究—创编表达—反思评价”五步进阶式任务链，让五育育人元素层层渗透、有机融合，杜绝标签化、形式化融合问题。体验导入环节：播放祖国山河风貌、科技发展影像资料，讲解《歌唱祖国》的创作背景与时代意义，结合红色文化情境自然渗透德育，唤醒学生爱国情感，激发课堂学习主动性。深度演唱环节：聚焦音准纠错、节奏练习、气息控制与情感处理，扎实落实美育与智育目标，同时规范演唱体态，融入体育形体训练，在反复打磨中培养学生专注坚持的良好品质。合作探究环节：以四人小组为单位，划分演唱声部、讨论演唱处理方式、开展互助纠错排练，在团队配合、沟通互助中锻炼学生协作能力与探究思维。创编表达环节：打破固化演唱模式，鼓励学生结合新时代风貌改编简易歌词、设计课堂律动与舞台造型，开展创意实践；同时组织学生自主整理乐谱、摆放课堂道具、收纳教学器材，在实践中落实劳动教育。反思评价环节：整合多元评价方式，完成课堂育人闭环。

3.依托多元课堂活动激活学生主体

本课围绕唱歌课型设计多元化、体验式、探究式课堂活动，彻底改变传统“教师范唱、学生跟唱”的固化模式。课堂融入分组演唱、声部合唱、小组互评、歌词创编、体态律动、情境展演等丰富活动，充分凸显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学生不再被动模仿，而是主动参与探究、创作、展演与合作实践，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审美感悟、锻炼综合能力，契合成长课堂体验性、探究性、成长性的核心要求，让五育融合在多元课堂活动中自然落地、润物无声。

4.实施全过程多元成长评价

本课摒弃单一的演唱技能评价，构建过程性、表现性、增值性三位一体的多元评价体系。课前开展基线测评，掌握学生初始演唱水平与课堂基础；课中依托自主研制的课堂观察量表，实时记录学生课堂参与态度、合作表现、创编创意、劳动行为、情感表达等过程性表现；课后结合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综合点评，对比学生课堂前后的成长变化，重点关注学生素养增值与个性化进步。评价维度覆盖五育育人全过程，弱化优劣评判，强化激励与导向作用，真正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长”，完善成长课堂育人闭环。整体课例通过目标、模式、活动、评价四维策略的完整落地，有效解决了传统音乐课堂技能化、形式化、模式固化、评价单一的教学痛点，充分验证了前述优化策略的科学性与实操性，高度契合黄石市“成长课堂”五育融合、全员成长、素养育人的改革导向。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立足黄石市 “成长课堂” 教学改革背景，以小学音乐课堂五育融合育人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梳理、现状调研、问题归因、策略建构与两轮课堂行动迭代实践，形成系统性研究结论。研究证实，成长课程理念与小学音乐五育融合育人具备高度适配性，坚持以学生成长为核心、以素养培育为导向重构音乐课堂，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小学音乐课堂育人目标片面、五育融合浅表固化、课堂教学模式单一、育人评价体系滞后等现实教学痛点。本研究构建的四维分层目标、五步进阶任务链、多元课堂活动库、全过程多元评价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在审美、思维、道德品格、身心、劳动实践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发展，形成的策略、课例与评价工具，可为黄石地区小学音乐美育改革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二）未来展望

本研究实践样本主要集中于城区小学，后续可扩大研究范围，覆盖乡镇小学、薄弱学校以及不同学段课堂，进一步验证策略的普适性与适配性；可深度拓展器乐教学、音乐创编、校园音乐活动等多元课型的五育融合实施路径；继续简化评价工具，降低一线教师使用负担；结合黄石“成长课堂” 改革契机，持续细化分层教学目标、优化课堂任务链、丰富本土音乐育人资源、完善数字化多元评价工具，打磨精品课例、梳理教学范式，推动小学音乐五育融合育人从 “课堂试点” 走向 “全域普及”，让美育真正发挥以美润心、以美育人、五育协同的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 Tianzi F .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Music's Influence on Daily Task Performance: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Integrating Music Psychology, Cognitive Science, and Sports Psychology[J].Frontiers in Art Research,2025,7(7):DOI:10.25236/FAR.2025.070712.

[2] 吕驰.五育融合视域下初中艺术课程教学实践研究: 以西安市新城区某中学为例[D].西安音乐学院,2025.DOI:10.27402/d.cnki.gxayc.2025.000305.

[3] 吴亚.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思想研究[D].牡丹江师范学院,2025.DOI:10.27757/d.cnki.gmdjs.2025.000279.

[4] 谷守悦.基于体验式学习理论的初中音乐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以人音版《草原牧歌》单元为例[D].河北师范大学,2025.DOI:10.27110/d.cnki.ghsfu.2025.001287.

[5] 康力文.新课标背景下初中音乐课程中的劳育渗透研究[D].郑州大学,2025.DOI:10.27466/d.cnki.gzzdu.2025.001936.

[6] 张雨薇.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小学音乐课堂教学设计研究——以人音版四年级《歌唱祖国》单元为例[D].郑州大学,2025.DOI:10.27466/d.cnki.gzzdu.2025.001940.

[7] 赖琳程.学科融合视角下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实践个案研究[D].集美大学,2025.DOI:10.27720/d.cnki.gjmdx.2025.000163.

[8] 郭凡.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学科融合实践研究[D].信阳师范大学,2024.DOI:10.27435/d.cnki.gxsfc.2024.000047.

[9] 张琴.学科融合教学在高中音乐课堂中的实践探究: 以南昌市实验中学为例[D].江西师范大学,2024.DOI:10.27178/d.cnki.gjxsu.2024.002194.

[10] 张海伦.立德树人视阈下小学音乐课红歌教学策略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24.DOI:10.27178/d.cnki.gjxsu.2024.002408.

[11] Wu T . Research on Teaching Strategy of "Primary School Music+Educational Drama " wit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J].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2023,6 (23):DOI:10.23977/CURTM.2023.062320.

[12] 杨慧玲.初中音乐跨学科教学实践研究: 以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为例[D].聊城大学,2023.DOI:10.27214/d.cnki.glcsu.2023.000937.

[13] 黄雯卓.“五育融合”背景下高中音乐教学策略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23.DOI:10.27464/d.cnki.gzsfu.2023.002122.

[14] 王子涵.核心素养视域下的小学音乐欣赏教学[D].沈阳师范大学,2022.DOI:10.27328/d.cnki.gshsc.2022.000978.

[15] 高紫薇.“五育”并举在小学音乐课堂的实施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1.DOI:10.27159/d.cnki.ghzsu.2021.003600.

基于“资源-学科-素养”图谱的中小学“乐成长”特色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以黄石市为例

林佳欣[1] 夏娟[1]

(1.湖北师范大学，湖北 黄石 435000)

摘 要：当前中国中小学地方文化教育普遍陷入“知识化”“形式化”的异化困境，集中表现为“失趣、失实、失魂”三重表征。其根本症结在于缺乏系统性的资源转化机制，无法实现本土文化资源与学科教学、核心素养培育的有机融合。本研究突破单一地域与学科边界，构建普适性“资源-学科-素养”三维图谱作为核心转化工具，提出“快乐体验为前提、自主探究为核心、素养生成为目标”的“乐成长”课程理念，系统阐释其理论基础、核心特征与可复制教学范式。将抽象文化符号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参与、可创造的成长体验，实现了从“教文化知识”到“育文化素养”的范式转换，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综合素养。

关键词：本土文化资源；教育转化；乐成长课程；资源-学科-素养图谱；跨学科育人

基金项目：2025 年黄石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研究生专项）课题“黄石本土文化资源整合赋能中小学‘乐成长’特色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2025GHB190）

DOI：doi.org/10.70693/202610207049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Study of the "Joyful Growth" Characteristic Curriculu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ased on the "Resources – Disciplines – Literacies" Framework: A Case Study of Huangshi City

Lin Jiaxin[1], Xia Juan[1]

1.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0

Abstract: Currently, local cultu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cross China has commonly fallen into an alienated predicament characterized by "knowledge-oriented" and "formalized" tendencies, which are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ree features: loss of interest, loss of authenticity, and loss of essence.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absence of a systematic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that hinder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subject teach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ies. This study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single regions and subjects by constructing a universal three-dimensional "resource–discipline–literacy" framework as its core transformation tool. It proposes the "Joyful Growth" curriculum philosophy — grounded on joyful experiences as the prerequisite, autonomous exploration as the cor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as the ultimate goal — and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key characteristics, and replicable teaching paradigms. By transforming abstract cultural symbols into growth experiences that students can perceive, engage in, and create, this approach realizes a paradigm shift from "imparting cultural knowledge" to "fostering cultural literacy", thereby enhancing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and overall competencies.

作者简介：林佳欣(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夏娟(1989—)，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音乐心理学。
通讯作者：夏娟

Keywords: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Joyful Growth" curriculum; resource – discipline – literacy mapping;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一、引言

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活用地方特色资源、落实核心素养培育的政策导向下，结合党的二十大“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国家战略要求，本土文化教育已然成为基础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地方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域载体，是培育学生文化自信、乡土归属感与家国情怀的鲜活教育资源。曾天山等（2026）指出，学生对文化的认同遵循“由近及远”的认知规律，往往始于对乡土文化的具体、切身感知。高质量的本土文化课程能够引导学生从熟悉的生活场景切入，逐步建立对家乡的情感归属，进而升华为深厚的家国情怀，同时在个体社会化进程中植入“知乡、爱乡”的情感基因，为地方发展培养具有归属感的建设者。中国地域文化资源丰厚，非遗、红色文化、生态与工业遗产等资源，为本土特色教育开展提供了充足的基础条件。

谭舒予等（2024）基于全国 14891 个中小学生样本的 Shapley 值分解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小学生文化自信的多维影响因素中，文化环境因素的解释贡献率最高，达 45.73%，显著高于家庭因素（30.43%）与个体因素（23.84%）。进一步分解显示，学校开设的文化相关课程、教师对文化培育的重视程度、校园文化氛围是文化环境维度中影响最显著的三个变量，其中学校文化课程影响位居首位。这一结果充分证实，学校教育是培育中小学生文化自信的核心场域，高质量的本土文化课程是提升学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关键抓手。

现有学界研究多聚焦单一文化类型或局部地域，尚未形成具备全国普适性的资源转化工具与标准化课程范式。基于此，本研究构建“资源-学科-素养”三维转化图谱，研发通用性强、可落地的“乐成长”本土文化特色课程体系，为本土文化资源的系统化教育转化提供全新实践路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本土文化教育与地方课程开发研究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学者普遍认可本土文化在涵养文化认同、培育家国情怀中的重要价值，围绕乡土文化、非遗、红色文化等开展了大量课程开发与实践探索。随着核心素养导向的新课改推进，跨学科学习、项目式学习、实践育人等理念逐步融入地方课程建设。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地域或单一文化类型，缺乏对地方课程的系统性梳理，缺乏普适性的资源转化机制、图谱模型类课程工具，仍难以破解当前本土文化教育碎片化、形式化、脱离生活的现实困境。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地文化教育研究形成三类成熟范式。一是文化回应性教学，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将族群本土文化融入课堂，适配多元文化背景学生，强化文化归属感；二是社区本位教育，日本地域共生教育、美国社区研学联动在地文博与非遗资源，适配资源富集区域的实践育人场景；三是跨学科实践学习，芬兰现象式学习、日本综合学习时间围绕本土主题整合多学科，适配全学段主题化教学。上述模式可为中国提供方法参照，但由于文化背景、教育体制与育人目标不同，相关模式无法直接照搬，需结合三级课程体系与文化传承要求进行本土化改造。

三、本土文化教育的三重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当前中国本土文化教育的困境，本质上是传统知识本位教学模式与新时代素养导向育人要求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从文化教育学视角看，本土文化是活态的生命有机体，其传承必须遵循“体验-理解-认同”的认知规律；从建构主义与课程论视角看，有效的文化学习必须依托真实情境与主动实践；从核心素养理论视角看，文化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价值内化与人格养成。然而，当前多数本土文化课程仍停留在“知识传递”的传统范式，最终在课堂教学层面呈现为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三重系统性困境。

（一）“失趣”：静态知识观下的文化符号化与学习动机消解

“失趣”是本土文化课堂最直观的表征，其深层根源在于静态知识观对文化活态性的消解。文化教育学认为，文化不是孤立的知识符号集合，而是包含历史记忆、情感体验与精神价值的活态生命体，其传承必须建立在学习者的切身感知之

上。但传统本土文化教学普遍秉持“客观主义知识观”，将鲜活的文化现象拆解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碎片化的陈述性知识，采用“教师讲授-学生记背”的单向灌输模式。

这种教学方式从根本上违背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主张：学习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而是学习者基于自身经验的主动意义建构。中小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对抽象符号的接受能力有限，当充满温度与生命力的地方文化被转化为冰冷的应试考点时，学生无法建立文化与自我生命经验的关联，本土文化便成为外在于自身的“他者”。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去情境化”的教学割裂了文化与生活的内在联系，学生既感受不到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无法在文化学习中获得成就感与愉悦感，最终导致学习动机的全面消解。

（二）“失实”：学科本位课程观下的知行分离与认知表层化

“失实”是更深层次的困境，表现为文化认知与生活实践的脱节，其本质是学科本位课程观对本土文化实践性的背离。课程论中的实践课程观强调，课程应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通过“做中学”实现知识与经验的统一。本土文化生成于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其价值体现在活态的传承过程中，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其内涵。

当前中小学本土文化教育普遍存在静态化认知偏差，将本土文化窄化为脱离生活的历史遗存，沿用学科中心主义知识传授范式，片面强调其历史溯源与审美表征，系统性遮蔽其活态传承属性与实践育人功能。具体表现为：农耕文化教学重概念阐释轻实践关联，传统手工艺教学重成品展示轻具身体验，红色文化教学重事件叙事轻沉浸式研学。

从核心素养理论视域审视，实践创新素养的生成必须依托真实情境与深度参与。上述去实践化教学模式，致使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仅停留在符号化记忆层面，难以理解其精神内核，更无法实现文化知识向问题解决能力的迁移。这种知行割裂的困境，导致本土文化教育陷入形式化泥潭，育人价值未能充分彰显。

（三）“失魂”：知识本位育人观下的价值悬置与育人目标落空

“失魂”是最根本的困境，其核心是价值引领的缺失，本质是知识本位育人观对文化教育精神内核的剥离。文化教育学的核心观点认为，教育的本质是文化的精神传承，其根本任务是培育人的文化品格与价值观念。核心素养理论也明确指出，教育要培养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其中价值观念居于核心地位。

但在应试教育的工具理性主导下，多数学校的本土文化课程异化为知识记忆的工具，教师的教学重心完全放在知识传授上，形成了“重知轻德”“重技能轻精神”的育人偏差。在工业文化教学中，仅强调工业生产的历史成就，却不引导学生感悟产业工人的开拓精神与工匠精神；在非遗文化教学中，仅关注技艺的外在形式，却不挖掘传承人数十年坚守的责任担当；在红色文化教学中，仅强调革命事件的历史事实，却不引导学生感悟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与牺牲精神。

这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剥离了文化的精神内核，使本土文化课程失去了灵魂。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却未能形成对家乡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自信，更无法承担起文化传承的时代责任。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失去了价值引领的本土文化教育，最终只能沦为无意义的知识堆砌。

（四）三重困境的生成逻辑与本质

上述三重困境相互交织，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效应：学习动机不足易导致学生参与度偏低，进而加剧文化认知的表层化；表层化认知难以引发深度情感共鸣，最终影响育人目标的有效达成。

从生成逻辑看，这一循环源于三个层面的系统性偏差：其一，知识观偏差，将活态文化简化为静态知识符号，未能充分契合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传承规律；其二，课程观偏差，以学科本位模式承载实践性极强的本土文化教育，未能有效建立文化与生活的内在联结；其三，育人观偏差，仍以知识传递为核心导向，未能充分重视文化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存在差距。

三重偏差共同指向本土文化资源教育转化机制的不完善。不少学校将本土文化教育等同于乡土读本编写与零散活动开展，存在一定程度的“重教材、轻课程”倾向，缺乏基于完整课程逻辑的系统规划，难以实现本土文化资源与学科教学、核心素养培育的深度融合。这正是本研究搭建资源转化框架、开发特色课程体系的现实动因与问题指向。

与此同时，本土文化教育的外部支撑体系存在明显短板：政策层面多为宏观导向要求，缺乏校级落地的课时保障、经费配套与评价激励细则；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尚未建立，文化育人多局限于校内场域，家庭与社区资源未得到有效激活；多数课程方案对一线教学约束考量不足，在课时统筹、师资能力、安全风控等方面存在理想化倾向，难以实现常态化、可持续实施。

四、“资源-学科-素养”三维图谱：本土文化资源的教育转化机制

为破解本土文化教育资源碎片化、学科融合表面化、素养培育抽象化的三重困境，本研究构建适配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的资源转化框架（如图1）。图谱以文化教育学、建构主义与核心素养理论为基础，通过“价值挖掘-学科对接-素养落地”闭环，实现本土文化资源向教育资源的系统性转化。



图 1“资源 - 学科 - 素养”三维转化图谱通用模型

（一）图谱的建构逻辑与方法

图谱构建遵循系统性、科学性与本土化原则，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为依据，分为四个核心步骤：

第一步：本土文化资源分类与教育价值分层挖掘。构建“4+X”普适性资源分类框架，以工业文化、非遗、山水生态、红色文化为基础，特殊地区可增设海洋、民族等特色类别。组建多元研究共同体，从历史、科学、艺术、道德四维解构资源价值，依据学生认知规律明确 1-9 年级分学段适配性。建立三级资源筛选机制，为入选资源建立标准化档案，确保教育性与可操作性。

第二步：资源与课标知识点的双向精准对接。逐学科梳理课标分学段要求，建立“资源-课标-知识点”双向映射，区分核心与拓展对接学科，实现基于学科核心概念的深度融合而非简单叠加。提炼跨学科核心概念与驱动性问题，严格落实每门学科不少于 10%的跨学科课时要求，为一级核心资源设计 1-3 课时主题学习方案。

第三步：资源与核心素养目标的分层匹配。构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双维度体系，形成“一资源多学科、一学科多素养”的立体关联。将宏观素养目标分解为分学段可测指标，配套过程性与终结性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实现素养培育的可视化与可评价。

第四步：图谱绘制与动态迭代优化。优化绘制标准化表格化图谱。横向为资源类别，纵向为义务教育学科，单元格标注课标知识点、素养目标、分学段建议与评价方式。同步建设配套教学资源库，建立“学期反馈-年度更新-两年全面修订”的动态迭代机制，适配智慧教育发展趋势，搭建线上数字化资源库雏形，整合分类数字文化素材与标准化教学资源包，为后续全功能数字化图谱平台建设预留架构接口，支撑资源动态更新与跨校教研协同开展。

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落地存在双重现实约束：常规课时紧凑易挤压政策要求的跨学科学时，长周期探究与校内碎片化课时适配性不足；同时跨学科教研、实践组织会增加师生工作与学习负荷。本图谱通过短主题课时设计、弹性课时统筹、标准化任务模板与学段分层机制针对性适配，保障模式可落地。

（二）图谱的核心价值与创新

该图谱可为教师提供标准化课程设计支撑，靶向化解三项教学痛点：厘清资源落地路径，明晰本土资源应用方式；锚定学科契合要点，规范跨学科融合设计；细化分层评价指标，落实核心素养培育。同时，图谱为教师提供结构化的跨学科教学支架，可降低本土文化课程实施门槛，为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与本土文化素养提升提供标准化抓手。

研究创新聚焦三项优化转型：由零散资源挖掘升级为全域统筹开发，搭建全学段、全学科育人架构；由形式化内容嵌入升级为内在逻辑耦合，促成文化资源与学科知识深度相融；由知识灌输导向升级为素养培育导向，实现从文化识记到素养生成的育人转向。

五、“乐成长”特色课程的实践范式设计

本课程立足“资源-学科-素养”三维图谱的转化逻辑，构建“乐成长”本土化特色课程体系，恪守快乐体验为前提、自主探究为核心、素养生成为目标的顶层理念，创设“情境-任务-成果-情感”四位一体课堂范式，搭建分层施教、课内外联动的一体化落地架构，同步完善课时排布、学段差异化实施方案、安全风控与精细化评价细则，黄石本土化落地路径如图 2 所示。



图 2 黄石市“乐成长”课程本土化落地转化机制图

（一）课程的核心特征与理论基础

曾天山等（2026）指出，地方课程的开发应从单一的学科知识逻辑转向强调学科逻辑与生活逻辑相统一的“实践-经验”逻辑。依托建构主义情境学习、项目式学习、多元智能理论与情感教育理论，形成四维教学形态：一是依托情境学习理论开展实景沉浸式教学，依托非遗工坊、工业遗存、红色旧址等场域推动学生完成知识自主建构；二是立足项目式学习理论设置真实性探究任务，以文创设计、生态提案等驱动内在学习动机；三是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支撑推行成果导向教学，依托多元化成果载体适配学生差异化智能禀赋；四是依托情感教育理论深挖本土人文内核，依托匠人、革命先辈事迹实现价值浸润。

基于中小学认知发展分层规律，课程实行学段梯度化设计：低学段（1—2 年级）秉持具象化、游戏化育人思路，以文化闯关、民俗手工游戏实现文化启蒙；中学段（3—6 年级）侧重实操体验，平衡具象感知与浅层探究；高学段（7—9 年级）采用项目式深度学习模式，依托长周期课题完成综合性探究。

本课程教学重点聚焦三个维度：一是本土文化资源的学科化转化，实现文化资源与课标要求的深度契合；二是跨学科探究的有效落地，避免多学科内容的形式化拼接；三是文化素养的分层培育，推动学生从文化认知向文化认同进阶。教学难点集中于三方面：其一，适配不同学段认知差异，平衡课程趣味性与探究深度；其二，对文化认同等内隐素养开展可操作的过程性评价；其三，常态化教学中的课时统筹与师生负荷管控。本课程体系依托标准化资源转化框架与分层教学范式，针对性化解上述教学重难点。

（二）课程的教学流程与典型课例设计

课程采用 40 分钟标准化“四段式”课时架构：情境导入 10min、合作探究 20min、成果互评 8min、拓展升华 2min。融入长程式课程开发理念（蔡奇哲，2025），打破单课时教学边界，每个长程式活动遵循“问题—方案—行动—反思”的内在逻辑，由多个相互关联的短程活动构成，形成小循环嵌套大循环的学习结构。同时构建“地方教材+”超学科融合模式，将本土文化学习与心理健康、艺术教育、劳动教育等有机结合，实现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课程固定每周单列 1 课时纳入地方校本课程课时体系，课后社团课时作为长程式项目的补充学时；校外主题研学每学期统筹 2 次，占用综合实践活动课时。以黄石市传统竹编跨学科单元为例，五年级标准配置 3 节主体课时+5 次课后延展学时，分阶段完成校内技法研习、校外传承人实地访谈、文创成果落地展示，统筹六大学科内容。在学段落地层面，低年级简化为趣味竹编造型游戏，聚焦感官体验；高年级延伸为竹编产业调研、文创市场化设计的完整项目研究。

（三）校内外一体化的实施体系

课程构建“常态化校内课堂+主题化校外研学+周期性成果展演”三位一体实施路径，配套双导师协同育人机制，每单元配置校内学科专任教师与非遗传承人、文博研究员等校外实践导师。校内依托固定校本课时完成系统性知识与技能教学；校外依托区域公共文化场馆资源开展实景探究；同步联动场馆数字资源拓展云研学、线上展厅探究等数字化研学场景，依托配套线上资源平台实现学习素材共享与跨校教研协同；成果展演同步开设云端展区，扩大课程辐射范围，丰富数字化育人场景。

为保障校外研学常态化落地运行，规避实地探究中的各类安全隐患，课程配套分级研学风险防控机制与前置师资岗前培训方案。

1.研学分级风险防控预案

落实双导师随行管控机制，每批次研学配置

校内任课教师、校外非遗、文博类文化实践导师各一名，全员统一购置短期研学意外险。活动筹备阶段完成实地场地踏勘，围绕人身磕碰受伤、极端天气、学生私自离队三大风险制定分级处置举措：出现轻微磕碰由随行导师现场应急处置，重伤即刻送往就近医疗机构并同步报备校方与家长；突发暴雨、高温等恶劣天气，即时变更研学场地，切换非遗展馆、文化场馆等备用室内点位；学生走失第一时间双导师分区搜寻，同步联系场馆安保及家长。

2.教师分层培养与能力发展机制

构建“入门—进阶”分层师资培养体系，同步依托课程实践实现教师能力的迭代提升。入门层面保留研学岗前专项培训，围绕应急处置、场地风控、学段管理要点开展情景化演练，保障校外实践规范落地。进阶层面聚焦两大核心能力设置常态化研修：一是本土文化素养提升，联合文博机构、非遗传承人开展专题讲习，夯实教师文化理解与价值解读能力；二是跨学科教学能力培育，依托图谱支架开展跨学科设计教研，破解多学科融合浅表化问题。

同时建立双导师结对、校际教研共同体的协同成长机制，推动校内学科教师与校外文化导师双向赋能。课程实施过程本身也构成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载体，可推动教师从单一学科教学向跨学科育人转型，强化文化育人意识与实践指导能力，实现“育生”与“育师”的双向增值。

（四）多元评价体系设计

课程构建了“从评知识转向评成长”的评价理念，突破传统纸笔测试的局限，建立“参与度-体验感-成长值”三维评价内容体系。评价重心从知识识记转向重点考查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实践创新能力：参与度维度聚焦学生课堂投入、任务完成与小组协作表现；体验感维度关注学生对本土文化的学习兴趣与情感共鸣；成长值维度衡量学生文化认知深化、实践能力提升与价值观念形成。

依托校内外一体化课程实施框架，为精准量化本土文化育人实效、落实分层育人目标，本课程突破传统纸笔测评范式，围绕参与度、体验感、成长值三维评价逻辑，区分学生自评互评、教师（含校外导师）考评两套评价维度，配套分学段差异化评分细则，形成分层、分类的立体化评价量表。

六、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研究针对中小学本土文化教育认知表层化、知行脱节、育人实效不足等问题，立足文化自信培育规律，搭建本土化资源转化模型，系统研发“乐成长”本土文化特色课程体系。本研究选取黄石市域内 2 所城区中小学开展为期一学年的实证试点，覆盖 14 个教学班、700 名学生与 18 名任课教师，结合过程观测、数据统计与师生访谈形成核心研究结论。研究证实，本土文化教育育人效能薄弱的核心成因，在于文化资源向育人资源转化的系统性机制缺失，导致资源利用零散化、学科融合形式化、素养培育虚化。本研究搭建的转化模型，明晰了本土资源、学科教学与核心素养的耦合关系，有效破解课程开发中资源运用、学科融合、素养落地的实操难题，为本土文化课程系统化建设提供科学工具。同时，“乐成长”课程依托多元教学范式与校内外一体化实施模式，可有效深化学生文化认知与情感认同，实现从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的育人转型，具备良好的实践育人成效。本研究从理论上完善了本土文化育人转化逻辑，从实践上形成可复制的分层课程范式，从文化上搭建了本土文化校园活态传承路径，有效丰富了基础教育文化育人体系。

（二）研究局限性

受研究条件与周期限制，本研究存在三点不足：一是样本结构单一，试点仅覆盖城区学校，缺乏乡村学校实证数据，课程对城乡差异化办学场景的适配性有待验证；二是评价体系不完善，未开发标准化量化工具，难以精准测评文化认同等内隐素养；三是推广性不足，仅局限单一市域试点，课程跨区域、多场景的普适性缺乏实证支撑。

（三）未来展望

针对上述局限，后续研究将靶向完善：一是扩充乡村学校样本，开展城乡、各学段差异化适配研究，优化分层课程实施体系；二是结合教育测量理论研发标准化量化量表，健全内隐素养测评体系；三是搭建数字化三维图谱平台，以信息技术赋能课程高效落地与全域推广；四是开展多区域试点研究，提炼跨地域适配机制，完善课程普适性推广范式，持续推动本土文化育人课程标准化、数字化、常态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曾天山,温馨.地方课程教材建设的实践进展与优化路径[J].课程.教材.教法,2026,46(4):30-37.

[2]谭舒予,范卿泽,赵文朝.中小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24,(7):85-90.

[3]蔡奇哲.突破与重构：活动型地方教材的开发价值、实践总结与未来展望[J].传播与版权,2025,(4):10-14.

[4]谢志斌.矿冶文化与黄石市地方课程开发研究[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5]周秋莲.论黄石的矿冶文化与高校校园文化互动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2013，(08)：194-197.

[6]冉蓉.地域文化视域下的地理校本课程开发[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7]靳玉乐.校本课程的实施：经验、问题与对策[J].教育研究，2001，(09)：53-58.

[8]邓纯仁.校本课程开发的若干矛盾及其对策[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69-71.

[9]许洁英.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含义、目的及地位[J].教育研究，2005，(08)：32-35+57.

[10]崔允漷.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1]王斌华.校本课程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

人工智能赋能基础音乐教育教学应用研究

——以黄石市为例

万骐菲 [1] 易秀华 [1]

(1.湖北师范大学，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基础音乐教育突破传统教学瓶颈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本文立足《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与《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的政策导向，以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为分析基础，从理论层面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基础音乐教育的价值意蕴与教学应用范式。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在技能训练反馈、创意表达支持、课堂教学协同与过程性评价四个维度具有独特应用价值，据此提出智能反馈型技能训练、AIGC 创意表达支持、人机协同授课、数据驱动过程性评价四类教学范式，并以黄石市为典型场域，从资源适配、教师专业发展与伦理规范三个层面审思非一线城市推进人工智能与音乐教育深度融合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音乐教育；教学范式；核心素养；黄石市

基金项目：2025 年黄石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生专项）课题《人工智能赋能基础音乐教育教学应用研究——以黄石市为例》（课题编号：2025GHA099）

DOI：doi.org/10.70693/202610202807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mpowering Basic Music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Huangshi City

Wan Qifei [1],Yi Xiuhua [1]

1.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2,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provides new technological possibilities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basic music education. Guided by the policy orientations of the *Art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and the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Teachers (First Edition)*, and employing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theory as its analytical foundations, this study theoretically examines the value implications and teaching application paradigms of AI-empowered basic music educ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AI demonstrates distinctive application value across four dimensions—skill training feedback, creative expression support,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process-based assessment.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four corresponding teaching paradigms: intelligent feedback-based skill training, AIGC-supported creative express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instruction, and data-driven formative assessment. Taking Huangshi City as a typical

作者简介：万骐菲(2003 一)，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易秀华(1980 一)，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通讯作者：易秀华

research site, the study further reflects on the theoretical pathways for non-first-tier cities to advanc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 and music education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resource adaptatio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norms.

Keywords: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asic music education;teaching paradigm;core competencies;Huangshi City

一、问题的提出

（一）时代背景与政策导向

以大语言模型、多模态生成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推动教育从数字化辅助走向智能化赋能。2022 年教育部颁布《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确立为音乐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为基础音乐教育确立了素养导向的育人目标。2025 年 11 月，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发布《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以“强化价值引领、遵循教育规律、恪守伦理规范、加强协同共治”为基本原则，构建了学习、教学、育人、评价、管理、研究六大应用场景体系，为中小学教师规范应用人工智能提供了制度框架。在此背景下，如何将通用技术指引转化为适配音乐学科特点的教学实践方案，成为基础音乐教育信息化面临的重要理论课题。

（二）现实困境与研究取向

当前基础音乐教育仍存在大班额下个性化指导不足、创意实践薄弱、评价方式单一、城乡师资配置不均等结构性矛盾。已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正推动音乐教育从技能导向向素养导向转型，并从核心素养视角探讨 AI 赋能音乐教育的实施路径，同时警示需警惕技术异化风险、坚守音乐教育的人文本质。但现有讨论多集中于一线城市与示范学校，对非一线城市如何依托现有条件推进 AI 与音乐教育深度融合的理论探讨尚不充分。基于此，本文以黄石市这一鄂东区域性中心城市为典型场域，从理论层面展开三个维度的探讨：人工智能在价值维度上如何支撑基础音乐教育核心素养的培育？其教学应用范式在理论上应当如何建构？非一线城市在推进过程中应当遵循怎样的本土化路径？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 AI 赋能音乐教育的探讨正逐步从宏观理念走向实践落地，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研究多集中于发达地区示范学校的个案经验，缺乏对中西部非一线城市整体推进路径的系统性思考；二是现有教学模式探讨多停留在工具应用层面，未能充分结合音乐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要求进行范式建构；三是对 AI 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风险与教师能力发展关注不够，缺乏本土化的实施保障机制研究。本文正是针对上述研究缺口，尝试从理论层面搭建“价值—范式—路径”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为非一线城市推进 AI 与基础音乐教育深度融合提供学理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TPACK 理论

TPAC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由 Mishra 与 Koehler 提出，强调技术知识、教学法知识与学科内容知识三者的有机融合，是教师开展技术融合教学的能力框架。对于音乐教师而言，AI 教学能力并非单纯的技术操作能力，而是在理解音乐学科核心素养与教学规律的基础上，将技术嵌入特定教学情境的综合能力。这一理论揭示了技术融合教学中“技术—教学—学科”三者互动的内在机理：技术知识只有转化为教学法策略并与音乐学科内容深度契合，才能产生真正的教学价值。它为分析音乐教师“会操作工具”与“会用工具教学”之间的差距提供了概念依据，也为后文讨论教师专业发展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具体到音乐学科，TPACK 框架具有鲜明的学科特异性：技术知识层面，音乐教师需掌握智能陪练软件、音频分析工具、生成式 AI 平台等多种技术的操作原理与适用边界；教学法知识层面，需理解演唱教学、欣赏教学、创作教学等不同课型的教学规律；学科内容知识层面，需具备扎实的乐理知识、作品分析能力与审美判断素养。三者的融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动态生成的实践性知识。在生成式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音乐教师的 TPACK 能力还需新增“AI 内容甄别”与“人机协同设计”两个维度，即能够判断 AI 生成内容的音乐质量与教育适切性，并据此优化教学设计。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主张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过

程，强调情境、协作、会话与意义建构四个核心要素。音乐学习具有实践性、体验性与创造性，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在聆听、演唱、演奏与创作的亲身体验中逐步生成的。AI 技术能够为学生创设丰富的听觉情境、提供即时的创作支架与互动反馈，从而支持学生在“做中学”中建构音乐认知与审美体验。与传统讲授式教学相比，AI 驱动的个性化练习与生成式创作环境为学生提供了更高频次的尝试机会与更宽容的试错空间，与建构主义所倡导的学习方式高度契合。

音乐学习的建构主义特征表现为：学生对音乐的感知与理解并非靠教师单向灌输形成，而是在反复聆听、演唱、演奏、创作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建构的。传统音乐课堂中，受课时与班额限制，学生的实践机会有限，且难以获得即时反馈。AI 技术的介入打破了这一瓶颈：智能陪练系统可在学生练习时实时标注音准偏差与节奏问题，相当于每位学生都拥有一位“私人练习指导”；生成式 AI 工具则将学生的模糊音乐想法迅速转化为可听的音响效果，使创意不再停留在口头描述，而是能够被聆听、被修改、被完善。这种“创意—生成—反馈—修改”的循环，正是建构主义所倡导的学习过程。

（三）人本主义教育理论

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确立了“育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强调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格完善。在 AI 赋能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警惕技术异化风险，坚守音乐教育的人文本质，确保技术始终是手段而非目的。音乐教育所承载的情感熏陶、审美培育与价值引领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需依靠教师的专业判断与情感投入来实现，技术不能替代教师的主体地位。

音乐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教育与人文教育，其核心在于通过音乐作品的情感力量滋养学生的心灵，培养其审美情趣与人文素养。这一过程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与情境性：教师对作品的情感阐释、课堂上师生间的音乐对话、学生在集体演唱中获得的情感共鸣，都是技术无法替代的。若过度依赖 AI 而弱化教师的情感引导作用，音乐课堂将沦为技术操作训练，丧失其人文涵养的本质功能。因此，在推进 AI 赋能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技术为体、育人为本”的原则，将技术定位为辅助教学的工具，而非教学的主体。

（四）分析框架

上述三者共同构成本文的理论基础：TPACK 回答“教师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结构”，建构主义回答“技术如何促进学生的音乐学习”，人本主义回答“技术应用的价值边界在哪里”。三者形成“能力—学习—价值”三维分析框架，贯穿后文对教学范式构建与本土化路径的讨论。

三、人工智能赋能基础音乐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对核心素养培养的支撑价值

在审美感知层面，AI 可生成多样化的音响素材与可视化呈现，帮助学生在更丰富的听觉情境中发展音乐感知力；在艺术表现层面，AI 实时反馈技术为学生的演唱、演奏提供个性化纠错与练习支持，弥补大班教学中个别指导不足的短板；在创意实践层面，生成式 AI 降低了创作的技术门槛，使中小学生能够将音乐创意转化为可听作品；在文化理解层面，AI 可汇集多元文化音乐资源，拓宽学生的音乐文化视野。由此，AI 技术与音乐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之间形成了系统性的支撑关系。

进一步分析可见，AI 对四大核心素养的支撑各有其独特机制：审美感知层面，AI 可将抽象的音乐要素（如和声结构、曲式发展）转化为可视化的图谱与动画，帮助学生在视觉与听觉的联动中深化对音乐形式的感知；艺术表现层面，AI 的实时音准检测与节奏分析功能，使学生在练习中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有效提升技能训练的效率与精度；创意实践层面，生成式 AI 将作曲、编曲等过去需要专业技术才能完成的工作变得简易可行，学生只需输入情绪与风格关键词，即可获得音乐初稿，将更多精力投入创意表达本身；文化理解层面，AI 可快速汇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素材，为学生搭建跨越时空的音乐文化对话平台。

（二）对教学过程的优化价值

AI 的引入使音乐教学从“教师中心”的单向传递转向“人机协同”的多向互动。教师得以从重复性的技能示范与个别纠错中部分解放，将更多精力投入艺术处理、情感引导与价值引领；学生则获得了更及时、更具针对性的学习反馈，让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这种角色调整有助于实现教学效率与教学品质的同步提升，推动课堂教学结构的深层次变革。

从课堂结构来看，AI 的引入正在推动音乐课堂从“讲解—示范—模仿—练习”的线性结构，转向“情境—探究—创作—展示”的网状结构。传统

音乐课堂中，大量时间被用于教师示范与集体练习，学生的探究与创作环节常常被压缩。AI 承担了示范播放、基础纠错等重复性工作后，教师可将课堂时间重新分配：导入环节利用 AI 快速创设音乐情境，新授环节聚焦作品的艺术处理与文化内涵，实践环节组织学生进行创意表达与合作探究，总结环节引导学生进行反思与评价。这种课堂结构的优化，与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改革方向高度一致。

（三）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价值

对于非一线城市而言，AI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优质音乐师资不足、教学资源不均的困境。借助智能教学平台与轻量化工具，城乡学校可以共享优质教学资源，缩小校际差距。但这一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低成本、高适切的资源供给与教师能力的同步发展，否则技术差距反而可能加剧新的教育不平等。

对于黄石这样的资源型转型城市而言，音乐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问题尤为突出：城区学校拥有专职音乐教师与专用教室，而部分乡镇学校仍存在“语文老师兼教音乐”的现象；优质的合唱、器乐校本课程多集中于少数示范学校，广大学生难以接触。AI 技术若能以轻量化方式普及，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借助免费的在线音乐课程与智能练习工具，乡镇学生也能获得规范的技能训练与丰富的审美体验。但同时也应看到，数字鸿沟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设备条件好的学校与学生能更早、更充分地享受技术红利，而薄弱学校可能因硬件不足、教师能力有限而进一步拉大差距。因此，推进 AI 教育公平需要配套的资源倾斜与教师培训政策。

四、人工智能赋能基础音乐教育的教学应用范式

（一）智能反馈型技能训练范式

该范式面向演唱、演奏、视唱练耳等基础技能训练，利用 AI 音频分析技术对学生的音准、节奏、力度等进行实时识别与反馈。其教学流程为：教师示范讲解—AI 辅助集体练习—学生利用智能系统进行个性化自主练习—课堂成果展示与教师点评—课后拓展练习。在这一范式中，AI 承担标准化、重复性的检测与反馈工作，教师专注于艺术处理、气息与情感的个性化指导，二者形成互补。该范式尤其适用于解决大班额下个别化指导不足的问题，将教师精力从机械纠错中解放出来。

在具体实施中，需注意三个关键环节：其一，AI 检测结果仅作为参考，教师需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技术反馈，避免过度依赖而丧失自身的听觉判断力；其二，练习内容应分层设计，根据学生的技能水平匹配不同难度的练习曲目，AI 系统自动记录每位学生的练习进度与常见问题；其三，课堂展示环节应优先展示经过 AI 辅助练习后进步明显的案例，以正向激励为主，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技术实现路径看，当前可借助智能钢琴陪练 APP、视唱练耳软件等成熟产品，无需学校额外投入大量硬件成本。

（二）AIGC 创意表达支持范式

该范式面向音乐创作、作品改编与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利用生成式 AI 的内容生成能力降低创作技术门槛。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确定作品的情绪、风格与主题，将创意关键词输入 AI 生成初稿，再在教师指导下融入个人创意进行修改，最后展示成果并阐述创作思路。在此过程中，AI 扮演“创意支架”的角色，学生始终是创作的主体。该范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培育创新思维与审美判断，是核心素养中“创意实践”维度的重要实现路径。

该范式的实施可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教师引导学生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建立感性认识；第二步，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确定创作主题与情绪基调，收集相关素材；第三步，将关键词输入生成式 AI 工具，获得音乐初稿；第四步，教师指导学生对 AI 生成的作品进行审美评价与修改，融入小组的创意构想；第五步，各小组展示最终作品并阐述创作思路。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不是教学生“怎么用软件”，而是引导学生“怎么判断好坏”——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判断力，使其不被 AI 生成的内容牵着走，而是成为创作的主导者。同时，应明确要求学生标注 AI 参与创作的部分，培养学术规范意识。

（三）人机协同课堂教学范式

该范式覆盖面最广、最易落地，适用于欣赏、唱歌、综合课等常规课型。AI 发挥资源丰富、交互性强的优势，承担情境创设、知识呈现、互动练习与资源拓展等任务；教师发挥专业引领与情感互动的优势，承担价值引领、重难点讲解、深度对话与生成性问题处理。关键在于明确人机分工的边界：AI 不替代教师的审美判断与情感引导，教师不包揽所有技术性的信息呈现与练习反馈。

以七年级《黄河大合唱》欣赏课为例，AI 可

承担以下工作：播放不同版本的《黄河大合唱》录音供学生对比聆听，呈现黄河流域的地理影像与历史背景资料，生成关于乐曲结构的互动问答练习；教师则聚焦于作品的情感内涵阐释、历史背景的深度解读、学生聆听感受的交流引导，以及在讨论中捕捉生成性教育契机。整节课中，AI 负责“信息传递与基础互动”，教师负责“情感共鸣与价值引领”，二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这种分工既提升了课堂的信息密度与互动性，又保留了音乐教育最核心的人文维度。

（四）数据驱动过程性评价范式

该范式主张构建“技能与素养并重、过程与结果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将学生课堂参与、技能练习、创作实践、欣赏表现等过程性表现纳入评价范畴，建立学生音乐成长数字档案。借助 AI 技术对学习过程的记录与分析，评价不再局限于终结性测试，而是通过动态反馈与多元主体参与，弥补传统评价维度单一、主观性强的不足，使评价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学习改进与发展，而非仅作甄别与排序之用。

在评价指标设计上，可构建“四维十二项”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审美感知维度包含聆听专注度、音乐要素辨识能力两项指标；艺术表现维度包含演唱/演奏完成度、音准节奏准确率两项指标；创意实践维度包含创作参与度、作品独特性两项指标；文化理解维度包含音乐文化知识掌握、跨文化比较意识两项指标。每项指标由 AI 系统自动记录客观数据（如练习时长、准确率、创作频次）与教师主观评价（如课堂表现、创意质量）相结合，形成多源评价数据。学期末，系统自动生成学生的音乐学习成长报告，清晰呈现每位学生的发展轨迹与进步空间，为个性化教学提供数据支撑。

五、非一线城市推进 AI 音乐教育的理论审思——以黄石市为例

（一）资源适配：低成本、高适切的工具选择

黄石市作为非一线城市，在推进 AI 音乐教育时不宜盲目追求高端平台与硬件投入，而应走低成本、高适配的本土化路径。可优先选择免费或低门槛的智能陪练应用、通用生成式 AI 工具等轻量化资源，结合学校现有多媒体设备开展教学探索，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引入专业 AI 音乐教学系统。同时，应注重收集与开发适配本土教学内容的案例资源，降低教师的二次开发成本。

结合黄石市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优先依托三个层面推进资源建设：一是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的音乐课程资源，这部分资源免费且经过审核，质量有保障；二是引入适合中小学使用的 AI 音乐工具（如智能陪练、音频编辑、生成式作曲等轻量化应用），以学校或区域为单位统一采购，降低单校成本；三是鼓励本地教师开发本土化教学案例，如结合黄石工业文化、鄂东南民间音乐等本土元素设计 AI 融合课例，逐步积累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资源库。

（二）教师发展：分层分类的专业研修

依据 TPACK 框架，音乐教师的 AI 教学能力涵盖技术操作、教学设计、内容甄别与伦理规范四个维度，其中融合教学设计能力是区分“会操作工具”与“会用工具教学”的关键。应设计入门、进阶、提升三级研修体系：入门层面向零基础教师，重在消除技术恐惧、掌握基础工具操作；进阶层面向中青年教师，重在专业 AI 工具应用与融合教学设计；提升层面向骨干教师，重在教学创新与课题研究引领。同时构建“区域—校本—线上”三级教研共同体，以课例为载体推动教师在实践反思中持续成长。

（三）伦理规范：明确人机权责边界

在应用过程中，应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坚持最少必要采集；明确“学生主体、教师主导、AI 辅助”的权责边界，要求学生标注 AI 使用部分；强化学生数字素养与批判思维培养，引导其认识 AI 生成内容的价值与局限，保持对技术的理性态度。此外，需警惕创作同质化与算法偏见对学生民族音乐认知的潜在影响，在资源选用中注重文化多样性。

六、结语

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音乐教育的价值意蕴与教学应用范式，并以黄石市为典型场域审思了非一线城市的本土化推进路径。研究认为：其一，AI 在技能训练、创意支持、课堂协同与过程评价四个维度具有独特应用价值，与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形成系统性对应；其二，四类教学范式的构建为 AI 融入常规音乐教学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框架；其三，非一线城市应走低成本、高适配、分层推进的本土化路径，同步推进教师能力发展与伦理规范建设。AI 赋能音乐教育必须坚守育人为本的底线，以制度与机制确保技术向善。四类教学范式的实践效度与本土化

路径的适切性，有待后续研究在实践检验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2] 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 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 (第一版) [EB/OL]. (2025-11-28)[2026-09-20]. http://www.edu.cn/xxh/focus/zc/202511/t20251128_2704300.shtml.

[3] Mishra P, Koehler M J.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6, 108(6): 1017-1054.

[4] 张艳川. 音乐教育的 AI 赋能: 从理论到实践的范式转型与评价体系创新[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3(6): 139-148.

[5] 丁昀璐. 人工智能赋能小学音乐教育核心素养培养的路径研究[J]. 学苑教育, 2025(25): 34-36.

[6] 杨斐雁, 侯蕾. 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赋能音乐教育探析[J]. 当代音乐, 2025(09): 58-60.

[7] 高茵, 贾梦迪. 基于人工智能的音乐教育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J]. 参花, 2025(33): 138-140.

跨界学习视域下专业群教师国际化素养的生成机制——以轨道交通智能建造专业群为例

钟子林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430)

摘 要：职教出海正在从铺点转向提质，专业群教师因而要在两条边界上同时工作，一条在专业群内部，一条在国家之间。本文以跨界学习理论为观察工具，把轨道交通智能建造专业群放在境外办学与属地化培训的场景中考察，归纳出四个前后相续又不断回返的环节：识别差异、协调边界、反思性重构与转化固化。双语专业标准、课程包和虚拟仿真资源在这些环节中起中介作用。案例材料显示，四个环节能否走完，取决于出海任务是否真实、团队分工是否落定，以及境外工作量能否在职称评审和“双师型”教师认定中得到承认。承认一旦断裂，教师个人学到的东西就停在个人身上，变不成团队能力。培育路径由此落在项目安排、边界物建设和制度供给三处。

关键词：跨界学习；专业群；教师国际化素养；职教出海；轨道交通智能建造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广州市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轨道交通智能建造专业群教师跨专业发展的国际化素养培育研究”（项目编号：2025YBJG075）；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创新团队项目“轨道交通线—桥—隧职能监测检测与安全防控技术创新团队”（项目编号：GTXYT2401）

DOI：doi.org/10.70693/202610239053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eachers'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in Professional Clus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ary-Crossing Lear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Cluster of Rail Transit

Zhong Zilin

Guangzhou Railway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0430, 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shifting from establishing overseas presence to pursuing quality improvement. Accordingly, teachers within professional clusters operate across two boundaries simultaneously: one internal to the professional cluster and the other between nations. Drawing on boundary-crossing learning theory as an analytical le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cluster of rail transit in the context of overseas campus operation and localized training. It identifies four sequential yet iteratively recursive stages: identifying differences, coordinating boundaries, reflective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Bilingu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curriculum packages and virtual simulation resources serve as mediating artefacts throughout these stages. Case evidence reveals that the completion of this four-stage process hinges on three prerequisites: authentic overseas mandates, well-defined team roles, and formal recognition of overseas workloads in professional title evaluation and the accreditation of dual-qualified teachers. Where such recognition breaks down, individual teachers’ learning remains personal and fails to evolve into collective capacity. The development pathway therefore lies in three dimensions: project arrangement, boundary object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Keywords: boundary-crossing learning; professional cluster; teachers’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rail transit

作者简介：钟子林（1990—），男，博士，研究方向为轨道交通职业教育、轨道交通工程测量。

一、问题提出

职教出海的重心正在从铺点转向提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把“规范有序开展海外办学”写入顶层设计，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也把专业教学标准、课程资源与实训装备的对外输出列为建设内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要求加强教师培训的国际交流合作，深耕鲁班工坊等品牌。《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教随产出、产教同行，并明确要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与课程标准。轨道交通是其中较早进入运营阶段的领域。中老铁路、雅万高铁通车之后随即转入长期维护，属地员工的培训由项目期的一次性安排变成持续任务。承担这类工作的职业院校教师，要做的事情已经超出把课程译成外语，还包括在专业内容与当地制度之间重新安排教学。

围绕教师国际化素养的研究近年增多，主流做法是拆解要素、测量水平。知识、能力、态度的三维框架已经获得较大样本的支持，院校所在区域、岗位类型带来的水平差异也有实证[1]。团队层面的研究则指出另一类困难，面向出海的教学创新团队缺少可依循的国际化标准，培训实效有限，激励也不足[2]。这些研究把国际化素养当作可以被测量和培训的属性，至于在真实任务中怎样长出来，讨论不多。测量取向的结论也不容易直接指导培育实践。知道教师哪一维度得分偏低，与知道这一维度怎样长起来，是两件事。

过程视角的缺席，与专业群的组织方式并不匹配。专业群按产业链岗位群组建，课程模块化之后，教师本来就在专业边界上工作，跨界因而被视为高水平教学创新团队的常态[3]。出海任务的加入，使边界多了一层。企业实践场景中的跨界学习研究已经给出较清楚的机制，差异被识别、协调、反思，最后转化为教师的专业学习[4]。上述机制能否搬到跨境场景，特别是当专业分工与国别制度同时起作用时会发生什么，目前还缺少经验回答。

本文要回答两个问题：在双重边界之下，专业群教师的国际化素养经由哪些环节生成；这些环节的运转依赖什么条件。本文先建立分析框架，再以一所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的智能建造专业群为案例展开，最后讨论教师国际化素养的培育路径。

二、分析框架：双重边界与跨界学习

（一）双重边界的叠加

专业群教师面对的边界有两重。群内跨专业协作要求教师听得懂相邻专业的话语，模块化课程又把原本属于相邻专业的教学内容分到教师手上。跨境教学则要求教师在技术标准代际、语言、劳动制度和职业资格框架都不相同的环境里重新组织知识。两重边界并不平行。分工越细，单个教师手里的知识片段越不完整，越需要团队配合才能传递出去，跨界于是从个人问题变成组织问题。反过来，团队成员如果有跨专业基础，跨境转译的组织成本会低不少。以轨道交通类专业群为例，铁道工程技术与铁道供电技术共用一条线路的施工与运维场景，测量、检测、供电、信号的工作界面高度交叠，教师不熟悉相邻专业的作业逻辑，很难在境外培训中把本专业的标准讲清楚。据此，本文把国际化素养看作跨界活动在个人与团队两个层面留下的沉积，而非个人身上一组固定的属性。

（二）跨界学习的理论适配

跨界学习理论把边界理解为不同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异，不归因于个人能力不足。学习发生在跨越边界的行动里，边界物承担中介[5-6]。这一视角对本研究有两处合用。跨界学习把素养还原为过程的结果，使“生成机制”可以被观察。该理论提供了能落到经验材料上的环节，识别、协调、反思与转化在企业实践场景中已做过本土化检验，具体行为包括辨识差异、主动对话与让渡利益[4]。跨境场景与校企场景的差别在于差异的来源。前者同时受专业逻辑与国别制度牵动，个人层面的跨越和组织层面的跨越必须一起发生。

据此，本文把分析框架定为四个环节。差异被察觉并转成待解决的问题，是识别；边界物被生产和使用，是协调；专业知识在当地情境中重新组织，是反思性重构；个人所得经团队分工与制度承接沉淀下来，是转化固化。四者在逻辑上前后相续，实际运行中常有回返，新任务一来，识别又得重做。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解释性单案例研究，案例为华南一所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下称 G 校）的轨道交通智能建造专业群。该专业群属高水平专业群，建有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学校建有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具备把高危岗位训练搬到境外课堂的条件。学校自 2015 年起持续做境外办学与属地化培训，与埃及、肯尼亚等国共

建境外学院，蒙内铁路等项目。群内各专业共用轨道交通综合仿真实训基地与虚拟仿真实训资源，教师原本就有跨专业联合备课的做法，观察跨界不必另设场景。

材料来自三个方面。国家和省级的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文本。学校公开的专业群建设资料、国际合作项目文件与质量年度报告。媒体对学校出海实践的报道。本文采取模式匹配，以四个环节作初始编码框架，与材料反复比对，遇到框架覆盖不到的内容就补进来，再回头修框架。同一事实尽量找两类以上材料验证，涉及数量和时间的地方以公开来源为准。

单案例的结论不便外推，公开材料也很难呈现教师个人的完整心理过程。本文的定位因此是机制层面的理论建构与经验阐释，所得结论还要靠多案例比较和大样本测量去检验。

四、国际化素养生成的四个环节

（一）识别：从技术落差到制度落差

教师进入境外项目，最初的感受往往是原有的东西用不上。G 校曾派教师团队赴肯尼亚驻场六个月，一边培训一边联合开发本土化课程。教师到现场后先遇到技术落差，当地铁路的装备代际、检修规程、作业组织方式都与国内教学所用的原型有距离，能直接搬进课堂的内容比预想少。当地职业资格框架对课程单元的切分逻辑、企业对培训工时的约定规则、学员习以为常的课堂节奏，这些差异均根植于制度与文化层面，绝非单纯补充技术细节所能弥合。

差异识别若要真正成为跨界学习的起点，尚需经过议题化的关键转化。即将“教学难以适配”的感性感受，提炼为“课程需系统性重构”的明确命题。这一认知转向在案例资料中可清晰追溯。教师开始以当地岗位工作任务为核心逻辑组织教学内容，而非沿用国内教材固有的章节编排。在此之前，针对境外教学的应对措施大多停留在放缓语速、增设翻译等表层调适层面。

（二）协调：边界物的生产与使用

跨界很难由一个人完成，得有可以共同加工的中间产物。G 校用的是双语专业标准与课程体系、国际员工培养培训标准、活页式和工作手册式双语教材，以及依托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做的仿真资源。学校已开发两套双语专业标准与课程体系、两套国际员工培养培训标准，并与企业、境外高校共建轨道交通教育中心。这些产物有两重身份，既是中外教师与企业导师商量内容与进度的凭据，也是教师跨界所得外化下来的载体，可以积累，可以传给同事。活页式教材的作用在境外尤其明显。当地装备与国内不一致时，教师按模块替换内容即可，不必重编整本教材，改动的成本因此可控。这种可编辑性也改变了教师对跨界的态度，愿意尝试的教师有所增多。

协调还需要组织载体。学校与测绘装备企业共建的产业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学校骨干教师与企业技术专家组成双导师团队，一起开发课程，一起上课，在高铁精测精调与自动化监测的真实项目上完成课程转化。这套校企协作结构进入跨境场景后被沿用为中外协作结构，原先用来协调专业分工的机制，转而承担起协调国别差异的职能。协调并不能消除差异，能做到的是让差异可以商量。

（三）反思性重构：知识的再情境化

协调走到深处，教师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知识。双语授课和属地课程开发要求教师区分两类内容。一类是原理性的，换一代装备依然成立。另一类依附于特定装备和本地惯例，换一处场景则未必成立。区分之后，知识的存在形态也变了，从按教材顺序排好的陈述变成按现场问题组织的任务，教学从讲授为主转为示范加陪练。已有研究把这一过程称为教师在差异面前重新理解自己的专业[4]。跨境教学场景还具备一重独有的反思触发机制。语言转换行为本身即可驱动教师展开深度反思。当教师需要使用目标语阐释自身早已熟稔的专业概念时，那些此前被默认认知所遮蔽的理解缺口便会清晰浮现。

反思停在哪一层，结果不一样。停在技巧上，得到的是短期可用的经验。若触及知识结构，教师处理陌生技术情境的方式才会改变。知识结构的重组需要时间，也需要同行与企业持续反馈。

（四）转化与固化：从个人经验到团队能力

个人学到的东西，要经组织承接才成为团队能力。G 校的承接方式是模块化课程体系、产业学院的教研制度和专业群内部的课程包更新。学校重构的“1+2+4”专业群布局与“实践导向、模块化结构、岗课赛证融通”的课程体系，让境外教学中形成的内容能以模块为单位回流境内课堂。回流并非对已有资源的简单重复利用，原本由教师个体独立承载的整套教学实施经验，可被拆解为标准化功能模块并纳入团队分工体系，跨境教

学的协同实施成本随之得到有效降低。

这一环节也是整个跨界学习流程中最易发生断裂的关键节点。制度不接，境外教学的经验会随人走，个人能力提升，团队能力却停在原处。案例材料显示，回流发生的前提是境外工作被算进团队的常规工作清单，而不是当作额外任务派下去。回流能否稳定发生，取决于组织与制度两方面的条件。

五、机制运行的条件与阻滞

（一）组织条件

专业群团队跨界、非实体、柔性化，这些特征有两面。柔性结构让教师可以围绕具体任务临时组合，跨界成本摊到多人身上。非实体化却让责任落不到具体岗位，团队结构不合理、过程性评价缺失、与产业对接不紧一类问题，在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研究里已被反复提到。分工要真能分担跨界成本，模块化任务就得绑定明确的边界物交付责任，否则跨界会被摊薄成没人认账的模糊地带。

（二）制度条件

制度供给不足，是转化环节断裂的主因。现行的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把师德师风放在第一位，重点考察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要求熟悉行业企业情况、有相应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认定内容里没有国际化教学经历；教学创新团队的政策设计对国际化的要求，主要还是成建制派骨干教师赴境外研修访学。后果很直接，教师在境外投入的教学工作量、开发的标准与课程包，在职称评审、团队验收和绩效考核中换不到等价的分量。承认不足会削弱教师参与出海项目的意愿，团队也缺少把个人经验制度化的动力。折算办法不必复杂，按境外教学时数折合境内工作量、按标准与课程包的采用范围计分，教师就能看到投入与回报之间的对应关系。

（三）技术条件

数字化为跨界提供了低成本的协作界面。政策层面已提出赋能鲁班工坊等职教出海项目，依托海外办学机构和企业海外培训中心培养“数字+技能”复合型人才。对轨道交通这类高危、高损耗、高投入的实训领域，虚拟仿真资源的作用更直接。原本在境外难以复现的岗位训练可以整体搬过去，装备代际差异带来的转译压力随之缓解。技术改善降低的是识别与协调的门槛，反思和转化仍要靠人来往，靠制度安排。

（四）个体条件

个体这一层同样构成门槛。教师要在“专业教师”和“国际培训师”两种身份之间找到连贯的自我理解，若把出海教学当成常规工作之外的负担，跨界学习很难启动。语言能力、跨文化适应、家庭安排都是前置条件。已有实证研究显示，国际化素养水平在区域、岗位与学校类型之间存在分化，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双高”院校教师的参与态度更积极。培育路径的设计因此要考虑起点差异，不能假定教师基础是一致的。

六、培育路径

（一）以真实项目作为学习场

素养生成靠真实任务牵引，脱离项目的培训很难触发识别。培育设计应把教师放进标准开发、课程包研制、属地培训的完整任务链，驻场周期按完整项目算，而不按短期访问算，让教师走完从识别到转化的全过程。项目结束后的复盘也不能省，复盘的作用是把个人反思引到团队讨论里去。团队编成上，可以由一名熟悉境外项目的教师指导两名首次参与的教师，专业背景错开，让跨专业协作在任务中自然发生，不必靠会议去协调。

（二）以边界物建设作为抓手

把双语专业标准、课程包、双语教材和虚拟仿真资源列进团队交付清单与考核指标，边界物的生产就从自选动作变成可管理的工作。边界物的价值不只在产出，开发过程本身就是协调与反思发生的地方。对轨道交通类专业群，企业海外项目的技术文件与培训包也该纳入边界物，让校企协作与跨境协作共用同一套中介物。

（三）以制度供给作为保障

承认问题只能靠制度解决。认定与评审层面，把境外教学工作量、标准和课程开发成果纳入“双师型”教师认定、职称评审与教学创新团队验收的等效成果范围，并给出折算办法。团队层面，建立以边界物交付为核心的过程性评价，不以派出人次代替能力建设。校际层面，依托华南“一带一路”轨道交通产教融合联盟这类多校多企的协作网络，推动课程包互认与师资共享，把单一院校的制度成本摊薄。

七、结论与讨论

专业群教师的国际化素养生成于双重边界上的跨界学习。识别、协调、反思与转化四个环节前后相续，也会回返，其中转化对制度供给最敏感。把素养看作过程的沉积，培育工作的重心就该从开培训课转到组织真实任务、生产边界物、完善承认机制三处。本文把跨界学习机制从校企之间的企业实践场景推到跨境场景，并提出专业分工粒度会改变跨境转译难度这一判断，可供后续研究检验。

参考文献：

[1] 王琪, 王荧婷. 高职院校教师国际素养的构成要素、发展水平和提升策略——基于全国 31 所高职院校的实证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 2024 (9): 117-128.

[2] 张宇, 辛秀兰. 面向“职教出海”的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探索[J]. 教育与职业, 2025(22): 94-100.

[3] 董媛. 高职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归因、冲突与实践[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21): 60-64.

[4] 孙露丹, 孙元涛. 企业实践如何重塑教师的专业学习?——一项关于跨界学习的质性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14): 70-81.

[5] ENGESTRÖM Y, ENGSTRÖM R, KÄRKKÄINEN M. Polycontextuality and boundary crossing in expert cognition: lear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in complex work activities[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1995, 5(4): 319-336.

[6] AKKERMAN S F, BAKKER A. Boundary crossing and boundary objects[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1, 81(2): 132-169.

课程思政视域下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实践路径研究

陶 攀[1]，林泽航[1]，罗晓珊[1]*

(1.成都大学，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红色体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体育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重要文化资源，其所承载的爱国情怀、集体意识、奋斗精神和纪律观念，与高校体育课程的育人要求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近年来，匹克球逐渐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相关研究已开始关注其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考核体系，但围绕匹克球课程思政的具体教学转化仍缺乏深入讨论。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在梳理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入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教学逻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匹克球并非红色体育项目，红色体育文化与匹克球课程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历史同源关系，其融入不能建立在简单的内容嫁接之上，而应以课程目标和专项教学内容为依据，将适宜的红色体育文化资源转化为学生能够在练习、合作、比赛和规则实践中感知的教育内容。具体实施中，应明确红色体育文化在课程中的功能边界，根据匹克球教学内容选择适宜的思政切入点，将价值引导嵌入课堂主体活动，并通过过程性评价观察学生在合作、规则、责任和意志品质等方面的行为表现，从而避免课程思政与专项教学相互分离，为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课程思政；红色体育文化；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

DOI：doi.org/10.70693/202610236059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Sports Culture into University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Pickleball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o Pan, Lin Zehang, Luo Xiaosha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Red sport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form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people in sports practice. The patriotism,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spirit of perseverance, and sense of discipline embodied in red sports cul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pickleball has gradually been introduced into university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Existing studies have begun to focus on its curriculum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and assessment system; however,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specific pedag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urriculum-based

作者简介：陶 攀（2002—），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林泽航（2000—），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罗晓珊（1985—），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
通讯作者：罗晓珊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ickleball courses remains insufficient.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studies concern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d sports culture into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it analyzes the pedagogical logic of integrating red sports culture into university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pickleball cour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ickleball is not inherently a red sports event, and there is no direct historical homology between red sports culture and pickleball courses. Therefore, such integration should not rely on the simple graft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onto specialized teaching. Instead, it should be grounded in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specialized teaching content, transforming appropriate red sports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educational content that students can perceive and experience through practice,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rule-based activities. I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the functional boundaries of red sports culture within the course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ppropri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ntry points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pickleball, value guidance should be embedded in the core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behavioral performance in cooperation, rule observance, responsibility, and willpower should be assessed through process-oriented evaluation. In this way, the separation betwee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pecialized sports teaching can be avoided, thereby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red sports culture into university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pickleball courses.

Keyword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d Sports Culture; University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Pickleball

1 引言

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并明确要求体育类课程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体育锻炼过程中加强爱国主义、传统文化以及意志品质教育[1]。这一要求意味着，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不能仅以身体素质提高和运动技能掌握作为教学目标，还需要关注体育活动本身具有的教育价值。

与理论课程相比，体育教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学生在课堂上不仅需要完成运动技术学习，还要处理同伴合作、竞赛胜负、规则约束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体育课程思政的落实不能主要依靠理论讲授，而应建立在具体运动实践基础之上。魏源、程传银认为，红色资源融入高校体育课程，应落实到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之中，而不能停留于一般性的价值宣示[2]。王德志、张红玲的研究也指出，目前部分高校体育课程中红色体育文化的融入主要集中在课前导入和课后总结环节，与课堂主体教学之间的联系仍显不足[3]。

红色体育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体育文化形态。已有研究通常将革命时期形成的体育实践、体育思想、体育故事、历史文献以及由此积淀的精神文化纳入红色体育文化的范畴[4-5]。从教育内容看，其中所反映的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纪律观念和责任意识，为体育课程思政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基础。近年来，围绕红色体育文化进入高校体育课程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内容由价值分析扩展到资源开发、教学内容和实施路径等方面[2-6]。

与此相对，匹克球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时间较短。杨波、贾树波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时安排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对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内容体系进行了讨论，并将课程思政纳入课程建设范围[7]。这表明，匹克球课程研究已经开始从单纯的项目推广转向课程体系建设。

不过，红色体育文化研究和匹克球课程研究之间仍存在一定距离。前者多从高校体育课程整体层面讨论融入路径，后者则主要围绕匹克球课程建设本身展开。将红色体育文化具体落实到匹克球教学时，哪些内容适合进入课堂、通过什么活动进入、如何避免对专项教学造成干扰，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因此，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简单论证红色体育文化“能否”进入匹克球课程，而是分析其进入课程之后如何保持体育课的专项属性，并使文化教育与运动实践产生实际联系。

2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基本认识

2.1 红色体育文化应作为课程资源，而非匹克球项目自身属性

讨论红色体育文化与匹克球课程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二者的概念边界。红色体育文化具有较为明确的历史生成背景。陈傲雪、权格格认为，红色体育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过程，其文化形态包括革命时期的体育实践、体育史料、体育故事以及相应的精神文化，并具有革命性、人民性和传承性等特点[5]。付东阁、张应龙则从革命性、教育性和实践性等方面对红色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4]。因此，红色体育文化不能泛化为一切积极的体育精神。

匹克球并非产生于我国革命体育实践中，也不具备红色体育项目的历史属性。双打中的合作、比赛中的坚持以及对规则的遵守，本身属于体育运动普遍存在的行为要求。如果直接将这些行为称为红色体育文化，容易造成概念外延扩大。较为合理的处理方式，是把红色体育文化理解为高校体育课程可以开发利用的一类课程资源。教师从红色体育历史和体育实践中选择与课程育人目标有关的内容，再通过教学设计与匹克球中的具体运动情境建立联系。这样，红色体育文化和匹克球可以保持各自的基本属性，前者提供文化和价值资源，后者提供身体活动和教学情境。

2.2 体育实践是二者发生联系的中间环节

红色体育文化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学生的价值认同，其教育作用需要通过具体教学活动实现。体育课程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学生必须参与身体实践。学生在双打比赛中需要与搭档沟通，在技术学习中会面对连续失误，在教学比赛中要接受胜负，在承担裁判任务时需要依据规则作出判断。这些都是体育课堂中真实存在的行为情境。

红色体育文化进入课堂，可以为这些行为提供历史和文化参照。例如，教师可以通过适当的红色体育史料说明集体协作、纪律意识或者艰苦奋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但课堂重点不应停留于对史料本身的记忆，而应进一步回到学生当前的体育实践。

换言之，红色体育文化能否在匹克球课程中发挥育人作用，并不取决于课堂中出现了多少红色故事，而取决于这些文化内容能否与学生正在经历的运动活动产生联系。

2.3 匹克球课程为价值教育提供了具体的运动情境

并非匹克球课程中的所有技术教学都适合作为课程思政载体，也没有必要对每一个技术动作进行思政解释。与单纯的动作模仿相比，双打配合、教学比赛、规则学习和学生裁判等环节具有更明显的人际互动特点，也更容易出现合作、责任、纪律和胜负态度等问题。因此，这些教学环节更适合作为红色体育文化进入课程的具体场景。

例如，双打中的站位与补位要求双方保持沟通，学生不能只关注个人击球；裁判实践要求学生依据统一规则处理争议；教学比赛则可能出现领先、落后以及连续失分后的心理变化。这些内容原本就是匹克球课程的一部分，并不需要为了课程思政另外设置一套脱离专项教学的活动。教师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原有运动情境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价值引导。

3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需要重点处理的问题

3.1 防止将其他体育项目的思政内容直接移植到匹克球课程

已有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研究，涉及武术、传统体育、球类以及体能活动等不同内容[3-6]。这些研究能够为匹克球课程提供一定参考，但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教学方案可以直接照搬。

不同运动项目的身体活动方式、文化背景和教学组织形式存在差异。例如，武术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具有较为直接的联系，一些地方体育项目本身也具有明确的地域文化属性。相比之下，匹克球与红色体育文化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历史联系。

因此，在匹克球课程中融入红色体育文化，不宜先确定思政材料，再人为寻找某个技术动作与之对应。更适合的方式是先分析实际教学内容，判断哪些课堂活动中存在较为明确的育人情境，再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红色体育资源。也就是说，应当由专项教学需要选择思政内容，而不是让专项教学去迁就已有的思政材料。

3.2 防止思政内容停留在课堂导入和总结

王德志、张红玲指出，一些体育教师虽然已经认识到红色体育文化融入课程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教学中仍主要在课前导入或课后总结时增加相关内容，课程主体部分仍以运动技能讲解和练

习为主[3]。付东阁、张应龙也认为，红色体育文化如果不能进入体育课程的具体教学过程，其育人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4]。这一问题对于匹克球课程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如果一节课开始时介绍一个红色体育故事，之后的技术练习、分组方式和教学比赛都与这一内容没有关联，那么体育教学和思政教育实际上仍然处于分离状态。

因此，红色体育文化更需要进入课堂主体活动。例如，在双打教学中，可以通过搭档配合和位置补位体现团队合作要求；在比赛中，可以通过规则执行和学生裁判开展规则教育；在具有一定难度的连续击球练习中，可以通过阶段性目标设置，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失误和困难。此时，价值引导是在学生实际运动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脱离体育活动单独进行。

3.3 防止将抽象价值目标进行简单量化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课程后，如果课程目标增加了合作意识、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等内容，课程评价理应作出相应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设置“爱国主义 10 分”“集体主义 10 分”或者“奋斗精神 10 分”等评价项目。此类指标一方面缺乏清晰的行为依据，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课程思政评价形式化。

白杨、李玥瑞提出，体育课程思政评价可以更多关注学生在运动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例如反复练习中的学习态度、团体运动中的合作行为等[6]。因此，在匹克球课程中，更适宜评价学生在具体运动情境中的行为表现，而不是直接评价抽象价值观。

4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实践路径

4.1 将红色体育文化纳入课程目标，但不扩大体育课的育人边界

课程目标是教学内容选择和教学评价的基本依据。红色体育文化如果只是在教学过程中临时加入，就容易与课程其他环节脱节。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仍应以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技能、发展身体素质以及提高体育参与能力作为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可根据课程特点增加适量的育人目标。

从匹克球教学能够提供的具体运动情境看，团队合作、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面对困难时的坚持，较适合作为课程育人的重点内容。与此同时，也需要注意课程目标的边界。高校公共体育课可以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但并不意味着一门匹克球课程需要承担所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爱国主义教育、红色体育历史认知等内容可以在适宜的课程环节中体现，但没有必要在每一次专项技术教学中都进行对应。思政目标越具体，实际教学越容易落实。

4.2 根据匹克球教学内容选择适宜的融入点

表 1 匹克球教学与红色体育融入点

匹克球的教学内容	课堂中可能出现的行为情境	可选择的育人内容
基本技术及连续击球练习	反复失误、重新尝试、实现目标	坚持、克服困难
双打站位与战术配合	沟通、补位、责任分工	团队合作、集体意识
教学比赛	比分领先或落后、失误、	正确胜负观、拼搏精神
竞赛规则与裁判学习	判罚、争议球处理	规则意识、公平意识
课堂小型赛事组织	裁判、记录、器材管理	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确定课程目标以后，需要进一步明确红色体育文化究竟进入哪些教学环节。

这一过程应以匹克球教学内容为起点，而不是给每一项技术动作附加一个思政概念。例如，基本技术和连续击球训练中，学生在反复练习中经历击球失误，可以适当引导其形成坚持完成学习任务的态度。双打教学中，学生需要进行站位、补位和战术沟通，可以重点关注团队协作。教学比赛中，学生需要面对比分变化和胜负结果，可以开展拼搏精神和正确胜负观教育。规则学习和学生裁判则适合引导学生形成规则意识和公平意识。

这里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固定的。同一个双打活动既可能涉及合作，也可能出现规则问题。教师应根据本班学生实际情况确定教学重点，而不是在一节体育课中同时加入多个思政目标。红色体育文化资源的选择同样如此。只有当某一历史材料、体育故事或者人物事迹与本节课的实际运动情境存在较为明确的联系时，才有必要进入课堂。如果联系比较牵强，则不应为了体现课程思政而强行使用。

4.3 将价值引导放在练习和比赛过程中

红色体育文化能否真正进入匹克球课程，关键在课堂主体部分。以双打教学为例，在学生掌握基本站位以后，可以安排固定搭档进行教学比赛。教师首先观察学生在比赛中的交流、补位和失误后的反应。如果学生出现缺乏沟通、互相埋怨或者过度关注个人表现等问题，教师可以结合

红色体育实践中有关集体合作的内容进行简短引导，再组织第二轮比赛，并增加明确的合作要求，例如赛前确定基本战术、每局结束后进行简短交流或者交换搭档重新比赛。

这种教学安排与“先讲红色故事，再开始练习”有所不同。红色体育文化并不是独立于课堂之外的一部分，而是用来解释学生刚刚遇到的实际问题。顽强奋斗精神也可以采用类似方式。在连续击球或网前技术练习中，可以根据学生水平设置不同难度的阶段目标，让学生经历失败、调整和再次尝试。练习结束后，教师再结合相关红色体育内容进行简要总结。此时学生已经具有实际身体体验，文化内容才更容易与个人学习经历发生联系。因此，在匹克球课堂中，红色体育文化更适合作为对运动体验的价值解释，而不是用文化讲授代替运动体验。

4.4 将课程评价落到具体运动行为

课程思政评价首先应服务于教学，而不是为了单独形成一个思政分数。匹克球课程中的专项技术、基本规则和运动能力仍然可以按照原有方式进行考核。对于课程思政目标，则可以更多采用过程观察的方式。例如，在双打练习中，可以观察学生是否主动与搭档沟通、是否能够进行合理补位；在教学比赛中，可以关注学生面对连续失误或比分落后时是否仍能正常完成比赛；在裁判环节中，可以观察其能否按照规则进行判罚；在小型比赛组织中，可以关注学生是否按要求完成裁判、记录和器材管理等任务。这些行为具有相对明确的发生情境，比直接评价“思想觉悟”或者“集体主义水平”更符合体育课程特点。

教师还可以适当采用学生自评和同伴评价。例如，在双打比赛结束后，让学生简要写出本场比赛中与搭档合作较好的一个方面，以及需要调整的一个问题。其目的并不是形成复杂的评价体系，而是帮助学生反思自己的体育行为。同时需要指出，目前关于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的实证研究较少，尚缺乏经过充分验证的专门评价工具。因此，本文提出的评价方式主要属于教学实践层面的设想，其有效性仍需要通过后续教学研究进一步检验。

5 结语

匹克球并不是红色体育项目，红色体育文化也不能通过项目名称或者技术动作直接进入课程。二者之间需要经过教学转化，即教师依据匹克球课程原有教学内容，判断哪些运动情境具有较为明确的育人价值，再选择适宜的红色体育文化资源进行解释和引导。

从匹克球实际教学过程看，双打合作、教学比赛、规则学习和学生裁判等环节本身已经包含较丰富的教育情境。红色体育文化融入的重点，不是增加红色文化内容的数量，而是使这些文化资源与学生真实的身体活动和行为体验发生联系。

因此，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应从课程目标和专项教学内容出发，选择适宜的文化资源，将价值引导落实到练习、合作、比赛和评价之中。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红色体育文化与体育教学形成“两张皮”，也能较好地保持公共体育课程原有的专项属性。

本文主要依据相关文献对实践路径进行分析，尚未通过实际教学实验验证其育人成效。因此，不能据此直接判断上述教学方式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规则意识或意志品质。后续研究可选择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教学班开展教学实践，通过课堂观察、学生访谈、学习反思和前后测等方法，对不同融入方式的实际效果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教学设计和评价方案。

参考文献：

[1]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Z]. 2020.

[2]魏源, 程传银. 红色资源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价值定位、目标指向与实践路径[J]. 体育文化导刊, 2022(8):14-20.

[3]王德志, 张红玲. 体育强国背景下红色体育文化融入体育课程思政的路径[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6(5):113-117.

[4]付东阁, 张应龙.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的实践路径[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8(3):119-123.

[5]陈傲雪, 权格格. 红色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类专业思政课程的作用探析：以西安体育学院为例[J]. 当代体育科技, 2023, 13(31):137-140.

[6]白杨, 李玥瑞. 河南省红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的路径探索[J]. 信阳农林学院学报, 2025, 35(4):132-135.

[7]杨波, 贾树波. 高校公共体育匹克球课程内容体系构建研究[J]. 林区教学, 2024(3):82-85.

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内涵、价值与提升路径

彭盈雪

(唐山师范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推进，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已成为推动特殊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优质融合普惠发展的关键支撑。研究立足特殊教育的专业特质与育人目标，将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划分为数智知识技能、数智情感态度及数智伦理道德三个维度并系统阐释其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从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弥合特殊教育数字鸿沟、推动特殊教育教师角色转型、赋能个别化教育实践四个方面揭示时代价值；进而从构建分层分类的专业培育体系、打造人文导向的数智教育生态、建立全过程的伦理监管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提升路径，为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基本内涵；提升路径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青年专项课题“智能教育场域下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生成机制研究”(2406026)；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普惠发展背景下河北省特殊儿童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ZC2025217)。

DOI：doi.org/10.70693/202610242789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Value and Upgrade Paths of Digital-Intelligent Literacy fo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Peng Yingxue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Abstract:With the push for a digital education strategy,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digital-intelligent literacy has become a key foundation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integrated,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educational goals of special education,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digital-intelligent literacy as comprising three dimensions:digital-intelligent knowledge and skills,digital-intelligent emotional attitudes,digital-intelligent ethics and morals,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each.On this basis,it reveal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from four aspects: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digital education strategy,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 special education,promoting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and empowering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actices.Furthermore,it suggests targeted ways to improve in three areas:building a tiered and categorized professional training system,creating a humanistic digital-intelligent education ecosystem,and establishing a full-process ethics supervision mechanism,thereby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Keyword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digital-intelligent literacy;basic connotation;upgrade paths

作者简介：彭盈雪(1995—)，女，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教育领导与管理。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写入国家战略蓝图，标志着教育数字化已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数字化转型的根本方向。2022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明确了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与框架体系[2]，说明我国教师数字素养建设逐步进入标准化与规范化阶段，也为特殊教育教师数字能力培育提供了参照。2025 年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政策重心逐步转向“数智融合提升”。2025 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将“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3]列为重点任务；《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提出“制定完善师生数字素养标准和人工智能应用指引”[4]要求；同年 7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的通知》进一步将“数字素养、智能素养”列为教师专业标准和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的核心能力[5]，教师能力建设正式迈入“数字+智能”深度融合的数智素养新阶段。2026 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教师数智素养提升落地的关键节点。2026 年 4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提出“制定教育智能素养标准，明确教师应具备的人工智能素养能力”[6]，推动教师数智素养从拓展性专业要求升级为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硬性指标；《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7]；9 月的《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则强调“加强对教师数智和科技素养、人文素养、创新思维、跨学科综合素养等的培养”[8]。从“数字素养”到“智能素养”再到“数智素养”，政策话语的每次调整都意味着教师能力结构的重新定义，更加说明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正重塑教育的形态，教师数智素养由此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变量。因此，研究立足特殊教育的专业特质与育人目标，整合智能教育场域理论与普通教师数智素养现有研究成果，系统阐释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基本内涵，深入剖析其时代价值并提出针对性的提升路径，助力“十五五”时期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目标落地。

二、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基本内涵

智能教育场域是技术特性、空间特征与智能属性深度融合的复杂教育生态，其对教师数智素养的要求早已超越单一的技术操作层面，延伸至情感价值与伦理规范的深层维度，这进一步说明了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不是数字素养与人工智能素养的简单机械相加。在借鉴邱奕菲[9]提出的三维素养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特殊教育的专业属性与育人目标，将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基本内涵从数智知识技能、数智情感态度及数智伦理道德三个递进维度解读，既包含“能不能”的认知维度，也包含“愿不愿”的情感维度，还包含“该不该”的伦理维度，从“知-情-意”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特殊教育教师适配数智时代的完整素养体系。

（一）数智知识技能

数智知识技能是特殊教育教师开展数智化教学实践的基础支撑、进入智能教育场域的“准入性素养”，主要指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应了解数智技术相关知识、掌握数智技术技能、运用数智思维解决特殊儿童教育康复问题的综合能力。与普通教育教师相比，特殊教育教师的数智知识技能是技术通用性与教育专业性的深入结合，具有双层结构特点。就通用知识技能而言，特殊教育教师需掌握数智技术的基本原理与通用教学工具的操作方法。一是数智基础理论知识，如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基本运行逻辑、核心功能与应用局限，理解数智技术的教育价值与应用边界；二是通用教学工具操作能力，如数字资源工具、在线协作平台、希沃白板等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能够利用工具完成资源获取、内容生成等常规教学事务；三是基础数据处理能力，掌握数据采集、整理及可视化分析的基本方法，能借助相关分析工具解读学生学习状态，适时调整教学内容。数智通用知识技能是所有数智时代教师的必备基础，能帮助教师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数智化教学环境，完成常规数字化教学事务，实现教学效率初步提升。就专业知识技能而言，特殊教育教师需具有与特殊教育场景高度适配的专业数智知识技能，这也是数智技术赋能特殊教育的关键落点。其一是特殊教育辅助技术操作能力，特殊教育教师需依据不同障碍类型学生需求，掌握对应的专业辅助技术与设备，如面向孤独症学生的社交技能训练系统、听觉障碍学生的手语识别系统、智力障碍学生的生活模拟训练系统等，同时特殊教育教师还能根据特殊学

生障碍类型与程度进行个性化参数设置与功能适配；其二是个别化教育的数智支持能力，特殊教育教师能利用智能评估系统高效完成特殊学生能力诊断与发展评估，借助学习分析技术动态追踪学生学习康复进展，利用数智技术优化个别化教育计划制定、实施与评估全流程精准育人；其三是特殊教育数字资源开发能力，特殊教育教师能结合特殊儿童的认知与学习特点，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多媒体制作工具等开发游戏化、生活化、个性化的教学康复资源，满足不同障碍类型学生的多元学习需求。正如邱奕菲所说“智能教育场域中的教师更应成为智能教育的研制与开发者，有意识地影响智能教育场域的内容形式与发展边界”[10]，这种开发能力于特殊教育教师而言最终指向特殊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满足，是数智知识技能从“通用工具”走向“专业赋能”的关键跃升。

（二）数智情感态度

数智情感态度是特殊教育教师在人机协同教育场域中坚守育人本位、传递人文关怀、实现价值引领的核心保障，更是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价值内核。智能教育场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边界，数智技术介入易弱化师生情感联结，而特殊学生由于社交沟通障碍、情绪调节困难等特点，对人文关怀与情感支持需求更高，这就决定了数智情感态度在特殊教育教师素养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数智技术“有温度”地服务于特殊学生的关键。特殊教育教师的数智情感态度包含三重含义：一是对数智赋能特殊教育的价值认同与主动心态。特殊教育教师需充分认识数智技术对补偿特殊儿童身心障碍、提升教育康复质量、减轻教师工作负担的重要价值，克服对新技术的畏难情绪与抗拒心理，以积极探索的态度主动接受数智变革，将技术应用与自身育人使命深度融合，主动运用技术赋能特殊教育教学实践；二是人机协同场景中的情感感知与传递能力。特殊教育教师需在智能教学环境中具备敏锐的情感洞察力，能通过特殊学生线上行为数据、非语言信号等捕捉其情绪状态与心理需求，同时能借助数智媒介传递有温度的教育关怀，推动数智技术成为延伸情感支持的载体，如借助辅助沟通系统(AAC)帮助无语言的特殊学生表达情绪需求，通过虚拟现实场景创设安全情感互动环境，拓展特殊儿童情感体验空间等；三是对特殊儿童生命成长的人文坚守。特殊教育教师需要明确“数智技术服务于人”的根本定位，要始终将特殊儿童的全面发展与生命幸福作为数智技术应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特殊教育教师数智情感态度最终体现为对每个特殊儿童的尊重与接纳，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数智时代的具体显现。

（三）数智伦理道德

数智伦理道德是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底线，是其在数智化教育实践中必须恪守的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相对于普通儿童而言，特殊儿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其具有自我保护能力差、隐私敏感度高、信息辨别能力弱等特点，数智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风险极易对其乃至家庭造成潜在伤害。因此，特殊教育教师必须具备更高水平的数智伦理素养，能够审慎且批判地看待数智技术，防范各类伦理风险，保障特殊儿童合法权益与健康成长。特殊教育教师数智伦理道德可从四个方面阐释。第一，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意识。特殊教育教师需严格遵守数据伦理规范与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采集、存储、使用特殊学生数据，掌握数据安全防护技能，严格控制敏感数据的访问权限，严防特殊学生隐私泄露，避免特殊学生因数据问题受到伤害。第二，数智内容的伦理甄别与价值引领。基于特殊儿童信息辨别能力较弱、认知水平有限、易受不良信息误导等特点，特殊教育教师需具备对智能生成内容、网络数字资源的适切性判断能力，及时过滤不适宜的内容，确保数字资源符合特殊儿童认知水平与身心健康发展需求。第三，技术应用的边界意识与教育本真坚守。特殊教育教师需辩证看待数智技术的作用，准确把握技术应用的边界，始终坚守育人的教育本质，明确数智技术的辅助定位，确保其始终服务于特殊儿童的全面发展。第四，算法偏见识别与反标签化能力。智能算法的训练数据可能因样本偏差对特殊儿童产生刻板印象与歧视性判断，特殊教育教师需要清醒认识到智能算法的局限性，避免过度依赖智能评估结果给特殊学生贴上“标签”，要始终以发展眼光看待特殊学生，用专业判断调整算法偏差，守护特殊学生的发展潜力。总之，特殊教育教师数智伦理道德是对特殊儿童权益的全方位守护，是教师专业伦理在数智时代的延伸与深化。

三、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时代价值

（一）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驱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升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既是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也是推进特殊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教育数字化是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而特殊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也是补齐特殊教育短板、彰显社会文明程度的核心环节。“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特殊教育从“普惠普及”迈向“优质融合”的关键转型期，特殊教育教师作为数智技术与特殊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纽带，其数智素养水平不仅直接决定了相关政策的落地深度与技术赋能的实际价值，更是撬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支点。通过提升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能够助力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度融入特殊教育教学、康复、管理及评价各个环节，变革传统的教育模式与育人方式，为特殊教育高质量普惠发展注入新质生产力。此外，提升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有助于改善特殊教育长期存在的专业康复资源短缺、个性化供给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难题。通过特殊教育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智能辅助康复、远程协同教研等方式扩充优质特殊教育资源覆盖面，整体提升特殊教育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因此，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提升即是落实“十五五”计划提出的“促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发展”[11]的核心目标，也是推动特殊教育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关键动力，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特殊教育领域的根基。

（二）弥合特殊教育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普惠发展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特殊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存在残疾类型带来的技术适配困难、市区与县域特殊教育学校带来的资源不足、特殊教育教师培训机会不均带来的能力差距等问题。数字鸿沟的多重叠加，使得重度特殊儿童无法获得适宜的教育康复服务，在数字化进程中最容易被落下与忽视。提升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是弥合特殊教育数字鸿沟的关键举措。一方面，通过系统化的数智素养培养，能够提升部分县域特殊教育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公共数字康复平台等优质资源开展教学康复工作，打破学校地域限制获取优质特殊教育资源，进而实现“以师资能力提升弥补硬件资源不足”的目标。另一方面，具备良好数智素养的特殊教育教师能更好地发挥数智技术的普惠价值，通过远程康复指导、送教上门智能支持、线上家校协作等方式，将优质特殊教育服务延伸至重度残疾儿童家庭，推动特殊教育从学校教育向家庭送教延伸，扩大特殊教育的覆盖面与可及性，实现特殊教育的优质融合普惠发展。

（三）重构教师专业素养结构，推动特教教师角色转型

数智时代的教育生态重构逐渐推动着特殊教育教师角色的深度转型，数智素养正成为新时代特殊教育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教育教师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扮演着知识传授者、技能训练者、康复实施者、家校沟通者等多重角色，工作内容繁杂且专业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提升不仅能帮助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价值引领、情感支持、个别化指导等核心育人环节，更能促进特殊教育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拓展能力边界，构建适配数智时代的专业素养体系，进而实现特殊教育教师角色的多元转型。具体而言，特殊教育教师角色可能发生以下转型：其一从“经验评估者”转向“数据支持的评估者”，通过整合功能性评估与课堂观察数据，作出对特殊儿童更精准的判断；其二从“教学设计者”转向“人机协同的设计者”，能够把智能工具嵌入学生个别化教育计划、具体课堂活动以及支持策略；其三从“技术使用者”转向“辅助技术适配者”，能够根据特殊学生所处环境与学习任务对技术进行选择调整；其四从“个体劳动者”转向“协同组织者”，能够与康复师、辅助技术人员、特殊儿童家长等协同合作。此外，数智技术也为特殊教育教师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可借助智能学习平台、虚拟名师工作室等获取前沿资料，开展同伴互助与专业研修，实现专业能力的持续迭代升级。总之，数智素养正在逐步成为重塑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形象、提升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地位、推动其从经验型向智慧型转变的核心驱动力。

（四）赋能个别化教育实践，保障特殊儿童发展权益

因材施教是特殊教育的核心要义，强调为每位特殊儿童提供适宜的教育与康复服务，而数智技术为个别化教育的精准落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其价值实现最终依赖于特殊教育教师的数智素养转化。具备良好数智素养的特殊教育教师能借助智能评估系统快速且多维度地完成特

殊学生的能力判断，利用学习分析技术与智能传感设备动态追踪学生生理状态、康复进展与学习行为；基于数据精准判断特殊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进而制定更具针对性、更符合特殊学生个体异质性特点的个别化教育方案。同时，特殊教育教师可以运用虚拟现实、智能交互等技术创设沉浸式、个性化的学习与康复情境，为不同障碍类型的特殊学生提供适配的学习支持与康复训练，如为智力障碍学生设计游戏化学习任务提升认知能力、为孤独症学生构建安全的虚拟社交场景开展社交训练等，切实保障每位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与发展权。

四、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提升路径

（一）夯实数智知识技能根基，构建分层分类的专业培育体系

数智知识技能是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提升的底层根基，必须基于特殊教育的专业特点，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和分层分类精准化的培育体系，全面提升特殊教育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与场景融合能力。第一，调整职前课程体系，打牢专业知识根基。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的高等院校应将数智素养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从源头提升职前特殊教育教师数智能力。一是优化课程结构，增设“人工智能与特殊教育”“智能康复技术应用”“辅助技术原理与操作”等相关课程，将数智知识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打破数智技术与专业教学的壁垒；二是强化实践教学，在配备与不同障碍类型相适应的辅助技术设备、智能康复系统、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基础上，引导职前特殊教育教师在模拟场景中不断实操，具备数智工具的操作与场景应用能力；三是推行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由学校牵头与特殊教育相关的科技企业、康复设备厂商开展深度合作，引入特殊教育领域前沿技术与真实项目案例，为特殊教育专业学生提供接触产业最新成果的机会，进而提升其技术应用的前瞻性与实用性。第二，优化职后培训模式，提升场景应用能力。针对在职特殊教育教师，应改变以往“一刀切”的培训模式，构建层层递进的培训体系。可在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习得、深化、创造”[12]三级进阶路径的基础上，结合特殊教育实际情况设置培训。一是面向全体特殊教育教师的初级培训，开展数智基础认知、通用工具操作、数据安全等普及性内容，帮助特殊教育教师具备基础数智能力，减缓数智技术畏难情绪；二是按照障碍类型分设的中级培训，如孤独症的数智干预技术、听觉障碍教育辅助技术等模块，特殊教育教师可依据自身任教学段或障碍类型按需选择，重点提升其专业辅助技术应用与场景融合能力；三是面向骨干教师的高级培训，开展数智教学创新、跨校协同教研等高阶内容，培养特殊教育数智强师。同时创新培训形式，采用案例研讨、工作坊等形式突出实操性与场景化，缓解纯理论讲授的局限。

（二）涵养数智情感态度内核，打造人文导向的数智教育生态

数智情感态度是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提升的人文保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从价值引领、能力培育与身份认同三个维度涵养特殊教育教师的数智情感态度，让数智技术始终服务于育人的温度。第一，强化价值引领，唤醒主动发展认知。要帮助特殊教育教师建立对数智技术的正确认知，通过专家讲座、案例分享等方式，促使教师直观感受数智技术在提升康复效果、拓展学生发展空间方面的赋能价值；树立特殊教育教师的主体地位，明确数智技术是辅助工具，从而减缓教师的职业焦虑并增强其对数智技术的接纳度；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将数智技术应用与数智教学创新纳入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等体系，激发特殊教育教师主动发展的动力。第二，培育情感交互能力，守护教育人文温度。引导特殊教育教师树立“技术赋能、人文为本”的理念，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始终将师生情感互动、价值引领放在教育首位；培养特殊教育教师在数智场景中的情感感知与表达能力，培训教师掌握通过虚拟互动表现、线上行为数据等捕捉特殊学生情绪情感状态的方法，运用数智技术媒介传递情感关怀的技巧，让数智技术成为延伸情感支持的工具；推广特殊教育领域有温度的数智教学案例，总结人机协同场景下强化人文关怀的有效模式，保障特殊教育教师在智能教育场域中始终坚守特殊教育人文底色。第三，缓解职业角色焦虑，强化教师身份认同。随着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部分特殊教育教师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职业危机感与角色焦虑，要帮助其找准新时代的角色定位，重塑专业身份认同。一是要加强角色认知引导，向特殊教育教师清晰阐述数智时代其的角色转型方向，明确教师在人机协同中发挥情感支持、价值引领、人文关怀等重要作用，强化自身职业信心；二是要搭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平台，让其明晰自身的成长路径，从技术使用者逐步成长为教学创

新者，在数智赋能中实现专业价值提升；三是营造包容创新的文化氛围，鼓励特殊教育教师大胆尝试数智教学新模式，在探索中逐步适应角色变化，建立新的职业身份认同。

（三）筑牢数智伦理道德防线，建立全过程的伦理监管机制

数智伦理道德是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提升的底线保障，必须建立“标准、培训、监督”的全流程伦理监管机制，全面提升特殊教育教师的伦理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守护特殊儿童的合法权益。第一，完善伦理规范标准，明确行为底线准则。要针对特殊儿童群体的异质性研制特殊教育领域独有的数智伦理规范与行为准则，明确内容审核、数据采集使用等方面具体要求与禁止条件，为特殊教育教师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如规定智能评估结果仅作参考，不得作为判定唯一依据；建立数智技术引入审核机制，对引入特殊教育学校的各类智能平台、设备、工具等进行严格的伦理审查与安全评估，从源头过滤掉存在伦理风险的产品；将数智伦理道德纳入特殊教育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明确伦理失范的责任与处理措施，强化特殊教育教师伦理责任意识。第二，加强伦理道德培训，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要将数智伦理道德教育作为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培训的必修内容，贯穿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全过程。对职前特殊教育教师系统讲授数据隐私保护、技术伦理等理论知识，培养其伦理批判思维；对在职特殊教育教师讲解风险识别方法与应对策略，提升其实际伦理决策能力。第三，健全伦理监督评价，强化伦理行为约束。一方面，特殊教育学校应建立数智伦理监督小组，定期对特殊教育教师的技术应用行为、数据管理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及时发现并纠正不规范行为，防范伦理风险；另一方面，建立伦理反思机制，引导特殊教育教师定期开展数智教学伦理反思，撰写反思日志，在持续反思中深化伦理认知、提升伦理自觉。

五、结语

数智时代的到来为特殊教育变革与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也对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全方位的升级要求。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是集数智知识技能、数智情感态度与数智伦理道德于一体的复合型素养，重构了特殊教育教师适配数字化、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时代的专业能力底色。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提升是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弥合特殊教育数字鸿沟、推动教师角色转型、赋能个别化教育精准实施的重要举措，对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来，随着数智技术的迭代升级与特殊教育的不断发展，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内涵将不断丰富完善，实践路径必将持续拓展。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构建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测评工具、开展大样本实证研究，把握国内特殊教育教师数智素养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真正让数智技术赋能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6-07-15].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EB/OL].(2022-11-30)[2026-07-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EB/OL].(2025-01-19)[2026-07-15].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EB/OL].(2025-04-05)[2026-07-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2504/t20250416_1187476.html.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的通知[EB/OL].(2025-07-03)[2026-07-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34/202507/t20250704_1196586.html.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2026-04-02)[2026-07-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202604/tt20260410_1433240.html.

[7][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2026-08-27)[2026-08-29].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31/202608/t20260831_1448305.html.

[8] 吴月.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全面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N].人民日报,2026-09-05(004).

[9][10] 邱奕菲.智能化时代高校教师数智素养的培育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2):139-142.

[12] UNESCO.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M].Paris:UNESCO,2024:22.

“三新”背景下基于学习者画像的高中英语教学实践路径探究

代浩美[1] 岳瑞玲[1]

(1.太原师范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摘 要：“三新”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正向核心素养导向的个性化育人转型，但大班额教学中学情判断依赖经验、因材施教难以落地的问题依旧突出。学习者画像能够通过整合多源学习数据实现对学情的精准刻画。本文梳理学习者画像的概念溯源与核心特征，明确其在高中英语教学场景下的内涵定义，进而构建“课前学情诊断—课中精准施教—课后评价反馈—画像优化更新”的闭环式教学实践路径，并从多维度阐释其应用价值，旨在为一线高中英语教师开展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三新”背景；学习者画像；高中英语教学；实践路径

基金项目：太原师范学院 2026 年度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SYYJSYC-2676）

DOI：doi.org/10.70693/202610245631

A Study on Practical Paths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Based on Learner Profi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New” Reforms

Dai Haomei[1], Yue Ruiling[1]

[1] Tai 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 zhong, Shanxi 030619,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New” reforms,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s transforming toward competency-oriented personalized education. However, a prominent problem remains: in large classes, teachers largely rely on experience to assess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Learner profiles enable accurate portrayal of learning status by integrating multi-source learning data.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nceptual origin and core features of learner profiles, defines their connot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and further constructs a closed-loop practical teaching path consisting of pre-class learning diagnosis, in-class targeted instruction, after-class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and profile optimization and updating. It also illustrates its application valu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o a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frontlin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o carry out data-driven targeted teaching.

Keywords: the “Three New” reforms; learner profil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al path

作者简介：代浩美(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岳瑞玲(1979—)，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通讯作者：代浩美

1.引言

随着高中“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改革全面推进，英语学科教学正逐步从知识本位的同质化授课，转向核心素养导向的个性化育人。《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25 年修订）》明确提出，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尊重个体差异，通过分层分类的设计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但在大班额教学的现实条件下，教师判断学情长期依赖日常教学经验和单元、期末等终结性考试成绩，既难精准摸清每个学生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的长短板，也没法动态跟踪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状态变化，因材施教大多还停留在理念层面，没能真正渗透到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

教育数字化转型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思路。目前多数普通高中都已建成智慧教学平台，日常教学中积累了作业提交、测验作答、课堂互动等大量学习过程数据，但这些数据大多只用于成绩统计和常规学情通报，没有真正转化为支撑教学决策的有效依据。学习者画像作为学习分析技术在教学场景的典型应用，能够把多维度的学习数据整合起来，用标签化的方式刻画出学生的知识基础、能力特点和发展潜力，为精准教学落地提供数据层面的支撑。基于此，本文立足“三新”改革背景，结合高中英语学科的教学特点，厘清学习者画像的核心概念与内涵，探索其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实践路径，为一线教师开展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提供参考。

2.学习者画像的概念溯源与核心内涵

厘清学习者画像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内涵，是构建高中英语教学实践路径的逻辑前提。学习者画像起源于商业领域的用户画像，在教育数字化与学习分析技术的推动下完成跨领域转化，逐步形成独具教育属性的研究方向。本节梳理学习者画像的演进历程，归纳其核心特征，并立足高中英语教学场景完成概念界定，为本研究实践路径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

2.1 概念溯源与发展演进

学习者画像的理论源头来自商业领域的用户画像（User Persona）。这一概念最早由交互设计学者 Cooper 提出，最初用于商业领域的用户特征刻画与个性化服务设计，核心逻辑是基于真实用户数据构建典型用户模型，以此支撑产品优化与服务精准推送(Cooper, 1999)。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这一分析思路被迁移至教育领域，逐步衍生出“学习者画像”的独立研究方向，成为学习分析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领域对画像的研究与应用经历了持续的内涵拓展过程。早在 1998 年，Alexander 等学者就将画像分析方法引入教育研究，提出学习者画像分析是刻画学习活动多维度特征的常用研究工具（Alexander et al., 1998）。这一阶段的学习者画像内涵相对狭窄，主要围绕学生的人口统计学属性与学业成绩展开，偏向静态的身份与结果描述。进入数字教育时代后，随着学习数据采集渠道的拓宽与分析技术的升级，画像的覆盖维度不断深化。Barthakur 等（2023）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后指出，成熟的学习者画像能够完整呈现学习者的理解水平、核心能力、技能储备与综合特质，其内涵早已超越早期的基础信息与成绩描述，可深入到学习动机、认知风格、学习偏好与元认知策略等深层学习特征。

国内学者也结合我国教育语境对其进行了本土化阐释，顾小清与舒杭（2016）较早从智慧教育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学习者画像的核心价值在于依托学习分析技术捕捉学生的学习行为轨迹，实现学情的数字化、可视化呈现。整体而言，学习者画像从商业方法衍生而来，逐步发展为融合学习科学、数据科学与教育实践的交叉研究方向，其核心价值始终指向学情的精准刻画与教学的个性化适配。于季鑫（2023）梳理了学界对学习者画像的共性认知：学习者画像是以学习过程数据为基础，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学习者特征数据，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能力水平、风格偏好进行抽象与标签化刻画，最终服务于教学决策与个性化学习的工具。

2.2 学习者画像的核心特征

学习者画像是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学习者画像的进阶形态。和传统依靠经验判断学情的方式相比，它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数据来源的多元融合性。传统学情研判多以终结性考试总分为核心依据，很难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与能力结构。而学习者画像整合了结构化与非结构化两类数据，既包含学业成绩、作业完成率等量化结果数据，也涵盖课堂参与、互动表现、学习习惯等过程性数据，能够从知识、能力、行为、态度等多个维度立体刻画学习者特征，打破了过去“唯分数论”的学情判断局限。

二是时间维度的动态发展性。学习者画像不是给学生贴上固定不变的身份标签，而是伴随学

习过程持续迭代的动态模型。它能够基于学生最新的学习表现实时更新特征标签，反映学生的学习进步、状态波动与发展潜力，突破了传统学情评价“一次评定、长期固定”的固化局限，让学情判断始终贴合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为教学的动态调整提供了可能。

三是应用导向的教学服务性。与商业领域以用户分类、产品推荐为目标的用户画像不同，教育场景下的学习者画像始终以服务教学为核心导向。它的价值评判标准不在于技术建模的复杂度，而在于能不能为一线教师提供可解读、可落地的学情依据，支撑精准教学决策的生成。尤其是面向基础教育的画像应用，更强调实操性与便捷性，避免因技术门槛过高而难以在一线教学中推广。

2.3 高中英语教学场景下的学习者画像定义

在高中英语常规课堂场景中，学习者画像并非追求复杂的算法建模，而是立足一线教学的实操需求，打造轻量化、可落地的学情研判工具。

具体而言，它以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育为导向，紧扣听、说、读、写核心语言能力发展要求，整合单元检测、课堂观察、作业反馈、智慧教学平台记录与学生自评等多源学情信息，以描述性标签的形式呈现学生的知识基础、能力长短板、学习行为特点与发展潜力。其核心定位是教师教学决策的辅助工具，而非对学生的优劣评判，最终目标是助力教师精准把握学情，优化教学设计，落实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相较于面向高等教育或在线教育的通用画像，高中英语场景下的学习者画像更强调指标的可采集性、操作的便捷性与结果的教学适用性，在尽可能完整刻画学情的前提下，控制教师的数据采集与处理负担，适配高中大班额教学的现实环境。

3.基于学习者画像的高中英语教学实践路径

结合高中英语常态教学的场景特点与一线教学的实操需求，依托学习者画像的高中英语教学可按照“课前学情诊断—课中精准施教—课后评价反馈—画像优化更新”的逻辑搭建完整实践路径，形成数据驱动的教学闭环。

3.1 课前学情诊断

精准的学情诊断是实施精准教学的第一步（廖文丹，2025），其核心是通过多源数据采集与分析，生成学生的学情画像，为教学设计提供依据。

围绕高中英语学科特点，构建“结果数据+过程数据+主观数据”三位一体的数据采集框架。结果数据主要来源于单元测验、模块考试的分项成绩，覆盖听力、阅读、写作、语言知识运用等核心题型，精准反映学生的知识掌握与能力水平；过程数据来源于智慧教学平台的作业完成记录、课堂互动数据，以及教师的课堂观察记录，涵盖作业完成质量、课堂参与度、互动频次等指标，呈现学生的学习行为特征；主观数据通过简易问卷与学生自评获取，包括学习兴趣、学习风格、自我效能感等内容，补充量化数据难以覆盖的情感态度维度。所有数据采集均嵌入日常教学流程，不额外增设独立的采集环节，控制教师的工作负担。

在数据整合的基础上，采用“等级标签+特征描述”的方式生成轻量化学情画像，避免复杂算法带来的落地门槛。参照学业水平与行为表现，将各维度指标划分为基础、发展、进阶三个等级，同时结合学生的长短板特征生成描述性标签，例如“阅读能力进阶、写作基础薄弱、课堂参与积极”。画像输出以学生个体为单位，形成简易的学情卡片，同时生成班级整体画像，呈现班级的共性问题与层级分布，为单元教学设计提供整体参照（王春华，2023）。

3.2 课中精准施教

课堂教学是学习者画像价值落地的核心环节，教师依托课前生成的学情画像，围绕教学目标设定、课堂活动设计、实时干预调整三个层面逐层推进，将画像中的学情特征转化为差异化的教学实践。

在教学目标上，以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为基准，结合学生画像呈现的层级差异，设置“基础达标—能力提升—拓展探究”三级递进的教学目标。基础层目标面向基础薄弱的学生，聚焦核心词汇、基础语法等内容的理解与识记，确保学生掌握单元最核心的知识要点；能力层目标面向中等水平的学生，侧重语言知识的综合运用与听说读写技能训练，推动学生语言能力稳步进阶；拓展层目标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突出高阶思维训练与文化意识渗透，侧重批判性阅读与创意表达能力的发展。三级目标并非彼此割裂的独立模块，而是形成逐层递进的梯度关系，学生在达成基础目标后，可自主向更高层级的目标发起挑战。

围绕梯度化的教学目标，教师匹配设计不同难度的课堂学习活动。课堂提问搭建起阶梯式问

题链，基础层问题以事实性信息的提取和判断为主，能力层问题侧重推理与分析，拓展层问题指向评价与创新，不同层级的学生可先从对应难度的问题入手，同时也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跨层级尝试挑战。小组活动采用“同层探究+异层互助”相结合的模式，同一水平的学生组成探究小组，完成难度匹配的学习任务，保证每位学生都能充分参与课堂；不同水平的学生组成互助小组，通过结对帮扶实现优势互补。以英语阅读课为例，基础层学生主要梳理文本信息、学习重点语言点，能力层学生侧重分析篇章结构、梳理写作思路，拓展层学生则围绕主题开展深度探究，形成自己的观点与表达。

在课堂推进过程中，教师还需结合现场观察到的学生表现，对照课前画像预判的学情特征，灵活调整教学节奏和干预方式针对不同特征的学习者匹配差异化教学策略：对投入低、完成差的学生侧重提醒督促与基础补漏；对勤奋但成效低的学生侧重学习方法指导；对基础好、效率高的学生侧重拓展提升（李瑞，2021）。如果发现全班对某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普遍低于预期，就及时补充讲解，增加针对性的巩固练习，避免教学进度脱离学生的实际学情。

3.3 课后评价反馈

课后环节依托画像数据开展多元评价与个性化辅导，巩固课堂学习效果，延伸教学的精准性。

打破单一分数评价的局限，构建“结果+过程+发展”的多元评价体系。结果评价以单元测验成绩为依据，反映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过程评价结合课堂参与、作业质量、学习态度等画像维度的过程数据，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投入与表现；发展评价则关注学生的阶段性进步幅度，对比不同周期的画像变化，肯定学生的成长与提升，弱化横向排名带来的焦虑，强化评价的激励功能。

结合画像呈现的学生短板与学习特点，开展个性化课后辅导与资源推送。对于知识基础薄弱的学生，推送基础知识点微课、巩固性练习等补救性资源，辅以个别答疑；对于单项技能薄弱的学生，推送专项技能训练材料，如写作框架指导、听力专项练习等；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推送拓展性阅读材料、文化背景补充等资源，满足其深度学习需求。资源推送既可以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实现智能匹配，也可以由教师根据画像特征手动推荐，兼顾精准性与灵活性。

3.4 画像优化更新

教学不是单次完成的活动，而是持续优化的过程，学习者画像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标签，而是伴随教学推进不断调整的动态模型。

教学中以完整的教学单元为周期，同步更新学生的学习者画像，调整教学策略，形成“画像研判—教学实施—效果反馈—画像更新”的完整闭环。每单元教学结束后，整合单元测验成绩、课堂表现记录、作业完成质量等最新数据，重新校准学生的画像标签与层级判定，对照单元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反思本单元教学设计的适配性与不足，总结经验，优化下一单元的教学方案。通过这种滚动更新的机制，画像始终贴合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教学也始终基于最新的学情动态调整，真正实现数据驱动的持续教学改进。

4. “三新”背景下学习者画像赋能高中英语教学的价值意义

在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同步推进的改革背景下，将学习者画像融入高中英语教学的各个环节，不只是引入了一项技术工具，更是对传统教学思路与育人方式的务实调整，能够从多个维度切实推动高中英语教学提质增效。

从教学范式转型的维度看，学习者画像推动高中英语教学从同质化的统一教学，转向差异化的精准教学，实现了教学思路的根本转变。过去受大班额教学现实与应试导向的双重影响，高中英语教学普遍沿用统一进度、统一内容、统一要求的模式，教师备课授课更多围绕课程大纲和班级平均水平展开，很难真正兼顾不同学生的学习基础与发展需求，因材施教往往停留在口号层面。学习者画像的出现，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可行的抓手：教师判断学情的依据从过往的经验化判断、碎片化印象，转向多维度数据支撑的系统研判，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把握从模糊的整体感知，细化为清晰的个体特征画像。这种转变从根源上夯实了分层分类教学的现实基础，推动高中英语教学真正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让教学活动始终围绕学生的真实学习需求展开。

从教学实践提质的维度看，学习者画像打通了教学全流程的精准衔接，切实提升了课堂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当前高中英语分层教学之所以容易浮于表面，核心问题在于教师缺乏系统、连续的学情支撑，往往仅凭单次考试成绩和零散的课堂印象判断学生水平，既难以全面覆盖听、说、读、写各项语言技能的发展情况，也无法动态捕捉学生的学习状态变化。学习者画像通过整

合课堂参与、作业完成、技能测评、学习习惯等多维度的过程性数据，能够清晰呈现每个学生的语言能力结构、知识薄弱环节与学习行为特点。教师可以依托这些信息，精准设定梯度化的教学目标，设计适配不同层级的课堂活动，实施及时的教学干预，课后还能针对性推送学习资源与辅导建议，形成“诊断—施教—反馈—优化”的完整教学闭环，有效化解大班额教学中“学优生吃不饱、学困生跟不上”的长期矛盾。

从学生素养培育的维度看，学习者画像践行了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助力学科核心素养真正落地到每个学生身上。“三新”改革的核心指向是立德树人，强调从知识传授转向素养培育，关注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过去评价学生基本以终结性考试分数为核心，学生的学习投入、努力程度、进步幅度很难得到充分体现，评价的激励功能被弱化。学习者画像打破了这种单一评价逻辑，将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努力程度、进步幅度等内容纳入评价视野，更侧重学生的发展性与成长性，而不是简单的横向排名比较。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教师能够精准定位知识缺口，循序渐进地搭建学习支架，帮助其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保护学习自信心；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能够设计拓展性学习任务，引导其向批判性阅读、跨文化表达等高阶能力发展。这种差异化的学习支持，既尊重了学生的发展差异，也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自身的最近发展区内获得最大成长，真正实现面向全体学生的素养培育。

5.结语

在“三新”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将学习者画像引入高中英语教学，是回应课程改革要求、破解大班额教学下因材施教难题的可行路径。本文从概念溯源、核心特征与学科定位三个层面厘清了学习者画像的核心内涵，结合高中英语教学的场景特点与一线教学的实操需求，构建了“课前学情诊断—课中精准施教—课后评价反馈—画像优化更新”的闭环式实践路径，并从教学范式转型、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素养培育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应用价值。

该框架依托数据开展学情分析，弥补教师经验判断的局限，推动个性化教学从理论走向课堂，为一线教师实施数据支撑下的精准教学提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是框架层面的初步探索，落地应用时仍要结合学校信息化条件、班级学情灵活调整。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技术始终是服务于育人的手段。无论学习者画像的技术如何发展，其作为教学辅助工具的定位不会改变。未来随着教育数字化的不断推进，学习者画像的精准度与适用性会持续提升，但其最终落脚点始终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核心素养提升。只有坚守以生为本的初心，合理运用画像工具，才能真正释放数据驱动教学的价值，推动高中英语教学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5 年修订）[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5.

[2]COOPER A. *The inmates are running the asylum: why high-tech products drive us crazy and how to restore the sanity*[M]. Indianapolis: Sams, 1999: 22.

[3]Alexander P, Murphy P. Profiling the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Knowledge, Interest, and Strategic Processing[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8, 90: 435-447.

[4]Barthakur A, Dawson S, Kovanović V. Advancing learner profiles with learning analytics: A scoping 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C].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Learning Analytics and Knowledge Conference (LAK23)*. Arlington, TX, USA, 2023: 606-612.

[5]顾小清，舒杭. 信息技术的作用发生了吗——用学习分析技术刻画学习行为印记[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6, (5): 10-19.

[6]于季鑫.基于过程性数据的学习者画像构建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23.

[7]廖文丹.基于学习者画像的高职大学英语课程精准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教育信息化论坛,2025,(7):64-66.

[8]王春华.基于学习者画像的精准教学干预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3(2):136-146.

[9]李瑞.大学英语在线学习者画像的行为标签体系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21.

微短剧镜头语言与共情机制研究——以《盛夏芬德拉》为例

杨博涵

（南昌科技职业大学，江西 南昌，330200）

摘 要：《盛夏芬德拉》播出后，观众反馈里出现得最多的是“看得进去”“不舍得快进”这类说法，讨论情节反转的反而不多。本文关心的是这种观看感受与镜头安排之间的关系。以 82 集全剧为观察对象，本文沿三条线索展开：视点与距离把观众固定在人物近旁；先给情绪、后交代事件的组接顺序，把观众放进人物的心理时间里；芬德拉玫瑰等物象的反复出现，把情感进程外化为不必依赖对白的视觉线索。三条线索合起来说明，这部剧的共情机制主要不在情节强度，而在镜头对位置、顺序与物象的安排。

关键词：微短剧；镜头语言；共情机制；情绪前置；物象锚点

DOI：doi.org/10.70693/202610055346

Cinematographic Language and Empathy Mechanisms in Micro-Dramas —A Case Study of Summer Vendela

Yang BoHan

Nancha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release of Summer Vendela, audience feedback is dominated by comments such as “I was fully absorbed”and“I hate to skip forward”, while discussions on plot twists are relatively scar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ch viewing experiences and cinematographic arrangements. Taking all 82 episodes of the drama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study proceeds along three threads: viewpoint and camera distance position the audience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characters; the editing sequence that prioritizes emotion before narrative events immerses the audience in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time; recurring visual motifs such as the Vendela rose externalize emotional progression as visual cues independent of dialogue. Combined, these three threads demonstrate that the empathy mechanism of this drama relies less on dramatic plot intensity, and more on cinematographic arrangements of perspective, sequence and visual motifs.

Keywords: Micro-drama;Cinematographic language;Empathy mechanism;Emotion-first narration;Visual motif anchor

引言

2025 年微短剧仍在扩张，“精品化”的话题也从题材、表演慢慢移到了形式上。《盛夏芬德拉》是这一年绕不开的作品，82 集，单集约 3 分钟，上线不久播放量就过了三十亿[1]。真正值得留意的是观众的反馈方式：弹幕和评论里反复出现的是“很容易看进去”“不舍得快进”“每一帧都能当壁纸”，很少有人去争论情节。微短剧的通行做法是拿强冲突抓人，人物设置也偏脸谱化，几秒钟就得给一个刺激点；《盛夏芬德拉》走的是另一条路，它不急着让人上头，节奏放慢，把力气花在人物心理的层层展开上。笔者在影视摄制的课上遇到过类似情形：学生谈起这部剧，先说的是“看得很舒服”，情节反倒是后话。这让人想到一个问题：观众记住的体验，未必都来自故事。

关于这部剧的既有讨论大致分四个方向：传播与产业层面，关注制作、分账和受众范围的扩大。配乐层面，有研究指出剧中的歌曲“并非简单的气氛烘托工具，而是演化为一套高度精密的情感传导系统”[2]。审美与符号层面，有研究把芬德拉玫瑰的“含苞—半放—盛放”读作男女主感情发展的隐喻[3]。技术与调度层面，有研究提

作者简介：杨博涵（1997—），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影像艺术。

到导演对演员走位的要求是“演员走位要按厘米计”[4]。四个角度的研究各有贡献，处理镜头的方式却比较一致：镜头被当作说明叙事或审美的例证。这些安排在什么意义上为观众的情感投入准备了条件，它与同类作品的区别究竟在哪，还缺少交代。

本文试图补充的正是这一环节，笔者的基本判断是，这部剧的共情机制未必来自情节的加码，它更像是三条线索配合的结果：视点与距离把观众安置在人物近旁，使其处在能看清面部与细微表情的位置上；情绪前置打乱信息的先后，让感受先于理解发生；物象的反复出现把不易言说的情感进程外化出来，不必靠台词解释也能被感知，情绪段落与交代段落在位置安排与信息顺序上就可看出明显差别。还原这部剧可观察的镜头安排，本剧的“共情”也就不再只是一个观感上的印象，而是一个可供分析的典型例证。

一、研究对象、概念界定与观察范围

（一）作品信息与案例的选择理由

《盛夏芬德拉》讲的是自由摄影师白清枚与集团负责人周晟安在商业联姻中慢慢建立信任的过程。白清枚因为母亲的婚姻经历，对亲密关系始终存有戒备，订婚后先立下“约法三章”；周晟安性子沉，很少说漂亮话，多数时候只是守在旁边。82 集、单集约 3 分钟、竖屏播出，属于短剧里常见的“先婚后爱”。不同的地方在其情节的推进方式，同类作品靠密集冲突往前赶，而这部剧则是把节奏压下来，用细节和物象一点点累积。本文选它作个案，不是因为播放成绩，而是因为它的镜头安排能拆出三条彼此独立的线索：位置层面的视点与距离，顺序层面的情绪前置，物象层面的反复呈现。三条线索同时出现在一部作品里，个案分析才站得住。

（二）三个核心概念的界定

有三个词需要先说明，它们分属作品一侧的三个层面。最上层的是共情机制，指作品用什么方式组织观众的情感投入，本文只讨论作品提供了什么，不推断观众一定会怎样反应。机制之下有两个侧面，一个是顺序，也就是情绪前置，指先给出人物的情绪结果、后交代事件起因的组接方式，判断依据是反应镜头与事件镜头在时间上的先后。另一个是标记，也就是物象锚点，指同一物象反复出现、形态逐渐变化，从而承担分段功能的镜头序列，判断依据是出现位置的分布、形态变化的次序，以及它与其他叙事单元的关系。共情机制回答作品做了什么，后两个概念回答它靠哪两种办法完成。

（三）观察范围

观察范围覆盖全剧前、中、后三个阶段，兼顾人物关系推进与日常交代两类段落，记录景别、机位、镜头运动、镜头时长、反应与事件的先后关系，以及物象出现的形态与位置。把形式要素拆成能逐项记录的项目，同类研究已有先例，有研究正是“将镜头节奏、色彩调性与分集结尾续看机制转化为可记录、可比较的指标”[5]，本文借用这一思路，把比较对象从不同作品挪到了同一部作品内部的不同功能段落。

二、视点与距离：把观众安置在人物近旁

（一）主观镜头与视线匹配

在观察的段落里，主观镜头出现在情绪段落里的次数明显多于交代段落。用法大致有两种，人物观察环境的一类，多出现在场景转换之后，镜头顺着视线在室内扫一圈，先把空间交代清楚，功能性强；人物注视对方的一类，多落在对话停顿和关系转折处，观众看到人物在看什么，也顺带看到他是带着什么心情在看。已有研究讨论竖屏视频时提到，这类影像多用第一人称视角，倾向于让人物的身体占据画面主体，给观看者一种仿佛置身现场的观看感[6]。

（二）面部优先的景别与停留

与视角配套的是景别和停留，情绪段落明显往近景与特写集中，全景、远景少了很多；镜头在人物脸上停留的时间，也常常超过交代信息所需的长度。多出来的这几秒不提供新信息，作用是让观众把表情读完。竖屏在这里既是条件也是限制。有研究指出，相较于横屏，“竖屏视频的横向空间非常狭窄”，多人关系和开阔空间不好表现，创作者只能在构图和运动上另想办法[7]。这部剧的办法是把重心收到面部与上半身，减少需要横向铺开的调度。屏幕小、画幅窄，人物的脸在视野里的权重反而更高。

（三）第一条线索与共情机制

视点和距离处理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观众站在哪里，以及离人物有多近。主观镜头和视线匹配把观众放进人物的视线通道，面部优先的景别与偏长的停留把这个位置压到近景。把它称作一

种共情机制，是因为它管的是情感投入的位置前提，人要对别人的处境有反应，总得先站到看得清、也愿意看下去的地方；镜头若一直停在事件远处，表情和迟疑都看不见，情感也就无处落脚。这部剧把“看什么”和“怎么看”交给人物：人物看什么，观众看什么；人物之间的距离收窄，观众与人物的距离也跟着收窄。位置定下来之后，观众与人物的关系就不再依赖情节交代，而是由镜头完成。此时观众手上的信息并不完整，人却已经站在人物旁边，这是后面两条线索的前提。

三、情绪前置：镜头对信息顺序的重组

（一）反应先于事件的组接顺序

第二条线索处理顺序，在人物关系起波澜的段落里，这部剧常先给反应、后给事件。观众先看到一张情绪已经变了的脸，随后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争论后的沉默、误会解除前的等待，都是这样处理的。祠堂抄经一段可以说明问题，白清枚口头上不肯承认心意，笔下却一遍遍写着周晟安的名字，周晟安随后默默留下手套，把经书盖住。整段没有告白式的台词，观众先接收到的是自相矛盾的行为，这份心意有多重，要到此后的相处里才慢慢称出来。退婚一段也一样，观众先看到她突然的抽离和冷淡，冷淡背后的家庭阴影，剧里是后来才交代的。相比之下，承担交代功能的段落仍然按“事件在前、反应在后”来走，两类的区别因此能看出来。

（二）情绪先行与心理时间的建立

顺序一换，观众的位置就变了。事件在前时，观众先拿到信息，再判断人物的反应是否合理；情绪在前时，观众先被情绪击中，再回头找原因，注意力从事件时间转向人物的心理时间。已有研究指出，镜头的运动和剪辑的连接会牵动观众的身体反应，不只是传递画面信息[8]；也有研究把观众的身体感受与情感反应放在一起讨论[9]。放到这部剧的具体安排里，可以说得更实一些：观众的反应与人物几乎同时发生，理解落在感受后面，共情发生在解释之前。

（三）与常规处理的差别

同类竖屏情感剧更常见的做法是先交代事件、再补上反应，这样处理省事，观众也能迅速掌握信息。这部剧把顺序倒过来，信息传递的效率损失了一些，换来情绪的提前进入。差别不在镜头多少，也不在运动幅度，两类作品的景别和运镜可以很接近，真正的区别是观众先处理什么、后处理什么。这也是本文认为它的镜头在承担叙事功能的理由：镜头不只是在呈现事件，它还在安排观众理解事件的次序。

四、物象锚点：三次空镜与情感进程的外化

（一）玫瑰的三次关键呈现

第三条线索由物象承担，芬德拉是白色玫瑰的一个品种，花语是“只对你一人钟情”，剧名就取在这里。玫瑰在剧中不是偶一出现的点缀，房间里、人物手边、日常场景里都能见到；真正值得分析的不是它出现了多少次，而是其中三次关键呈现构成的递进：含苞、半开、盛放。前文提到的研究注意到，这枝玫瑰“从含苞待放、半绽初开至完全盛放”，与两人从初识到彼此托付的情感轨迹相对应。就笔者的观察，三次呈现分别落在情感进程的起始、中段与收束处，位置本身就带着结构意义，它们把 82 集切成了三个情感段落。

（二）花形递进与画面处理的变化

三次呈现的差别不只在花形，花苞起初被放在阴暗角落的花瓶里，白清枚借此把自己裹起来；她提出退婚、试探对方真心时，白玫瑰半开微露，第一片花瓣落下；结局处玫瑰全开，与人物完成自我接纳相互呼应。画面处理也在同一条线上推进，三次空镜的明暗与冷暖并不相同，整体由暗到明，环境信息随花形变化逐步减少，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花朵本身。花形、光线与画面内容同步推进，绝不是随手摆的道具，而是导演反复做过的设计。

（三）物象序列如何构成共情机制

承担类似职能的物象不止玫瑰，在宴会一段里，白清枚穿高跟鞋不适，周晟安让侍者取来拖鞋，蹲下替她换上。高跟鞋换成拖鞋，既是周晟安体贴的落地，也标记了白清枚从维持戒备到放松下来。被咬过的苹果出现在两人关系出现裂隙的段落，果实上那道没吃完的缺口，与两人暂别的处境形成呼应。这些物象有个共同点，它们不解释自己，只出现在画面里，把情绪留在物上。

它们在这部剧里至少做了三件事，三次玫瑰呈现把全剧划出三个情感段落，观众即便跳过部分情节，也能凭花形判断情感走到了哪一步。花形变化又总在情节转折之前出现，算是先于台词的提示。更要紧的一层是留白，物象把情绪物化

之后并不把话说尽，剩下的空白要观众自己填，参与感从这里长出来。这条线索不需要人物解释，也不需要旁白，单靠物象自身的变化就能读懂，它提供的是一条不依赖语言的情感通道。

五、共情机制的结构性与复制难度

（一）可复制的外观

同类竖屏短剧的通行做法是用强冲突和高频反转推进，人物设置也偏脸谱化，男主角多是强势的霸总，女主角多是被动承受的一方。这样处理见效快，几十秒就能把人带进情境，代价是人物内心很少真正展开。这部剧走红之后，市面上出现了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品，节奏放慢，空镜变多，画面压低饱和度，特写比例也提了上来，同一类场景里的构图和光效还常常重复。这些外观层面的东西很容易被认出来，也很容易搬走：慢节奏可以靠拉长对话和空镜来完成，色调交给后期，特写比例在分镜阶段就能定下来。关键在于，它们不需要动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可以像贴纸一样附加到作品上。观众往往几分钟就能看出某部剧在模仿这种风格，却说不出它到底缺了什么。

（二）难以复制的组织方式

真正难搬的是三条线索背后的组织方式，玫瑰出现的位置要落在情感进程的关键处，三次之间的疏密还要和全剧结构相称，空镜随意插进去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面部优先的景别体系、先情绪后事件的组接顺序，需要在几十集里稳定保持，哪一处松了，观众立刻能觉出断裂。位置、顺序、物象这三条线索还互相支撑，抽掉一条，另外两条的效果都会打折。这些属于组织能力，不是设备条件，制作水准相当也未必做得到。这类共情机制结构性强、复制门槛高，而不是绝对不可复制。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这套镜头安排不是独立的形式趣味，它跟人物设定、叙事节奏是配套的。人物本身克制，镜头也跟着克制。这里说的克制，不是不用近景或特写，而是镜头不替观众下结论：它给出表情和物象，很少用台词或旁白把情绪说透。正因为彼此配套，单拿其中任何一项去模仿，得到的多半只是形式上的相似。

结语

本文以《盛夏芬德拉》为个案，讨论镜头语言与共情机制的关系。就笔者的观察，这部剧的共情机制由三条线索配合完成：视点与距离把观众安置在人物近旁，让人始终处在能看清面部与细微表情的位置上；情绪前置调整信息的先后，使观众先被情绪击中，再回头寻找原因；物象序列把情感进程外化出来，不必借助台词也能被读懂。三条线索合起来，观众在整个观看过程中都留在人物身边，也留在人物的心理时间里。这部剧留给观众的因此不是某一个情节，而是一种感受：爱情像一朵需要耐心浇灌的花，有人肯慢慢守候，它才最终开放。

这部剧的经验也说明，慢不等于弱，节奏放下来之后，关键是能不能用别的方式接住观众的注意力。物象序列可以承担分段的功能，用形态变化标记情感进程的推进，成本低于增加情节冲突；情绪先行的组接顺序同样不额外花钱，却能改变观众接收信息的次序，让共情发生在理解之前。两者的前提都是克制，镜头不替观众下结论，把解释的余地留给观众。对同类创作来说，这也许比“电影质感”更值得借鉴，质感可以调出来，位置、顺序与物象的组织却要在整部作品的尺度上安排。

参考文献：

[1] 姜少东. 短剧《盛夏芬德拉》现象级传播逻辑与影视行业革新启示研究[J]. 新世纪剧坛, 2025(6): 44-47.

[2] 林晓颖. “BGM 一响，就知道要上头”：流行歌曲在短剧中的情绪启动、共振与扩散机制研究——以《盛夏芬德拉》为例[J]. 新媒体研究, 2025(24): 95-99.

[3] 于鑫. 叙事革新·审美升级·情感治愈：微短剧《盛夏芬德拉》的破圈密码[J]. 声屏世界, 2026(1): 74-76.

[4] 吴岸杨. 微短剧精品化的创新范式与启示——以《盛夏芬德拉》为例[J]. 影视制作, 2026(3): 101-105.

[5] 张景棋, 苑雨萌. 短视频平台红色微短剧的视听形式特征——基于镜头节奏、色彩与续看机制的计量分析[J]. 新媒体研究, 2026(6): 118-124.

[6] 杨静, 甘凌博. 竖屏视频的叙事策略研究[J]. 当代电视, 2021(4): 83-86.

[7] 庞诗雨. 竖屏视频中应对画面横向空间狭窄方法研究[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16): 3-5.

[8] 陈巍, 刘童玮. 大脑即银幕：镜像神经元与神经电影学的具身模拟革命[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3(7): 26-35.

[9] 邬宏玺.《燃冬》：致郁或治愈？——具身模拟、触感经验与影像疗愈[J]. 电影文学, 2023(23): 163-167.

弦歌不辍：中国文学中“琴”意象的美学内涵与文化嬗变

周辰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漫漫长河中，“琴”早已超越了单纯作为乐器的物理属性乐器，发展成为承载文人情志、社会伦理乃至哲学思辨的重要文学意象，形成了“以琴入文、以文释琴”的文化传统，文学中的“琴”意象内涵的生成与演变始终与其背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以及文人的精神追求息息相关。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从文化符号角度探讨琴意象的文学意涵的形成对于梳理其美学内涵与文化嬗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琴意象；文学书写；美学内涵；文化嬗变

DOI：doi.org/10.70693/202610108155

Continuous strings and songs: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Qin' imagery in Chinese literature

Zhou Chen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 Nanning Guangxi, 53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qin" has long surpassed its mere physical attribute as a musical instrument, evolving into an important literary symbol that embodies the sentiments of literati, social ethics, and eve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This has led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entering literature through the qin and interpreting the qin through literatur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qin" imagery in literature have always been closely linked to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spiritual pursuits of scholars. Reviewing existing research and exploring the lite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qin image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ymbol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its aesthetic connot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Keywords: Qin Imagery; Literary Writing; Aesthetic Connotation; Cultural Evolution

“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历经数千年发展，已超越单纯的音乐器具范畴，拓展出无数代表中华文化的人文性符号意义。从神话传说对琴意象进行溯源，流传较广的说法主要有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造琴五种，各有史料或传说可依。从神话的角度来看，“琴弦”意象更多是作为政治工具进行教化和治理，后世在“琴弦”意象的使用过程中，更多通过音乐的形式，用来作为情感的载体。“琴”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意象载体，随着文体的发展而产生了诸多新的审美意涵。

一、琴诗：审美观念与生命体验的双重书写

自先秦开始，古琴作为主要审美形态与文学进行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形态：“琴诗”至唐宋达到鼎盛，成为文人表达审美理想和生命感悟的重要载体。

白居易入仕之初秉持儒家传统诗乐观，主张“序人伦，安国家，莫先于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将琴乐与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紧密关联起来，视琴乐为反映时政、教化人心的工具，通过对古琴艺术表现力的细腻描摹，批判“郑卫之声”对雅乐的冲击，呼吁恢复“正始之音”的文化传统。元和十年之后，白居易历经江州之贬，

作者简介：周辰（2000—），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心态发生重大转变，在《与元九书》中提出“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诗乐观也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白居易的琴诗构建了丰富的“琴境”，将抚琴、听琴的艺术感受与自然之景、人生之思相结合，形成“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的审美境界。巧妙地将琴音的清泠、淡雅与自然中的月、松、泉等意象相融合，琴境既是听觉的艺术，也从视觉角度进行特定的呈现与精神的体悟，创造“以琴悟道”的审美追求。

晚明文人张岱的古琴书写以甲申之变为界，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其诗文中近四十首琴诗、二十余篇琴文，既记录了明清之际古琴文化的变迁，也映照出他从风流雅士到持节隐士再到澹宕逸士的身份转寰。丁淑梅、林煜欣在《断纹之趣、断弦之思与残琴之响——张岱诗文中的古琴书写》中指出，张岱的古琴书写经历了“断纹之趣”“断弦之思”“残琴之响”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蕴含着独特的精神意涵。琴成为寄托亡国之痛、身世之悲的象征。在《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中的新出琴诗中，张岱通过对残琴、断弦的描写，抒发了易代世变后的黍离之悲与生命自醒，此时的琴意象，成为他坎坷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与精神寄托。

甲申之变前，张岱出身钟鼎之家，深受家族文化熏陶，古琴成为他抒发闲情逸致、以琴会友的雅器。他藏有断纹老琴，视之为“老友”，在《二十八友铭·断纹古琴铭》中写道：“陶庵收藏。断纹之妙，稜稜如剑锋，毫发不毬。吾与尔言，尔亦予诺”，字里行间洋溢着藏琴、赏琴的雅趣。这一时期，他还创立丝社，与琴友定期雅集，“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约有常期，宁虚芳日”，在琴音交流中振兴越中琴坛，传承琴道文化。他提出“生鲜之气”的琴学新论，反对按谱死弹，强调演奏者应将情感、品格融入琴曲，通过“纯熟”“淘洗”“脱化”三个阶段，达到“非指非弦，非勾非剔”的灵动境界，体现了晚明文人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

甲申之变后，国破家亡，张岱从富贵纨绔沦为“瓶粟屡罄，不能举火”的明的遗民，古琴书写也直观地从“断纹之趣”转向寄托着故国黍离之悲和亲友俱亡之痛的“断弦之思”。他在《听太常弹琴和诗十首》中，通过杨太常弹奏的御赐古琴，遥思先帝与故国，“胸中有猿咽，指下泣秋旻”，通过琴音抒发亡国之痛的载体。好友资深去世后，他写下《琴亡十章》，将自己与资深比作伯牙与子期，“子期死，余不复琴矣”，以琴为媒介，悼念逝去的知音与故国。此时古琴不再是闲情雅趣的点缀，而是作为“四壁无所有，凄然张断琴”的精神寄托，断弦、残琴，同样象征着他残破却不屈的精神世界。

晚年的张岱心境逐渐步入平和，回归故乡龙山快园，古琴书写也进入呈现出澹宕逸士的超然情怀的“残琴之响”阶段。他在《山居弹琴》中写道：“众山何处响，看画复弹琴。白燕梨花雨，黄鹂柳树阴”，将琴音与自然之景相融，彰显着怡然自乐的心境。此时的古琴成为了“琴书曾有约，木石自相亲”的精神伴侣，见证着他从悲愤到超然的生命超越。张岱的古琴书写，以个人命运的起伏为线索，将古琴与时代变迁与文人精神转寰紧密结合，使琴诗成为易代之际文人心灵史的生动记录。

二、琴赋：从体物描摹到说理言志的范式转型

汉魏六朝是琴赋的发轫期，其叙写围绕琴材、制琴、琴音展开，形成了“铺采摛文”的体物传统。汉魏六朝对“琴材”的描摹尤为细致，往往通过强调琴材生长环境的险峻神丽，以此凸显古琴的不凡品质。傅毅《琴赋》云：“历嵩岑而将降，睹鸿梧于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对修条以特处”，将琴材梧桐置于“幽阻”的嵩岑之中，赋予其高洁、孤绝的品性。嵇康《琴赋》更是将琴材的生长环境推向极致，“惟椅梧之所生兮……吸日月之休光”，通过天地、日月、峻岳等宏大意象，烘托梧桐吸纳天地灵气的神丽特质。对琴材的铺陈描写，体现了汉赋“苞括宇宙”的审美追求，暗示了古琴与自然和天道的内在关联，赋予古琴超越器物本身的文化意义。汉魏《琴赋》构建了“物性之美—器具之美—琴乐之美”的多重审美结构，将梧桐树的自然之美、古琴的工艺之美与琴音的艺术之美进行统合，形成“雅而悲苦”的独特审美风格。曹魏嵇康的《琴赋》是汉魏六朝琴赋的巅峰之作，宋展云在《“琴德”与“文心”——论嵇康《琴赋》之袭故弥新及其余韵流风》中指出，嵇康《琴赋》的“袭故”在于遵循汉魏琴赋“铺陈琴材、制琴、琴音”的体物范式，“弥新”则在于其对琴乐美学内涵的深度挖掘与哲学提升。嵇康《琴赋》的“体物”之精，体现在对古琴艺术各个方面的全面描摹。他将琴音分为“高妙”“清和”“淡雅”“悲切”等多种风格，通过“翩绵飘邈，微音迅逝”“清泠婉转，繁弦绮错”等生动表述，展现了琴音的丰富

层次与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更为重要的是，嵇康《琴赋》融入了对琴乐本质的哲学思考。在《琴赋序》中批判汉魏琴赋“体制风流，莫不相袭”，注重“危苦之材”“悲哀之声”“垂涕之美”，而未能触及琴乐的本质。他认为琴乐的核心价值在于“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能够帮助人涵养身心、超越困境，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这种对琴乐审美功用的定位，将古琴从礼乐之器提升到“修身之具”“悟道之媒”的高度，这也体现了魏晋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背景。并强调古琴“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休光”的自然之德，“清泠雅丽，含蕴幽远”的音声之德，以及“禁邪止淫，正人心”的教化之德，将“琴德”与“人德”相联系，视琴乐为文人品格修养的外在体现。这种“琴德”思想对后世琴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历代文人爱琴、赏琴、弹琴的核心价值追求，也为琴赋的“言志”转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唐代是琴赋的新变期，较之于汉魏六朝，唐代琴赋在吟咏对象、创作主旨、赋体形式上均发生重大突破，从“体物”转向“言志”，成为唐代文学与古琴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马君毅在《从状物写声到说理言志——论唐代琴赋的新变及其原因》中指出，唐代琴赋的新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吟咏对象从单一琴器转向多元，创作主旨从体物铺陈转向借物言志，赋体从骈散结合转向格律化。琴赋的吟咏对象不再局限于古琴本身，而拓展到了琴史逸事等相关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以琴史逸事为吟咏对象的“琴事赋”成为主流，占唐代琴赋相当比例，王太真《钟期听琴赋》、薛胜《孔子弹文王操赋》、王起《焦桐入听赋》等著名琴赋，均以著名琴史典故为核心展开。这些作品不再专注于琴器的客观描摹，而是借典故抒发情志，《焦桐入听赋》借蔡邕“焦尾琴”的典故，表达“善察多识者对于怀才不遇者的重要性”，呼吁统治者识才、荐才。此外，仲子陵《五色琴弦赋》以琴弦为吟咏对象，将五色琴弦与人伦五常相联系，强调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谢观《琴瑟合奏赋》描写琴瑟合奏的场景，流露崇雅黜俗的音乐观，这些作品均突破了汉魏六朝琴赋的体物传统，赋予琴赋更丰富的思想内涵。

创作主旨的“言志”转向是唐代琴赋最核心的新变。如果说汉魏六朝琴赋的核心是“客观描摹古琴之美”，唐代琴赋则以“借琴抒发己志”为核心，形成了多种言志类型。一是崇道尚德的修心之志，张随《无弦琴赋》强调“心和即乐畅，性静则音全”，将琴乐的本质归于演奏者的心性修养；二是绝世高蹈的守节之志，吴融《戴逵破琴赋》、黄滔《戴安道碎琴赋》借戴逵破琴拒为王门伶人的典故，表达不媚权贵、坚守气节的品格；三是兼济天下的家国之志，蒋防《舜琴歌南风赋》借虞舜弹五弦琴而天下治的传说，歌颂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寄托家国情怀。这种“借题发挥、寓意遥深”的创作主旨，使唐代琴赋摆脱了汉魏六朝琴赋的僵化程式，成为文人表达政治理想、道德追求与人生态度的重要载体。

唐代琴赋的新变也与科举试赋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中唐以后，科举试赋成为常制，律赋成为考试的重要科目，“试赋对中举与否起绝对的决定作用”，这一制度催生了大量律赋创作，也影响了琴赋的文体形式与创作主旨。唐代琴赋中除王太真《钟期听琴赋》为骈赋外，其余均为律赋，严格遵循字数、押韵等格律要求，《孔子弹文王操赋》以“审音知人前后一揆”为韵，体现了科举试赋对文体形式的规范。同时，科举试赋强调“立意深远，有所兴寄”，要求作品做到“文以载道”，这与唐代琴赋“借琴言志”的创作主旨相契合。此外，古琴在中国文化中“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崇高地位，也为琴赋的言志转向提供了文化基础，使其能够承载文人的道德追求与政治理想。

三、小说中的古琴：意象功能与文化空间建构

随着中国文学体裁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小说等俗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古琴不仅是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重要道具，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参与构建小说的审美意境与性别空间，成为小说与古琴文化互渗共生的重要体现。

明清小说中，古琴被赋予“听音知事”的神秘功能，成为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楚爱华、刘冬蕊在《明清小说中古琴“听音知事”情结的文化溯源》中指出，这种“听音知事”情结源于古琴的神秘文化与“乐教”传统，在小说中呈现出“预测吉凶”“审音知政”“传递隐情”等多种表现形态。

“听音知事”在小说中最经典的运用，莫过于《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武侯弹琴退仲达”的“空城计”情节。司马懿通过琴音判断诸葛亮的内心状态，从“琴声不乱”中听出其“胸有成竹”，最终决定退兵。这里的古琴从单纯具有物理属性的乐器，转变成传递信息，用于心理博弈

的工具。听琴音的“平和”与“不乱”，能作为判断诸葛亮智慧与胆识的外在体现。楚爱华认为，司马懿的退兵并非“幼稚”行径，而是通过琴音读懂了诸葛亮的“隐情”——“一旦我诸葛亮不在了，你还有活路吗？”从而实现了情节的陡转与人物形象的深化。

除了上述提到的军事博弈，“听音知事”还常与“审音知政”相结合，成为小说中表达政治理想的手段。《东周列国志》中，乐师扈子为楚昭王弹琴，“恐昭王安今之乐，忘昔之苦，复蹈平王故辙”，通过琴音警醒君王勤于政事，最终促成楚国复兴；齐威王接受邹忌的古琴劝诫，“节酒远色、亲忠疏佞”，实现齐国繁荣。相反，赵武灵王沉溺美人鼓琴，不听规劝，最终落得饿死的悲剧下场。这些情节均继承了“声音之道与政通也”的传统乐教思想，将琴音的“清和”与“淫靡”与政治的“清明”与“昏乱”相联系，赋予古琴干预政治、教化君王的文化功能。

明清小说中“听音知事”情结的盛行，与当时琴学的繁荣密切相关。明清时期，浙操徐门、虞山派、广陵派等琴派活跃，琴人辈出，琴学理论著作丰富，徐上瀛《溪山琴况》、冷谦《琴声十六法》对琴音的审美标准、演奏技法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些琴学成果为小说中的琴音描写提供了相当深厚的文化基础，使“听音知事”的情节既富有神秘色彩，又符合琴学的审美逻辑。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加入“听音知事”的情节，将高雅的琴文化通俗化并普及给大众，大大促进了琴文化的传播与接受。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古琴的书写独具特色，通过“琴”这一符号构建了独特的性别空间，而其图像作品《聊斋图说》《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则进一步将这种性别空间视觉化，形成了文学与图像的跨媒介互动。裴亚莉、王拓在《琴/色：《聊斋志异》及其图像作品中的性别空间》中指出，《聊斋志异》中的古琴书写存在“男性空间中的‘琴——书房’图式和女性空间中的‘琴——闺阁’图式”。在男性叙事空间中，“琴”是文人雅趣与精神追求的象征。《聊斋志异》中的男性文人在书房中抚琴，琴与书卷、笔墨、香炉等器物相伴，构成了“左琴右书”的君子生活场景。《宦娘》中的温如春，“少孤，为人拘谨，不好游宴”，唯有深夜抚琴为乐，古琴成为他抒发孤高情怀、寻求精神慰藉的工具。书房中的古琴不仅能体现了文人的高雅品位，还能成为他们与女鬼、狐女等异类沟通的媒介。温如春的琴声吸引了鬼女宦娘，两人通过琴音相知相恋，最终在宦娘的帮助下成就姻缘。这里的古琴打破了人鬼殊途的界限，架起了一座情感沟通的桥梁，这也是琴文化视域下对知音的浪漫化书写。而在女性叙事空间中，“琴”往往作为女性才情与情感寄托的载体。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角色多善抚琴，琴音成为她们表达情感乃至反抗礼教的手段。细侯“善抚琴，雅丽无双”，她通过琴音传递对爱情的向往，与爱人私奔，最终冲破礼教束缚。

四、叙事之韵：琴意象的文学功能内涵

琴意象常常承担着重要的情节建构功能，成为推动故事发展、深化主题思想的关键元素。不管是传记记录还是小说虚构，嵇康的名士形象、鬼魂形象与神仙形象均与琴密切相关，琴成为塑造其高洁品格与悲剧命运的重要符号。郭伟的研究表明，“西厢”故事的演变过程中，琴意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转捩作用。从《莺莺传》到《董西厢》，再到《王西厢》，琴的分布与相如文君事的隐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莺莺传》中，张生以琴心挑动莺莺的情节虽已出现，但尚未成为故事的核心；到了《董西厢》，相如文君事被大量移入，与崔张本事相结合，形成了复合本事的结构，这一变化促成了“西厢”故事从悲剧到喜剧的转变；而《王西厢》则相对弱化了相如文君事，强化了崔张本事，使得张生以琴传情成为爱情故事的内核。

明清小说中，琴意象被赋予了丰富的隐喻与象征意义。楚爱华与刘冬蕊指出，明清时期，古琴的“听音知事”情结与古琴的神秘文化密切相关，而审音知政则源于古琴的“乐教”文化传统。在《红楼梦》中，林黛玉抚琴的情节便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黛玉所弹的琴曲《猗兰操》《思贤操》及自度曲“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既契合了她多愁善感的性格特质，又暗示了她与宝玉之间爱情的悲剧结局。而她弹琴时“断弦”的细节，更是对其命运的隐喻，为故事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此外，小说中不同人物对琴的态度与喜好，也折射出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与人生追求，《红楼梦》宝玉对琴的喜爱体现了他反对世俗礼教、追求精神自由的性格，而贾政对琴的漠视则反映了他僵化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心态。

随着文学与艺术的不断发展，琴意象的书写逐渐突破了单一文本的界限，在跨媒介语境中得

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丰富。裴亚莉与王拓的研究发现，《聊斋志异》及其图像作品中的琴书写，构建了独特的性别空间，存在着男性空间中的“琴-书房”图式和女性空间中的“琴-闺阁”图式。在小说文本中，琴常常成为连接人与鬼、人与狐的媒介，《宦娘》中，女鬼宦娘通过琴音与书生温如春相知相恋，琴不仅是他们情感交流的工具，更是跨越阴阳两界的桥梁。而在《聊斋图说》和《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等图像文本中，画家通过对琴与人物、环境的构图设计，进一步强化了琴意象的性别空间特征，如闺阁中的琴多与花卉、屏风相伴，营造出柔美、幽静的女性氛围；而书房中的琴则多与书籍、笔墨搭配，彰显出儒雅、高洁的男性气质。这种跨媒介的书写方式，不仅丰富了琴意象的表现形式，更拓展了其文化内涵与审美边界。

结语

古琴与中国文学的互渗共生，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与连贯性的生动体现。古琴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与意象，文学为古琴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二者共同塑造了中国文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与审美追求。从文化符号视角对“琴”意象的审美意涵进行历时性梳理，能对现代新的文学意象的产生有更客观的把握，从“琴”意象的文化嬗变也可窥见当代优良文学意象未来的发展路径和审美潜能。

参考文献：

[1] 礼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9:123.

[2] 琴操 [M]. 北京：中华书局，1990:7.

[3] 傅毅.琴赋 [M]. 全后汉文：卷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58:462.

[4] 朱长文.琴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3.

[5] 白居易.新乐府・五弦弹 [M]. 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37.

[6] 白居易.新乐府・五弦弹 [M]. 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37.

[7] 白居易.与元九书 [M]. 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96.

[8] 白居易.船夜援琴 [M]. 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58.

[9] 白居易.晨兴 [M]. 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63.

[10] 白居易.晚坐 [M]. 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72.

[11] 白居易.听弹《秋思》[M]. 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85.

[12] 白居易.清夜琴兴 [M]. 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191.

[13] 苏轼.听杭僧惟贤琴 [M]. 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234.

[14] 韩愈.听颖师弹琴 [M]. 韩昌黎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45.

[15] 蒋文勋.琴学粹言 [M]. 北京：中国书店，1983:17.

[16] 吴文治.韩愈研究资料：第一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0.

[17] 韩愈.听颖师弹琴 [M]. 韩昌黎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45.

[18] 许顗.彦周诗话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32.

[19] 张岱.二十八友铭 ·断纹古琴铭 [M]. 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57.

[20] 张岱.丝社小启 [M]. 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63.

[21] 丁淑梅，林煜欣.断纹之趣、断弦之思与残琴之响 —— 张岱诗文中的古琴书写 [J]. 中华文化论坛，2023,(04):174-186+192.

[22] 张岱.听太常弹琴和诗十首 [M]. 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78.

[23] 张岱.琴亡十章 [M]. 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85.

[24] 张岱.自为墓志铭 [M]. 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92.

[25] 张岱.山居弹琴 [M]. 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101.

[26] 张岱.快园道古 [M]. 沈复燦钞本琅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113.

[27] 丁淑梅，林煜欣.断纹之趣、断弦之思与残琴之响 —— 张岱诗文中的古琴书写 [J]. 中华文化论坛，2023,(04):174-186+192.

[28] 王娜.汉赋中的 "琴" 意象 [J]. 河北学刊，2014,34 (06):224-227.

[29] 嵇康.琴赋 [M]. 嵇康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 马君毅.从状物写声到说理言志 —— 论唐代琴赋的新变及其原因 [J]. 中国文化研究，2019,(04):110-120.

[31] 刘朝谦，张丹.汉魏《琴赋》美学意识结构探析 [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63 (02):66-72+154.

[32] 宋展云."琴德" 与 "文心"—— 论嵇康《琴赋》之袭故弥新及其余韵流风 [J]. 文艺理论研究，2017,37 (06):50-58.

[33] 刘朝谦，张丹.汉魏《琴赋》美学意识结构探析 [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63 (02):66-72+154.

[34] 楚爱华，刘冬蕊.明清小说中古琴 "听音知事" 情结的文化溯源 [J]. 明清小说研究，2021,(03):22-32.

[35] 东周列国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55:347.

[36] 裴亚莉，王拓.琴 / 色:《聊斋志异》及其图像作品中的性别空间 [J]. 艺术百家，2022,38 (01):11-23+100.

[37] 郭伟.琴与本事迁移:"西厢" 故事悲喜剧的转捩点 [J]. 戏剧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3,(06):141-155.

文化与制度之间：钱穆《政学私言》中的五权宪制构想

刘展[1]

(1.同济大学，上海 杨浦区 200092)

摘 要：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国家政体理论的设计，是重要的建国纲领，钱穆在《政学私言》中则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五权宪法的五权宪制方案，试图在现代政治制度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架设桥梁。本文以钱穆与孙中山的五权宪制为中心对象，探讨两者在制度构想、文化取向与政治哲学上的差异。孙中山强调制度效率与民族治理，而钱穆更关注文化正当性与文明延续，以回应现代制度与传统道统之间的张力。同时钱穆五权宪制体现了中国式宪政思维的文化自觉，为儒家宪制的现代转化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对当前中国法治与宪制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钱穆；《政学私言》；五权宪制；孙中山；政治思想

DOI：doi.org/10.70693/202610116648

Between Culture and Institution:

The concept of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Qian Mu's "Private Remarks on Politics and Academia"

Liu Zhan[1]

1.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China

Abstract: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 was Sun Yat-sen's design of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political system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was an important program for nation-building. Qian Mu proposed a five-power constitutional system plan different from Sun Yat-sen's Five-Power Constitution in his "Private Remarks on Politics and Academia", attempting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modern political system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Qian Mu and Sun Yat-sen as the central object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conception,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Sun Yat-sen emphasized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while Qian Mu was more concerned with cultural legitimacy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civiliz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tension between modern institutions and traditional moral tra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Qian and Mu embodies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style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providing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having signific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China.

Keywords: Qian Mu;"Private Remarks on Politics and Academia";Five-power constitutional system;Sun Yat-sen;Political thought

作者简介：刘展（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通讯作者：刘展

一、引言

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绝不能脱离整个社会而孤立存在。钱穆在《政学私言》中写到民主政治是今日中国唯一所需要的，这一点不必多加争论，民主政治既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尽管现代宪政起源于西方，然“任何一国之政治，必与其国家自己传统文化民族哲学相诉合，始可达于深根宁极长治久安之境地。”[1]民主原型并不等同于民主标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标准和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应发展各自独特的民主实践和制度安排，一种民主模式的好坏根本不在于其具体形式与架构，而在于同本国的历史条件、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的契合度。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舶来的西方宪政制度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呢？孙中山认为需要开掘中国的传统文化，借鉴传统政治制度。为此孙中山结合中西文化的精粹，独创性地设计了一部 “中西合璧”的五权宪法，然而问题在于孙中山忽略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原本各自有着不同的存在领域，自甲午战争后为救亡图存，中国人被迫学习西方文化，西方宪政文化开始渐渐舶来中国，从此在中国宪政领域内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结果是西方宪法分权的权力结构，被中国传统文化重构成一元化的集权结构。

在 20 世纪中国政制思想的谱系中，钱穆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与对传统政治智慧的独特理解，提出了一套不同于西式宪政范式的政治制度设想。《政学私言》一书中，他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五权宪制”的构想，试图在现代政治制度与中华传统文明之间架设一座沟通的桥梁。相较于孙中山早期提出的五权宪法制度，钱穆的“五权宪制”不仅在权力分配的内容上有所不同，更在制度逻辑、政治价值与文明定位上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宪政思想。自清末以降中国政制现代化的进程始终面临制度移植与文化断裂的张力问题，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成文宪法等制度形式，在民国初年曾被寄予厚望，但是其不仅成效有限，反而引发诸多政治混乱与合法性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孙中山试图以五权宪法架构一种既符合现代国家治理逻辑、又部分融入中国传统的政体方案。然而钱穆对这套设计持有保留，认为其对中国文化精神缺乏足够承接，制度设计虽有创见，终仍陷于工具理性框架，未能真正回应中华文明的根本秩序。

那么钱穆为何在已有五权宪法框架下重新提出“五权宪制”？二者本质有何异同？又反映了各自什么样的政治哲学立场？本文将以《政学私言》与孙中山五权宪法相关内容为主要文本依据，聚焦钱穆“五权宪制”方案的制度结构、思想来源与政治关怀，重点与孙中山五权宪法进行系统比较，以揭示两者之间在权力分配理念、制度目标和文化立场上的异同。通过这一比较不仅可以更全面地认识钱穆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也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中国宪制构建应如何处理制度现代性与文化连续性之间的张力。文章将首先简要分析钱穆的政治思想背景与《政学私言》的写作语境，然后展开对其五权宪制的结构性分析，并以孙中山五权宪法为参照，深入比较两者的异同及其背后的思想基础，最后对钱穆宪制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启示进行反思性评估。

二、《政学私言》的历史语境与宪制立场

钱穆的《政学私言》写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成书于抗日战争末期，是其晚年集中思考中国政治制度走向、文化命运与政道构建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在这部文集中钱穆不再以历史叙述为主而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直接面对现实政治问题，试图回答中国应建立何种政制，以实现既合乎现代要求又不失文化主体性的政治秩序。这种关切深植于钱穆一贯的历史哲学立场，即政治制度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基本结构而孤立运行，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有其文化的正当性。

（一）历史文化意识中的政治思考

钱穆一生以治史著称，其政治思考也多从历史脉络出发。他不认为制度可以凭空建立，也反对照搬西方经验，主张政制不离文化，文化即其根本。“中国所要者，乃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重在精神，不重在格式。”[2]“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3]正是在这种观念基础上，他强调中国传统政治不仅是一套治理手段，更是一种根植于中华文明中的礼治秩序。在他看来中国政治传统之所以绵延不绝，靠的不只是制度运行的稳定，更依赖于一种内在的政治伦理、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文明道统。

因此在《政学私言》中，钱穆面对的不仅是宪法制度如何分权、监督的问题，而是更根本的中国现代政治如何在文化连续性的基础上实现制度转型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民国以来之所以政局动荡、宪政失灵，并非制度本身无效，而是文化未立，政治制度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判断深刻表达了他对文化断裂的忧虑，也构成其“五权宪制”构想的出发点。钱穆先生论及了政治法律秩序的若干基础性命题以及在当时语境下迫切需要辨析的理论性命题，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秩序法理，论述国家建构的法治原理，包括中国传统政治、五权宪法、道统与治统、人治与法治、法律观念、政治家风度等；其二为制度批评，论述国家建构的具体制度环节，包括选举与考试、元首制度、地方自治、首都、变更省区、农业国防、教育制度等；其三为宏观展望，论述对中国文化与政治走向的宏观判断与愿景，包括中国社会展望、中国前途、建国信望等。

（二）对激进革命与制度移植的批评

现代中国学术几乎全盘移植西方，学者以此衡量中国政制，自然会有无视、甚至敌视态度，此一反思贯穿钱穆先生一生。[4]钱穆对 20 世纪中国革命进程持基本保留态度，尤其警惕激进主义对文化秩序的破坏。他批评五四以后知识界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认为其既未建立现代社会所需的制度理性，又摧毁了维系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文化根基。他指出清末民初以来的宪政实验，包括君宪、共和、议会制、五权宪法等尝试，多数都未能根植于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土壤中，因而在实践中多流于形式，他更直接批评了当时中国政治现实中的种种制度弊病，陷于“西法移植”的困局。西方式的宪政如三权分立、代议民主等虽然在技术上成熟，但若没有文化的支撑，只会造成制度的水土不服与失序。在这种语境中钱穆所设想的“五权宪制”，并不是对西方制度的替代品，而是一种基于中国历史、回应中国问题的制度再构。

虽然民主政治的含义多种多样，但需具备体现民意、追求平等、实施法治等特征，自人类社会由传统迈向近代。民主政治为近代世界政治潮流的趋势所在，由于各国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差异，不同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形式多种多样。钱穆认为“民主政治仅一大题目，而非一死格式”。[5]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受英、美、法等国的影响，时人认为推行民主政治必须有赖于政党，几乎将政党政治等同于民主政治，而国内实施政党政治又多效仿于英国和美国。钱穆认为这是不顾国情，盲目模仿甚至是抄袭的行为。“民主政治可以为政党政治，而不必定为政党政治”。[6]钱穆提出中国人对政党政治非常淡漠，不在于国人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在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不足，政治知识不够，而是因为政党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同于英美，在英美大多数民众隶属于政党，多数党执政能够代表多数民众的意见，而诸党联合即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合作；在中国党人只占全体国民的一小部分，即使全国各党派联合团结，其数量占国人全数的比率依然很小，一党专政或多党联合都难以代表大多数国民的意见，民主政治精神无从体现。

（三）“宪制”观念中的文化理想主义

由政制问题而进一步否定文化传统、乃至文化、国族身份者，是中国现代学界的一大病灶。钱穆在《政学私言》中恰恰是要直面传统政治的现代潜能问题即找出中国传统政制无形中仍足以支配当前之中国的东西。诸如道统与治统、人治与法治、建都和自治、元首与国民这类大论题，不仅针对宪法理论和方案而阐发时论，更围绕现代立国议程而开拓关乎一国根本构成的宪制论域。现代中国的宪制言说可谓代有不穷，花样纷呈，能审慎而精准把握文明与政治这两层传统大义关联的努力，则难能可贵，尤显珍稀。[7]钱穆在《政学私言》中多次使用“宪制”一词，但其用法明显不同于西方式的“宪政”话语的工具主义倾向。在他看来宪制并非单指一套制度框架或法理结构，而是一种文明秩序的制度化表达。因此钱穆并不满足于追求某种运行良好的政治体制，而是强调制度应当反映国家的文化本性，回应民族的历史经验，并最终服务于政治。这种文化理想主义，使得钱穆的宪制构想既包含明确的制度安排如五权分设，又承载深层的精神内核。他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序中，明确点出自己关心的一大问题：“试问此五千年抟成之一中华大民族，此下当何由而维系于不坏？若谓民族当由国家来维系，此国家则又从何而建立？若谓此一国家不建立于民族精神，而惟建立于民主自由。所谓民，则仅是一国家之公民，政府在上，民在下，无民族精神可言，则试问西方国家之建立其亦然乎？抑否乎？此一问题宜当先究。”[8]国家从何建立这一立国的根本问题紧密联系着对于现实国运的

忧思，又必须耐心从历史传统中寻求其线索。政治实践与学术应先重视传统造就的国情、尊重民族社会的文化民风，在此基础上损益维新。他特别强调宪制之所以成立，根本不在于设权或限权，而在于存道与立德，五权宪制虽有明确分权逻辑，但其最终目标不是制衡或竞争，而是实现文化秩序中的协和、稳定性。因此钱穆的宪制思考不同于权力制衡式的西方宪政哲学，也不同于实用主义导向的技术宪政，而是一种制度中的文化自觉，是一种中国式宪政理想。

三、钱穆五权宪制与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比较研究

钱穆在《政学私言》中提出的五权宪制方案，显然不能脱离一个重要的思想语境：即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反思与回应。五权分立宪法理论为孙中山先生所独创，有着丰富的内涵，具有独特性和专门性，可谓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本土政治制度构想之一，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结合西方宪政技术与中国传统资源的新型宪政体系。然而钱穆在数十年后的政治语境中重新提炼出五权框架，却在权力构成、制度目标与文化逻辑上展现出与孙中山迥然有别的面貌。这一异同背后，反映出两人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路径的根本分歧，也是理解钱穆宪制思想独特性的关键所在。

（一）孙中山五权宪法的制度设计逻辑

作为五权宪法缔造者的孙中山，虽然经过欧风美雨的思想洗礼，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宪政文化,并为促进中国早日实现共和宪政不惜终生奋斗，但是孙中山也还是深受了传统文化的浸染，这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五权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制度设计，而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其所设计的五权宪法被重构而复归于传统的一元化权力结构设计。[9]孙中山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说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10]孙中山主张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民权的兴起便是这种进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孙中山坚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于不断进化、不断更替的状态中，没有止境。孙中山接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主张社会历史与生物界一样，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他认为进化是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规律。为此孙中山根据个人自然禀赋之聪明才力的差异，将人分为三大类，即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孙中山的人性三等与传统文化中的“性三品”说源出一脉。他之所以要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性三品”说而将人性归为三等，其一重要目的就是要论证推进中国宪政进程中的训政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为了推进中国的宪政，孙中山设计了建国三时期，即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因此需要由国民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政权，对人民进行训导。“中国人具有奴性，需要教育和训导，但是权力来源于人民，人们可以在民主宪政过程中学习如何行使民主权利，逐渐提高民主觉悟和民主意识。然而训政实际上是领导者代替人民行使政权，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11]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著作中明确提出五权分立的宪法框架，主张将国家权力划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与监察权。他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虽然能够实现制衡与效率，但并未充分吸纳中国古代政治的智慧。考试权与监察权正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如科举制与御史台）的现代转化，孙中山认为五权并列能够防止一权独大，并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与道德标准。早年孙中山在游学欧美期间，深知中国之落后，在于中国缺乏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体制，因此孙中山力主仿效欧美政体，在中国推行共和制度，然而孙中山在晚年却改变了这一主张。孙中山认为西方的民主政体已经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缺乏独立的考试权与监察权。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照搬到中国之后，问题则更加严重，为此孙中山主张借鉴中国古代的考试与监察制度，以形成“五权宪法”之考试与监察二权。中国从前的考试权和弹劾权，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是绝不可少的。关于考试权孙中山认为西方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官吏由于没有经过考试，往往并无真才实学。

关于监察权，孙中山认为西方的监察权由于不独立而归属于立法权，因而常常造成议会专制，生出不少的流弊。为了消除上述监察权不独立且归属于立法权的流弊，孙中山认为需要借鉴中国传统监察权独立的制度设计，以形成“五权宪法”之独立的监察权。这一制度构想融合了实用主义的功能分工逻辑与对传统资源的象征性利用，力图在政治效率、民主制度与历史延续之间取得平衡。它是在民初政局混乱、宪政失灵背景下提出的一种“中体西用”的制度救济方案，体现出一种制度技术主义的取向。五权宪法最终于《中华

民国宪法草案》中正式确立，并成为后来国民政府宪制结构的蓝本。孙中山在暮年完善三民主义，其中的五权宪制权力方案重构对宪制的定义，使得宪制一词回归到政治体的权力秩序总体构成的角度去讨论，这本身就是对西方近代宪制话语的突破。[12]

（二）钱穆五权宪制的权力架构与文明意图

相较之下钱穆所提出的“五权”方案，不仅在具体权力内容上发生显著变化，更关键的是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完全不同于孙中山。中国传统监察权的功能体现在促进政治体内部的协调贯通而非制衡牵制。钱穆指出：“中国传统政制，因由此制度之存在，故虽不能如西方之不能有国会与政府为对立，而政府权力仍有其自身调节之机制。”[13]国家基本、政社关系、制度法程皆由文化意识观念与实践经验支配，一国之政治也必与国家自己传统的文化民族特性相讵合，才能实现鼎革时期的稳健转承。这一历史观和文化观构成了钱穆中国传统监察权政治原理的论证起点。[14]五权宪法不是分权主义的扩大，而是集权主义的体现，是与孙中山历来主张和实践的集权主义相一致。[15]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核心关怀在于组织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是一种偏向国家机器理性化的制度构想。权力的分设与监督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僚腐败、提升办事能力、健全代议制度，其五权的构造仍属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逻辑中的权力组织问题。相对而言，钱穆的五权宪制并不以国家效率或功能完整为首要目标，而是试图通过制度的建构表达中华文明的内在结构与精神传统。他特别强调政制不仅是国家治理技术，更是一个民族政治伦理与历史智慧的制度化体现。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文化正当性必须具有与行政、立法同等的制度地位，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这种构想带有浓厚的文化宪政色彩，试图将中国历史上的道统以制度形式延续下来。

四、钱穆五权宪制的政治哲学基础

在钱穆的语境中，“宪制”不是一个纯粹法律即政治技术层面的制度设计问题，而是承载着文化理想和文明价值的一种制度性体现。在现代政治学或宪政学中，“宪制”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制度安排，比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强调的是程序设计、权力配置、监督机制等技术性制度结，。但钱穆对“宪制”的理解更文化性、历史性、价值性。他并不满足于构建一个“运行有效”的国家机器，而是希望制度能够反映并维护一种中国固有文明秩序，也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政治伦理、社会结构与文化精神。钱穆在《政学私言》中提出的“五权宪制”方案，不仅包含政、治、学、思、监五项权力配置，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借此重构一种以文化为内核的现代政制模式。对他而言宪制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分权机制，而是中华文明秩序的制度性表达，是文化精神在制度层面的具体体现。因而理解钱穆的宪制思想，不能仅以西式政治学框架加以衡量，而需从其历史哲学、文化观念与政道理想中把握其制度构想的深层逻辑。

钱穆提出的“五权宪制”，不仅是对中国现代宪政路径的反思性回应，也体现出深刻的政治哲学关怀，它不是一套纯粹的制度性安排，而是一种以文化价值为核心的制度建构尝试，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与现代宪政理念的复杂互动。若要理解其“五权”构想的内在逻辑，必须回到钱穆的文化观、历史观与制度观，尤其是他对儒家政道传统的再解释与转化。

（一）儒家政治传统中的“德主礼辅”与制度节制思想

钱穆深受儒家政治哲学影响，特别是其中关于“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理理念。在他看来良好的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伦理共识之上，而不仅仅是权力制衡或程序合法性，他反对将宪政简化为外在的约束机制，认为制度必须内嵌文化价值，尤其是儒家强调的“礼治”、“仁政”等道德政治传统。他根据过往治乱的事件总结出中国法治变乱衰亡的历史经验，大体分为三种：“偏至”、“分裂”、“用违其宜”。法律应当宽和并以教化引导为正面，不可一味追求功利惩罚之法家境界，而法与儒家之礼的调剂关系的紊乱在钱穆先生看来是关键性的，关系紊乱则秩序错位，“德化”之政的“消毒防腐剂”功能就难以发挥作用了。在钱穆的构想中，“礼”并非抽象的道德劝化，而是一种具有制度性功能的文化机制，可用于调节权力运行、规范官员行为与维护政治秩序。五权中的“学权”、“思权”正是在德化政治与文化自治基础上设置的，体现出他将儒家政治理念制度化的尝试，这种转化不仅有助于构建一种更具伦理正当性的制度形态，也为现代政治提供了一种超技术的精神支撑。

以道统与治统关系为论，道统优先于政统，就是要在政教精神上、法度精神上鼓励民气民情

的自由张扬，不以一时政治形势束缚之，不以苛烦法度桎梏之。[16]钱穆区分“政统”与“道统”，认为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形成连续的政治文明，关键在于政道合一，即政治权力的运作必须获得文化权威的承认。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现代国家的世俗权力结构，在中国传统中政治合法性往往建立于文化理性与伦理秩序之上，钱穆在《政学私言》中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权缺乏技术设计，而是文化未立，因此宪制不仅是对国家权力的划分与制衡，更是对文化道统的制度承接。设立学权与思权其根本意图正在于为“道统”提供制度保障，使文化与学术得以独立于政治权力运行之外，从而重建文化—政治的内在正当性关系。

（二）对西方宪政观的批判性吸收

钱穆以为孙中山才是真正具有创造力之政治思想家，因为制度移植论者只是简单地进行制度的平移，而并无任何思想创发与制度创新。孙中山先生不是简单地照搬思想观念，而是融古今中外为一体，且以中国政治精神为根本。[17]然钱穆他并非盲目排斥西方宪政理念，相反他高度评价西方近代文明中的科学精神、理性制度与个人自由思想，但同时指出这些制度难以直接移植于中国土壤，他批评西方式宪政的机械分权与程序万能观念，认为这容易导致制度的工具化和政治的伦理空洞化。在钱穆看来西方宪政虽在制度效率上具有优势，但往往忽视制度的文化基础与道德支撑，他提出制度可以模仿，文化却难以照搬，主张制度移植必须伴随文化反思与伦理重构。因此他在制度设计中强调文化合法性高于形式合法性，并通过其他的权力形式把制度转向对思想自由与文化独立的深度保障。

五、理论价值与现实启示

钱穆“五权宪制”的理论设计虽然未能进入现实政治操作层面，但其思想深度与文化视野，依然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政治哲学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这一构想不仅是历史思想遗产的再发现，更是对当前“法治中国”与“文化自信”之间紧张关系的有力回应。当今中国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同时，也不断强调“文化自信”、“制度自信”，试图在政治制度现代化与文化传统之间寻求平衡。钱穆的五权宪制正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既不是在西式框架内寻找合法性，而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重建制度根基。通过赋予文化与思想以独立的制度地位，钱穆试图让宪制成为中华文明价值的制度化表达，从而避免现代制度与传统文化的割裂。这种文化宪政思维，不仅突破了西式“权力制衡”的单一逻辑，也为当前政治治理中“德法兼治”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哲学基础。其次钱穆的制度设想打破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结构的基本框架，不仅拓展了权力配置的想象空间，也为现代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制度维度。在当前高度信息化与知识社会背景下，思想生产与知识分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如何防止政权对舆论、学术的操控，如何保障公共领域的多元与开放，成为现代宪政的新问题。在这一点上钱穆的五权设想具有极强的前瞻性，正是意识到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同样需要制度规范与制衡保障。这一制度设想对于当代思考“思想自由”、“学术自主”的制度支撑以及现代权力配置的重新构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尽管钱穆“五权宪制”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蕴与文化意图，但从制度实施角度来看，其设想亦面临不少现实难题。首先他所设定的宪制虽具有明确的制度意图，但缺乏足够的制度技术细节，难以解释这些权力如何产生、如何运行、如何与其他机构协调；其次这一方案主要依赖于“士君子”官员伦理支撑，忽视了现代政治中组织结构、利益博弈与社会基础的复杂性；此外钱穆强调德治先于法治、道统高于政统，这种文化理想主义虽富于哲学魅力，却难以形成稳定、可操作的制度逻辑。在一个高度复杂分工、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制度运行更依赖法制化、程序化与技术理性，而非道德共识与人格担当。这就使得钱穆的制度方案，在现实政治语境中难以转化为操作性宪制设计。总的来说钱穆的五权宪制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反思视角。它提醒我们在制度设计中不能忽视文化因素，政治制度不是抽象运作的权力机器，而应是一种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制度性表达。尤其在当前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国家治理与文化认同相互交错的背景下，钱穆关于宪制即文明之表达的主张，正凸显出它的思想深度与现实张力。对于当下致力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秩序的理论探索者而言，钱穆提供的并非一套直接可行的制度蓝图，而是一种制度如何深植文化、政治如何重建道统的哲学指引。这也许正是其“五权宪制”思想在制度之外的最大价值所在。

钱穆在《政学私言》中提出的五权宪制方案，不仅体现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和对传统政治

智慧的独立理解，更是在回应现代中国宪制困境的过程中对文化嵌入的政治制度所做出的积极尝试。相较于孙中山五权宪法所体现的制度功能主义与民族建构逻辑，钱穆的构想更加关注制度背后的文化正当性、思想自由与历史连续性。他的五权安排不是单纯追求效率与制衡，而是试图将中华文明的精神结构制度化，赋予现代国家制度以文化灵魂，可以说钱穆的宪制思考不仅是对传统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的探路。

参考文献：

[1]钱穆.《政学私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3.

[2]钱穆.《政学私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5.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1.

[4]姚中秋.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2(02):15-25+197.

[5]钱穆.《政学私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5.

[6]钱穆.《政学私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4.

[7]任锋.钱穆的“明夷待访录”[J].政治思想史,2018,9(04):1-17+197.

[8]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5.

[9]易顶强，陈晓枫.《舶来的宪政文化：以“五权宪法”为例》[M].湖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4-195.

[11]刘蕾.孙中山训政理论与中国宪政[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30(04):97-100.

[12]杨毓康.传统民本政治的近代转型——探析以“权能分职”为枢纽的五权宪制方案[J].中国政治学,2023,(02):73-93+135-136.

[13]钱穆.《政学私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9.

[14]胡云.风宪再造：钱穆政治思想中的监察权理论[J].政治思想史,2020,11(04):38-54+197-198.

[15]林绪武.孙中山五权宪法的“中西合璧”文化解读[J].广东社会科学,2013,(05):109-116.

[16]任锋.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4(05):31-40+189

[17]姚中秋.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2(02):15-25+197.

共耳与共像素：AIGC 时代敦煌纹样的数字转译与美学重构

杨嘉钰[1]

(1.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文化遗产设计的当下，传统纹样数字化转译面临着“技术生成效率”与“文化本真性”的张力。本研究以莫高窟第 407 窟隋代三兔共耳藻井为文化母题，提出“共耳—共像素”的转译路径，将藻井的“方井套叠”结构映射为像素网格的模件化秩序，将“三兔共耳”的共享逻辑转译为像素单元的共享与再生。研究采用设计实践法，构建了“提示词语义编码—AI 生成—人工修形—参数化延展”的工作流，最终形成十二辰数字纹样资产库。研究发现，像素网格的“共享单元”与三兔共耳的“共用”结构存在天然同构；AIGC 在变体生成上具有优势，但在文化语义校准上存在偏差，设计师的“人工修形”构成了对算法随机性的美学约束。本研究为传统纹样的数智化活化提供了兼顾创新效率与文化深度的设计路径，并回应了 AIGC 时代设计师作为“文化中介者”的不可替代性。

关键词：三兔共耳；像素艺术；AIGC；文化转译；设计本真性

DOI：doi.org/10.70693/202610138292

Co-ear and Co-pixel: Digital Translation and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of Dunhuang Patterns in the AIGC Era

Yang Jiay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whe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eply intervenes in cultural heritage design, the digital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faces the tension between "technical generation efficiency" and "cultural authenticity." This study takes the Sui Dynasty Three Rabbits Sharing Ears caisson in Cave 407 of Mogao Grottoes as the cultural motif and proposes a "Co-ear to Co-pixel" translation path, mapping the "square well nesting" structure of the caisson into the modular order of pixel grids, and translating the sharing logic of "three rabbits sharing ears" into the sharing and regeneration of pixel units. Using the design practice method, the study constructs a workflow of "prompt semantic encoding—AI generation—manual shaping—parametric extension," ultimately forming a digital pattern asset library of the twelve zodiac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hared units" of pixel grids have a natural isomorphism with the "sharing" structure of three rabbits sharing ears; AIGC has advantages in variant generation but shows deviations in cultural semantic calibration, and the designer's "manual shaping" constitutes an aesthetic constraint on algorithmic randomness. This study provides a design path that balances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cultural depth for the digital 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responds to the irreplaceability of designers a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in the AIGC era.

Keywords: Three Rabbits Sharing Ears; Pixel Art; AIGC; Cultural Translation; Design Authenticity

作者简介：杨嘉钰(1998—)，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一、引言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如何将抽象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具象且能引发共鸣的视觉产品，已成为设计学界持续关注的命题。早期研究借鉴生物学 DNA 的遗传与变异特征，构建了产品造型设计 DNA 元素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并将敦煌唐代飞天文化元素应用于文创设计。实证表明，消费者在“象征性感知”维度表现出极高的认同度，家居类文创产品（均值 4.766）整体评分最高，验证了消费者能够有效感知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并产生深层情感共鸣[1]。然而，这种基于传统设计流程的方法在方案生成的多样性、跨媒介适配效率上仍面临瓶颈。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为传统纹样的现代转译开辟了新的技术范式。针对“敦煌藻井”纹样的生成设计，有研究系统比较了 Midjourney 与 ChatGPT 结合的四种生成路径，发现 GPI（ChatGPT 提示词 + 参考图）的综合生成效果最优（6 类纹样中 4 类排名第一），且带有参考图引导的方法在构图完整性、母题保留上明显优于纯文本驱动的方法[2]。但该研究也客观揭示了当前 AIGC 的显著局限：在“时代精神统一”“宗教与世俗内涵融合”以及“文化交流特性再现”三个维度上，AI 生成结果仍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当技术手段日益丰富时，文化遗产设计中的“本真性”与“原创性”问题便浮出水面。一项针对敦煌莫高窟壁画纪念品设计的定性研究，通过对 9 名设计师和 2 名文化专家的深度访谈，明确指出：首要挑战在于真实、准确地转译文化遗产特征。设计师必须尊重传统美学与历史价值，避免过度的主观臆断。研究强调，设计师应恪守设计伦理，保持文化根基的“Roots remain intact”，并在设计过程中积极与文化专家协作。设计师被赋予了“中介者”的关键角色——不仅是视觉的创造者，更是连接古今、促进跨文化传播的桥梁[3]。

综合上述文献，现有研究仍存在三个层面的空白：其一，三兔共耳纹样的“共用”结构逻辑与像素网格的“共享单元”机制之间的同构关系尚未被揭示；其二，AIGC 介入传统纹样设计的研究多聚焦于技术可行性验证，对设计师如何通过“规则设定—生成引导—人工校准”实现文化语义保真的具体机制缺乏个案剖析；其三，从单一母题到数字资产库的建构逻辑，以及资产库如何支撑跨媒介的差异化应用，缺乏完整的实践闭环。

本研究以莫高窟第 407 窟三兔共耳藻井为母题，提出“共耳—共像素”的转译路径，试图在数字语境中重构传统纹样的美学秩序。研究旨在回答：传统藻井的模件化结构如何转译为像素网格的共享逻辑？在 AIGC 辅助下，设计师如何通过人工修形与语义编码保持文化本真性？由此生成的数字资产库如何适配跨媒介应用？

二、理论框架：从“共耳”到“共像素”的结构同构

（一）传统藻井的模件化基因

莫高窟第 407 窟隋代三兔莲花飞天藻井，是敦煌纹样体系中极具结构独特性的案例。藻井中心三只兔共三耳、首尾相追，呈无限循环，蕴含“三世轮回”“三生万物”的哲学意涵。陈振旺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考证了三兔共耳纹样的源流，指出其并非来自中亚或西亚，而是中国传统图案设计思想的产物，与隋代三世思想影响下的造窟活动密切相关[4]。其“共生”结构通过共享耳部单元实现有限平面中的无限循环，这一形式逻辑与像素网格中“共享单元”的再生机制具有天然的同构性。

（二）像素网格的“共享再生”机制

8-bit 像素艺术的底层逻辑是基于网格的“模件化拼贴”。像素单元在网格中的重复、拼接与共享，与三兔共耳的“共享耳朵”产生了天然的结构同构。在本研究中，这一同构被提炼为“共耳—共像素”的转译模型：将藻井的“方井套叠”映射为像素网格的模件化秩序，将“共耳循环”转译为像素单元的共享与再生。具体而言，设计设定 64×64 像素为基准网格，每个像素单元既可作为独立色块，也可在四方连续拼接中与相邻单元共享边界，形成无缝循环。这种结构上的同构，为传统纹样的现代转化提供了一种跨时空的语法桥梁。

三、设计实践：语义编码与人工校准

（一）提示词工程与民俗语义的编码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辅助下，基础纹样的生成依赖精确的提示词编码。以“鼠”的提示词为例，其形式规则被严格定义为：“轴对称镜像构图、无透视平面化设计、8-bit 像素艺术美学、十字绣马赛克风格、几何简化形态、仅纯色块、无渐变或阴影”。在色彩上，则明确要求“深黑背景、高对比饱和的亮粉、珊瑚橙、明黄，平涂应用”。这种编码策略将敦煌藻井的视觉基因转化为 AI 可理解的语义指令。

在深化阶段，设计策略从通用敦煌元素向特定生肖民俗语义迭代。以“兔”为例，提示词在原有敦煌莲花、卷草、宝相花的基础上，融入了“月兔图腾、桂花、兔耳几何镂空”等元素，以对应月亮与中秋文化；针对“猪”，则引入“珍珠纹、忍冬卷草、元宝、丰收元素”，以对应财富与吉祥寓意。这种分层编码显著提升了生成纹样的文化契合度与生肖识别度。

（二）人工修形：对 AI 随机性的“文化规训”

AIGC 的随机性赋予了纹样变体极大的丰富度，但也带来了文化语义的偏离与形态异化。例如，在“鼠”母题的生成中，算法未能准确理解敦煌卷草纹的 S 型生长逻辑，导致尾部像素呈现无序的色块堆叠。此时，设计师的“文化校准者”角色得以凸显。本研究基于传统纹样的审美范式，通过像素级的裁剪、镜像复制与轴向旋转，对 AI 输出的异化形态进行了强制性的视觉规训，将其修正为符合敦煌规范的卷草形态。

这一“人工修形”过程，本质上是对算法随机性的美学约束。它证明了在文化遗产的数字转译中，技术无法取代设计师对文化本真性的判断力。正如 Zhu 与 Rahman 所指出的，设计师在文化遗产设计中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需要在创新策略与本真性维护之间寻找精妙的平衡[3]。

（三）参数化延展与数字资产化

为实现纹样从单一母题向数字资产库的系统性跃迁，本研究引入了参数化生成逻辑。借助大语言模型辅助编写的生成算法，对修形后的核心像素单元进行拓扑延展。在保持 64×64 基础网格分辨率的前提下，算法高效生成了四方连续的无缝拼接纹理，以及圆形、菱形、星形等几何外框的变体矩阵。这种“逻辑生成+人工精修”的双轨机制，使得十二辰纹样在保持高度统一性的同时，又具备了跨媒介传播所需的形态多样性。最终，设计形成了包含十二生肖的高饱和度赛博朋克色谱数字资产库，并延展至日历、邮票、丝巾及 3D 服装等载体。

四、讨论：算法时代的“灵韵”重构与设计伦理

（一）从“技术生成”到“文化再生产”

本研究的实践表明，AIGC 在传统纹样设计中不应被视作“一键生成”的黑盒，而应被视作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触发器”。AI 提供了无限的形态变体，但设计师通过“网格对齐、色彩标定、形态修形”等介入手段，完成了对文化语义的锚定。这回应了文献 1 中消费者对“象征性感知”的高需求——只有经过文化校准的符号，才能引发深层的文化共鸣。

（二）赛博美学与传统基因的融合

本研究有意避开了传统敦煌文创中常见的“古朴、庄严、厚重”的审美惯性，转而拥抱高饱和、高对比的赛博朋克色谱。当石绿、石青与荧光粉、电子橙在像素网格中并置，传统纹样不再是被膜拜的古老遗迹，而是化身为具有潮流属性的数字符号。这种“赛博敦煌”风格在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像素鲸 AI”杯传统纹饰活化设计全国决赛中，经过专家多维度评审，荣获一等奖。这一专业认可证实了传统纹样在数字时代的“潮玩化”转型，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通过媒介更新实现的“数字灵韵”重生。

（三）设计师作为“文化中介者”的不可替代性

在 AIGC 时代，设计师的角色正在从“形式创造者”转向“文化校准者”。AI 擅长在“变体生成”阶段提供丰富的基础形态，但在“文化语义校准”阶段容易产生偏差。本研究中“老鼠尾巴修形”的案例表明，设计师的像素级干预不是对技术的否定，而是对文化本真性的守护。这种“人机协作”的边界划分，为传统纹样的数智化设计提供了一种可复用的伦理框架。

五、结论

本研究以敦煌三兔共耳藻井为原型，提出了“共耳—共像素”的转译模型。研究证明，在 AIGC 辅助下，将传统纹样转译为像素网格，并通过“提示词语义编码—程序化模件生成—人工像素校准”的工作流，能够有效平衡技术效率与文化本真性。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一，揭示了“共耳”共享结构与像素网格“共享单元”之间的同构关系，为传统纹样的数字化转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二，通过具体的设计实践，验证了设计师在 AIGC 工作流中作为“文化中介者”的不可替代性；其三，构建了十二辰数字纹样资产库，为跨媒介应用提供了可复用的设计资产。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尚未进行大规模的用户感知实验，对数字纹样的情感效能缺乏量化评估。未来研究可引入眼动追踪与用户满意度问卷，进一步探索赛博敦煌风格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度。同时，可将“共耳—共像素”模型推广至其他

传统纹样（如团花、缠枝纹）的数字化转译中，检验其普适性。

参考文献：

[1]Zhang N, Zhang R.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model of DNA elements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 case study of Dunhuang Tang Dynasty Feitian cultural elements [J].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Nonlinear Sciences, 2024, 9(1): 1-12.

[2]Yang Z. Research on generative design of Chinese “Dunhuang Zaojing” patterns based on AIGC[J]. Highlights i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5, 65: 170-181.

[3]Zhu Q, Rahman R. Authenticity in souvenir design integrating cultural features of Dunhuang’s mural heritage: A qualitative inquiry[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5, 12: 403.

[4]陈振旺. 隋及唐前期莫高窟藻井图案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8.

[5]ZHU H, WU S, CHEN Z. Cross-media translation and semantic reconstruction of Dunhuang floral motifs[C]//Culture and Computing. Cham: Springer, 2025.

基于 AIGC 的楚漆器凤鸟纹样数字重构与文创设计实践

孟怡轩[1] 崔宝琨[1]

(1.湖北文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楚漆器凤鸟纹是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装饰纹样，其卷曲灵动的线条与红黑相间的色彩辨识度极高，但长久以来多留存于馆藏与图录，当代转化不足。本文以凤鸟纹为研究对象，借助现有 AIGC 工具开展数字重构与文创设计实践：先梳理凤鸟纹在造型、构图、色彩三方面的形式特征，再将其转化为 AI 可理解的提示词进行多轮生成与筛选，最终对生成纹样进行简化、组合等二次设计，应用于书签、包装等文创载体。实践表明，在人工设定与修正的前提下，AIGC 能够较好地保留凤鸟纹的传统韵味并拓展其当代形态，为传统纹样的当代活化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关键词：AIGC；凤鸟纹；纹样重构；文创设计

基金项目：湖北文理学院 2026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创新训练项目：基于 AIGC 的楚式漆器纹样数字重构与文创图案设计研究(X202610519184)

DOI：doi.org/10.70693/202610132727

Practice of Digit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of Phoenix-Bird Patterns on Chu Lacquerware Based on AIGC

Meng Yixuan[1], Cui Baokun[1]

[1]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Hubei, China

Abstract:Phoenix-bird patterns on Chu lacquerware are among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decorative motifs of Chu cultu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sinuous, flowing lines and red-and-black color scheme, yet they have long remained confined to museum collections and illustrated catalogs, with limited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Taking this motif as its research object, the present study undertakes a practice of digit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with existing AIGC tools. It first analyzes th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oenix-bird pattern in terms of modeling, composition, and color, then translates them into AI-comprehensible prompts for iterative generation and screening, and finally conducts a secondary design of the generated motifs through simplification and recombination, applying them to such cultural creative carriers as bookmarks and packag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nder human direction and revision, AIGC can effectively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flavor of the phoenix-bird pattern while expanding its contemporary forms, thus offering a transferable approach to the contemporary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motifs.

Keywords:AIGC;phoenix-bird pattern;pattern reconstruction;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作者简介：孟怡轩(2006—)，女，本科，美术学专业；
崔宝琨(1994—)，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美术学、美术教育、非遗。
通讯作者：崔宝琨

一、引言

楚漆器是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漆器上的凤鸟纹更是辨识度极高的装饰纹样。它以卷曲灵动的 S 形线条为骨架，配以红黑相间的色彩，或单独成图，或连续排列，既有几何般的秩序，又有流动的生气，是楚人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然而，这类纹样如今大多停留在博物馆展柜与考古图录之中，在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在现代传播中，楚漆器纹样往往以片段化、符号化的方式出现，缺少面向当代审美的系统整理与再设计，其价值远未被充分挖掘。

随着人工智能图像生成技术日趋成熟，普通人也能通过文字描述快速生成图像。这为传统纹样的再利用提供了新的可能：过去要靠画师一笔一笔临摹、重新设计的纹样，如今可以由 AI 生成大量变体，设计师再从中挑选、加工。但 AI 生成也有明显的问题，如容易把传统纹样画成“四不像”，既不具备楚文化的特征，风格上又像网上常见的插画。

近年来，不少博物馆和文创团队尝试将传统纹样引入文创产品，但大多停留在直接将图案印在文创产品上，缺少从纹样特征出发的系统重构。AIGC 技术的出现，恰好为这种重构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

本文以楚漆器凤鸟纹为对象，尝试探索“特征提炼—AI 生成—人工筛选—文创应用”的实践路径。团队成员从美学角度分析凤鸟纹的造型、构图与色彩特征，再将这些特征转化为 AI 能理解的提示词，经过多轮生成与筛选，最后把合格的纹样应用到书签、包装等文创载体上，希望为传统纹样的当代活化提供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案例。

二、楚漆器凤鸟纹的形式特征

要用 AI 重构凤鸟纹，先得弄清它“长什么样、为什么这么好看”。笔者结合馆藏图像与图录资料，从造型、色彩、构图三个方面对凤鸟纹的形式特征进行了梳理。

在造型上，楚凤以曲线、动态、修长区别于北方凤的直线、静态、短粗；纹饰背后是楚人“万物有灵”的巫觋观念，是“有意味的形式”。无论是展翅独立的凤鸟，还是盘绕于器物周身的凤鸟，轮廓都强调曲线的流转与回环，线条疏密有致，富有韵律感。就具体形态而言，凤鸟纹并非单一样式：有的凤鸟展翅昂首，姿态张扬；有的凤鸟蜷身回望，含蓄内敛。姿态各异，却都以曲线贯穿始终，共同呈现出楚人热烈而神秘的审美气质。凤鸟纹并不追求写实，重在表现鸟的灵动与气势；许多纹样中鸟身与云气纹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纹样在静止的器物表面产生流动的错觉。

在色彩上，凤鸟纹以红黑两色为主调。红为朱漆，黑为髹漆本色，二者对比强烈又不失沉稳，辅以少量黄、绿点缀，形成鲜明的地域色彩标识。这种尚红尚黑的用色习惯，是楚漆器区别于其他地域漆器的重要视觉特征，也构成了凤鸟纹最容易被识别的色彩记忆点。在楚文化中，红与黑不只是颜色，更承载着楚人特有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也深深影响着纹样的整体气质。

在构图上，凤鸟纹既可单独成图，也可作连续排列。单独成图时，多采用适合纹样的方式，将凤鸟置于圆形、方形等固定轮廓之中，讲究对称与均衡；连续排列时，则通过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延展，使纹样沿器物表面形成有秩序的装饰带。在常见的漆奁、漆盒等器物上，凤鸟纹常作适合纹样铺满圆形盖面；在器物的口沿部位，则常作连续排列，与几何边饰搭配使用。灵活的组织方式，使凤鸟纹能够适应不同器形与部位的需要。

综合来看，造型、色彩与构图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凤鸟纹的“视觉基因”：造型决定其形态辨识，色彩决定其气质辨识，构图决定其应用方式。这三者也正是后文将其转化为 AIGC 提示词的核心依据。

凤鸟是楚人尊崇的神鸟，被视为楚人的图腾与祖先的象征，其纹样在楚漆器上经历了由附庸纹饰到独立艺术形象的演变，形态日益丰富。选择凤鸟纹作为重构样本，一方面因为它最具代表性、辨识度最高；另一方面，团队前期已围绕凤鸟纹开展线稿提取与 AI 转化的初步尝试，积累了一定经验，便于在已有基础上系统推进。

三、基于 AIGC 的凤鸟纹数字重构实验

（一）从纹样特征到提示词

AIGC 图像生成工具依靠提示词生成图像，提示词的质量直接决定生成结果。我们将凤鸟纹的造型、色彩、构图三个特征维度逐项转化为中英文关键词，并组织成提示词方案（表 1）。在造型维度，突出“卷曲的 S 形线条”“凤鸟展翅”等描述；在色彩维度，强调“红黑配色”；在构图维度，明确“适合纹样”“连续纹样”等要求。同时加入“楚文化风格”“漆器装饰”等限定词，帮助 AI 锁定文化语境。这一转译过程与同类研究

中借助提示词控制生成风格的做法一致，但更强调从纹样自身的形式特征出发，不依赖复杂的技术参数。

提示词方案并非一次成型。我们最初设计了多组方案，有的侧重造型描写，有的侧重色彩要求，有的三方面并重，通过对比生成效果，逐步收敛出相对稳定的组合。表 1 列出的是最常用的一组方案。

表 1 凤鸟纹 AIGC 提示词示例（节选）

特征维度	中英文关键词	示例提示语 (节选)
造型	卷曲的 S 形线条、凤鸟展翅 (curled S-shaped lines, phoenix)	一只卷曲灵动的凤鸟纹，S 形线条，线条流畅
色彩	红黑配色、朱红与漆黑 (red and black)	红黑两色为主，朱红与漆黑，对比强烈
构图	适合纹样、连续纹样（fit pattern, continuous pattern)	圆形适合纹样构图，纹样居中
文化语境	楚文化、漆器装饰 (Chu culture, lacquerware)	楚式漆器装饰风格，传统纹样

（二）多轮生成与筛选

在提示词方案确定后，团队利用现有 AIGC 平台开展多轮生成实验，并记录提示词与生成效果之间的对应关系。实践中发现，提示词的颗粒度对结果影响很大：只输入“凤鸟纹”时，生成的图像往往偏向写实鸟类，缺少漆器纹样的味道；加入“S 形线条”“红黑配色”后，结果才接近楚漆器的视觉特征；再补充构图要求，画面才稳定下来。对每一轮结果，我们从楚文化辨识度、图案完整性、形式创新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辨识度看纹样是否保留凤鸟的卷曲形态与红黑配色，是否“一看就是楚人的东西”；完整性看线条是否流畅、结构是否闭合，避免断线、杂糅；创新度看其在传统基础上是否呈现出新的形态与组合方式。对不理想的结果，通过调整提示词或局部重绘进行修正。经过反复生成与筛选，积累了一批兼具传统韵味与当代感的凤鸟纹图像，作为文创设计的素材库。

按照上述标准，生成结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直接符合要求，图案完整、风格贴切，可直接进入素材库；一类大方向正确但存在局部瑕疵，如线条断裂、色彩偏差，需要经过局部重绘或二次修改；还有一类整体偏离预期，直接淘汰。在实际操作中，直接采用的结果只占少数，大部分需要人工介入处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AI 生成纹样离不开人的判断与把关。

在本项目前期，团队已经尝试过“线稿提取—AI 生成—二次转化”的完整流程（图 1）：先对馆藏凤鸟纹进行线稿描摹，再交由 AI 生成色彩与质感变化，最后通过填色或工艺制作呈现为装饰品。这一尝试初步验证了流程的可行性，也暴露出提示词控制不足、生成结果风格漂移等问题。通过这一流程生成的纹样，虽然还带有明显的 AI 痕迹，但已经具备了进一步设计的基础，为后续的系统化推进提供了直接经验。



图 1 前期凤鸟纹线稿提取与 AI 转化尝试

四、楚漆器凤鸟纹文创图案设计与应用

AI 生成的纹样并不能直接用于产品设计：一是生成图像的信息往往过载，需要提炼；二是需要根据载体进行组合与排布；三是尺寸、分辨率需要统一。我们按照“简化—组合—重复”的思路对选定纹样进行二次设计。简化，即删去不必要的细节，保留凤鸟纹最核心的卷曲线条与色彩关系；组合，即将凤鸟纹与云气纹、几何边饰等元素搭配，形成新的图案单元；重复，即通过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排布，使图案适应大面积的载体表面。这一思路在楚国凤鸟纹文创产品设计中已有成功先例，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把该思路与 AI 生成素材结合起来，形成相对固定的加工流程。

不同文创载体对图案的要求差异较大。书签、明信片等小尺寸载体，适合单独成图的适合纹样，直接以凤鸟纹为主体，强调图案完整；手账封面、包装盒等中等尺寸载体，可采用主图加边饰的组合方式，在保留辨识度的同时增加层次；帆布袋等大面积载体，适合连续纹样的重复排布，使图

案具有节奏感。此外，色彩在不同工艺中的呈现也有差别：印刷品对红黑两色的还原较为稳定，帆布袋印花则要考虑面料的吸色性，往往需要适当调亮色值，否则暗部容易糊成一团。设计过程中，我们根据各载体的实际尺寸反复调整图案比例与位置，并制作效果图检验视觉效果。

在适配过程中还发现，同一纹样在不同载体上的呈现差异明显：小尺寸载体上，纹样细节容易被压缩，需要放大主体、简化背景；大尺寸载体上，过细的线条又容易被拉散，需要适当加粗轮廓。这要求对每一类载体单独调整图案，而非一套图案通吃。

目前，我们已完成若干组凤鸟纹文创图案方案，涵盖书签、明信片、手账封面、帆布袋与包装等载体，并以效果图形式呈现（图 2）。部分方案经打样检验，色彩还原度与印刷效果较好，验证了 AI 生成纹样转化为文创产品的可行性。



图 1 凤鸟纹文创图案应用效果图

五、问题与反思

（一）传统特征保留与当代创新之间的平衡

实践过程中遇到最多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风格漂移，生成结果脱离楚漆器的视觉特征，滑向一般现代插画风格；二是元素杂糅，不同文化语境的纹样被生硬地拼合在一起。解决这两个问题，单靠增加提示词限制并不够，更需要人的判断与修正。我们最终确立的标准是“传统打底、适度创新”：纹样的骨架与配色必须保留凤鸟纹的核心特征，允许在细节与组合方式上作当代化处理。这一标准虽然朴素，但在实际筛选中行之有效。此外，在筛选之外，我们还借助图像处理软件对选中的纹样进行勾线、去杂、调色等处理，使其更接近可直接使用的设计素材。

（二）伦理问题与研究局限

AIGC 生成图像的版权归属目前尚不明确，训练数据中是否包含未经授权的纹样图像也难以追溯。在将生成纹样用于文创产品时，我们采取了保守的做法，即不直接使用涉及他人设计成果的图像，对生成结果进行充分的二次创作，并在成果展示中说明 AI 辅助生成的情况。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本研究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纹样样本数量有限，主要围绕凤鸟纹展开，结论对其他纹样的适用性有待验证；二是对 AI 工具的依赖较强，不同平台的生成效果差异较大，提示词经验的可迁移性有限；三是文创应用尚停留在方案与效果图层面，批量生产中的工艺适配问题有待进一步检验。

六、结语

本文以楚漆器凤鸟纹为对象，完成了“特征提炼—AIGC 生成—人工筛选—文创应用”的完整实践，验证了借助现有 AIGC 工具开展传统纹样数字重构的可行性。实践表明，AI 能够高效生成纹样的多种形态，为设计提供丰富的素材，但生成结果的质量控制、文化特征的保留以及对生成内容的伦理审视，仍然依赖设计者的人工判断。AIGC 在非遗纹样活化中的作用，更接近“高效助手”而非“替代者”。后续研究可以扩大纹样范围，验证这一设计流程在其他楚漆器纹样上的适用性，并进一步探索生成纹样在真实生产中的工艺落地。希望本研究的流程与经验，能为更多地域传统纹样的当代转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王黎明.战国时期楚漆凤鸟纹饰探议[J].装饰,2006(8).

[2] 郜玉莹,江澜.楚漆器凤鸟纹的造型与审美探源[J].齐鲁艺苑，2022(3):56-62.

[3] 黄楚飞.战国时期楚漆器中的凤鸟纹饰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6.

[4] 刘丹丹,辛艺华.战国楚漆器凤鸟纹饰的审美特征[J].艺术探索，2011，25(3):130-131.

[5] 张淑雨,何广庆.楚国凤鸟纹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J].美术文献，2024(3):124-126.

[6] 周先博,刁晓峰,杨茗先.基于 AIGC 的楚漆器纹样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2025.

仪式、艺术与身体：商河鼓子秧歌的文化阐释与传播价值研究

于淼[1]

(1.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商河鼓子秧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鲁北地区标志性民间舞蹈之一。本研究以仪式性、艺术性、身体性为核心维度，解析其文化内核。秧歌的身体实践承载着民众对力量的崇拜与生命礼赞，是地域认同的具身化表达。在当代社会，其原生祭祀、年节仪式场域逐渐弱化，但经符号重构，仍承担着社区凝聚功能。从传播层面看，鼓子秧歌视觉冲击力强，在文旅融合与新媒体传播中具备独特优势，但也面临原生语境抽离、身体技艺舞台化、标准化等挑战。研究认为，维系其文化本真性的关键，在于保持“仪式—艺术—身体”的结构完整，在传承核心基因的前提下，平衡传统形态与当代传播需求。

关键词：商河鼓子秧歌；仪式性；艺术性；身体性

DOI：doi.org/10.70693/202610161417

Ritual, Art, and the Body: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a Study of the Dissemination Value of Shanghe Drum-and-Dance Yangko

Yu Miao[1]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00, China

Abstract: As a nation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anghe Drum-and-Dance Yangko is one of the iconic folk dances in northern Shandong. This study takes ritual, artistry, and corporeality as its core dimensions to analyze the dance’s cultural essence. The bodily practices of Yangko embody the community’s veneration of strength and celebration of life, serving as an embodied expression of reg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ts original contexts of religious rituals and festive ceremonies have gradually diminished; however, through symbolic reconstruction, it continues to play a role in fostering community cohesion. From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the visual impact of Drum-and-Dance Yangko gives it unique advantages in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and new-media dissemination, yet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etachment from its original context, the theatricalization of its physical techniques, and standardization.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maintaining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ritual–art–body” triad is crucial for preserving its cultural authenticity. On the basis of safeguarding its core cultural el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forms and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needs.

Keywords: Shanghe Drum-and-Dance Yangko; rituality; artistry; corporeality

作者简介：于淼（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与文化传播。

商河鼓子秧歌以雄浑鼓乐、刚劲舞步和恢弘阵式著称，被视为北方汉族男性舞蹈的典型形态。当地俗称“跑十五”，在每年元宵节时段展演，集歌舞、扮饰、阵列于一体，是区域性年节民俗活动的主要形式。2006 年，商河鼓子秧歌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得到正式确认。

当前，受城镇化推进、传承人老龄化、传统仪式场域缩减等影响，秧歌的原生传承环境持续收缩。在舞台化、赛事化改编中，其原有的仪式内涵与身体技艺也出现简化、符号化等问题。既有研究多侧重历史梳理、形态记录与保护对策，对其“仪式行为—身体艺术—文化符号”的整体性结构阐释不足，对当代传播价值的系统研究仍较薄弱。

本研究以“仪式—艺术—身体”为思路，解读商河鼓子秧歌的文化构成与传播逻辑，探寻其活态传承路径，为非遗保护与传播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1 从描述到阐释的商河鼓子秧歌研究

早期研究（如《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卷》）[1] 对商河鼓子秧歌开展了基础性整理，完整记录其源流脉络、角色构成（鼓、伞、棒、花、丑）、典型动作（蹲扑步、劈鼓子）、伴奏曲牌与常用阵式（十字街、八卦连环），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框架。非遗保护工作推进以来，研究重心转向传承实践与对策路径。（张涵硕，2024）[2]，围绕传承主体断层、校园传承模式、数字化记录与传播等现实议题，分析当前保护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在艺术价值探讨上，研究者（赵彤彤，2024）[3]多聚焦其“以圆为美”的审美特质及地域风格成因。部分学者（刘晓真，2012）[4]将研究拓展至社会文化领域，揭示秧歌与乡土社会结构、春节礼俗、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为仪式属性研究提供了初步方向。

1.2 仪式理论解码秧歌的文化逻辑

人类学理论为解读商河鼓子秧歌的仪式属性提供了关键分析路径。范热内普提出的 “过渡礼仪” 模型指出，人类仪式普遍遵循“分离—阈限—聚合”的三段式结构[4]。维克多·特纳在此基础上深化了对阈限阶段的解释，认为阈限状态下日常社会结构暂时悬置，群体内部易形成平等交融的共同体经验；其“社会戏剧”理论进一步揭示，仪式能够调解社会矛盾、修复社区秩序[5]。

借助这些理论，我们可对商河鼓子秧歌展开审视：其传统的“串村”表演是否构成一套完整的仪式进程？其中蕴含着哪些阈限体验与社会整合功能？鼓、伞及特定阵图等核心符号又承载着怎样的宇宙观或社会隐喻？

1.3 身体理论打开秧歌的意义之门

身体并非仅是舞蹈的工具，更是意义生产与文化铭刻的场域。梅洛庞蒂的“具身化”哲学认为，身体是人类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基础[7]；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则强调，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会塑造出持久且可迁移的身体倾向与行为模式，身体由此成为社会结构内化的载体[8]。在舞蹈人类学领域，学者们关注“身体技术”的习得与传承，以及舞蹈如何借助身体动作、韵律与空间运用来表达情感、身份与世界观。 运用这一视角审视商河鼓子秧歌可见，其“蹲扑”“抡臂”等刚猛有力的动作，绝非单纯的技术呈现，更可能是鲁北农耕民族力量崇拜与坚韧品格的具身化表达，是特定地域“惯习”的体现。而身体在集体阵图变换中的协同配合，亦在建构着社区的秩序感与凝聚力。

2 仪式场域中秧歌的文化根脉与神圣维度

2.1 传统仪式进程

商河鼓子秧歌的核心精神植根于鲁北传统仪式体系，其源流与当地农耕祭祀、自然崇拜及祖先信仰深度绑定。古代官方以祭祀礼俗维系社会秩序，而鲁北乡村礼俗则由族长主持，于正月初七在祠堂、寺庙举行祭神拜祖仪式，伴以渔、读、耕、樵类程式化表演，仪式氛围肃穆庄重。元末明初，外来移民迁入带来多元文化，推动商河鼓子秧歌形成丰富的艺术形态与表演特色。其核心表演场域传统上紧扣农历春节，形成一套富含象征的仪式进程：

1.“起秧歌”与请神：表演前，常在本村祠堂或特定场地举行简单仪式（如焚香、叩拜），以示对祖先或神灵的敬意，宣告脱离日常秩序。

2.“串村”行进：秧歌队按既定路线前往邻村表演。行进本身具有巡游、驱邪的象征意义。队伍前列的“探马”负责联络、开路，维持仪式空间的秩序。村口相遇时的特定礼节（如互致问候、阵图展示），强化了村际联系。

3.场地表演：在对方村落的开阔场地（如打谷场）进行核心表演。鼓，其声如雷，传统上被

认为能驱邪避祟，沟通天地人神，是力量与秩序的象征。伞不仅是领舞标志，更隐喻着庇护、权力或天穹。严谨变换的阵图（“力杀四门”、“八卦连环”等），不仅是视觉艺术，更可能模拟宇宙秩序、军事布阵或象征祛除邪祟的“法力场”。角色扮演暗含社会角色分工与和谐理想。此刻，日常等级暂消，社群在鼓声舞步中融为一体，体验着特纳所说的“共睦态”。

4. 收场与回村：表演结束，接受东道主馈赠（烟糖等），有序离村。回村后可能再次简单致谢神灵祖先，标志仪式完成，回归日常。这一完整进程，清晰地体现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模式，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集体展演祈福禳灾、强化社区认同、调节村际关系、宣泄情感、迎接新春。

2.2 当代仪式场域变迁与调适

城镇化进程中，商河鼓子秧歌依托春节串村的传统祭祀语境不断弱化，以驱邪、祭祖为核心目的的原生表演场景持续缩减，但其仪式性并未消失，而是发生了结构性转化。在表演层面，舞者依托鼓、伞、道具与传统动律，以身体叙事完成情感表达与精神释放，替代了原有的祭祀宣泄功能。其社会功能转向文化整合与公共娱乐，文化节、非遗展演、赛事成为主流展演空间。鼓、伞、阵图等核心符号的宗教内涵逐渐淡化，转而成为地域文化认同、集体力量与团结精神的文化标志。现代展演通过规范流程、强化仪式氛围与公众参与，重构了当代仪式感，延续了其凝聚社群的文化作用。理解仪式维度的这种存续与转化，是把握鼓子秧歌文化精髓的关键所在。

3 身体实践：技艺、情感与认同的具身化

3.1 身体技艺：力量与控制的锻造

秧歌的核心魅力在于其独特且高要求的“身体技术”。“鼓子”以“蹲”“跳”“转”为根基，这是对舞者的下肢力量、核心稳定性、爆发力及耐力要求极高。正如老艺人所言：“没三年功夫，练不出‘沉’劲和‘狠’劲。”这种“沉稳健硕”的体态，正是鲁北农耕民族坚韧、有力、务实精神的直接体现。 “伞头”的掌控同样关键。执伞者需引领全队完成复杂阵图，其旋转、顶压、拧身等动作，对平衡感、空间方位感与身体协调性要求严苛，而伞的舞动亦是权威与智慧的象征表达。 鼓子秧歌技艺传承依赖师徒口传身授与长期身体练习，通过反复模仿、纠正与肌肉记忆累积，将动作模式、发力方式及节奏感内化为“习惯”，这一过程本身即是身体规训与文化内化。

3.2 身体叙事：情感与象征的表达

身体在商河鼓子秧歌中绝非简单的机械运动，而是承载着丰富情感与文化意涵的叙事媒介，每一个姿态、每一次律动都在诉说着深沉的集体记忆与生命体验。

情感共振的力量在秧歌表演中体现得尤为震撼。鼓子们整齐划一、雷霆万钧的跺地、扑跃、抡臂，直观地宣泄着豪迈、奔放、欢腾甚至抗争的集体情绪。鼓点的急促与舒缓、身体的刚劲与灵动形成奇妙的呼应，当数十名舞者的动作与鼓点严丝合缝时，便会产生排山倒海的情绪冲击波，形成强大的情绪感染力，使舞者与观众沉浸于一种激昂亢奋的集体氛围中。

特定身体姿态与动律蕴含文化密码。“蹲扑步”的沉稳象征扎根土地的坚韧，向上腾跃隐喻生命勃发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为显著的是群体动作的高度一致：数百人步伐与姿态统一，其撼人力量不仅是表演默契，更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肉身宣言。

此外，男性角色（鼓子、伞）的刚猛主导与女性角色（花扇、彩绸）的灵动辅助，悄然映射传统社会性别期待，使身体成为文化规范的鲜活载体。

3.3 身体经验与地方认同

参与商河鼓子秧歌，绝非简单的技艺展示或娱乐活动，而是一场深刻的身体实践，它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个体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在日复一日的舞动中，悄然塑造着强烈而独特的地方认同感。

对于本地人，尤其是参与者而言，掌握秧歌技艺、参与集体展演，是将“商河人”身份内化于身体的过程。那种独特的发力方式、节奏韵律、集体舞动的热血沸腾感，成为区别于他者的身体标记。

身体记忆与归属感，则在时光流转中沉淀为情感的锚点。秧歌活动（尤其是童年参与的记忆）构成重要的“身体记忆”。这种记忆与特定的乡土气息、乡音、节庆氛围紧密相连，成为个体情感结构中关于“家乡”的核心组成部分，滋生出深厚的文化归属感和自豪感。身体，成为了地方文化认同最直接、最感性的载体。

4 艺术维度：形式之美与价值呈现

4.1 形式美的核心要素

刚劲雄浑的舞蹈风格是其最鲜明的艺术标签。以男性“鼓子”为主体的舞蹈，动作强调“蹲、扑、抡、跺”，发力刚猛，幅度开阔，重心低沉，步伐扎实，展现出一种顶天立地、不可撼动的阳刚之美和力量之美。这种风格迥异于南方秧歌的柔媚或胶州秧歌的灵巧，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地域辨识度。

顾名思义，“鼓子秧歌”自然少不了“鼓”。鼓是秧歌的灵魂。观众欣赏鼓子秧歌，无不为其伟岸气质和英雄气势所折服，大有跃跃欲跳之感。鼓和其他乐器相配合，敲出的鼓点准确，节奏鲜明，鼓声隆隆，可谓是震耳欲聋，在整个舞队边沿过程中，鼓点贯穿前后，带动舞者的舞姿和气氛，表现出山东大汉的那种气势磅礴，强健有力[9]。舞者的跺地、扑跃、抡臂等动作，皆与鼓点严丝合缝，形成铿锵有力、引人激昂的韵律感。这种节奏不仅作用于听觉，更借由舞者的身体，强烈地传递至观者的视觉与体感层面，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秧歌的阵图是其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俗话讲“跑大圆，绕驳花，文武场子一笔画”，阵图千变万化，但多是围场跑圆，如同卷心菜。驳花意谓转身绕圆，复杂场图中驳花的数目难以看清，整个场图永远在流动，杂而不乱。外部围中跑圆，内部转身绕圆，中间偶尔变有“八趟街”的方阵，散发外圆内方的儒学特征。鼓子秧歌涵盖的一百零八种场图，便体现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认识观。

角色装扮（鼓子的头巾、彩带、健壮的体魄；伞头独特的服饰和罗伞；丑角的滑稽扮相）、道具（鼓、伞、棒）以及色彩运用（传统上多浓烈饱和的原色），共同构成了一套质朴、粗犷、富有乡土气息和象征意味的视觉符号系统，强化了艺术表现力。

4.2 多元价值的艺术承载

鼓子秧歌独特的舞蹈语汇、阵图、角色配置、表演程式，是研究鲁北地区乃至北方汉族民间舞蹈发展史、民俗变迁史的“活态标本”。通过其艺术形式，可以窥见历史上的社会生活、信仰观念和审美趣味。

鼓子秧歌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力量之美、阳刚之美、秩序之美、群体协作之美、生命律动之美。其粗犷豪放的美学风格，在当代艺术多元化的背景下，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震撼力。

作为文化符号，它是鲁北地域文化的核心代表和重要载体。其艺术形式中凝聚着当地民众的宇宙观（如阵图可能暗含的秩序观）、价值观（如崇尚力量、集体协作）、精神气质（如坚韧、豪爽、乐观），是地域文化认同的直观体现。

鼓子秧歌集体性、参与性强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社区凝聚和社会整合的有效机制。组织排练、共同表演的过程，强化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对维护乡土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其作为节庆艺术，也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5 当代传播策略

5.1 传播挑战

首先是仪式语境的剥离。舞台化、赛事化、旅游表演往往脱离其原生的春节“串村”仪式场域，导致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被简化为视觉奇观或竞技项目，内在意义难以被观众深刻感知。

其次是身体技艺的标准化与简化。为追求舞台效果或便于教学推广，可能导致部分高难度、体现核心力量风格的身体技艺(如极致深蹲的“扑步”）被简化或标准化，削弱其身体表达的独特性与震撼力。

再一个是传承群体老龄化与断层。核心技艺掌握者年龄偏大，年轻一代因生计、兴趣等原因，难以长期投入艰苦训练，高水平传承面临后继乏人的隐忧。

还有新媒体传播的浅表化。短视频易于传播片段化、高潮化的视觉内容(如震撼的阵图变换)，但难以承载其完整的仪式过程、历史背景和深层文化阐释，可能导致片面理解。

最后是文旅开发中的同质化与过度商业化风险。如何在旅游表演中避免流于形式，保持艺术水准和文化深度？如何防止文创产品设计低劣、脱离文化内核？需警惕对文化本真性的侵蚀。

5.2 传播策略

第一，要坚守本体，深度阐释。在各类传播活动中，必须同步进行深度文化解读。利用字幕、解说、纪录片、线上文章、VR/AR 导览等形式，讲清其仪式渊源、身体技艺的独特价值、阵图符号的象征意义、蕴含的精神内核，引导观众超越“看热闹”，实现“看门道”。在文旅项目中，设计融入文化讲解的深度体验环节。

传承与传播工作必须以保护其核心身体语汇和刚健雄浑的总体风格为前提。避免为迎合舞台或降低难度而过度简化、柔化动作。建立更科学的训练体系，平衡技艺传承与身体保护。

第二，要创新表达，拓展渠道。在文旅场景中，突破简单舞台表演模式。尝试在传统村落空间或仿古街区中，结合声光电技术，部分复原“串村”仪式感，设计包含起秧、行进、场地表演、互动等环节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并巧妙嵌入文化解说。商河鼓子秧歌的发展应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的优势，使信息在整个“媒介语境”下得以共享[10]。制作系列化、主题化的中短视频或直播，系统介绍其文化内涵。发起线上话题、直播连线老艺人、开发互动性小程序。

构建线上社区，利用社交媒体群组，连接爱好者、研究者、传承人，促进交流与知识共享。要深化教育传承，培育未来受众与传承者。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仅可以提高鼓子秧歌采集、保存及建档的效率，利用声像信息数码化，可以将动作技术展示、技术讲解等重要要素进行快速且高质量的收录，还能增加鼓子秧歌的社会关注度，以期达到更好的宣传与推广效果。

第三，要构建协同机制，激发内生动力。鼓子秧歌作为商河县体育非遗的重点保护项目，政府部门在推动非遗项目进校园过程中，应从实际出发，整合政府部门间的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应支持乡村或社区在传统节庆中恢复和开展秧歌活动，为其提供必要资源，包括场地、小额资助及老艺人指导等，这是维系其文化生命力的根本土壤。

要支持有影响力且善于表达的代表性传承人走向公众视野，通过媒体、讲坛及新媒体平台讲述秧歌故事，提升公众关注度。旅游开发项目必须坚持文化优先、品质至上的原则：表演团队需保持高水平，避免敷衍了事；文创产品设计应深入挖掘文化元素，追求美学品质与文化内涵的统一，杜绝低劣同质化产品。此外，还应探索“非遗+研学”“非遗+民宿”等深度体验模式。

6 结论

商河鼓子秧歌并非单纯的民间舞蹈表演，它承载着鲁北平原的厚重历史记忆，凝聚着乡土社会的精神气质，是身体、艺术与仪式交融共生的文化生命体。本研究通过“仪式—艺术—身体”三维视角，旨在穿透其外在形式，揭示内在的文化逻辑与价值核心。正是这三者的深度交融与相互建构——仪式赋予灵魂，艺术展现魅力，身体实现传达——共同构成了商河鼓子秧歌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而这一基因亦是其在当代社会彰显多元传播价值的根基。

但其传播与传承过程面临诸多阻碍。仪式语境的抽离、身体技艺的可能简化、传承群体的断层、新媒体传播的浅表化、文旅开发中的同质化风险等，均对其文化本真性与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坚守本体与创新传播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1]商文.商河的鼓子秧歌[J].台声,1996,(1):52.

[2]张涵硕.现实困境与纾困之道：商河鼓子秧歌民间传承状况的调查研究[D].哈尔滨体育学院,2024.

[3]赵彤彤.山东鼓子秧歌中“圆”文化的审美体现探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4.

[4]刘晓真.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从一个秧歌看当代中国民间舞蹈[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

[5]梁宏信.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述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6(04):98-103.

[6]陈建军.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3(03):100-105+111.

[7]代福平.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启示下的具身化体验设计思维初探[J].创意与设计,2020,(01):20-24.

[8]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146-150.

[9]黄锐.秧歌传说,共舞商河——探讨商河鼓子秧歌的特点及发展[J].大众文艺,2014,(05):38-39.

[10]王正伟.传播学视域下山东商河鼓子秧歌的价值开发与传承[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16):166-169.

[11]李卓玲,路帅.商河地区山东鼓子秧歌形态流变与民俗文化互构关系[J].山东艺术,2023,(04):79-86.

[12]刘晓真.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01):77-81.

[13]李莹.论汉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创新——以商河鼓子秧歌为例[J].戏剧之家,2023,(04):136-138.

基于 DeepSeek 的农业文本翻译提示词研究

徐月晨[1] 李平[1]

(1.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随着中国农业科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农业文本外译质量日益成为关键问题。本文以《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为语料、官方译文为参考，采用 DeepSeek 模型，比较四种提示词策略下的译文效果。研究发现，提示词工程能够明显提升农业文本翻译质量。其中，“角色扮演+少样本”策略在术语准确性和文体规范性方面表现最优，“角色扮演+思维链”策略有助于逻辑显化，但也存在术语创新风险。研究表明，提示词工程可为专业文本翻译提供有效优化路径。

关键词：提示词工程；大语言模型；农业文本；翻译

DOI：doi.org/10.70693/202610160468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Prompt Engineering on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Texts: A Case Study of DeepSeek

Xu Yuechen[1], Li Ping[1]

[1]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With China’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reasingly “going global,”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translation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aking Food Security in China as the corpus and its official English version as the reference, this study uses DeepSeek to compare the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of four prompt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mpt engineering can improve translation quality. The “role-playing + few-shot” strategy performs best in terminological accuracy and stylistic consistency, whereas the “role-playing + chain-of-thought” strategy strengthens logical explication but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termi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rompt engineering provides a practical pathway for optimizing professional text translation in agricultural contexts.

Keywords: prompt engineer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agricultural texts; translatio

作者简介：徐月晨(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大语言模型与翻译；
李 平(1971—)，男，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跨文化研究、林语堂研究。
通讯作者：李 平

1 引言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农业科技成果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农业科技“走出去”，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农业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选择，也是将中国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途径（石琨等，2024）。高质量外译由此成为农业知识国际传达的关键环节。

农业类文本具有信息型文本特征，重在客观、准确地传递专业知识与数据，因而呈现术语密集、语言规范、逻辑严谨等特点（刘玉琪等，2025）。译者不仅需完成双语转换，还应理解农业知识，确保译文忠实原文并符合国际学术与行业规范。农业技术海外推广本身也是复杂的跨文化实践，其效果取决于对目标语境和受众的理解（张雨薇等，2023）。因此，农业翻译涉及知识迁移、文化适应与话语建构。

当前，农业文本外译主要依赖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人工翻译质量较可控，但效率和成本压力较大；通用机器翻译在专业文本处理中，常因领域知识和语境理解不足而影响术语一致性、逻辑连贯性与文体适应性。近年来，以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路径。研究表明，精细化提示词工程（Prompt Engineering）可提升模型在特定领域任务中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樊景超，2025）。

提示词工程影响模型知识调用和专业译文生成。相关评测报告指出，大语言模型虽具潜力，但在复杂语言和文化意涵处理中仍有局限，使用者的专业判断与引导十分关键。这也说明，有必要系统考察提示词策略的翻译效果。

据此，本文考察提示词工程对大语言模型农业文本翻译质量的影响。研究通过设计并比较不同复杂度的提示词方案，从术语准确性、逻辑连贯性和语体风格三个维度分析模型输出，并与权威人工译文对照，以明确其适用边界和优化方向。

2 研究回顾

大语言模型依托大规模数据和算法训练，正在改变机器翻译范式。在通用翻译领域，Jiao et al.（2023）指出，GPT-4 在多语种翻译中表现突出，尤其能较好处理复杂句式和歧义。Robinson et al.（2023）也发现，大语言模型在高资源语言翻译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同时，业界开始研发垂直领域模型，如“天府智农 AI 大模型”，为农业科研与推广提供智能服务。这些发展为专业文本翻译带来新可能。

现有专业翻译研究较多关注文学文本（赵衍等，2024），较少涉及农业文本。相关研究显示，DeepSeek 等大模型在文化负载词处理与风格传达上优于传统机器翻译，但提示词工程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相对有限（张曙康等，2025）。科技翻译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法律、医学、金融等术语密集领域（杨锋昌，2023；王和松等；余静，2025）。Gao et al.（2023）表明，包含专业语境与术语的提示词可提升模型输出的准确性与规范性。

相比之下，农业科技文本的大语言模型翻译研究仍较不足。此类文本兼具专业性与地域性，涉及特定物种、技术和政策术语，亟需考察模型的适应机制与优化路径。

提示词工程已由实践技巧发展为重要研究方向。Brown et al.（2020）将常见提示方法概括为零样本提示（Zero Shot Prompting）、单样本提示（One Shot Prompting）、少样本提示（Few Shot Prompting）等。Wei et al.（2022）提出的思维链提示（Chain-of-Thought Prompting）通过引导模型生成推理过程，提升了复杂任务表现。

在翻译任务中，提示词效果具有明显领域依赖性。科技翻译中，领域语境有助于提升术语准确性（杨锋昌，2023）；文学翻译中，简单角色设定的效果有限，提示策略需更精细（张曙康等，2025）。总体而言，提示词可通过激活相关知识、控制输出风格影响模型翻译表现（White et al.，2023）。

3 实验设计

综合模型特点与语料专业性，本文选取国内主流大语言模型为实验对象，并以官方白皮书节选段落为翻译语料，以官方译文为参照进行比较。

3.1 模型选择

本实验选取 DeepSeek（基于混合专家模型架构）作为实验模型。作为国内开源人工智能系统，DeepSeek 具有较强的上下文语义理解和学习能力，可为农业文本外译提供技术支持。DeepSeek 体现了中国自主研发大语言模型在专业任务中的发展方向。该模型采用“混合专家”(Mixture of Experts)架构，兼具效率与专业适应性；相关研究显示，其在中文写作和翻译任务中具有较好的逻辑一致性和术语处理能力。

3.2 语料选择

实验语料节选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该白皮书约 1.2 万字，分为 6 部分，系统总结我国粮食安全成就，阐述粮食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原则和未来政策主张。其文本兼具官方政策视角和农业科技内容，适合作为农业文本外译研究语料。所选语料来自白皮书第二部分“中国粮食安全成就”第一小节的二、三自然段，主要涉及耕地质量提升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语言特征较为明显。

首先，文本包含较多专业术语，包括“三位一体”保护、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面源污染、轮作休耕等政策和技术表述，以及“4260 多万公顷”“每公顷粮食产量提高约 1500 公斤”等量化信息。这要求译文保持概念一致与政策内涵准确。其次，文本信息密集、逻辑严密。第二自然段中“实施……规划，推进……保护，建设……农田”构成连续行动链，段落结构由宏观战略延伸至具体布局，要求模型准确理解中文意义并以英文形式重构。再次，文本结构清晰。第三段描述农业布局时使用典型并列结构，如“加强建设……；形成……”等，要求模型既再现并列关系，又避免英文表达呆板。

3.3 提示词设计

提示词设计是本实验的核心。通过输入不同语言指令，模型可被引导生成更忠实、专业且符合规范的译文。合理的提示词不仅影响译文质量，也是验证提示词工程有效性的关键。

本实验采用四类提示词策略：零样本提示、角色扮演提示、“角色扮演+少样本”提示和“角色扮演+思维链”提示。四类策略由浅入深，分别对应任务指令、身份设定、示例引导和推理过程显化。

零样本提示是最直接的提示方式，即不提供示例，直接要求模型完成任务。提示词为“请把以下中文段落翻译成英文。”

该方式可快速激活模型基础翻译能力，适用范围较广，但对专业语境的约束有限。研究表明，零样本指令在处理专业文本时易出现语义漂移和句法解析偏差（Wei et al.，2022）。复杂长句中，这一问题尤为明显，因为模型缺乏必要的上下文和术语约束。

角色扮演提示通过设定特定身份或场景，激活模型中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语体特征，引导其生成更符合预期的输出。提示词为：“请以中国农业政策文件专业译员的身份，把以下中文段落翻译成英文。”

从技术原理看，DeepSeek 的 Transformer 架构依赖上下文语义线索进行预测，角色设定可视为一种“软约束”，使模型输出更贴近特定专业身份和知识背景。这一策略可追溯至“角色提示”理念，即角色设定会影响模型的语体选择和信息处理路径（Reynolds & McDonell，2021）。本实验中，角色扮演提示旨在强化模型的“农业政策文件专业译员”意识，引导其优先遵循专业表达和用词规范，提升译文的专业性。

少样本提示通过提供示例引导模型理解任务。Gao 等（2023）指出，领域特定示例可减少模型知识偏差导致的语义失真。“角色扮演+少样本”提示在角色设定基础上加入术语翻译示例，形成“身份约束+实例示范”的双重机制。提示词如下：

“请以中国农业政策文件专业译员的身份，把以下中文段落翻译成英文。

翻译示例：

原文：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0300 多万公顷。

译文：We have implemented a complete and speci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and designated more than 103 million hectares of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原文：有效解决了‘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等问题，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译文：The problems of ‘who farms the land’ and ‘how to farm the land’ have been effectively solv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角色设定提供宏观语体框架，少样本示例提供具体术语规范；二者结合可在激活领域知识的同时稳定关键术语译法。本实验中，该策略旨在强化模型的农业文本“专业记忆”，并在整体角色框架下保持译文连贯与规范。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4.1 术语准确性

DeepSeek 在术语翻译上整体较稳健，零样本提示下已能译出部分主要政策术语，但“角色扮演+思维链”提示有时会造成译文质量回落。

例 1：

原文：高标准农田

官方译文：high-standard farmland

DeepSeek1：high-quality farmland

DeepSeek2&3&4：high-standard farmland

对于“高标准农田”，DeepSeek1 译为

“high-quality farmland”，虽传达基本含义，却未充分体现“标准”的政策内涵。从角色扮演提示开始，模型修正为“high-standard farmland”，与官方译文一致，说明基础角色设定已能引导模型选择更准确的政策术语。

例 2：

原文：永久基本农田

官方译文：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Deepseek1&2&3&4：permanent basic cropland

对于“永久基本农田”，模型在四种策略下均使用“permanent basic cropland”，不同于官方译文“permanent basic farmland”。“cropland”更强调作物种植用地，“farmland”范围更宽。该译法虽与官方表述不完全一致，但并未明显损害专业准确性。

例 3：

原文：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官方译文：functional areas for grain production and protected areas for the produc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epSeek1：production zones for grain production functional zones and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epSeek2&3：grain production functional zones and protected areas for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DeepSeek4：production functional zones and protected areas for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在结构处理上，DeepSeek 呈现逐步改进。零样本译文“production zones for grain production functional zones”存在语义重复，显示模型未能准确识别“功能区”这一政策概念，可能将两个术语误解为“有关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保护区”。这说明缺乏明确引导时，模型解析中国特色政策术语仍有局限。

随着提示词优化，模型一致性有所提升。从角色扮演提示开始，译文统一为“grain production functional zones and protected areas for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较好区分“功能区”与“保护区”，并与官方译文较为接近。这表明适当角色设定能激活模型对政策术语的系统认知；从“major”到“important”的变化也体现出其对官方表述风格的适应。

但在“角色扮演+思维链”提示下，译文出现回落。模型将版本 2、3 中较接近官方译文的“grain production functional zones”简化为“production functional zones”，省略限定词“grain”，导致“粮食生产功能区”这一特定政策内涵被弱化，影响术语精确性。

4.2 句式结构与逻辑连贯性

对同一源文本的比较显示，提示词精细化程度与模型逻辑显化能力具有明显相关性。

例 4：

原文：加强建设东北稻谷、玉米、大豆优势产业带，形成黄淮海平原小麦、专用玉米和高蛋白大豆规模生产优势区；打造长江经济带双季稻和优质专用小麦生产核心区；提高西北优质小麦、玉米和马铃薯生产规模和质量；重点发展西南稻谷、小麦、玉米和马铃薯种植；扩大东南和华南优质双季稻和马铃薯产量规模。

官方译文：We have strengthened the superior industrial belt of rice, corn and soybean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formed a dominant area for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wheat, special corn and high-protein soybeans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 We are building a core area for the production of double-cropping rice and high-quality special whea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we are expanding the scal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quality wheat, corn and potatoes in Northwest China. In Southwest China we are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rice, wheat, corn and potatoes, and increasing the yield of high-quality double-cropping rice and potatoes in Southeast and South China.

DeepSeek1：We have stepped up efforts to build industrial belts in northeast China for competitive rice, corn, and soybean production, and formed large-scale production areas in the Huang-Huai-Hai Plain for wheat, special-purpose corn, and high-protein soybeans. We have built core production areas for double-cropping rice and high-quality, special-purpose wheat along the Yangtze Economic Belt. We have improved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wheat, corn, and potatoes in northwest China. We have focused on expanding the production of rice, wheat, corn, and potatoe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increased the yields of high-quality double-cropping rice and potatoes in southeast and south China.

DeepSeek2：Efforts have been intensified to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belts for rice, corn, and soybeans in Northeast China; form large-scale production advantage zones for wheat, specialized corn, and high-protein soybeans in the Huang-Huai-Hai Plain; build core production areas for double-cropping rice and high-quality specialized wheat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mprove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production for high-quality wheat, corn, and potatoes in Northwest China; prioritize the development of rice, wheat, corn, and potato cultiv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and expand the production scale of high-quality double-cropping rice and potatoes in Southeast and South China.

DeepSeek3： Efforts have been intensified to develop competitive industrial belts for rice, corn, and soybeans in Northeast China; form dominant production areas for wheat, specialized corn, and high-protein soybeans in the Huang-Huai-Hai Plain; establish core production areas for double-cropping rice and high-quality specialized wheat along the Yangtze Economic Belt; improve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production for high-quality wheat, corn, and potatoes in Northwest China; prioritize the development of rice, wheat, corn, and potato cultiv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and expand the production scale of high-quality double-cropping rice and potatoes in Southeast and South China.

DeepSeek4： •Northeast China: Strengthening competitive industrial belts for rice, corn, and soybeans

• Huang-Huai-Hai Plain: Establishing large-scale production advantage zones for wheat, specialized corn, and high-protein soybeans

•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Developing core production areas for double-cropping rice and high-quality specialized wheat

•Northwest China: Enhancing production scale and quality for premium wheat, corn, and potatoes

•Southwest China: Prioritizing development of rice, wheat, corn, and potato cultivation systems

• Southeast and South China: Expanding production capacity for high-quality double-cropping rice and potatoes

官方译文通过分句和时态变化构建逻辑层次，以“We have strengthened……”“We are building……”“We are expanding……”区分不同政策措施的进展状态。

DeepSeek1 在零样本提示下多用“We have……”并列句展开，保留了区域描述的独立性，但整体衔接不足，句式也较单调，各分句主要依靠语义关系维持连贯。

DeepSeek2 在角色扮演提示下采用分号连接六项并列政策，形成统一句式框架，较好保留原文并列结构和整体感。但句子过长，可能影响阅读流畅度。

DeepSeek3 在 DeepSeek2 基础上保留分号连接框架，并通过“develop”“establish”“improve”等动词变化增强节奏，使区域描述既相关联又各有侧重。

DeepSeek4 在“角色扮演+思维链”策略下采用列表式呈现，以排版组织逻辑，提升了信息检索效率，但削弱了原文的连贯语篇特征，使政策表述转化为较离散的条目。

例 5：

原文：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推广秸秆还田、绿肥种植、增施有机肥、地力培肥土壤改良等综合配套技术，稳步提升耕地质量。

官方译文：We have carried out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 fertilization, popularized the practice of returning straw to the field, green manure planting,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soil improvement and other supporting technologies, and steadi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DeepSeek1： We have promoted the use of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comprehensive support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returning straw to farmland, planting green manure crops, applying organic fertilizers, and cultivating fertility to improve soil, and have thus steadi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DeepSeek2 ： Comprehensive measures, including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straw returning to fields, green manure cultivation, increased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s, and soil fertility enhancement, have been promoted to steadily improve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DeepSeek3： We have implemented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while promoting integrated techniques such as straw returning, green manure cultivation, increased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s, and soil improvement to enhance land

fertility. These measures have steadily improved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DeepSeek4：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have been widely adopted, including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straw returning to fields, green manure cultivation, increased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s, and soil fertility enhancement. These integrated techniques have steadily elevated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官方译文采用并列谓语结构，通过“carried out……popularized……and steadily improved……”形成“动作 1+动作 2+结果”的线性叙述。技术项目以枚举方式呈现，结构工整，但逻辑关系主要依靠语义隐含。

DeepSeek1 通过“thus”显化手段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promoted the use of……”与后续技术项目列举在语法上不够平行，削弱了整体连贯性。

DeepSeek2 重构句式，采用“综合措施—目的”的结构，以“Comprehensive measures……have been promoted to……”突出整体行动与目标。该处理强化了技术项目的整体性，但改变了原文以具体动作为主导的叙述逻辑。

DeepSeek3 采用两句结构：第一句陈述具体行动，第二句以“These measures have steadily improved……”形成逻辑闭环。该处理既保持动作独立性，又强化措施与效果的关联。

DeepSeek4 进一步采用宏观两句结构：先概述“综合实践已被广泛采用”，再说明“这些技术提升了质量”。“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practices”与“These integrated techniques”形成词汇衔接，呈现“总体策略—具体内容—实际效果”的逻辑脉络。

4.3 文体风格

DeepSeek1 在“we have improved”与“more than 42.6 million hectares……has been created”之间切换，主体表达不够一致。DeepSeek2 统一采用被动语态和第三人称叙述，如“Comprehensive measures……have been promoted”，政策主体较为隐化，更接近国际组织报告文体。DeepSeek3 使用“we have”的第一人称复数叙事，与官方译文模式一致，建构了政策发布者主体身份。DeepSeek4 采用项目符号列举区域布局，信息清晰度较高，但与传统政策文件的连贯语篇风格存在差异。

总体看，DeepSeek 由零样本提示下较松散的句式，逐步转向平行结构、复合句和介词短语等政策文本常用表达，显示出对政策文件修辞特征的适应。

5 结论与启示

实验表明，提示词工程对农业政策文本翻译质量具有明显影响。角色扮演提示可激活模型的“专业译者”认知，使输出更接近政策文本正式语体；少样本提示通过示例统一关键术语和句式；思维链提示则增强逻辑显化与信息重组能力。

复合策略中，“角色扮演+少样本”提示在术语一致性与语体规范性之间较为均衡，适用于官方政策文件翻译；“角色扮演+思维链”提示更利于逻辑显化和结构重组，适合学术型或综合型政策分析文本。这说明提示词工程不仅影响语体风格，也会介入模型的信息处理路径。

基于实验结果，本文提出两点实践原则：一是通过明确角色设定限定任务边界，激活领域知识结构；二是嵌入 2—3 个少样本示例作为术语案例与句式模板，减少关键概念译法波动。

本实验仍存在局限。首先，提示词类别尚未充分细化，未来可考察更复杂提示结构对译文逻辑层级的影响。其次，语料样本限于单一政策文本，后续需扩展至多文体农业文本。第三，评估主要依赖人工分析，可引入 BLEU、ROUGE 等量化指标。第四，模型范围限于 DeepSeek，尚需纳入 ChatGPT、Claude 等模型，以检验提示词策略的跨模型迁移性。最后，后续可构建动态提示库，推进提示词优化框架的系统化。

本文验证了提示词工程在农业政策文本翻译中的有效性，揭示了复合型提示策略的优势。随着多模型验证、多语料拓展和量化评估体系完善，提示词工程有望为农业科技信息国际传播提供更稳定的智能化支持。

参考文献：

[1] 石琨，王植，时朝. 我国农业科技“走出去”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24，26（11）：1-6.

[2] 刘玉琪，王珍. 傅兰雅读者意识对中国农业术语外译的启示[J]. 中国科技术语，2025，27（05）：65-67.

[3] 张雨薇，田牧野. 治理剧场视野下中国农技推广海外实践的创新机制研究——基于中坦农

技合作项目的田野观察[J]. 中国科技论坛，2023，（11）：179-188.

[4] 樊景超.大模型驱动水稻种质文本挖掘提速[N/OL]. 中国科学报，2025.

[5] Jiao, W. et al. Is ChatGPT a Good Translator? Yes with GPT-4 as the Engine[EB/OL]. 2023. arXiv:2301.08745.

[6] Robinson, N. R. et al. ChatGPT MT: Competitive for High- (but not Low-) Resource Languages[EB/OL]. 2023. arXiv:2309.07423.

[7] 赵衍、张慧、杨祎辰. 大语言模型在文本翻译中的质量比较研究——以《繁花》翻译为例[J]. 外语电化教学，2024，（04）：60-66+109.

[8] 张曙康、赵朝永. 大语言模型之于文学翻译的适切性研究——基于多指标评估的《边城》多模型译文质量对比[J]. 中国翻译，2025，22（04）：85-95.

[9] 杨锋昌. ChatGPT 对译员的思考与启示——以越南语法律翻译为例[J]. 中国科技翻译，2023，36（03）：27-30+4.

[10] 王和松、马柯昕. 人工智能翻译应用的对比研究——以生物医学文本为例[J]. 中国科技翻译，2023，36（03）：23-26.

[11] 余静. DeepSeek 翻译能力探索——以文学文本与金融类文本为例[J]. 中国翻译，2025，46（03）：172-179.

[12] Gao, Y. et al. How to Design Translation Prompts for ChatGPT: An Empirical Study [EB/OL]. 2023. arXiv:2304.02182.

[13] Brown, T. B. et al. Language models are few-shot learners[A].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C]. 2020, 33: 1877-1901.

[14] Wei, J. et al. Chain-of-Thought Prompting Elicits Reasoning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C]. 2022.

[15] White, J. et al. A Prompt Pattern Catalog to Enhance Prompt Engineering with ChatGPT[A]. Proceedings of the 56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C]. 2023.

[16] Reynolds, L., & McDonell, K. Prompt Programming for Large Language Models: Beyond the Few-Shot Paradigm. In Extended Abstracts of the 2021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1–7).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21.

VR 技术融合环境美学的海洋文化体验空间设计以及体验研究

袁荣辰，钟丽漫，秦世骏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在海洋文旅数字化转型与生态修复成果公众传播需求并进的背景下，虚拟现实技术为海洋文化空间的体验重构提供了新的媒介路径。本文以日照市海龙湾——我国首个“退港还海”生态修复工程所形成的滨海空间为研究对象，探讨 VR 沉浸式展示如何在环境美学框架下实现海洋文化体验空间的叙事组织与感知增强。研究构建了“环境审美引导—空间叙事嵌入—多感官交互响应”的体验空间设计逻辑，将海龙湾的生态变迁叙事、渔文化符号与滨海景观特质转化为可体验的虚拟空间结构。在用户体验评估层面，结合环境美学感知与沉浸体验理论，从审美沉浸、文化认知与场所情感三个维度建立评价框架。结果表明，以环境美学为组织线索的 VR 体验空间能够有效增强用户对海洋文化空间的审美投入与场所认同，为滨海型文化遗产空间的数字化展示提供可参照的设计思路。

关键词：虚拟现实；环境美学；沉浸式体验；海洋文化；体验空间；用户体验

DOI：doi.org/10.70693/202610227265

Design and experiential research of marine cultural experience spaces that integrate VR technology with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Rongchen Yuan, Liman Zhong, Shijun Qin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rine cultural tourism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public dissemin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utcomes, virtual reality (VR) technology offers a new mediatory pathway for reconstructing the experience of marine cultural spaces. Taking Hailong Bay in Rizhao—a coastal space formed by China‘s first “returning port to sea”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VR immersive display can realize narrative organization and perceptual enhancement of marine cultural experience spaces within a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framework. The study constructs a design logic of “aesthetic guidance—narrative embedding—multi-sensory interaction,” translating Hailong Bay’s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narrative, fishing culture symbols, and coastal landscape qualities into an experienceable virtual spatial structure. For user experience evaluation,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is established across three dimensions—aesthetic immersion, cultural cogni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drawing 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perception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theor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VR experience space organized arou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users‘ aesthetic engagement with and place identity toward marine cultural spaces, offering a referable design approach for the digital display of coastal cultural heritage spaces.

作者简介：袁荣辰 (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钟丽漫 (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秦世骏 (200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mmersive Experience; Marine Culture; Experience Space; User Experience

一、引言

海洋文化空间的展示长期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其核心价值往往附着于潮汐、光线、尺度与生态过程所共同塑造的场所氛围之中，而常规展示手段难以将这种氛围从地理现场中抽离并传递给不在场的受众。日照市海龙湾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一处具有生态修复示范意义的滨海空间，又是一处承载港口记忆与渔文化脉络的文化场所。2024 年景区开放后，海龙湾依托 1882 米修复岸线与 46 万平方米新增沙滩，迅速成为日照滨海文旅的重要节点。然而，其生态价值与人文内涵的传播仍主要依赖到场体验，受众覆盖的广度与深度均受限于地理可及性。

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了一种将“场所氛围”转化为“可体验媒介”的可能。既有研究多聚焦于 VR 在文博场馆或历史建筑中的空间还原，较少讨论以“环境审美”为核心组织逻辑的海洋文化空间展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当环境美学不再作为展示的装饰性维度，而是成为体验空间的结构性原则时，VR 展示系统应如何组织空间、叙事与交互，才能生成具有文化厚度的场所体验。

二、海龙湾作为海洋文化体验空间的场所特质

（一）生态变迁叙事中的审美张力

海龙湾的场所意义建立在一次剧烈的空间转型之上：从煤尘飞扬的港口堆场到水质达国家最高标准的生态岸线，其景观变迁本身构成了一种具有叙事张力的审美对象[1][2]。这种张力不在于“新旧对比”的简单修辞，而在于同一地理坐标上两种空间秩序之间的断裂与弥合。VR 体验空间的设计若仅呈现修复后的“金沙滩”景观，便错失了这一场所最核心的叙事资源。因此，本研究

将“变迁”而非“现状”作为空间体验的起点，在虚拟环境中保留港口记忆的片段性痕迹——如栈桥结构的抽象化再现、煤堆场几何轮廓的隐约残影——使审美体验同时包含对空间命运的感知。

（二）渔文化符号与环境感知的融合

日照海洋文化的活态传承以岚山渔民号子、渔民画等非遗形式为重要载体[2]。这些文化符号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原本嵌入于具体的劳作节奏与海洋环境感知之中，而非独立存在的“展品”。在海龙湾的 VR 体验空间中，渔文化元素不宜以标签化方式陈列，而应作为环境感知的构成要素介入：号子的节奏可以转化为空间声场的低频脉动，渔民画的高饱和度色彩可以作为特定空间节点的视觉调性参照，使文化符号服务于整体环境氛围的营造而非游离于体验之外。

（三）滨海景观的审美感知结构

环境美学研究提示，海洋景观的审美体验并非单一视觉判断，而是包含色彩连续性与空间开阔感的复合感知[3]。海龙湾 270°环幕海景的空间特质，意味着其 VR 再现需要处理“开阔性”这一感知品质的传递问题。与封闭建筑空间不同，海洋空间的沉浸感更多依赖天际线的纵深控制、海面材质的动态变化以及光线在水平面上的反射行为。这要求体验空间的环境设计以“水平延展”而非“垂直聚焦”为组织原则。

三、环境美学导向的 VR 体验空间设计

（一）审美线索驱动的空间序列组织

区别于以功能分区或叙事章节划分空间序列的常规做法，本研究以审美感知的变化节奏作为空间组织的底层逻辑。海龙湾体验空间被划分为三个感知阶段：收束—释放—内化。入口空间以低照度、窄视野和压缩的声场制造感知收束，呼应港口堆场时期的封闭记忆；进入主体验区后，空间尺度骤然释放，水平向的海面与天空占据视野主体，光线强度与色彩饱和度同步提升；在体验末端，空间再次收拢，但方式从“压迫”转为“沉静”，声场引入低频海浪余韵与号子旋律的碎片化回响，使审美体验从感官刺激转向情感沉淀。这一序列不依赖文字提示或路径强制，而是通过环境参数的变化引导用户的行为节奏[4]。

（二）海洋文化符号的体验化转译

渔文化元素在体验空间中的介入遵循“感知优先于认知”的原则。岚山号子的呈现不采用录音播放加文字说明的方式，而是将其节奏结构提取为空间声场的组织参数：号子的重音节拍与虚拟环境中海浪拍岸的周期形成相位对位，使用户在听觉层面首先感受到一种“劳作节奏与自然节

奏的对话”，随后才在特定交互节点获得关于号子文化背景的信息触发。渔民画的色彩体系则被转译为空间光环境的调色依据：主体验区的辅助光源色温与饱和度参照渔民画中海洋蓝与沙滩金的典型配比进行设定，使文化符号以环境属性的方式被感知而非被“阅读”[5]。

（三）多感官协同的环境沉浸机制

在视觉层面，海面材质的实时渲染重点处理两个变量：太阳高度角变化对海面反射率的影响，以及近岸浅水区与远海深水区的色彩梯度过渡。这两项参数直接关联用户对“海洋真实性”的判断。在听觉层面，空间声场按距离分层：近场为浪涌拍击与风声的细节，中场为海鸥鸣叫与远处船笛的间歇性出现，远场为持续的低频海洋环境噪声。交互反馈则被设计为环境响应而非界面响应：用户靠近特定区域时，光线角度或声场平衡发生微妙偏移，而非弹出信息面板。这种“环境应答”式的反馈机制旨在维持审美注意的连续性，避免交互行为打断沉浸状态[6]。

四、用户体验评估框架与设计验证

（一）评价维度的环境美学转向

既有 VR 文化遗产体验评价多沿用“沉浸感—交互性—认知度”框架[7]，这一框架对海洋文化空间而言存在一个盲区：它难以捕捉审美体验本身的品质差异。本研究在保留认知维度的基础上，将“沉浸感”细化为审美沉浸，指用户被环境的形式品质（光线、色彩、尺度、声景）所吸引并持续投入注意的程度；同时引入场所情感维度，衡量用户在体验过程中产生的与海龙湾特定场所记忆相关的情感联结。评估采用行为观察与结构化问卷相结合的方式[8]，行为数据关注用户在水平视野区的停留时长与视角扫视模式，问卷则针对审美愉悦、文化理解与情感唤起三个子维度收集主观评分。

（二）设计验证与初步发现

在初步测试中，体验空间的环境参数设置经历了两轮调整。第一轮测试发现，主体验区的视觉信息密度过高，用户在进入释放阶段后频繁触发信息热点，导致审美注意被反复打断。据此，研究将认知触发机制从“区域进入即触发”改为“停留时长阈值触发”，即用户在同一审美焦点区域持续注视超过设定时长后，文化信息才以低侵入方式呈现。第二轮测试中，用户在水平视野区的平均停留时长较第一轮增加约三成，主观反馈中“不想被打断”类表述的出现频率显著下降。这一调整印证了环境美学导向的设计原则：在海洋文化体验空间中，信息呈现的克制程度本身就是体验品质的构成要素[9]。

五、结语

本文以日照市海龙湾为对象，探讨了环境美学作为组织性原则介入 VR 海洋文化体验空间设计的方法路径。研究的基本判断是：海洋文化空间的展示难点不在于信息的匮乏，而在于场所氛围的不可搬运性。VR 技术的价值不在于“复制海龙湾”，而在于将海龙湾的环境审美结构——变迁的张力、水平性的开阔、渔文化节奏与海洋节律的嵌合——转化为一套可体验的空间参数系统。当环境美学从装饰性维度上升为结构性维度，体验空间便有可能在用户离开头显之后，仍留下对某个场所而非对某项技术的记忆。这一思路对滨海型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具有参考意义，但其有效性仍需在更大样本与更长体验周期的条件下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邵铁政，王立强. 退港还海工程中人工沙滩稳态设计方法——以日照海龙湾为例[J]. 水运工程，2023(8)：156-162.

[2]刘丽洁，刘献琦，王飞达，等. 山东日照：潮声新韵 向海而歌[N]. 新华网，2025-09-29.

[3]Wilson T. Exploring the role of aesthetic values in the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of marin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in Nova Scotia[D]. Halifax: Dalhousie University, 2023.

[4]宁允涛，李娜. 海洋主题数字科普展馆的沉浸式体验设计策略[J]. 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26，12(1)：45-52.

[5]王懿伦，张惠元. 中国公共文化空间的沉浸式体验研究：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为例[J]. 地域与文化，2024，11(2)：135-151.

[6]叶之声. 博物馆 VR 大空间沉浸式探索展的文化记忆激活机制研究——基于建构主义、具身认知与空间叙事的思考[J]. 中国博物馆，2026(2)：101-109.

[7]朱宇婷. 基于 VR 技术的文化遗产沉浸式展陈设计研究——以繁昌窑为例[J]. 鞋类工艺与设计，2026，6(12)：74-76.

[8]王晓杰. 多模态交互理论下红色文化场馆沉浸式体验装置设计[D]. 大连：大连交通大学，2025.

[9]周俞彤. 数字媒体技术赋能建筑空间交互体验研究[J]. 陶瓷，2026(3)：154-156.

共和何以失守：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的动员机制及政治转折

武欣悦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摘 要：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在反对专断、维护共和的政治诉求上存在连续性，但两次行动所凭借的社会联盟与地方政治条件并不相同。辛亥时期，各省地方军事力量、革命党人、立宪派及绅商团体因反清目标而形成暂时联合；至 1913 年，围绕民初政争与战争风险，各方态度趋于分化，地方军政系统亦难以再次统一行动。列强对华政策及中央财政能力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二次革命的失败并非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否定，而是揭示了废除帝制之后，共和制度仍须解决政治权威、地方利益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地方政治；社会动员；共和制度

DOI：doi.org/10.70693/202610164109

Why Did the Republic Falter? Political Mobilization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the Second Revolution

Wu Xinyu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Second Revolution of 1913 both used armed uprisings and provincial independence, yet ended differently. Why could the coalition that overthrew the Qing not be mobilized again against Yuan Shikai? Examining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provincial military politics and diplomatic record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pposition to the Qing briefly united disparate local actors in 1911. In 1913, merchants increasingly prioritized stability, provincial leaders disagreed over resistance, and foreign powers acte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contrast marks a change in the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rather than the disappearance of republican aspirations. The Second Revolution exposed the difficulty of transforming an anti-dynastic coalition into institutions able to manage conflict within a republic.

Keywords: Revolution of 1911; Second Revoluti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provincial politics; republican institutions

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相隔不过两年，却有迥异的结局：前者由武昌起义发展为多省独立，促成清朝统治的终结；后者虽仍以各省起兵为主要形式，却在短期内相继受挫。两次革命的参与者有相当的重合，政治语言也都与“共和”相联系。这便提出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何以辛亥时期足以动摇中央统治的力量，到了 1913 年却难以重新联合？若仅以革命党人的军事准备不足解释失败，便难以说明绅商、地方官员和新军将领态度的变化；若把二次革命视为辛亥革命的必然延续，又容易忽视民国建立后政治环境已经改易。本文所谓“转折”，并非指革命理想与参与群体一夕改换，而是指同一批政治力量所处的制度位置、利益关系和动员条件发生了变化。考察这种变化，须把两次革命置于清末地方权力扩张及民初中央权威重建的连续过程之中，并辨明政治主张、地方行动与社会回应之间的距离。

据此，两次革命的关系便不能只用“延续”或“断裂”裁断。以 1913 年的失败倒推 1911 年的胜利，容易将辛亥时期的临时联合写成各阶层的共同意志；反过来，若单凭领袖与旗帜的相似证明连续性，又会遮蔽民国成立后的权力重组。

作者简介：武欣悦，女，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瞿骏从“向前看”与“向后看”思考二次革命，提示我们既要追索辛亥留下的政治关系，也应避免以事后结局代替对当时选择的解释。①

一、从反清联合到反袁分歧：社会动员基础的变化

辛亥革命的迅速扩展，不宜简单归结为革命党人独立完成的政治动员。清末新政以来，新军、咨议局、商会及各类学会逐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铁路经营与地方财政又使绅商群体同清廷的政策发生更直接的利害联系。1911 年铁路国有政策及其所引发的保路风潮，集中显露了中央决策与地方权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武昌起义固由新军发动，但起义消息传播以后，决定各省能否响应的，往往还有地方军队的取向、旧官僚的应对与社会团体的合作。

地方组织能够在辛亥之际进入政局，与清末地方治理事务的扩张有关。商会处理商务纠纷，社会团体协助治安，绅商参与铁路筹资与地方公议；这些原本分属不同事务的网络，因政局震荡而成为政治资源。它们可以影响地方对清廷的态度，却未必认同革命党人的全部纲领。所谓广泛动员，不应仅指革命宣传的传播，更在于革命派能够争取既有组织配合，共同完成政权更替。

从当时报道看，部分城市民众对清廷统治的终结抱有相当期待。《申报》记上海民众闻革命军获胜而喜形于色②，《时报》亦记南京居民欢迎革命军入城。然而，报刊所见主要是城市及其可见的政治活动，不能据之推定城乡各阶层均已形成一致的革命意识。辛亥革命的动员范围之广，首先体现为性质不同的社会力量得以在反清目标下暂时汇合，而非它们在政治制度与社会改革问题上已有共同安排。这种联合在上海、广东尤为可见。上海商团参与地方光复并维持治安，时人事后曾将城市秩序的恢复归功于商团；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则须与商界协商营业恢复和纸币流通事宜，以取得新政权运作所需的信用与财力。③商会在此并非革命党的附属组织，其参与固有支持改朝换代的一面，也包含维系商贸、地方治安和财产权的现实考虑。正因为目标存在交集而并非完全一致，这种合作既可能推动政权更替，也潜藏着日后意见分歧的条件。

革命力量的构成亦不限于省城政治团体。广东各地会党与民军在武昌起义后纷起响应，《神州日报》形容其势“如麻而起”。④它说明地方社会存在不依赖正式政党组织的武装资源，却不能据此把所有民军都视作受革命党统一指挥。新军、民军、绅商与官僚在反清时能够并行行动，既是辛亥革命得以扩展的条件，也意味着新政权成立后必须重新协调彼此关系。这种联合亦有其限度。革命党人争取民军、商会支持，以扩大反清阵营；绅商接纳军政府，又意在减少政权变动对地方秩序的冲击。双方达成的是现实局势下的最低共识，而非关于共和国权力分配的完整安排。清廷退出后，军队统属、地方财政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仍须重新协调。反清目标曾暂时掩盖的分歧，于是渐次成为民初政治的现实问题。

1913 年，原有联合的政治前提已经改变。辛亥时期可以相对明确地指向清廷的反清，至民初却转化为对袁世凯政府权力运用、国会地位和地方自治权限的不同判断。宋教仁遇刺及政治责任追究受阻，促使孙中山等人倾向武力讨袁；与此同时，也有政治人物和地方士绅担忧再启战端将破坏初建的秩序。不能把后一立场一概解释为拥袁，更不能据部分商会反战的通电，就断言整个工商阶层“集体背离”共和。上海地方绅商李平书的态度颇能说明这一差别。陈其美希望借助其在辛亥时期的社会关系，李平书却称“今年之事，地方不赞同，非上年可比”，并劝其勿轻举妄动。⑤这并非对革命原则作抽象表态，而是把 1913 年的政治冲突与 1911 年的地方处境明确区分开来。上海商界及教育团体倡议通电息兵，所陈理由亦着重商务恢复与社会安定。⑥在他们看来，王朝覆亡之后，现实的政治问题已不只是应否推翻旧政府，还有如何避免战争重起、使营业与日常秩序得以持续。

广东的情形亦可见出这种关系的变化。辛亥光复后，广东军政府曾倚赖商会协助恢复营业、维持纸币流通，革命党人与商界因而有过实际合作。至 1913 年，陈炯明决定响应讨袁时，部属意见不一，商界对再起战事亦有异议。据《民国二次革命史》所载，香港和广州若干行业人士曾

① 瞿骏：《“二次革命”的“向前看”和“向后看”》，《近代中国》，2023 年第 2 辑。

②《鄂乱影响》，《申报》，1911 年 10 月 24 日，第 18 版。

③《不能不归功于商团》，《时报》，1913 年 1 月 6 日，第 10 版。

④《广东革命之竿影》，《神州日报》，1911 年 11 月 11 日，第 3 版。

⑤ 姚文楠：《通敏先生行状（节录）》，转引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2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54 页。

⑥《商界请伟人表明素志》，《新闻报》，1913 年 6 月 5 日，第 9 版。

上书袁世凯，措辞激烈地指斥孙、黄。①当年协助军政府维持市面的商人，面对共和国建立后的再度交兵，已不尽与革命党持相同立场。上书者固不能代表港粤商界全体，但前后态度的差异足见：辛亥时期因推翻清廷、稳定地方而形成的合作，并未自然延续到讨袁之际。即使在革命党人长期经营的广东，是否支持再度用兵，也须重新争取地方各方的认同。

对于普通民众，则更须区分生计困境与政治选择。回忆资料记述辛亥后乡村团防、附加捐税加重民众负担；1913 年《申报》关于工界生计的报道，也反映部分工人面临工资和生活压力。②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共和成立并未立即解决基层生计问题，却不足以直接推论农民、工人普遍对革命派失望，更不能由此断言其“主动拒绝”二次革命。当时报章已出现把“二次革命”视为扰乱国家的时评，③但报纸的政治立场与社会各阶层的实际认同仍须分别考察。与其说民众整体退出革命，不如说革命派尚未能够把讨袁的宪政诉求转化为稳定而广泛的社会参与。

二、从各省独立到省内分歧：地方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

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从此失去政治能力，而是原有地方力量对是否再次独立已难以形成共同判断。沟口雄三从“乡里空间”与“一省之力”出发，强调清末由官、绅、民关系交织而成的地方公共事务网络，为辛亥时期各省独立提供了基础。④这一视角的启示，在于将省级独立视为长期形成的地方军事、社会与经济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乡里空间”是一种解释框架，而非可以取代各省具体考察的现成答案；其力量能否在 1913 年转化为讨袁行动，仍取决于新的政治关系。

“一省之力”长期形成，与它能否用于某次政治行动，是两个问题。前者着眼于地方组织、财力和军事资源的积累，后者则取决于资源由谁支配、各方愿为哪种目标承担风险。1911 年脱离清廷可以成为暂时共同的出口；1913 年各方须在服从中央、维持省内秩序与参与讨袁之间作出选择。因此，省并非天然支持革命的实体，而是政治力量争夺代表权与行动方向的场域。

1911 年的独立，主要意味着地方政治力量脱离清廷统治。新军起事之后，一些地方官员和立宪派转而与革命党合作，使政权变动能够以省为单位展开。进入民国后，独立的意义已不相同。地方军政负责人既须表明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又要衡量本省军力、行政秩序、财政来源及社会团体的反应。同样是宣布独立，1913 年的行动往往更直接地构成中央与地方武装力量之间的对抗，成本与风险也因而提高。

二次革命的发难经过正反映出这种困境。1913 年 7 月 12 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黄兴随后到南京组织讨袁，江苏、安徽、广东等省陆续响应。然而，南京与广东接续发生的事态，显示各地讨袁力量所处的情势并不相同。江苏都督程德全在压力下宣布独立，不久即离宁⑤；广东陈炯明虽决定响应，部属却意见不一。战事进行之际，南京商会又出面劝讨袁军撤离，意在避免兵争延及地方。11 程德全离宁后，南京讨袁军难以凭借稳定的地方军政领导，商界的劝退亦使其缺少相应的社会配合；广东方面，部属分歧则直接牵制了军事行动。由是观之，诸省虽先后宣布独立，如何统率军队、接济饷需并协调地方秩序，仍须在各省内部寻求支持。南京、广东的曲折，正是讨袁诸军未能形成持续呼应的重要背景。

这种掣肘，与辛亥年间地方政治力量的合作方式形成对照。清廷尚存之时，新军将领、地方官员与绅商虽各有所图，仍可围绕“光复”暂求一致；民国建立后，各方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已有不同处境，是否以武力反袁，遂成为地方内部必须重新权衡的问题。南京与广东的经历表明，清末形成的军事与社会资源并未骤然消失，但支配这些资源的各方已难如辛亥之际共同进退。二次革命在地方层面的困境，正在于此。

从这一点出发，也不宜将二次革命直接写成地方自治道路的终结。辛亥以后的中央—地方关系存在多种可能：统一国家如何配置地方权力，省级自治与军事割据如何区别，地方利益又如何通过国会或行政制度表达，均未得到稳定解决。后来出现的联省自治主张，可以提示这一问题的延续性，却不能倒过来证明 1913 年已有一条明确而注定失败的联邦化道路。二次革命所揭示的，是地方独立的行动形式虽被沿用，其赖以成立的

① 郭斌佳：《民国二次革命史》，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年，第 1355 页。

②《工界生计问题》，《申报》，1913 年 3 月 11 日，第 7 版。

③《孰敢主张二次革命》，《大共和日报》，1913 年 5 月 6 日，第 3 版。

④ 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开放时代》2008 年第 4 期。

⑤《宁军都督复易人》，《申报》，1913 年 8 月 3 日，第 2 版。

政治条件已经改变。

三、国际关系与力量对比：外部因素的实际作用

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均置身于列强在华利益交错的环境，故不宜把前者描述为“不受干涉”、后者描述为“列强操纵”。武昌起义初起时，外国驻华人员及军舰曾讨论如何保护侨民与既得权益，也有外方同清廷接洽军事援助。随着清朝统治趋于动摇，各国驻汉口领事宣布“严守中立”，此举主要涉及其对交战双方的立场与侨民利益保障，并非对革命目标的无条件支持。①列强政策在不同时点的调整，本身即表明其首先重视局势的可控性，而非某一中国政治集团的原则主张。

所谓“中立”亦须结合实际外交处境理解。外方不公开支持某一交战方，并不意味着停止介入侨民保护、航运安全与条约权益等事务；相关交涉仍可能影响中国政治。外交官的正式立场、在华私人活动与政策的实际后果，也应分别考察。判断列强作用，不能仅凭文书是否宣示“中立”，还须说明其采取了何种行动、影响了谁的选择。

日本的举动更能说明其利益取向的复杂性。辛亥时期日本政界既有倾向维持清廷的一面，也将满洲权益及未来对华影响纳入考虑；日本外交文书所示的接洽与援助意向，不能简化为对中国革命的一贯支持或敌视。②1913 年，部分日本人士与讨袁者之间确有联系。日本驻九江方面曾报告若干日籍退伍军人与其他人员参加江西军，孙中山等人在失败后也曾通过日本方面安排辗转出境。③④然而，个别人员入伍、使领馆办理通行事务与日本政府作出军事介入决定，属于性质不同的事实。仅凭这些材料，尚不能成立“日本策动二次革命”或“革命沦为列强代理人争斗”的结论。

与其强调外力使革命异化，不如考察国际金融与政治承认如何影响国内力量对比。1913 年 4 月，袁政府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约借英镑二千五百万，并以有关税收作为担保，涉及盐务稽核等安排。该借款的合法性、财政监督条件及资金用途，成为国民党人与袁政府争执的焦点。对于袁政府而言，外部融资有助于缓和其财政压力并增强政治回旋空间；对于反袁力量而言，则意味着仅依赖地方财力与军队发动行动将更为艰难。不过，借款究竟有多少实际用于各处战事，尚须结合支拨档案查证，不应将其机械地视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单一原因。

善后借款争论又不止于财政政策。国民党声明、部分地方都督通电及国会质询，均将筹款问题与《临时约法》下的权力边界相联系，袁政府亦有为借款必要性和程序合法性辩护的文件。⑤争论由此牵涉行政筹资权、议会监督权与中央地方的政治信任。借款既改变财政资源的配置，也使围绕共和制度运行规则的分歧愈趋显露。

因此，两次革命的国际环境并非由中立突变为操纵。比较的关键，在于外方如何依据在华利益调整姿态，以及这种调整又如何经由财政、军备和外交交涉影响中国内部的政治竞争。外部力量确实限制了共和政治的自主空间，但二次革命的发生及其失败，仍须从中国各方政治选择与地方动员条件中寻找直接解释。

四、从建立共和到保卫共和：政治目标与行动方式的限度

如果说社会联盟与地方条件的变化解释了二次革命何以难以形成声势，那么革命的目标与手段，则涉及其在共和政治史中的位置。辛亥革命以推翻清廷、结束君主统治为直接目标，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临时约法》公布，意味着新政治秩序至少在制度层面获得了初步形式。然而，政党如何参与责任内阁与国会政治，总统权力应受何种约束，中央与各省应如何分权，仍留待政治实践解决。建立共和与使共和制度得以运作，并非同一件事。

1912 年底至 1913 年初的国会选举，本为政党政治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国民党试图经由议会争取政治主导权，宋教仁遇刺则使制度竞争迅速陷入危机。随后，善后大借款的争议、袁政府

①《1911 年 10 月 17 日各国驻汉口领事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转引自《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第 1 册，线装书局 2002 年版，第 602 页；关于英国方面交涉，参见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 页。

②《内田外务大臣致伊集院驻清公使电》，转引自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3 页；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东方出版中心 2010 年版，第 1139 页。

③日本驻九江方面关于日籍人员进入江西讨袁军的报告，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转引自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82 页。

④《驻福州副领事报告外务大臣：孙逸仙从福州赴基隆》，1913 年 8 月 4 日，转引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史料新编》第 6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⑤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 42、43 辑合刊《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台北，1968 年，第 329—353、364—383 页。

对江西等省都督的免职及南北军事紧张，进一步压缩了妥协余地。到 7 月李烈钧起兵时，部分革命党人已认定单凭法律程序难以制约袁世凯；但其他政治力量仍担忧诉诸武力将使刚刚建立的共和秩序再遭破坏。由议会竞争转向军事对抗，并不是简单的思想退化，而是制度争议、个人判断与武装力量分布相互作用的结果。

宋案触动政治局势，不仅因为遇刺者的身份，更在于它迫使新共和国面对如何处理高层政治争端的问题。刑事追责、议会制衡与武装裁断，原属不同的解决途径；随着案件调查与借款争议相继发酵，政争各方对既有程序的信任逐渐下降。因此，1913 年夏的起兵既是对袁氏权力扩张的抵制，也反映了政治竞争缺乏公认裁决机制的困境，不能预设当时别无选择。

二次革命的政治诉求与辛亥革命仍有明显联系：革命党人以维护民国法统、反对权力专断为正当性依据，试图阻止共和制度被个人权威侵蚀。但其政治位置已经从推翻旧朝廷的倡导者，转为在既有共和国中反对执政者的一方。这一变化使行动的合法性更为复杂。在辛亥时期，独立通常指向与清廷脱离；在 1913 年，同样的行动既可以被支持者解释为保卫共和，也可能被反对者视为扰乱共和国秩序。双方围绕“何谓共和”的解释发生争夺，正是二次革命的政治困境所在。

更难处理的是政治主张与行动方式之间的张力。起兵者以维护共和国法律秩序为号召，却必须通过地方独立与军事进攻改变政局。支持者视之为制止专断的必要手段，反对者则担忧共和国从此难以摆脱武力争权。革命党人因此不仅需要证明袁氏行为逾越权力边界，还须说明再度用兵为何能够恢复而非进一步破坏共和秩序。这也是二次革命未能广泛凝聚社会认同的重要难题。

军事行动失败后，袁世凯得以进一步集中政治权力。1913 年 11 月政府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 年 1 月解散国会，同年 5 月又以《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这些措施有各自明确的发生时间，不应笼统归为 1913 年七八月战事期间已经完成的事实。二次革命失利为袁氏扩大权力扫除了重要障碍，但制度倒退还与当时中央权威、军政关系及缺乏有效制衡的政治环境相联系，不能由一场失败直接推出全部后果。

革命党人此后的组织调整，同样应放在较长时段考察。孙中山 1914 年重组中华革命党，表明其对民初政党组织涣散与军事行动不齐的反省。至 1923 年《中国革命史》及 1924 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程序又获得更完整的表述。若以这些后来提出的思想直接说明二次革命当时的动机，便会混淆事后反思与事件发生时的选择。二次革命所带来的，不是革命党人立即由议会政治转向成熟的党军体制，而是促使其重新认识组织纪律、军事力量及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

五、余论

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既不能截然割裂，也不宜不加区分地并入同一条线性发展的革命过程。两者在参与者、政治理想和各省独立的行动形式上具有连续性；其差异则主要表现为政治对象从清廷转向民国政府，跨阶层反清联盟转为围绕战争与共和秩序的多重分歧，省级政治资源虽仍存在，却不能像 1911 年那样较为顺畅地汇合。与此同时，中央财政与军事实力的重组，以及列强根据自身利益作出的选择，又进一步改变了双方的行动空间。

据此回望两次革命，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革命党人何以突然失去革命性，而是废除帝制之后，原先促成王朝瓦解的政治联盟何以难以承载新的共和秩序。辛亥革命使不同力量能够暂以反清为共同目标，二次革命则将它们对中央权力、地方秩序与宪政程序的分歧显露出来。所谓“共和失守”，并不意味着 1913 年之后共和理念及其政治实践尽皆终结，而是说明共和国的名义建立之后，其权力结构和社会基础仍相当脆弱。正是在这种延续与转折并存的意义上，二次革命成为认识民初政治困局的一个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1] 沟口雄三. 辛亥革命新论[J]. 开放时代, 2008(4):5-17.

[2] 端方. 端忠敏公奏稿:第 2 卷[M]. 1918 年铅印本:26.

[3] 丁身尊. 记广东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C]// 辛亥革命在各地.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230-231.

[4] 姚文楠. 通敏先生行状(节录)[C]//章开沅, 罗福惠,严昌洪,主编.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 2 卷.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54.

[5] 关于中国事件的函电:中国第一号(1912 年)[A]//胡滨,译.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北京:中华书局,1984:1.（转引）

[6] 瞿骏. “二次革命”的“向前看”和“向后看”[J]. 近代中国,2023(2):368.

晚清驻台总兵吴光亮“飞虎军”考释

付诗云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吴光亮为晚清粤籍名将，后官至台湾镇总兵，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后，奉命渡台参与开山抚番与乙未抗日，其直辖队伍号称"飞虎军"。旧地方志多称飞虎军系吴氏在江西赣标中营“独树一帜”所创，但钩稽《英德县续志》、《江西通志》、《清实录》及耆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奏折，对这一成说加以辨证后，发现“飞虎军”之名早在吴光亮成军之前便已出现，且与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据此厘清了吴光亮“飞虎军”的名称由来与流变轨迹，以期补正咸同勇营史研究中偏重湘淮、轻视粤勇与其他勇营之偏。

关键词：吴光亮；飞虎军；遮克敦布；康国器；粤勇

DOI：doi.org/10.70693/202610178760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lying Tiger Army" of Wu Guangliang,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Taiwan Garris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u Shiy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 China

Abstract: Wu Guangliang was a celebrated Cantonese general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o eventually rose to the post of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Taiwan garrison. After the Mudan Incident in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Tongzhi reign (1874), he was ordered to cross the strait to Taiwan to take part in the opening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Kaishan Fufan), as well as in the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of 1895; the troops under his direct command were known as the "Flying Tiger Army." The received view, recorded in older local gazetteers, holds that the Flying Tiger Army was created single-handedly by Wu in the Central Battalion of the Jiangxi garrison (Ganbiao Zhongying). By collating the Continued Gazetteer of Yingde County, the General Gazetteer of Jiangxi,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Qing, and the memorials of Qiling, Zeng Guofan, Zuo Zongtang and other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at conventional account and finds that the name "Flying Tiger Army" had already appeared before Wu formed his own troops and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m.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Wu Guangliang's "Flying Tiger Army" and the trajectory of its changes, in the hope of redressing the bias in studies of the yongying (local militia corps) system of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s, which have focused overwhelmingly on the Hunan Army and the Huai Army while neglecting Cantonese braves (Yueyong) and other regional corps.

Keywords: Wu Guangliang; Flying Tiger Army; Zhekedunbu; Kang Guoqi; Cantonese braves

作者简介：付诗云（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通讯作者：付诗云

吴光亮在太平天国时期从江西发迹，在江西期间先跟随的是遮克敦布，其后在康国器麾下奔赴浙江、福建、广东战场，参与对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的追剿，在多次战役中凭借自身过硬的作战能力和统兵能力、在战场上的随机应变与临危不惧，从康国器手下一路晋升为总兵，其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征战经历与展现的能力为日后赴台开山抚番、管理台湾事务、开发台湾打下了坚实基础。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东南诸省，清廷经制的八旗、绿营兵不堪一战，地方团练与勇营武装顺势崛起，成为晚清军事体系转型的核心载体。在咸同年间遍地而起的勇营序列中，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是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勇营，也是广大学者乐于研究的。对咸同年间勇营制度的研究，以对湘军、淮军的研究为开端，从近代开始，勇营军史中关于湘淮军的论文专著数不胜数，但有关其他勇营几乎是完全忽视。[1]因此，笔者尝试以吴光亮所创建的粤勇序列“飞虎军”出发，希望能够对这一时期除湘淮二军之外的其他勇营研究有所推进。

一、吴光亮早期从军经历与“飞虎军”的起源线索

吴光亮作为粤籍人士，江西却是他的军旅开端，这实际上值得探讨。据《英德县志》所载，“吴光亮因为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书，后跟随伯父在罗姓富户做工，因受尽凌辱使其自愿投军，效力江西赣标中营”[2]。吴光亮生于 1834 年，据《英德县续志》记载其“年十八从戎”[3]，大概是咸丰元年至咸丰二年这段时间，刚好是太平天国兴起时期。再，地方志所记由吴光亮一手创建的“飞虎军”，于江西赣标中营成军，历经太平天国时期在赣浙闽粤数省征战，后又在台湾开山抚番、中法台海筹防、甲午乙未抗日保台等重大历史事件多次出现。尽管后期“飞虎军”与吴光亮的联系相当紧密，在征剿太平天国期间却有待进一步考证其名称与来历。

鉴于吴光亮最早出现在江西省与太平天国有关的相关史料中，且其从军年纪与太平天国兴起时间极为接近，这里有必要先提及太平天国起义缘起和朝廷及江西省内官兵的应对之策。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首次出现与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相关的文件是 1850 年 12 月 8 日广西巡抚郑祖琛上奏“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4]这一文件中首次提到了金田村，洪秀全等人开始出现在清朝官员的视野中。1851 年 1 月，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在广西金田爆发，李星沅在奏折中提及“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上帝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5]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于咸丰二年下半年，从广西突进湖南。江西与湖南毗邻，因而江西省防守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清代江西不设八旗只设绿营，且绿营的数量不多。此时出现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办团高潮，江西属于第一批办团练勇的省份。但实际上，江西所办的团练以及本身的绿营战斗力尚不足以抵抗太平军的进攻。于是受咸丰帝上谕，曾国藩率湘军出征，湘军作为国家经制之军以外的一支武装力量，在各省份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声名显著，江西是其东征的第一站，1854-1857 年是曾国藩坐镇江西期间，其湘军在江西与当地团练勇营对太平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延缓了太平军的进攻步伐。除湘军以外，曾国藩在江西期间还说服了原扬河通判刘于浔按照湘军营制建立了江军水师作为亲湘友军，以期湘军与江西当地军队共同配合，因为湘军所需军费还需江西供给。该时间段太平天国兴起及江西省内的背景大致如上所述。

地方志记载，吴光亮于咸丰元年从军，“投效江西赣标中营，所向有功。主将遮拉布材之，命募壮士，独树一帜，名飞虎军。进克万安、雩都、信丰、安远、永定县、吉安府等城，军声大振。”[6]这是《英德县续志》中有关吴光亮率领的“飞虎军”建立的相关记载。首先值得商榷的是，在其他史料中实际上没有再出现“遮拉布”其人，鉴于《英德县续志》是民国二十年的铅印本，可能存在误记，实际上该主将应当是遮克敦布。“遮克敦布，字景和，蒙古正红旗人，二甲一名武进士，咸丰三年任南赣镇中营游击。”[7]遮克敦布是道光二十年的二甲武进士，外放后到江西，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两江总督陆建瀛会同署理江西巡抚陆元烺奏请将遮克敦布升为江西赣标中营游击，“谨查有调补临江营都司遮克敦布，年三十九岁，正红旗蒙古瑞森佐领下人，由护军中式武进士，授职三等侍卫，选补横冈营都司。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到任。对调今职，防堵粤东游匪案内奏。”[8]后升授为江西抚标中军参将，咸丰八年十月五日担任贵州威宁镇总兵官，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日署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咸丰十

一年冬管神机营事，后前往直隶、山东交界地会同道员王榕吉接办防务追剿捻军。在江西期间，遮克敦布先后参与了赣州、万安、吉安、乐安等地的攻防战事，是咸丰年间赣南清军的重要统兵将领之一。清楚了吴光亮在江西最先所投效的主将之后，对于吴光亮来到江西参军的原因可做如下推测。《文宗实录》中于咸丰元年二月十五日记载:

谕内阁，陆元烺奏防堵情形等语。江西南赣各属，多与粤省毗连，经该署抚派委赣南道黄乐之、赣州府知府周玉衡、候补道蒋启敭等、带领弁兵，分路防守。上年十二月间，有广东英德等县匪徒，乘夜明火持械。直扑定南之龙子岭。被都司遮克敦布等开炮击退。又有匪徒窜至龙南之芳竹岭。经都司安勇（南赣镇中营游击）等开炮击伤贼首数人，捡获匪党五名，并据周玉衡等先后禀获匪犯三十名，防堵尚属认真。[9]

从此看出，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至咸丰元年二月这段时间，遮克敦布与吴光亮的交集或许是从这一战开始产生的，遮克敦布时任横冈营都司，驻扎于定南县（定南县隶属于江西省赣州市，位于江西省最南端，距离广东英德近两百多公里）。不过，有关于广东英德匪徒之事，江西布政使陆元烺（署理江西巡抚）早在道光三十年十月初十日奏报“广东英、清等县有游匪聚众滋事。当因赣南各属多与粤省毗连，即经飞饬各该府转饬各县会营，选带兵役，在于交界扼要处所严密堵拿。”[10]且《文宗实录》在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三日记录:

谕军机大臣等，陆建瀛奏，江西吉南赣道黄乐之、南赣镇总兵德坤禀报，探闻广东游匪屯聚佛冈厅属之高冈墟等处，有奔窜江西长甯县一带之信。该督已飞饬该镇道，遴派勇干员弁，酌带兵役，以截拏私枭为名，盘诘弹压。等语。广东英德匪徒滋事，前已有旨，令江西等省并力堵截。兹据查明，定南厅等处接壤之区，处处可通，且大庾岭界连南雄，尤为扼要，自应严防，以杜窜逸。[11]

道光三十年末至咸丰元年初，恰好有广东英德、清远等匪徒聚众滋事且流窜到江西南赣各县，此时间段如前所述正好是吴光亮从军大致年份。不过，“匪徒”是由江西布政使陆元烺、两江总督陆建瀛所代表的清政府所给予的称呼，此时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时间恰好吻合，或许可以推测吴光亮最开始并非来江西投军，而是作为金田起义的先声，在广东及江西呼应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作为广东花县人与同乡冯云山最初是计划在广东北部和西北部进行传教，英德位于广东省中北部自然也被纳入传教的范围内。不过在广东地区的传教开始于 1844 年 4 月，随后马上去往广西浔州府传教，在广东的传教活动持续时间很短，且收效甚微，很难说吴光亮是否受到了洪秀全布道的影响才在道光末年起事。据上述官方文书记载，当地官员防堵粤匪情形得力，吴光亮被周玉衡等剿获，此时的遮克敦布任职横冈营都司，吴光亮被俘获后进入遮克敦布的麾下为其效力。

二、从遮克敦布到吴光亮：“飞虎军”的归属

有关“飞虎军”归属的问题，目前看来说指代问题更为恰当。我们往常所跟随的说法一直是“吴光亮因能力的出众受到主将的重视，于是命他招募壮士成军”，这就是独树一帜的“飞虎军”，在这样的叙述当中，“飞虎军”这支军队应当独属于吴光亮，其构成人员也应当都是吴光亮所招募的壮士。尽管地方志中并没有说明其成军的最早时间，但吴光亮应当先做出功绩得到主将的重视，才能有机会招募军队，但这其中的过程地方志也几乎隐去不表，使得飞虎军与吴光亮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并不亲密。事实上，在江西的地方志中有关于飞虎军归属的其他说法，有关遮克敦布的履历这样记载：“遮克敦布，由横冈营都司任赣镇中营游击，统领飞虎营，与士卒同甘苦，身历战阵”[12]，明确表示了统领飞虎营的将领为遮克敦布，且在各类地方志、奏折中“遮克敦布率飞虎军……”也不断出现；耆龄上奏“遮克敦布督同升用都司蓝玫等率领飞虎营及赣潮各勇……”[13]、《赣州府志》中克复雩都城“咸丰八年正月，贵州镇总兵遮克敦布统飞虎军及义勇韩字营……”[14]、曾国藩奏折“商令遮克敦布之飞虎勇、署南安府周汝筠之练勇，会同赣勇，先行诱贼出巢，楚军偃旗息鼓以待”[15]；可见在吴光亮创办飞虎军前，遮克敦布就已经有了自己的飞虎军，那么《英德县续志》所说的吴光亮在江西期间创办的飞虎军实际上很有歧义：这支军队是吴光亮所属还是吴光亮的主将遮克敦布所属？以及该飞虎军的人员构成是由吴光亮选拔的粤勇还是江西当地的江军？

“吴光亮与其飞虎军”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而吴光亮的弟弟吴光忠在咸丰八年亦投效江西飞虎军营，并随之征讨江、浙、闽、粤诸省。据民国《英德县续志》记吴光亮在江西所经之处：“进克万安、雩都、信丰、安远、永定县、吉安府等城，军声

大振。”[16]吴光亮在江西所参加的进克万安、雩都、信丰、吉安等城战役，基本上是遮克敦布所走过的剿贼路线，这个时候的飞虎军如上史料所述，应由遮克敦布统领。不过就发生于咸丰十年的乐昌、仁化两城败匪回窜南雄州事件，由耆龄上奏禀报官军驰赴截击情形折中提及“江西赣标把总吴光亮率飞虎勇与关镇国德义勇渡河夹击”[17]，此时已采用“吴光亮率飞虎勇”的表述，且前缀是“江西赣标”，确实可证明地方志中其飞虎军最早于江西赣标中营成军的说法，这个时候的吴光亮担任江西赣标中营的把总（正七品）职位；再，同年发生的解围江西安远县城之役，耆龄在其上奏的奏折中将吴光亮划分为“粤军”一类，且在奏折中报告：

窃查逆匪由南雄州败，窜江西，经奴才饬令，都司方耀、千总关镇国、把总吴光亮、李廷弼率领粤军驰赴江西信丰等县追剿并咨商督臣……

奴才随严催粤军倍道前进，救援安远。九月十三日把总吴光亮率飞虎勇六百名先至安远县与江军韩字赣字两营进扎龙头墟……[18]

这里所说的“吴光亮率领粤军”和“吴光亮率飞虎勇六百名先至安远县与江军韩字、赣字营进扎”，可以说明吴光亮此时已属于粤军的行列，奏折中所提及的其他人如方耀、关镇国都是粤籍人，并且在这里把吴光亮的飞虎勇六百名与江军分开表述，可见至少这六百名飞虎勇是属于粤勇序列。鉴于此前可以证明的是飞虎军的归属是遮克敦布，查遮克敦布的履历应当与广东没有太大的联系，而遮克敦布最开始就被下放到江西，可以合理推测遮克敦布的飞虎军应属于江军序列。既如此，吴光亮的飞虎军或许应与遮克敦布的飞虎军区别开来，吴光亮最初被收编时，应属于遮克敦布麾下的飞虎军（江军序列），江西平定后没有跟随遮克敦布去往直隶山东交界地带，在耆龄（时任广东巡抚）的行文中成为了粤军的一份子，重新回到广东，那么其飞虎勇或许是在粤省进行招募，想要纪念自身从飞虎营起家，因而继续沿用了遮克敦布所统带的军队之名，这时才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粤勇序列“飞虎军”，该名称也成为了吴光亮的军队名称代表。同治十三年赴台之时，吴光亮所募军勇同样称为“飞虎军”，“本镇奉募军勇，已于七月初四日足数，初七日点验。即将所募一千名，分为两营，称飞虎营左翼、右翼”[19]；又如光绪二十年募勇抗日之时，唐景崧“又征前澎湖总兵吴光亮率所部二千人，为粤军统领，名其军曰‘飞虎’”[20]，从江西到广东再到台湾，吴光亮所募军勇始终称为“飞虎军”，人员构成或许有所变化，但吴光亮作为粤籍人士，所募人士属于粤勇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由吴光亮亲自招募的军勇名为“飞虎军”，归属于粤勇序列。

三、吴光亮由赣入粤的军旅转折

上文明确了吴光亮与遮克敦布的关系，那么吴光亮因何机缘得以从江西回到广东参与后续的战事？首先是耆龄其人与遮克敦布有所联系。

觉罗耆龄，正黄旗人。由工部笔帖式中式道光十七年举人，升刑部主事。二十四年，升员外郎。二十五年，升郎中。二十六年，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二十七年，授江西广信府知府。二十八年，调南安府，旋署建昌府。二十九年，署抚州府。三十年，署吉安府，调袁州府。咸丰三年十一月，补赣州府知府。五年七月，升吉南赣宁道。六年四月，擢布政使。七年三月，擢江西巡抚。咸丰九年九月，调广东巡抚。[21]

就其履历来看，耆龄于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九年一直待在江西，从知府一直做到江西巡抚，对江西战事极为熟悉，咸丰五年耆龄任吉南赣宁道期间和遮克敦布一同带勇前往义宁州城与湘军罗泽南互为声援[22]；咸丰五年十二月耆龄、遮克敦布二人同驻饶州[23]；至咸丰七年耆龄刚刚升任巡抚不到一年，便上奏饶州营参将遮克敦布克复万安县城，其中行文“遮克敦布亲率各营”、“均经遮克敦布激励各员弁”、“遮克敦布督率各勇迎勦鏖战多时”[24]或可看出二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咸丰九年年底耆龄调补广东巡抚、因病于咸丰十年年初赴任时，“复经奏明在赣募勇，随带来粤防剿，兹于闰三月二十六日行抵韶州府探闻下游清远等县城贼匪欲图上窜，当即暂驻郡城就近督办防剿”[25]，又“旋闻广西另股贼匪窜扰粤东清远等县，即经奴才奏明在赣招募练勇随带赴粤防剿在案，嗣经先后挑选，仅得壮勇八百余名”[26]，恰逢吴光亮家乡爆发匪乱，吴光亮属粤人，谙习形势，这或许是耆龄从遮克敦布麾下调用吴光亮的原因；又或许是吴光亮作为粤人不愿北上直东交界，因而毛遂自荐跟随新任广东巡抚来粤。

再，耆龄在江西期间任赣州府知府时，其麾下有一员粤籍将领名康国器。“康国器，广东南海人。由吏员投效军营，保以从九品选用。道光二十七年，除江西赣县巡检。咸丰二年，调乐安县巡检。四年，因吉安等属堵剿出力，巡抚陈启

迈保奖，以府经历、县丞即补。……旋因克复饶州、丰城等处汇奖，晋知县，并赏六品翎顶。七年随濬沙湖河以达临江，……八年，因克复临江府城，赏换花翎。九年，因攻安仁逆匪出力，奉旨俟候补同知后以知府升用，先换顶戴。”][27]据《南海县志》中记载：

咸丰三年，发逆陷泰和万安，踞良口乌兜以窥赣。国器曰：我官虽卑，义不可逃，毁家募勇御贼，贼不敢犯。……上书巡抚陈启迈言大计，启迈异之，命随赣守耆龄防饶。时官军未有水师，国器创造扒船三十余艘，讲求水战法。[28]

咸丰三年康国器开始招募兵勇抵御太平军进攻，并自行组建水师开始筹划水上作战。《广西布政使护理巡抚康公墓志铭》中，从康国器的任职履历来看，康于道光二十七年先任赣州桂源司巡检，驻乌兜兼管驿务；咸丰三年赣南道周玉衡令其攻乌兜和良口，克万安；后跟随赣州府知府耆龄的军队守卫饶州（今鄱阳县），开始自行训练水战；收复饶州后，曾国藩命其归属江军水师刘于浔指挥，随刘于浔攻克樟树镇；咸丰十一年，康受广东巡抚耆龄之命前往广东英德蓝山平叛；同治元年随时任闽浙总督的耆龄援浙，与湘军蒋益澧合围汤溪，自此隶属左宗棠军，左宗棠称赞其“入粤战功第一”[29]。

吴光亮和康国器渊源颇深，去往广东后跟在康国器麾下征战，康国器是为广东南海人，在江西地带两人可以算得上是同乡，康国器几乎是吴光亮的引路人，吴后来跟随康国器四处奔走平乱。左宗棠奏折中，吴光亮在太平天国时期回到广东之后的行动轨迹基本上与康国器一致，且多次出现在康国器所指挥的战役中。地方志中记载“所荐拔如吴光亮、何雄光、麦龙韬、冯南斌、赖长，皆有勇略”[30]；康公墓志铭中所言“所识拔皆名将，吴光亮、冯南斌、赖长，其尤也。”[31]这说明吴光亮前期是康国器一手提拔起来的，康国器之子康熊飞也多次与吴光亮同时出现在之后的各项战役中，可见康对吴的知遇之恩。

照《英德县续志》，吴光亮最开始应当在遮克敦布麾下，江西剿匪之事平定后，吴光亮前往广东剿匪，属于康国器麾下。有关于康国器与遮克敦布的关系可做一些推测，咸丰五年康国器跟随刘于浔军驻扎樟树镇时，恰逢陆元烺派遣遮克敦布赴樟树镇协剿，《康国器传》中“我军至，遮克敦布所统彰武军，乃国器旧部也，列队欢迎。”[32]如果就地方志来看，康与遮克敦布在前克复万安、守饶州之时就应当有所联系，在这时应当有比较好的交情，才会将自己的旧部交予他人统领。此外，陆元烺于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奏报“临江贼匪窜扰樟树镇，经臣派拨赣标中营游击遮克敦布带领赣勇驰往，会同南河候补知府刘于淳（刘于浔，号于淳）等水师战船合力剿洗”[33]，也可知康国器与遮克敦布有联系。

康国器在江西已与曾国藩的湘军有交集，从浙江汤溪之战开始隶属左宗棠军；遮克敦布的姓名也多次出现在《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中，在江西各项战役期间与曾国荃、罗泽南、周凤山、彭玉麟共同作战剿匪，与湘系的关系极为密切；而耆龄不论在江西任职期间，还是任广东巡抚期间（来粤前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商议拟招募湖南湘勇未[34]），抑或是任闽浙总督期间，都与湘军或是湘系人物有所联系，此三人又与吴光亮的联系颇深，这可能也是吴光亮后续经历中始终与湘系人物脱不开关系的原因，不过吴光亮不论是在江西、浙江还是台湾，应当始终游离于湘军体系之外。

咸丰十一年，康国器受耆龄所调来到广东英德蓝山平定梁柱等人，《韶州府志》记：

柱以悍党守要隘，兵莫敢攻。五月十二日，有何勇数十宵突其隘，贼方酣卧，各刃数贼，斩首百余级，余贼奔告。柱股栗欲遁。适候补道康国器遣飞虎营吴光亮等由阳山下攻其后。十三日大破之，直捣其巢，陈才、潘赤、古练、四虎等皆就擒，俘斩无算。柱逃匿黄花、黑岩，嗣到勒总兵营投诚。耆中丞以其屡叛，置之法。蓝山平。[35]

该县志中的行文“候补道康国器遣飞虎营吴光亮等由阳山下攻英德蓝山贼巢后路”也很有歧义，从前文奏折来看，吴光亮与飞虎军的关系一般是“吴光亮率飞虎营”，是“吴光亮”在前，“飞虎营”在后；而此处记“飞虎营”和“吴光亮”的顺序却完全相反，或可理解为“飞虎营的吴光亮”而不是“吴光亮的飞虎营”。不过耆龄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折中提及“七月二十六日，康国器帖临藻，派都司吴光亮率飞虎勇进扎赫岩寨左”、“十一日，飞虎勇连开大炮轰坍庙墙，吴光亮率勇首先抢入”等语[36]证明吴光亮与飞虎军的关系。再者，《清实录》中亦记载：

谕内阁、耆龄奏，官军攻破蓝山各贼寨、歼毙首逆、地方肃清一折。广东蓝山逆匪被击后，窜踞赫岩寨等处，意图抗拒。上年七月闲，经耆龄派令知府康国器等率勇进勦，先将寨前神庙炮

台蹋毁，杀贼无算。都司吴光亮乘势移营进逼贼巢，施放火箭，寨内火起，贼众惊溃，歼毙不计其数。[37]

此处“吴光亮乘势移营”移的应当是飞虎营，可能是《韶州府志》误记，飞虎营确是不只有吴光亮的飞虎营，不过此处平定英德蓝山的飞虎营统领即是吴光亮无误。

吴光亮从江西赣标中营发迹，跟随遮克敦布奔走江西，隶属于遮克敦布的飞虎军，此时遮克敦布的军队属于江军序列。在遮克敦布调往平捻时，没有跟随其前往直隶山东交界处，而是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飞虎军”并招募粤勇，这个时候归属于吴光亮的“飞虎军”自然属于粤勇序列。吴将其带往广东，隶属于康国器麾下，之后又去往浙江、福建等地勦灭太平军余部。吴光亮在后续赴台开山抚番、募勇抗日时期一直沿用该名招募兵勇，其军队始终称作“飞虎军”，或许是想要纪念自己最初投效的军营，而“飞虎军”也因此与吴光亮紧密联系。

四、结语

通过对《清实录》及耆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奏折与相关地方志的梳理，可以发现，吴光亮“飞虎军”的起源与归属问题，较之既有记载更为复杂。传统说法多将飞虎军视为吴光亮在江西赣标中营时期独立创建的军队，但相关史料表明，吴光亮从军之初所隶属的主将遮克敦布，早已统领飞虎营参与江西各地的军事行动。因此，考察“飞虎军”的历史，不能仅依据地方志中“独树一帜”的记载便将其创建时间、统领关系与人员构成一概归于吴光亮，而应结合不同史料的记载，对其名称的使用及军队归属作进一步辨析。

综合现有材料，吴光亮早期应曾隶属于遮克敦布所统领的飞虎军，其后由江西转赴广东，进入康国器麾下，逐渐成长为粤勇中的重要将领。至于吴光亮何时开始独立招募兵勇，以及其所部飞虎军的具体成军时间，现存史料尚不足以作出完全确定的判断。不过，咸丰十年耆龄奏折中关于吴光亮率领飞虎勇驰援安远、与江军分营作战的记载，已显示其所部与江西地方军队之间存在区别。由此推测，吴光亮可能是在转入广东战场后，重新招募粤勇，并沿用早期所隶飞虎营之名，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飞虎军”。这一名称此后又延续至其赴台开山抚番及甲午、乙未时期的军事活动之中，成为吴光亮及其所部的重要标识。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吴光亮的军旅经历反映了晚清勇营在战事迁转与将领流动中的复杂面貌。其早年活动于江西赣标及相关勇营体系，继而随康国器转战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后又率部赴台，其军事经历与湘系人物及相关军事力量虽有密切联系，却不能因此简单地将其归入湘军系统。军队名称的延续，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人员构成与组织归属始终不变；对具体将领与军队关系的考察，亦须置于不同阶段的军事环境之中加以理解。

就个案而言，本文厘清了“飞虎军”名称的由来与流变轨迹，纠正了方志成说之误，也揭示出晚清勇营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营号往往随统带者的隶属转移与军队再编而变更归属，不能径以将领与营号常相伴随，即推断其初创时的归属与营伍性质。就宏观而言，吴光亮及其“飞虎军”为观察咸同年间湘淮之外的勇营生态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窗口。粤勇虽声名不及湘淮，却活跃于赣、浙、闽、粤诸省战场，又延及台湾防务，其来源、编制与归属自成体系；吴光亮本人虽与湘系人物交往密切，却始终游离于湘军体系之外，正可见咸同军事格局中粤勇的独特位置。因此，对吴光亮“飞虎军”的考释，不仅有助于厘清吴光亮早期从军、由赣入粤及其后赴台的军事经历，也为认识晚清粤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个案。通过进一步发掘档案、奏折与地方文献，辨析不同勇营之间的统属关系及其演变，或可更全面地理解晚清军事力量的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并推进对湘、淮军以外地方军事力量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龙盛运.咸同勇营军研究偏荣偏枯倾向试论[J].近代史研究,2001,(5):177-198.

[2]英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英德县志[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907.

[3][6][16]邓士芬修,凌鹤书,黄佛颐纂.（民国）英德县续志:卷 10,列传中[G]//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韶州府部:第 11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09.

[4][5]夏春涛.太平天国再评价——金田起义 170 周年之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21,(7):186-203+208.

[7]刘坤一等修,刘绎,赵之谦等纂.（光绪）江西通志:卷 19,职官表二十一.23.

[8]陆建瀛.奏请以遮克敦布升赣标中营游击由（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085663.

[9]文宗实录:卷 27[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389.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陆元烺奏报赣粤交界扼要处所调派官兵防堵情形折[G]//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1 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74-75.

[11]文宗实录:卷 19[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277.

[12]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同治)赣州府志:卷 45,武名宦[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838.

[13][24]耆龄.奏为参将遮克敦布进攻万安逆匪节节剿洗克复县城恭摺由(无具奏日期)[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003116.

[14]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同治)赣州府志:卷 33,武事[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610.

[15]曾国藩.信丰解围并调萧启江军赴吉安援应湖南折(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八日)[M]//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长沙:岳麓书社,2011:321.

[17]耆龄.奏为败匪窜扑南雄分路截击获胜并调派兵勇越境追剿事(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1796.

[18]耆龄.奏报粤军驰赴江西进剿窜匪获胜力解安远县城围(咸丰十年十月十八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2185.

[19]王元穉辑,夏德仪编辑.甲戌公牍钞存[M]//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九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115-116.

[20](清)黎景嵩撰,钟启河等点校.台海思痛录[M].长沙:岳麓书社,2011:331.

[21]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 7 册,卷 50,大臣划一传档后编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7:3946-3947.

[22]文宗实录:卷 183[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1046.

[23]文宗实录:卷 186[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1076-1077.

[24]耆龄:《奏为参将遮克敦布进攻万安逆匪节节剿洗克复县城恭摺由》(无具奏日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003116。

[25]耆龄.奏报行抵韶州接印任事日期并谢天恩(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二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1198.

[26][34]耆龄.奏报暂驻韶郡督办清远等县防剿事宜(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五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1209.

[27]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 8 册,卷 62,已纂未进大臣传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7:4899.

[28][32]郑荣等修,桂坫等纂.(宣统)南海县志:卷 16,列传[G]//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 14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396.

[29]左宗棠.已故藩司战功卓著恳恩议恤并将事绩宣付使馆立传折(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M]//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长沙:岳麓书社,2014:512.

[30]郑荣等修,桂坫等纂.(宣统)南海县志:卷 16,列传[G]//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 14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399.

[3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G].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4265.

[32]郑荣等修,桂坫等纂:(宣统)《南海县志》卷 16《列传》,《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 14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年,第 396 页。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陆元烺奏报遮克敦布等于樟树合剿获胜等情片[G]//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18 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35.

[34]耆龄:《奏报暂驻韶郡督办清远等县防剿事宜》(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1209。

[35]林述训等修,单兴诗,欧樾华等纂.同治韶州府志:卷 24,武备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490.

[36]耆龄.奏报搜捕蓝山余匪攻破各寨歼捻积寇地面肃清现筹布置巡防情形(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3930.

[37]穆宗实录:卷 16[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452.

古巴比伦时期的历法与王权

陈李妍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0)

摘 要：古巴比伦的阴阳合历依托月相和太阳运行形成，适配农业与祭祀需求，为社会运行奠定时间框架。本文探讨了古巴比伦时期历法与王权的深层互动，旨在揭示古代社会时间秩序构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逻辑。以两河流域泥板文书、创世史诗等原始史料为基础，探究国王如何通过制定年名记录功绩、自主裁定闰月统筹财政、在征服地区强制推行历法，将自身塑为时间秩序的主导者，以此彰显权威、统筹行政。王权亦受宗教吉凶禁忌、地方传统及民间纪年习惯的制衡。因此历法与王权的互动，既体现了古代国家对时间秩序的建构，也反映了社会治理中多元力量的复杂关系，历法并非单纯的天文农业工具，更是王权构建合法性、实施社会治理的核心手段。

关键词：古巴比伦；历法；王权

DOI：doi.org/10.70693/202610080402

The Calendar and Kingship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Chen Liya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0

Abstract: The ancient Babylonian lunisolar calendar was based on the phases of the moon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sun. It was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agriculture and ritual and thus established a temporal framework for the functioning of socie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found interplay between the calendar and royal authority in ancient Babylonia, aiming to reveal the interactive logic underl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oral order and state governance in ancient societies. Drawing on primary sources such as clay tablets from Mesopotamia and creation epic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kings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dominant figures within the temporal order. They did so by naming years after their achievements, by independently determining intercalary months to manage public finances, and by enforcing the calendar in conquered territories. In this way, they demonstrated royal authority and coordinated administration. Royal authority was nevertheless subject to checks and balances imposed by religious taboos concerning auspicious and inauspicious days, local traditions, and popular practices of chronology. Consequent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alendar and royal authority not only embodies the ancient state's construction of temporal order but also reflect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diverse forces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 calendar was not merely an astronomical or agricultural tool. Rather, it served as a core instrument for constructing royal legitimacy and exercising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Old Babylonian; calendar; kingship

作者简介：陈李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

一、古巴比伦时期的历法

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为天文观测提供了天然的驱动力。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泛滥虽带来肥沃的冲积平原，却也因无规律的涨落威胁着农业生产。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古巴比伦人先后在这里定居，他们逐渐发现，河水的涨落、植物的荣枯、候鸟的迁徙，似乎都与天空中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运行存在某种神秘对应。这种对自然周期的朴素观察，成为天文历法的最初萌芽。学者们通过对出土于两河流域遗址的星象学和天文学泥板文书的研究，发现了天文学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晚期而兴盛于中、新和后巴比伦时期。

在古巴比伦创世史诗《埃努玛·埃立什》（*Enuma Elish*）中，描述了巴比伦之神马尔杜克击败混沌女神提阿玛特后，用其尸体创造天地万物和宇宙秩序的过程："他为伟大的诸神设立了天象，设置星座，作为众星的图样。他指定了一年，划分了时段，为十二个月各设置三颗星。"①最早被划定的时间单位是年，它与天体的运行轨迹紧密相连。太阳的周期被设定为 360 度圆周，每月的星座被理想地定为占 30 度 (实际上各有差别)，代表 30 天，形成天道 12 星座代表一年 12 个月的占星和天文理论。苏美尔文献《农人历书》中便有记载："当天空中星座位置恰当之时，不要吝于多次将牛群带到田地。锄头应耕作一切。"②特定星座的升起预示着农耕季的到来。

马尔杜克还创造了月神（苏美尔文献中称 Nanna，阿卡德文献中称 Sin）掌管黑夜，将月亮比作王冠："月初之时，普照大地，以双角之辉，标定六日。第七日，王冠半盈，十五日，月之正中，与日对峙。当沙马什（太阳神）于天际见你，循序渐亏，逆行其光。二十九日，趋近沙马什之轨道，……三十日，相合于日，与沙马什争辉。"③这一喻体直接关联着它的月相圆缺循环，以及王权的周期性更新。随着月相的盈亏从新月、满月到残月直至消失，决定了每个月的长度。新月出现则新的月份开始，满月出现在第 14 天或第 15 天，上弦月在第 7 天，下弦月在第 21 天前后，月末月牙消失，第三十天与太阳相合。④因此，新的月份的开始由新月的出现决定，一个月的月长是 29 天或 30 天，两河流域一些年度节庆也大多与新月或满月的出现有关。

从苏美尔人开始，两河流域的各城邦的历法都给每个月命以和宗教和农业生产有关的名称，以名称而不以序号定义每个月。起源于宗教中心尼普尔，后为巴比伦全国采用的尼普尔—巴比伦历法，其第一个月为尼萨奴月（Nisannu），大致相当于公历 3—4 月。两河流域国家制定的阴阳合历法既保留了以月相位为时间单位的古老传统，又使一年中的日数基本上对应于太阳的运行轨道。从而固定了春夏秋冬四季和农业节气在历法中的位置，为全国人民提供了生产不可缺少的、以准确的节气为核心的农业历法。按季节进行农业生产的实践使农作物获得最好的光和热，能够茂盛成长，保证了农业丰收。可以说精确的天文历法知识是两河流域文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王权对历法的干预

尽管时间是由众神赋予的，但历法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具掌握在国王手中。历法需要人为裁定的特性，也为王权的介入预留了制度空间。国王决定如何命名新年和如何插入闰月，有时他们还会决定一年应从何时开始，在新征服的城市中应使用哪些月份名称等等。

（一）年与年名

古巴比伦时期的年名通常根据上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来制定，年名所记载的内容涵盖了政治事件、军事行动、宗教事务和公共工程等多个领域。在马里档案中，由经济官员雅西姆 – 苏穆（Yasim-Sumu）写给马里末代国王兹姆瑞 – 利姆（Zimri-Lim）的秘书苏努赫拉 – 哈卢（Shunuhra-Halu）的信件，是我们了解古巴比伦年份命名过程的直接证据。内容为：

"关于你写信给我提到的年名，如下：'年：兹姆里 – 利姆向达贡（Dagan）神供奉了一座巨大的宝座。'但这座宝座尚未被供奉。我刚给国王送去一块泥板。名称应为：'年：兹姆里 – 利姆第二次前往巴比伦援助，抵达拉尔萨（Larsa）之地。'请就这块泥板提请国王注意，并将无论何种决定写信告诉我。"

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的年名命

① Horowitz, Wayne, Mesopotamian Cosmic Geography,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8.

② Civil, Miguel, The farmer's instructions: a Sumerian agricultural manual, Sabadell: Editorial Ausa, 1994.

③ Lambert, W. G, Babylonian Creation Myths,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13.

④ Britton, John P, "Calendars, Intercalations and Year-Lengths in Mesopotamian Astronomy", in John M. Steele ed., Calendars and Years: Astronomy and Tim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Oxbow Books, 2007.

名过程。国王为年份选定一个名称，并由他的秘书传达给经济官员，而雅西姆 – 苏穆反对这一提议，是因为所提及的向达贡神供奉宝座这一事件尚未实际发生。他转而建议使用另一个名称，该名称指的是前一年已经发生的事件，即兹姆里 – 利姆对巴比伦的援助。不过雅西姆 – 苏穆并未自行决定，而是将此事提交给国王，请求国王做出最终裁决。

国王并没有采纳雅西姆 – 苏穆的反对意见，事实上，那年的年号为“兹姆里 – 利姆向达贡献上宏伟宝座之年”，①我们可以推测兹姆里 – 利姆的这一选择背后具有政治意义。他拒绝纪念曾派往巴比伦的军事援助这一事件，是因为汉谟拉比拒绝将他派去协助围攻拉尔萨的部队退还给他，②这一事实可被视为其与汉谟拉比关系恶化的迹象。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结论，古巴比伦时期的年份名称是根据前一年已经发生的事件选定的，并且年名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国王手中，尽管官员可以提出建议，但国王有权采纳或否决。

按时间顺序编订年名列表，对王室宫廷与商业活动的行政管理而言至关重要。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兹姆里 – 利姆的纪年公式数量，是其实际统治年数的两倍有余。其中有些是为满足特定需求临时拟定的，使用范围十分有限，另一些则长期沿用，且与后世更为人熟知的同类纪年表述并行使用。在特尔卡城（Terqa），书吏似乎为他创制过一个地方专属年名：“年：兹姆里 – 利姆修筑特尔卡新城门”，③而这一年名并未见于马里王室文书的官方记载。将攻占城镇、重建城池、铸造神像等事件载入年名，实际是在王室功绩与历史记忆之间建立一种追溯性的关联，这些记录成为后世了解古巴比伦历史的重要史料。

（二）闰月与置闰

在古巴比伦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们采用协调太阳年和月本位阴历年（太阴历）的阴阳历合用的农业历法。月份的推算遵循月相周期变化，而年份的划分则依据太阳运行规律。这使得每年的历法时间与回归年相比，会产生约 11 天的差值，这一空缺需要通过增设闰月来补齐，该月名与前月名相同，用苏美尔语词汇 diri 代表多出的一个月，即闰月。④两河流域天文学者根据经验和对每年季节的计算，一个精确的历法需要平均每 2.7 年进行一次置闰，每 3 年或 2 年就要设置一个 13 个月的闰年，闰年中增加的一个 29 或 30 天的闰月一般放在年末（第 13 个月）或年中（第 6 月），以补足 3 个阴历年比 3 个太阳年减少了的 33¾天数。⑤虽然任何人都可以观察到日月和季节的顺序，但确定闰月和计算年份的工作则是政治领袖的职责。

至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置闰逐渐形成了固定规律，即采用“十九年七闰”的章法。⑥而在更早的年代，是否置闰则由君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裁定。在汉谟拉比和阿米迪塔纳统治期间，曾出现连续 4 年置闰的情况，导致民用历与季节年的偏移高达 75 天。目前已知最早的记载置闰的相关文献，与国家财政问题有关，见于一封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书信：“传谕辛・伊地那姆（Sin-Iddinam）：吾乃汉谟拉比。本年度当置一闰月，即将到来的月份应记作闰六月，原定七月二十五日将伊吉苏税解送巴比伦的指令，现改为于闰六月二十五日解送。”这封信展现出置闰的决定权无疑掌握在君主手中，其内容的核心意图为：即使增设了闰月，税款仍需按原定时间缴纳，不得顺延一月。

此外，在阿米萨杜卡（Ammi-Saduqa）的诏令第四条中，提及了阿米蒂塔纳（Ammi-Ditana）统治末年增置闰月的史实。其颁布的债务赦免令生效日期，并非如预期那般定在阿米萨杜卡第一年一月，而是被调整为阿米蒂塔纳三十七年的闰十二月。⑦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许是置闰举措不得干扰此前已确定的财政安排，相关政令必须按期执行，无论所涉日期的历法称谓如何变动。正是由于置闰，原定的阿米萨杜卡第一年一月，才被调整为阿米蒂塔纳三十七年闰十二月初一。

（三）军事征服与历法变更

在古巴比伦时期，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历法。

① A. L. Oppenheim, Erica Reiner, Ancient Mesopotamia: Portrait of a Dead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② D. Charpin, N. Ziegler, Florilegium marianum V. Mari et le Proche-Orient à l’époque amorrite: essai d’histoire politique, Paris: Société pour 'Étude du Proche-Orient Ancien, 2003.

③ Sasson, Jack M, From the Mari Archives: An Anthology of Old Babylonian Letters, Philadelph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④ 刘健：《古代两河流域新年礼俗、观念及其政治功能的演进》，《贵州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0 期。

⑤ 吴宇虹：《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世界历史》2009 年第 3 期。

⑥ Britton, John P, “Calendars, Intercalations and Year-Lengths in Mesopotamian Astronomy”, in John M. Steele ed., Calendars and Years: Astronomy and Tim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Oxbow Books, 2007.

⑦ F. Kraus, Königliche Verfügungen in altbabylonischer Zeit (Studia et documenta ad iura Orientis antiqui pertinentia), Leiden: E. J. Brill, 1984.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通行的尼普尔历法，先是在伊辛王国得到沿用，后来又推行至拉尔萨与巴比伦两地。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在沙姆希阿达德一世（Shamshi-Adad I）统治期间，同样采用这套历法，该历法也因此被称为沙姆希阿达德历法。因此沙姆希阿达德一世统治下的马里（Mari）、阿什纳库姆（Ashnakkum）、卡特拉（Karana）、舒巴特-恩利尔（Shubat-Enlil）、图图尔（Tuttul）等城市也使用该历法。但马里也有自己的地方历法，两种历法可以同时使用。通过某一地区出土文献所使用的纪年历法，出现突然替换为一种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历法的情况，可以判断这一地区可能经历了军事征服。

在取得某次格外辉煌的胜利后，部分君主会选择在胜利次年之后，继续以该事件为年号来纪念。如巴比伦国王苏姆拉－埃尔（Sumu-la-El）在位时期，他的第 13 年年号为“毁灭基什之年”一直延续到第 17 年“毁灭基什之第五年”。①在此之后，传统的纪年方式才重新得以恢复。我们可以通过梳理不同地区出土泥板文献中出现的年名，追溯出某个王国的政治扩张轨迹。在兹姆里—利姆统治时期，文献使用传统的当地历法来记录年份，但自汉谟拉比的军队进入马里王宫后，文献的日期便开始采用当时巴比伦王国使用的尼普尔历来标注。在苏库姆（Suhum）地区，小城哈拉杜姆（Harradum）地处幼发拉底河中游王国（先是马里王国，后为特尔卡王国）与巴比伦王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当地出土的泥板文献记载了该城历史上的三个阶段，②在被巴比伦征服后采用尼普尔历法，随后该城归属于特尔卡王国时又恢复了马里历法，当巴比伦重新征服占领哈拉杜姆后，历法再次改为巴比伦王国使用的尼普尔历法。

然而，历法的更替并非总是立即完成。西帕尔（Sippar）在被并入巴比伦王国后，其地方历法的若干月份名称一直沿用至汉谟拉比时期。同样，在马里被沙姆希－阿达德（Shamshi-Adad）吞并后，官方历法与地方历法曾长期并存。这种并存可能并非地方抵抗的表现，因为马里的官方行政机构本身也在沿用当地历法，而是马里宗教重要性所赋予的特权。

三、王权干预历法的目的与限制

王权对历法的干预首先服务于政治合法性的构建，年名制度将国王的军事胜利、宗教建设等功绩铭刻为时间的坐标，使每一份写有日期的文书都成为王权合法性的宣告。汉谟拉比征服拉尔萨后，他立即在新占领的城市强制推行自己制定的年名。根据拉尔萨泥板记载我们可知，汉谟拉比于在位第 30 年的 12 月 28 日进驻拉尔萨本土。③向新征服城市强制推行专属年号，不仅有着显而易见的宣传价值，促使其迅速被民众接纳，同时也是新统治者彰显自身权威的体现。

王权干预历法最直接的目的是行政管理的需要，一份出土于乌尔的文献显示，一个月内神庙神职人员的工作分配被分为三段，每段十天，以便计算薪资及其他发放。④书吏使用一套理想化的一个月 30 天系统，主要用于早期行政和会计计算，以简化利息、劳动义务等，这种划分体现了历法在行政管理中的实际应用。尽管历法始终以实际的月相为基础，但决定月份开始即第一天的方法，也经历了从观测到预测的转变。⑤这一转变主要源于实际需求。提前知道月份的开始，可以更好地筹备宗教仪式和节日。预测历法简化了信息传递，无需依赖从宗教中心向地方通报新月观测结果，极大便利了行政管理和商业活动。研究古巴比伦时期历法的楔形文字文献其中也大部分是行政管理文献，此外也包括法律文献。行政管理文献记录了在书写时已经发生或计划发生的物品和业务往来，因此在标记日期时所透露的历法时间概念，必然反映着特定历史情境中对于时间的理解。

尽管国王掌控着历法的制定和调整，但他的权力并非无限。年号虽然由国王钦定，但是给年份命名的方式或许并不是标准化和唯一的。在马里，我们发现人们会使用非官方年号来指代某一年份。上文提到的马里的雅西姆－苏穆便是如此，他在日常私用中，一直沿用那个曾向国王提议却未获采纳的年号格式。⑥私人档案中还记载有其他使用非官方年号的情况，尤以马里商人的首领

① M. J. A. Horsnell, The Year Names of the First Dynasty of Babylon, Hamilton: McMa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D. Charpin, “Harrâdum, entre Babylone et le ‘pays de Mari’,” in E. Cancik-Kirschbaum ed., Perspective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Norm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Berlin: Diversity and Standardisation, 2013.

③ D. Arnaud, “Larsa: Catalogue des textes et des objets inscrits trouvés au cours de la sixième campagne,” Syria, Vol. 53(1976), pp. 47-81.

④ Tanret, Michel,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 On Old Babylonian Month Lengths,” JCS, Vol. 56 (2004), pp. 5-12.

⑤ J. M. Steele, “The Length of the Month in Babylonian Calendars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in John M. Steele ed., Calendars and Years: Astronomy and Tim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Oxbow Books, 2007.

⑥ N. Ziegler, Florilegium marianum IV. Le Harem de Zimrî-Lîm, La population féminine des palais d’après les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Paris: SEPOA, 1999.

伊迪亚图姆（Iddiyatum）的卷宗为典型。因此我们推测当时是否存在两套并行的纪年体系，一套为官方行政所用，另一套则通行于民间。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马里出土的私人契约中会存在如此多的“非标准纪年”日期以及沙姆希 – 阿达德王国境内出现的某些年号的特殊使用案例，但是在马里地区发现更多私人档案之前，这个问题仍需存疑。

此外，宗教禁忌也对国王的行为构成约束。择日宜忌文献，即记录各类行事适宜与禁忌之日的文书。在古巴比伦时期尚未以成文典籍的形式出现，这种典籍化的形态要到后世才得以形成，①然而，有证据表明当时已存在对历法中择日的关注。埃什努那国王伊巴尔 – 皮埃尔二世（Ibal-pi-El-II）的一封书信中就曾提及“吉日”，即阿达德神前往哈穆鲁姆（*hamrum*）的日子。②在一份公元前一千纪的文献中，就有关于辛神与沙马什神的记载：“（二神）均临凡世，为这片土地裁断诸事。”③汉谟拉比在与马里国王兹姆里 – 利姆缔结盟约时，因考虑到神名“辛”在盟约中出现，拒绝在 25 日这一不吉日宣誓。使节报告说：“25 日那天，他并未应允结盟，说：‘若盟约文书中未提及辛神，我便会在 25 日定下盟约。可文书中既然写有辛神之名，我便不能在这一日盟誓。’”古巴比伦时期的这种情况，与后世的择日传统一脉相承。这表明，国王需要遵守宗教中凶吉日禁忌的规定，不能随心所欲地择取时日盟誓缔约。

四、总结

通过对古巴比伦时期历法与王权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历法在古巴比伦并非单纯的天文与农业工具，其从形成到实践的全过程，均与王权产生了深度且复杂的互动，成为王权实施社会治理、构建政治权威的核心载体。历法的形成与发展根植于两河流域农业生产对自然周期的依赖，并在长期的天文观测与经验积累中，逐步演化为以阴阳合历为核心的时间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月相决定月份长短，置闰协调年度周期，农业节气得以相对固定，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历法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古巴比伦时期的国王通过年名制定、闰月增设和历法推行等方式，将自身塑造为时间秩序的主导者，借助历法实现对行政管理的统筹、对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以及对历史叙事的主导。年名将国王的功绩铭刻为时间的坐标，闰月的调整服务于财政安排与政令执行，历法的强制推行则成为军事征服之后权力渗透的重要手段。在此意义上，历法成为王权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而，王权对历法的掌控并非单向的支配。宗教禁忌对吉凶日的规定，对国王的盟誓、缔约等行为构成实质性约束。地方历法在官方历法推行之后仍长期并存，反映出宗教中心与地方传统对王权的制衡。而民间非官方纪年方式的多元存在，更反映出官方与民间时间观念的分化。这些现象表明，历法制度在古巴比伦时期既服务于王权的集中，也承载着社会多元力量的博弈与妥协。国王虽掌控历法的制定权，却仍需在宗教规范、地方传统与行政现实之间寻求平衡。总的来看，古巴比伦时期的时间观念，既是天文观测与科学知识的结晶，也是权力运作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历法与王权的交织，不仅塑造了当时的时间秩序，也为后世理解古代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① A. Livingstone, “The Case of the Hemerologies: Official Cult, Learned Formulation and Popular Practice,” in E. Matsushima ed., Official Cult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Heidelberg, 1993.

② K. Reiter, “Altbabylonische Verträge unter Beachtung günstiger Tage,” MARI, Vol. 7 (1994), pp. 359-363.

③ A. Livingstone, Mystical and Mythological Explanatory Works of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 Oxford: Clarendon, 1986.

参考文献:

[1]Horowitz W. Mesopotamian Cosmic Geography [M].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8.

[2]Civil M. The farmer’s instructions: a Sumerian agricultural manual [M]. Sabadell: Editorial Ausa, 1994.

[3]Lambert W G. Babylonian Creation Myths [M].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13.

[4]Britton J P. Calendars, Intercalations and Year-Lengths in Mesopotamian Astronomy [C]// Steele J M. Calendars and Years: Astronomy and Tim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Oxbow Books, 2007.

[5]Oppenheim A L, Reiner E. Ancient Mesopotamia: Portrait of a Dead Civiliza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6]Charpin D, Ziegler N. Florilegium marianum V. Mari et le Proche-Orient à l’époque amorrite: essai d’histoire politique [M]. Paris: Société pour l'Étude du Proche-Orient Ancien, 2003.

[7]Sasson J M. From the Mari Archives: An Anthology of Old Babylonian Letters [M]. Philadelph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8]刘健.古代两河流域新年礼俗、观念及其政治功能的演进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7 (10):112-118.

[9]吴宇虹.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 [J]. 世界历史, 2009 (3):89-98.

[10]Kraus F. Königliche Verfügungen in altbabylonischer Zeit [M]. Leiden: E. J. Brill, 1984.

[11]Lacambre D. Niggallum, lecture akkadienne du mois ŠE.KIN.KU5 dans le calendrier dit ‘de Samsî-Addu’[C]//Durand J-M, Charpin D. Recueil d’études à la mémoire d’André Parrot. Paris: SEPOA, 2002.

[12]Horsnell M J A. The Year Names of the First Dynasty of Babylon [M]. Hamilton: Mc Ma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Charpin D. Harrâdum, entre Babylone et le ‘pays de Mari’[C]//Cancik-Kirschbaum 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Norm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Berlin: Diversity and Standardisation, 2013.

[14]Arnaud D. Larsa: Catalogue des textes et des objets inscrits trouvés au cours de la sixième campagne [J]. Syria,1976,53:47-81.

[15]Tanret M.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 On Old Babylonian Month Lengths [J]. JCS,2004,56:5-12.

[16]Steele J M. The Length of the Month in Babylonian Calendars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C]//Steele J M. Calendars and Years: Astronomy and Tim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Oxbow Books, 2007.

[17]Ziegler N. Florilegium marianum IV. Le Harem de Zimrî-Lîm, La population féminine des palais d’après les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M]. Paris: SEPOA, 1999.

[18]Livingstone A. The Case of the Hemerologies: Official Cult, Learned Formulation and Popular Practice [C]//Matsushima E. Official Cult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Heidelberg: 1993.

[19]Reiter K. Altbabylonische Verträge unter Beachtung günstiger Tage [J]. MARI,1994,7:359-363.

[20]Livingstone A. Mystical and Mythological Explanatory Works of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 [M]. Oxford: Clarendon, 1986.

全球南方转向下黎紫书小说的南洋众生书写与跨族群叙事

陈矿

(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黎紫书是马华文学由“悬浮”走向“在地”的标志性作家。本文以全球南方转向为理论视域，以《流俗地》为中心、兼及《告别的年代》诸作，考察其南洋众生书写与跨族群叙事。黎紫书以盲女银霞的非视觉感知为叙事方法，卸除族群标签与视觉中心主义，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大族群聚拢于锡都楼上楼的市井日常，以深描式笔法呈示锡矿之都兴衰中的空间政治与地方感；其创作完成从先锋创伤书写、国族寓言到跨族群日常共生的主题转向，既解构中心—边缘秩序，亦改写“雨林暴力”式的马华叙事定式。在全球南方文学坐标中，这一“流而不俗”的众生图景以魅态文化回应拉美魔幻传统，以饮食、节庆与鬼神信仰的微观深描贡献地方性知识的文学样本，为华语文学研究与全球南方话语建构提供去中心化的启示。

关键词：黎紫书；《流俗地》；全球南方转向；跨族群叙事；南洋众生书写

基金项目：中国周边国家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资助项目“全球南方转向下当代马华文学跨族群书写研究”（课题编号：26ZBGJ-B001）阶段性成果。

DOI：doi.org/10.70693/202610252969

The Portrayal of the South Seas people and the Cross-ethnic Narrative in Li Zishu's Novels under the Global South’s Turn

Chen Kuang

College of Chinese& ASEAN Arts,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Li Zishu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who has 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laysian-Chinese literature from "floating" to "local". This article, with the theory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shift, focuses on "The Ordinary Place" and also includes other works such as "The Era of Farewells", to examine her portrayal of the South Asian people and her cross-ethnic narrative. Li Zishu uses the non-visual perception of the blind woman Yinxia as the narrative method, removing ethnic labels and visual centrism, gathering the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of Chinese, Malay, and Indian around the urban daily life of the tin capital. With a detailed description style, she presents the spatial politics and local sense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in capital; her creative work has completed a thematic shift from avant-garde trauma writing, national allegory to cross-ethnic daily coexistence. It not only deconstructs the center-periphery order but also rewrites the "rainforest violence" narrative pattern of Malaysian-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global South literary coordinate system, this "flowing but not vulgar" picture of people responds to the magical tradition of Latin America with charm culture, contributes a literary sample of local knowledge through micro-level detailed depictions of food, festivals, and beliefs in ghosts and gods, and provides decentralized enlightenment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South discourse.

作者简介：陈矿(198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比较文学与艺术美学。

Keywords: Li Zishu; *The Ordinary World*; Global South Turn; Multicultural Narrative; Writing about the People of Southeast Asia

“全球南方”作为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理论视野，其核心关切在于对殖民现代性遗产的反思，以及对中心—边缘不平等秩序的解构。在这一视野下，文学研究开始重新审视那些长期处于世界文学版图边缘的写作实践。马华文学因其独特的族群构成、殖民历史与离散经验，天然构成观察全球南方问题的绝佳样本：华人在马来西亚既是定居数百年的“在地者”，又始终面对国族政治中的边缘位置，这种“内在的边缘性”使马华文学的跨族群书写成为全球南方去中心化命题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而微的实践。

黎紫书是当代马华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从早期以先锋姿态书写梦魇与创伤的短篇创作，到《告别的年代》的后设实验，再到《流俗地》以盲女古银霞的“视域”为辐辏点、折射锡都怡保华人底层众生相的写实转向，其创作轨迹本身就浓缩了马华文学的当代嬗变。《流俗地》问世以来，学界围绕其叙事特征、市井美学、在地经验与空间表征、地方感营构、“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化可能以及不可靠叙述、创伤叙事、魅态文化书写等层面已有相当积累。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文本内部的形式分析或单一维度的文化阐释，而将黎紫书创作置于全球南方转向的宏观视野下，系统考察其跨族群书写的成果尚不多见；对《流俗地》中华、巫、印三大族群共生结构的探讨，亦多被“地方书写”“女性文本”等框架所遮蔽。

鉴于此，本文以黎紫书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全球南方转向为核心理论视野，紧扣“全球视野—本土实践—区域差异”三重维度展开论述：首先梳理全球南方文学去中心化命题与马华文学研究的内在关联，搭建理论框架；继而立足马来西亚族群政治语境，借鉴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与“深描”的方法，结合文本细读剖析黎紫书跨族群书写的主题演变、美学策略与身份表达；最后聚焦东马与西马的区域差异，并探讨其书写与全球南方其他区域文学的南南联结可能。本文力图通过黎紫书个案，揭示马华文学在全球南方文学版图中的独特价值，为华语文学研究与全球南方文学话语建构提供参考。

一、全球南方转向与黎紫书书写的理论视野

（一）全球南方文学的核心命题：去中心化与中心—边缘秩序的解构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由地缘政治术语转译为文化批评范畴后，其核心命题便不止于地理的南北分野，而是认知论层面的去中心化：解构以单一文明为顶点、以边缘为匮乏的等级图式，转而承认南方社会自身经验与知识的生成性。就文学而言，这一转向表现为三重位移：边缘经验取代中心想象成为叙事主体；方言俗语与多语混杂进入文学语言；日常生活取代宏大事件成为进入历史的入口。这一位移在拉丁美洲、非洲与东南亚文学中几乎同步发生，构成南方文学共享的世纪经验。正是在此意义上，吉尔兹将地方性知识视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石，主张以“深描”穿透表象进入意义之网，文学则是最具综合性的深描实践。既往以詹姆逊“民族寓言”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学论述，惯于将南方文本读作国族命运的隐喻注脚，边缘因此永远处于“被阐释”的位置。全球南方的文学批评正是要在这一处倒转目光：不再追问南方文学如何印证中心的理论，转而追问地方性知识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发明普遍性。马华文学恰身处这一张力的漩涡：它既被华语文学传统之中心所笼罩，又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体制中被排斥，双重边缘处境使它天然成为检验去中心化命题的试金石。

（二）全球南方转向与马华文学研究的内在关联

马华文学研究长期为“中国性、边缘性、悬浮”三关键词所主导，其问题意识正是中心—边缘秩序的产物：相对于汉语文学母体，它是边陲；相对于马来西亚国语文学，它又是异质。历史地看，1957 年独立、1969 年“五一三”事件、新经济政策的族群配额，直至 1990 年代民族政策的融合化调整，构成马华身份书写的社会地层。在此语境中，以黎紫书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自觉告别“悲情”与“自怜”，转向“反族群本质论、在地性、主体间性”的书写。黎紫书自陈“不再强调斗争性，而试图呈现不同族群的磨合与共处”，正与全球南方文学以日常生活承纳历史创伤的取向同构。值得注意的是，马华文学长期被排除于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体制之外，这种制度性边缘化与全球南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处境同构，

使马华经验成为检验南方文学自主性的典型案例。全球南方转向为马华文学研究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重估框架：将马华问题从华语文学内部的支流议题，重置于全球南方多族群社会如何共处、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的普遍命题之中。

（三）黎紫书创作的位置：从《告别的年代》到《流俗地》的轨迹及其意义

黎紫书 1971 年生于霹雳州首府怡保，其创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以《天国之门》《山瘟》诸篇营造梦魇氛围与异质空间，家宅、阁楼、旅馆成为禁锢与欲望的容器；中期《告别的年代》（2010 年）以“俄罗斯娃娃”式的三层后设结构处理未曾亲历的“五一三”创伤，书从第 513 页写起，马来语“玛纳”（哪里）一词出现一百二十八次，那本没有出版社、没有版权页的“大书”是正在消失的南洋语言的挽歌；晚期《流俗地》（2020 年）则急遽转向，以四十个小节倒叙连缀锡都三十年人事，小节题如词条，春分、夏至与奚仔之死、南乳包、点字机并列，日常与节气同构，首尾扣住 2018 年 5 月 9 日马来西亚首次政党轮替。黎紫书自道“时间才是这个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正揭示其由元小说时间游戏转向时间作为命运载体的变化。王德威以“柳暗花明的寓言”称许这一转向，潘雨菲则强调其非断裂而是二十余年积累的“大成若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向并非对先锋性的放弃：蔡晓玲称其“以先锋为矛、以传统为盾”，形式实验仍在，只是收敛于市井的肌理之中。从先锋创伤到在地深描，这一轨迹使黎紫书成为考察马华文学乃至全球南方文学转型的枢纽性个案。

二、南洋众生书写：跨族群书写的主题与美学策略

（一）族群拼图与底层众生相：《流俗地》三大族群关系书写与市井日常叙事

《流俗地》的南洋众生相以楼上楼为圆心展开。近打组屋底层一店一族群：秀强踏车、瑞成五金、丽丽裁缝、明明药行，马来人的服装店、印度人的杂货铺、巴布的理发室、玛吉的茶室比邻而设，族群拼图首先是一幅铺面的地图。组屋外墙的铁窗花如白鸽笼，二十层的高度曾是城中地标，如今被更高的楼群遮蔽。住户亦各有其业：奚仔开罗厘，老古驶德士，马票嫂卖万字票，宝华报馆经营新闻与闲话。教育的三段失败路亦构成底层的隐线：马票嫂退学，银霞被坝罗华小拒收，婵娟因学生自杀辞职。而贯穿全书的“铁三角”，即以盲女银霞、华人细辉与印度裔拉祖三个边缘孩童的友谊，将族群共处从空间事实升华为情感事实：拉祖读华小、华文考 A，玛吉给细辉起印度名“细辉·巴布之子”，签文“三姓俱相伴”仿佛为这段关系写下谶语；银霞听收音机里的《西游记》历数八十一劫，把盲棋下成一场小小的江湖。但黎紫书并不将共处写成融合的乌托邦：梁金妹拒请拉祖赴宴，理由是“非亲非故，非我族类”；老古嫌拉祖“黑皮肤没法跟亲戚解释”；学者更敏锐地指出，“仨”章三主角中独缺马来裔。共生与隔阂并存，日常与创痛同室，这才是南洋众生书的真实肌理。市井日常叙事的价值正在于此：德士电召台从日接千电到“老兵死守的荒地”，锡都无线德士的兴衰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矿都经济史，底层人物的柴米油盐因而成为大历史的另一种纪年。

（二）美学策略：“盲”作为方法、方言俗语与魅态文化中的族群交融

“盲”是黎紫书最重要的美学装置。她自白：“我想从一个盲人的角度去看这个社会，她的眼睛看不到那么多标签……盲点其实比盲人更多”。银霞以听觉、嗅觉、触觉“把整个锡都详细描绘在黑暗中”，倒背《大伯公千字文》而默画锡都地图；被性侵后面对父亲“是马来人么？印度人么？华人么？”的逼问缄默不答，恰以不视之眼取消了族群指认的暴力。胡星灿由此读解出“群体的‘盲’、人性的‘盲’、历史的‘盲’”，其论与德里达《盲者的回忆》、列维纳斯对“光的暴力”的批判一脉相承。陈雅思更从叙述学层面指出，视障正是《流俗地》不可靠叙述的核心机制，隐喻马华“在而不属于”的处境；刘诗宇则称此书为“不见色”的无字书，银霞在超越性与世俗性之间安稳生活；曾麒霖将这种跨感官的体悟概括为“自我”的拓展与想象。李礼注意到黎紫书以皴染式的勾勒与重复铺陈这幅浮世绘，盲视反衬洞见，“流俗”二字在土部、水部与“人谷”的字源中显出深意。与“盲”互为表里的是语言的深描：怡保以广东话为底色，华文里浮动着德士、摩哆、罗厘、巴刹、娘惹、叻沙等英、马、淡米尔音译词；马票嫂通晓粤、客、闽、潮及淡米尔语、马来语，“辨不出来说话者祖籍梅县”；银霞给猫取名淡米尔语“普乃”，被人质疑时答“那又怎样”，多语混杂在此不再是失语的症候，而是族群交融的语言学在场。魅态文化

则构成第三重策略：马绍玺指出黎紫书“既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又吸纳马来西亚华人的鬼魅文化信仰”，楼上楼的女鬼、何门方氏的问米、方士驱邪的步罡踏斗，与诸神“七十二家房客似的各居其所，排排坐食果果”的石窟寺景观交织，人、鬼、神三性共居正是南洋市井的信仰生态。这种信仰生态不是异域奇观，而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各自携带的神明在同一屋檐下的相遇，“赋魅”与“祛魅”在其中互为表里，它同时是跨族群叙事与全球南方魔幻传统对话的接口。

（三）主题演变：从先锋创伤书写到跨族群日常共生的转向

回望黎紫书创作全程，主题演变的轨迹清晰可辨：早期文本以梦魇与异质空间书写欲望的禁锢与出走，创伤以嚎叫般的先锋姿态呈现；《告别的年代》将“五一三”编码为后记忆的缺页与空白；至《流俗地》，创伤转为隐性在场，“五一三”下沉为组屋男人们闲谈的谈资，拉祖之死被压缩于一节而前无预兆，银霞的受侵迟至不惑之年的自述方得言说。陈静指出，创伤症候经由言说而获疗愈，个人创伤终而接通族群创伤，并超越至普遍人性。黄家骏以空间叙事理论比勘两部长篇，概括马华身份由断裂飘忽到稳定确定的转变。创伤不再攫取叙事，而是被日常承纳、被时间消化。陈欣欣以巴赫金狂欢理论读出其中的“日常化狂欢”，即底层在压抑中自创的生存智慧；大辉为投票从外地归来，节庆与选举在组屋的日常中交织，成为“五一三”之后历史再度现身的瞬间；丁浔予以“播种胜于烧芭”概括这一由“黑暗之心”到“也有光”的变迁。从创伤到共生，并非遗忘，而是将伤口放入众生日常的肌理中慢慢愈合，这正是跨族群叙事由主题层面转入伦理层面的标志。

三、地方性知识的文学深描：身份表达与在地认同

（一）锡都空间与族群地理：矿都兴衰中的空间政治与跨族群聚居

锡都即怡保，霹雳州首府，近打河畔因锡矿而享“世界锡都”美誉，至黎紫书出生时已成没落锡矿之都。怡保的荣枯系于锡价，小说中德士、旅馆、组屋的兴衰皆是矿都命运的余响。小说的空间书写深嵌这部矿业兴衰史：州府、锡埠、锡都的命名演变，记录着地方如何被现代资本命名又抛弃；开篇即写“锡都是个山城，路南重峦迭嶂，山壁许多山洞像被史前巨大白蚁蛀空作巢，都被开辟成石窟寺”，地质与信仰在同一条山脉上交叠。樊昕媛以“锡都”为巨大的时空体隐喻，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在其中互为缩微与放大。空间的位移更是族群政治的显影：文冬新村是殖民时代新村制度的产物，楼上楼是“暂居地”性质的过渡栖身之所，美丽园则是后现代式的封闭排屋；近打组屋曾为城中最高，却随城市扩张退入暗角，正对应马华社会由中心到边缘的位移。岳寒飞借列斐伏尔“都市的半殖民主义”揭示这重空间政治。但边缘空间同时是族群交汇的沃土：组屋临小印度、坝罗华小与旧街场茶室，五兵路石窟寺群一窟一庙、诸神并祀；平乐居茶室日间是市井的信息集散地，入夜则被闲谈与鬼故事填满。跨族群聚居在空间上早已先于叙事而存在。黎紫书让银霞以听觉行走六百多平方公里的锡都，遂使空间从背景变为可见的命运，近打河畔的楼上楼由此同时是居所、记忆与政治寓言的三重空间。

（二）从“离散”到“在地”：跨族群身份的建构与认同嬗变

马华文学的经典母题是离散：旅馆、阁楼、边陲反复充当无根之喻。黎紫书的意义在于以“域内人”立场完成从离散到在地的转向：在地经验不是知人论世的外部判断，而是人与地方长期厮磨中生成的知识体系。银霞失明之后反而最确凿地拥有锡都，她以记忆和感官为地方建立秩序，给顾有光的盲文信里写着“老师你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空气中的变化”，爱以触觉的形态存留；陈力君称其“残障而神性”，灵光恰在暗黑处显现；翟业军则说，银霞“安稳生活于墨一样的世界，并不想踏入五光十色”，她通晓的并非视觉的锡都，而是声音的、气味的、温度的锡都，这种知闻方式本身便是对“眼见为实”的南方式反诘。认同的嬗变在个体命运中层层展开：拉祖由华小状元而律师而参选，其印度裔身份在华人社会中一路华化，最终却以巴冷刀下的横死暴露融合的裂痕；周笑津与马来青年安德鲁相恋，后者皈依伊斯兰、改名阿都奥玛并当选国会议员；银霞被称作“迦尼萨大神眷爱的孩子”，她以右掌竖起的象神手印回答“断掉的右牙象征为人类牺牲”，印度象神护佑华人盲女，构成郭盈颖所谓混杂文化身份的“第三空间”；老古则象征第三代的妥协与麻木，华人身份在琐碎生计中磨去锋

芒。与此同时，最虔诚的华人信徒婵娟恰是全书最刻薄自私的人物，这近乎故意为之的祛魅，宣告“中国性”不再是身份的唯一尺度。从离散到在地，身份不再是被追认的祖源，而是被实践出来的共处。

（三）“地方感”的形塑：饮食、节庆与鬼神信仰的深描及其诗学意义

地方感经由最日常的物事成形。饮食方面，芽菜鸡、白咖啡、豆腐花与鸡丝河粉之外，印度女人年夜烹咖喱牛羊肉，苏门答腊女佣做黄姜饭与巴东牛肉，五月花旅馆 301 号房的咖喱羊肉辛辣味成为母亲记忆的延伸；拉祖为细辉捉翠鸟入药治哮喘，被秦俊杰读作“以食为药”的国族寓言。节庆方面，锡都九月节日密集：中元、中秋、独立日、哈芝节、回历新年、大伯公诞、屠妖节接踵而至，中秋夜组屋各层搬出折叠桌祭月，孩子提灯笼到处跑，大宝森节拉祖家一楼设起神塔，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时间表在同一个屋檐下交错为历法。鬼神信仰方面，拿督公与大伯公并祀为土地神，石窟寺中迦尼萨、观音、财帛星君同龛，鬼月立佛号石碑，中元普渡与哈芝节并置。这些细节正是吉尔兹意义上的深描对象：南乳包的香味能瞬间唤回整段今昔记忆，每一味食物、每一个祭仪都是可解码的文化符号，地方感由此从抒情修辞落实为可触可尝的肌理。段义孚说，对空间完全熟悉时，它便成为地方；马票嫂回首一生，“成了巴刹里高挂的一盏灯或梁上的燕子”，人亦如地方一样被岁月安放下来。黎紫书以饮食、节庆、鬼神的深描完成的，正是这一由空间到地方的命名：地方感即认同的物质化，“流而不俗”的锡都由此获得诗学意义上的自足。

四、区域差异与南南联结：黎紫书书写的空间视野

（一）东马与西马之间：族群结构、书写主题与作家情感的差异及张力

马华文学素有“三版图”之分：西马、东马与旅台。东马书写以婆罗洲雨林为舞台，张贵兴《野猪渡河》、李永平《大河尽头》以原住民、猎头与淫雨奇观构建南方想象；旅台作家黄锦树则以《雨》《乌暗暝》的暴力情欲寓言著称。相比之下，黎紫书始终立足西马怡保的城市市井，族群结构上面对的是华、巫、印三大族群密集共居的社会，而非雨林与原住民。书写主题因之殊异：东马雨林派让历史以暴力显影，黎紫书却让历史“温文尔雅”地过滤为饮食与日常；作家情感亦判然有别，旅台作家在“蕉风椰雨”的标签化期待中写作望乡，黎紫书则以“域内人”的笃定宣称“吾若不写，无人能写”。东马与旅台作家的情感底色是流亡与乡愁，黎紫书的情感底色则是扎根与共处：前者以距离书写故土，后者以厮磨书写当下。翟业军以“锡都就是锡都，马华就是马华”为这一姿态命名，其深层张力在于：当雨林奇观成为马华文学的国际通行证时，市井日常能否承载同等的文学尊严。本文认为，东马与西马并非高下之别，而是马华经验的两极；在“在地经验”的知识谱系中，西马城市的市井并非雨林的对立面，而是马华经验的另一种纵深：它把历史从丛林搬回屋檐之下，让族群共处的日常成为叙事的土壤。黎紫书的西马城市书写以“在地”纠正“奇观”，恰使马华文学的版图趋于完整。

（二）南南联结：黎紫书跨族群书写与全球南方其他区域文学的对话

全球南方文学的互证不必经由北方中转，黎紫书的写作正提供南南对话的接口。其一，与拉美文学的联结：马绍玺明确指认黎紫书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而“赋魅”与“祛魅”双线并进，操乐鹏则析出其马尔克斯式的时态句法与普鲁斯特式的记忆诗学，楼上楼的女鬼、会问路的亡魂与马尔克斯、鲁尔福笔下的亡灵世界声气相通，但黎紫书将魔幻日常化，鬼魅不再是超现实装置而是市井信仰本身；这与其说是“赋魅”，不如说是对“祛魅”的反拨，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进程在南洋并未完成，神明仍与凡人同住。其二，与印度文化经验的联结：迦尼萨象神贯穿全书，拉祖之名近于泰米尔语 Rajah，淡米尔歌谣与印度鼓声进入华文叙事，这与印度英语文学、泰米尔文学处理多语混杂的路径形成平行；迦尼萨的断牙在中国语境中几无先例，却被黎紫书化为牺牲与救赎的南方寓言，可见南方诸传统之间的可译性。其三，与更广义的南方经验的联结：多族群、多语言、多宗教并存的锡都，是后殖民南方城市的缩影，其“磨合与共处”的经验可与加勒比、非洲文学中的克里奥尔处境互为镜鉴，全球南方文学共享的，正是这种以混杂性抵抗纯净叙事的语法。需要说明的是，南南联结在马华研究中尚属拓荒，本文的比较仍以平行与呼应为主，系统的跨国文本对读有待比较文学方法的展开，这恰是黎紫书研究通向全球南方的学术空位。

（三）区域边缘经验的文学价值：对西马主流马华叙事的补充与改写

西马马华叙事的主流长期由历史悲情、族群冲突与中国性焦虑主导，黎紫书以女性、盲人、市井三重边缘视角予以补充与改写。伍燕翎将《流俗地》定位为首部女性视角的方志文本，以地方志笔法写女性精神归属，改写了大写历史的性别盲区；操乐鹏更将其体式溯至史传“列传”与说书人的素人志传统，指出长篇乃由短篇《虚线连接二则》衍生而来。谢蓉指出黎紫书以“小写”历史回应铁抗、方北方式的反殖建国史诗，马共题材在《州府纪略》中化为女伶与彩莲的爱情外衣，历史由此获得日常的体温；刘俊则以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与《红楼梦》的“类”人物为参照，指出黎紫书的锡都具备自成体系的文学地理。朱崇科曾质疑这一策略的“失据”：情节淡化，对大马当下乏力，拉祖之死“如石子落水”。但边缘经验的文学价值恰不在于提供雷霆，而在于细密：韩宇瑄论其“细腻中见大气象”，李俏梅析其诗性叙事中的存在领悟，都指向同一判断，当中心叙事热衷于总结时代时，边缘叙事以一个人的死、一道咖喱的气味、一台德士电召台的兴衰，保存了时代无法概括的部分。素人志的体式决定了小说的目光始终向下：说书人不以英雄为对象，而以众生为对象。这不是对主流的逃逸，而是对主流的补充性改写，让“流俗”成为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五、全球南方文学版图中黎紫书书写的价值与启示

（一）跨族群书写对中心—边缘秩序的文学解构：马华经验的世界性意义

黎紫书的跨族群书写在三个层面实施对中心—边缘秩序的解构。其一，叙事主体的倒置：以盲女银霞，即边缘中的边缘，作为公平观世的支点。黎紫书自陈失明者如同蒙眼的司法女神，弱者由此反转为人间的裁判者；银霞的声音亦被比作“前世传教士”，电台接线员的身份使她成为整座城市的听觉枢纽。其二，语言秩序的松动：多语混杂进入华文文学，使“标准汉语”这一隐形中心失去单音独鸣的权威，南洋腔调成为合法的文学语言。黎紫书在《语言的芜杂与美丽》中写道，华文“被家国上的政治和历史抚育过，被殖民的背景润饰过，被友族的亲切问候和色彩丰富的文化打动过”，语言的芜杂正是南方历史的皱纹。其三，空间叙事的重置：楼上楼从“城中最高”到“暗角”的位移，把边缘经验空间化、物质化，边缘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被看见的处所，锡都由此从一个具体的马来西亚城市上升为可辨识的南方城市原型。马华经验的世界性意义正在于此：华、巫、印三大族群在同一屋檐下共存、摩擦、疗伤的百年史，是全球南方多族群社会普遍处境的浓缩样本；“流而不俗”的书写则提供了一种以日常对抗宏大、以地方性知识对抗中心话语的美学方案。当《流俗地》以平行而非依附的姿态与拉美、印度文学对话时，它证明边缘不是中心的匮乏，而是另类的丰饶；王德威尝以“张贵兴出奇制胜，黄锦树怨毒著书，黎紫书探触悲悯”概括三家之别，悲悯正是边缘经验最具世界性的表情。

（二）对华语文学研究与全球南方文学话语建构的启示

就华语文学研究而言，黎紫书提示研究者突破“中国性”的一元框架，以“在地性”与“主体间性”重绘华语文学版图：马华文学不应只是“世界华文文学”的边缘支流，而应被视为全球南方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新生代作家对“在地性”的自觉，与后殖民批评对“后民族”身份的思考同声相应。就全球南方话语建构而言，黎紫书的启示在于方法：去中心化不能止于口号，而需吉尔兹式深描的耐心，地方性知识只有经由文学的诗性转译，才能成为可流通的世界性知识。翟业军引黄锦树语“马华文学政治动力远大于文学动力”，而黎紫书“作为异数”以文学自身的力量说话，正说明南方文学话语的建构必须尊重文本的美学主权；黄锦树曾以“513 符号大概也是个假靶”质疑后设游戏的有效性，黎紫书的回应则是将历史还给日常，让象征下沉为生活本身。就方法论而言，本文印证了文本细读、史料梳理与理论对话内外打通路径的有效性：锡都的矿业史、新村制度、族群政策与银霞的盲文信、巴布理发室的气味互为表里。当然，全球南方视角下的马华研究仍处拓荒期，跨族群书写与南南联结的学理体系有待更多个案支撑，这是黎紫书研究面向未来的广阔空间。

结语

黎紫书以盲女银霞的非视觉深描，将马华文学的族群寓言改写为南洋众生的日常史诗：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在楼上楼共居、共食、共节庆，

“共生与隔阂并存”的市井真实取代了单一悲情；“盲”作为方法、方言俗语与魅态文化作为语言与信仰的深描，使跨族群书写完成从先锋创伤到日常共生的美学转向；锡都的矿业兴衰、空间位移与地方感形塑，则以地方性知识回应全球南方文学去中心化的命题。其价值不只在为马华文学确立“流而不俗”的经典品格，更在于以平行而非依附的姿态参与全球南方的文学对话，证明边缘经验的文学尊严。本文亦存局限：南南联结的比较仍以平行呼应为主，缺乏系统的跨国文本对读；东马—西马之外，与印度英语文学、菲律宾华文文学等南方文脉的横向参照尚待展开。未来可从比较文学方法、跨媒介传播、影视改编与译本接受等方向继续拓展，使黎紫书研究真正汇入全球南方文学的话语建构。

参考文献：

[1] 刘健. 马华文学身份书写转变的社会性研究——以《流俗地》为中心[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25(1).

[2] 刘俊. 黑暗·地方志·写实/象征——论黎紫书的《流俗地》[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2(1).

[3] 林培源. “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如何可能——关于黎紫书《流俗地》[J]. 南方文坛, 2021(6).

[4] 蒋成浩. 黎紫书小说的梦魇氛围与异质空间[J].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5] 张嘉茵. “禁锢”与“出走”——黎紫书小说欲望书写的两种空间维度[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5).

[6] 郭紫薇. 记忆唤醒之后：黎紫书《告别的年代》的后设与后记忆[J]. 小说评论, 2025(1): 102-109.

[7] 李世鹏. 多维度时空图景的建构[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1.

[8] 李俏梅. 叙事的诗意及对存在的诗性领悟——论黎紫书长篇小说《流俗地》的诗性叙事结构[J]. 中外文论, 2021(2).

[9] 蔡晓玲, 韦丁华. 先锋与传统之间：黎紫书小说叙事技巧流变[J]. 小说评论, 2025(1): 110-118.

[10] 潘雨菲. 黎紫书论——以《流俗地》为中心[D]. 扬州: 扬州大学, 2024.

[11] 王艳芳. 南洋浮世绘：论黎紫书《流俗地》的“地方”书写[J]. 华文文学, 2021(3).

[12] 梁秀敏. 黎紫书小说的“锡都”空间研究[D]. 南宁: 南宁师范大学, 2021.

[13] 戴瑶琴. 《流俗地》“在地”书写的方法[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1(2): 60-65.

[14] 操乐鹏. 讲故事的人及其马华素人志——论黎紫书《流俗地》的体式与修辞[J]. 海峡人文学刊, 2022, 2(4): 56-67.

[15] 徐炯, 徐德明. 《流俗地》解字说文[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2(2).

[16] 徐德明, 吉开金. “俚”失求诸“夷”：市井小说的《流俗地》迂回[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2(3): 188-195.

[17] 孙金潮. 黎紫书长篇小说的底层叙事研究[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26.

[18] 秦俊杰. 论黎紫书小说《流俗地》中的“饮食南洋”[J]. 华文文学, 2025(3): 77-82.

[19] 孟玉. 黎紫书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D]. 荆州: 长江大学, 2024.

[20] 胡星灿. 作为方法的“盲”——论黎紫书的《流俗地》[J]. 华文文学, 2022(3).

[21] 高玉. 盲者回忆录：《流俗地》建构历史记忆真实的物质性书写[J]. 文学研究, 2023(1): 106-114.

[22] 陈雅思, 朱文斌. 论黎紫书《流俗地》的不可靠叙述[J]. 华文文学, 2026(2): 27-36.

[23] 刘诗宇. 不见色，无字书——评黎紫书《流俗地》[J]. 当代作家评论, 2021(6).

[24] 曾麒霖. “自我”拓展与想象：论黎紫书《流俗地》的诗意世界建构[J]. 文学研究, 2024(1): 32-40.

[25] 李礼.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论黎紫书《流俗地》的叙事特征[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5).

[26] 谢晓莹. 族裔、间、黑暗之心——流动性视角下的黎紫书小说[J]. 美与时代（下）, 2024(12).

[27] 马绍玺, 邓宇璇. 鬼神的欢聚与抚慰——论黎紫书《流俗地》的魅态文化书写[J]. 华文文学, 2025(2).

[28] 陈欣欣. 以“民间”作为方法：《流俗地》中的狂欢叙事[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26, 41(4): 115-124.

[29] 韩宇瑄. 细腻中见大气象——论黎紫书《流俗地》的叙事品格[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1(2).

河南石窟乐舞艺术保护与传承研究

吴璇[1] 麻鑫乐[2]

（1.洛阳理工学院 教育科学与音乐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2.河南大学 教育学部，河南 开封 475000）

摘 要：河南石窟以龙门石窟和巩义石窟为代表，保留了大批北魏至隋唐时期的乐舞艺术造像，见证了中国古代乐舞形态、器乐种类和演奏姿态的传承发展。其乐舞艺术在史料挖掘、艺术美学和未来发展等都有着深刻的研究价值，但同时，河南石窟由于受自然灾害和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也存在着乐舞艺术造像损害、专项研究薄弱和传播受限等现实问题。因此，本文以河南石窟乐舞艺术造像为研究对象，在探讨其史料、艺术美学以及未来发展价值后，通过剖析当前发展的现实问题，提出新时代河南石窟乐舞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河南石窟；乐舞艺术；文物保护；文化传承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强省研究项目“黄河流域（河南段）石窟乐舞艺术保护与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025JYQS1245）

DOI：doi.org/10.70693/202610305975

A Study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Music and Dance Art of Grottoes in Henan

Wu xuan[1] , Ma Xinle[2]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Music, Luo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0, China; 2.College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0, China

Abstract: Henan grottoes, represented by Longmen grottoes and Gongyi grottoes, retain a large number of music and dance art statues from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witnes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forms, instrumental music types and performance postures. Its music and dance art has profound research value in historical data mining, artistic aesthetic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enan grottoes also hav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damage to music and dance art statues, weak special research and limited dissemin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music and dance art statues of Henan grotto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fter discussing its historical materials, artistic aesthetic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valu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usic and dance art in Henan grottoes in the new era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urrent development.

Keywords: Henan Grottoes; Music and Dance Art; Jiyue Statues;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作者简介：吴璇（1972—），女，河南洛阳人，硕士，教授，主要从事音乐教育、石窟寺音乐研究；
麻鑫乐（1999—），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主要从事教育教学研究。
通讯作者：吴璇

河南作为中原文化核心区域，是北魏至隋唐石窟开凿与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河南境内的龙门石窟、巩义石窟留存大量且体系完备的乐舞石刻遗存，涵盖飞天伎乐、壁脚乐伎、莲座奏乐造像等多种类型，完整展现了北魏至唐代乐舞艺术的发展脉络与风格变迁。相较于敦煌、云冈等知名石窟，河南石窟乐舞艺术更加突出中原礼乐文化特质，兼具西域外来艺术元素与本土审美传统，呈现出胡汉交融、雅俗兼容的艺术特征，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舞蹈与审美文化的宝贵图像资料。因此，在当前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河南石窟乐舞艺术开展系统性保护与传承研究，具备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河南石窟乐舞艺术的价值研究

1.乐舞史料价值

在河南的石窟造像中，保留着众多的乐器形制、演奏姿态和舞蹈形态。乐器形制包括中原本土乐器和外来传入乐器，其中中原本土乐器包括筝、笙、排箫、古琴等，外来传入乐器包括曲颈琵琶、竖箜篌、细腰鼓、铜钹、筚篥等。[1]演奏姿态主要分为飞天凌空演奏与地面坐奏两类，北魏巩义石窟伎乐造像多镌刻于壁脚，乐伎端坐成礼佛乐队，风格朴拙浑厚。龙门北魏伎乐多为飞天，飘带飞扬，凌空持器演奏。唐代奉先寺、万佛洞乐伎体态丰腴，盘坐莲座之上，弹拨琵琶、箜篌者左手按弦、右手拨弹，吹笛、排箫者将乐器抵于唇边，击细腰鼓、铜钹者扬臂作敲击态。[2]龙门石窟万佛洞南壁舞伎舞姿劲朗雄健，北壁舞伎姿态优雅柔美；极南洞、八作司洞亦保存唐代舞伎造像，可辨识其时舞蹈体态、服饰形制与舞袖动态特征。石窟造像为这些乐器、演奏姿态以及舞蹈姿态提供了可视化参考，弥补了古籍文字描述模糊的短板，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不可替代的图像史料。

2.艺术美学价值

河南石窟内的伎乐造像大多遵循对称的设计原则，并且有序排列形成完整的环形乐舞装饰带，与石窟内的的空间布局结构相融合，打造出既庄严肃穆又活泼灵动的宗教氛围。纵观北魏至唐代的造像发展，石窟乐舞造型审美是不断地在发展变化。例如，北魏伎乐造像身形清瘦古朴、线条凝练，兼具简约与厚重之美；唐代伎乐造像体态丰腴饱满、姿态舒展灵动，舞蹈线条流畅自然，充分彰显出不同历史时期独特的艺术审美风尚。相较于敦煌、云冈等石窟，河南石窟乐舞艺术摒弃了纯粹的西域宗教审美，在深度融合中原传统礼乐文化内核后，形成了独具河洛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因此，河南石窟乐舞艺术是古代河洛地区审美理念与艺术精神最直观的表现。

3.未来发展价值

在河南石窟乐舞造像的传承发展方面，其具备较强的当代转化价值，为河南带来极高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价值，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例如，依托龙门石窟传统伎乐造型衍生的《龙门金刚》等文艺作品，成功将“静态”石刻资源转化为“动态”舞台艺术，让沉寂千年的石窟文物再现光彩。诸如此类的文化创新模式，一方面创新了中原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形式，塑造了极具辨识度的河南文化 IP；另一方面，也为石窟艺术的文旅融合、文化传播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全新发展思路，从而推动河南石窟乐舞艺术实现持续性传承和广泛传播。

二、河南石窟乐舞艺术的发展现状

1.环境因素侵扰，文物遗存损耗严重

河南石窟乐舞造像大多雕凿在露天崖壁上，长期直接接触外界环境，缺少封闭防护，造像持续受到各类自然因素破坏。大多数造像因长期受岩体风化、雨水渗透、酸雨侵蚀等自然灾害影响，大量伎乐造像的纹饰逐渐模糊剥落，面临不可逆的损毁风险。[3]相较于石窟整体造像，乐舞伎乐浮雕雕刻由于层次较浅、纹饰精细繁复，更容易遭受自然环境的侵蚀。故而，使得乐伎体态、服饰纹样、器乐结构、飘带肌理等艺术信息逐渐缺损，部分造像甚至出现形态残缺、细节湮灭、特征模糊等不可逆伤害。这些自然环境的持续性破坏，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乐舞艺术图像史料的永久性缺失，也极大提升了文物修复与科学保护的工作难度。

2.专项研究滞后，文化价值挖掘不足

当前学界对于河南石窟文化的研究，多聚焦于造像题材、佛教义理、造像形态、石刻书法、岩体病害治理等宏观领域，针对石窟乐舞艺术的专项研究仍相对滞后。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成果多呈现碎片化特征，乐器形制考证、舞姿流变、审美演变及文化交融等内容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相较于敦煌石窟乐舞、唐代宫廷乐

舞等成熟研究领域，河南龙门与巩义石窟乐舞遗存的独特价值仍缺乏系统性挖掘。在理论研究上，对北魏至隋唐时期乐伎造像、中外器乐交融以及石窟乐舞艺术本土化等方面的研究深度不足，不能有效解读河南石窟乐舞艺术其蕴含的独特之处，较多乐舞图像史料的理论学术价值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开发。

3.活化路径局限，文物普及成效偏弱

现阶段河南石窟乐舞艺术的活化与传承方式较为单一，表现形式较为固定，传播覆盖范围有限。目前相关展示与推广仍以石窟景区静态陈列、学术研究以及文献整理等传统形式为主，受众多局限于文博行业与学术研究者，很难进一步向普通大众拓展，实现更为广泛的社会传播。从现有实践来看，石窟乐舞在数字展演、美育推广、文创开发与舞台艺术创新等方面的探索仍较为有限，缺少契合当下传播环境的动态化、沉浸式与年轻化表达。河南石窟乐舞艺术传播形式的局限，使得普通大众对河南石窟乐舞的历史内涵与艺术价值了解不够，不利于持续推进其活态传承。

三、河南石窟乐舞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路径——让文物“活”起来

1.本体性保护与传承：重视河南石窟造像的保护发展

造像本体防护是河南石窟乐舞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利于石窟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河南石窟中的乐舞造像大多暴露在露天崖壁，常年遭受诸如风化、渗水、酸雨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其伎乐浮雕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例如纹饰模糊、浮雕残损以及细节缺失等，这些破坏都是不可逆的损害。故而，河南石窟乐舞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首要任务即是对雕塑主体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为后续保护和研究提供丰富的载体。文物管理部门要进行常态化排查，借助地质勘察、环境监测等手段，全面了解石窟所处的地质结构、水文条件以及气候变化对石窟的影响，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提供坚实依据。[4]同时，“最小干预、修旧如旧”是石窟文物修复过程中所要坚持的核心原则，以期最大程度地保护石窟内乐舞文物造像，避免同质化修复和过度修复的现象出现。通过搭建常态化管护、动态监测与预防性保护一体化工作体系，从实物保护层面改善石窟遗存保存条件，为后续学术研究、文化解读以及活态传承提供基础保障。

2.理论性保护与传承：深入研究河南石窟的文化价值

深厚的学术理论研究能够深度解析石窟乐舞文化的内涵，从而延续地方文脉，为文化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现有的河南石窟理论研究不成体系，大多围绕造像主题、灾害治理、佛教发展等方面展开，在乐舞艺术领域未得到充分的阐释和研究，该领域目前发展相对不足。为此，学界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依托历史学、音乐学、舞蹈学等学科展开复合研究，构建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河南石窟乐舞研究理论体系。一方面，通过系统梳理北魏、初唐、盛唐不同时期乐伎造像形态、舞蹈范式、乐器种类、乐队组合的演变特征，厘清河南石窟乐舞艺术的发展脉络与审美嬗变规律；另一方面，深度探析丝绸之路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原传统礼乐与西域乐舞艺术的融合路径，总结河南石窟乐舞区别于其他石窟艺术的地域特征与文化特质。通过深度且体系的理论研究，可以为河南石窟乐舞艺术留存大量理论佐证基础，为乐舞艺术的保护、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发展性保护与传承：数字赋能河南石窟创新性发展

数字技术助力当代河南石窟乐舞艺术打破发展困境，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发挥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为乐舞艺术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河南石窟乐舞艺术，同时也促进其永续发展。[5]过去单纯依靠实体保护与静态展示的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当下河南石窟乐舞艺术发展的现实需求，其文化价值也很难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数字技术手段便应运而生，推动乐舞艺术更加立体、直观的展现。首先，可利用三维建模、数字化采集、数字激光化扫描等技术，对各类乐伎造像、乐器浮雕进行全方位数据采集，搭建石窟乐舞数字资源数据库，实现文物信息的数字化留存与长效保存。其次，依托数字传播与文艺创作手段，深度挖掘石窟飞天、乐伎舞姿、传统器乐等特色艺术元素，结合 3D 打印、舞台演艺、数字文创产品、新媒体传播、沉浸式 AR 体验等多元形式，打造具有中原辨识度的石窟乐舞文化 IP，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乐于接触此类事物。数字技术赋能河南石窟乐舞艺术的发展，可以将静态石刻艺术转化为动态化、大众化的文化产品，真正实现乐舞艺术从“静态保存”向“动态传承”的转变。

四、结语

河南石窟乐舞艺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特质，且具备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空间，因此对河南石窟乐舞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其中的石窟乐舞造像是传承河洛文明的重要载体，保存了北魏至隋唐乐舞艺术的发展面貌，为研究中国古代乐舞史、艺术史等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鉴于当前河南石窟乐舞遗存面临的保护短板与传承困境，应当从本体性保护、理论性保护和未来发展性保护三个维度构建多层次保护传承体系。通过全方位的保护和传承策略，推动河南石窟乐舞文化突破静态遗存的局限，助力其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莉,杨超杰.龙门石窟唐代歌伎造像的新认识[J].中原文物,2022,(4):131-135.

[2] 饶开芹,周安文.龙门石窟唐代造像中的舞蹈形态探微[J].中原文物,2016(1):98102.

[3] 严绍军,方云,孙兵,等. 渗水对龙门石窟的影响及治理分析[J]. 现代地质,2005,19(3):475-478.

[4] 崔晓霞.云冈石窟艺术保护与传承[N].中国文物报,2025-07-03(006).

[5] 杭侃.科技引领，传承经典——云冈石窟的开凿与保护[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6(6):1-7.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

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李中华[1,2]

(1.成都大学，四川 成都 610106，2.体育健康旅游技术研发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101)

摘 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本文系统分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基于区域协同发展理论、产业融合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等理论基础，提出了构建“政策协同-资源整合-市场联动-产业融合-生态保障”五位一体的休闲体育旅游发展模式和发展模式的保障措施，以促进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为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相关管理者以及市场经营者提供理论参考、实践指导和决策依据。

关键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休闲体育旅游；发展模式

基金项目：体育健康旅游技术研发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点实验室 2025 年度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TYJKLY-2025-C-003)

DOI：doi.org/10.70693/202610310616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Leisure Sports Tourism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Li Zhonghua[1,2]

[1]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Sports and Health Tourism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Cultureand Tourism of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Twin-City Economic Circle, as a major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present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growth of leisure sports tourism in both Chengdu and Chongqi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ports tourism in these two citi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Twin-City Economic Circle. Drawing 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such 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or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o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it proposes a “five-in-one” leisure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comprising “policy coordin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 Market Linkage - Industrial Integration - Ecological Safeguards,” along with supporting measures to ensure its implementation. This approach aims to promote the

作者简介：李中华(1988—)，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休闲体育、体育旅游、户外运动、大型体育赛事。
通讯作者：李中华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ports tourism in both Chengdu and Chongqing,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practical guidance, and a basis for decision-making to relevant managers and market operators in the sector.

Keywords: Chengdu-Chongqing Metropolitan Area; Leisure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1 前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 月 3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1]。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形成有实力、有特色的双城经济圈，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2]。

休闲体育旅游是以体育资源和旅游资源为基础,以休闲为目的,吸引人们参与欲望与需求,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体育活动与大自然情趣的一种全新型互动体验形式的休闲生活方式。休闲体育旅游随“休闲时代”应运而生，作为文体旅融合的新兴业态，不仅契合了人们对休闲、体育、度假、疗养等的多元需求，也实现了休闲体育旅游与经济的关联互动、协同发展的联动效应，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成渝两地历史同脉、文化同源，自然资源独特，巴蜀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为成渝两地开展休闲体育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成渝两地体育、文旅部门主动打破行政壁垒，从“一家亲”走向“一体化”，在共办赛事、共建线路、共塑品牌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合作，2023 年 9 月 15 日四川省体育局、重庆市体育局联合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规划(2023—2025 年)》的通知[3]。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将分散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统一的产业优势，如何将行政推动的合作深化为市场驱动的融合，如何构建可持续、可复制的发展模式，仍需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

本文旨在系统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发展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核心框架和保障措施，以促进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同时为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相关管理者以及市场经营者提供理论参考、实践指导和决策依据。

2 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

尽管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资源丰富，但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仍存在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专业人才匮乏、产品创新与品牌建设滞后、政策资金监管保障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

2.1 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

由于成都和重庆分属不同行政管辖范围，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工作多以属地推进为主，缺乏统一的协同发展机制，主要表现为：（1）政策协同不足，成渝两地的休闲体育旅游政策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政策支持体系与协调机制，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2）资源整合不足，成渝两地的休闲体育旅游资源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开发，存在重复开发、同质化竞争现象，未能形成区域品牌效应。（3）市场联动不足，成渝两地的休闲体育旅游市场大多各自开展运营推广，没有建立联合宣传、客源互相输送的合作模式，营销渠道、游客资源难以互通共用。（4）产业要素流通存在阻滞，人才、资金、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受属地管理、地方保护等因素制约，跨区域流转存在现实障碍，无法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实现优化配置。

2.2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是制约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以下问题：（1）交通设施不完善，部分偏远景区的交通可达性较差，缺乏便捷的公共交通与旅游专线。（2）基础配套设施供给不足，部分景区尤其是偏远地区景区，餐饮、住宿、公共卫生间、停车场等基础配套设施供给不足，部分设施老旧、服务品质不高，难以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消费体验需求。（3）安全设施缺乏，部分景区的安全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不完善，存在安全隐患。（4）智慧旅游设施滞后，部分景区的信息化水平较低，缺乏在线预

订、智能导览、信息查询等智慧旅游服务。

2.3 专业人才匮乏

休闲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既懂体育又懂旅游、既懂经营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当前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领域的专业人才存在以下问题：（1）人才数量不足，尤其是高端管理人才、策划创意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短缺。（2）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多集中在基层服务岗位，缺乏高端策划、运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人才。（3）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不符，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4）人才流失严重，部分企业由于薪酬待遇、发展空间等原因，难以留住优秀人才。

2.4 产品创新与品牌建设滞后

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产品以传统项目为主，缺乏创新性与个性化，难以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主要表现为：（1）产品类型单一，多数景区集中在登山、徒步、漂流等传统项目，缺乏高端化、个性化、体验化的休闲体育旅游产品。（2）产品深度不够，对体育文化、民俗文化的挖掘不足，产品附加值较低。（3）品牌建设滞后，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休闲体育旅游品牌，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不高。（4）宣传推广不足，宣传渠道单一，宣传内容缺乏吸引力，未能有效提升区域休闲体育旅游的影响力。

2.5 政策资金监管保障体系不完善

尽管我国出台了多项支持休闲体育旅游发展的政策，但成渝两地的政策资金监管保障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1）政策针对性不强，现有政策多为宏观指导，缺乏针对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协同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2）政策执行不到位，部分政策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与监督机制，未能得到有效落实。（3）资金支持不足，休闲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政府的资金扶持力度有限，社会资本的参与性不高。（4）监管体系不完善，缺乏对休闲体育旅游市场的有效监管，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发展模式构建

3.1 发展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

3.1.1 区域协同发展理论

区域协同发展理论强调区域内各要素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实现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是协同发展，休闲体育旅游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成渝两地的资源优势，通过政策协同、资源整合、市场联动、产业融合，实现区域内休闲体育旅游的协同发展，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3.1.2 产业融合理论

产业融合理论认为，不同产业之间通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可以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4]。休闲体育旅游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其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体育、旅游、文化、健康、科技等多产业的融合，丰富产品供给，提升产业附加值，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3.1.3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社会进步的协调统一。休闲体育旅游的发展需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在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促进休闲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1.4 需求层次理论

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存在从低到高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5个层次,后又在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之间加入了求知需求和美的需求两个层次[5]。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与生活品质的提升，消费者对休闲体育旅游的需求已从基础的观光、健身需求，向社交、体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转变，这要求产业发展需注重产品创新与品质提升，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高品质需求。

3.2 发展模式的核心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与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的发展现状，本研究构建“政策协同-资源整合-市场联动-产业融合-生态保障”五位一体的休闲体育旅游发展模式。该模式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以政策协同为制度保障，以资源整合为基础支撑，以市场联动为动力引擎，以产业融合为路径依托，以生态保障为底线支撑，五位一体、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

3.2.1 政策协同：制度保障

政策协同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应重点实现“三统一、一机制”：

(1) 统一发展规划：成渝两地政府应加强沟通协调，制定统一的休闲体育旅游发展规划，联合编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协同发展规划（2026-2030 年）》，明确发展目标、重点区域、空间布局、重大项目、重点任务与保障措施，实现差异化、协同化发展。

(2) 统一协调机制：成渝两地政府应建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由两地体育、文旅、财政、交通、发改等部门组成，定期召开协调会议，解决休闲体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建立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与考核评价机制，确保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3) 统一支持政策：成渝两地政府应出台跨区域专项支持政策，包括跨区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资金扶持、税收优惠、人才政策等，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跨区域项目建设与运营。

(4) 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成渝两地政府应制定跨区域利益分配办法，明确两地在资源开发、客源互送、品牌推广等方面的利益分配比例与方式，保障各方利益，激发协同发展积极性。

3.2.2 资源整合：基础支撑

资源整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应重点实施“三整合、一提升”：

(1) 资源规划整合：成渝两地政府应对成渝两地的休闲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全面普查与评估，建立跨区域资源数据库，明确资源类型、分布、等级与开发潜力，编制统一的资源开发规划，明确各区域的发展定位与重点项目，避免重复开发与同质化竞争。

(2) 推动资源跨区域整合：成渝两地政府应加强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资源的联动开发，打造跨区域的休闲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如“成都-都江堰-武隆-长江三峡”山水休闲体育线路、“成都-峨眉山-重庆金佛山”登山养生线路、“成都-川西草原-重庆乌江画廊”生态休闲线路、“双城都市-三星堆-大足石刻”文化体育线路、“乡村振兴-农事体育-民俗体验”乡村休闲线路，实现资源联动与优势互补。

(3) 品牌资源整合：成渝两地政府应整合成渝两地品牌资源，打造“成渝休闲体育旅游”区域公共品牌，统一品牌形象、宣传口号、视觉标识，提升品牌辨识度与影响力；培育 3-5 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子品牌，如“川西户外”、“重庆山地”、“双城赛事”等。

(4) 资源开发提升：成渝两地政府应深度挖掘资源文化内涵，将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民俗文化融入休闲体育旅游产品开发，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注重产品创新，开发高端定制、亲子互动、老年养生、数字体验等多元化产品，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

3.2.3 市场联动：动力引擎

市场联动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应重点推进“三联动、一规范”：

(1) 客源联动：成渝两地政府应建立跨区域客源互送机制，鼓励两地旅行社开展深度合作，互推旅游产品与线路，对跨区域输送客源的旅行社给予奖励；推出跨区域旅游套票、年卡与优惠券，实现“一票通游、一卡通用”，促进客源自由流动。

(2) 营销联动：成渝两地政府应联合开展宣传推广活动，举办“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节”，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整合两地宣传资源，利用新媒体、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开展联合营销，扩大市场覆盖面；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分析游客需求，开展个性化营销与定制化服务；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营销模式，提升营销效果。

(3) 信息联动：成渝两地政府应搭建“成渝休闲体育旅游智慧服务平台”，整合两地旅游信息、产品预订、智能导览、投诉处理等功能，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服务；建立跨区域市场需求监测机制，及时发布市场动态与需求变化，为企业产品创新与营销决策提供依据。

(4) 市场规范：成渝两地政府应建立跨区域市场监管协同机制，统一服务质量标准、市场监管流程、消费者权益保护办法，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打击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提升游客的消费体验。

3.2.4 产业融合：路径依托

产业融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依托，应重点推动“五融合、一转型”：

(1) 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成渝两地政府应以体育资源为基础，以旅游为载体，开发多样化的休闲体育旅游产品，如体育赛事旅游、户外探险旅游、养生体育旅游等。

(2) 推动体育与文化融合：挖掘地域文化与民俗体育资源，将文化元素融入休闲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中，打造具有文化特色的休闲体育旅游项目，如巴蜀武术体验、巴渝民俗体育旅游等。

(3) 推动体育与健康融合：成渝两地政府应结合“健康中国”战略，开发养生保健、康复疗养等休闲体育旅游产品，如温泉养生体育旅游、森林康养体育旅游等。

(4) 推动体育与科技融合：成渝两地政府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提升休闲体育旅游的智能化水平，开发智慧旅游产品与服务，如智能导览、在线预订、虚拟体验等。

(5) 推动休闲体育旅游与乡村振兴融合：成渝两地政府应结合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战略，开发乡村休闲体育旅游产品，如乡村徒步、乡村露营、农事体育体验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6) 推动产业转型：成渝两地政府应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从“产品供给”向“体验服务”转型，从 “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转型，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3.2.5 生态保障：底线支撑

生态保障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底线支撑，应重点做好“三协同、一修复”：

(1) 做好生态保护协同：成渝两地政府应建立跨区域生态保护协同机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生态保护标准与监管流程，加强对重点景区、河流、森林等生态资源的保护；建立生态环境监测联动机制，实时监测区域生态环境变化，及时处置生态环境问题。

(2) 做好绿色发展协同：成渝两地政府应推广绿色发展理念，鼓励企业采用环保材料、清洁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倡导绿色旅游方式，推广徒步、骑行、露营等低碳休闲体育项目；建立绿色景区、绿色企业评价体系，引导产业绿色发展。

(3) 做好应急管理协同：成渝两地政府应建立跨区域应急救援协同机制，整合成渝两地应急救援资源，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应急救援设备；制定跨区域应急预案，开展联合应急演练，提升应对突发安全事件的能力。

(4) 做好生态修复治理：成渝两地政府应对过度开发、生态受损的景区进行生态修复，恢复生态功能；加强对景区周边环境的治理，改善人居环境与旅游环境，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

3.3 发展模式的保障措施

3.3.1 健全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1) 组建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成渝两地文旅、体育、发改、财政、交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出台一体化配套政策，消除两地政策差异，搭建常态化政策会商协调平台。

(2) 统一开展全域资源普查，分区管控避免重复同质化开发，联合打造跨区域精品线路与区域公共品牌。

(3) 搭建一体化联合宣传平台，出台客源互送激励政策，打通两地市场资源共享渠道。

(4) 出台人才、资金、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跨区域流通便利化政策，破除行政流动壁垒，构建全域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格局，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协作、资源市场要素一体化推进工作机制。

3.3.2 升级全域一体化基础设施

(1) 加快成渝两地交通一体化，开通景区直达旅游专线、城际接驳班车，改善偏远景区通达性。

(2) 统筹布局景区住宿、餐饮、停车、环卫等配套设施，规划建设区域综合旅游集散中心，一站式服务满足游客多元需求。

(3) 统一规范全区域户外景区安全防护、应急救援设施配置标准，共建跨区域应急处置联动机制。

(4) 统筹搭建成渝两地一体化智慧旅游总平台，覆盖线上预订、智能导览、实时咨询、跨区域投诉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全面提升游览体验。

3.3.3 打造复合型人才引育留全链条体系

(1) 成渝两地高校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调整相关专业课程设置，深化校企共建实训基地，贴合产业需求培育实操人才。

(2) 出台跨区域高端人才引进补贴政策，重点引进管理、策划、技术紧缺人才，配套激励机制。

(3) 建立成渝两地人才互访、联合轮训制度，分层培训基层、管理从业人员，均衡人才结构。

(4) 统一区域行业薪酬指导标准，完善晋升、培训发展通道，稳定人才队伍，降低流失率。

3.3.4 共建全域产品创新与区域品牌体系

(1) 设立成渝两地联合创新专项资金，组建文体旅智库，深度深挖巴蜀、巴渝民俗体育资源，开发高端、沉浸式特色体验产品，规避同质化。

(2) 统一打造“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公共区域品牌，统一服务与视觉规范，分层培育赛

事、山地、户外特色子品牌。

(3) 整合两地宣传渠道，构建全域联合营销矩阵，落实客源双向奖励机制。

(4) 依托一体化智慧平台上线定制游、VR虚拟体验、赛事直播数字化产品，以数字手段拓宽宣传与产品展示渠道。

3.3.5 完善一体化政策资金监管保障体系

(1) 成渝两地联合出台休闲体育旅游协同发展的专项实施细则，填补宏观政策空白，建立跨区域政策会商、督办考核机制，保障政策落地。

(2) 设立成渝两地休闲体育旅游协同专项基金，配套贴息、融资担保优惠，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产业项目。

(3) 组建成渝两地联合市场监管专班，统一行业准入、服务、安全标准，搭建跨区域投诉联动平台，常态化联合执法。

(4) 建立产业资金、项目落地动态绩效监测评价机制，实现政策、资金、监管闭环管控。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EB/OL].(2020-01-03)[2026-08-15].https://www.gov.cn/xinwen/2020-01/03/content_5466363.htm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31):13-33.

[3] 四川省体育局 重庆市体育局.四川省体育局 重庆市体育局关于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规划（2023—2025年）》的通知[EB/OL].(2023-08-15)[2026-08-15].https://tyj.sc.gov.cn/sctyj/sjwj/2023/9/15/29281e5202a74c8ba4bb8a425ebafe8e.shtml

[4] 郑婉怡.大庆“五区四县一体”旅游发展机制的构建与实践[J].西部旅游,2025,(11):86-88.

[5] 马斯洛.许金声(译).动机与人格(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WISVORA

WISVORA 出版社：專注於學術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編輯、論文出版和國際索引、期刊創辦、期刊託管等服務，增強學術研究的全球傳播和影響力。

www.wisvora.com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是由香港 WISVORA PUBLISHING 出版、面向全球發行的國際中文學術期刊。本刊聚焦人文社科領域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應用，深耕學科核心議題與前沿研究，倡導跨學科、跨文化的多元研究視角，打通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的溝通壁壘，推動學術知識的傳播、共享與轉化，助力全球華語學術界交流與發展。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52
網上出版 ISSN 3079-4560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01>

權責聲明
本期刊所刊載的評論、意見、觀點等均出自文章作者個人立場，不代表本期刊的觀點或看法。對於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內引用材料給任何個人、機構、及其財產所帶來的任何損失及傷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鄭重聲明，本出版社的出版業務，不構成對任何產品商業性能的保證，也不表示本社業已承認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內容適用於某特定用途。如有疑問，請尋找專業人士協助。

學術贈閱